

李慎明/主编

王立强 傅军胜 曹苏红/副主编

历史在这里沉思

苏联解体20周年祭

HISTORICAL REFLECTIONS AFTER 20 YEARS OF SOVIET UNION'S COLLAPSE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研究系列 45

历史在这里沉思

苏联解体20周年祭

HISTORICAL REFLECTIONS AFTER 20 YEARS OF SOVIET UNION'S COLLAPSE

李慎明/主编

王立强 傅军胜 曹苏红/副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文前彩插


CASS
中国社会科学论坛——苏联解体2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Forum
—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he 20th Anniversary of the Collapse of Soviet Union
主办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Sponsored b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中国·北京 2011.04.23 Beijing, China April 23, 2011


《居安思危-苏共亡党二十年的思考》《2010-2011世界社会主义黄皮书》发布暨
世界格局演进与世界思潮变化学术研讨会
主办：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
社科文献出版社
2011年3月1日

深入剖析苏联解体因果教训　准确把握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趋势

——"中国社会科学论坛——苏联解体2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发言摘要

大会致辞

论坛概况

组织路线错误是苏共失败的重要原因

经济学"西化"：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

苏联解体与世界格局

苏联解体后果再思考

苏联剧变和解体缘自内部

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

苏联解体进程中意识形态的作用及其教训

当前俄罗斯历史问题

苏联政治改革与民主化的教训

苏联与东德祸福一体

关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现状与展望

苏联崩溃原因：俄罗斯国内争论的若干结论

苏联解体与当今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

战争与和平：谁将获胜?

总结国际共运历史经验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居安思危——苏共亡党二十年的思考》发布会发言摘要

对苏联亡党亡国的现实思考

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在于苏共的蜕化变质

坚定信仰　高举旗帜　正视历史　依靠群众

拒腐防变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为什么前苏联会不攻自破?

正确的导向　严密的论证　翔实的资料　巨大的影响

站在人民的立场解读苏联剧变的教训

对苏联解体重大历史事件的深入思考

目录

- 代序 在“中国社会科学论坛——苏联解体2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致辞
- 主旨报告
    - 苏联解体与世界格局
    - 组织路线上的严重错误是苏共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 摧毁苏联的原因：俄罗斯进行的争论及一些结论
- 第一篇 戈氏“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与苏联解体
    - 历史在这里沉思
    - 苏联解体的原因分析
    - 苏联剧变和解体的根本原因是内部出了问题
    - 经济学“西化”：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
    - 裂变、失败与崩溃
    - 关于苏联解体原因、后果的再思考
    - 评苏共在改革中亡党的六大教训
    - 斯大林问题，一份悬而未决的历史遗产
    - 观照苏联剧变的一个视角
    - 苏联解体的历史原因
    - 苏联解体20年：学界如何评价戈尔巴乔夫及其改革
    - 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误与苏联解体
- 第二篇 苏联70年兴亡历史：成也苏共 败也苏共
    - 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党纲中的苏联东欧剧变
    - 苏共亡党过程中的意识形态教训及时代警示
    - 社会信仰体系崩溃：前苏联制度颠覆的一个重要根源
    - 成也苏共 败也苏共
    - 苏共亡党的深刻教训
    - 从思想政治教育视角解读苏联解体
    - 苏联解体20年再看文化因素
    - 苏联解体起源于抹黑斯大林

    - 苏共变质与苏联解体
    - 苏共利益观的蜕变及其严重后果
    - 教训与启示：苏联共产党丧失政权的思考
    - 希腊共产党关于苏东剧变原因的思考
    - 思想路线错误是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根源
    - 苏共党内特权阶层的腐败和蜕变是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

- 第三篇 西方大国的和平演变战略与苏联解体

    - 从美国战胜苏联的“其他方式”看外因对苏联解体的影响
    - 苏联解体进程中意识形态的作用及其教训
    - “文化冷战”和苏联解体
    - 苏共亡党的教训：要深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
    - 苏联解体的历史启示
    - 研究苏联演变问题的一份宝贵材料
    - 意识形态的变化与苏联剧变

- 第四篇 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及美国对中亚战略新变化

    - 苏联解体20年：影响远未结束
    - 20年来美国中亚战略的基本路径
    - 关于俄罗斯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
    - 俄罗斯教育前景堪忧 腐败成为最严重问题
    - 国家治理与政治稳定的悖论
    - 从苏联社会剧变看俄罗斯转型
    - 后苏联时代的“有限民主”和俄罗斯左翼的困境
    - 俄罗斯左翼学者：质疑现实，憧憬未来

- 第五篇 苏联解体后资本运动的新特点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

    - 关于苏联解体的几点思考
    - 苏联解体后资本运动的新特点与社会主义斗争的新任务
    - 苏东剧变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探索中前进
    - 金融危机后社会主义在世界的吸引力剧增
    - 苏联解体以来越古老朝社会主义运动现状及路向探析
    - 中东欧左翼学者和共产党对未来社会主义的思考与展望
    - 苏联解体与古巴社会主义的“更新”

- 第六篇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学者对几个争论

问题的评析

    - 戈尔巴乔夫全盘否定苏共领袖和苏共历史的背景
    - 妖魔化斯大林及苏共领袖人物的过程
    - 从对斯大林的批判扩大到对共产党领袖人物的批判
    - 全盘否定苏共领导人与苏联解体
    -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对世界局势的影响
    -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果的总体评价
    - 今天对于苏联解体这一历史事件的争论焦点
    - 今天俄罗斯人如何看待历史
    - 革命性的创举还是悲剧性的政变？
    - 15年后看苏联解体

- 第七篇 国际理论界对苏东剧变重大历史事件的回顾与展望

    - 关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现状与展望
    - “改革”：总结和教训
    - 苏联解体与当今国际社会主义运动
    -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被系于同一个命运共同体
    - 苏联模式社会主义解体的三个教训
    - 战争与和平：谁将获胜？
    - 苏联解体20年
    - 社会主义消亡：社会主义长存
    - 苏联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从斯大林主义向21世纪社会主义转型的失败
    - 越南学者对苏联解体和社会主义前途的看法
    - 苏联社会契约的终结
    - 苏联垮台的根本原因和经验教训

- 附录一 会议综述

    - 苏联解体并未改变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趋势

- 附录二 发言摘要

    - 深入剖析苏联解体因果教训 准确把握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规律

- 附录三 论文摘编

○ 一 从苏联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教条化看苏联解体
○ 二 民生问题是如何促使苏联解体的？
○ 三 政治资源流失对苏联解体的影响
○ 四 中国军事软实力建设的战略思考
○ 五 苏联解体与现代公有产权制度的包容性和发展
○ 六 关于苏联剧变原因研究中若干问题的思考
○ 七 苏联环境政策失败的教训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 八 文明的融合：21世纪中俄两国关系发展前景展望
○ 九 从“以人为本”的视角初探苏联解体的体制原因

代序 在“中国社会科学论坛——苏联解体2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致辞

王伟光 [1]

今年是苏联解体20年。苏联解体、苏共亡党是20世纪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20年前，苏联解体曾使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学术精英额手称庆。福山自信地宣称：20世纪社会主义制度实践的大规模失败，标志着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最后一种政治形式和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自由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在全世界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这就是历史的终结。因为，虽然历史的自然过程还会继续，但历史的所有大问题已经完全解决，不再有重大事件发生。20年过去了，我们看到了什么呢？美国爆发的世界金融危机表明，西方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制度不但没有解决世界面临的所有重大问题，而且带来了资本主义世界更大的一场灾难，使西方资本主义面临全局性的衰退趋势。而苏联的解体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失去了一个有力的竞争对手，但与此同时，它也失去了自我克制的动力和自我反省的能力，不可抗拒地遵循资本主义内在矛盾规律，亦步亦趋地走向衰退。短短20年的历史，我们见证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制造的局部战争连绵不断、贫富鸿沟日益增大、各类危机频繁爆发等一系列人类社会危机问题。

苏联的解体既没有终结也没有改变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今天生存的世界仍然是一个由资本扩张主导的，人类利益被迫服从于资本意志的世界，这不仅没有超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视野，而且可以说，当今世界是自从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描述和科学预期的世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根据资本积累的实质推断出的全球化、全球范围的两极分化、金融资本的恶性膨

胀等现象必然出现，资本主义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的激化，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制度性危机的爆发越发显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当年对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预测在今天越发显示其科学的预见性。

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的结构性制度危机，西方“自由民主”所标榜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等一整套理念、制度体系无法给予有效答案，以解决人类面临的种种迫在眉睫的生存问题。这些问题包括由生产过剩导致的经济危机，由利益争夺、价值冲突、两极分化导致的局部战争和贫困饥饿，由过度追求物质生活方式导致的环境和能源危机，以及人们因对人类生存状况失望而产生的悲观厌世和愤世嫉俗的情绪……要解决所有这些问题，人类必须要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价值观中寻求解决思路，必须要认识到资本主义、个人主义、物质主义、拜金主义、自由主义这些主导着人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体系已经造成了人类灵魂的深刻异化和人类社会的深重灾难。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急需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智慧。

存在主义哲学大师萨特曾经说过一句名言：马克思主义是当代唯一不可超越的哲学，任何超越它的企图，不是重复马克思主义早已说过的东西，就是回到马克思主义以前的陈旧观点上去。苏联解体后20年的历史进程再次向我们证明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过时，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仍然是解决资本主义现存问题的切实可行的方案。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人类的未来，而对未来的开拓是建立在对历史正确解读的基础之上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是社会主义事业和人类解放事业遭遇的重大挫折，而深刻认识苏联解体的原因和它对世界产生的影响，是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前提。

在苏联解体20年之际，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论坛——苏联解体2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目的就是为国内外对苏联解体和社会主义命运感兴趣的学者提供一个学术交流的平台，为推动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尽一份微薄之力。这次会议得到了国际友人的积极支持和热烈响应。国内知名学府、杂志社也都踊跃参与。我们此次会议就由12家单位共同举办。在此，我谨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陈奎元院长，热烈祝贺“中国社会科学论坛——苏联解体20周年国际学

术研讨会”的召开，向国内外在推动社会主义和人类进步事业付出辛勤劳动、作出重大贡献的各位专家、学者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最后，我祝愿这次学术研讨会圆满成功！

谢谢！

---

[1] 王伟光，中国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研究员。

主旨报告

苏联解体与世界格局

李慎明 [1]

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有三件大事分外值得关注：一是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二是194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是1991年底的苏共亡党、苏联解体。这三件大事，都对世界格局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其中的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前两件大事给我们共产党人带来无尽的喜悦与振奋；而苏共亡党、苏联解体这第三件大事给我们共产党人带来的则是令人震惊和痛惜。

苏共亡党、苏联解体与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有着根本不同的性质。马克思在论述巴黎公社的失败时曾明确指出：“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而为人所称颂。它的英烈们已永远铭记在工人阶级的伟大心坎里。那些扼杀它的刽子手们已经被历史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不论他们的教士们怎样祷告也不能把他们解脱。”[2] 而苏共亡党、苏联解体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巨大逆流、灾难和反动，是人类历史发生的大曲折、大逆转；葬送苏联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苏联的叛徒们也同样已经被历史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不论他们的教士们怎样祷告也不可能把他们解脱。

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多次反复强调反面教员的独特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讲，没有中国土地革命时期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中湘江战役5万余人的鲜血，便没有后来的遵义会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为有牺牲多壮志。”没有苏共亡党、苏联解体这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乃至人类历史上这一重大灾难，我们便不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艰辛与壮烈，因而也反衬

不出社会主义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雄伟与瑰丽。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湘江战役5万余人的牺牲与苏联解体、苏共垮台，对于共产党人来说，虽同为悲剧，但属于两种不同性质的悲剧。虽然从对革命造成重大损失这一点上看，不存在极“左”比极右好的问题，但毕竟属于两种不同性质的悲剧。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湘江战役5万余人的牺牲毕竟是仍要革命的问题，而苏共亡党、苏联解体则是对革命背叛的问题。两者在这点上无疑有着原则的区别。在今后社会主义运动的征程中，我们无疑要继续警惕犯过去“左”的错误，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在纠正一种倾向的同时，也要警惕被掩盖着的另一种倾向的产生——注意右的错误思潮的发生。邓小平曾说：“东欧、苏联的事件从反面教育了我们，坏事变成了好事。问题是我们要善于把坏事变成好事，再把这样的好事变成传统，永远丢不得祖宗，这个祖宗就是马克思主义。”[3] 因此，对苏联解体、苏共亡党这一重大历史现象进行深入剖析，汲取深刻教训，对加强各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建设乃至全人类解放事业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2011年，是苏共亡党、苏联解体20周年，其深远意义正在显现。

如何为苏共亡党、苏联解体这一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定性呢？是一场大灾难还是一次大进步呢？前几年，无论是在俄罗斯还是在其他各国，对这一重大问题都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从一定意义上讲，“好得很”与“糟得很”各不相让。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1913年，欧洲那些自称“文明的”国家正在进行军备竞赛，而成千种报纸、成千个讲坛，用成千种论调以“爱国主义”、“捍卫文化”等幌子为扩大军备寻找理由。针对这一现象，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要是一下子看不出是哪些政治集团或者社会集团、势力和人物在维护某些提议、措施等等，那总是要提出‘对谁有利？’这个问题的。”“公众先生们！别相信空话，最好是看看对谁有利！”[4]

苏共亡党、苏联解体对谁有利，对谁是灾难呢？

一 给俄罗斯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

改革开放以来，不要说在中国的北京、上海等这些大城市，就是在偏远的乡镇，都在大兴土木，推土机、吊车随处可见。2002年6月，笔者到俄罗斯访问，先到莫斯科。偌大的城市上空，偶见转动的吊车。俄中友协主席、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季塔连科告诉笔者，现在要比此前衰败的10年好不少。就这样，还是有70%的国内外资本转悠在莫斯科。你们到了莫斯科以外的几乎所有地方，都可以进一步体会到苏联解体、苏共亡党给他们的国家、民族和人民带来的严重灾难。接着我们来到伏尔加格勒（原来叫斯大林格勒）访问，从下降的飞机上即可看到在宽阔的伏尔加河上高耸着9座大桥墩。下飞机后笔者问前来迎接的州长，回答说这是通往哈萨克斯坦的一座铁路桥，修通后对俄罗斯的经济发展很有好处。但因联邦政府不给钱，1990年被迫停工。笔者接着问，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斯大林格勒有六大工业区，矗立在延绵80余公里的伏尔加河两岸。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六大工业区被夷为废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仅用3年左右时间，又一座延绵80余公里的斯大林格勒新城在这里耸起。现在的主要建筑还都是那3年建设的。那时有资金吗？他说，没有。笔者又问，3年左右时间，可以建一座新城，而12年左右时间却建设不了一座新桥。这是为什么？他沉默少许说：“主要是人的精神不一样。那时，人们有信仰，有干劲，饿着肚皮也干。现在很迷惘：我们的过去错了，将来要往哪里走？我们一无所知！”随后，我们代表团又来到俄罗斯远东地区几个地方，在那里，可以明显看出，衰败得更为厉害，原来集体农庄大量房子的门窗歪七扭八、破损不堪。

2003年10月笔者再次访问俄罗斯。访俄期间，笔者与莫斯科大学原副校长、俄罗斯社会科学研究院院士、莫斯科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多博林科夫长谈。他说：“俄罗斯近年来所遭受的精神和物质损失，无法计量。实际上，所谓的改革使俄罗斯倒退了20～30年，有些精神损失，无法估量。”在这次访问中，我们获得从苏联解体到20世纪末大约10年间有关俄罗斯社会倒退的不少具体资料，概举如下。

1.经济领域

国内生产总值急遽下降，现代工业大国变成原材料附庸。从1991年苏联解体到20世纪末，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比1990年下降了52%，而1941～1945年的卫国战争期间仅仅下降了22%；同期工业生产减少了64.5%，农业生产减少了60.4%，卢布贬值，物价飞涨5000多倍。一些现代化航空航天企业改行生产简单的日用品。1990～2001年间，科技领域就业人数从250万下降到80万，大量的高素质人才到美国、西欧甚至发展中国家就业或谋生。从一定意义上讲，俄罗斯已变为西方欧美发达国家甚至新兴工业国家的原料附属国。

2.社会领域

分化混乱、人口锐减。今日俄罗斯，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成为现实。1989年10%最贫穷人口收入与10%最富裕人口收入比为1：4.7，而1999年这个比例将近1：80。另外，酗酒、精神疾病、无家可归、流浪儿童、卖淫、艾滋病等社会问题成堆。每年约有50万名妇女流落到国外卖淫。苏联解体本身，使它不只失去大片国土，还使其锐减1亿多人口。就是俄罗斯本身的人口也在逐年减少。根据2002年10月人口普查结果，全国人口总数仅为1.45亿人，比1989年减少200万人。根据俄罗斯国家统计委员会2005年提供的数据，俄罗斯男子的平均寿命为58.6岁，比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时男性平均寿命的63.4岁还低4.8岁，这使得俄罗斯成为全欧洲男子平均寿命最低的国家 [5] 。

3.社会治安领域

犯罪猖獗，罪犯逍遥法外。苏联解体后10年间各种犯罪尤其是重大犯罪案件剧增。1990年俄罗斯杀人案为1.43万起，1998年为2.3万起，2001年为2.98万起，2002年已超过3.2万起。每年由于犯罪造成的失踪人口超过10万 [6] 。实质上每年有20万人被害。犯罪案件急剧增加，每4个成年男人中，就有1个有前科。俄罗斯平均每5分钟就有1人被杀。平均每10万人口有1000个犯人——这是世界上最高的比例。针对平民百姓的那些犯罪现象非常猖獗，有组织犯罪甚至渗透到最高的一些权力机关，事实上社会现在处于全面的恐怖状态。然而，

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的自由派却依然要求用市场作为解决所有社会经济问题的纲要，他们依然竭力鼓吹小政府，继续弱化、削弱国家各个方面的职能。这些自由派所说的“人权保护”实际上保护的是罪犯。

4.国家职能领域

国家职能严重退化。由于照搬西方的多党制，严重搞乱、破坏了其政治制度，使得弄虚作假盛行，贪污腐败成风。每年用于贿赂的金钱高达数百亿美元，政府和居民之间缺乏信任和有效的互动。国内到处都是政治公关、政治作秀。一些私人的新闻传媒往往把人民看做可以操纵、欺骗的物件。在社会生活的许多重大问题上，普通人民的意见被漠视、被排斥。国家缺乏经过科学论证的发展构想，缺乏解决内政、外交问题的战略性思维。人们对政治的失望在增加，对政治领袖的失望在增加，对其“民主制度”的失望也在增加。

5.精神道德领域

社会盛行“丛林法则”。理想信念混乱，伦理观念混乱，丧失了传统的善恶观念和区分是非的能力，社会道德基础恶化，精神面貌全面倒退。一些大众媒体向社会民众传输西方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只是为了巧取豪夺和谋取个人的利益，从而造成原有的劳动伦理和热爱劳动品德的丧失；造成是非混淆、善恶混淆，世风日下、金钱至上。许多青年不愿从事劳动，更多的是希望一夜成为银行家、公共关系专家甚至向往抢劫犯或者是敲诈者。一些大众传媒，如一些电视节目和电视剧甚至公开美化犯罪和黑帮。在严重的社会经济和精神道德危机下没有出路的悲惨生活，导致了自杀这样一种社会悲剧现象迅速攀升。1990年俄罗斯自杀人数达2.64万人，1998年为3.54万人，而2001年已经达到3.97万人。

6.国际地位方面

从超级大国沦为二流国家。其最明显的标志，就是20年过去了，俄罗斯现在的GDP仍然没有达到其1990年的水平。俄罗斯当局在解体

后相当长的时期内，迎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需要，在世界上很多地方逐步主动放弃自己的盟友，甚至全面撤退，逐渐丧失超级大国的地位。俄罗斯在独联体的地位同样也在弱化，致使其他国家迅速填补空白。俄罗斯的地缘政治也发生了巨大的逆转：昔日祖国的概念，今日分崩离析，已付东流。自波罗的海三国、中亚和外高加索各前加盟共和国独立后，俄罗斯的版图锐减到17世纪初彼得一世时的规模，并失去波罗的海沿岸的出海口和黑海一带的天然良港。正所谓：“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李煜：《浪淘沙》）

近些年，笔者先后四次访俄，无论是季塔连科、多博林科夫还是其他有识人士，在谈到苏联解体、苏共亡党所造成的巨大灾难时无不痛惜万分甚至泪光闪烁。1994年，著名作家、前持不同政见者马克西莫夫去世前躺在病床上对《真理报》记者谈道：“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对现在发生的一切感到如此痛心。”自己的祖国被糟蹋成这个样子，好像“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母亲被强奸一样。再没有比这更难受的了”[7]。

苏联部长会议原主席尼·伊·雷日科夫在其新著《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中也说：苏联解体“给俄罗斯造成巨大损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种情况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涉及我国在国际社会的威信和作用，涉及经济、国防能力、科学发展、生产和文化、居民生活水平等等”[8]。为说明这一点，他从无数确凿的事实中，仅举1999年国家杜马专门委员会弹劾俄罗斯总统叶利钦材料中的几例。但这几例却用去整整近9页的篇幅。雷日科夫在这9页中说：“苏联统一经济空间、国民经济和科学的破坏，产生了近千万的失业大军。”“1998年的失业人口在超过2500万。”“比较幸运的20%的居民身上，集中了一半以上的国民总收入，而收入的主要部分，则为200～300个家族据为己有，他们攫取了国家财富的绝大部分，同时也攫取了国家的权力。”[9]

二 给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造成极大的灾难与低潮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东欧国家脱离了资本主义体系，先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从1950年开始，东欧国家开始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经济增长速度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让我们看看剧变前苏东主要国家国民收入、工业总产值与主要欧美国家增长的对比。1950～1984年间，苏联国民收入、工业总产值分别增长9.9倍和14倍，保加利亚为14倍和29倍，匈牙利为5.1倍和9.2倍，民主德国为7.6倍和11倍，波兰为5.9倍和14倍，罗马尼亚为17倍和38倍，捷克斯洛伐克为5.3倍和9.4倍。而1950～1982年间，美国国民收入、工业总产值则分别增长1.8倍和2.1倍，英国为1倍和0.9倍，法国为2.9倍和2.9倍，联邦德国为3.4倍和3.9倍，意大利为3.1倍和5.3倍[10]。

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之后，使国外原有的15个社会主义国家中的10个国家改变性质或不复存在，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3个多民族联邦制国家先后解体，世界上其他国家共产党的总人数由原来的4400多万锐减为1000多万，且多数丧失了执政地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步入空前低潮。

1989～1990年，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波兰、匈牙利、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6国，政权纷纷易手，执政40多年的共产党或下台成为在野党，或改变了性质。紧随其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于1992年3月在大选失败后下台；在南斯拉夫，先是南共联盟不复存在，原南斯拉夫联邦内的各邦都发生了剧变，其后在经历近一年之久的内战后，最终分裂为6个独立国家。伴随共产党丧失执政地位，东欧各国的社会制度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政治上，实行多党制为基础的议会民主；在经济上，否定公有制占主导地位，大肆推行私有化，生产大幅度下滑，出现了持续的奔腾式通货膨胀、严重的财政赤字和国际收支逆差、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人民实际生活水平大幅下降，使人们预期将在较短时期内实现繁荣和富裕的希望落空，为之付出的沉重代价却远远超出事先的想象。

据俄罗斯《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杂志提供的数据，“1990～

1993年，独联体国家生产总值下降的幅度很大，其中亚美尼亚下降的幅度超过50%，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摩尔多瓦、塔吉克斯坦大约减少40%，乌克兰下降30%多，乌兹别克斯坦和白俄罗斯比较稳定，只降低17%和24%”[11]。

东欧国家国内生产总值下降的幅度也很大，1990～1993年，罗马尼亚下降20.8%，保加利亚下降26.6%，捷克下降22%，斯洛伐克下降25.8%，波兰下降5.8%，匈牙利下降17.1%[12]。

从剧变至今近20年来，保加利亚举行了6次议会选举，先后组建11届政府，没有一届政府或一位领导人连任。现在，除烟草、铁路、港口、核电站等少数经济部门还掌握在国家手里以外，70%以上的国有企业都被私有化，且大多卖给了外国人。97%的银行已是外资银行。在私有化过程中，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人们健康状况恶化，人口从原来的近900万减少到现在的780万，有100万人（且大多是年轻人和有一技之长的知识分子）外流。社会两极分化严重。少数人暴富，大多数人贫困。由于经济处于停滞状态，基础设施陈旧，铁路、公路、街道、房屋都是剧变前甚至是50年前建造的，房屋墙体剥落，路面失修，到处是一派破败景象[13]。

我们再来看看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给古巴带来的灾难。20世纪70年代，在经过前一时期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政策的探索后，古巴开始实行依靠社会主义阵营实施国家工业化的经济发展战略。古巴与苏联实行经济一体化，并于1972年加入经互会，发挥蔗糖生产的比较优势，用蔗糖换取苏东国家的工业产品，满足人民所需的消费品和国家实行工业化所需的生产资料。古巴与经互会成员方的贸易额占古巴外贸总额的85%，每年从苏联进口石油1300万吨，占国家石油需求的90%。与苏联的经济一体化保证了古巴的经济命脉，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古巴经济年均增速20世纪70年代为7%，80年代上半期为8%[14]。同时，古巴的社会建设事业也得到快速发展。80年代末，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等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古巴与苏联的经济一体化同时为古巴埋下了严重隐患。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几乎摧毁了古巴整个对外贸易，美国趁机强化经济封锁。古巴遭受这

一“双重封锁”的致命打击，被迫进入“和平时期的特殊阶段”。1989～1993年古巴经济萎缩35% [15] ，1993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为1989年的66.1% [16] 。直至今日，古巴尚未从“双重封锁”中完全恢复过来，走出“和平时期的特殊阶段”（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劳尔·卡斯特罗语）。直到2008年初，菲德尔·卡斯特罗还在《起义青年报》上发表文章进一步表示说，苏联解体对古巴来说是“一个毁灭性打击” [17] 。

最后看看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给朝鲜带来的灾难。朝鲜自1948年建国以来，在经济建设中取得了较大的成就。1948～1984年工业产值平均增长率为17.3%。1984年工业总产值相当于1946年的431倍，粮食产量为1946年的5.6倍，人均国民收入增长65倍，人均国民收入1986年达到2400美元。朝鲜在20世纪70年代就实现了农业机械化和电气化、化学化，但在80年代，朝鲜也形成了依赖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石油的高度机械化的农业体系。苏东剧变后，朝鲜石油紧缺，大部分农业机械严重闲置，使原来几乎全部依赖进口的钾肥、磷肥严重匮乏（朝鲜化工只生产氮肥等），导致农业危机，引发严重的粮食问题。尽管朝鲜并不是经互会成员，但原来朝鲜对外贸易的70%也是同苏东国家进行的。苏东剧变后，朝鲜经济持续9年出现年均约2%的负增长，1995年的经济负增长率高达4.6%。苏东剧变使朝鲜对外贸易额从80年代的100多亿美元减少到1997年的不足10亿美元。人均国民收入从1990年的1064美元降至1997年的741美元 [18] 。朝鲜现在经济困难，无疑有其他方面的种种原因，但是，苏联解体、苏共垮台和经互会的不复存在难道不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吗？

三 给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人民造成巨大灾难

过去笔者总认为，苏东剧变后，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主导的，它使得富国、富人愈来愈富，穷国、穷人愈来愈穷。现在笔者认识到，从本质上说，新的一轮经济全球化是以极少数人为代表的国际垄断资本为主导的。新的一轮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是全球范围内极少数富人愈来愈富，绝大多数穷人（其中包括中等收入阶层） [19] 愈来愈穷；极少数富人愈来愈富，几乎所有国家本身（其中包括发达国家本身）愈来愈穷。资本主义国家仅仅是资本存在

和运作的方式，是承载和包裹资本的外壳，是为极少数富人服务的奴仆，奴仆不可能富有。由于苏东原来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全面社会福利参照体系的坍塌，美国、瑞典、法国、德国等西方发达国不仅所有制、分配制度、政治体制、意识形态右转，就连已建立好的福利体系都在右转。2000年，美国贫困人口为3160万，2001年增加130万，2002年又增加170万，达到3460万。而到2007年则增至3620万，其中有2950万人靠领取食品券过活[20]。1980年，英国达不到全国平均收入水平40%的人口为100万，而到1999年增加到了800万[21]。现在，法国有25个亿万富豪，却有700多万个穷人，近70万人身负重债[22]。根据联合国《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数据，现在世界上最富有的500人的收入总和大于4.16亿最贫穷人口的收入总和。2007年9月12日英国《卫报》报道：现在，世界上最富有的225人的收入与最贫穷的27亿人的收入相等，相当于世界所有人口收入的40%。比尔·盖茨、巴菲特、保罗·艾伦三人的总资产比世界上最不发达的43个国家GDP的总和还多。现在，美国一半以上的州政府从理论上已经破产；而各国的主权债务几乎都在急遽增加。按照物理学能量守恒的定律，财富不会减少，也不会增加，而只会转移。各国主权债务的增加和全球范围内绝大多数穷人的愈来愈穷的过程，就是极少数富人在世界范围内运用各种手段极其贪婪甚至残酷地聚敛巨额财富的过程。当中等收入阶层大量失业，被抛入贫困行列，国家亦十分贫穷之时，大规模的社会动乱就不可避免了。

四 相对于苏东剧变后的低潮而言，世界左翼和社会主义思潮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开始有所复兴

笔者认为，从一定意义上讲，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可以说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主导的以新自由主义为主要推力的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无疑是一柄“双刃剑”。它的正面效应是有力地推动了发展中国家GDP的高速增长等。但也要看到，冷战结束后，美国一家独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强国才能够和敢于利用其在全球的经济、政治、文化以及军事、科技等强权，特别是其中的金融霸权，放手、放肆地掠夺他国，张着大嘴“巧吃”、“白吃”世界。正因为如此，美国国内生活必

需品的价格才长期低得出奇，加上美国文化霸权的大肆渲染，其所谓“民主制度”才能够在美国国内得到较多数民众的认可并得到较为稳定的维系，在国际上才能得到更多人的追捧。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助长了新自由主义价值观念和一系列政策在全球范围内的泛滥和推行。从一定意义上说，目前这场正在深化的国际金融危机，就是苏东剧变给世界带来灾难的最新表现，这不仅是对美国这种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特别是其金融霸权肆意泛滥的绝地“报复”，是对新自由主义政策、理论的有力清算，更是对美国所谓“民主制度”的根本挑战。贫富差距的拉大和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化，进一步导致全球社会动荡加剧。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从欧洲到中东、北非再到亚洲、拉美，社会不安情绪弥散，广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广大民众对资本主义普遍不满，大规模街头抗议增多，极端政治事件频发，不少国家政局不稳，全球社会动荡风险明显上升，其中值得关注的亮色，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在全球重新得到重视。各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本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积极开展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研究和应对。国外共产党在一定地区、一定范围内进行着有限的联合活动。全球具有相当影响力的英国著名作家、记者弗朗西斯·惠恩在2009年新出版的《马克思〈资本论〉传》中说：“马克思并未被埋葬在柏林墙的瓦砾之下，他真正的重要性也许现在才刚开始。他可能会成为21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23]对这种已经开始复兴的左翼和社会主义思潮我们一定要高度关注，统筹考虑。各国左翼学者应该运用多种方式进行积极合作与配合，这是世界社会主义能够坚持和发展的极其有利的国际机遇。

五 世界社会主义前景展望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之中，世界已经步入历史发展的快车道。目前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尚未见底，仍在深化，其根本标志是世界各个国家特别是各主要大国的主权债务都在急遽增加。由于新一轮金融危机在未来几年内极可能存在进一步恶化的趋势，新兴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今后几年内也都有可能面临国际垄断资本新一轮的洗劫。当然，其洗劫的手法和手段将是多种多样甚至是十分残酷的。世界各大战略力量正在加强合作，同时也有激烈的竞争和博弈直至较

量。历史的经验反复证明，经济危机发展的结果必然是政治危机。必要之时，所谓的“国际社会”必然寻求战争之道去力图摆脱。这是它们企图摆脱危机的最后也可能是最有效的途径。过去我们讲“地缘政治”，现在可不可以加上“货币政治”和“资源政治”？这三种政治相加，特别能够理解“金融政治”的独特作用，似乎才可以解释当今世界上所发生的所有重大事件。在未来二三十年里，相互合作、竞争、博弈、较量的结果会是什么？笔者认为，还很难说一定是一个结果，各种可能性都有。如果世界上其他各个主要大国应对正确，美国霸权从此有可能从其顶峰逐步跌落下来。当然，这个衰落过程，极可能要用几十年时间。假若如此，这也是我们衷心所希望的现有的中国、越南、古巴、朝鲜、老挝5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巍然屹立与世界社会主义思潮的较大复兴。我们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充满信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着光辉的前途。当然，在特定条件下，也绝不能排除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遇到新的更大的困难。这正是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三代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多次反复强调增强忧患意识，要居安思危的深意所在。如果世界社会主义步入新的更大的低潮，世界就有可能重新出现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各资本主义大国为重新瓜分世界也可能会重新酝酿并发动新的世界性战争。当然，这是从大历史和历史的长时段来说的。世界格局中期前景的不确定，从一定意义上说，其根本原因是人们对指导当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理论的认识还不成熟和不完善，或是说还仅在寻找或形成之中。但不管世界格局中期发展的前景如何，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从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开始直到21世纪前二三十年，乃至上半个世纪的世界格局，都可能处于一种激烈动荡甚至跳跃的状态，这是世界各种各类重大矛盾特别是生产社会化乃至生产全球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这一根本矛盾长期累积冲突的必然结果。中国的老子提出了“物极必反”的思想。中国还有句充满哲理的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笔者坚信，世界各国人民将在无比丰富的社会实践和经验教训中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在2050年前后，将是世界社会主义的又一个无比灿烂的艳阳天。

---

[1] 李慎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81页。

[3] 冷溶、汪作玲主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第1332页。

[4] 《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0，第61～62页。

[5] 孙力舟：《俄大规模私有化导致失业 使成年男子死亡率上升》，搜狐新闻，2009年1月20日（http：//news.sohu.com/20090120/n261860206.shtml）。

[6] 〔俄〕符·伊·多博林科夫：《全球化与俄罗斯：社会学的分析》，莫斯科，2006，第339页；Добреньков В.И.Глобализация и Россия：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ий анализ，М.：ИНФРА-М，2006，c.339。

[7] 1994年3月29日〔俄〕《真理报》。

[8] 〔俄〕尼·伊·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徐昌翰等译，新华出版社，2008，第372页。

[9] 〔俄〕尼·伊·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徐昌翰等译，新华出版社，2008，第374页。

[10] 宋则行、樊亢：《世界经济史》（下），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第100～111页。

[11] 〔俄〕帕·波·鲁齐利娜：《九十年代独联体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摘要）》，李志远译，《黑河学刊》1995年第2～3期，第89页。原载于〔俄〕《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1994年第5期。

[12] 小林、陈弘：《东欧国家近年经济状况的一些数字》，《俄罗斯研究》1995年第5期，第57页。

[13] 刘淑春、吕薇洲、马细谱：《苏东剧变以来的保加利亚——与保加利亚学者座谈纪要》，《国外理论动态》2007年第9期，第35页；刘淑春、吕薇洲、马细谱：《苏东剧变以来的保加利亚——与保加利亚学者座谈纪要》，《国外理论动态》2007年第10期，第34页。

[14] Desarrollos Macroeconómicos de Cuba en las Décadas de los Años 80 y 90（http：//www.redem.buap.mx/t2font.html）.

[15] Informe Económico 1994，Banco Nacional de Cuba，C.Habana，agosto de 1995，anexo 1.

[16] http：//sociales.reduaz.mx/art_ant/historia_de_cuba.pdf.

[17] 埃菲社哈瓦那2008年1月27日电。

[18] 孟庆义、刘蕾：《朝鲜真实的经济状况》，乌有之乡网站，2007年11月6日（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0/200711/26836.html）。

[19] 西方称之为中产阶级。其实，中等收入阶层所拥有的住房、家庭轿车等，仅仅是生活资料，而不是生产资料，所以不能把他们称为中产阶级。西方把中等收入阶层称为中产阶级，其实质是想掩盖极少数人剥削的本质。

[20] 《美国贫困人口不断增加》，路透社华盛顿2008年11月17日电。

[21] 刘志军：《全球化削弱人类安全》，2006年5月2日《环球时报》。

[22] 山南：《法国陷入“集体性贫困”》，2008年12月5日《国际金融时报》。

[23] 〔英〕弗朗西斯·惠恩：《马克思〈资本论〉传》，陈越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第188页。

组织路线上的严重错误是苏共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1]

张全景 [2]

20年前苏联解体、苏共亡党，是苏联及俄罗斯人民的巨大灾难，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严重挫折。苏东剧变的历史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会不会改变颜色，关键在党、关键在人。今天，我着重谈谈苏共在组织路线上的严重错误，和大家一起探讨苏共亡党亡国的惨痛教训。

第一，苏共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改变了党的性质和作用。党的建设的过程是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苏联共产党（原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是列宁亲手缔造的无产阶级政党，由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始终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理想。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下，苏共始终保持了党的阶级性和先进性，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粉碎了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胜了法西斯，取得了辉煌胜利。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方面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经济大国、军事强国，在科学技术领域居于世界先进行列，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是，赫鲁晓夫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定、歪曲苏联历史，否定列宁和斯大林。赫鲁晓夫提出“全民党”、“全民国家”、“三和一少”的错误理论，建立所谓“工业党”、“农业党”，造成全党全民极大的思想混乱，失去了正确理论指导和前进方向。戈尔巴乔夫又提出“公开性”、“民主化”，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这就从根本上背叛了社会主义，背叛了人民。在这些严重错误思想指导下，改变了党的无产阶级性质，丧失了党的阶级性和先进性。基层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战斗堡垒作用，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也丧失殆尽。因此，当戈尔巴乔夫宣布解散苏共时，竟然没遇到任何有组织的抵抗。苏共失败的这一重要教训告诉我们：任何时候都不可忘记党的建设，要坚持不懈地同各种

错误思想作斗争，始终保持党的阶级性、先进性，始终保持和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的战斗堡垒作用、先锋模范作用，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第二，苏共严重背离并最后抛弃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民主集中制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组织原则。早在1905年12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会议通过的有关决议就强调指出：“民主集中制原则是不容争议的。”列宁担任党的领导人的时期是党内民主集中制执行得最好的时期。每个党员都充分享有党章规定的权利，党内不分高低，没有特殊党员。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人是必须经过选举产生的，是必须向党员作工作报告的，是可以撤换的。在当时党的会议上，没有逢迎、吹拍，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就像人类需要空气那样自然。当然，列宁在强调党内民主包括保护党内少数人权利的同时，也十分强调党的集中，特别是少数服从多数、部分服从整体，绝不容许党内出现派别活动和无政府主义倾向。

在斯大林担任苏共总书记初期，民主集中制和党内监督制度还是得到了贯彻。但从1934年苏共十七大以后，在党的组织生活中，个人集权制逐渐取代了民主集中制。斯大林后期搞“一言堂”，搞个人崇拜，造成了严重后果。而在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虽然在形式上对斯大林时期苏共组织路线的错误作了某些“修正”，但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贯彻民主集中制。在党内领导体制上，不过是由一个人说了算，改成了少数几个人说了算。赫鲁晓夫是靠反对“个人迷信”上台的，但他上台后搞的“个人迷信”比斯大林更严重，有过之而无不及。勃列日涅夫时期特别是其执政后期，违背了民主集中制原则，放弃了党内监督。

戈尔巴乔夫时期，则是步步抛弃民主集中制原则，走向所谓“民主化”的极端。戈尔巴乔夫先是提出“重新认识民主集中制”，推行各级党组织“自治原则”，从而使苏共丧失了统一意志和统一行动。在“公开性”、“多元化”、“民主化”的口号下，伴随着“新思维”，“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作为完整的思想体系逐步形成，以往牢不可破的真理变得面目全非。戈尔巴乔夫还公开否定、批判民主集中制原则。他认

为："过去的全部实践已使这条原则声名狼藉。"在他的主导下，苏共二十八大通过的党章正式删除了"党的组织机构、全部生活和活动的指导原则是民主集中制"这一条文。随着"公开性"、"多元化"和"民主化"的实施，苏联政党体制由一党制转为多党制，形成了党外有党、党内有派、派中分流的局面。应当指出，戈尔巴乔夫虽然时时把"民主化"挂在口头上，但他实际上是采取个人极端专制的办法推行其反共路线的，宣布苏共中央自行解散这样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大事，就是戈尔巴乔夫个人作出的决定。这样，苏共亡党亡国也就在所难免了。

第三，苏共严重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干部路线。干部路线是组织路线的关键和核心，对党和党的事业具有决定性意义。苏共垮台是同它在干部工作中的一系列错误分不开的。是任人唯贤还是任人唯亲，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先还是凭个人好恶、亲亲疏疏，是坚持民主选举还是个人或少数人说了算，是加强群众监督还是疏于管理，等等，是挑选、培养、使用、管理干部的重大原则，坚持前者就能选好、用好干部，实行后者则会造成严重失误。列宁曾经反复强调，随着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党内一切机关要实行普遍的选举制、报告工作制和监督制。鉴于任命制显露出来的弊端，列宁提出要以自下而上的选举制来取代它。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任命制并没有被彻底废除，后来反而演化为变相任命制。任命制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终身制。虽然列宁提出过领导干部实行任期制的设想，但是没有来得及实现。后来，苏共也曾对干部任期和定期更换分别作出过规定，但这些规定和措施没有得到真正的实施。1966年苏共召开二十三大，苏共领导人以"稳定干部"为名，取消了领导干部按一定比例定期更换制，实际上确定了领导职务终身制。干部的任命制和终身制，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任命制和变相任命制还直接促成了任命者和被任命者之间的依附关系和利害关系。

正是在干部问题上抛弃了民主集中制，苏共在列宁时代确立并实行的选用干部的政治标准和德才兼备原则也随之被任人唯亲所取代。亲朋故旧、同学老乡、部属亲信备受重用，"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几乎成为普遍现象。赫鲁晓夫把自己的老婆、女儿、女婿都委以重任。

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无一不是如此。这是苏共从内部被攻破，最终亡党亡国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四，苏共严重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群众路线。组织路线和干部路线的错误，导致苏共逐渐背弃了自己的生命线——群众路线。率先在帝国主义最薄弱的链条上取得革命的成功，建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战胜国内外敌对势力的联合绞杀，巩固了新生政权；打败不可一世的希特勒和德国法西斯的猖狂进攻，等等——所有这一切，如果不是苏共具有强大的群众基础，如果没有苏联人民的全力支持，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但是，随着统治地位的巩固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苏共逐渐把群众路线抛到脑后，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原则渐渐被遗忘，人民群众的利益受到极大伤害，对党逐渐冷漠甚至仇视。甚至在捍卫党和社会主义政权的力量与反党反社会主义势力对垒的时候，广大人民甚至共产党员竟然无动于衷，甚至为反动势力推波助澜。所以，我们才目睹了苏联人民为苏共的亡党亡国举行了一个过于平静的“葬礼”。2.9亿苏联人民，特别是1500万苏共党员，无奈地接受了现实。从这个方面看，对群众路线的背离，使得苏共丧失了最后一道防线。

总之，苏共组织路线的错误是非常深刻的，值得马克思主义政党认真吸取。中国共产党是善于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的党，包括自己的和其他党的经验教训，特别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执政党苏共的经验教训。从这个意义上说，苏共在组织路线上的失误是中国共产党健康发展的宝贵财富。当前，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原则，积极发展党内民主，努力形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中国共产党坚持正确的干部路线，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培养造就了大批善于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高素质干部队伍，确保党的事业始终掌握在忠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地坚持群众路线，始终贯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从而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和支持，党的社会基础不断巩固。居安思危，20年前苏共亡党、

苏联解体的教训，将永远是一面镜子。

---

[1] 此文系作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中国社会科学论坛——苏联解体2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2] 张全景，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

摧毁苏联的原因：俄罗斯进行的争论及一些结论

〔俄〕德·格·诺维科夫 [1]

摧毁苏联是由性质迥异的多种因素造成的。一些俄罗斯学者认为，20世纪80年代深刻的社会经济危机是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但即使这样，人们对这场危机的缘由和实质的理解也各不相同。

在学术著作和出版物中广泛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建立在计划经济和行政命令式管理原则基础上的经济模式是导致苏联衰败的原因。他们确信，苏联经济在与西方的竞争中败北，而且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耗尽了其发展的潜力。然而，关于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缺少活力的这种结论没有得到客观数据的证实。苏联经济是最稳定的一种经济。在苏联时期，公民社会福利稳定增长。在1928～1987年这段时期，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4倍。即使在80年代，经济年均增长也达到了3%～4%，这种发展速度是发达国家的标准。

关于苏联经济体制因技术落后而导致崩溃的观点也不符合历史事实。20世纪80年代，苏联工农业使用的技术研制产品符合国际标准的占70%，其中超过国际标准的占15%。

认为军工企业的高消耗导致苏联经济衰败的观点毫无根据。M.C.戈尔巴乔夫多次声称，苏联用于国防的消耗约占整个国民收入的20%～40%。实际上，按照苏联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世纪80年代用于军工企业的支出占苏联国民经济总产值的10%。显然，这种军工生产的消耗水平是不可能导致苏联经济走向崩溃的。

一种比较合理的观点是，M.C.戈尔巴乔夫在1985～1990年期间实施的混乱的、毫无章法的、欠缺深思熟虑的政治经济改革是导致摧毁苏联的危机的主要原因。苏联领导宣布实行改革，以加快国民经济发展，提高劳动生产率。为此，企业开始向“经济管理方式”和“全面经济核算制”过渡，1986～1987年进行的部委改革是第一步。其结果是

削减了约40%的中央直属机构，辞退了60万名职员。这一举措严重损害了原本协调一致的经济管理体制和部门间的相互配合。

“深化改革”使经济状况急剧恶化。1987年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通过有关削减体制内干部的计划内商品供应的决议，而体制内干部的计划内商品供应原本是由国家计委向企业以国家订货的名义采购。建立以市场为基础的商品和商品原料交易网络，取代计划供应，这一举措导致几乎所有商品的价格都大幅上涨。

1987～1988年间通过的建议设立“全面经济核算”的《国有企业（联合企业）法》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途中迈出的又一步。投资大幅缩减，各部门之间的平衡被破坏，消费品价格持续上涨，生产衰退，是这一法案导致的后果。苏联经济陷入“既没有计划又没有市场”的窘境。

国家领导层考虑不周的行为也影响到贸易金融部门。取消国家对外贸易垄断导致消费品短缺。因为一些商品外销可以获得巨额收入，它们在工厂就被买空，根本不会投放到国内市场。包括有色金属在内的一些工业制成品被变成废料或者被当做原料出售。根据专家的统计，20世纪90年代生产的消费品有1/3被运出国门。

同时，苏联政府奉行个人主义的金融政策，其后果是居民个人收入大幅上升。如果1981～1987年间，苏联居民的货币收入年均增长157亿卢布，那么，在1988～1990年间，已经达到667亿卢布。在生产增长速度放缓和商品储备减少的同时提高个人收入，导致通货膨胀和消费市场的崩溃。很多食品和日用品都从零售商店消失了。当局对各种食品（肉、奶、黄油、糖、酒精饮料、粮食）实行票证。政府想消除消费品短缺现象，大幅度增加进口。快到1990年的时候，苏联贸易逆差已经达到100亿卢布。

社会和经济局势急剧尖锐化是“经济转型”的后果。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的生产下滑。居民生活水平下降。国家金融制度瘫痪。居民生活水平恶化。国家财政赤字增加（从1985年的189亿卢布增加到1991年的890亿卢布）。国家债务增加。如果1985年苏联的内债是1420亿

卢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8.2%），在1990年苏联的内债已经达到了5660亿卢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6.6%）。1985年苏联欠外债约为300亿美元，1991年达到1200亿美元。苏联的黄金储备缩减了90%，从1985年的2000吨到1991年的200吨。因此，正是由于戈尔巴乔夫领导班子的唯意志论行为，导致国家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初陷入深度危机。这种局面推动了苏联的离心过程。

执政党——苏联共产党——的危机是导致苏联被摧毁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考虑到党在管理国家和苏联社会生活组织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这是完全合理的。

改革的思想家提出让党走上"非国家化"道路，目的是把苏联共产党从行政和经济机关的活动的监督者的角色下"解脱"出来。1990年，苏联宪法中宣布苏共在苏维埃社会政治体系中的领导和指导作用的第六条被撤销。苏联共产党的所有权力都转交给了苏维埃机关。但是没有考虑到，正是党的委员会才是国家管理制度的基础环节。地方苏维埃既没有为此而培养的干部，又没有必要的行政资源。其结果是打断了国家管理体制的关键环节。不负责任和犯罪不受惩罚的浪潮充斥着整个国家。

与此同时，苏共党内的意识形态危机不断加剧。在1990年召开的党的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上，苏共领导思想上的软弱无力暴露无遗。代表大会通过带有一系列含糊声明的《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宣言代替苏共的新纲领。代表大会决定正式允许在党内建立政治"派别"，而各个加盟共和国的共产党获得最广泛的自主。苏共的思想统一遭到破坏。党内出现了各种派别和集团。最有影响的是苏共的民主派。其拥护者反对"一党专制"，要求"真正的民主"和政治多元化。也建立了"马克思主义派"，其代表拥护社会主义，但批判社会主义的"斯大林—勃列日涅夫模式"，为争取"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斗争。同时还形成了一些其他派别（劳动人民联合阵线，"团结"），它们要求消除苏联"改革"和变革过程中不断增长的威胁。思想上的各种分歧使苏共由一个充满活力的政治机构一下子变成一个争论俱乐部。戈尔巴乔夫的左右逢源加速了解体进程。

在苏共作为一个统一的组织活动能力衰退的情况下，1990年6月成立了俄罗斯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共产党（此前，俄罗斯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是苏联唯一一个没有自己的共和国共产党的加盟共和国）。俄罗斯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共产党的组织者为自己设定的目标是保留作为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

最终，四分五裂、失去了真正权力的苏共无法对抗导致党被取缔、国家被解体的摧毁性趋势。1991年8月苏联共产党的组织没有被动员起来支持以国家副总统亚纳耶夫为首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动。虽然已经这样，但是1991年6月12日开始成为俄罗斯总统的叶利钦还是发布命令，禁止苏联共产党和俄罗斯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共产党在俄罗斯领土上活动。摧毁苏联的道路终于清扫干净。

戈尔巴乔夫政府的对内政策给苏联造成了沉重打击。苏联社会的激进改革被宣布为新内政方针的主要内涵。就1985～1988年事情的本质而言，苏联领导层为无法控制的政治进程提供了一个开端，其发展导致国家瓦解。改革是在“多一些社会主义！”和“革命在继续！”口号下开始的，而以反社会主义政变结束。

公开性政策是改革的基础。国家领导层认为公开性是社会民主化的基本手段。但事实上，公开性是操控社会思想的一种机制。自由主义力量利用公开性，组织了破坏苏联社会思想基础的有力行动。“民主的”大众传媒在歪曲苏联历史，损害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活动家威信的同时，抛出了大量积压的负面信息，诋毁涉及苏联社会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一切。为了树立苏维埃国家制度的负面形象，使用所有能够利用的各种借口，其中包括自然灾难和人为灾难（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纳希莫夫海军上将号”客轮的事故、亚美尼亚地震等）。

同时，在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的主持下，苏联共产党形成的信息政策，置有关公开性的各种论述于不顾，距离自由地讨论紧迫的问题越来越远。于是，1988年3月13日《苏维埃俄罗斯报》发表了尼娜·安德烈耶娃的文章《我不能放弃原则》。在这篇文章中，尼娜·安德烈耶

娃捍卫苏联历史的一系列想法，包括反对对苏联历史的斯大林时期进行恶意中伤。但是，这篇文章和作者本人因捍卫斯大林主义很快就遭受到大众传媒的毁灭性攻击。从各个宣传工具燃起的这把火意味着：现在可以自由地批判苏联历史，但不许自由地捍卫苏联历史。

已经改变了方针的大众传媒坚持塑造了一个“可怕的祖国”的形象，同时赞美美国和西欧国家取得的成就。他们越来越把资本主义想象成为一种理想的世界秩序模式。

整体上讲，公开性给了苏联国内外的所有敌人一个附加的杠杆。很多人把苏联体制的个别缺陷看成制度本身的问题，这就是“洗脑”的结果。1917年俄国偏离了所有“正常国家”都沿着其前行的“正确的”历史道路的思想被强加给社会。

国内破坏性力量——持不同政见者和反对派——的活动促成了苏联解体。

持不同政见政治群体在苏联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这是人数不多、组织得并不好的反苏活动家的集团。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人数增多了，从国外获得了资金援助，具备了出版和宣传印刷材料的基础。在改革和公开性条件下，持不同政见者运动规模扩大。

思想上的不同政见在苏联是一个十分庞杂的现象。其内部划分为“西方派”、“乡土派”和其他一些流派。与其说是观点上的共同性把这些反对派分子联合在一起，不如说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仇恨把这些反对派分子联合在一起。“西方派”A.萨哈罗夫指责苏联支持俄罗斯的大国沙文主义，而“乡土派”И.沙法列维奇则指责苏维埃国家仇视俄罗斯。

苏联这些“同共产主义进行斗争的战士们”与西方情报机关和人权组织密切合作。正是持不同政见者成了苏联社会中的“第五纵队”，它保证了西方的宣传能取得显著的成果。他们强迫大多数人质疑社会主义价值观，质疑社会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理想。

在多元化和公开性条件下，过去的持不同政见者获得了公开进行政治斗争的可能性。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出现了几十个非正式组织。它们逐渐地政治化了。在1988年5月组建了“民主联盟”（瓦·诺沃德沃尔斯卡娅）。1988年8～9月间，该组织成员在莫斯科召集了两次反共产主义集会。在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期间，反对派联合成“跨地区议员团”，其领导人——A.萨哈罗夫、Ю.阿法纳西耶夫、Б.叶利钦和Г.波波夫——要求废除苏联宪法第六条，主张损害国家稳定的政治罢工合法化。

1990年社会政治运动“民主俄罗斯”继续了反苏和反共产主义的路线。其领导人倡导经济和政治生活的进一步民主化，拥护俄罗斯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从苏联分裂出去。1989年成立的俄罗斯自由民主党也持反共产主义立场。反对派积极地撼动社会政治局势。

民族主义组织——在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俄罗斯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和其他共和国里出现的“人民阵线”——在苏联解体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起初，这些组织宣称其目标是捍卫改革和公开性，但是，随后它们就提出了民主主义和分离主义口号。

民族矛盾激化是摧毁苏联的主要原因之一。戈尔巴乔夫的政策导致民族间关系的恶化和民族主义的爆发。在大多数情况下，种族冲突都是由自由主义力量计划好的。20世纪80年代，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A.努伊金就强调指出：“我们支持能动摇政权的一切。不吸收强有力的民族杠杆加入就不能推翻它……”为了使用这些杠杆，民主思想和民族主义联合在一起。民主主义者宣称，在“苏联殖民统治”和“民族压迫”的条件下，不能建成民主。他们据此得出结论：进行争取“民族自由”的斗争是苏联人民的首要任务。

中央领导无力控制局面。民族自由主义者挑衅性的狂妄举动激起了民族主义的嚣张。种族冲突动摇了整个国家尤其是外高加索和中亚。20世纪90年代初，在沙文主义浪潮中，波罗的海沿岸共和国、中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摩尔多瓦、俄罗

斯的民族主义力量执政，民族主义力量在随后的瓦解苏联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西方情报机构的颠覆活动是摧毁苏联的基本原因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及其盟国发动了反对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冷战”。宣传是“冷战”最重要的武器。在20世纪下半叶，华盛顿付出重大努力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宣传机器。1947年2月，“美国之声”广播电台开始用俄语广播。1953年美国国会根据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建议通过了建立美国新闻署的决议，美国新闻署的主要任务就是同共产主义力量和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进行新闻战。1960～1980年间，美国新闻署的活动范围极其广泛。该机构在129个国家设立了214个办事处。美国新闻署有几百个广播电台和几十个电视中心。该机构出版数千份报纸和数百种期刊。美国新闻署在其宣传活动中使用最新的信息心理影响法。

应该承认，西方的宣传给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原则造成了沉重的打击。资产阶级思想家在苏联社会内部成功地找到了同盟者，有步骤地诋毁了共产主义价值观和理想，创造了一个有吸引力的西方资本主义的形象。西方宣传对部分苏联知识分子和党的领导的道德伦理和思想状况造成了不良的影响。西方的宣传者成功地毁掉了苏联社会的团结，并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反对苏联社会团结的力量。

苏维埃国家有效的思想宣传工作受阻，宣传机器无法捍卫社会主义的成就并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缺陷。在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实际上背叛了社会主义思想的情况下，苏联输掉了新闻宣传战、信息心理战，在很大程度上，是这种情况导致了其毁灭。

欧洲社会主义国家体制的崩溃促进了苏联被削弱和摧毁的进程。

1989年苏联军队开始从中东欧国家撤出。由于政治自由化，苏联在盟国军事存在的削弱引起了反苏和反共产主义情绪的激化。但是，苏联领导没有采取有效措施支持社会主义联合体中的各个国家。戈尔巴乔夫外交政策的方向是西欧和美国。同社会主义国家联盟关系的巩固和发展不再是苏联的优先考虑因素。没有为保留经济互助委员会和

华沙条约组织做任何事情。苏联领导实际上背叛了自己的盟友，从一个旁观者的立场，眼看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的社会制度替换。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经济互助委员会和华沙条约组织的解散创造了毁灭苏联的国际环境。

进行总结的时候，要特别指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研究的仅是摧毁苏联的问题，而不是苏联1985～1987年宣布改革的原因。1985年苏共中央“四月全会”上宣布的加快政策和1987年苏共中央“一月全会”上宣布的改革政策是这些改革的开端。目前，一些俄罗斯研究人员认为，导致苏联毁灭的原因就是促使戈尔巴乔夫开始进行改革的那些原因。另一些研究人员认为，苏联解体是戈尔巴乔夫政策本身造成的结果。

我们认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进行政治经济改革的必要性已经成熟。这样的改革可以为国家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提供强劲的推动力。此前，苏联形成了计划管理经济和社会进程的机制。在这些背景下，执行具有明确纲领的改革尤其重要。因为没有明确的纲领、戈尔巴乔夫混乱的行动使整个国家机器全面失衡。产生的危机被国内外社会主义的敌人积极地利用。他们尽一切可能让苏联离开历史的舞台。

因此，在摧毁苏联的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不是客观性因素，而是主观性因素。在这种情况下，谈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被摧毁比谈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解体更正确。

（陈爱茹 译）

---

[1]〔俄〕德米特里·格里戈里耶维奇·诺维科夫：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俄罗斯联邦会议国家杜马代表，历史学副博士。

第一篇 戈氏“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与苏联解体

历史在这里沉思

——苏联解体20周年杂记

周新城 [1]

一 光阴荏苒，苏联解体已进入第**20**个年头了

回想20多年前，当时我在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工作，兼任着苏联东欧研究所所长。在苏联政局发生剧变的时候，我可以说是集中全力进行跟踪研究，以便向有关部门报送材料，提出自己的看法。有一段时间里，看的材料越多，越感到迷茫，弄不清楚苏联究竟发生什么事了，还会往哪儿发展。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思考，我慢慢把握住了苏联政局变化的本质：戈尔巴乔夫是按照“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思想和路线，引导苏联的改革。他不赞成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完全否定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用他的话来说，“斯大林模式遭到了战略性的失败”（他说的“斯大林模式”内涵十分广泛，包括理论、政党、社会制度等，总之是指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全部），因而他改革的目标不是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而是要“炸毁一切”，建立起西欧社会党所主张的那样的政党和社会制度，即把共产党改造成社会民主党，把社会主义制度改造成作若干改良的资本主义制度。

大体上到1989年下半年，我就形成了一个看法：戈尔巴乔夫是一个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者，在他的思想路线指引下，苏联不可避免要复辟资本主义制度，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即将葬送在他

的手里。

苏联向资本主义演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重大的事件。正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我国人民对苏联演变问题十分关心。这是因为如何分析和认识苏联的演变，涉及社会主义有没有前途、马克思主义灵不灵这一类根本性问题。本来，20年过去了，剧变风暴刮起的尘埃早已落定，有关材料大多已经公开，事情的性质、起因、结果应该清楚了，然而不同阶级、不同政治派别却对此具有完全不同的判断，至今仍争论不休。事情类似20世纪中期的斯大林问题，当时毛泽东就说：“斯大林问题，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大问题，曾经引起了世界各国一切阶级的反响，至今还在议论纷纷。各个不同的阶级，代表各个不同阶级的政党或政治派别，意见不同。估计在本世纪内，这个问题不可能作出定论。”[2] 现在看来，不仅20世纪，而且进入21世纪，仍然存在不同意见，甚至分歧更大了。苏联演变问题同斯大林问题是密切相关的，一定程度上是彻底否定斯大林这股思潮延续下来的结局，而且其影响比斯大林问题更为深远。借用毛泽东的话来说，苏联演变问题，不同阶级、不同政治派别意见不同，也是一种正常现象，估计很长时间里人们对此难以有一致的看法。

二 在意见分歧甚至对立的情况下，我们怎么研究苏联演变问题呢？

首先要解决一个立场问题。我们必须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研究苏联演变问题是为了吸取教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搞得更好，防止我国出现类似苏联这样的悲剧。这是我们研究苏联演变问题的目的所在。如果得出结论，社会主义是没有前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才是唯一出路，那就违反了社会发展的规律和人民的根本利益。那种把苏联演变说成“摆脱了历史迷误”的“进步”现象，说俄罗斯从此走上了“人类文明的正道”的观点，反映的是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苏联政局剧变以后，西方垄断资产阶级政治家、思想家欣喜若狂、额手称庆的场面，我们至今记忆犹新。这种场景足以证明苏联演变是多么符合他们的利益和愿望！我们不能与他们同流合污。

我认为，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有社会责任感，必须考虑研究工作

为谁服务、得出的结论对谁有利，这也就是立场问题。这个问题，多年不讲了，好像讲立场有点过时了，甚至有点忌讳似的。然而不管承认与否，或者自觉不自觉，这个问题是客观地存在的。社会科学的性质决定了这一点。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极少数学科除外，如语言学），人们在社会关系中地位不同、利益不同，在阶级社会里也就是说人们是分别属于不同的阶级，站在不同的阶级立场上，出于不同的利益，对同样一个问题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社会科学本身具有阶级性，这一点连资产阶级学者也是承认的。例如，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获得者索洛就指出：“社会科学家和其他人一样，也有阶级利益、意识形态倾向以及一切种类的价值判断。但是，所有的社会科学的研究，和材料力学或化学分子结构的研究不同，都与上述（阶级）利益、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有关。不论社会科学家的意愿如何，不论他是否觉察到这一切，甚至他力图避免它们，他对研究主题的选择，他提出的问题，他没有提出的问题，他的分析框架，他使用的语言，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的（阶级）利益、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3] 索洛这一看法是符合客观实际的。

必须指出，只有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这是因为，工人阶级是最先进的阶级，它代表了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代表了社会发展前进的方向，它的利益是同社会发展的总趋势相一致的。在工人阶级那里，阶级性与科学性是统一的。

三 除了立场问题外，研究苏联演变问题还需要有正确的研究方法

苏联演变是一个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复杂的历史事件，其中有国际的因素，也有国内的因素；有党外的因素，也有党内的因素；有历史的因素，也有现实的因素；有政治的因素，也有经济的、社会的、民族的因素。对于这样一个复杂的事件，要作出科学的分析，必须有正确的方法。

列宁曾经指出：“社会科学的惟一科学的方法，即唯物主义的方法。”[4] 唯物主义就是要从客观存在的实际出发。原则不是研究问题

的出发点，而是对实际材料进行研究后得出的结论。正如毛泽东对实事求是所作的解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5] 我们必须从苏联演变的实际情况出发，找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内在联系。绝不能从某种既定的原则出发来剪裁苏联演变的材料，更不能用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来对苏联演变的原因进行简单的推理。正确的方法应该是，详细占有苏联演变过程的第一手材料，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进行分析，从中得出带有规律性的结论。

从实际材料出发，必须注意尽可能全面地了解苏联演变的整个过程，尤其要把握这一过程的基本事实，而不能抓住个别事例就下结论。苏联演变是一个多因素促成的复杂的历史过程，切忌不作全面研究，引用某一方面的甚至某几个材料就作出论断。列宁曾经告诫我们："在社会现象方面，没有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的方法了。罗列一般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或者完全起相反的作用，因为在具体的历史情况下，一切事情都有它们个别的情况。如果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而且是证据确凿的东西。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断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么事实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都不如。"[6] 因此，我们在研究苏联演变问题时，必须从事实的总和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中去把握苏联演变的过程。

研究苏联演变问题的另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原则是必须抓主要矛盾。苏联演变是多种矛盾综合起作用所造成的，然而这些矛盾在整个事件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一样的，如果不分主次去研究像苏联演变这样复杂的事件，势必如堕烟海，不知从何着手，或者只能停留在对现象的罗列和描述上，而不能把握事情的内在联系和本质。因此，应该从在苏联演变过程中起作用的各种矛盾中区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抓住主要矛盾，就抓住了整个事件的纲，进而"纲举目张"，就可以把事件的各个环节作为一个系统研究清楚。这是毛泽东同志教给我们的方法。他说："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

盾的存在和发展。”“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7] 我们必须运用这一方法来研究苏联演变问题。

四 研究苏联演变问题，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

对于像苏联演变这样重大而又复杂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政治事件，应该怎样分析呢？早在1914年，列宁就对分析复杂的政治事件谈到一个方法论性质的意见，他说：“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扑朔迷离、一团混乱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只有研究某一社会或某几个社会的全体成员的意向的总和，才能科学地确定这些意向的结果。其所以有各种矛盾的意向，是因为每个社会所分成的各阶级的地位和生活条件不同。”[8] 历史的发展是各种社会力量的合力推动的，为了说明历史的发展，就必须分析“社会关系以及从一个阶级到另一阶级、从过去到将来的许多过渡阶段的复杂情景”。他再三告诫说：“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离开分析阶级关系的正确立场。”[9]

回顾一下苏联演变的过程，我们不能不承认，这是社会主义条件下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斗争的核心是政权问题。苏联演变的实质是敌对势力（即所谓的“民主派”）在西方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在共产党内的新修正主义分子（即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分子）的鼓励和纵容下，三者相互配合，向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夺取政权的过程。整个过程显示出这样的“三部曲”：第一步，党外敌对势力和党内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分子沆瀣一气，全盘否定和攻击党的历史和社会主义实践，制造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舆论，做反革命的意识形态工作，搞乱了党员、干部和广大人民的思想，动摇了他们的社会主义信念；第二步，敌对势力在广大党员和群众思想混乱的基础上，瓦解党的组织，制造政治动乱，乘乱一步一步夺取政权，而共产党在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思想误导下，步步退让，拱手让权，最后无产阶级政权被颠覆，并酿成共产党被解散、苏联被肢解这样的亡党亡国的悲惨结局；第三步，资产阶级政治势力利用夺取到的政权的力量，推行私有化，恢复

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为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奠定经济基础。

苏联演变的过程，从政治斗争的角度看，大体上经历了以下几个回合。

第一回合，敌对势力成立各种“非正式组织”，公开地进行反共反社会主义活动，而戈尔巴乔夫非但不予制止，反而予以纵容和鼓励。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苏联社会上各种“非正式组织”如雨后毒蘑菇般冒了出来，1987年底，非正式组织就达3万多个，而到1989年2月则发展为6万多个，至1990年8月又陡增到9万多个。这些组织的宗旨，绝大多数都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敌对势力的活动由地下转为公开，他们公开组织各种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活动。一时间为了某种政治目的而举行的集会、游行、示威、罢工、罢课以至民族冲突接连不断。据官方公布，仅1989年一年，全国就举行了5300次群众性集会和游行示威，参加者达1260万人次，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稳定。

第二回合，为了在政治舞台上同共产党相抗衡，敌对势力并不满足于非正式组织的建立和公开活动，而是得寸进尺地要求正式成立政党，实行多党制。戈尔巴乔夫则认为，实行民主化、多元化，必然“会导致在某一阶段建立一些政党”，“多党制并不是悲剧”，“不应当像魔鬼害怕烧香那样害怕多党制”，宣布苏共准备同新成立的政党“合作并进行对话”，同时决定修改宪法，取消宪法中有关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的条款。这实际上是共产党主动从法律上放弃领导地位，允许敌对势力向共产党夺权。

第三回合，在“自由选举”的旗号下，敌对势力一步一步地夺取地方政权，进而夺取全国政权。在取消共产党领导以后，敌对势力利用地方权力机关换届之机，在选举中通过报刊、电台、电视台频频发表竞选演说，并组织各种群众集会进行声援，声势夺人；而苏共中央却不断向下发指示：“不准干预”选举，因而共产党的候选人几乎毫无声息。结果，大批“持不同政见者”、政治反对派以及各种犯罪分子进入苏维埃，并在许多地区取得了多数地位。在“8·19”事件之前，苏共已在7个加盟共和国（包括俄罗斯）和一系列重要城市（包括莫斯科、

列宁格勒、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等）失去了政权，沦为在野党。敌对势力并不以夺取部分地方政权为满足，他们的目标是夺取全国的政权。在政局急剧动荡的情况下，1991年4月23日举行了“9＋1”会议。这次会议撇开合法产生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和政府，以共产党与反对派“平等对话”的方式，决定有关国家命运的大事，实际上推翻了现有的中央政权，成为一场政变。

第四回合，借“8·19”事件失败之机，解散苏共，肢解苏联。敌对势力以共产党在这一事件中“未能站在谴责和抵制的坚决立场上”为由，宣布解散共产党，没收苏共财产，查封党的各级机构及其报刊，停止党的各级组织和活动。随后，宣布苏联解体，从此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世界政治地图上消失了，资本主义复辟在苏联疆域内成为现实。

回顾苏联演变的过程，谁都不能否认这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我们可以看到，敌对势力是多么的猖獗，他们步步进逼，提出一个又一个政治要求，咄咄逼人，而苏联共产党在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的误导下，却不断妥协，直至让出政权、自动解散。这一过程真是惊心动魄！

五 绝不能说苏联向资本主义演变是“人民的选择”

有人以苏联演变过程中，曾经有几千万人次的反共游行、集会、罢工等活动，而在“8·19”事件后解散苏共时又没有遭到有组织的反抗为根据，证明苏联的演变反映了人民的意愿，是人民的选择。

这种判断是错误的。历史上一切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的倒退行为，都是反动阶级强加给人民、违背人民群众意志的，苏联的演变也不例外。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猖獗一时、肆无忌惮的反共反社会主义活动，是在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公开性方针的支持和纵容下，敌对势力通过蛊惑性欺骗宣传煽动起来的。这类活动表面上声势不小，但骨干人数却不多，大多数群众是不赞成的。至于说到解散苏共时没有什么有组织的反抗，这并不能证明广大党员拥护解散，而恰恰证明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恶果，按照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改造

党，使得共产党改变了性质，思想混乱，组织涣散，已经处于不攻自垮的状态，因而不可能有组织地反抗解散苏共的决定。事实上，苏联的演变不符合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人复辟资本主义的行为以及解散苏联的决定并没有得到人民的授权。1991年3月17日苏联曾就“是否赞成保持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这一问题进行全民公决，结果是，参加投票者76%的人赞同保持苏联，但此后仅9个月时间，叶利钦等人就强行解散苏联，这难道是“人民的选择”？显然，这是反人民的。我们再举一个例子。1990年前后，为了研究苏联改革的走向，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许多民意测验机构在苏联进行了多次民意测验，结果表明：支持实行资本主义的人在5%～20%之间，而高达80%的人都希望坚持社会主义。1991年5月（即苏联解体前7个月），美国一个民意测验机构在苏联进行了一次1000人规模的民意测验，其中一项内容是：“你是否赞成在苏联实行美国式的自由市场经济？”只有17%的人表示同意，83%的人表示不赞成。由此可见，苏联公众的大多数并不想取消社会主义而建立资本主义。如果让苏联人民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愿，他们是绝不会选择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直到2001年12月8日，也就是解散苏联的《别洛韦日协议》签订10周年之时，俄罗斯就解散苏联一事举行的民意测验显示，多数俄罗斯人（72%）对苏联解体感到遗憾，只有10.4%的人赞同解散苏联，13.4%的人对此漠不关心，其他人认为难以回答。可见，苏联演变和解体并不反映人民的愿望，不是人民的选择。

六 正确评价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是研究苏联演变问题的前提

苏联演变问题研究工作中观点的分歧，往往是同对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评价分不开的。很明显，如果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实践，认为苏联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错误的，社会主义建设一无成就，“对斯大林模式否定得越彻底越好”，那么，苏联演变的原因就在于社会主义本身，从而向资本主义演变就是必然的，甚至是进步的；如果对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评价是“三七开”，认为成绩和经验是主要的、第一位的，缺点和问题是次要的、第二位的，那么，苏联演变的决定性原因就不应该到社会主义实践中去找。向资本主义演变也不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处于次要地位的缺点和问题完全可以在社会主义制度的范围

内，依靠社会主义自身的力量加以解决，而不需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

清代思想家龚自珍总结历朝更替的教训，提出一个振聋发聩的论断："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史存而国存，史亡而国亡。"这一论断说明了正确对待历史的重要性。苏联演变为这一论断又增添了一个注解。回顾一下苏联演变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敌对势力正是在民主化、公开性的纵容和支持下，全盘否定党的历史和社会主义实践，把过去的一切工作描述成一团漆黑、一无是处，从而动摇了党员、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对共产党的信任和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在此基础上进而煽动群众、制造政治动乱，最终夺取政权。所以，如何评价社会主义实践，不仅是一个学术问题，而且是一个关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前途和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

评价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第一，应该采取历史主义态度，即结合具体的环境和条件来评价。有许多事情，例如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等，在当时是必要的、正确的，但随着条件的变化需要调整和改革。切忌用现在的、已经变化了的条件来评价历史上的事情。第二，应该全面分析，既看到问题，也要看到成绩，而且应该分清主流和支流。必须从整体上考察苏联社会主义实践，切忌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一叶障目，不见太山。更不能带着偏见去观察，先有了结论，然后去寻找符合这个结论的材料，而对不符合这个结论的材料视而不见。第三，必须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它的具体实现形式——体制、运行机制——区分开来，正确认识缺点和问题的根源。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失误和弊病，不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产生的，而是在具体的体制、运作机制环节上出现的，或者是由工作方法、具体政策造成的，因而纠正这些失误和弊病，不需要改变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而应该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改革体制和改进工作。切忌笼统地谈论失误和弊病，并把它们引到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身上去。

在谈论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成败得失时，还应该看到，苏联是人类历史上把社会主义从理想变为现实的第一个试验，是一种没有现成

经验可资借鉴的探索（巴黎公社只存在72天，留下的经验太少）。这种探索，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挫折的教训，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宝贵的财富，都为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丰富的借鉴材料。

分析苏联演变同社会主义实践的关系时，在方法论上，必须注意把改革的必要性与垮台的必然性区分开来。

谈到苏联演变的原因，人们往往提到苏联演变是执政的共产党犯错误的结果。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共产党处于执政地位，如果共产党不犯错误，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可能被颠覆的。然而这样的认识是远远不够的，有时甚至会导致错误的结论。应该看到，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崭新的事业，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需要在实践中进行探索，在探索过程中，出现失误是不可避免的。如果笼统地说共产党犯错误就必然导致社会主义垮台，那么我们对社会主义就一点也没有信心了。必须具体分析所犯错误的性质。有两类错误。一类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具体工作中犯的错误。对于这一类错误，哪怕是带有全局性的错误，像我国“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错误，共产党只要有一条正确的路线，完全可以由自己来纠正，并不会改变党和国家的颜色。另一类错误是共产党抛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提出并执行一条错误的资本主义性质的路线，那么推翻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结局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而且是无可挽回的。苏联演变正是后一类错误造成的。

这两类性质的错误说明的是这样两个不同的问题：前一类错误说明了改革的必要性。改革不是目的，而是解决实际生活中存在的矛盾的一种手段，正因为出现失误和存在弊端，所以必须进行改革；后一类错误则必然导致社会主义垮台。试想，执政的共产党自己都不搞社会主义了，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了，在这个国家里，社会主义制度当然就难以继续存在下去了。我国学术界有人经常罗列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失误和弊端（从数量上说，这是很多的，而且孤立来看，有的问题还十分严重），以此作为苏联演变的根本原因。这种看法在方法论上的缺点就是没有区分不同问题的性质：把说明改革必要性的问题当做必然导致垮台的原因了。

七 必须具体分析各种因素在苏联演变过程中的作用

上面讲过，苏联演变是多种因素综合起作用所造成的。为了分析苏联演变的原因，我们应该全面地考察所有有关的因素。

在国际国内研究苏联演变问题的著作中，关于苏联演变原因的说法是各种各样的，几乎是一人一种说法。但是，概括起来，无非三大类因素。第一类是外部因素，即西方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战略。这一类因素不容忽视，美国一些政治家更看重这一因素的作用。但是西方国家在苏联演变过程中的作用终究只是外部的，和平演变战略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就推行了，一直没起多大作用，只是到了80年代末才发挥巨大影响。“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因此，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国内的因素。

第二类是社会主义实践中出现的失误和弊病。列举这一类因素的各种具体表现，往往成为研究苏联演变原因的主要内容，有人把这一类因素中的某些表现称为苏联演变的“深层次原因”，仿佛正是这些失误和弊病是导致苏联演变的根本的、决定性的原因。这是值得探讨的。我们不否认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确犯了很多错误，有的还十分严重，然而这些错误在整个社会主义实践中是支流。这些错误的不良后果引起了人民群众的不满，给敌对势力提供了煽动群众、制造动乱的可乘之机，但它们终究只是演变的一种潜在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能否变为现实，取决于党的路线。如果共产党有一条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就完全可以通过改革纠正错误，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应该承认，我国由于“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在20世纪70年代末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远比苏联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时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要严重得多，然而我们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贯彻党的基本路线，通过改革开放，不仅克服了困难，而且出现了经济繁荣、政局稳定、社会安定的欣欣向荣景象，使得苏东剧变后社会主义堡垒依然屹立在东方。在苏联80年代中期存在的矛盾、困难和问题尽管比我国要少得多，程度也轻得多，但由于发生了路线性错误，却出现了向资本主义演变的悲剧。把中国与苏联的情况作一比较，我们可以看到，问题不在于社会主义实践是否有失误和弊病（这在一定程度上是难免的），

而在于如何对待这些失误和弊病，这里，路线是决定一切的。因此，绝不能认为，第二类因素是苏联演变的决定性因素。如何分析这一类因素在苏联演变过程中的作用，是我国学术界在研究苏联演变原因问题上存有分歧的焦点所在。

第三类因素是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领导集团推行一条错误路线——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贯彻这条路线，使得共产党变成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导致思想混乱、组织涣散，最后毫无反抗地接受解散的结局；贯彻这条路线，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否定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照搬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使得社会制度由社会主义演变为资本主义；贯彻这条路线，纵容和鼓励敌对势力开展夺权斗争，而共产党则步步退让，最后拱手让出政权。应该说，戈尔巴乔夫的错误路线是苏联演变的决定性因素，它与苏联演变之间是一种直接的、必然的因果联系。

苏联演变是这三类因素的合力促成的，但前两类因素早已存在，它们只是一种潜在的因素，只是在第三类因素推动下才转化为苏联演变的现实因素。

八 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是葬送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手里的

社会主义是一个经常改革的社会。因为同其他社会制度一样，社会主义社会也存在矛盾，也是在不断出现矛盾而又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发展的。通过改革解决矛盾，是社会主义向前发展的动力。改革才能使社会主义保持蓬勃发展的活力。但是，并不是任何改革都是正确的。必须区分两种改革：一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即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改革不适合生产力发展需要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另一种是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即把改革的矛头指向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抛弃社会主义，实行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戈尔巴乔夫推行的就是后一种改革，在一片“改革”声中葬送了社会主义。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以全盘否定社会主义实践作为出发点的。他提出，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极权的”、“官僚专制的”、“专横

的"社会主义，因为存在各式各样的垄断：政治上，共产党的领导，造成共产党"对政权的霸占"，这是政治垄断；经济上，生产资料公有制占统治地位，排除了人们对所有制的自由选择，这是经济垄断；思想上，马克思列宁主义起指导作用，妨碍了"吸收先进思想"，这是精神垄断。这些垄断导致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出现异化现象：政治垄断导致"人与政治、政权的异化"，经济垄断导致"人与财产、生产资料的异化"，精神垄断导致"人与文化的异化"。"改革"就是要消除垄断、克服异化，"形象地说，应该炸毁一切"，"告别过去"，"根本改造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办法是实行多元化，即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实行多党制、议会民主；取消公有制，实行私有化；取消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实行意识形态多元化。简单说来，就是按照西方国家一整套社会制度的模式改造社会主义制度。这就是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改革"的基本思想和主要内容。这样的改革实际上就是全面的资本主义化。

顺便说一下，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的改革，从根本上讲，是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一致的，可以说它是对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继续和深化。

可见，不要笼统地谈论改革，不要天真地认为一切改革都是好的。讲到改革，必须问一问改革的性质、对象和目标，即改什么和想改成什么样。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反对资本主义化的改革，不要上像戈尔巴乔夫那样的打着"改革"旗号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家"的当。

九 在苏联演变过程中戈尔巴乔夫的作用，主要是指他所代表的一条错误路线的危害

戈尔巴乔夫自称，他"终生的目的是消灭共产主义"。当叶利钦等人宣布解散苏联、戈尔巴乔夫不得不离开刚刚坐暖的总统宝座时，他表示"感到安宁"。这是因为，如他自己所说："我生活的主要目的已经达到：我消灭了苏联和所有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主义。"[10] 身为苏联共产党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居然把消灭共产主义作为"生活的目的"，把他称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大的叛徒，绝不为过。

在他的领导下，苏联出现向资本主义演变的局面是在所难免的。

有人不赞成戈尔巴乔夫应对苏联演变承担责任。他们说：“把苏东剧变的原因归罪于戈尔巴乔夫等人对社会主义事业的背叛，是他的所谓的‘新思维’使苏联已经起步的改革背离社会主义方向，并最终导致该国政治经济制度解体，这是夸大叛徒的作用，是‘叛徒史观’，实际上是一种历史唯心主义。”这种流行的看法是值得探讨的。

应该指出，我们在谈到戈尔巴乔夫的叛徒行径时，并不仅仅指他个人的行为（当然，他个人是有责任的），主要指的是以他为代表的一条背叛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错误路线。好比列宁说考茨基是叛徒，主要指的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路线一样。以戈巴乔夫为代表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不是社会主义的一种模式。从意识形态来说，它是一股反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潮；从社会制度来说，它是作若干改良的资本主义制度；从历史作用来说，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它是从社会主义倒退到资本主义的桥梁。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是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和阶级根源的。正如列宁所说：“机会主义不是偶然现象，不是个别人物的罪孽、过错和叛变，而是整个历史时代的社会产物。”[11] 戈尔巴乔夫所代表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也不例外。概括说来，屈服于帝国主义压力是它产生的外部条件，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是它产生的内部条件。我们不来详细分析这股思潮的根源，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需要专门讨论。这里，我们只想强调一点，戈尔巴乔夫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同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是一脉相承的。我们党的一位领导同志曾精辟地指出，戈尔巴乔夫“新思维”那一套不是一下子产生的：“从思想政治渊源来说，可以追溯到赫鲁晓夫时期。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鼓吹什么‘全民党’、‘全民国家’，把党和人民的思想搞乱了。苏联今日的演变，从赫鲁晓夫时期已开始埋下了种种危机。”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当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这股思潮在苏联东欧国家泛滥起来的时候，我们党严肃地指出了这股思潮的危害，提出要分清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界限。应该说，这至

今仍是理论界的一项重要任务。

十 苏联演变是不是具有必然性？

在讨论苏联演变问题时，经常有人提出这样的疑问：苏联演变是不是必然的？撇开政治立场不说，单从认识的角度看，这个问题，应该分为两个层次来说明。如果从社会发展规律来说，苏联演变不过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的一个旋涡，它不是客观的必然趋势，而只是发展中的一种曲折。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客观规律，是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决定的。只要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依然存在，这一规律就不会改变。但这一规律是通过阶级斗争实现的，因而它的实现过程不是直线的，出现一些反复、曲折是难以避免的。苏联演变只不过是这种曲折性的表现。我们不应该由于出现苏联演变这样的曲折（尽管这是十分严重的挫折）就怀疑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客观必然性。如果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阶级斗争的具体环境，即当时当地的阶级力量对比来说，由于执政的共产党领导集团的叛卖，使得得到帝国主义支持的敌对势力的力量占了上风，压倒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因而苏联演变又是必然的。为了总结苏联演变的教训，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其原因，防止阶级力量对比发生苏联那样的逆转。我们一方面要总结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尤其是要分析其社会主义实践中出现的失误和弊端，坚持改革，与时俱进，努力消除敌对势力的可乘之机，消除演变的潜在的可能的因素，使社会主义立于不败之地；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研究像苏联共产党这样一个历史悠久、具有光荣革命传统而又有丰富经验的政党内部，为什么会产生一批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分子这样的“精英”，探讨如何保证党政领导权牢牢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防止出现像苏联演变那样的局面。

正如我国一位诗人仿《阿房宫赋》所说的：“苏共之亡，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认真研究苏联演变的原因，汲取其教训，完全可以避免像苏联演变这样的悲剧重演，完全可以避免出现“后人复哀后人”的局面。

---

[1] 周新城，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2] 吴冷西：《十年论战》（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第646页。

[3] 〔美〕克伦道尔、埃考斯编《当代经济论文集》，波士顿，利特尔·布朗公司，1972，第11页。

[4] 《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第181页。

[5]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801页。

[6] 《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90，第364页。

[7]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320、322页。

[8]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426页。

[9] 《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85，第140页。

[10] 〔捷〕《对话》1999年第146期。

[11]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494页。

苏联解体的原因分析

徐崇温 [1]

一 苏联解体源于戈尔巴乔夫走上改旗易帜的邪路

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接任苏共领导的时候，苏联经济正在不断滑坡，经济改革形势紧迫，于是经过一年多的研究，他在1986年的苏共二十七大上推出了“加速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在1987年的苏共中央六月全会上又推出了“根本改革经济管理的基本原则”。但前者由于根本忽略了当时苏联国民经济中产业结构已经很不合理的情况，进一步加剧了农轻重的比例严重失调，导致消费品市场供应出现全面紧张、全面短缺，价格上涨，卢布贬值，抢购之风盛行，群众对改革日益丧失信心而遭到挫败；后者则由于在当时的苏联缺乏有效的价格、财政、税收等政策以及宏观的竞争机制和约束机制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做法只是招致了企业“集团利己主义”的滋长，使消费基金的增长大大超过消费品生产的增长，从而进一步加剧了消费品短缺和通货膨胀的严重局面，使其改革再次遭到挫败。

在经济体制改革一再遭到挫败以后，戈尔巴乔夫不是实事求是地从中寻找原因，再接再厉地推进改革，而是把它归因于“障碍机制”，并从1988年6月的苏共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开始，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首位，把它当做深化改革的关键。而他所说的要改革的政治体制就是指十月革命后形成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他说，在3年来的改革中，“经济状况改变得缓慢”，其原因在于“在某一个时期，由于十月革命胜利而形成的政治体制发生了严重的变形”，“现在我们所遇到的许多困难，其根源也可以追溯到这个体制”，它“注定使当时进行的改革归于失败”。

应当说，早在这次苏共的党代会之前，戈尔巴乔夫就已在酝酿“改革”苏联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例如，在1987年11月庆祝十月革命70周年的大会上，他就强调要改变“被扭曲的”社会主义

制度；在1987年出版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他说过去的政治“把阶级利益置于首位”，而他的“新思维的核心是承认全人类的利益，人类生存的利益高于一切”。改革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最充分地揭示我们制度的各个决定性方面——经济、政治、道德的人道主义性质”。1989年11月26日，他在《真理报》上发表《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性变革》一文说：“社会主义思想，据我们今天的理解，首先是自由的思想。”“而且是指这样的自由，它依据人的理智，依据关于个人权利、其他人的生活环境，关于自由的人道主义观念。”“社会主义是一般民主的和全人类的理想和价值观的体现者和捍卫者。”他特别强调：“如果说在初期，我们认为改革基本上指的只是纠正社会机制的部分扭曲现象……那么，现在我们说，必须根本改造我们的整个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我们可以完全有根据地说，我们正在建设的不仅是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而且是民主的社会主义。”而在1990年7月的苏共二十八大上，戈尔巴乔夫正式举起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旗帜，从而完成了他改旗易帜的发展历程。

为什么说戈尔巴乔夫举起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旗帜，就是在“改旗易帜”？因为正是在这面旗帜下，他从批判斯大林的错误转到全盘否定斯大林，把苏联的社会主义说成必须加以“根本改造”的“国家社会主义”、“专制官僚体制”；从宣传人道主义价值观发展为在国内鼓吹超阶级的民主自由，在国际上鼓吹全人类的价值观，要求在政治上排除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对抗性；从公开性、民主化发展为鼓吹政治上的多元化、多党制；在经济上，鼓吹用生产资料私有化去“全面改革所有制关系”；在思想上，鼓吹指导思想多元化，要求“坚决摒弃对其他观点与思想的意识形态限制、教条主义和不容忍态度”；在党的问题上，鼓吹“党的民主化”，要求苏联共产党起“议会党的作用”，使之成为“自治的社会主义政治组织”。而且戈尔巴乔夫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他直接从社会党国际的民主社会主义那里抄袭而来的，只不过是它的一个翻版罢了。1990年4月30日，戈尔巴乔夫在《工人阶级与当代世界》杂志上发表《未来世界与社会主义》一文说：“在社会民主党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中，我们看到了许多有意义的、富有启发性的内容。我确信，由于社会主义国家中的

深刻变化以及社会民主党内的过程，我们正变得彼此接近起来。”“今天，在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之间，已不再存在从前使他们分裂的鸿沟。”因为“共产党人对自己的弱点、失误和错误估计进行了毫不留情的自我批判”。“社会党国际十八大所通过的纲领性文件证明，我们有许多共同之处——无论是在对当代世界的看法上，还是在理解所有进步力量所面临的任务上，在人道的、民主的价值观的基础上，我们不仅在政治立场上，而且也在世界观立场上都接近了，这种接近是当代世界发展的逻辑，是世界形势乃至历史经验的要求。”

然而，事实上，民主社会主义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却是根本对立的：在对待资本主义的态度上，科学社会主义坚持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民主社会主义则认为，在当今世界上，资本主义已无可取代，并以“资本主义病床边的医生”自居，说自己要“同资本主义共同生存”。在对待社会主义的态度上，科学社会主义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同时代特征、各国人民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与时俱进地不断深化着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不断地赋予社会主义以新的生机和活力；而当代的民主社会主义则把社会主义视为通过对现存资本主义的不断调整实现平等、互助的价值，对存在局限、矛盾和不平衡的历史进程的不断改革，从而把社会主义从人类社会的选项中排除出去，同时又反对共产主义，并参与帝国主义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科学社会主义坚定不移地把马克思主义当做自己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而民主社会主义则把世界观中立、指导思想多元化奉为自己的思想纲领。

二 对于社会主义的自我丑化、自我否定，是苏联陷于解体的最根本前提

在民主社会主义的反共主义看来，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破坏自由和获得自由的机会”，“它的基础是建立在军事官僚和警察恐怖之上的”，是和法西斯主义并列的一种“极权主义”、“旧式的暴政”、“独裁统治”，它“把人当做原料而不是一切努力源泉和目标”。

早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所作秘密报告中，赫鲁晓夫就沿着民主

社会主义的这一反共主义路线，指责斯大林是“迫害狂”、“严酷的专横”、“走上了大规模迫害的道路，走上了恐怖的道路”，而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这就使帝国主义能够利用它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一场大规模反苏反共浪潮，在东欧酿成波匈事件，在西方国家则造成1/3的共产党员退党。

到了20世纪80～90年代，戈尔巴乔夫继承和进一步发挥了这种反共主义，对列宁逝世以来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加以全盘否定。他认为，苏联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给人民带来的只是灾难，因而不仅犯了错误，而且是“犯了罪”的“极权社会主义”、“专横社会主义”。他说：“几十年来强加给党的社会主义原来那种理论和实践模式已经站不住脚了。”“几十年来强加给党和社会的模式已经遭到战略性的失败，这一结论具有原则意义。”它说明几十年来形成的体制机制的弊端是“人与政权的异化，人与生产资料和自己劳动成果的异化，人与精神财富的异化”。他认为：“改革的意义，归根到底就在于彻底克服这些异化现象，而纠正的办法是采用属于全人类共同价值标准”的“民主和人道主义”。他强调说：“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我们已接近于必须进一步彻底改变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观点。在旧模式的范围内，找不到我们问题的答案。”为了克服这种危机，就“必须粉碎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以及有关的一切东西”。

应当指出，戈尔巴乔夫在这里所涉及的，已经不是单纯的斯大林的问题，而是怎样看待苏联几十年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几十年的历史的问题。在20世纪50年代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引发国际反苏反共浪潮的时候，毛泽东曾经明确指出，斯大林有缺点，有官僚主义，但他终究把苏联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国家，毕竟打败了希特勒，如果都是官僚主义，都是官僚机构，能够取得这么大的成功吗？说苏联都是官僚阶层，是不能说服人的。在斯大林的问题上，当时世界上议论最多的，一是肃反扩大化，一是大国沙文主义。但无论在对待反革命分子问题上或对外关系方面，斯大林都有他正确的方面。人杀多了，但对那些真正的反革命分子是杀对了，错在扩大化，杀错了好人。在对外关系方面，多数情况下，斯大林还是实行国际主义的，他援助兄弟党和兄弟国家，援助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所

以，对斯大林的问题，要实事求是，不能全盘否定[2]。30多年以后，当问题涉及对晚年犯有错误的毛泽东进行评价的时候，邓小平更把问题提到如何对待我们党和国家一段重要历史的高度："毛泽东同志从一九五七年开始犯了'左'的错误，最'左'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然而，邓小平在评价毛泽东的时候说："对于错误，包括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分析各种不同的情况，不能把所有的问题归结到个人的品质上。""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他反复强调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3]。他还说："我们党总结历史经验不能丢掉毛泽东。否定毛泽东就是否定中国革命大部分的历史。""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只有采取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分析和总结，才有好处。""对毛泽东同志晚年错误的批评不能过分，不能出格，因为否定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意味着否定我们国家的一段重要历史，这就会造成思想混乱，导致政治的不稳定。"[4]

从这样的高度来看戈尔巴乔夫通过全盘否定斯大林来对苏联社会主义所作的自我丑化、自我否定，就不难发现，他的改旗易帜，对社会主义的自我丑化、自我否定之所以会导致苏联解体，其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对于戈尔巴乔夫搞的社会主义自我丑化、自我否定，有一位美国政论家米克尔·达维多曾经评论说："在五年多的时间中，由于片面地、完全否定地把党和国家的百年历史说成极权政治，从而为反共提供了和继续提供着肥沃的土壤。美国的历史过去和现在都有黑暗的章节——奴隶制、消灭土著的印第安人，但它从未受到过如此片面的否定。如果说以前对事实的歪曲来自国外的反苏势力，那么现在则是由苏联的主要报刊和往往是知名的党员通过苏联电视台向苏联人民提供的，目前许多主要的苏联报纸和杂志上的反共内容比美国报刊多，某些电视台也是如此。此外，这种反共要巧妙得多，因为它建立在对党和苏维埃国家历史'内部'了解的基础上。从这一点上看，苏联目前是反社会主义、反苏、反共宣传的最'权威的'发源地。"

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人对于社会主义的自我丑化、自我否定，为他们的自我垮台、为苏联的解体创造了最根本的前提，这是因为既然苏联共产党人自己把几十年来的社会主义实践抹得一团漆黑，那么它还有什么理由要求执掌对于国家和社会的领导权呢？

三 “公开性、民主化、社会多元论”召唤反共势力集结起来推翻共产党的领导

不仅如此，戈尔巴乔夫还在1988年的苏共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上提出了所谓公开性、民主化、社会多元论三项倡议，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公开性的决议》还强调公开性是实现社会主义人民自治以及公民的权利、自由和义务的必要条件，是实现苏联社会各种利益和舆论多元化的方法，是确立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有效途径。

应该指出，如果扩大公开性的口号，是针对着苏联模式过去对于社会主义民主的宣传和实行得都很不够、公开性水平低下等缺陷而提出，旨在调动广大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的话，那当然是无可非议的。但现在的问题在于，戈尔巴乔夫是在大搞社会主义的自我丑化、自我否定的前提下提出这些口号的，而且还把它们加以片面化、绝对化，宣扬什么“毫无限制的公开性”、“最大限度的公开性”、“放手去搞公开性”。戈尔巴乔夫本人就在这些口号下，把斯大林时期的“行政命令体制”说成“专横的官僚体制”、“极权主义”、“兵营式的社会主义”。再加上苏联最高苏维埃1990年6月12日通过的《新闻出版法》又宣布“新闻自由”、“舆论不受检查”，公民有“以任何形式、包括通过报刊和其他舆论工具发表意见和见解，寻找、选择、获得和传播信息的权利”，并规定国家机关、政党、社会组织、宗教团体以内及年满18岁的公民“都有权利创办舆论工具”。这就使他的所谓公开性、民主化、社会多元论三项倡议，成了用泄露党和国家机密的“新闻自由”去揭露社会主义的所谓“黑暗面”，使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遭到贬抑、共产党的形象遭到损害，并使意识形态严重失控和瓦解的工具和武器。

为此，早在苏联解体不久之后，戈尔巴乔夫的这三项倡议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就受到了国外舆论的热烈议论：1991年9月23日的香港《亚洲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评论说，戈尔巴乔夫试图做的是改变权

力关系的性质，他选择的道路是对党加以限制，通过公开性揭露党的缺点，但公开性很快就失控，使苏联的统治作为一个政府的合法性威信扫地。文章认为，国家的稳定取决于三个因素：没有严重的民族矛盾、工人阶级相安无事和统治集团的团结一致。过去所有这些条件都靠意识形态来保证，在公开性的压力下，意识形态的瓦解使所有三个条件都受到了破坏。1992年1月9日的菲律宾《世界日报》发表文章评论说，戈尔巴乔夫在最需要一个坚强核心的时候削弱了共产党，在最需要全国团结一致的时候却大翻历史旧账，挑起了意识形态的大争论和民族问题大爆发，在最需要一个有效的行政机构推行其改革计划时，却一手削弱和摧毁了党。苏联这么一个强大的国家落到这个地步，不是像有一些人说的那样是社会主义造成的，这完全是戈尔巴乔夫轻信西方，人谋不臧的结果。智利共产党前总书记路易斯·科尔巴兰则在1993年发表的一本著作中指出，苏联的社会主义不能前进是因为受到了中央集权和官僚主义的侵蚀，但戈尔巴乔夫采取的措施却是把国家推向了崩溃，在客观上，戈尔巴乔夫成了苏联政权的掘墓人。

关于社会多元论的问题，首先要指出的是，在社会主义社会，确实存在着人民内部矛盾，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思想观点和利益差别。斯大林强调工农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社会道义上和政治上的一致，显然是片面的，但戈尔巴乔夫提出的社会多元论，却不是用正确的方针去调节社会主义社会中确实存在的矛盾和利益差别，而是把它引到政治的方向上去，鼓励社会团体同党唱对台戏，以后，他更由多元论发展为鼓吹多党制，说什么民主化将导致“出现公民的新的社会政治团体”，“社会发展也不排除创造政党的可能性”；“实行多党制并不是悲剧，如果多党制是一种正常历史进程的结果并符合社会需要的话，我们不应当像魔鬼怕烧香那样害怕多党制”。这就把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蛰伏下来，或者在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政策的影响下培植起来的反共势力召唤和集合起来，组织成反对党去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布热津斯基在《大失败——20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一书中曾经评论说，多元化“有助于使持不同政见者逐渐成为真正的政治反对派，到一定时候，他们就会要求进行和平移交权力的谈判”，一个多元化的“独立的民众社会的出现，就等于社会从共产党统治下最终解放出来的开

端”。据统计，随着公开性、民主化、社会多元论方针的推行和实施，苏联的各种非正式组织一下子从地下钻了出来，1987年为3万多个，1989年为6万多个，1990年达9万多个，这些非正式组织大部分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而在1990年苏共中央二月全会决定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实行多党制以后，又一下子出现了500多个政党，全苏性的政党有20多个，而且几乎全都是以打倒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为政治目标的。

共产党在苏联执掌政权达74年之久，为什么在戈尔巴乔夫走上改旗易帜的邪路以后，就会顷刻丢权，使苏联解体崩塌呢？原苏共里沃夫州州委第一书记谢克列塔留克在该党沦为在野党以后，痛切地反思了丢权过程。他说：“先是共产党对70多年来犯的错误表示内疚、反省，以为会全民欢呼，民主化一帆风顺。”但事实并非如此，该州共产党“人数最多，但只想谦虚地作为一种平衡力量进入州苏维埃，然而人家不买账，他们仇视共产党，理由是：共产党把国家搞到这种地步，是犯罪组织，应该被消灭，被赶出政坛”。

应该说，这也就是戈尔巴乔夫走了改旗易帜的邪路导致苏联解体所留下的一个深刻教训。日本共产党认为，苏联解体是因为苏共领导走上了一条极端的、完全抛弃科学社会主义世界观和期望资本主义的道路，采取了自我否定、自掘坟墓、自我毁灭的变节者的态度，所以，苏共亡党和苏联的解体，是那些违背科学社会主义和逆历史潮流而动者必然带来的和合乎规律的结果。美国共产党认为，苏联解体是苏联领导人偏离社会主义原则造成的恶果，也是西方诋毁、消灭马列主义的努力的一部分。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实行的公开性促成了反社会主义、反共产主义势力的形成。总起来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是西方资产阶级与戈尔巴乔夫、叶利钦里应外合发动的一场反共政变。

---

[1] 徐崇温，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2] 参见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第19、26、27页。

[3]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第291页。

[4]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271、272、284页。

苏联剧变和解体的根本原因是内部出了问题

——苏共亡党、苏联解体20年后的思考

赵曜 [1]

一 改革的错误导向

戈氏上台以后，看到苏联社会问题成堆，顺乎历史潮流，坚持对社会的各个方面进行改革是对的。但是，在当时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和思潮的压力与影响下，改革逐渐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背离了原来“完善社会主义”的宗旨和轨道，导向都错了，最后改革变成改向和改制，葬送了社会主义事业。

（1）经济体制改革的错误导向。戈尔巴乔夫上台后，首先抓的也是经济体制改革。但是，他先后出台的几项措施，几乎都是错误的。首先，实施“加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苏联的经济结构很不合理，农轻重的关系始终没有调整好。在超重型的经济结构没有调整的情况下，“加速”发展，只能使农轻重的关系越来越失调。其次，开展反酗酒运动。苏联人生活在寒带，长期养成了喜爱喝酒的习惯。反酗酒，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导致人民对改革不满，对党和政府不信任。再次，向市场经济过渡。戈氏认识到原有的计划经济已不能适应新形势下发展经济的要求，坚持过渡到市场经济是对的，但急于求成，引进了新自由主义和接受了沙塔林院士的“500天纲领”，试图用一年多时间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欲速则不达，结果把苏联的经济体制搞成既不是计划经济又不是市场经济，经济生活越来越混乱和困难。最后，实行经济私有化。苏联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同时，实行私有化计划，确定头两年把80%的中小企业卖给个人，接着大型企业也由私人经营，用资本主义私有制代替社会主义公有制，从而摧毁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2）政治体制改革的错误导向。戈氏在改革初期提出“多一点民

主”、“多一点社会主义”的口号，在群众中产生好感。他还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对此我们也应予以肯定。问题主要发生在1988年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以后，他轻率地把改革重点从经济领域转向政治领域，全盘照搬西方的政治模式——总统制、议会制、多党制，并错误地提出“民主化”、“公开性”口号。这样，“民主化”就变成无政府主义，谁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谁也管不了谁。同时，把“民主化”和党的领导对立起来，矛头直接指向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及其合法性。“公开性”，则把赫鲁晓夫对前人的否定发展为历史虚无主义，否定社会主义历史，否定历史人物，诬蔑以往的社会主义是“扭曲变形的社会主义”、“官僚专制的社会主义”，给社会主义抹黑，自我丑化，自我否定，自我毁灭。民主化和公开性把两种势力释放出来：一种是反社会主义势力，一种是民族分裂主义势力。释放出来以后，谁也驾驭不了，于是政局动荡失控，最后从动荡失控走向崩溃解体。

（3）意识形态领域改革的错误导向。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把意识形态工作交给他的亲信雅科夫列夫、梅德韦杰夫，这个领域始终由党内的右翼势力把握。戈尔巴乔夫接受雅、梅的建议，先是提出“意见多元化”，接着发展为“舆论多元化”，最后毫不掩饰地提出“意识形态多元化”。这样，就由僵化变成自由化。意识形态多元化的实质，就是主动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让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占领这块重要阵地。从此以后，苏联的理论混乱，舆论失控，报刊和新闻广播连篇累牍地发表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攻击社会主义的谬论，党的机关报《真理报》不再讲真理，政府机关报《消息报》专门发表反政府文章。

戈尔巴乔夫在“意识形态多元化”中，带头否定和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1987年，他应美国一家出版商的约请，用了40天时间，写作并出版《改革与新思维》一书。“新思维”的基本内涵，一方面美化资本主义，主张重新评价资本主义，另一方面丑化社会主义，主张根本改造社会主义，在这个基础上鼓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进行“历史性妥协”。“新思维”的要害是“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的价值观。戈尔巴乔夫鼓吹：现在“大家都在同一条船上”，因而应当使自己的举动不致导致翻船。这实际上是在西方的核讹诈面前奉行阶级投降

主义，是赫鲁晓夫“诺亚方舟论”的翻版。后来戈尔巴乔夫又进一步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戈氏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是民主社会主义在苏联的翻版。戈氏的这一举动实质上是用民主社会主义取代马克思列宁主义，改旗易帜，是在思想理论上的背叛。接着，戈尔巴乔夫又提出要按照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根本改造苏联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并且把党也改造成社会民主党。这又是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背叛。这样，苏联的思想理论彻底乱了。当时在苏联，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社会主义成为一种时髦，世界的社会主义中心成了世界的反社会主义中心。西方反共政治家、美国卡特时期的国家安全助理布热津斯基指出，戈氏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架起了一座从社会主义演变为资本主义的桥梁。

（4）党自身改革的错误导向。苏共作为一个长期执政的党，是苏联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社会主义改革不是要不要党的领导，而是怎样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苏共长期以来存在两个问题需要改善，一是不重视自身建设，党不管党的现象严重；二是在党政关系上，大权独揽，以党代政，未能很好地发挥苏维埃的作用。戈氏在改革初期，似乎也认识到这个问题，曾经提出过“党政职能分开”。但是，在他的思想深处，是敌视党，认为党是改革的阻力。为了搬走这块“绊脚石”，他一步步地向削弱和否定党的领导的方向推进。他采取了几个步骤。第一步，他借用和歪曲列宁“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把权力从党转到政府手中，使党大权旁落。第二步，待到条件成熟时，适应党内外、国内外反共势力的需要，动手修改宪法第六条，取消党的领导。对苏联来讲，这是致命的一招。戈氏放弃党的领导，苏联马上派别林立，出现了几十个甚至上百个政党，群龙无首，社会分崩离析。戈尔巴乔夫的外交顾问法林认为，苏共放弃党的领导是后来发生苏联剧变的最主要原因。在这之后，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利用未遂的“8·19”事件颁布非党化命令，戈尔巴乔夫亦步亦趋地宣布解散苏联共产党，说明他已彻底背叛了苏共，背叛了社会主义，走得更远了。总书记个人宣布解散共产党，这在国际共运史上是第二次，第一次是美共总书记白劳德。但美共纠正了白劳德的错误，反过来将白劳德开除出党，苏共则以悲剧告终。

（5）民族关系改革的错误导向。戈氏上台以后，过分相信在民族问题上所取得的成就，对民族之间的矛盾和问题估计不足，对民族分裂主义势力缺乏警惕，对其迁就妥协，一让再让，最终酿成民族危机。带头闹独立的是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三个波罗的海国家，格鲁吉亚紧随其后，纷纷发表“独立宣言”和“主权宣言”。戈氏对这些宣言都不表态，实际上是默认。在这种气氛中，双方互相抱怨，一些少数民族说他们在经济上“受剥削”，已成为俄罗斯民族的“殖民地”，而俄罗斯民族则声称自己是“奶牛”、“输血者”，每年都要付出200亿卢布，大谈“莫斯科救了俄罗斯”、“俄罗斯救了全国”。民族间的裂痕尽管发展到如此程度，但在群众中仍未失去对联盟的凝聚力。在1991年3月的全民公决中，有76%的人仍赞成保留苏联。可是，在同年12月由叶利钦导演的俄、白、乌《别洛韦日协议》，却不顾多数公民的意愿，宣告联盟已不复存在。总之，在民族政策上的一硬一软，最终导致联盟解体。一个强大的联盟国家在世界版图上消失了。

二 共产党的蜕化和变质

苏联共产党是一个具有光辉历史，经历了夺取政权、巩固政权并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它在近一个世纪中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但是，在执政以后，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由于长期不重视执政党自身的思想、组织和作风建设，在和平建设年代一步步蜕化变质。这种蜕化变质，一般不是表现在普通党员身上，而主要是表现在身居高位、拥有很大权力的各级领导干部身上。首先，党内出现和形成了一个特权阶层。苏联共产党执政以后，拥有很大的权力。一些领导干部有权有势，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养尊处优，饱食终日，有特殊商店的特殊商品供应，对群众的疾苦漠不关心，不能执政为民，关心的只是如何维护既得利益。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的一些政治家在接触中已察觉到，苏联的一些高层领导已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而是一批技术官僚。特权阶层的形成，标志着资本主义复辟已有了社会政治基础。其次，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丧失。马克思、恩格斯用“两个必然”的思想，武装了全世界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和革命者。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国共产党人就是以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打出社会主义江山的，这是共产党人的传统优势。但是，在和平建

设年代，理想信念也在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中淡化。70年代特别是80年代以后，由于受西方社会思潮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在苏共一些领导干部中共产主义信念在丧失。美国学者、马萨诸塞州大学教授大卫·科茨在苏联剧变后写作并出版了《来自上层的革命》一书，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书中指出，1990年前后，美国和西方的一些民意测验机构到苏联搞了一些民意测验，了解苏联人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态度。在广大群众中测验的结果是：只有5%～20%的人主张实行资本主义，而高达80%的人希望坚持社会主义。但在10万人左右的占据着党政机关重要领导岗位的“精英集团”中，测验的结果却完全相反：只有9.6%的人主张坚持社会主义，12.3%的人主张搞民主社会主义，高达76.7%的人希望实行资本主义。科茨在书中指出：“作为一个在世界上存在最长，影响最大的社会主义苏联，党的干部队伍内竟有那么多的人主张实行资本主义，实在令人震惊。”其实也不足怪。他分析说：“据我研究，70年代苏共领导集团还是由理想主义的革命者组成的，到80年代就完全不同了，占据苏联党政机关要职的‘精英’们开始放弃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代之以典型的物质主义、实用主义。尽管这些‘精英’还在不断重复官方的观点，但相信者是极少数。他们开始考虑实行什么改革方案对自己最有利。”“显然，实行资本主义最符合‘精英’集团的利益。这样，他们不仅是生产资料的管理者，而且可以成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既可以实现个人财富更快地增长，又能合法地让子女继承权力和财富。”

上述情况说明，到20世纪80年代，苏共党内有一大批领导干部已蜕化变质。他们已不再坚持社会主义，而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些人后来在苏联剧变和解体中起了很坏的作用。其中一部分人杀出共产党，在社会上组建几十个政党，并且成为这些党的党魁或政要；另一部分人，主要是企业领导人，在私有化过程中，利用权力，化公为私，成为“暴发户”和“经济巨人”。而原来一批持不同政见的党外知识分子，几乎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和实惠。有鉴于此，近年来国际上有一种说法，认为苏联剧变是苏共领导层所搞的一场自我政变。这种认识不无道理，至少可作为一家之言，供进一步研究参考。

三 领袖们的背叛

在苏联政治体制中处在权力顶峰的是苏共中央政治局。政治局成员的状况如何，关系党和国家的命运。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形成的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中央政治局中，只有一个人参加过卫国战争，其他都是在战后和平年代成长和一步步高升的。在这个班子中，虽然有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如利加乔夫、雷日科夫，敢于坚持原则，阐述个人意见，但由于戈氏身居总书记的最高权位，逐步在政治局中形成了以戈氏为中心的，包括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梅德韦杰夫在内的右翼势力集团，他们主导了政治局。这些人本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后来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下，一步步蜕化，有的成为民主社会主义者，有的成为自由主义者。对他们来说，已不只是共产主义信念动摇和崩溃的问题，而是背叛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问题。他们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宣扬它是“新宗教”；背叛了共产党，自己下令解散党；背叛了社会主义，诬蔑它是“新乌托邦”。苏联改革的逆转，是苏共领导集团中的右翼分子一手策划和导演的，从而把苏联引向万丈深渊。现在俄罗斯人经常说的“领袖们的错误和背叛”就是这个意思。

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在他的反思著作《大动荡的十年》一书中指出，这伙人的罪恶目的，就是“给国家、社会——政治制度以沉重的打击，把它彻底摧毁”（第3页）。他愤怒地说：“近年来与之共事的，竟是一帮背叛变节、使奸耍滑、两面三刀之徒。这帮人昨天还信誓旦旦地要忠于我们共同的理想，今天却心怀虐待狂的满足践踏它们，抛弃自己昔日的信念，及时投入不久前的敌人营垒。”（第28页）在谈到戈氏时，他指出：“此人身上同时还有一种魔鬼般喜欢背叛的特性。在我看来，这种特性是他性格中的组成部分。他不仅背叛我们和全国人民据以追随他、信赖他的理想，他还一次次奸诈狡猾地把与他志同道合的人都出卖掉了。只要一有机会，他就会像扔掉废物一样，把人们抛开的。”“经过若干年以后，戈尔巴乔夫‘早年’的所有战友都已被他一个个地赶出政界或国务活动的舞台，当他们离去的时候，还都被扣上各种政治‘帽子’……原来，总书记在他整个的历史时期内，都是为了消灭党，消灭国家，并把那些反对这种目的和行为的活动家们一个个罢免掉。”（第78页）他在谈

到戈氏和叶利钦的历史责任时指出："戈尔巴乔夫把国家引向资本主义，而叶利钦、盖达尔及其一伙则把国家引到了资本主义，而且是野蛮的资本主义。他们把我们大家拖进了半殖民国家才特有的社会制度。""这就是两个领袖——改革领袖戈尔巴乔夫和后改革领袖叶利钦——的主要的背叛。"（第382页）他的看法和态度是："可以原谅错误，但不能饶恕蓄谋的背叛。"（第379页）曾任戈尔巴乔夫秘书，后任苏共中央书记的博尔金在《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中指出："无论是世界大战、革命，还是两大阵营的军事、经济对抗，都没能摧毁和肢解这个伟大的国家。苏联是被人从内部攻破的，是被一小撮有影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葬送的，是被反对派搞垮的。"（第1页）实践证明，从个人在历史重要关头所起的作用来看，戈尔巴乔夫搞垮了苏共，叶利钦搞垮了苏联。叛徒们所起的作用，是公开的敌人起不到的。在摧毁苏共和苏联方面，身居党和国家权力顶峰的背叛者们起了西方政治家起不到的作用。诺贝尔和平奖的政治色彩很浓，戈尔巴乔夫获得此项大奖是西方对他在苏共亡党、苏联解体中所作贡献的奖赏。

四 与国内外敌对势力的颠覆遥相呼应

少数最高层领导人的背叛，对苏联社会主义是重重一击，但仅靠此还不足以摧毁社会主义苏联，他们里应外合地同国内外敌对势力联手共同推翻和颠覆了苏联。所以，探讨苏联剧变的原因，不能回避阶级和阶级斗争。就国外因素来说，还存在着西方敌对势力。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后曾经多次指出，只要国际资本存在，资本主义就具有一种优势，苏联就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斯大林曾经正确地提出过资本主义包围的论断。所谓资本主义包围，不是地理概念，而是一个政治概念，意即只要存在国际资本主义，苏联就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但这些正确论断，被后人遗忘和否定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一直敌视苏联，为了消灭社会主义苏联，它们先后和交替使用扼杀、遏制与和平演变战略。20世纪50年代初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认识到，对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对苏联、中国这样的大国，用"扼杀"手段，从外部强攻是攻不破的，而且只能愈攻凝聚力愈强，必须变换策略，从内部攻，因为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这就是所谓的"和平演变"战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在80年代，利用苏联的改革和

困难，加大了和平演变的力度，对苏联软硬兼施，压力和诱惑并举。1991年11月刚卸任一年多的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在美国休斯敦的公开演讲，直言不讳地道出“我们是怎样瓦解苏联的”。她说：“苏联是一个对西方世界构成严重威胁的国家。”为了实现瓦解苏联这一目标，西方着重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通过军备竞赛拖垮苏联国民经济，另一方面通过腐蚀和收买党政高官取得最后胜利。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就是被西方相中和做了工作的两个重点人物。她演讲的最后一句话是：“我负责地告诉诸位，不出一个月的时间你们就会听到法律上苏联解体的消息。”果然，一个月后苏联就瓦解了。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2010年12月8日披露，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局长威廉·凯西一手策划了瓦解苏联的方案。其中包括：通过提出反导防御体系，诱使苏联参加军备竞赛，拖垮苏联国民经济；扶持东欧各国的反共组织，瓦解苏联在该地区的影响；扶持民族分裂主义势力，瓦解苏联；为阿富汗反政府游击队提供军事和财政支持，试图把战火引向苏联境内；与沙特阿拉伯合作压低油价，以此大幅减少苏联的硬通货收入；在共产党的上层寻找和物色代理人。世界上每个重大事件的背后，都有美国的影子。

西方敌对势力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是铁了心的，但这也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戈尔巴乔夫奉行屈服政策，对外屈服帝国主义压力，对内屈从资本主义势力，使其发挥作用。试想，如果没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用各种方式从外部“扼杀”和“演变”苏联，苏联发生剧变是难以想象的。就国内因素来说，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和公开性，把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释放出来，出现了反对派；反对派降生后，又利用民主化和公开性，势力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夺权欲望急剧膨胀，最后利用两个事件，加速推翻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一个是1991年的“8·19”事件。这个事件是苏联一部分对现实感到忧虑的政治力量为挽救联盟解体、国家免于灾难和降为二等国而采取的非常行动。但是，“事件”很快失败，右翼势力全面夺权，并借机打击苏共，强令停止苏共活动。另一个是同年12月8日，俄、白、乌签署明斯克协议，宣布成立独联体，实际上宣告了苏联的解体和消失。

五 缺乏社会主义法治的保障

苏联有70多年社会主义历史，在这个过程中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和体制，也制定了社会主义宪法和一系列法律，社会主义思想也深入人心。但是，为什么当最高领导层推行背叛性的改革，一步步摧毁社会主义制度时，制度和法律不起作用，群众束手无策，只能听之任之，这里的一个深层次问题是缺乏法治的保障。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但是由于有很深的封建主义历史包袱，又未深入地反对封建主义余毒，长期实行的是人治而非法治。人治和法治有很多区别，但最根本的区别不在于有没有法律和有多少法律条文，而在于权力和法律哪个大，权大于法是人治，法大于权是法治，法治意味着法律尤其是宪法在社会生活、国家生活的一切重要领域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法律的权威性，要求国家机关、任何政党、社会团体和个人都必须服从法律，政府的权力来源于法律，必须以法律为依据，依法行使。如果苏联是法治国家，宪法和法律就会有效地保障社会主义制度，领导人如若脱离社会主义轨道，人民就会以法律为武器来制止他的行为，甚至弹劾他。苏联虽然制定了宪法和一些法律条文，但是，没有形成完整的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实行的是人治，最高领导人的一句话，比任何法律都管用，他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宪法等于虚设。这是苏联剧变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剧变的一个重大教训。所以，为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使国家长治久安，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总括上述五条，第一条改革的错误导向，是苏联剧变和解体的渠道和途径，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不是在社会主义框架内的社会主义自我完善，而是彻底改变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改向和改制，最终断送了社会主义。第二、三、四条，共产党的蜕化和变质、领导集团的背叛、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渗透和颠覆，是苏联剧变和解体的主要和根本原因。第五条，缺乏社会主义法治的保障，是苏联未能制止剧变和解体的重要条件。苏联剧变不是历史的必然，本来可以避免的事未能避免，这是历史的不幸。苏联最后一位元帅，前苏联国防部部长（1987～1991年在任）亚佐夫认为，苏联解体并非时代必然，而是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除了美国等外部因素的推动外，雅科夫列夫以及戈尔巴乔夫的“变节”也是重要的内部“推手”。苏联剧变后，

联盟解体，俄罗斯降为二流国家；东欧各国普遍改旗易帜，从社会主义演变为资本主义；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到前所未有的重创和挫折；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搞单极世界，更加有恃无恐地推行霸权主义，不断发动战争，威胁世界和平和各国安全。

---

[1] 赵曜，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经济学“西化”：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

——由“500天纲领”引发的思考

何干强 [1]

20年前，苏联是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解体的，究其原因，不能不反思经济学“西化”所起的恶劣作用。经济学“西化”，这不是地域空间概念，而是指经济学的西方资产阶级化。充分认识经济学“西化”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瓦解作用，这是研究苏联解体原因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视角；它对我们吸取教训，在经济学领域自觉划清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具有不可低估的重大意义。

一 **“500**天纲领”：经济学“西化”结出的毒瘤

放任经济学“西化”的严重后果，集中地体现在苏联解体前出版的“500天纲领”上。它是苏联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与国外敌对势力联手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行动纲领。

“500天纲领”得名于一份叫做《民主俄罗斯》的小报上刊载的《国家向市场关系过渡的500天纲领》 [2] 。这份小报报头下边，写着一行黑色小字“俄罗斯民主力量的报纸”。通栏大标题下方，印有满面春风的叶利钦和他几位幕僚跨步行走的黑白照片。1990年10月间，这张小报在莫斯科大量发行。

其实，这份小报刊登的“纲领”只是名为《向市场过渡 构想与纲领》这部书的浓缩版。该书标明：由时任苏联共产党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和自由化势力的代表人物叶利钦共同决定组织撰写。

由于浓缩版是《向市场过渡 构想与纲领》这部书核心内容的摘录，所以，“500天纲领”也可以作为这本书的简称。从书的大小标题来看，很清楚，“500天纲领”，就要在从1990年10月1日起始的500天

之内，通过各种“非常”政策措施，彻底改变苏联国民经济的基础和结构，转向所谓市场经济，实质是转向资本主义经济。

浓缩版的第一句话强调：“迄今人类尚未找到任何比市场经济更有效的经济。”这表明，它根本否定人类社会已经诞生的社会主义制度能超越资本主义制度，根本否定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显示出的社会主义制度推动经济发展的优越性。“500天纲领”行文中，贯穿于始终的有两个关键词，就是“经济非国有化”（разгосударствление экономики）和“私有化”（приватизация）。全书导言毫不掩饰地申明：“人权在所有制上的实现要靠非国有化和私有化，靠国家财富转交给公民。”这集中地体现出其颠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的目的和资产阶级性质。

值得一提的是，“500天纲领”发表前，征求过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的意见。一个关系社会主义国家前途命运的经济改革纲领，竟然要征求美国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的意见，足见苏共领导在改革中已经不问“姓社姓资”了，已经迷信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了，已经完全依靠自由化精英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500天纲领”是苏联经济学“西化”结出的毒瘤。众所周知，它的问世，进一步加速了国家经济、政治的全面危机，出台400天不到，苏联就解体了。事实证明，经济学“西化”会导致亡党亡国，具有极大的危害性。

二 经济学“西化”危害性的主要表现

1.把“非国有化”和“私有化”作为改革的首要方针，把构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作为改革的目的

“500天纲领”通篇不提社会主义公有制，甚至不使用社会主义这个概念[3]。它用“短缺”、“命令经济”、“集权主义”、“专制主义”等贬义词，根本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而不是辩证地扬弃），把可以通过改革纠正的传统计划体制的缺陷，夸张为根本经济制度本身的无可救药，足见其目的根本不是改革管理体制，而是要彻底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建立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

2.混淆经济形态的一般与特殊，用转向市场经济掩盖转向资本主义经济

“500天纲领”运用的一个十分隐蔽的手法，就是大讲转向市场经济，而将转向资本主义经济的真实意图掩盖起来。翻开近现代经济思想史，资产阶级经济学有史以来的通病，就是用一般流通关系掩盖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刻揭示过的。“500天纲领”只使用市场经济范畴而不直接使用资本主义经济范畴，这种掩盖真实意图的手法，恰好表现出了它在经济学上的“西化”性质。

3.借口突出“企业家”的经济地位，实质是要培育资本家阶级

表明“500天纲领”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是它把企业家获得“最大限度的自由”作为“有效发挥市场经济作用的”前提条件。要求国家“扶植企业家活动”，原则是“未被禁止的一切都允许”。它在推行“非国有化”的同时，要求国家“对私人雇佣劳动力的规定定出细则”，可见，它指的“企业家”不是企业管理专家，而是资本家的隐蔽用语。用培育私人“企业家”来掩盖培育新资产阶级的意图，这体现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虚伪性和欺骗性。

4.鼓吹抽象的人权和自由，否定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对劳动者权益的根本决定作用

“500天纲领”全书的导言突出“人、自由、市场”三个关键词，宣扬抽象的人性和人权，抽象的自由和平等。它强调占有私有财产的人权，却绝口不提工人阶级和劳动者维护国家财产的人权；强调“企业家活动的自由”，却绝口不提工人阶级和劳动者通过何种途径实现民主管理国民经济和企业的自由。实际上，它根本否定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赋予劳动者的基本人权和最广泛的自由、民主权益。

5.贯彻新自由主义，实行经济卖国主义

“500天纲领”竭力鼓吹苏联经济应“与世界经济体系连成一片”，要求在进行私有化时，一开始就特别注意吸收外国资本；宣扬“外国

法人和自然人在平等的条件下同所有生产者一起在国内市场进行活动”；“开放外汇账户”，放任外国资本自由进出本国。按理来说，实行经济的对外开放，应当加强国防和国家安全工作，可是它在第一个100天，就提出“给国防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拨款缩减到20%”，这就明显地暴露出纲领的炮制者根本无视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他们推行的经济自由主义，实质是一种迎合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卖国主义。

6.推行民主社会主义，照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福利制度

“500天纲领”为了赢得人心，不能不宣扬改革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是，在具体方式上，却搬用现代西方福利主义经济学，采取民主社会主义的改良主义经济措施，也就是“私有制加公共财政再分配”。它强调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新因素，主要是“以最低消费预算为基础的最低生活费”、“失业者补助法”、“最低劳动工资法”、“财产和依财产收入法”等，都来自西方福利主义经济学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施的社会保障具体制度。这种再分配关系只能起某种缓和对抗性的劳资矛盾的作用，这是一种维护资本主义根本制度的、治标而不能治本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方法。

三 苏联经济学“西化”的原因

1.苏共高层领导推行资产阶级虚伪的“普世价值”观

苏联结出“500天纲领”恶果，绝不是偶然的。根本原因在于苏共最高领导抛弃了唯物史观的指导思想，抛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的侵蚀打开了绿灯。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1988年同时在苏联和美国出版《改革与新思维 为了我们的国家和为了全世界》[4]，宣扬“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用这种唯心史观的“新思维”看问题，就会盲目崇拜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把它们视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先进样板；就会无视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阶级性质，把它视为对人类价值有利的现代经济科学。在这种资产阶级“普世价值”观指导下，他们竟然起用波波夫、盖达尔、亚夫林斯基这样的一批经济学界

的“西化精英”对改革出谋划策，放任他们大肆赞美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尤其是美国的所谓现代市场经济制度，诋毁社会主义根本经济制度；让雅科夫列夫这样的西化“改革派”进入苏共领导核心，打击、压制站出来与西化“精英”斗争的马克思主义正义力量。苏共高层对经济学“西化”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最高领导戈尔巴乔夫起了最恶劣的作用。

2.经济学界存在背离历史唯物主义的严重倾向

从经济学界来看，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成为苏联所谓主流经济学，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苏联是1965年决定实行经济改革的[5]。尽管说，探讨经济改革的学术文献中不乏一些从实际出发，主张公有制经济与商品货币关系相结合的科学观点，但是，那些占主流地位的研究者，先是把社会主义经济与商品货币关系对立起来，后来则转向另一个极端，用市场经济否定公有制经济。这与苏联经济学界存在背离唯物史观指导的不良倾向有重要关联。在戈尔巴乔夫当政之后，经济学不断“西化”，经济学界不再重视所有制这个至关重要的基本问题，而是在现代西方经济学各种流派影响下，鼓吹“趋同论”，只研讨国家与市场、集权与分权、资源配置方式等问题；妖魔化“斯大林模式”，把公有制与“短缺经济”画等号，把公有制本身与旧体制画等号；这些倾向最终导致产生了“500天纲领”。

3.高校淡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学和学科建设

高校是经济学学科建设和知识传授的主要阵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经济改革中的指导地位，必须用马克思主义指导高校经济学的学科建设。苏联高校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不断淡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学和学科建设，以引入现代经济学的名义，大量传授现代资产阶级的主流经济学，这就使经济学“西化”在苏联迅速蔓延，滋生出大量反社会主义的自由化“精英”。在改革中提升为苏联副总理，又成为“500天纲领”发起人的亚夫林斯基等人就是高校的教师。

4.放弃对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

经济学“西化”能够在苏联形成气候，是需要一定的社会基础的。由于历史的辩证法造成，社会主义国家包括苏联，都诞生在社会生产力水平较落后的国家，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战后又出现新的发展，这就容易造成普通意识的错觉，认为资本主义优越于社会主义。本来，苏联只要加强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不难让人民群众认识到，正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才使一个比较落后国家在不长的时间变成能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体制上存在的一些弊病，在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完全可以依靠人民群众自身的力量加以纠正。可是，苏共领导却淡化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教育，于是社会上普遍滋生出羡慕西方经济制度，追求资产阶级享乐主义的情绪。应当说，这造成了经济学“西化”的社会思想条件。

5.放任国际资产阶级经济思潮的传播

20世纪60年代以来，有三股来自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国际思潮，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进行了冲击。一是新自由主义思潮，通过新制度经济学，宣扬私有制市场经济的优越性；二是民主社会主义思潮，通过福利主义经济学，宣扬可以通过公共财政再分配调节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纠正资本主义经济的弊病；三是制度“趋同论”思潮，通过比较经济学，淡化或否定按照生产资料所有制来划分经济制度。尽管新制度经济学、福利主义经济学和比较经济学，都有某种可供借鉴的成分，但是，它们都属于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都混淆经济管理体制与根本经济制度。如果全盘照搬，就会对私有化主张失去警惕，就有可能把改革等同于“改掉”公有制。苏联在戈尔巴乔夫的“全人类价值观”的怂恿下，对这些资产阶级的国际经济思潮不加分析批判，终于酿成了苦果。

四 深刻的教训

上述分析表明，唯物史观揭示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作用与反作用的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客观存在的。当资产阶级经济学像在苏联那样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思想指导之后，它作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就必然要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起瘋狂的瓦解

作用，导致社会主义国家亡党亡国。中国人民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很有必要吸取苏联经济学“西化”的这种深刻教训。因此，我们必须遵循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划清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坚决纠正目前存在的一些严重认识误区。

1.绝不能认为西方经济学是搞市场经济的，改革开放就要依靠西方经济学

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是以私有者眼光分析市场经济的，是一种停留在经济表面的、片面的、具有主观性的经济学；从根本上说是不科学的理论。它不但不能科学地指导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且也不能指导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摆脱危机。苏联自由化势力是以“现代经济学”的名义来掩盖他们推行经济学“西化”的。须知，一般来说现代的自然学科确实比近代的科学；但是，由于经济学固有的阶级性和意识形态性，现代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在揭示经济规律的深刻程度上，还不如古典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即便它用足了数理模型，也不能解决其经济分析逻辑的不科学性。我们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才能保证中国经济沿着科学的、有利于最广大人民利益的轨道，实现科学的发展，才能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

2.绝不能认为世界上存在什么脱离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现代市场经济

中国要创建的是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就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那种实行国有、集体企业私有化的“改制”，绝不属于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改革，而是对企业社会主义性质的根本消灭。量变产生质变，企业私有化扩大到一定程度，就会动摇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造成像苏联亡党亡国那样的严重灾难。事实上，在国外敌对势力的支持下，一些推行经济学“西化”的人，把需要改革的计划产品经济体制与生产资料公有制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根本经济制度混为一谈，目的就是要接过“改革”的旗帜，推行私有化，妄图改掉公有制这个广大劳动人民的“命根子”，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对此，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3.绝不能迷信抽象的公平正义观或普世价值观

戈尔巴乔夫宣扬“全人类的价值”，其实是用超阶级的人和人类，来掩盖现实社会的阶级、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用当代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来冒充人类的利益；用抽象的自由、公平和正义来掩盖现实社会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造成的对于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不自由、不公平和不正义，用资产阶级自身的自由、公平和正义来冒充所谓社会的自由公平正义；用一般的市场关系或商品货币关系来掩盖包括生产过程和所有制关系在内的资本主义市场关系，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来冒充一般的市场经济。宣扬抽象的公平正义或“普世价值观”，只会模糊人们的视线，让资产阶级的经济观、价值观侵蚀人们的思想。马克思曾批判过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流行的用抽象的公平正义替代唯物史观的腐败风气。他指出：“这些人想使社会主义有一个‘更高的、理想的’转变，就是说，想用关于正义、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女神的现代神话来代替它的唯物主义的基础（这种基础要求人们在运用它以前进行认真的、客观的研究）。”[6] 马克思的教诲值得我们深思。

4.绝不能在经济学领域只反“马教条”，不反“西教条”

须知，这样做的后果，实际起了压制、淡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扶植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助长经济学“西化”的作用。各级领导尤其是主管学术领域的领导，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认真贯彻“百家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支持马克思主义学者站出来讲话，批判经济学“西化”的不良倾向。

5.绝不能认为高校淡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只是学科内容的一般变更

放任经济学“西化”的实质，就是怂恿资产阶级经济学取代无产阶级经济学，就是怂恿不科学的经济学取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经济学，就是让资产阶级来夺取经济体制改革的领导权，这绝不是学科内容的一般变更。高校的经济学学科建设一旦出现“西化”倾向，后果极其危险。中国应当吸取苏联高校培养出了“500天纲领”炮制者的深刻教训。

[1] 何干强，南京财经大学教授。

[2] Программа 500 дней，Переход страны к рыночным отношениям，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ая россия，октябрь 1990.

[3] 笔者注意到，“500天纲领”浓缩版与“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有点沾边的只有一处，即在讲构建社会保障制度时说，要在新的条件下保证“居民最低消费预算水平……这意味着经济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化（социализация）”。然而，它只从再分配角度讲社会保障，所讲的“社会主义”显然指的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施的福利制度体现的所谓“民主社会主义”。

[4] М.С.горбачева，Перестройка и новое мышление для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и для всего мира，Москва，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1988.

[5] 参见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编《国外经济学讲座》第4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第383页。

[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420页。

裂变、失败与崩溃

——苏联政治改革与民主化的教训

张树华 [1]

一 政治：改革而非改向

十月革命胜利后，新生的苏维埃社会主义政权自建立之日起就引起西方帝国主义的强烈仇恨，遭到国内外敌对势力的疯狂破坏和捣乱。帝国主义的政治家们一开始就发誓，一定要把这个崭新的社会制度“扼杀在摇篮之中”。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大国更是将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视为“自由世界”的威胁。此后50多年，西方阵营除保持强大的军事压力外，更是选中了“和平演变”作为与苏联进行政治和思想较量的手段。丘吉尔、杜鲁门、乔治·凯南、尼克松、里根、布什等许多西方政要都坚持，要针对苏联进行政治战、心理战、文化战，以“民主、人权”为工具，摧毁苏联社会主义制度。

冷战以后，西方国家积极利用“民主、人权”等借口，将其视为攻击苏联政治制度的有效砝码和利器。西方称苏联是“共产主义专制”国家，祭起“人权”、“民主”、“自由”等旗号，对苏联发动猛烈政治和外交攻势。20世纪60年代以来，利用苏美高层会晤的机会，美国政府将“人权”、“民主”和“自由”等问题列入会谈的议程，对苏联领导人施加强大压力。同时，西方国家先后成立各种形式的民主基金会，并与外交、情报等部门配合，在苏东阵营里寻找政治代理人，支持苏联持不同政见者或民族分裂势力。美国“全国争取民主基金会”旗下的刊物——《民主杂志》——两个主编之一、政治学家拉里·戴蒙德曾毫不掩饰地说，美国和西方国家在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推行“人权”和“民主化”，就是要改变这些国家的政治制度。

在国际共产主义历史上，面对资产阶级的政治圈套和话语陷阱，列宁一语破的。列宁指出，民主、自由和平等从来都是具体的、历史

的。列宁反对笼统地、抽象地奢谈一般性或普遍性的“民主”、“自由”与“平等”[2]。列宁认为，不应当抽象地谈论民主，不要相信什么“普遍民主”或者“绝对的民主”[3]的谎言，不存在什么“全民的、全民族的、普遍的、超阶级的民主”[4]。他指出：“只要阶级还没有消灭，对于自由和平等的任何议论都应当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哪一个阶级的自由？到底怎样使用这种自由？是哪个阶级同哪个阶级的平等？到底是哪一方面的平等？”[5]

然而，20世纪60年代以后，苏联政治领导人逐渐失去了政治信仰，理想信念开始动摇。1983年，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考察几个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后得出这样的结论：苏东共产党人已经失去信仰。这些国家正在崛起的一代领导人，不是思想家，而是务实派。戈尔巴乔夫[6]自己承认，他早就不相信科学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因此在上任后便企图用“西欧式的社会民主思想”来改造苏共。

戈尔巴乔夫后来承认，正是1987～1988年期间他的思想发生了根本转变。他自白：“随着经验的积累，变得明确了：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袭击我国的危机并非局部，而是整个制度的性质。发展的逻辑使我们认识到，即不是应该完善整个制度，而是攻入它的基础本身。”[7]他写道：“1988年我们意识到，必须对制度本身进行根本改革。由此进入了内容丰富的第二阶段的改革，这应立足于另一些意识形态观点，其基础就是社会民主思想。”[8]

对于以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等为代表的苏共最高领导人政治信仰和思想立场的转变，除上面提到的尼克松之外，时任美国驻苏联大使、著名的苏联通小杰克·F.马特洛克[9]、美国政治家布热津斯基等人早已洞若观火。布热津斯基在1989年写道：“戈尔巴乔夫在改革过程中已逐渐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他不仅要改变苏联的经济结构，还要修改苏联制度的思想基础，甚至要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苏联的政治程序……在克里姆林宫出现一位修正主义的总书记所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世界共产主义就会有瓦解的危险……有朝一日，苏共要丧失对社会的垄断控制，苏维埃联盟随时可能解体。”[10]

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的手段，改革不能变成“信仰放弃、方向背弃、主义抛弃”，改革不是改向。苏共后期主要领导人放弃自己的政治信仰，否定苏共历史，这对于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来讲，无异于“思想自宫”行为。在戈尔巴乔夫等领导人的带领下，苏共借批判“斯大林模式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之名，力图改弦易辙，走一条社会民主主义道路，不但于事无补，反而导致了苏共丧失执政的合法性，引发了政治分裂和国家瓦解，从此走上了一条政治自杀的绝路。在短短的6年左右的时间里，这股打着“民主、人道”旗号的政治思潮不仅使得苏联改革误入歧途，而且葬送了74年的苏联社会主义事业，埋葬了国际共运中最具影响力的、有着90年历史的苏联共产党。

苏共后期的领导人放弃了科学社会主义，转而接受“看上去很美”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其中除领导人的因素外，也有着复杂的社会文化原因。20世纪80年代的苏联社会，在经历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历史之后，还不能一下子接受盎格鲁—撒克逊式的自由资本主义。而与欧美自由资本主义模式相比，民主社会主义更具亲近性和诱惑力，再加上苏共主要领导人的鼓动与带动，更使得这股思潮具有内部性、蛊惑性、隐蔽性和危险性。但是，民主社会主义令人目眩的愿景并没有给苏联社会带来安定和富裕。这朵美丽的蓝色妖姬不仅没有给苏联人民带来民主和自由，反而使苏联社会失去了公平、失去了70年之久的社会主义。更加引人深思的是，80年代“民主化、人道化”的口号引来了俄罗斯“财阀、寡头的为所欲为”，为90年代野蛮、原始、犯罪式、官僚式的俄罗斯资本主义打开了大门。

二 苏共：坚持而非放弃

苏维埃国家联盟是苏共一手创建的。苏共是苏维埃政权和政治体系的根本和核心，苏联大厦维系在苏共这一重要的政治支柱上。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先削弱、后放弃苏共的领导地位。5年左右的时间里，苏共遭受了被改革→被削弱→被边缘化→被分化→被抛弃的悲惨命运。失去了苏共也就没有了苏联。

（1）内部削弱。改革初期，苏联和改革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还

取决于苏共。但在戈尔巴乔夫倡导的“民主化”和“公开性”思潮冲击下，苏共开始逐渐丧失对改革和国家发展的引导力量，在政治生活中逐渐被边缘化。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不力的情况下，把苏共视为改革前进和社会发展的“阻碍机制”。戈尔巴乔夫把1800万名各级管理人员都看成“改革的阻力”，放任“自由民主激进派”对苏共和政府的干扰和攻击。雷日科夫出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仅一年半的时间内就被激进的议员提出6次不信任案。原俄共领导人波洛兹科夫反思道：“改革一开始就出现重大失误，夸大了党内、党员干部和国家机关中保守主义的危险性，拼命攻击党，人为地培植反对派。本应从党抓起，使之成为社会主义改革的有力工具，本应用加强组织性来促进民主化，可是戈尔巴乔夫却背道而驰，这个教训是十分深刻的。”[11]

所有这些逐渐导致苏共成为舆论批评的众矢之的。1990年，苏共已经感受到非常严重的危机，当社会上自上而下地出现了意识形态和政治多元性后，苏共已经是徒具形式上的统一，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大大被削弱。在1990年苏共二十八大上许多代表表达了对党的高层领导及总书记身边人员的不满情绪，许多人忧虑党的意识形态原则的摇摆不定。苏共二十八大通过的纲领中苏共党的宗旨出现根本性的变化，组织基础遭到彻底的改变。许多党员认为，实际上把党变成了一个“意识形态俱乐部”，削弱了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战斗力。除此之外，大会还规定了各个联盟共和国的共产党拥有无限的独立性。

（2）外部取消——由领导党变为议会党。早在1988年，一些非正式组织，如“民主联盟”就提出废除苏共领导地位的问题。随着人民代表选举活动的开展，一些政治势力看到与苏共拉开距离更容易走上政治舞台，于是，在1989年5月第一次人代会上和同年12月的第二次人代会上，“民主派”代表多次提出废除宪法中有关苏共领导地位的条款。之后，1990年2月4日，在苏共中央召开二月全会的前夕，莫斯科有20万人举行集会游行，喊出了“取消苏共领导地位、审判苏共、实行多党制”等口号。

1990年前后，受到东欧剧变的影响，戈尔巴乔夫开始对多党制表示认可。随后在1990年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上，正式提出了修改宪法第

六条的决议，取消苏共对国家政权的法定领导地位。在苏共二十八大上，戈尔巴乔夫声明，苏共将起着议会党的作用。在咄咄逼人的民主激进势力的进攻下，苏共先后在许多共和国、州、市丧失了执政地位。

（3）瓦解分裂。早在戈尔巴乔夫刚刚上台之际，他身边的政治谋士已经准备了从政治和思想上将“苏共一分为二”的计划。1985年12月，雅科夫列夫利用苏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身份上书苏共中央总书记，向其提出实行民主化、公开性、多党制和总统制等一系列全面政治改革建议。他建议在组织上将党一分为二：分成社会党和人民民主党，全民投票选举总统，任期10年……政府由在全民选举中获胜的党的总书记领导，等等。据原苏联科学院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所长、曾担任过几位苏共总书记政治顾问的格·阿·阿尔巴托夫院士证实，当时苏共最高领导人在一个小圈子里的确也曾讨论过这一方案。以这位院士为代表的一些苏联高级知识分子也认为这是可行的，党可以分裂成两个或三个，包括一个强大的社会民主派。

在政治思想方面苏共已经分裂在即。苏共二十八大还为按民族和地区继续分立留下了空间。这次代表大会的政治决议规定，除了与苏共有着共同的“纲领性原则”之外，各个加盟共和国的共产党以后都可以“制定自己的纲领和文件，独立解决政治、组织、干部、宣传和财政问题，在共和国的国家体制、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领域实行各自的路线，与其他包括国外政党的组织和社会运动单独建立联系”。苏共党内各地民族政治精英人物先后脱党或脱离联盟中央，成为民族和地方分裂势力的急先锋。正如俄罗斯学者写道：“在各共和国的共产党之间建立联邦关系是导致后来苏联被否定和肢解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因素。”[12]

如果说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苏共最高领导层就已冒出分裂的念头，那么苏共灭亡、改革失败的命运早已注定[13]。

（4）抛弃与葬送。苏共后期，除了在外部面临民主派的竞争与攻击外，苏共在内部实际上已经遭到戈尔巴乔夫等高层的背弃。1990

年之前戈尔巴乔夫对党已经失去信念。戈尔巴乔夫在向“民主派”作出一系列政治让步之后，开始为自己安排退路：提出设立总统一职。1990年3月戈尔巴乔夫当选苏联第一任总统之后，立即成立了总统委员会。总统委员会制定决策方案后，或通过总统交给立法机关议决，或由总统发布命令执行，苏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再也无能力影响重大决策的制定与执行，制约戈尔巴乔夫的能力越来越小。虽然戈尔巴乔夫仍保留了总书记的职位，但更多的是利用权势以摆脱苏共的控制，直到最后完全摒弃苏共。

1990年夏，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已经决定彻底抛弃苏共 [14] 。苏共二十八大会议期间，苏共已经近乎分崩离析。曾担任政府总理的苏共政治局委员雷日科夫痛心地说：“党到1990年已经缓慢地濒临死亡。”

1990年7月苏共二十八大之后，苏联的国内形势更加危急。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集会和示威连续不断，此起彼伏。广大党员对党的前途失去了信心，引发了大批苏共党员退党。大批党员退党或脱党实际上是对戈尔巴乔夫搞垮苏共的不满和抗议 [15] 。据苏联《对话》杂志报道，1985年苏共退党人数为4万，1986年为4.5万，1987年为4.9万，1989年14万，1990年上半年达到37.1万，而苏共二十八大以后7～8月又有31.1万人退党，出现退党高潮。1991年7月，据苏共中央公布，在最近一年间共有420万名党员退党。苏共由1900万名党员的队伍减为1500万人，退回到1973年的水平。据苏联官方统计资料表明，在退党党员中工人党员的比重较大。1990年头5个月，在莫斯科的1.1万名退党党员中，工人党员占57.4%。1990年6月15日，全苏矿工代表大会在通过对政府的不信任案的同时，声明矿工“不认为目前这种形式的苏共是工人自己的党” [16] 。

在内外敌对势力的夹击下，到1991年夏天，苏共——这个有着90多年光荣历史和70多年执政经验的大党——已经风雨飘摇、危在旦夕。1991年7月，叶利钦签署了其就任俄罗斯总统后的第一道总统令，宣布禁止一切政党在俄罗斯联邦政府机关和国营企业内的活动，蓄意要把共产党的组织机关从政府机关、军队和企业中清除出去。而

此时戈尔巴乔夫的态度却是拒绝动用总统权力维护苏共的利益，直至苏共解散 [17] 。

三 宪政：完善而非拆毁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苏共领导层决意要与现行的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彻底决裂。他们在推行“公开性、民主化和新思维”等思想政治和外交路线的同时，先后发起了大规模激进的政治改组和宪政改革。苏共领导地位、苏维埃社会主义政权、联盟国家是苏联政治制度的三大根基。而自1988年开始后的两三年的时间内，戈尔巴乔夫通过激进的政治改组拆毁了苏联国家和宪法的根基。1990年前后，戈尔巴乔夫积极推动修改苏联宪法 [18] ，取消了苏共领导地位 [19] ；宣布政治多元化，实行多党制 [20] ；设立独揽大权的总统职位 [21] 。

1988年开始，在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的浪潮下，苏联民族分裂势力在各加盟共和国迅速得势，向中央发起了“法律战”、“主权战”，纷纷宣布“主权独立”。民族分裂势力与俄罗斯内部以叶利钦为首的民主激进派遥相呼应 [22] ，戈尔巴乔夫开启的民主化运动落入陷阱，政治改革也随之走向了绝路。

（1）政治热潮与治理失败。戈尔巴乔夫认定，苏共内部的官僚阶层是苏联落后的“罪魁”，官僚机构是阻碍改革和前进的最大绊脚石 [23] 。为此，政治改革的矛头应当转向各级权力机构。1988年6月，苏共召开了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全面拉开了民主化和政治变革的大幕。从此，苏联社会的政治热潮更为高涨，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被遗忘。1989年的差额选举、苏维埃大会的辩论，引发了苏联社会从未有过的“政治高烧”，被唤起的各种势力纷纷投入到政治热潮。经济改革不见任何成效，人民生活日益恶化。进而中央权威丧失殆尽，各地纷纷抗缴税款，经济割据现象更加严重。分裂势力和激进势力趁机将矛头对准了苏联及其国家制度 [24] 。

（2）政治混乱与秩序失控。随着戈尔巴乔夫公开性和民主化政策的推进，非正式组织和地下刊物问题又滋生开来，在短短三四年的时间里便犹如雨后春笋、四处蔓延，最后变得不可收拾，酿成大祸

[25] 。1987年12月非正式组织数量有3万个，1989年2月增加到6万个，1990年发展到9万个。其中多数是有目标、有组织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政治组织。有的打着维护本民族利益的旗号，有的打着西式自由的旗帜，有的要求复辟沙皇贵族统治，等等。1987年底之后，一些组织的思想和主张开始激进化。特别是一些反社会主义和反苏共的组织更加积极，如“民主和人道主义小组”等。这些非正式组织也称得上培养自由主义或某些极端势力的初级党校。

（3）民族冲突与国家瓦解。20世纪80年代后期，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非但没有为经济改革和发展提供保证，反而导致社会经济每况愈下，民族区域的离心倾向越发明显。部分民族地区政治精英认为，是苏共将苏联领进了“死胡同”，苏共所代表的社会主义模式失败了。在这种社会气氛中，“民族主义、分离主义成为苏联许多地方都吸食的麻醉剂” [26] 。几经试探后，波罗的海沿岸三国首先打出“主权和独立”的大旗。首先是三个共和国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戈尔巴乔夫发难，要求在“民主集中”的原则下，扩大党内民主。随后，一些名为“人民阵线”的民族分裂组织在各地成立，直言“主权独立”。一些共和国的党组织对此暗地支持。看准了政治气候的转变，许多民族官员开始涂抹“民族主义的色彩”，抛弃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选择民族主义旗号，借以吸引选民的注意。以叶利钦为首的俄罗斯联邦起了领头羊的作用，他们与苏联境内的民族分裂势力遥相呼应，反苏共、反中央，拉起了“独立”、“自由”的大旗。这样，戈尔巴乔夫所代表的苏联和苏共“腹背受敌”，“民族独立”和“民主化”像两把利刃直逼而来。

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苏联民族冲突愈演愈烈，几年后雪崩式压垮了苏联。1986年12月的阿拉木图事件，是戈尔巴乔夫执政后发生的首次大规模民族动乱；1988年2月开始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围绕着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州的地位问题发生了愈演愈烈的冲突，持续多年；1990年1月又发生巴库事件。除土库曼斯坦共和国之外，14个加盟共和国都发生大规模民族冲突。1988～1991年的4年中，苏联境内共发生175起民族冲突事件，造成1万人死亡，数万人受伤。这些民族冲突的后面是由民族分立主义势力操纵的，他们同苏共内的激进势力和社会上的政治反对派勾结在一起，对抗联盟中央，制造分裂。波罗的海

三国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的人民阵线以及白俄罗斯人民阵线、乌克兰“鲁赫”民族运动、阿塞拜疆人民阵线、格鲁吉亚民族解放运动等，纷纷提出民族独立的口号，反对苏共和苏联。这些民族分立主义势力与俄罗斯的“跨地区议员代表团”的激进势力遥相呼应，迅速成为能够左右苏联政局、动摇瓦解苏联基础的政治力量[27]。

民族分离主义、地区分离主义是瓦解苏联社会的催化剂和起爆器。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率先宣布自己拥有国家主权，提出要退出苏联。而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中央在处理这些事件时表现得优柔寡断，这样反而更加纵容了各地的民族主义分裂势力。苏共的失败是从苏共党内的分裂开始的，而民族划线是撕开苏共的重要裂口。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苏联各地民族主义分裂势力兴起之际，当地苏共党组织姑息、纵容甚至参与民族分裂活动。1989年末立陶宛共产党脱离苏共并宣布独立，拉开了苏共分裂和苏联解体的序幕。1989年6月，为抵制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中央的不作为，建立了独立的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但他们后来在以叶利钦等为代表的自由民主派势力的影响下，不由自主地汇入瓦解苏联的大潮中。正可谓：一个染上民族主义的党，是一个走向灭亡的党[28]。

到1991年8月，苏联的政治危机、经济危机、民族危机不仅没有缓和，反而急剧加深。8月19日，部分苏联领导人仓促策划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然而，由于缺乏政治意志力和社会支持，这次挽救苏联的绝望的努力不到三天便宣告失败。随后，苏共中央宣布解散。1991年12月25日，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上空黯然落下，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联盟完全解体。

20世纪末的苏东剧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大事，苏联解体根本上改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政治格局。苏共败亡和苏联瓦解既是一项严肃的历史课题，也是一项政治性和思想性很强的研究项目。苏共政治改革失败的教训警示后人：政治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必须坚持正确的方向。政治改革必须有利于国家的稳定和民族团结；必须有利于提升政治民主、政治稳定和政治效率；必须在党的坚强领导下进行；必须树立正确的民主观，探索和走出一条全面

的、科学的政治发展道路。

---

[1] 张树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2] 《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85，第335页。

[3]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68页。

[4]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721页。

[5] 《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第423~424页。

[6] 俄罗斯学者指出，戈尔巴乔夫出生在1927~1933年间，被称为“金色的一代”。因为1918~1926年出生的男性参加了卫国战争，不少人战死在疆场，而戈尔巴乔夫一代是在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接受大学教育，又在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时期开始步入社会。参见〔俄〕亚·谢·巴尔辛科夫《当代俄罗斯历史导论（1985~1991）》，莫斯科，2002，第56页。

[7]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第71页。

[8] 参见〔俄〕《自由思想》杂志1995年第3期，第9~10页，转引自李兴耕等编《前车之鉴：俄罗斯关于苏联剧变问题的各种观点综述》，人民出版社，2003，第38页。

[9] 〔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第162、164、169页。

[10] 〔美〕兹·布热津斯基：《大失败——20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军事科学院军事研究部译，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第65~66、76~77页。

[11] 〔苏〕1990年11月16日《真理报》，转引自吴恩远《从共产党的先进性看苏共丧失执政地位的历史原因》，载于吴恩远《苏联史论》，人民出版社，2007，第347页。

[12] 〔俄〕Д.Л.兹拉托波里斯基：《摧毁苏联》，莫斯科，1998，第24页。

[13] 1991年“8·19”事件后，戈尔巴乔夫随即宣布解散苏共。他描述了当时苏共中央内部的状况。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苏共面临分裂的危局。戈尔巴乔夫写道，苏共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要解体。“因为它包含了各种各样思想、政治派别的代表。我主张通过民主的道路达到这一点——11月举行党的代表大会，到时候在会

上进行分野，好说好散。我和我的志同道合者所提出的党纲模式，根据一些民意调查，党员支持率在三分之一左右。其余部分就各奔东西了：有支持尼娜·安德烈耶娃和安皮洛夫的，有支持布兹加林和科索拉波夫、久加诺夫、罗·梅德韦杰夫和杰尼索夫、利皮茨基和鲁茨科伊的。看来有相当一部分人加入了民主俄罗斯，与特拉夫金的民主党、基督教民主主义者为伍了。这件事（指他宣布解散苏共的事——引者注）归根结底还是发生了。”参见〔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下），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第1369页。

[14] 在苏共二十八大上，身为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对多年的亲信阿·切尔尼亚夫讲：“听着，托利亚（切尔尼亚夫的名字——引者注），我……许多人像是约好了一样，都说服我甩掉总书记一职。可你要明白：这个讨厌至极的疯狗不能松开绳子。如果我这样干了，那这个庞然大物就会全部扑向我。”有关戈尔巴乔夫要摆脱党的思想，身为亲密助手的阿·切尔尼亚夫在1993年和1998年两次回忆录中透露。只是在1998年用“怪物”一词代替了“狗”。分别参见〔俄〕阿·切尔尼亚夫《与戈尔巴乔夫一起的六年》，莫斯科，1993，第356页；《苏联总统助手日记》，莫斯科，1998，第326页；〔俄〕阿·切尔尼亚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徐葵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第425页。

[15] 戈尔巴乔夫亲手解散了苏共，但他并不为自己的言行有丝毫的悔意与不安。他说：“从更广袤的历史前景的角度来看待所发生的一切。苏共到一定的阶段要解体，这是不可避免的。”“为苏共解散而大为惋惜是没有意义的。它起到了自己的历史作用，该退出历史舞台了。”参见〔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下），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第1369页。

[16] 转引自马岩《意识形态与苏联解体》，《马克思主义研究》1997年第3期。

[17] 时至今日，戈尔巴乔夫依然为自己开脱，认为他的改革之所以失败，除叶利钦等势力的干扰外，来自苏共的阻碍是关键因素。他后悔没有一开始就下手对苏共实施“彻底改革”。例如，2010年4月6日，在“改革”25周年之际，俄罗斯《独立报·政治专刊》刊登对戈尔巴乔夫的专访。记者问：“有人指责您把关于苏共领导地位的条款从宪法中删除了，而且您却没有把国家管理现代化的工作进行到底。您同意这些说法吗？”戈尔巴乔夫回答：“我以为（我把这看成自己的第一个错误），就是没有及时改革苏共，这导致苏共后来实际上变成了一系列至关重要的进程的障碍。”

[18] 中国人民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戈尔巴乔夫言论选录（政治部分）》（内部资料），第92页。

[19] 《苏共中央总书记米·谢·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1990年2

月5日）》，见《苏共中央二月全会文件选编（1990年2月5～7日）》，莫斯科，1990，第3～4页。

[20] 《苏共中央总书记米·谢·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1990年2月5日）》，《苏共中央二月全会文件选编（1990年2月5～7日）》，莫斯科，1990，第4页。

[21] 戈尔巴乔夫推动设立苏联总统职位，赋予自己“非常大的权力”，可以行使强权，宣布紧急状态，实行总统直接治理，对议会行使否决权，等等。

[22] 〔俄〕尼·克拉斯尼科夫：《中情局用经济绊倒苏联？——西方特工机构插手摧毁苏联》，〔俄〕2010年12月8日《共青团真理报》。

[23] 参见《内部最坏的敌人》，莫斯科，1987；〔苏〕1987年5月7日《莫斯科真理报》。

[24] 〔俄〕叶·盖达尔：《帝国的消亡：当代俄罗斯的教训》，王尊贤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第237页。

[25] 参见〔俄〕亚·谢·巴尔辛科夫《当代俄罗斯历史导论（1985～1991）》，莫斯科，2002，第87～88页。

[26] 〔俄〕亚·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1999，第262页。

[27] 《叶利钦总统的讲话》，〔俄〕1991年11月28日《消息报》。

[28] 〔俄〕叶·库·利加乔夫：《警示》，钱乃成等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第284页。

关于苏联解体原因、后果的再思考

谭索 [1]

一 苏联解体、苏共灭亡，是多种因素的综合结果，旧体制的弊端未及时改革是重要的原因之一，但并非主要的决定性因素

（1）苏联的迅速解体，是历史的、现实的、外部的、内部的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历史因素是重要的原因之一。苏联是在史无前例、没有任何现实经验可供借鉴的条件下，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大国，在被帝国主义包围和不断侵犯的条件下，披荆斩棘独创建设的，在探索行进中，有些错误和弯路是难免的。20世纪20～30年代苏联在实际中形成的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能够及时调动全国的资源集中用于当时国家最重要的目的，迅速建设起一个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体系，打败横扫西欧不可一世的纳粹军队，创造了历史伟绩。而且这种体制在战后10多年间，仍使国民经济保持了10%左右的增长率。这些使苏联当时的领导者错误地认为这种体制就是不可变更的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律，看不到任何一种具体的政治经济体制，与它的基本制度和经济发展的适应，它的长处和弊端是相对的、可变的，因此长期坚持这种体制不加改革，而且压制、打击别人的改革，致使社会经济逐步失去活力，经济增长率逐步下降。这种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在战时确有灵活、机动、高效的长处，但在平时如不注意及时调整和改革，就易于产生各种弊端，如妨害社会主义民主的实施，限制群众的民主权利，阻碍经济的发展和群众生活的改善，使领导易于脱离群众、丧失群众的支持。一些领导成员自身的社会主义信仰日趋淡薄，甚至形成某些特殊利益阶层或特权集团。苏共领导集团中有些人的思想政策逐步背离人民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一些西方大国的实力以及对苏联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估计不足。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对苏联西化、分化的颠覆活动更是不择手段、无孔不入。这些，都成为苏联剧变的重要原因

（2）直到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前，苏共虽然威望有所降低，但仍

是多数群众所信任拥护的力量；苏联经济增速虽然逐渐降低，但仍高于西方国家。直到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之前，苏联经济增速虽然逐步有所降低，但仍一直保有高于西方国家的正增长，而且不像西方国家那样不时陷于复苏、繁荣、危机那种循环。据统计，1951～1984年苏联国民收入增长8.9倍，工业产值增长13倍，平均年增长分别为7%和8.1%，而美国的国民收入增长2.1倍，工业产值增长2.6倍，平均年增长为3.4%和3.9%。即使单算1981～1985年的社会总产值的年均增长，苏联为3.6% [2] ，而美国只有2.8%。

甚至在戈氏上台的初期，他所主持的错误路线尚未全面形成和落到实处，他和雷日科夫等倡导经济体制改革，使经济生产也有向好的趋势。还在1982年安德罗波夫执政时期，就曾授命戈尔巴乔夫和雷日科夫等组织筹划经济改革并进行初步的试验。1985年戈氏执政后，由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负责的“根本的经济改革纲领”于1986年6月由苏共中央全会通过，并初步实施。雷日科夫曾回忆说：“1986～1988年国内经济出现明显的好转。”“国民收入增长11.6%，工业产值增长13.3%。” [3] 1988年生产总值还取得增产5.5%的好成绩。戈尔巴乔夫在1988年6月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说：“完全有权把我们生活的最近三年称为转折性年代。这三年通过党和劳动人民的努力，已成功地阻止了国家滑向经济、社会和精神领域的危机。”“经济逐步加速运转。去年首次依靠提高劳动生产率取得了国民收入的增长。本五年计划的头两年人均实际收入增长了4.6%。” [4] 可见，旧的经济体制的弊端并非已不可救药，不能改革了。

至于在政治体制方面，群众对苏共有所不满，但是渴望改革领导弊端，而不是要改变社会制度。1985年4月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时，打出“改革”的旗号，提出“有计划和全面地完善社会主义”，曾受到群众的欢迎和期待。到了1989年5月，在自由选举的第一次全苏人民代表大会上，他还以90%的支持率当选为最高苏维埃主席。甚至到1991年3月，全苏就是否保存“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问题进行公民投票时，苏联全国也有76.40%的人赞成，俄罗斯联邦的赞成票为71.34%。这也说明多数人的人心所向，并非旧体制已根本无法改革，只能解体灭亡。

二 历史事实说明，苏联解体根本的主要的原因是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背叛苏联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执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错误路线，其思想理论基础是民主社会主义

（1）戈氏执政时的改革旗帜和方向的演变。1985年4月戈尔巴乔夫执政时，就打出“改革”的旗帜，提出“加速经济发展”的战略。1986年2月苏共二十七大还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最伟大的革命世界观”，党的“全部活动的出发点是忠于马列主义学说”，“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有计划和全面地完善社会主义”是“党的基本任务”。广大干部群众曾对它充满期待。但是，戈尔巴乔夫从来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20世纪50年代，他曾受到赫鲁晓夫领导集团一些背离马克思主义思想原则的影响。他说：“我承认，改革同赫鲁晓夫所做的事是有一定联系的。”[5] 后来，他又与那个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为“专制政权”、“极权主义”服务的“新宗教”，并主张用“民主化”、“公开性”以摧毁它的雅科夫列夫结为“政治知己”，并使雅氏成为他的“改革设计师”和苏共中央政治局思想宣传工作的负责人。戈氏接受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逐步演变，于1987年1月中央全会上，即提出“民主化”、“公开性”的问题，并把它作为改革的主调、动力和保证。在雅氏主持的一些媒体带动下，社会上形成一个对苏联的历史、现实各种“禁区”进行揭发批判的热潮。苏共中央干部博尔金回忆说：“公开性常常被扭曲，扭曲得面目全非，这是因为舆论部门经常发表严重失实的消息，甚至故意进行歪曲。”[6] 利加乔夫回忆说：“这股潮流开始大肆歪曲历史，暴露文章如狂涛恶浪席卷了舆论工具”，矛头对准了苏共、党的的历史及人民 [7] 。戈尔巴乔夫也感到这些言论带有侮辱、谩骂、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性质，但他对政治局和干部群众中的不同意见和抗议，视为“反改革”的言论，予以批判和打击，以“保障公开性不受侵犯”。雷日科夫曾引用群众中流行的“俏皮话”说：“苏联人民在苏共领导下开始反苏共的时代已经到来了。”他还解释说，前半部分说的“人民”不免有些“夸大其辞”，后半部分“却是接近实际情况的，摧毁党的正是它最积极的成员” [8] 。这正是苏联垮台的前奏。

（2）“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的形成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推

行。在1988年6月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戈氏正式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并决定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先是在中央，后在各共和国、直辖市实施自由选举人民代表，以代表大会为最高权力机关。当时全国正处于公开性促动的揭批“苏共历史黑暗面”的高潮中，社会主义和苏共的威望遭受空前的贬损，而那些反苏反共、公开嘲弄历史的人，反而成为改革激进派的英雄。选举结果，自由化思潮的代表人物或称民主派首次登上全国人大的舞台，并建立推动全国范围的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运动的组织——跨地区议员团。叶利钦原为苏共政治局候补委员、莫斯科市委书记，因批评戈尔巴乔夫而受到打击，被视为不惧迫害、敢于为民请命的英雄。他和那些自由化首领一起成为该议员团的领导核心。他们的纲领中“最重要的一条”是“承认财产的私人或个人”占有，土地归农民[9]。他们的群众组织是“民主俄罗斯”，不时动员几万、几十万群众进行游行示威或罢工，对苏共和联盟政府施压，并要求取消宪法中关于苏共为全国领导核心的条款，以把当时纷纷成立的多个政党、组织合法化。随后，在俄联邦、莫斯科、列宁格勒及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的选举中民主派均掌握了政权。从此形成了在全苏联范围内民主派与各地民族分立主义者相结合以架空联盟中央政权的局面。

苏联1988年前的经济形势曾经趋好。当时戈尔巴乔夫的政治路线还未贯彻和落到实处。到1989年，社会局面动荡起伏，群众游行、集会、辩论甚至罢工经常不断，各地方政权、各企业单位自行其是。失去社会稳定这一必要条件，生产难以正常进行，更难实施经济改革。于是，雷日科夫悲叹道：“令我终生难忘的是1989年……正是从这一年起，我不论是作为一名普通公民还是作为国家总理的一切希望都开始破灭。”“从1990年起，出现急剧的几乎是无法控制的滑坡。”[10]他几次向中央提出渐进改革经济的计划，但当时已经掌握俄联邦政权的民主派叶利钦等，急于推进私有化的“500天纲领”，反而责骂联邦政府雷日科夫等的渐进改革计划是“反人民政策”，并多次发起“倒阁”、“倒雷”的风潮。雷日科夫说：“完全可以看出，新领袖们的激进做法所追逐的目标是毁灭国家，改变社会制度。”而戈尔巴乔夫，即国家总统在那时已踏上一条令人不能容忍的妥协之路，这些妥协在以

后导致了国家的灭亡[11]。社会动荡，生产滑坡，物价上涨，人民要排长队去买生活必需品，小孩子甚至到坟地去捡糖块，群众的冲天怨气都被民主派诱导撒向苏共和社会主义。

（3）戈尔巴乔夫对民主派妥协投降路线的贯彻，最终造成苏联解体的悲剧。在1990年5月民主派叶利钦参加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的竞选时戈尔巴乔夫就已明显看出叶利钦有走向资本主义的意向。他说，叶利钦的某些论点，有使俄罗斯脱离社会主义的企图。叶利钦的发言中没有一次提到社会主义。戈尔巴乔夫说："社会主义选择，苏维埃政权……这是我们的基本价值，我们的方针。"对此，叶利钦反驳说："历史上一直存在几种社会主义，甚至还有国家社会主义。单有社会主义这个词是不够的，我所希望的是人民能过上幸福的生活。"叶利钦掩盖了自己的真面目，而戈尔巴乔夫没有也不能去揭破叶利钦的真面目，组织开展对民主派的斗争。结果，叶利钦民主派在俄罗斯掌权，随即通过了《俄联邦国家主权宣言》，宣告俄联邦的宪法、法律在俄境内至高无上。从此，民主派以俄联邦政权为阵地，开展对联盟中央的斗争。这就掀起了自由化思潮与民族分离主义相结合，以分裂联盟使苏联走向解体的新高潮。

随后，在民主派叶利钦掀起"最残酷的夺权斗争"面前，戈尔巴乔夫充分显示出他对资本主义反动派妥协投降的真面目。他于1991年2月在明斯克说，苏共"放弃了对权力的垄断"，但"某些政治派别""开始变得不容异己和充满敌意"，试图实行全面私有化，力图改变联盟中央的目标和方向。他们的目标是"削弱联盟，如果可能，还要搞垮联盟"，并"试图取而代之"。他批评说："民主派近来已采取了赤裸裸的反共方针。""民主派在觊觎政权。"他点名叶利钦、波波夫等民主派"否定社会主义思想，主张社会资本主义化"，是"典型的右翼反对派"。同时，他又宣称："我是一个共产党人并忠于社会主义思想，我将至死不渝地坚持这一点。"既然如此，他就应该组织力量开展对民主派的坚决斗争，而戈尔巴乔夫却对此提出："要放弃战胜谁的原则"，"不要两军对垒"，要"邀请他们合作"，并提出他的"中派路线"、"中派立场"，"其基础不是让一部分人来对抗另一部分人，不是对抗，更不要把对立的一方当做敌人"，而是要"在政治多元化的范围

内”进行民主讨论，和“建设性的合作”[12]。这些话真实地反映了戈尔巴乔夫对资本主义民主派妥协投降路线的实质。他明明看到民主派在“残酷夺权”，谋求“社会资本化”，而仍要去讲“团结”、“和睦”，这只能助长民主派的发展壮大，夺取全部政权。这就决定了苏联社会主义事业的命运。以后的事态只是这种路线的结局而已。

有人说，戈尔巴乔夫对苏联解体的责任，在于未注意维护联盟。其实直到最后，戈氏最为关心的就是联盟的存在。因为很简单，没有联盟的存在，就没有他戈尔巴乔夫的位置。戈尔巴乔夫自己就说："没有能保留一个统一的国家，乃是我的大悲剧，也是我最感痛苦的事。而我是集中全部精力专心致志地去保持统一的。"[13]他先用全民公决、联盟条约来对抗民族分立主义者。但是，如前所述，全苏虽有76.4%的人拥护保留“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他还领导着一个全国性的执政的共产党，掌握着国家政权和一支现代化的军队，但是，他已陷入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的泥坑，他的“社会主义选择”已不是真正共产党人理解的社会主义。他不会也不能充分体察和运用“民心”，发动和组织群众，运用政权的力量，去与民主派进行坚决的斗争。于是，戈尔巴乔夫在与以叶利钦为首的民主派、民族分立主义者联盟的斗争中，步步退让、步步失利。

1991年“8·19”事件的发动，是处于党政军高层机关中一些共产党员挽救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的最后一次尝试。由于他们在准备和行动中的种种弱点、错误而迅速失败了。但戈尔巴乔夫当时总算还握有联盟中央的军政大权，如果他能与事件发动者合作，挽救局势不是不可能的。但是，他宁肯与民主派同流合污，视事件发动者为仇敌。他迎合民主派的需要，不仅镇压了这些维护联盟的举事者，而且亲手解散了共产党。这时，他把自己也算作民主派，但他已经失去了力量，也就失去了作用，民主派也不要他了。正如列宁所说，离开了共产党的支持，资本家只需几巴掌就能赶走各种机会主义者。最后，雄踞世界70多年的苏联解体，戈尔巴乔夫自己也被叶利钦限期离开作为他的权位象征的克里姆林宫[14]。

戈尔巴乔夫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自觉的。他自己说，1988年的

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是与列宁主义“分离”，到1990年的苏共二十八大，更是与列宁主义“决裂”。他说他的改革“新思维的出发点就是不从狭隘的阶级利益或民族利益的立场上，而是从人的利益优先的立场上去评价一切” [15] 。他不仅自己崇尚民主社会主义，而且说他经反复思考，认为“结论只有一个，必须加速对苏共的改造，使之成为一个坚持民主社会主义立场的现代政党” [16] 。

（4）苏共灭亡苏联解体，叶利钦民主派运用掌握的政权，采用“激进的休克疗法”，实行私有化、自由化，以摧毁70多年来苏联劳动人民以血汗创建的社会主义国家，重建资本主义社会。这首先使俄罗斯民族深陷灾难和深渊。1991～1999年叶利钦当政的9年间，工业产值下降近54%，生产总值下降近43%。而苏联1941～1945年卫国战争期间，生产总值只下降了21%。1929～1933年西方资本主义5年大萧条，工业产值下降34%～45%。俄罗斯在经济下滑的深度和持续时间上，都打破了历史纪录。

普京接班后，放弃了“休克疗法”，情况有所好转，但也一直处于低迷状态。20年后，在世界金融危机前的较繁荣的2007年，工农业生产才与苏联解体前夕的1990年大体持平，除天然气生产外，其余生产领域还不及苏联时期。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的2009年，俄罗斯GDP下降7.9%，通胀率为8.8%，是俄罗斯1998年经济灾难后的又一次大灾难。但就在这一年，俄罗斯的亿万富翁由47名增加到77名 [17] 。

生产连续滑坡，必然带来一系列社会、政治问题。犯罪率上升，科技人才外流，人口数量连年下降、寿命缩短。广大群众生活水平趋于贫困，少数人发财暴富。他们骄奢淫逸，挥金如土，操纵舆论政权，成为社会的主人。在1996年的总统大选中正是他们运用手中的金钱和媒体，将叶利钦送上了总统宝座 [18] 。

苏共灭亡，苏联解体，不仅直接造成俄罗斯及其周围一些独联体国家的社会灾难，而且影响到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剧变，并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然而，中国、越南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却在逆流中继续前进。

三 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从另一个角度证明，对社会主义旧体制的改革是可能的、必要的，其条件是必须要有正确的路线和政策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也采用了与苏联大体相同的政治经济体制，取得了许多成绩，也遇到不少困难和问题。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实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国内生产总值每年以10%左右的速度增长，即使在金融危机席卷世界的2008年、2009年我国生产总值仍以9.6%、9.2%的速度增长，并已跃居世界第二位。各项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国防现代化取得重大成就，综合国力有了很大提高，我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影响日益增强。现在世人公认，中国实行的改革开放，是建设富强、文明的强国并影响世界政治格局的成功的重要决策。然而在改革之初和改革的过程中，我国也受到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侵扰。一些地方出现了少数人闹事的现象。有人提出“要人权”、“要民主”、“要解冻”，甚至说“万恶之源是无产阶级专政”，要“彻底批判中国共产党”，要搞资本主义那一套“民主改革”，而党内也有些人看不到这种思潮的危害，甚至给予某种程度的支持。这时，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还说：“如果离开四项基本原则，抽象地空谈民主，那就必然会造成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的严重泛滥，造成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彻底破坏，造成四个现代化的彻底失败。那样中国将重新陷于混乱、分裂、倒退和黑暗，中国人民就将失去一切希望。”[19]（这是邓小平同志在1979年3月说的话，现在看来也像是对戈尔巴乔夫6年改革的失败及其严重后果的预言和写照）1987年10月，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阐述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确定了党在这个阶段的基本路线，即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直到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还嘱咐全党说：“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

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20]

有人说，不能把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简单地归结为某些领袖人物的行为。当时苏共是苏联的执政党，它对苏联的政治局势，不能不起决定性的作用。在苏联戈尔巴乔夫时期，对于这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不仅某些干部给予某种程度的支持，而且成为党中央的领导路线，戈尔巴乔夫是总书记，他也是这个领导集团的代表人物，关键点正在这里。

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21] 对于一个政党来说，它的思想政治路线又是由居于党的领导地位的人来集中形成并执行的。列宁曾说：“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的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22] 1917年时的布尔什维克党，在列宁领导下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原则，结合实际形成和执行了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面对沙皇俄国和各国反对派，曾经是手无寸铁、仅有24万党员，仍然取得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创造了社会主义新国家的人类奇迹。而到20世纪末，苏共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手中握有仅次于美国的军事和经济力量，拥有1900万名党员，并未遭遇严重的自然灾害或外敌入侵，却取消了党的领导地位，毁灭了无数劳动者用血汗建造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一个党特别是执政党的领袖，他具有更大的权力和影响，当然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不在于某个人，而是决定于某个决定政策、执行政策的领导集体。所以，邓小平同志说：“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23] 反观20世纪末的苏联，正是执政的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变质，迎合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执行民主社会主义路线，才酿成苏联解体的悲剧。

2008年冲击和震惊世界的金融危机，进一步暴露了资本主义世界

的根本矛盾和它虚弱的一面，迫使一些资产阶级思想家也不得不收起或改变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至此终结”的理论。特别是社会主义的中国在这次金融危机的灾难中，逆势而进，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它显示了在一个经济基础比较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既坚持改革开放，吸取一切人类社会发展的文明成果，以不断加速自己的发展，同时又能坚持马列主义的思想立场和社会主义道路，抵制各种有害的思想政治思潮及各种西化、分化的阴谋。这些经验将会得到全世界革命者的珍视。同时，我们还应清醒地看到，当前的西方强国，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还会维持它们在经济、技术、军事方面占有的优势。它们将主导经济全球化、剥削世界落后的国家和人民并将部分利润用来缓和国内的矛盾，同时，利用先进的军事技术，对弱小国家和人民颐指气使、横行霸道。我们仍将面临它们无孔不入、无所不用的西化、分化的图谋。我们要真正建成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程要走，还会遇到各种新的困难和问题，但只要我们珍视已有的国内国际的经验教训，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就能较快地实现伟大的目标。

---

[1] 谭索，总参三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2] 参见陆南泉等编《苏联国民经济发展七十年》，机械工业出版社，1988，第2、30页。

[3] 〔俄〕尼·雷日科夫：《大动荡的十年》，王攀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第259、241页。

[4] 尧凌珊编《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文件和评论》，新华出版社，1988，第1、5页。

[5] 〔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第44页。

[6]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第183页。

[7] 〔俄〕叶·利加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赫崇骥等译，新华社参考新闻编辑部，1993，第137页。

[8] 〔俄〕尼·雷日科夫：《大动荡的十年》，王攀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第140页。

[9] 〔俄〕叶利钦：《我的自述》，朱启会译，东方出版社，1992，第194页。

[10] 〔俄〕尼·雷日科夫：《大动荡的十年》，王攀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第257、241页。

[11] 参见〔俄〕尼·雷日科夫《大动荡的十年》，王攀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第455、456页。

[12] 〔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1991年2月26日在明斯克会见白俄罗斯知识分子代表时的讲话》，《苏联东欧问题译丛》1991年第3期。

[13] 〔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第195页。

[14] 关于戈尔巴乔夫错误路线的提出、演变及实施的结果，在笔者所写的《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苏联的毁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一书中有较详细的叙述和分析，其中关于苏共领导核心的分裂及思想演变过程，见第196~205页；关于“8·19”事件的前因后果见366~403页。

[15] 〔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第74页。

[16]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王尊贤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353页。

[17] 参见李慎明主编《世界社会主义跟踪研究报告（2010~201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第393、394、374页。

[18] 有关详情参见谭索《叶利钦的西化改革与俄罗斯的社会灾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第324~365页。

[19]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第164、173、176页。

[20]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第370~371页。

[21]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第242页。

[22]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151页。

[23]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380、365页。

评苏共在改革中亡党的六大教训

刘书林 [1]

一 改革不应该丢掉党对国家的领导权

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规定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这是面对资本主义占优势的世界，为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新兴制度而采取的根本性举措，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命脉所系。如果像戈尔巴乔夫一样，在西方政治观念的影响下，皈依西方的所谓宪政思想，取消宪法规定的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这便是灭亡的开始。

苏共的蜕化变质虽然已经达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濒临崩溃的边缘，但是如果操作得当，经过长期艰苦的斗争，未必不能起死回生，但是如果操作不当，就会立即亡党。在戈尔巴乔夫的主持下，苏共走的是后者这条不归之路。

首先在“毫无限制的公开性”的鼓噪中，苏共实际上失去了对知识界、理论界和新闻界的控制权，对新出现的3万个“非正式组织”不能控制，对反苏反社会主义的浪潮不能控制。有的经济学家公开提出：“如果能够推翻苏联共产党的统治，俄国就会重新回到它革命前的所谓‘常态文明’。”[2] 苏共用自己的舆论阵地为各种反共势力提供论坛。戈尔巴乔夫在1989年11月发布的《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变革》第一次肯定了资产阶级的三权分立学说，提出要引进西方的议会制度 [3] 。戈尔巴乔夫还伙同雅科夫列夫、谢瓦纳德尔泽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结束共产党执政的合法地位，但没有得到成功。1990年1月戈尔巴乔夫在立陶宛讲话中提出：“如果多党制产生并符合社会利益的话，我看不是悲剧。”[4] 1992年的苏共二月全会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会上叶利钦公开提出取消苏联宪法中关于共产党领导地位的第六条。根据二月全会的精神，苏共三月全会就通过决议，决定改变宪法第六条关于共产党执政地位的规定，被原西德一位学者称作“这是对列宁主义最重要的原则的一个决定性的背叛”[5] 。在当时的情况

下，照搬西方的多党轮流执政的道路，这显然是自杀的开始。到此苏共就完成了亡党的准备工作，具体亡党的时间只是一个偶然的问题了。

为了把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切实搞掉，戈尔巴乔夫首先在党内把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左派利加乔夫、葛罗米柯、索罗缅采夫降职或免职，使得极右派叶利钦等人在党的二十八大上更加肆无忌惮。他们提出："改变党的名称，应当叫民主社会主义党。""党应当放弃一切国家职能，在军队、国家安全系统和国家机关中应当取消其基层组织。"二十八大的直接效果就是导致了苏共的分裂。由于1991年"8·19"事件的失败，促使叶利钦8月23日签署了"禁止苏共和俄共在俄联邦领土上的活动"的命令[6]。当天下午，苏共中央大楼被查封。次日苏共中央宣布解散，随之苏共的所有机构土崩瓦解，苏共的财产、档案被接管。11月5日，叶利钦再次下令，完全禁止苏共和俄共在俄联邦境内的一切活动[7]。至此，具有93年历史和2000万名党员的苏联共产党彻底灭亡。

在我国的改革过程中，也有一种十分奇怪的"宪政"叫嚷，也有关于"军队国家化"的疯狂鼓噪，更有取消党在教育、国家机关和军队设立组织的合法性的倾向，但是，这些危险的思潮都被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识破并抛弃了。识破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对党的领导权的污蔑和攻击，社会主义事业就胜利发展，如果在这个问题上丧失正确的立场，就会亡党亡国。

二 改革不应该丢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

社会主义公有制决定了社会主义的性质，提供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保证，也是社会主义制度存废的实质条件。无论怎样的改革，只要保住了公有制或者公有制主体的地位，社会主义国家的根基就会稳固。否则，视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儿戏或过时的桎梏，一意孤行地推行"500天纲领"、"休克疗法"，一定要把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搞光，那么，社会主义公有制消失之日，就是所在的社会主义国家灭亡之时。

如果说苏联长期以来在经济方面排斥私有成分，影响了经济的发

展，形成了短缺经济，那么，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中加速实行的私有化（虽然在正式文字上表述为“非国有化”），则是挖掘了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基石，导致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大厦的坍塌。1990年8月，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商定，委托经济学家沙塔林院士制定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方案，即《向市场经济过渡——构想与纲领》。这个纲领一个月后面世，以“非国有化”的口号欺骗群众，实际上提出了以消除公有制为目的的“私有化”的纲领草案。沙塔林方案提出用500天的时间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戈尔巴乔夫接受了沙塔林方案，明确提出：“我们应当实现所有制私有化。”[8] 1990年10月18日，戈尔巴乔夫向最高苏维埃提出了《稳定国民经济和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构想与纲领》，并获得了通过。这个文件公开号召：“需要尽快把大部分企业从国家包办下解放出来，实行私有化。”[9] 1991年7月1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私有化法》，其中规定，国营企业可变成租赁或集体企业、股份公司，可招标出售或拍卖[10]。同年7月，戈尔巴乔夫致函西方七国领导人会议，说实施这个计划的头两年，将把苏联80%的中小企业卖给私人，然后将进一步对大型企业实行私人经营[11]。

苏联在改革中大搞私有化，挖掉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基础，形成了既得利益集团，出现阶级的分化和特权阶层，这样就形成了与人民群众的根本对立。只要有了这样的一个基础，不是变质的执政党发动剧变宣布国家的重组，就是激起群众的愤怒反抗，使得虚假的社会制度在骚乱或反抗浪潮中陷于崩溃。

三 改革不应该否定自己的伟大领袖斯大林

社会主义国家的创始者不仅仅是一个领导人，更是一种制度的象征，一段历史的标志，一代人的精神归宿，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化身。一切想继续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前进的人，都会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自己的领袖。对待社会主义国家创始者的态度，就是对待社会主义事业的态度的试金石。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早以官方的姿态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是赫鲁晓夫。他是掀起“非斯大林化”浪潮的始作俑者，开了一个社会

主义国家的后继领导人否定制度创始者的先例。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在国内引导了所谓“解冻”的思潮和向右转的趋势；在国际上引发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和波兰、匈牙利的动乱；同时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反共浪潮，西方反共势力抓住赫鲁晓夫提供的“材料”，污蔑社会主义为“极权统治”、“不人道”；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内的共产党员思想混乱，大量退党，出现所谓“马克思主义过时”的喧嚷。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真正的“主流”导向中，对斯大林的态度是严格保持赫鲁晓夫时期的基调的。1969年12月21日，《真理报》为了纪念斯大林诞辰发表的编辑部的官方文章中，不得不承认斯大林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对列宁主义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却强调：对斯大林的评价仍然要遵守1956年苏共中央《关于克服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决议[12]。

戈尔巴乔夫自1985年4月上台后，重新掀起批判斯大林的高潮。在这期间，大量的斯大林时期的档案公布于众，国家领导人讲话屡屡出现对斯大林的批判和责备，讨论斯大林问题的圆桌会议频频举行，报刊上关于斯大林的文章连篇累牍。所谓“斯大林主义”、“斯大林体制”作为社会主义制度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代名词，遭到粗暴的批判。

在苏联国内，极端主义的思潮很快由反对斯大林转向反对列宁，反对社会主义制度。苏联国家历史档案研究所所长、苏共“民主纲领派”的头目阿法纳西耶夫，发表了这样的观点：“斯大林主义的实质在于列宁主义。”“在1918～1919年著作里，列宁多次强调‘暴力’、‘无情地处决’、‘大规模的恐怖’这些字眼……就是这种允许恐怖、允许党的垄断的思想成为最终在斯大林时期形成的社会结构类型的基础。从这一点上说，斯大林与列宁相比实际上没有任何新的发明。现在社会上有一种说法，应当从坏的斯大林转向好的列宁。我感到这个口号是无益的、是前途无望的。我感到最重要的是要揭露斯大林主义所包含的列宁主义实质。”[13]看来，否定斯大林的最终目的就是否定列宁。

在苏联，官方延续了几十年的“非斯大林化”，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第一，从全面否定斯大林到全面否定苏联历史。在诽谤斯大林的氛围中，似乎苏联的历史是一个不断犯错误的历史，不光彩的历史，与这样的历史彻底决裂，必然导致走向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方向。第二，从全面否定斯大林到全面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官方持久地“非斯大林化”的过程中，制造了所谓“斯大林模式”的概念，把苏联的实践归于“斯大林模式”，把社会主义制度归于“斯大林模式”，随之予以否定。第三，从全面否定斯大林到全面否定共产主义目标。在苏联，一旦历史被践踏，共产主义理想也就失去了现实的基础。苏共二十八大的纲领，最终作出了抛弃共产主义目标的决定，公开提出：“我们的理想是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在踏上革命性变革的道路之后，必须毫不犹豫地摒弃自己身上妨碍我们向这一目标前进的过去的桎梏。”[14] 第四，从全面否定斯大林到全面否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第五，从全面否定斯大林到全面否定列宁。在苏共1990年的二月全会上，《苏维埃文化报》主编发言指出：“现在，正是列宁遭到了集中攻击，恰恰在我们的报刊上，而不是在外国的报刊上。某些出版物把他描绘成暴君，据说列宁策动了恐怖行动，也是他建立了集中营。一句话，他不是劳动人民的领袖，而是个鬼蜮。”“我们在某些杂志上看到了谈十月革命和列宁本人在以后国家遭遇到的灾难中所起的罪恶作用的重头文章。而斯大林仅被认为在恐怖方面继承了列宁的事业。”[15] 第六，从全面否定斯大林到全面否定共产党的领导。“非斯大林化”把斯大林妖魔化，也就拆毁了苏共执政权力的基础。

四 改革不应该丢掉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共产党人的旗帜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科学社会主义的旗帜。

苏联在改革中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盲目地进行改革，甚至把马列主义的指导丢到九霄云外。在这种条件下的所谓改革的新思维，把改革搞成了离经叛道。丢弃和背离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离开了立国之本，必然导致社会主义制度的变质。这就是苏联改革走向邪路，最终导致失败的最大的政治原因。

如果说苏联社会主义事业的直接叛卖者是戈尔巴乔夫，那么戈尔巴乔夫的榜样就是赫鲁晓夫。

在20世纪60年代苏联的改革中，赫鲁晓夫就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的方法，提出所谓“全民党”、“全民国家”等错误的口号，使得抽象的人道主义、社会党人的所谓“民主社会主义”在国内长期泛滥。

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中，戈尔巴乔夫按照所谓的“新思维”，一味狂热地鼓吹改革“迫不及待”，一味地否定社会主义国家实践的历史，一味地强调要大胆进行改革。但是，到底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怎么样坚持？改革的最终目的是什么？现实的改革还要不要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在这些根本问题上，戈尔巴乔夫表现出极大的盲目性。他甚至不允许党和人民对这些大是大非问题提出质问，更不允许党和人民对改革进行民主讨论和反思。他利用不受监督和制约的政治权力，压制党内的健康力量，把改革带入死胡同，把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推入灾难的深渊。

戈尔巴乔夫背叛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主要表现和步骤是：①1990年2月戈尔巴乔夫主持召开的苏共二月全会，以“修宪”为名，取消宪法第六条共产党在国家的执政地位，背叛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②戈尔巴乔夫主持的苏共二十八大，通过新纲领，公然丢掉共产主义的旗帜，举起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旗帜，公开背叛科学社会主义的最高理想。③鼓吹“公开性”，实际上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以致局面失控，全国动乱，不可收拾。

前美国驻苏联大使马特洛克曾对戈尔巴乔夫作过这样的评述：“从1988年到1989年，他已经一步一步地抽去了影响苏联历史70年的‘社会主义’的真正含义。到1991年中，他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隐藏的资本主义者，甚至他自己对此毫无觉察。”[16]

这个沉痛的教训向全世界人民宣示：在改革中，国家的生死存亡关键取决于是否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改旗易帜是一条邪路，灭亡之路。

五 改革不应该投靠和献媚美国

美国几十年来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始终不放松。经过杜勒斯和中情局的长期努力，提出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十条戒令”，西化和分化的战略图谋越来越突出。正如《参考消息》载文《中情局一手策划苏联解体》，就诉说了西方对苏联的颠覆和破坏图谋[17]。苏联上层领导改革的人却对此毫无戒备。不仅改革中的极右派叶利钦经常讨取美国主子的意旨，奉为上方宝剑，而且主流派的戈尔巴乔夫也是处处看美国的眼色行事，很在意美国人对自己的评价和赞赏，以讨好美国为标准。戈尔巴乔夫实行“公开性”原则，提倡所谓“文化领域的自主权”，以致最终放弃阶级分析的方法，提出“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都是向美国讨好，求得美国人的支持。最为露骨和可耻的是，在苏联发生“8·19”事件之后，戈尔巴乔夫首先是打通美国总统的电话，请示了美国总统之后才有了主张并离开休养地的。似乎美国人的接受，才是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标准。美国则软硬兼施，趁机组织并煽动暴乱，复辟变天。在开放的形势下，与西方来往是正常的，但不能奴颜婢膝，更不能认贼作父，平时不能丧失阶级斗争的警觉。与西方交流是必要的，但不能放弃阶级分析的方法，与西方人友好交往不要忘乎所以。保持冷静的头脑，作清醒有效的努力，这才是最需要的。

在苏联的改革中，掌握国家权力的是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这样两个美国的奴才，苏共在改革中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虽然，后来苏联垮台之后，叶利钦大骂美国不仗义，大有上当受骗和悔悟的表现，但那只是叛徒的悔恨，而不是革命者的教训。

六 改革不应该继续大国主义的错误、控制东欧社会主义国家

戈尔巴乔夫不但在自己的国家出卖社会主义事业，而且在改革中更加狂躁地推行大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干涉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民主德国的内政和改革，逼迫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走类似自己的叛卖道路。

在改革时期，戈尔巴乔夫推行大国主义，其主要内容有两个：在

向美国外交臣服的同时，疯狂地出卖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利益。“戈尔巴乔夫有意推动东欧国家非共产主义化……1989年8月22日，他打电话给波兰共产党领导人拉科夫斯基，说服他：必须合作，将政权交给‘团结工会’。”[18]

戈尔巴乔夫还逼迫民主德国走当时苏联改革的道路。“戈尔巴乔夫对昂纳克说话非常严厉。他证实，停止国内游行的惟一方法，就是按照苏联模式走改革路线，只有这样，昂纳克才能拯救自己的政府……戈尔巴乔夫对其战友们说，昂纳克必须下台，而且要越快越好，因为‘东德领导人已不能控制局势’。”[19] 戈尔巴乔夫不但命令苏联在前民主德国的驻军对前民主德国的动乱隔岸观火，而且还采取拆台的手段施加影响。1989年10月7日，当昂纳克下令秘密警察驱散示威的人群时，秘密警察领导人克伦茨得知戈尔巴乔夫对昂纳克的态度后，竟然拒不执行昂纳克的命令[20]。其后，戈尔巴乔夫在两德统一问题上对民主德国的出卖，连美国总统小布什都感到吃惊。

在1989年12月22日，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与反对派正在激烈交战的危急时刻，戈尔巴乔夫政府竟然宣布已经派出空军部队，把作战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向反对派“救国阵线委员会”一边。这种直接干涉他国内政的行为，真是恶习不改。戈尔巴乔夫的这些叛卖活动，为他的所谓的“改革新思维”作了一个清楚的脚注。戈尔巴乔夫领导的改革的失败，基本原因就是背叛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自寻死路。

---

[1] 刘书林，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2] 李慎明主编《居安思危——苏共亡党二十年的思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第103页。

[3] 李慎明主编《居安思危——苏共亡党二十年的思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第105页。

[4] 〔美〕小杰克·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第364页。

[5] 李慎明主编《居安思危——苏共亡党二十年的思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2011，第107页。

[6] 唐修哲、孙润玉：《克里姆林宫易主纪实》，新华出版社，1993，第337页。

[7] 李慎明主编《居安思危——苏共亡党二十年的思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第116页。

[8] 李慎明主编《居安思危——苏共亡党二十年的思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第156页。

[9] 李慎明主编《居安思危——苏共亡党二十年的思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第156页。

[10] 黄宏、纪玉祥：《原苏联七年“改革”纪实》，红旗出版社，1992，第552页。

[11] 江流、陈之骅：《苏联演变的历史思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第106页。

[12] 《苏联国内资本主义复辟纪事》，三联书店，1975，第456～458页。

[13] 《今日苏联东欧》1991年第1期，第11～12页。

[14] 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编译组编译《苏联问题资料》，东方出版社，1990，第2页。

[15] 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编译组编译《苏联问题资料》，东方出版社，1990，第140页。

[16] 〔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下），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第655页。

[17] 2010年12月10日《参考消息》第3版。

[18] 〔俄〕亚·维·菲利波夫：《俄罗斯现代史》，吴恩远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第282页。

[19] 〔俄〕亚·维·菲利波夫：《俄罗斯现代史》，吴恩远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第283页。

[20] 〔俄〕亚·维·菲利波夫：《俄罗斯现代史》，吴恩远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第284页。

斯大林问题，一份悬而未决的历史遗产

李伟 [1]

一 为斯大林辩护何错之有！

在我国学术界、理论界有这样一种思想现象为时不短了，即为斯大林说句公道话，或者为斯大林辩护，不要说文章很难发表，即使发表出来也往往受到斥责，这是造成当今学界批判甚至肆意辱骂所谓“斯大林体制”、“斯大林模式”的文章特别盛行的原因之一。难道为斯大林说句公道话，为斯大林辩护就错了吗？此种现象不打破、不纠正，学界的科学与民主将被践踏一空。所以，笔者特别怀念20世纪60年代以毛泽东为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为斯大林辩护的情景。

1963年9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即“一评”；7天后，发表《关于斯大林问题》，副标题是“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一评”是总论，紧跟其后的“二评”，是具体而翔实地展开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之间分歧的第一篇，可见斯大林问题在中苏两党分歧中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

在这篇文章里，中国共产党人以无畏的姿态和坦荡的胸怀，公开向世界表示：“苏共领导人指责中国共产党为斯大林‘辩护’。是的，我们是要为斯大林辩护。在赫鲁晓夫歪曲历史、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情况下，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我们理所当然、义不容辞地要起来为斯大林辩护。”

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敢这样做，是因为必须要冲破由于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为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在全世界掀起大规模反共浪潮提供了求之不得的反苏反共的弹药，是因为必须要揭露和打破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各色各样的机会主义者企图把全盘否定斯大林

作为一个定论推向全世界，坚决支持世界上一切为斯大林的正确方面辩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辩护的人们及其思想。

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怎样认识和对待斯大林的问题，不只是对斯大林的个人评价问题，更重要的是，怎样总结列宁逝世以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问题，怎样总结列宁逝世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为斯大林辩护，是为斯大林的正确方面辩护，是为十月革命创造出来的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光荣斗争历史辩护，是为苏联共产党的光荣斗争历史辩护，是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全世界劳动人民中的声誉辩护。一句话，是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辩护。不仅中国共产党人要这样做，一切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人，一切坚决革命的人，一切正直的人，也都已经或者正在这样做。”[2]

自那以后，40多年过去了，斯大林问题依然如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分析的那样：“斯大林问题，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大问题，曾经引起了世界各国一切阶级的反响，至今还在议论纷纷。各个不同的阶级，代表各个不同阶级的政党或政治派别，意见不同。估计在本世纪内，这个问题还不可能作出定论。但是，在国际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范围之内，多数人的意见其实是相同的，他们不赞成全盘否定斯大林，而且越来越怀念斯大林。”进入21世纪，首先是俄罗斯国家和人民对斯大林的评价，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戈尔巴乔夫时期有了很大不同，可谓风向大变；尤其是2007年俄罗斯教育部对历史教科书作了重大调整，将斯大林时代及其政治思想列入新学年历史教科书，确定斯大林为苏联最成功的领导人。“斯大林建立了一个伟大的祖国。”[3]

二 为什么他们总是把矛头指向斯大林？

在研讨苏共亡党、苏联亡国这一问题上，有这样一种现象：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派别总是把批判的矛头指向斯大林，相当一致地认为“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是斯大林模式”[4]，对其他原因谈得不多，甚至不怎么谈。这一思想现象很值得有思想的人们认真思索。

在研讨苏共亡党、苏联亡国这一重大历史问题上，帝国主义、各国资产阶级及其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派别为什么总是紧紧抓住斯大林问题不放，为什么总是把批判的矛头指向斯大林呢？这一现象突出地表现了他们在斯大林问题上的敏锐嗅觉，是他们提出了苏共亡党、苏联亡国“问题的总根子则是斯大林种下的”这样一个命题和论断，可以说是他们发现了苏共亡党苏联亡国之根——“任何一个时代的反动分子都是反映时代精神状态的准确晴雨表。”[5] 马克思的这句精妙之言，真是一语破的。

帝国主义、各国资产阶级及其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派别如此看重斯大林问题，下那么大的力气宣讲斯大林问题，绝非无中生有，空穴来风，而是这个问题对他们来说太重要了。否定斯大林，绝不单单是否定斯大林一个人，而是否定了与斯大林密切联系的一系列重大事物。因为斯大林代表着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代表着一个阶级、一种社会制度、一种生产方式、一条社会发展道路，代表着一种理论思想体系和一种道德精神体系。否定了斯大林，也就使斯大林所代表的这一切事物统统失去了继续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无疑，苏共和苏联还有继续存在的必要吗？正是由于否定了斯大林，苏共亡党苏联亡国就成为必然了，是迟早要发生的事情。

三 什么人总是贬低斯大林的历史功绩！

只要读者认真阅读批判斯大林的文章著作，即不难发现，这些作品总是千方百计地回避或者极力贬低斯大林的历史功绩。原因并不复杂，就是斯大林在开辟社会主义道路上所发生的肃反扩大化等这样或那样的失误也好，错误也好，与他所建立的震撼世界、改变世界的历史功绩是根本无法相比的。否则，他们的文章，他们的“研究成果”就拿不出手，就无法掩盖自身反历史、反人民、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及其拙劣的思想。正如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指出的那样，苏联修正主义者“把斯大林丑化，除了其他原因以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斯大林坚决同帝国主义斗争。他们把自己和斯大林区别开来，是要得到帝国主义的赏识”[6] 。

斯大林是改变过20世纪的历史人物，他的历史功绩之巨大，影响之深刻、深远，20世纪里能与之相提并论的人物也不过两三个。他的巨大历史功绩至少有以下三项。

第一，成功地捍卫和发展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无疑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转折点。但是要让这个转折点能够在人类历史上真正站住脚，就不能像19世纪70年代的巴黎公社那样，如划破夜空的流星，稍纵即逝，必须使苏联这个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世界资本主义列强的“围剿”下生存下来。苏联立国——这一重大历史任务——无疑是由斯大林完成的。斯大林接手苏联，使20世纪上半叶世界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顶住了资本主义列强长达20多年从政治、经济、文化到军事颠覆的猖狂进攻，不仅生存下来，而且还奇迹般地发展壮大起来。不仅如此，在斯大林领导下，苏联冲破帝国主义的重重包围和封锁，在世界上还发展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从而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开辟出一条全新的道路。斯大林胜利地完成了历史赋予他的任务，影响之巨大、深远，是无以言表的。十月革命证明了列宁所揭示的一条历史规律：“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一段时间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以前的国家。”而斯大林把这一辉煌的革命理论推向全世界，推动社会主义在一批国家陆续获得胜利，极大地鼓舞着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满怀信心地前仆后继地去争取胜利。

第二，斯大林领导的苏联拯救了20世纪的人类。苏联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出的牺牲是巨大的，贡献是最大的。是苏联红军攻克了柏林，消灭了德国法西斯主力，又出兵百万消灭了侵略中国的日本关东军，解放了世界上许多的民族和领土，受益国家众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英盟国发挥了很大作用，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事实表明，斯大林领导的苏联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阵营的领头羊，是中流砥柱，领衔打败了德日意法西斯阵营，拯救了20世纪的人类。苏联军事上的巨大胜利，改变了世界军事力量的格局，两个阵营的“冷战”由此产生，针锋相对了近半个世纪。斯大林领导的苏联的崛

起，在改变苏联的同时，也改变着美国及以其为首的世界资本主义阵营，导致了20世纪下半叶美国针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而制定、实施的争霸世界的全球战略，影响之深，延至今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残酷战争表明，无论怎样强大的帝国主义战争机器都不能摧毁斯大林领导的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苏联，反而证明了帝国主义是“泥足巨人”，是“纸老虎”。只要全世界人民团结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周围，就一定可以战胜和消灭帝国主义，建立起社会主义的新世界。

第三，造就了一个新型的人类社会及其思想道德体系。英国前首相丘吉尔1959年底在英国下议院发表讲演，他说了一句评价斯大林的名言：“他接手的是一个使用木犁的国度，撒手人寰时却是一个拥有原子弹的国家。”[7] 无疑，一国的军事力量，是该国经济实力直接的、真实的体现。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里的巨大作用和伟大胜利，反映出了那个时代的苏联所具有的强大的国民力量和经济实力。苏联这种令人震撼的实力，毫无疑问是在斯大林领导下发展和积聚起来的，是他领导苏联人民把俄国这样一个曾经的欧洲资本主义经济弱国，经过短短30年，其中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及国内战争的巨大破坏，建设成可与美国抗衡的世界第二强国。不仅如此，斯大林的力量和功绩还表现在，他发挥苏联自身的经济力量和文化力量，慷慨地“支持兄弟党和支持它们本国的人民为争取解放而斗争、为维护和平而斗争”[8] ，带动了一大批国家和民族的社会进步，使它们从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文化发展中受益匪浅，大大地解放和推动了20世纪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斯大林生活俭朴廉洁，工作勤奋刻苦，思想敏锐活跃，信念坚强如一。他在苏联人民中发现、培养了青年突击队，推广了斯达汉诺夫群众运动，带领苏联各族人民在广阔的土地上不仅创造了新型的美好的社会主义生活，还造就了沁人心脾的社会主义的道德观念和理想情操。这种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完全不同于几百年来资本主义社会的金钱至上、利欲熏心、血腥争夺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念。存在了几个世纪的美好愿望和理论形态的社会主义，变为实实在在的社会现实和人类生活，成为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追求的能够触手可及的理想社会，成为人

类社会发展中一个现实的社会形态和必须经历的历史阶段，可以说主要是经斯大林之手实现的。

斯大林作出的这三大历史性功绩反映了苏联的什么呢？在他领导下的苏联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创造的巨大成就及其对世界的巨大影响又说明了什么呢？它雄辩地反映了、说明了这样一个任何人也无法掩盖和诋毁不了的事实，那就是在斯大林时代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苏联的生产关系极大地解放和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政治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是成功的、先进的，其生命力是强大的、旺盛的。否则，就很难解释苏联哪儿来的这种力量，为什么有能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取得那么巨大的胜利，为什么有能力解放了那么多的国家和民族，为什么有能力支持和援助了那么多的国家和人民，为什么会在短短的30年里并在遭受了那么严重破坏后还能迅速恢复并发展成为欧洲第一强国、世界第二强国。

斯大林在有生之年做的这三件事，件件都改变了苏联，改变了许多国家和民族，影响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由此也就改变了20世纪人类世界的面貌和发展的格局，其影响之巨大而长远，已经远远地超出了20世纪。平心而论，斯大林的诸如肃反扩大化等失误和错误对历史的影响是十分有限的，与他影响世界、改变世界的历史作用相比是局部的、暂时的，在他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面前更显得那么的渺小。显然，否定斯大林，不是无知，就是别有用心。

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一切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各种派别千方百计回避或否定斯大林的巨大历史功绩和历史作用，不能不使人们思考这样的问题：他们为什么那么仇视和害怕斯大林的历史功绩和历史影响呢？斯大林历史功绩的根本作用和历史意义到底是什么呢？列宁有这样一种思想认识：在理论上认识一个问题与在实践中解决这个问题不是一回事。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理论上基本解决了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社会的一系列问题，可是真正在实践上将他们的理论民族化、具体化、生活化，变成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和生活的内容，并为之确立了一系列实现和巩固这个基础的原则和方法，是由斯大林完成的，或者说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由斯大林完成的；

不仅如此，斯大林还为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继续开拓社会主义事业指出了前进的方向和进一步发展的生长点。正是这样一些具有长久性的、根本性的原则、方法和思想理论，使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各色各样的机会主义者非常害怕，正像他们自己所表白的："一切问题的总根子，就在斯大林所建立的这一政治制度上。"显然，这对他们来说，如果不将其除之，被无产阶级政党和革命的人民完全继承和掌握了，他们的末日就不远了。这是他们总在那里妖魔化斯大林，总是反复地批判、丑化、诬蔑所谓"斯大林模式"、"斯大林体制"和离间革命人民的真实意图和原因。

四 斯大林的实践和理论是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活水源头

有人提出，要弄清苏联亡国亡党的原因，只要"深入探讨"这样几个问题就够了，其中摆在第一位题目是："斯大林的功过是非，也就是说他所代表的制度是否就是列宁所期望的制度，他本人是否列宁主义者，抑或相反。"其中竟说什么把斯大林视为马列主义者"是十分荒谬的"，是"文不对题"。笔者以为，这样的研究题目和内容的文章，绝不是什么幼稚可笑了，而是企图通过造谣惑众，搅乱是非，从而浑水摸鱼。我国学界竟出此荒唐观点，岂不被我国的友邻俄罗斯思想界和国际学术界耻笑？

常常读到一些理论文章，不讲道理，上来就斥责斯大林，斥责"斯大林模式"、"斯大林体制"僵化、教条、独裁、极权，实际上，这些作者大多不了解斯大林的生平和思想。

斯大林严于律己，是有口皆碑的，无论对自己还是对家人。

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写信给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儿童读物出版社，坚决反对并阻止了《斯大林童年时代的故事》这样一类书出版。他非常生气地指出："在这本书里有大量不符合事实、歪曲、夸大、和过分颂扬的地方。作者被童话爱好者、扯谎者（大概是'善意的'扯谎者）、阿谀奉承者弄迷糊了……这本书有一种倾向，即在苏联儿童（以及一般人）的意识中培植对个人，对领袖和绝对正确的英雄的崇拜。这是危险的，有害的。'英雄'和'群氓'的理论

不是布尔什维克的理论，而是社会革命党的理论。社会革命党人说：英雄创造人民，把他们从群氓变为人民。布尔什维克回答社会革命党人说：人民创造英雄。”斯大林严肃地指出：“一切这样的书都将为社会革命党人张目，都将危害我们整个布尔什维克的事业。”他说：“建议把这本书烧掉。”[9]

斯大林60岁生日前夕，苏联文学界有人想把斯大林年轻时用格鲁吉亚语言写的诗译成俄语出版。他不赞同，风趣地说：“格鲁吉亚的大诗人已经够多的了。就让那里少一个吧！”[10]

1946年，在与编写《斯大林传略》的学者座谈时，斯大林严肃地指出，这本书叙述的调子不好：“传略中好话很多，赞扬个人的作用。读者在读了这本传记后该做什么呢？他们得跪下来向我祈祷。”他对传略中没有提他是列宁的学生表示不满：“任何地方都没有明确说明我是列宁的学生……而事实上我过去和现在一直认为自己是列宁的学生。这一点我在同路德维希的谈话中明确地说过。列宁教导我，而不是相反。”他反对把他的某些观点抬高到“学说”一类的地位，用讽刺的语气说：“我现在居然有了各种学说，直到关于战争中起作用的经常性因素的学说。甚至发现我还有共产主义学说、知识分子学说、集体化学说等等。”“这样的学说在我这里‘发现’了整整六种……实际上一种也没有。”“我们有马克思和列宁的学说，任何补充的学说都不需要。”1947年出版时，他又作了多处删改，勾掉了“在斯大林领导下”、“斯大林领导的”这样的字句，去掉了“天才的理论家”、“苏维埃国家真正的舵手”、“最伟大的统帅”等头衔[11]。

诸如此类的事情，笔者能举出许许多多。就是这样一个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无条件地把自己的儿子以一名普通军人的身份送上卫国战争的最前线；儿子被俘后，又断然拒绝了德国提出的用被俘的儿子换一名被俘的德国将领的要求，儿子牺牲在了德国集中营。难道斯大林就是这样搞个人迷信、个人崇拜吗？把人民群众对革命领袖的热爱，当做所谓的个人迷信、个人崇拜来诬蔑和批判，这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及其御用文人惯用的挑拨离间的欺骗手段。这表明他们是多么害怕和妒忌革命领袖在人民群众中的崇高威望，而这样

的威望，正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获得胜利的一种必需的条件和保障。

斯大林不但有影响世界、改变世界的伟大历史实践，也有着丰富而深刻的理论思想，这两者是统一的，是相辅相成的。遗憾的是，研读过斯大林文章和著作的学人真是太少了，造成学界不少人被道听途说的口耳之学所影响，以讹传讹，弄得是非难辨。尤其是如果不知晓、不懂得两次世界大战这样一个既是国际战争又是苏联国内战争的历史背景和历史条件，就既不能理解斯大林的伟大革命实践、理论思想和创造性历史功绩是从何而来的，也不能理解他的失误和错误又是为何造成的。

斯大林毕生为无产阶级革命和人类解放无私无畏地奋斗，他学习刻苦，思想敏锐，远见卓识，留下了丰厚的思想和著述，是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斯大林的文章、报告，都是自己动手，有自己特殊的风格，同谁也混淆不了[12]。这在苏联、俄罗斯和世界思想界是公认的。这种非凡的理论思维和写作能力，连他的政治对手都十分钦佩和服膺。1959年丘吉尔在纪念斯大林讲话中说，斯大林“能明晰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斯大林自己写发言稿。在他的著作里总是有一种执行者的力量。斯大林身上这种力量之大，使他成为所有时代和民族领导人中独一无二的人”[13]。斯大林能有如此巨大的世界影响，原因在于他有真才实学，有《斯大林全集》这样辉煌的理论著作。

斯大林直至晚年，依然保持着活跃的思维，与时俱进，笔耕不辍，亲笔著述了《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这样一本至今仍然堪称经典的语言学著作。其中，斯大林针对苏联科学界、思想界强调：“没有不同意见的争论，没有批评自由，任何科学都不可能发展，不可能有成就。可是这个公认的规则，竟被忽视和极粗暴地践踏了。一些自认为完全正确的领导者组成一个排他的小集团，保证自己不受任何的批评，恣意横行，为所欲为。”[14]可以说，在苏联科学发展史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不是别人，正是斯大林一次又一次只身奋起，力排阻碍苏联科学发展的障碍，造就百家争鸣、推陈出新的局面。请问，世界上有这样的“现代沙皇”、“个人独裁”、“寡头领

袖”吗？如此论断，才是不折不扣的荒谬！

斯大林的刻苦勤奋和理论创造是超群的。这鲜明地表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就预见到一个全面的和平建设的时代很快到来了，于日理万机中不倦地探索“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规律”，活到老、学到老、写到老，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在人生的最后时光（1952年，74岁高龄），他亲笔著述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样一部划时代的理论著作。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是斯大林第一次明确而完整地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问题”。

斯大林严肃而诚恳地告诫人们：“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会有落后的惰性的力量。”“新的生产关系不可能永远是新的，而且也不永远是新的，它开始变旧，并和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发生矛盾，它开始失去其为生产力的主要推进者的作用，变成生产力的阻碍者。”就会产生“出现新生产关系来代替这种已经变旧了的生产关系”的社会愿望和要求。那么自觉地实现这种社会要求的切入点在哪里呢？就是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及其交换。因而需要围绕商品生产做一篇大文章，来启动和改变苏联思想界、理论界在这个问题上的僵滞局面和已经变得陈旧的思想观点，以便提出适应时代发展的新的想法、新的理论。这就是为什么当苏联经济刚刚从战争破坏中恢复，斯大林就不顾朝鲜战争尚在进行的“半热战”的国际局面，通过组织编写《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国内启动了一场关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大讨论，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问题”作为整个讨论的出发点和重点。他提醒人们：“不能把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混为一谈。”他启发人们思考和探索“为什么商品生产就不能在一定时期内同样地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服务而并不引导到资本主义”[15]。这个提法和论点实际上是提出了社会主义改革的切入点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生长点。5个月后，斯大林逝世，他要改革苏联社会经济运行体制的愿望和思想，被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高音长期淹没了，苏联历史的车轮走上了另一个方向。

实际上，斯大林从理论思想到社会实践的各个方面，其青春活力

和与时俱进，堪称马克思主义革命家的典范、楷模。

在20世纪20年代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即将全面爆发之时，斯大林深谋远虑，及时、果断地调整了列宁时期的“新经济政策”，转向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之后，又大胆地、广泛地引进美欧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技术、人才，不遗余力地利用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成果，改革、改造了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体制，创造了20世纪上半叶世界经济中高速发展的奇迹，造就了强大的苏联经济及其在世界的地位，为日后打败德日法西斯侵略者、拯救苏联，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而面对斯大林在20世纪实施的苏联特色的改革开放政策，世界资本主义思想界和话语体系长期失语，一言不发，是因为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巧妙地借助、利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迅速发展并壮大了自己，取得了事半功倍的历史奇效。而斯大林的经济政策和经济手腕，使美欧资本主义国家在苏联经济的高速发展中没有得到什么好处。苏联经济在那时不仅一枝独秀，气势如虹，战后还发展出了一个社会主义阵营，令美欧资本主义国家寝食难安，懊恼不已，不得不悄悄地咽下这一赔了夫人又折兵的苦果。

20世纪30年代中期，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全面爆发后，国际政治领域不断滋生出令人担忧的情况。斯大林高瞻远瞩，审时度势，为共产国际制定了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再度推动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这一策略对挽救当时处于极度危机中的中国共产党，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和作用。

以上种种，不胜枚举。难道这就是一些人常常批判的所谓的僵化的、低效率的“斯大林模式”、“斯大林体制”吗？！

这里需要再告诉读者的是，在1939年苏联共产党（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以鲜明而透彻的语言表达了如下这样一段经典思想，深深地影响了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不能要求距今45～55年以前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预见到每一个别国家在遥远的将来所发生的

所有一切历史曲折。如果要求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对每一个别国家在50～100年以后可能发生的一切理论问题都给我们做出现成答案，使我们这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后代可以安然地躺在暖炕上来咀嚼这些现成的答案，那就太可笑了。”[16] 斯大林的这一理论思想，深刻地揭示出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和建设的政策和策略产生和形成的唯一途径。毫无疑问，斯大林就是以这样的思想方法和态度领导苏联人民和苏联共产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显然，用教条主义、僵化、独裁之类的词语来评论斯大林，来评论斯大林的实践和思想，是颠倒了黑白。

那些指责斯大林是教条主义者的人，那些制造了“斯大林模式”和不厌其烦地批判所谓“斯大林模式”、“斯大林体制”的人，才是具有严重教条主义思想的人。为什么？是斯大林继承列宁的遗志，领导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创建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及其在两次世界大战这样一种历史条件下的运行体制，而这些都是史无前例的，完全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造，是无“条”可“教”的，又能“僵化”谁呢？只能是后人“僵化”斯大林的创造，根本就谈不上那时斯大林创立的新生的、年轻的苏联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及其那时的运行体制教条、僵化的问题。

斯大林的一生是在创造、创新中度过的，否则就不可能战胜对手，取得胜利。这一方面源于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深刻把握，一方面源于他总是处于国内外各种政治力量相互较量的最前沿。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认为：“斯大林同志的一切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不朽的文献。他所著的《列宁主义基础》、《苏联共产党历史》以及他最后的伟大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百科全书，是百年来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经验的综合……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和世界各国共产党人一样，是从斯大林同志的伟大的著作中去找寻自己胜利的途径的。”[17] 不难看出，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及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派别为什么那么热衷于丑化和诬蔑斯大林，因为斯大林的实践和理论思想是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活水源头。

五 斯大林问题对中国与世界的意义

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民、对中国革命、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无私帮助，被国内某些学人扣上“斯大林模式”而加以全盘否定。我们相信，善良而正直的中国人民不会忘记斯大林和苏联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和无私援助。

在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最初年代，斯大林和他领导的苏联对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的积极影响，即“斯大林因素”是中国革命和建设获得胜利和发展的一个基本因素。

在革命战争年代，大革命的兴起和北伐战争，江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西安事变，抗击日军空袭的武汉保卫战，延安整风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解散第三国际，百万苏联红军消灭日本关东军、解放中国东三省，支持中国共产党夺取和建立东北根据地，在世界上第一个承认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等等，都有着深深的斯大林印迹。

在中国革命的实践和理论方面，是斯大林发现和提出了由北伐战争显露出来的中国革命的特点，提醒共产国际领导层不要“忽略中国革命的一系列的根本问题”。他精辟地指出：“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中国革命军队的特殊意义正在这里。”他语重心长地告诫中国同志：“中国共产党人应当特别注意军队工作。” [18] 这是斯大林对中俄两国革命实践进行深入比较而作出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概括，真可谓出手不凡，立意高耸啊！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坚持运用这一卓越的思想指导中国革命，进而提出了武装斗争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之一，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主要的法宝”之一 [19] 。可以说，正是有了斯大林的启发，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才弄清楚了“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里面的具体内容，从而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政策问题。正是通过斯大林，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才掌握了活的马列主义，并最终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而斯大林生前也曾多次诚恳地告诫中国共产党人，注意避免苏联走过的弯路。不管斯大林对中国革命有过怎样的误解，他都是在一心帮助和支持中国革命，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贡献是第一位的。

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新中国成立时，中苏两国签订了《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议》，还签订了《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议》等。不是别人，是斯大林无私而慷慨地援助新中国经济建设，以年利1%的优惠条件，提供3亿美元贷款，当年即用这笔贷款向我国提供第一批大型建设项目50个。这50个项目就是后来被称为新中国156项工程中的第一批，主要是煤炭、电力等能源工业，钢铁、有色金属、化工等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苏联大力援助我国进行抗美援朝战争，除了支持武器弹药，那时保卫我国领空和与美军空战主要是依靠斯大林派出的苏联空军进行的。这样强大的经济和军事援助，是苏联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巨大破坏而国内也在恢复经济建设时期所能尽力给予和提供的。

1952年8月，周恩来总理再次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带着有关“一五”计划的设想和草案赴莫斯科访问。斯大林满腔热情地接待，表示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帮助中国。斯大林主动提出了一系列十分中肯的建议，强调中国在军事工业方面应自己生产飞机、坦克、雷达等武器装备，从修理经过装配到制造，从小到大，以利于培养干部和人才。他还诚恳地建议，最好是中国派人到苏联学习，培养自己的干部、工程师及技术工人。1953年，中苏签订了关于苏联援助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协议和议定书，苏联承诺援助中国新建和改建一大批规模巨大的工程项目，即在1953～1959年期间，援助我国建设与改建91个大型企业。1950～1959年，我国从苏联引进的技术设备投资总计76.9亿旧卢布（折合人民币73亿元）。10年中，来我国帮助建设的苏联专家有8500多人，向我国提供的各种数据和设计图纸仅1953年就达23吨，1954年为55吨，从指导建筑安装、开工运转，培养技术干部，一直到新产品研制，都给予了全面、系统的指导。应该说，这是世界现代史上一次前所未有的最全面、最无私的技术转让，使我国的工业技术获得了一次史无前例的突飞猛进的提高和发展。与此恰恰相反的是，赫鲁晓夫撕毁援华合同，给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严重损失。

斯大林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第一个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作出理

论总结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他的理论贡献在中国得到了积极的反响。1958年底毛泽东向全党发出读书倡议，要求认真学习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分析经济建设出现的“一大堆混乱思想”，“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20] 。毛泽东一再告诫全党：“俄国产生了列宁主义，经过十月革命变成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建设了社会主义，打败了法西斯，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工业国。它有许多东西我们可以学。当然，是要学习先进经验，不是学习落后经验。”[21] 正是这样的学习，帮助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思考和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现象，探索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规律，培养了一代经济理论人才，从而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做好了思想准备和干部准备。

毋庸置疑，在新中国初创的穷苦年代，斯大林帮助了我国，而且是在苏联战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国内建设也急需资金并不富裕的情况下，节衣缩食，支持了中国等一大批新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向我国索取过什么“知识产权”，当代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就是在那时苏联的援助下起步的。事实胜于雄辩，难道我们中国人不是感谢反要怨恨斯大林吗？至于后来两国闹翻了，那笔账要记在赫鲁晓夫身上。

毛泽东通晓斯大林问题的重要性和尖锐性，深谙其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巨大作用，因而把斯大林比作一把“刀子”[22] ，真可谓寓意精深。

20世纪60年代，中苏两党发生震动世界的论战，斯大林问题是导致两党矛盾的一个主要议题。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指出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是完全错误的，“是别有用心的”。自那时以来，世界关于斯大林问题的争论至今不断，正如当时毛泽东就指出的那样，一切修正主义分子“时时刻刻感觉到斯大林的阴魂不散，在威胁着他们”[23] 。

不论斯大林对苏联，对别的国家和民族，有过怎样的失误、错误，也改变不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20世纪的人类发展道路既因苏联

兴而变，又因苏联亡而变，这两种相反的变化都这样或那样与斯大林问题密切联系。斯大林问题不愧为20世纪之魂。虽然世界早已进入了21世纪，但是某种神秘的20世纪之物还在纠缠着人们，依然笼罩在20世纪的“阴霾”之下。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当年毛泽东说的，斯大林问题，这样一个引起了世界各国一切阶级反响的世界范围的大问题，至今没有作出一个科学的定论。只要世界一天不接受斯大林问题——20世纪最大的遗产，就难有安宁。

那么半个世纪以来议论纷纷、迷雾重重的斯大林问题到底是什么呢？它的核心是什么呢？不同阵营的人们所争论的焦点到底在哪里呢？长期以来，西方及戈尔巴乔夫“改革”散布的“斯大林模式”向听众灌输了一大堆不着边际的假话、瞎话，“忽悠”了不少人，致使是非难辨。其中掩盖着这样一个事实，即苏联历史以全盘否定斯大林的苏共二十大为界，前期的斯大林时代以两次世界大战为背景，是社会主义苏联从弱国奋起、走向繁荣强大的历史；后期的和平建设年代，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都以否定斯大林作为自己治党治国的信条和政治动员，是苏联衰落下来直至亡党亡国的历史。因而在关于苏联的立国亡国中不存在一个一概而论的“斯大林模式”或“苏联模式”。关于苏联亡国原因的辩论所涉及的斯大林问题，不是什么玄妙的、神秘的问题，一言以蔽之，就是渗透、隐藏在苏共党内的资产阶级分子通过否定斯大林来否定苏共曾坚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通过否定斯大林来否定和放弃斯大林带领苏联人民曾经开辟出来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和理论，他们从中发展壮大成为一个披着苏联共产党外衣的资产阶级，已经不再需要共产党这个外衣了，与党外资产阶级联合，共同毁灭了苏联共产党和苏联。苏共亡党与苏联解体悲剧的根本原因不是别的，就在这里。

---

[1] 李伟，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2] 《关于斯大林问题——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3年9月13日《人民日报》。

[3]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办公室编《2007

年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建设工程参考资料选编》，学习出版社，2008，第443页。

[4] 陆南泉：《有关斯大林模式若干重要问题的再思考》，2007年6月21日《社会科学报》。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03～204页。

[6] 《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1998，第797页。

[7]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办公室编《2007年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建设工程参考资料选编》，学习出版社，2008，第443页。

[8] 《斯大林文集（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85，第676页。

[9] 《斯大林文集（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85，第196页。

[10] 〔俄〕《我们同时代的人》1997年第5期，第40页。

[11] 〔俄〕1999年3月19～22日《真理报》。

[12] 〔俄〕Ф.丘耶夫：《莫洛托夫——掌握一半权力的统治者》，俄罗斯，奥尔马出版社，2000，第618～619页。

[13] 转引自〔俄〕尤·瓦·叶梅利亚诺夫《在权力的顶峰》，石国雄、袁玉德译，译林出版社，2006，第611页。

[14] 《斯大林文集（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85，第568页。

[15] 《斯大林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79，第545、549、577、585页。

[16] 《斯大林文集（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85，第279页。

[17] 毛泽东：《最伟大的友谊》，1953年3月9日《人民日报》。

[18] 《斯大林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79，第483、487页。

[19]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605～606页。

[2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432页。

[2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

91页。

[22]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第321～322页。

[23]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第369～373页。

观照苏联剧变的一个视角

——列宁利用资本主义的立场及启示

苑秀丽 [1]

一 列宁利用资本主义的立场

列宁领导苏俄实行新经济政策，开始了学习资本主义、利用资本主义的实践，这是结合俄国现实而对社会主义建设方式的大胆创新。新经济政策的实行使苏维埃共和国的政治形势很快稳定下来，经济得到恢复并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工农联盟在新的基础上得到巩固。但是，列宁的利用资本主义的思想并不为党内外广泛接受，党内外出现了许多议论和担忧。列宁高度重视这些思想倾向，从多方面阐述了他的观点，保证了社会主义事业的稳定和发展。

1.反对空谈共产主义理想

列宁提出的正确对待并积极学习利用资本主义的思想在党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许多人不能理解，认为学习西方资本主义“不是我们革命家干的事”。有人说：“我们可以自己想办法恢复生产，干吗把外国人叫来。”一些工人、农民说：“我们赶走了地主和资本家，又要把外国的资产阶级放进来。”有人说：“我们自己能搞好。”“我们大家吐点口水也能把他们（外国资本家）淹死。”一些人对租让制疑虑重重，提出：“我们农民愿意再受三年饥寒，再承担三年义务，只要你们不要用租让的办法出卖我们的俄罗斯母亲。”[2] 有人甚至极端地认为，凡是沾染上资产阶级的一切东西都是和社会主义不能相容的，都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必须抛弃的。当时有些国外的共产党人也表现出极大的不理解。在1922年2月举行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一次扩大全会上，法国共产党代表团的同志们不理解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和意义。他们认为新经济政策将导致资本主义在俄国复辟，会削弱国际革命运动。他们感到很悲伤，在会上失声痛哭起来。

列宁在肯定和赞扬了广大党内外人民的爱国主义情绪的同时，批评了这些错误看法。列宁指出，他们的这种行为是出于“最崇高的共产主义感情和共产主义志向”，但它是很不应该的。“也许在他们看来，这实在难于理解，只好放声大哭。不管怎样，我们是没有工夫伤感的。”[3] 列宁早在1918年就曾驳斥过那种认为“不向资产阶级学习也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观点。他这样说道：“我认为，这是中非洲居民的心理。我们不能设想，除了建立在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还有别的什么社会主义。没有邮电和机器的社会主义，不过是一句空话而已。”[4] “只有那些懂得不向托拉斯的组织者学习就不能建立或实施社会主义的人，才配称为共产主义者。因为社会主义并不是臆想出来的，而是要靠夺得政权的先锋队去掌握和采用托拉斯所造成的东西。我们无产阶级政党，如果不去向资本主义的第一流专家学习组织托拉斯式的即像托拉斯一样的大生产的本领，那便无从获得这种本领。”[5]

列宁指出，对于共产主义来说，没有什么东西比“我们自己能搞好”这种共产党员的自吹自擂更有害、更危险的了。他说：“如果认为我们只用清白的共产党人的双手，不要资产阶级专家帮助，就能建成共产主义，那是一种幼稚的想法。”[6] 列宁认为，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抽象地对立起来而不研究苏俄的现实情况是非常有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苏维埃俄国依靠工农蓬勃的热情取得了无数的胜利，但是经过了4年世界大战和3年国内战争，它已经被打得遍体鳞伤，就像一个“被打得半死的人”。由于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从这样的基础展开的，所以它需要用“拐杖”，这里的“拐杖”指的是资本主义。列宁指出：“谁如果以为我们可以不要拐杖，那就是说他什么都不懂。”[7]

列宁认为，“只靠共产党员的双手”来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十分幼稚的想法。列宁反对只凭朴素的阶级情感，拒绝与资本主义进行经济往来的理想主义。苏维埃俄国应当大胆承认还有很多东西可以而且应当向资本家学习。列宁说：“谁能在这方面取得最大的成绩，即使是用私人资本主义的办法，甚至没有经过合作社，没有把这种资本主义直接变为国家资本主义，那他给全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的益处，也比那些只是‘关心’共产主义纯洁性，只是为国家资本主义和合

作社起草规章、条文、细则，而实际上却不去推动流转的人，要多得多。”[8] 按列宁的意思，布尔什维克党带领人民在一个遭到了难以置信的破坏和缺乏物质前提的国家里，胜利地实行了进攻，获得了这么多不平常的胜利。但是，社会主义的实现并不能仅仅依靠革命和理想，为了保证社会主义的胜利果实，必须正视现实，采取合乎现实的途径和方式来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推进，而不能依赖理想主义。列宁的思想对党内外端正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认识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2.坚持有原则的退却

新经济政策表现了列宁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思想，列宁明确地把新经济政策定性为“退却”，并且是有原则的“战略退却”。在批评种种错误言行的过程中，列宁阐述了新经济政策蕴涵的“战略退却”的性质和意义。列宁指出这种“战略退却”是用迂回的方式前进，通过实行新经济政策，通过学习利用资本主义可以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增强国力，达到建成社会主义的目的。

一些人迷信资本家的威力，不相信社会主义发展的可能性，甚至主张对国内外私人资本作巨大让步，把实施新经济政策看成单纯的后退。列宁指出，各种反对派对新经济政策的态度表明，他们既不了解新经济政策的实质，也不了解新经济政策的退却性质。他反复强调实行新经济政策是为了进攻的退却。列宁解释道：“这个政策之所以叫新经济政策，是因为它在向后转。我们现在退却，好像是在向后退，但是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先后退几步，然后再起跑，更有力地向前跳。”[9] 实行新经济政策绝不是要把社会主义阵地让给资产阶级，而是用“新的迂回方法”来夺取一些阵地，实行退却，以便更有准备地再转入对资本主义的进攻。列宁指出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并不像党和军队遭到失败被迫实行的那种退却，这种退却绝不是败军溃逃，退却“是因为我们在经济进攻中前进得太远了，我们没有给自己留下足够的基地”[10] 。列宁强调这种政策转变是适应国际国内的现实形势而实行的。

从“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的重大转折体现了列宁的灵活性，将新经济政策看做不得已而实行的“退却”体现了列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性。对新经济政策“退却”性质的清醒认识使列宁一再提醒全党，资本主义的发展威胁着苏维埃政权，必须清楚地意识到这种政治上的危险性。虽然在饥荒严重、工业破坏的情况下，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保持不住1917～1921年所获得的全部阵地，已经被迫放弃了许多阵地，但是无论如何，经济政策方面的退却绝不允许牵带政治原则的退却。经济上的灵活性和政治上的原则性要兼顾，要把握好“度”，新的政策尽管是必要的、积极的，毕竟是向着自己的最终发展方向的后退运动，而不是向着最终方向的前进运动，发展得好才能促进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如果把新经济政策的这种退却当成前进，当成社会主义，那就只能丧失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导致向资本主义的狂奔。

3.正视利用资本主义的危险

新经济政策提出后，一些人提出：布尔什维克的新经济政策到底是什么，是演变还是策略？一些人议论说：“这个苏维埃政权在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呢？共产党人说是共产主义国家，并要人相信这是一种策略：布尔什维克在困难关头把私人资本家糊弄过去，然后再达到自己的目的。布尔什维克可以爱怎么说就怎么说，但实际上这并不是策略，而是演变，是内部的蜕变，他们一定会走向通常的资产阶级国家。”[11] 他们认为，苏维埃政权“正在滚进通常的资产阶级泥潭，那里只不过摇动着几面写着各种空话的共产主义小旗帜罢了”[12] 。苏俄国内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也学着资产阶级的腔调说，布尔什维克走回头路，又回到了资本主义，这样他们就完蛋了。国际资产阶级也希望这一斗争的胜利属于他们。美英法等国的资产阶级报刊把向新经济政策的过渡说成“苏维埃制度的破产”和资本主义在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彻底复辟，说成“革命的共产主义阶段的结束”，英国首相劳合·乔治竟然迫不及待地在议院宣布：“共产主义制度完全崩溃了”，布尔什维克抛弃了“马克思主义”[13] 。

列宁非常重视这些言论，他认为这些人说出了真话，指出了苏俄

面临的危险，党和国家必须注意到，苏维埃俄国在战争中不曾被武力战胜，但却在和平环境中经历着考验。新经济政策意味着苏维埃俄国要在经济战线上同资本主义作残酷的斗争。列宁坦率承认“退却”蕴藏着巨大的风险。他说：“这个新经济政策所采取的每一个步骤都包含着许许多多的危险。”[14] 资本主义在苏维埃俄国开始发展是不能回避的事实，谁想避开和抹杀这个事实，谁就是用空话安慰自己。列宁认为应该增强对资本主义的警惕，资本主义的恢复、资产阶级的发展和资产阶级关系在商业领域的发展等等，这些就是经济建设遇到的危险，在这一点上切不可有丝毫的糊涂。

现实发展中暴露出的问题验证了列宁的担忧，特别是在新经济政策实行一年后，列宁对现实的发展很不满意，他表现出深深的忧虑：投机倒把、间谍活动，西方的思想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以及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攻击等随之涌进。这些问题的滋生显示出工人阶级虽然足够的政治权力、国家掌握在手中，但是新经济政策的实行并没有按照工人阶级的意志行动。“它是怎样行动的呢？就像一辆不听使唤的汽车，似乎有人坐在里面驾驶，可是汽车不是开往要它去的地方，而是开往别人要它去的地方……”[15] 列宁指出这是新经济政策实行一年后的政治教训。而苏维埃共和国的现实决定了新经济政策将是一个长期的、持续多年的政策，无产阶级必须总结经验重新上路。苏维埃俄国需要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与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的一切先进的科学技术和资产阶级文化中的精华，但绝不需要资本主义任何腐朽的东西，在这一方面无产阶级是不会作出丝毫让步的，所有的共产党要勇敢地投入这场“特殊的战争”。

列宁对租让等政策带来的影响及需要保持的警惕也了然于心：“在一个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而且是一个落后的弱国会引起什么危险，我们决不视而不见。只要我们苏维埃共和国还是紧挨着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一个孤立地区，那种认为我国经济完全可以独立和各种各样的危险已经消失的想法，就是十分可笑的幻想和空想。”[16] 列宁坚信只有勇敢直面这些危险才能捍卫住伟大的苏维埃政权。由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对立的，因此，可以将签订租让合同看成开战的条约。他说：“但是签订这个条约对我们的危险性比较

小，对于工人或农民来说负担也比较轻，总比人家用装备精良的坦克和加农炮来进攻我们好得多，因此我们应当采取一切办法，以经济上的让步为代价来发展自己的经济力量，促进苏俄经济恢复的事业。”[17] 这样才能够捍卫一个比它周围的资本主义敌人弱得多的共和国。“我们的任务是保证俄国有恢复经济所必需的工具和资金，因为我们一旦得到这些东西，我们就会牢牢地站立起来，那时任何资本主义敌人对我们来说都是不足惧的。这就是指导我们实行租让政策的观点。”[18]

总之，列宁认为，只要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存，危险也就存在，并且不能避免，但是也不能夸大，只要站稳脚跟，就能克服这些危险。列宁坚信新经济政策是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社会主义的政策，不是利用资本主义来搞垮社会主义的政策。虽然资本主义关系的加强就是危险性的增强，但是这是当时俄国现实的选择，没有别的办法。经济的发展将改善无产阶级的生活状况，生产状况的改善，大工厂的开工，都会大大巩固无产阶级的地位。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的滋长没有什么可怕的，反而是经济状况的恶化会动摇苏维埃政权。这样列宁将无产阶级政权的巩固建立在坚实的经济基础之上。列宁认为，此时此刻，期望不利用资本主义而直接建设社会主义只能是梦想。他说：“你们能给我指出什么没有危险的革命道路、没有危险的革命阶段和革命方法吗？”[19] 共产党人在俄国必须清醒地、有意识地以“退却”、“让步”、“妥协”等方式谋求发展。

4.坚信利用资本主义并不可怕

新经济政策实行后，一些人“谈资本主义色变”，一些人陷于惊慌失措。许多优秀的布尔什维克不理解，认为实行租让制等是放弃革命成果，放弃阵地，是对小资产阶级的投降，是退回到资本主义，会导致苏维埃政权的灭亡。究竟利用资本主义对于苏维埃国家可怕不可怕呢？列宁坚定地作出了回答：发展和利用资本主义存在一定危险，但是，资本主义对于我们没有什么可怕的。列宁相信，依靠无产阶级拥有的政治力量和日益强大的经济力量，俄国必然会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首先，只要无产阶级牢牢掌握着政权，就不怕这种危险。新经济政策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苏维埃俄国社会制度方面的任何东西，只要政权还掌握在工人手里，就不可能有任何改变。“我们容许资本主义存在，必须容许其存在。如果说它丑恶、不好，那我们可以改造它，因为政权在我们手里，我们没有什么可怕的。”[20]

第二，国家的经济命脉掌握在无产阶级国家手中。列宁指出，主要的经济力量操在苏维埃国家手中，一切具有决定意义的大企业、铁路等，都操在国家手里。不管租赁在某些地方得到多么广泛的发展，但总的说来它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它的比重总的说来是微乎其微的，俄国无产阶级国家掌握的经济力量完全足以保证向共产主义过渡。列宁在《论粮食税》中鲜明地表达了这一点：“只要无产阶级牢牢掌握着运输业和大工业，无产阶级政权在这方面就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21]

第三，坚决维护对外贸易垄断制。对外贸易是苏维埃俄国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列宁从维护新生的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政治独立和经济利益，有效利用对外贸易来获得经济恢复和发展所必需的设备和生活用品出发，坚持对外贸易垄断。

列宁认为，苏维埃俄国与资本主义国家建立正常的、平等的贸易关系是十分必要的，通过对外贸易协定来购买恢复工业和运输业以及实行电气化所需要的东西，与通过租让制来达到同一目的相比，对于苏维埃俄国更为有利的，不会产生租让带来的危险。但是在实际中，应当采取什么政策，才能达到既发展对外贸易又不带来危险的目的，是一个现实问题。十月革命后不久，1917年12月底，列宁在银行国有化的法令草案中明确宣布对外贸易为国家垄断。1918年4月，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中，第一次阐述了对外贸易垄断制对于维护国家经济独立的重要意义。在列宁看来，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掌握国家经济命脉，必须在实行土地国有化，工业、交通运输以及银行国有化的同时，实行对外贸易垄断制。

由于实行新经济政策，扩大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联系，俄共

（布）和苏维埃领导人在对外贸易垄断的必要性问题上出现了意见分歧。索柯里尼柯夫、布哈林、皮达可夫等人认为，为了扩大对外贸易和推行租让政策，应当放弃对外贸易垄断，让地方、企业甚至个人都有进行对外贸易的自由，实行保护关税政策；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则主张放宽对外贸易垄断。列宁坚持维护对外贸易垄断。列宁从帝国主义时代的国际经济关系出发，阐述了对外贸易垄断的重大意义。他说："在帝国主义时代，在国与国之间贫富悬殊得惊人的时代，任何关税政策都不会有效果……任何一个富有的工业国都能够把这种关税保护完全摧毁。为此，它只要对输入俄国的那些我国征收高额关税的货物给予出口补贴就行了。这方面所需要的钱，任何一个工业国都是绰绰有余的，而采取这种措施之后，任何一个工业国都肯定能摧毁我们本国的工业。"[22] 看到了危险的存在，列宁特别强调对外贸易垄断的重要性，把它看成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中的主要命脉之一。他认为，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保证苏维埃国家的经济独立，保证本国工业的恢复和发展。

可以看到，在列宁的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中，坚持社会主义是原则，发展社会主义是目的，向资本主义学习则是实现目的的手段和途径。列宁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相统一。列宁在利用资本主义问题上始终保持一分清醒和坚定，这对于当时处在资本主义包围中的唯一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列宁满怀期望改变俄国的落后面貌，巩固社会主义政权，使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

列宁对新生的苏维埃俄国与世界资本主义之间关系的正确认识和处理是开拓性的、符合现实的成功探索，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宝贵财富。但是，由于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由于列宁之后的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思想认识等原因，列宁的正确思想并未得到继续贯彻和执行。

二 "新思维"与苏联剧变

苏联剧变后，有研究者在探索剧变原因时将苏联长期与资本主义

对立、抗衡，没有利用资本主义看做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如何看待这样的观点呢？这种认识有合理之处。苏联取得过令人瞩目的成绩，向世界昭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是，苏联在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却没有跟上发展大潮，没有及时进行改革，没有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导致了经济发展速度下降、经济效益差等问题，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差距逐步拉大。经济问题累积了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等，严重影响了广大人民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因此，回顾历史，不可否认，斯大林及其后的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处理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关系上存在失误。但是，更值得深思的是，苏联曾是与资本主义世界相抗衡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在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旗帜下，苏联却不复存在了。怎样看待这个问题呢？我认为，戈尔巴乔夫对苏联与世界资本主义关系的认识和处理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原因，戈尔巴乔夫高举加强与世界资本主义往来的旗帜而没有认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两种根本对立的社会制度，是戈尔巴乔夫“新思维”指导下的改革及对外政策没有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改革方向，断送了社会主义。列宁在提出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时，始终没有忽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依然存在着“谁战胜谁”的问题，一再告诫全党和全国人民要提高警惕，要警惕资本主义的滋生和进攻，要警惕社会主义制度被颠覆。多年以后，列宁的担忧变成了现实。

苏联从诞生起就受到国际资本主义的包围、封锁和进攻，国际资本主义企图扼杀社会主义，但始终没有成功。随着戈尔巴乔夫推行基于“新思维”的改革，美国开始调整政策。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涉及对世界发展新趋势的基本估计以及苏联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反映了戈尔巴乔夫对时代和资本主义世界的新认识，以及苏联在这种形势下作出的外交政策调整。改革之初，戈尔巴乔夫对社会主义制度特别是经过改革的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充满信心。他说：“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在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竞赛是必然的。但是，这种竞赛能够并且应当控制在必须以合作为前提的和平竞赛范围内。哪一种制度好，应当由历史作出判断。历史能判断一切。让各国人民自己去判断，哪一种制度更好，哪一种意识形态更好吧。让和

平竞赛来决定这一切吧。让各种制度来证明自己有能力满足人的利益和需要吧。地球上的国家和人民是大不一样的。不一样，甚至是一种好现象。这对竞赛是个推动。这种理解是同和平共处的概念相协调的。这也是辩证的对立统一。”[23] 戈尔巴乔夫希望通过开辟与世界各国的接触和交流为苏联的改革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戈尔巴乔夫提出，要在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中实行彻底的改革，就必须在对外政策方面进行相应的改革，创造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否则是不可能的，“作为开头，至少也得把‘冷战’的积雪扫除干净”[24] 。

戈尔巴乔夫希望改善苏联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在稳定的国际环境中进行国内的改革与建设，同西方大国建立稳定的关系，确保苏联在国际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影响。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戈尔巴乔夫提出要注意外交政策的灵活性。戈尔巴乔夫认为，世界已今非昔比，世界上的新问题再不能按过去留下来的思维方式来解决了。他说：“世界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但又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实质上是一个整体的世界的构想。我们在这一基础上制定自己的对外政策。诚然，在社会选择、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生活方式上，我们各不相同。当然，差异将继续存在。难道我们就因此而决斗吗？为了全人类的利益，为了地球上的生命，我们跨过把我们隔开的障碍岂不是更正确吗？我们作出了自己的选择，用说到就做到的声明和具体的行动确立了新的政治思维。”[25] “新思维的核心是承认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更确切地说，是承认人类的生存高于一切。”[26]

戈尔巴乔夫提出，必须破除几十年来使苏联与外部世界对立，对经济、社会意识、科学和文化，对国家的知识潜力都产生了负面影响的扭曲观念。“我们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在当代相互依存的世界，一个闭关锁国、思想封闭、与全球的发展隔绝的社会，是不可能进步的。今天，任何一个社会，只有在和其他社会互动而又保持本色时，才能够得到充分发展。”[27] 戈尔巴乔夫没有料到，在纷乱复杂的世界上保持“本色”有多么难。实际上，对一些资本主义国家而言，追求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而不是整个世界的普遍繁荣和发展。

戈尔巴乔夫开始在内政外交上推行基于“新思维”的改革，这使美国认为苏联出现了“符合美国利益的变化”。从1985年开始，里根和戈尔巴乔夫先后进行了多次高级会晤，双方在一些问题上取得了共识。里根政府看到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内外政策上的改变，并大加赞扬。1988年6月，里根在莫斯科大学演讲中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给苏联社会带来了自由的新风，是苏联历史上充满希望的时期，扬言要把美国式的自由传遍整个苏联社会[28]。后来，当有人在莫斯科问里根他是否还继续认为苏联是“邪恶帝国”时，他回答：“不，现在已时过境迁。那个时代已经过去。”而当有人问他，谁改变了形势，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这一功绩属于作为国家领导人的戈尔巴乔夫[29]。

戈尔巴乔夫提出“新思维”，以此为指导制定对外政策，排除意识形态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但西方国家并未忽视意识形态。美国著名外交家杰克·马特洛克（1983～1987年任里根总统与苏联关系问题主要顾问，1987～1991年任美国驻苏联大使）指出，里根总统对意识形态特别感兴趣。他说：“作为驻苏联大使我知道，意识形态是重要的。”[30]由于意识形态的重要性，1988年苏联领导层内关于“全人类利益”的争论引起了美国大使馆的注意，虽然这些争论在当时主要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马特洛克在给布什总统的三封电报中提出了如下建议：“在我们面前出现了历史性机遇，使我们可以检验苏联在多大程度上希望与其余世界建立新的相互关系并加强苏联的那些可以走向‘更实用的’经济和更多元的社会的趋势。”马特洛克提出，美国对苏联的政策是应当支持改革，因为苏联政治制度和社会的民主化符合美国的利益[31]。美国开始积极支持戈尔巴乔夫的改革。

戈尔巴乔夫主张国际关系非意识形态化，美国则继续奉行意识形态对立，推行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政策。1989年5月12日，布什总统在关于“苏联的变化”的讲话中宣称，战后以来“一些英明人物——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范登堡和雷伯恩、马歇尔、艾奇逊、凯南巧妙地制定了遏制战略”，几十年同苏联的交道中“这种遏制起了作用”[32]。布什提出超越遏制战略，这一战略表明美国将长期的“以压促变”的遏制战略转变为通过与对手的接触使其发生改变的“以接触促变化”的战略，以达到战胜苏联以至整个社会主义世界的目的。美国的目标是

不仅要遏制苏联的扩张主义，而且要苏联重新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员，“鼓励苏联朝着开放社会演变”，建立一个“在民主价值观上的新苏联”。美国的苦心最终没有白费。从1989年开始，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相继陷入剧烈的动乱之中，执政的共产党在所谓的“民主化”浪潮中纷纷垮掉。1991年，苏联解体，西方终于实现了“不战而胜”。

苏联剧变令全世界震惊，也引起了各方面的思考。苏联剧变的发生，既有内因，又有外因，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其中，戈尔巴乔夫对苏联与世界资本主义关系的认识和处理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原因。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对苏联所处时代的重新认识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他看到了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看到了人类面临许多需要共同努力解决的问题，呼吁加强国际合作；提出反对军备竞赛、反对核威胁；提出国际关系非意识形态化，提出用“新的眼光、新的态度和新的办法”来看待处理国际关系等一系列正确主张和建议，这有益于改善苏联的外交环境和推进国际关系的良性发展。但是，“新思维”中更多的是一些似是而非甚至错误的认识，在国际范围内依然存在着阶级对立与斗争的情况下，将抽象的“全人类的共同利益”置于阶级利益之上，混淆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发展道路的本质区别。现实表明，在世界上仍然存在对立的社会制度的情况下，在充满矛盾和斗争的世界中，一味宣扬“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全人类利益高于阶级利益”的“新思维”，呼喊“民主化、公开性、政治多元化”的“革命性倡议”，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政权来说只能是国家解体，共产党下台。

---

[1] 苑秀丽，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

[2] 《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6，第135页。

[3] 《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第86页。

[4] 《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第252页。

[5] 《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第289～290页。

[6]《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85，第129～130页。

[7]《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454页。

[8]《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513页。

[9]《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第296页。

[10]《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720页。

[11]《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第91页。

[12]《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第92页。

[13] 参见〔苏〕特鲁哈诺夫斯基编《国际关系和苏联对外政策史》（第1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第186页。

[14]《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第231页。

[15]《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第85页。

[16]《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6，第135页。

[17]《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6，第116页。

[18]《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6，第117～118页。

[19]《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607页。

[20]《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第115页。

[21]《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524页。

[22]《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741页。

[23]〔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第187页。

[24]〔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下），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第719页。

[25]〔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第174～175页。

[26]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第184页。

[27]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下），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第720～721页。

[28] 刘金质：《冷战史》（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第1289页。

[29] 〔美〕杰克·马特洛克：《从华盛顿看到的改革（1985～1991年）》，载于《奔向自由——戈尔巴乔夫改革二十年后的评说》，李京洲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第143页。

[30] 〔美〕杰克·马特洛克：《从华盛顿看到的改革（1985～1991年）》，载于《奔向自由——戈尔巴乔夫改革二十年后的评说》，李京洲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第143页。

[31] 〔美〕杰克·马特洛克：《从华盛顿看到的改革（1985～1991年）》，载于《奔向自由——戈尔巴乔夫改革二十年后的评说》，李京洲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第145页。

[32] 刘金质：《冷战史》（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第1383页。

苏联解体的历史原因

刘先松 张海 [1]

一 苏联共产党蜕化为特权阶层的代表，被人民群众无情抛弃

长期以来，苏共党内形成高度集权的官僚体制，党逐渐脱离群众。丧失民心，“被它一直宣称所代表的工人阶级和苏联人民所抛弃” [2] 。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实质是苏共领导体制的高度集权。这种权力垄断并非全党对权力的垄断，更不是无产阶级对权力的垄断，而是党的上层和领袖人物对权力的垄断。这种垄断需要制度保证，官僚体制便应运而生。党的日常工作机关集中了巨大权力，由于党内缺乏民主，这些机关不受任何监督。一切权力集中于党的机关，党的机关权力又集中于书记手中，层层集中，逐渐变成个人领导，使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这种官僚主义体制逐渐形成自己的特殊利益，越来越脱离群众，使党的威信下降。1990年6月，《西伯利亚报》曾作过“苏共究竟代表谁的利益”的民意调查，结果表明代表工人阶级的仅占4%，代表全体人民的仅占7%，代表合理化党员的仅占11%，而代表官僚和干部的占85% [3] 。

苏共缺乏党内民主思想和执政为民意识，严重脱离群众。党的领导层出现不受党纪国法约束、不受党组织和党员监督的特殊个人和组织，广大党员权利遭到削弱。压制党内不同意见，形成家长制、“一言堂”，集体领导原则遭到破坏。在干部工作中实行委任制及高级领导人终身制，缺乏党内民主，干部只对上级负责，不对普通党员群众负责，以权谋私，生活待遇特殊化，成为脱离群众的特权阶层。在勃列日涅夫后期，事实上的终身制确立，特权阶层最终形成。这个阶层占全国总人口的15%左右，享有各种特权，生活奢侈腐化。其子女可轻而易举地跻身待遇优厚部门，很快走上领导岗位，享受着权力带来的好处。官僚集团控制着社会各个领域，脱离人民群众，官僚主义严重，贿赂成风，腐化堕落。正如中国学者所说，苏共“党内形成一个

具有特殊利益的不受党内外群众监督和制约的特权阶层。这就是日益积累起来最后导致苏联解体的社会力量”[4]。1970～1972年，在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想被选上区委第一书记，需向共和国党中央领导人交纳15万～20万卢布，获得部长职位需行贿10万～25万卢布，要获得区警察局局长职位需交5万卢布。勃列日涅夫死后，苏联处理了一大批领导干部贪污受贿案件，如勃列日涅夫女婿、前内务部第一副部长丘尔巴诺夫利用职权受贿9万多卢布；在乌兹别克共和国贪污大案中，从党中央书记、部长会议主席、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内务部长及3名副部长到基层党的书记、政府官员、企业领导人等都参与了此案，贪污的总金额达20多亿卢布[5]。人民群众从不满发展到怀疑马克思主义和对党不信任，这种情绪被敌对势力所利用，造成了严重后果。

苏共完全丧失群众支持是在戈尔巴乔夫时期。由于苏共一系列路线错误，造成国内经济恶化、民族矛盾尖锐，人民群众丧失对苏共的信任，大批党员退党。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总路线后，到1991年1月党员由1948.78万人降至1651.61万人。到1990年，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有1/5的车间党组织、1/2的党小组解散或停止活动。由于修改宪法，苏共丧失执政地位。1990年底，苏共在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格鲁吉亚等共和国沦为在野党，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大城市市长也落入反对派之手。据1991年初民意调查：苏联政府的支持率仅有13%，不支持率达73%，苏共的支持率仅有14%，苏共已丧失群众基础。1991年6月，俄罗斯公布举行总统选举结果，被推上总统位置的是1989年退出共产党、1991年公开声明反共的叶利钦，所得选票（57.3%）远高于竞争对手俄共雷日科夫（16.85%）[6]。苏联解体根本原因是苏共脱离群众，没有真正做到执政为民。难怪有人说苏联共产党是“是唯一一个在自己葬礼上致富的政党”[7]。

二 改革出现路线性错误，背离了社会主义原则

改革背离社会主义方向是苏联演变的根本原因。苏共在改革中推行了错误路线，背离了社会主义方向，放弃了马列主义指导，放弃了

共产党的领导，改变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性质，导致改革失败、苏共亡党、苏联解体。

1985年，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共总书记。当时，苏联社会问题日益严重，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弊端愈益暴露，传统体制已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社会发展停滞不前。戈尔巴乔夫提出全面改革，1986年苏共二十七大通过《加速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决定进行经济改革，以“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有计划地、全面地完善社会主义”。这一时期，苏共注意力基本上集中在经济方面，重点是探索经济加速发展途径，完善企业经营管理体制，扩大企业自主权。但加速战略侧重经济增长速度，没有切实可行的措施步骤，党内思想不统一，改革不能到位，结果使经济结构更加不合理。1988年初，加速战略失败。微观改革也收效甚微，虽然取消指令性计划指标，代之以控制数字、国家订货等间接计划手段，但企业仍无法自由采购原材料、无权自由定价和自由销售。到1990年底，95%的产品和价格仍由国家统一调拨和规定，企业无法搞活。企业自主权扩大后，政策不配套，企业利润增大，往往利用权力谋取小集团利益。国家超计划增发货币，职工报酬增长大大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长，物价不断上升。

更严重的是放弃政治斗争，导致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日渐坐大。戈尔巴乔夫提倡毫无限制的“公开性”、“民主化”，企图以发动群众揭露体制弊端、揭露苏共历史上的阴暗面。结果各种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纷纷起来攻击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日渐形成强大力量，开始左右改革方向。在这种情况下本应调整政策纠正失误，可戈尔巴乔夫把困难和错误根源归因为斯大林体制，开始转向政治改革。1988年2月，苏共中央全会提出政改构想，除全面民主化外，还包括建立社会团体的发达体制，使各级苏维埃成为国家权力与管理的全权中心。6月，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革总目标，把公开性、民主化和社会主义多元论看做三个革命性倡议，决定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实行国家权力机构和地方各级苏维埃的自由选举，为反共、反社会主义和民族分离主义势力的崛起打开方便之门。一时，社会上出现6万多个非官方组织，苏共党内和社会自由化思潮泛滥。在1989年的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选举

中，这些团体的代表人物通过自由竞选进入最高国家立法机构，与苏共党内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民主纲领派遥相呼应，在苏联议会内外展开斗争，要求实行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戈尔巴乔夫步步妥协退让，1990年2月苏共中央全会和随后的苏联人代会决定修改苏宪法，取消有关苏共领导地位的规定。同年7月，苏共二十八大通过《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纲领性声明和新党章，提出实行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苏共坚决放弃政治垄断”和“意识形态上的垄断主义”，将同其他政治势力平等竞争。苏联政治体制及苏共的作用地位发生根本变化，国家最高权力由苏共中央政治局转向议会，最后转到总统手中，政党制度由一党制向多党制转变。经济领域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实行经济私有化。

改革背离社会主义方向，关键的错误就是指导思想多元化、多党制。指导思想多元化实质上是指苏共不再把马列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不再把共产主义作为奋斗目标。戈尔巴乔夫搞全盘西化，首先要取消党的马列主义指导思想。1991年7月全会报告说：“过去党只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鼓舞自己的源泉，而这个学说被极度歪曲，以适应当时的实用主义的方针，变成了一种圣经式的条文”，要“与过去的意识形态教条和陈规俗套坚决决裂”。戈尔巴乔夫主张毫无保留和限制的公开性，提倡完整和无条件的民主，带头否定苏联70年历史，攻击马克思主义已遭到失败：“几十年来强加给党的社会主义原来那种理论和实践模式已遭到战略性的失败。”把民主化和公开性同指导思想多元化、政治多元化联系起来：“现在必须使我们的思想库内包括国内外社会主义和民主思想的一切财富。”1990年苏共二十八大提出：修改党章，删去把马列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条文，苏共“坚决放弃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垄断主义”。1991年苏共中央全会通过《苏共纲领》，只字未提马克思列宁主义。否定马列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搞乱了人们的思想，搞乱了苏共和苏联。

以所谓多党制取代共产党的领导，以议会制取代苏维埃制度。1988年前，苏共对多党制主张基本是拒绝的。直到1989年1月，戈尔巴乔夫还针对多党制主张指出：“苏联的一党制是历史上形成的，谁也替代不了苏共。”到1990年1月，戈尔巴乔夫思想发生很大变化，提

出："实行多党制并不是悲剧。""我们不应当像魔鬼怕烧香那样害怕多党制。"他主持制定的《行动纲领》称："全民的法治国家排除任何一个阶级的专政，尤其是排除官僚主义的管理政权。"把建立所谓全民法治国家、多元化民主政体作为政治改革基本取向，为多党制打开了大门。主张"无条件民主化"、"无限制公开性"、"意见多元化"、"政治多元化"，束缚了自己的手脚，当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宣传多党制主张时也不敢反击。当多党制主张成为一股强有力的社会思潮，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日益坐大时，戈尔巴乔夫便放弃党的领导地位，接受多党制主张。1990年2月苏共中央全会提出：党的地位不应当依靠宪法来强行合法化。3月苏联人代会修改宪法第六条，取消苏共领导地位。苏共二十八大通过的《纲领性声明》提出要排除任何阶级、国家政党、集团、管理体制的独裁专政，新党章也载明苏共与其他政党、社会政治团体，不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而是平等竞争、合作的伙伴关系，在政治体制上明确宣告从一党制向多党制转变。1991年7月，苏共中央全会通过《苏共纲领草案》，提出要对党本身进行彻底革新，重新理解它在社会中的作用和地位。党在参与建立国家政权和管理机关时，"愿意与其他党派和组织进行广泛合作，为完成民主改革纲领而结成联盟和同盟"，"在议会的共产党员议员成为少数派的政权机关，他们将采取建设性反对派的立场"，实质上就是成为议会党。

在军队中搞非党化、非政治化，否定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改变无产阶级军队性质。1987年至1990年2月，反军乱军活动日益猖獗。1990年苏共决定取消党的领导地位、实行多党制后，军队开始走向"非党化、非政治化"，苏军统率权由苏共中央总书记转到总统手里，苏军总政治部也改为"总军事政治部"，脱离苏共中央领导而隶属同级军事首长，不再负责党务工作，部队教育取消马列主义内容。戈尔巴乔夫明确提出："一切合法的政治组织都毫无例外地有权在军队存在。"各种反共政治组织在军队中建立组织，军内思想混乱，对党的信念发生动摇。"8·19"事变后，戈尔巴乔夫大量撤换调整高级军官。叶利钦在8月23日签署法令宣布：武装部队里的苏联共产党组织为非法。24日，戈尔巴乔夫也发布命令，停止各政党在军队中的活

动，苏军完全走上“非党化、非政治化”道路。

三 西方和平演变战略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苏联解体的催化剂

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是苏联演变的外因。颠覆苏联是国际敌对势力长期以来的主要战略目标，从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建立之日起，国际资本主义便对社会主义进行了联合绞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力量在全球迅速发展，特别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形成了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这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恐惧不安，认识到单靠武力无法颠覆、阻遏苏联影响的扩大，必须同时使用非军事手段。1946年2月，美国国务院致电美驻苏大使馆征询对苏内政外交行动的意见，乔治·凯南发回8000字长电，对战后苏联理论、意图、政策和做法及美国应采取的对策提出建议。在此基础上，美国总统杜鲁门于1947年3月提出对苏联进行遏制的杜鲁门主义。凯南认为如果使苏联党的团结遭到破坏，那么苏联可能在一夜之间从最强国家变成最弱国家。1953年，杜勒斯首次提出和平演变战略，认为遏制只是消极被动的防御政策，应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主动的“和平解放”战略，通过政治战、心理战和宣传战等一切手段，促使东欧国家演变，和平演变的战略目标直指苏联。

1960年，肯尼迪政府提出通过接触促进变革的和平战略。美国参议院研究报告《意识形态与外交事务》指出，应同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广泛接触，竭力同共产党阵营内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同中上层政界人物广泛接触，以便影响其思想信仰。肯尼迪提出，为促进苏联制度和共产主义集团内部演变，应当提倡与共产主义社会进行最广泛接触，有步骤地、慎重地制订计划，从出现在铁幕上的裂缝中培养自由种子，并通过援助、贸易、旅行、新闻、学术交流及资金和技术来实现和平演变目标。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放弃僵硬的外交政策，改善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世界局势发生重大变化，和平与发展代替战争与革命成为世界的两大主题，这给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提供了良好国际条件，同时也使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危险增加。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东欧国家相继搞改革开放。美国等西方

国家向苏东发起强大攻势，战略目标更明确，措施更具体，步骤更快，进攻性更强。1982年，里根在英国发表演讲，公开号召在全世界范围内发动一场对共产主义国家的“自由十字军”征讨，掀起一场“把马克思主义扫进历史垃圾堆”运动，认为在东西方较量中最终的决定因素不是原子弹和火箭，而是意志和思想。因此，要与苏联展开思想和价值观的和平竞赛，通过思想和信息的传播来影响苏东人民，促使苏东实现西方模式的民主化。1989年，东欧国家开始搞政治多元化改革，美国断定东欧出现和平演变的大好时机已到，进一步调整对苏东政策，选择波兰、匈牙利为突破口，力图促使东欧脱离苏联控制，过渡到非共产党政权，从而促进苏联演变。为此，布什提出超越遏制战略，即不只是遏制苏联扩张，而要让苏联融入国际大家庭，把东西方融合成完整的自由欧洲。他提出戈尔巴乔夫改革和公开性方针符合美国和西方利益，西方必须鼓励苏联朝着开放社会演变；要在坚持足够的军事实力和加强美欧日三边联盟的基础上同苏联继续进行对话与合作；在以往遏制取得成功的基础上，通过经济、文化、书刊和思想自由交流等途径，努力谋求让苏联融合到国际社会中来。为达到和平颠覆苏联的目的，西方对苏联进行了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思想、文化、教育、宗教等领域的一切手段的和平演变攻势。苏联在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为解决长期积累的国内问题，摆脱日益严重的国内危机，实行改革，并向西方打开大门寻求援助，这就不可避免地给西方推行和平演变打开方便之门。在错误的指导思想和改革路线指导下，苏联处处迎合西方口味，以换取西方支持与援助，从而一步步被引向资本主义道路。

西方国家进行攻心战、宣传战，开展思想文化渗透。通过攻击马列主义，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向苏联人民灌输资产阶级民主、自由、人权等政治价值观，动摇其社会主义信念。从20世纪50～60年代开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就开始对苏联以及东欧国家的思想文化进行渗透。80年代后，这种渗透大大加强。苏联取消学校的马列主义课程，放弃对青年的思想教育，放弃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搞意识形态多元化，迎合西方口味。西方十分重视民主社会主义在推行和平演变中的作用，极力利用、培植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和

民主社会主义者。以经济合作、经济援助为诱饵，诱使苏联按西方模式进行改革。利用贸易、援助向苏联施压，迫使其政治上让步，接受他们的价值观念和政治模式。以“人权”为旗号，向苏联施加政治压力，扶植苏联国内的反对势力和代理人。利用民族矛盾挑起民族动乱，以使苏联变成一个四分五裂、无力对西方构成威胁的国家。西方同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民族主义分子互相勾结，打出支持各加盟共和国人民自决旗号，反对苏联采用武力解决国内问题，以支持各加盟共和国的独立活动。布什在访苏期间多次讲波罗的海三国独立问题是美苏关系的主要障碍，迫使苏联承认三国独立。西方肢解苏联的图谋得到苏联各种民族分裂主义势力的呼应，民族分立趋势愈演愈烈。同时，西方国家利用宗教配合其和平演变攻势。宗教势力在苏联演变中起了很大作用，在西方信教自由鼓噪和罗马教廷支持下，苏联东正教势力迅速扩大，教徒人数激增。“8·19”事变后，西方国家继续促使苏联加速向资本主义演变。美国等西方国家用各种手段反对紧急状态委员会，支持叶利钦；同时，加速联盟权力分散、最终解体；公开支持波罗的海三个加盟共和国独立。在西方干预下，戈尔巴乔夫急剧右转，苏联局势急转直下，最后解体。

---

[1] 刘先松，南京政治学院研究生九队政委；张海，海军指挥学院政工指挥系副教授。

[2] 黄苇町：《苏共亡党十年祭》，江西高校出版社，2004，第1页。

[3] 王长江：《苏共：一个大党衰落的启示》，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第135页。

[4] 卢之超：《对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剖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30页。

[5] 赵明义：《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人民出版社，1997，第557页。

[6] 沙舟：《克里姆林宫70年内幕》，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第404页。

[7] 季正矩：《腐败与苏共垮台》，《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0年第4期。

苏联解体20年：学界如何评价戈尔巴乔夫及其改革

王立强 李燕 [1]

一 国内外有关戈尔巴乔夫及其改革的主要研究成果

从国内外学界的主要翻译、研究成果看，对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评价主要有三个方向的评论：原苏联—当代俄罗斯、西方和中国。这三个方向的声音互有影响，如在材料上的相互引用，观点上的相互影响。应该说，这三个方向的评论不是各自独立的，而是相互交叉、互相影响的。不过，由于站在不同的国家利益、意识形态立场上，对于戈尔巴乔夫的评价也带有各自的特征。具体分类，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成果。

第一，戈尔巴乔夫在任时期的讲话、苏共中央各项决议、苏联解体后戈尔巴乔夫的回忆、苏联重要报刊的文章。这些是研究戈尔巴乔夫及其思想和改革初衷、改革措施以及效果的评价的原始资料，如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初在各种场合发表的讲话与他后来写的回忆著作，苏共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决议，当时苏联的主要报刊对于苏共领导人以及改革措施的报道等 [2] 。

第二，戈尔巴乔夫任职期间一些苏共高层领导或者戈尔巴乔夫身边的人在苏联解体后所写的回忆。这类著作是戈尔巴乔夫身边的一些当事人对改革时期戈尔巴乔夫的思想、言行、政策、措施的理解和阐释。这些当事人对自己在戈尔巴乔夫改革年代所经历的那些人和事的回忆，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是有关那一段时期的历史的一手资料，苏联解体后中国学界在研究戈尔巴乔夫时代苏联历史时，有很大一部分材料都取自这些回忆著作 [3] 。作者们从不同侧面写出了自己对戈尔巴乔夫其人以及他的改革政策措施的看法。当然，中国学界也有人认为，这些回忆中不完全是客观的，有一部分是在推卸责任，把改革失误、苏联解体的责任全都推到戈尔巴乔夫一个人身上。

第三，当代俄罗斯历史学家或者政论家的历史著作与评论文章，苏联解体前后至今在苏联或者当代俄罗斯新公布的原始档案材料、民意测验资料、当代俄罗斯的报刊，如当代俄罗斯历史学家罗伊·麦德维杰夫、皮霍亚还有其他一些历史学家或者政论家的文章和著作。他们根据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的文件、讲话材料、前述那些改革当事人的回忆，还有近些年俄罗斯新解密的当时的一些档案材料，从政治、经济、意识形态、民族关系、苏联社会的变化、戈尔巴乔夫本人的责任等角度回忆苏联后期的历史，分析戈尔巴乔夫及其改革 [4] 。苏联实行政治民主化、公开性以后，民主选举成为一种政治形式。在民主选举过程中，一些民选中心所公布的民意测验结果，以及当代俄罗斯的一些研究机构所设置的民意测验机构的测验结果，也成为研究民众对当时苏共领导人以及苏联一些大事的资料依据。

第四，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与其打过交道的西方国家政要的回忆，以及当代西方学者的著作、主要报刊对苏联国内或与苏联有关的国际关系大事的评论或者介绍。这些回忆著作或者报刊文章从西方视角来观察当时的苏联领导人、苏联的改革、苏联社会的变化以及苏联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关系，有些介绍是客观的，有些观点还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苏联解体后，当代西方有关戈尔巴乔夫以及当时的苏联历史有些原始资料就出自这些回忆录或者文章中。如戈尔巴乔夫基金会出的一本《奔向自由》，其中很大一部分资料就是来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西方报刊 [5] 。

第五，在上述各种材料基础上，从苏联解体前后至今，中国学界发表了大量有关戈尔巴乔夫时代苏联历史的研究著作和文章 [6] 。这些成果围绕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评价、苏联解体的原因、苏共失败的历史教训等议题，对戈尔巴乔夫改革以及苏联历史进行深入剖析。当然，除了对戈尔巴乔夫及其改革的总体分析与研究外，我国研究者还根据国内外的档案材料和信息，对戈尔巴乔夫改革从政治、经济、民族、军事、外交等方面作出具体研究与分析，还有联系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以及执政党建设，对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模式的总结等，写作了大量思想性、实践性很强的文章，从多方面多角度研究与分析戈尔巴乔夫改革与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以期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以及中国的执政党建设、多民族国家的巩固有建设性的指导作用[7]。

二 20年间国内外对戈尔巴乔夫及其改革的评价及变化

归结起来看，苏联解体至今对戈尔巴乔夫及其改革的研究主要问题集中在如何看待戈尔巴乔夫改革与苏联解体的关系，以及对戈尔巴乔夫时期的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民族等方面的政策措施及其效果的评价。近年来，对于戈尔巴乔夫思想和作为大国领袖的个人素养的分析与评价也多了一些。

1.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带来苏联解体的后果

从苏联解体之初，对戈尔巴乔夫及其改革的评价主要集中于戈尔巴乔夫改革与苏联解体的关系的分析。对于这个问题，苏联解体后的10年间，俄罗斯各党派有不同看法。俄罗斯左翼政党在肯定导致苏联解体有种种客观原因，如经济体制僵化、经济改革战略失误、政权机关的官僚化、苏共作为执政党自身出现执政危机、苏联在民族政策上的积弊，以及西方和平演变政策的同时，认为苏联剧变的直接原因是戈尔巴乔夫把改革引向歧途以及叶利钦的釜底抽薪。其典型代表如原苏联总理雷日科夫、原苏共中央书记利加乔夫、曾任戈尔巴乔夫办公厅主任的瓦·博尔金以及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等；俄罗斯中间派政党的学者和政论家认为，戈尔巴乔夫改革没有正确的改革方向是一个重要错误。俄罗斯历史学家罗伊·麦德维杰夫曾描述道：“当戈尔巴乔夫成为我们（指苏联）这艘巨轮的船长，当他以改革方针和新思维指挥着航行时，苏联遭受了失败。大海不平静，船长驾驶技术不很精湛，又缺乏自信。船体本身也不太牢固，它禁受不住风暴。结果由于船长指挥不当，船舶搁浅，船体损毁。”俄罗斯右翼政党对苏联社会主义实践总体上是否定的。对于苏共领导人的责任，他们多为叶利钦辩护，而对戈尔巴乔夫提出指责。俄罗斯自由民主党主席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认为，戈尔巴乔夫出卖了东欧，纵容了民族分立主义者，挑拨边远地区脱离俄罗斯……借助于反苏主义使社会主义阵营的盟友同苏联脱离[8]。进入新千年后，学界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又有了一些新

观点。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社会政治研究所所长、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根纳吉·奥希波夫在一次座谈时强调，苏联不是解体了，而是被瓦解、被肢解了。苏联被瓦解不是瞬间的事，而是国际敌对势力及其国内代理人长时间苦心经营的结果 [9] 。相比较于苏联解体之初的“抓叛徒”现象，近年来俄罗斯与西方对于戈尔巴乔夫改革与苏联解体关系的评价更理性更客观一些。

一般来说，西方政界与学界对戈尔巴乔夫及其改革的看法带有比较强的西方意识形态色彩。他们承认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失败了，并且带来苏联解体的后果，但他们认为也有其正面作用，比如“给人民民主自由权利”、结束冷战、“给世界带来和平”等。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遗著《超越和平》一书中，称颂戈尔巴乔夫等人“摧毁苏联共产主义的历史性作用”，认为戈尔巴乔夫是进行国内改革和外交新思维试验的“旗手”，并提出：“人们应当记住，戈尔巴乔夫是俄国历史上的一位伟大领袖，他的改革使叶利钦的表演成为可能。”“他们同我们一道在苏联的心脏地带——俄罗斯——打败了共产主义。” [10] 曾担任美国驻苏联大使的小杰克·马特洛克在其所著的《苏联解体亲历记》中写道：戈尔巴乔夫“是历史上第一位不是把使用武力放在优先地位，而是把它作为最后手段的俄罗斯领导人” [11] 。而在英国教授雷切尔·沃克眼中的戈尔巴乔夫具有两面性。他说：“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物，他既遭到了惨败，又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其失败在于他对苏联解体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在另一个方面，戈尔巴乔夫又“值得人们大加赞誉”。值得赞扬的是，戈尔巴乔夫以最小的流血代价成功地破坏了旧体制。很少有几个帝国在不引起战争和巨大的国际变动的情况下这样彻底瓦解 [12] 。可见，苏联人感受到的国家解体之痛在一些西方人眼中被视为民主和人权的胜利。相对于主权而言，西方人更看重民主和人权。

对于苏联解体的主要、直接原因，中国学界的看法还是有很大差异的。有研究者提出，“左”的教条主义的思想理论，是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的最重要的思想根源，而“左”的政治路线是导致苏共失败的关键的路线因素；高度集中的、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是导致苏联发生剧变的深刻的体制原因；缺乏民主和监督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造

成苏联党政领导机关的官僚化、特权化和严重脱离群众，是导致苏共失败和苏联剧变的重要政治原因；对待农民和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失误、民族政策和民族关系上的失误、对外关系和对外政策上的失误都是苏联遭到失败的重要原因。这里，学者们更侧重于苏联解体的体制性因素，也即苏联解体的客观原因[13]；还有学者强调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关键在于选择了方向性错误的改革路线”。戈尔巴乔夫及其领导集团确定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总路线本身是错误的。错误的政治思想方针造成国家领导核心的丧失，搞乱了人们的思想，进一步导致社会、经济、政治、族际关系等方面的激烈动荡，国家的灭亡就不可避免了[14]。在这里，学者们在肯定苏联解体的多种因素之外，指出了戈尔巴乔夫作为苏共领导人在领导改革时，对于改革方向的错误选择，即放弃社会主义路线。总体看，由于改革最后导致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大多数研究者都认为戈尔巴乔夫改革是失败的或不成功的。

2.戈尔巴乔夫经济体制改革失败起到严重的破坏作用

戈尔巴乔夫改革是从经济体制改革入手的，而直到苏联解体10年间，甚至又一个10年后，经济问题依然是一个困扰苏联（俄罗斯）民众生活的重要问题。学界比较一致的观点认为，戈尔巴乔夫时期实行的改革措施几乎没有取得成功的，而其带来的破坏作用却越来越清楚：加速战略带来的混乱，“500天纲领”带来的剧烈震荡，私有化对民众的欺骗，资本主义自由化带来的国民财富流失。对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总的看法是，没有解决民生这一根本问题。当代俄罗斯历史学家卡拉-穆尔扎认为，苏联不是失败在经济问题上，而是一场意识形态的失败。他指出，戈尔巴乔夫继任之初，苏联经济并没有走到尽头，改革并非没有可能成功。最主要的是作为改革的设计师，戈尔巴乔夫本人对改革从一开始就没有一个清晰的规划。另一位当代俄罗斯历史学家罗伊·麦德维杰夫总结戈尔巴乔夫经济改革失败最主要的原因是“确定优先目标失误”，没有始终把改善人民生活放在优先位置上[15]。中国学者吴恩远认为，戈尔巴乔夫实行的加速战略，有顺应世界科技革命发展潮流和社会主义各国改革形势的一面，并在完善社会主义目

标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它的政治改革逐渐偏离正确方向，最终为造成社会政治经济形势发展危机的人道的民主的总路线的制定奠定了基础；它既有表现为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思想方法，但更多反映出的是全盘否定苏联社会主义70年历史、否定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思潮[16]。学者陆南泉在分析戈尔巴乔夫经济体制改革失败与苏联剧变的关系时提出，戈尔巴乔夫经济体制改革是失败的，导致失败的客观因素，主要是在斯大林模式下长期成长起来的在各个领域起作用的阻碍机制。主观原因是在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失误。不过，苏联剧变有其十分深刻的深层次历史原因，根本原因是斯大林模式丧失了动力机制，这种模式的弊端带有制度性与根本性[17]。还有中国学者提出，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改革忽视了经济的稳定和发展，损害了人民的切身利益。在经济改革陷入困境的情况下，苏共领导并未深入分析原因，而是简单地认为是党内干部的抵制及政治制度存在着问题，因而仓促转入政治改革，这更给经济改革带来混乱。在经济混乱与政治动荡中，苏联的权贵阶层却乘机大量攫取国有资产，成为暴发的新寡头。正因为苏共内部这个极有权势的权贵阶层为了使自己长期以来通过不合法、不正当手段占有的社会财富和各种权益合法化，从而主导了苏共改革的走向，导致苏共的垮台[18]。

3.“民主化”、“公开性”影响恶劣

关于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当代研究者更多的是分析戈尔巴乔夫实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动机或初衷，戈尔巴乔夫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到底是由于经济体制改革没有解决好而被迫“转向”，还是他一开始就怀着“摧毁集权制度”的目的而进行了一场“革命”。

苏联解体之初，在雷日科夫和瓦·博尔金等人的回忆著作中，对于戈尔巴乔夫实行的“民主化”、“公开性”基本上是采取了“对开”评价：“民主化”使人民能够参与到国家社会生活中，使许多有魄力、有进取心的人走到社会生活的前台；“公开性”起到了解放千百万人的思想，促使大多数人民群众去独立地进行思考的积极作用。不过，“民主化”也被用来搞冲突、分裂国家、各种力量进行对抗和搞个人报复；“公开性”没有起到建设性的作用，却被用来贬低自己的政治前

任，若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可以起到毒化社会意识的作用 [19] 。戈尔巴乔夫在《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一书中曾为自己辩解，认为谴责和推倒极权主义是进行政治改革的必要前提，“不打破极权主义的政治结构，就不可能在经济领域中进行认真的改革”。当代俄罗斯历史学家罗伊·麦德维杰夫原曾赞同上述观点，经过对苏联解体10多年间灾难的反思，他的观点完全改变。他认为，戈尔巴乔夫没有确定正确的改革方向、意识形态的衰落才是导致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的最重要的原因 [20] 。苏联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也曾反思道：“苏联的垮台和原苏联国家的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崩溃不是持不同政见者所为，而是在‘克里姆林宫’领导下的最高政权的代表们所为。” [21]

有中国研究者在分析戈尔巴乔夫政治改革的过程后指出，戈尔巴乔夫从民主化、公开性发展到接受西方的政治多元化，从一党制转变到接受西方的多党制，从坚持共产党在国家生活中的领导地位转变到接受各政党自由竞争原则，从议行合一的苏维埃体制转向三权分立的议会民主制，这些“西化”政策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系列严重的后果，如公开进行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恶意宣传，攻击和否定历史，修改宪法第六条，放弃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实行多党制，加剧了政局的混乱，最终形成推翻、颠覆社会主义政权的政治力量 [22] 。学者张树华在分析戈尔巴乔夫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时指出，苏联东欧的变化，并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放弃社会主义道路的结果，证明了民主社会主义的破产。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戈尔巴乔夫手里搞垮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戈尔巴乔夫背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包括取消党的领导，抛弃无产阶级专政 [23] 。当然，也有研究者认为，戈尔巴乔夫政治体制改革失败是由于操作不当而导致的，是操作层面上的错误。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领导层面对改革中出现的各种矛盾与问题，缺乏系统、正确和可行的改革指导思想，举措失当，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成为在操作层面苏共民主化改革失败的主要原因 [24] 。

4.忽视民族矛盾造成千百万人的悲剧

瓦·博尔金认为，戈尔巴乔夫在实行改革，试行市场经济时，没有考虑苏联国土之广袤，民族之众多，文化心理之多样性。而经济状况急剧恶化，中央政府无力控制局面，助长了民族分离情绪。于是，“一个曾坚如磐石的国家，经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种种困难，顶住了苏联一大部分国土被占领的压力，克服了战后的经济困难，现在却被搞得支离破碎”。“这场由戈尔巴乔夫外行地、优柔寡断地推行的，而后又被他出卖的苏联社会的改革成了千百万人的悲剧。”[25]当代俄罗斯历史学家罗伊·麦德维杰夫认为，不是民族主义和分立主义导致了改革的失败，相反，是改革思想和方案的受挫、国家发生经济和金融危机、联盟中央和苏共中央委员会中政治意志的衰退以及权力的瘫痪助长了民族主义和分立主义。麦德维杰夫还指出，俄罗斯分立主义也推动了这个过程[26]。欧美学界在分析戈尔巴乔夫的民族政策与苏联解体的原因时，对于戈尔巴乔夫的责任有不同认识。有学者把民族政策失误与苏联解体的关系主要归纳为以下三点：一是沙俄帝国的侵略扩张政策及民族压迫是后来苏联民族矛盾的“基因”。二是苏俄时期民族政策的失误及民族问题的滥觞。三是苏联民族政策的演变及其影响。有些欧美学者特别强调戈尔巴乔夫本人对于苏联解体的作用。他们认为，是戈尔巴乔夫应对民族问题的政策失误导致了苏联解体。其具体错误是：第一，忽视苏联潜在的民族关系危机，对苏联民族分离主义失去警惕。第二，崇尚“公开性”，致使苏联民族分离主义泛滥。第三，实行“民主化”，放弃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为民族分离主义者夺权提供了机会。第四，实行主权国家联盟，为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独立铺平了道路[27]。对于外在因素对苏联解体的作用，西方研究者看法不一，多数观点还是认为内因，即苏联国内政治经济形势起到了主要作用。

5.戈尔巴乔夫的外交政策使西方得以发动和平演变

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初，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领导人在与其初步交往后，纷纷发表讲话称颂他，他被西方社会舆论看做苏联国内和国际政策发生变化的主要推动力量。随着“新思维”和“全人类价值”的提出，戈尔巴乔夫的国际声誉越来越高。1990年，在全国一片混乱的情况

下，戈尔巴乔夫被授予了诺贝尔和平奖。这应该是西方社会对戈尔巴乔夫外交政策的最高的褒奖了。曾担任驻苏联大使的美国人小杰克·马特洛克对戈尔巴乔夫为“世界和平”作出的贡献给予充分肯定。他认为，戈尔巴乔夫作出的每个决定都符合苏联的利益，同时也符合其他有关国家的利益[28]。不过，在国内，大多数居民对戈尔巴乔夫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给予了消极评价。当时有人拍电报给戈尔巴乔夫说：“总统先生：祝贺您因使苏联垮台、因出卖东欧、因毁灭红军、因把资源交给美国人、因把传媒工具交给犹太复国主义者而得到帝国主义的奖励。”“祝贺您因使自己的国家沦为乞丐、出卖列宁和十月革命事业、毁灭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得到世界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奖励。”《时代》周刊对此评论说：“在世界上得到颂扬的人，在国内却遭到咒骂。”[29]苏联解体以后，通过对这场剧变的反思，相当一部分俄罗斯学者认识到：“苏联解体是西方帝国主义有意识的政策的结果，他们借助在苏联内部被其收买的、贪赃枉法的一帮人直接实现了这个目的。”[30]当代俄罗斯历史学家罗伊·麦德维杰夫借用俄罗斯的一些学者的观点提出，苏联解体确实有来自西方的军事和经济方面的压力的原因，不过，从十月革命后到20世纪30年代，苏维埃国家一直进行着同资本主义世界的斗争，西方的压力并没有摧毁，反而加强和巩固了苏维埃国家制度，“冷战”前期两个体系的竞赛还是朝着有利于苏联的方向发展。甚至到80年代后期，由于戈尔巴乔夫对外妥协，这一压力甚至减弱了。因此，认为西方和美国80年代加强了对苏联的压力是不正确的，主要原因是对抗西方压力的那堵墙变得不那么坚固了[31]。有中国学者对戈尔巴乔夫外交政策的实质进行了分析，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的核心是接受西方的政治多元论，放弃党的领导地位，从而导致社会主义政权的丧失。在外交政策上，戈尔巴乔夫提出“新思维”，承认“人类的生存高于一切”。在外交实践中，他把苏美关系放在对外政策的首位，为了达到缓和美苏关系的目的，不惜对美作出有条件的让步。对西欧国家着重发展经贸关系，对第三世界采取收缩方针，大量减少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军事援助，并对美国在第三世界的扩张与干涉采取克制与容忍的态度。因此，东欧剧变与戈尔巴乔夫的态度有直接关系。他的“新思维”理论用超阶级的全人类利益观谈论国际关系，导致放松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警惕，使

西方国家得以对东欧和苏联展开“和平演变”攻势，最终导致苏联解体 [32] 。

6.在个人素养与品质上戈尔巴乔夫不适合担任大国领袖

作为跟随戈尔巴乔夫多年的人，瓦·博尔金对戈尔巴乔夫的性格有比较深入的剖析。他认为，戈尔巴乔夫当上苏共中央总书记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是苏联社会结构的产物。尽管担任了党的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依然保留了过去的世界观和优柔寡断的性格，在他身上体现出诸多的两面性：高喊民主，却又独断专行；提倡法治，却又做违背人权的事情；主张生活简朴，却又享受特权……或许正是他的这些两面性才使得改革艰难曲折，最终遭到失败 [33] 。当代俄罗斯历史学家罗伊·麦德维杰夫也认为戈尔巴乔夫是一个性格软弱的人，他的个人信仰不坚定，在苏联内外政策上没有采取果断的措施，导致改革失败。他认为，戈尔巴乔夫无论在选才用人还是在工作作风上，都表现出既肤浅又专断的特性。在戈尔巴乔夫身上，内心强烈的不自信与外表上的过于自信奇妙地结合在一起 [34] 。而美国人小杰克·马特洛克的评价是：从天性上说，戈尔巴乔夫有点孤家寡人的味道，他没能组织起一个有效率的顾问班子。主要原因是：第一，戈尔巴乔夫所选择的人常常不能在一起共事；第二，他从不认真对待那些顾问机构。而在社会交往中，戈尔巴乔夫没有一个亲密的朋友圈，能够为他提供同更大范围的人联系的哪怕是脆弱的纽带。人们注意到，除了外国同僚，他没有任何私人朋友。而戈尔巴乔夫之所以不能获得充分的信息和建议，也在于他总是任命二三流人物担任关键职务 [35] 。看来，戈尔巴乔夫不善于用人也可以说是导致他的改革失败的原因之一。

当代中国研究者李永全对戈尔巴乔夫的素养和个人品质作了比较全面的总结与分析：“戈尔巴乔夫并不具备出众的才干和能力，但是他却善于赢得领导者的欢喜。正是这个特点使他成了一个超级大国的领袖。从近年来发表的大量回忆文章和书籍看，戈尔巴乔夫是一个缺乏坚定的政治意志，善于左右摇摆的人，一个不适合担任大国领袖的人。戈尔巴乔夫喊出了一个个响亮的口号，但是他并不清楚哪些原则是不能放弃的……正是戈尔巴乔夫的所作所为使国家、社会政治、经

济和思想界发生混乱和失控。由于在苏联体制下一个人一旦担任了最高领导职务，他就具有了‘无限的权力’，其他政治家面对这种局面束手无策，于是那些不愿为此承担历史责任的人纷纷离戈尔巴乔夫而去。人们眼睁睁地看着这个超级大国垮下去。”[36] 对于瓦·博尔金所提到的戈尔巴乔夫性格中的两面性，有中国研究者作了比较深入详尽的分析，指出，戈尔巴乔夫具有“双面人”的特性：一方面，他是改革的发动者，发动了对斯大林体制的改革，并且首先打击官僚特权阶层；另一方面是连他自己都没意识到的，而且他自己也从来不会承认的，那就是他本人就属于特权阶层的一分子，他享受着最高特权者的权力和利益，有着特权阶层的行为方式和心理特征。戈尔巴乔夫的双面角色也使得他不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领导的苏联改革不可避免地步入歧途，其结局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联盟的解体、苏联共产党的衰亡和苏联式社会主义道路的失败[37]。

从上述成果的主要特点上看，苏联解体20年间国内外学界对戈尔巴乔夫及其改革的研究无论在方法上还是结论上都有很大变化：苏联解体之初，主要侧重于分析苏联解体的原因，分析戈尔巴乔夫及其改革对于苏联解体的影响，借用一句俄罗斯政论家的话说，主要是在“抓叛徒”，对于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民族等改革内容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内容、方法与效果的分析。而进入新千年以来，学界更侧重于依据历史事实，历史地看待和分析戈尔巴乔夫改革。其主要研究依据也以史料为主，研究者从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到经济学家、政论家等。在研究中，一方面是研究内容越来越丰富：对宏观层面上的改革、改革与苏联解体的关系、改革与苏联历史的关系、改革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关系、改革与东欧剧变的关系、改革与当代世界格局变化的关系等都有论述。其中比较突出的有这样几个方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苏联解体的关系、戈尔巴乔夫改革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变化的关系、戈尔巴乔夫改革与东西方军事力量变化的关系、戈尔巴乔夫改革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对比以及当代中俄关系、戈尔巴乔夫本人应对苏联解体负有怎样的责任。另一方面是研究方法越来越科学化、现代化，资料来源更多，同时也更需要仔细分辨。研究者采用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心理学、社会学等研究方法，更多地引用社会调查数据，还

有访谈法、案例分析等，学科间交叉也更多些。研究者既有经验丰富、德高望重的学者，也有年轻的学术新秀，既有功底深厚的权威论述，也出现了有新意、有独创性的新观点。这些都使得对于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研究成果更理性、更客观，也为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

---

[1] 王立强，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研究员；李燕，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2] 这些文献主要有〔苏〕米·谢·戈尔巴乔夫：《十月革命与改革：革命在继续》，莫斯科，1987；〔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岑鼎山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徐葵、张达楠、王器、李方仲、宋锦海译，新华出版社，2002；〔俄〕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俄〕戈尔巴乔夫、〔俄〕斯拉文：《尚未结束的历史——戈尔巴乔夫访谈录》，孙凌齐、李京洲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俄〕戈尔巴乔夫、〔日〕池田大作：《20世纪的精神教训》，孙立川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苏共二十七大、二十八大、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文件汇编；《真理报》、《消息报》以及由民主化、公开性催生的一些新出现的报刊，如《苏维埃俄罗斯报》等。

[3] 〔苏〕尼古拉·雷日科夫：《背叛的历史——苏联改革秘录》，高洪山、韩生民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苏〕叶戈尔·库兹米奇·利加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王廷玉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俄〕亚·雅科夫列夫：《“改革新思维”与苏联之命运》，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1998；〔俄〕亚·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徐葵、张达楠等译，新华出版社，1999；〔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俄〕阿·切尔尼亚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徐葵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俄〕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大政治年代》，焦广田等译，东方出版社，2001；〔俄〕叶·库·利加乔夫：《警示》，钱乃成等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俄〕尼古拉·雷日科夫：《大动荡的十年》，王攀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

[4] 〔俄〕斯·维·契什科：《苏联的解体》，莫斯科，1997；〔俄〕安·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莫斯科，2001；〔俄〕谢·卡拉-穆尔扎：《论意识操纵》（上、下），徐昌瀚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俄〕亚历山大·季诺维

也夫：《俄罗斯共产主义的悲剧》，侯艾君等译，新华出版社，2004；〔俄〕罗伊·麦德维杰夫：《苏联的最后一年》，王晓玉、姚强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5] 〔美〕布热津斯基：《大失败：20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美〕达科斯·多德尔等：《戈尔巴乔夫·克里姆林宫的异教徒》，隋丽君、施鲁佳译，新华出版社，1991；〔美〕小杰克·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英〕雷切尔·沃克：《震撼世界的六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怎样葬送了苏联》，张金鉴译，改革出版社，1999；〔英〕本·福凯斯：《东欧共产主义的兴衰》，张金鉴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美〕威廉·奥多姆：《苏联军队是怎样崩溃的》，王振西等译，新华出版社，2000；〔美〕彼得·施魏策尔：《里根政府是怎样搞垮苏联的》，殷雄译，新华出版社，2001；〔美〕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曹荣湘、孟鸣歧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俄罗斯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编《奔向自由：戈尔巴乔夫改革二十年后的评说》，李京洲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在这本书中，作者引用了英国《泰晤士报》、《卫报》、《独立报》、《高端杂志》，法国《巴黎竞赛画报》，德国《威斯特法伦日报》、《科隆城市导报》、《法兰克福汇报》，美国《华盛顿邮报》等报刊所载的西方与苏联社会舆论对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看法）；〔美〕彼得·拉特兰：《美国学者对苏东剧变的反思》，《国外理论动态》2000年第9期；〔英〕斯蒂芬·怀特：《苏联解体原因研究的反思》，《国外理论动态》2001年第11期；〔美〕瓦迪·哈拉比：《对苏联解体的一些看法》，《国外理论动态》2003年第1期。

[6] 江流等主编《苏联剧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江流：《苏联演变的历史思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中共中央党校科研部东西方政党和文化比较研究中心编著《苏共的失败及教训》，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宫达非主编《中国著名学者苏联剧变新探》，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陆南泉、姜长斌主编《苏联剧变深层次原因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申健：《论苏联剧变的体制原因》，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许新、陈联璧等：《超级大国的崩溃——苏联解体原因探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左凤荣：《致命的错误——苏联对外战略的演变与影响》，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陆南泉和姜长斌等主编《苏联兴亡史论》，人民出版社，2002；周尚文、叶书宗、王斯德：《苏联兴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陈之骅、吴恩远、马龙闪：《苏联兴亡史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李兴耕等编《前车之鉴——俄罗斯关于苏联剧变问题的各种观点综述》，人民出版社，2003；孟迎辉：《政治信仰与苏联剧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谭索：《戈尔巴

乔夫改革与苏联的毁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吴恩远：《苏联史论》，人民出版社，2007；李慎明主编，吴恩远、王立强副主编《历史的风——中国学者论苏联解体和对苏联历史的评价》，人民出版社，2007。

[7] 钮菊生：《戈尔巴乔夫执政后苏联的民族问题及其特点》，《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1991年第2期；张玉良：《戈尔巴乔夫的悲剧》，《国际共运史研究》1993年第4期；文有仁：《戈尔巴乔夫背离社会主义方向的新闻改革及其后果》，《当代思潮》1994年第4期；杨晋川：《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与苏联的演变和解体》，《当代思潮》1994年第2期；吴恩远：《论戈尔巴乔夫的“加速发展战略”》，《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左凤荣：《评戈尔巴乔夫对外政策的理论与实践》，《东欧中亚研究》2001年第1期；檀雪菲：《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苏共领导权的丧失》，《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年第3期；王广振、孙嵩霞编译《改革二十年戈尔巴乔夫访谈录》，《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5年第4期；李瑞琴：《戈尔巴乔夫时期经济体制改革评析》，《经济问题》2006年第3期；周尚文：《俄共缘何衰落》，《俄罗斯研究》2006年第3期；俄罗斯科学院社会综合研究所课题组编写《俄罗斯人二十年后看改革》，冯育民编译，《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6年第5期；葛新生：《俄罗斯一些著名政界人士和学者对苏联解体的反思》，《党的文献》2006年第3期；张树华：《苏共失败的政治教训——兼析戈尔巴乔夫民主社会主义的破产》，《政治学研究》2007年第1期；胡珺：《苏联解体原因研究综述》，《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7年第4期；汪亭友：《错误的改革路线是苏联演变的决定性因素》，《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年第4期；姜长斌：《20年后看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理论视野》2007年第9期；钱亚梅：《缥缈的理想幻灭于沉重的现实——读〈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理论导刊》2007年第10期；陆南泉：《戈尔巴乔夫经济体制改革失败与苏联剧变》，《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8年第1期；李俊升摘译《俄罗斯学者谈苏联解体的原因》，《国外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朱秀芳：《戈尔巴乔夫现象的历史诠释——再析苏联解体的深层次原因》，《俄罗斯研究》2009年第4期；张树华、罗文东、辛向阳：《俄罗斯科学院资深院士谈对苏联“改革”及赫鲁晓夫等人的政治评价》，《红旗文稿》2010年第16期；周新城：《历史在这里沉思——苏联解体近20年的思考》，《政治学研究》2010年第5期；郭春生：《论戈尔巴乔夫的双重角色及其改革的失败》，《科学社会主义》2010年第1期，等等。

[8] 俄罗斯左翼政党包括代表俄罗斯共产主义运动的共产党组织，以及一些民主社会主义组织；俄罗斯中间派政党包括以戈尔巴乔夫以及普京等人为首的俄罗斯社会民主党、俄罗斯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以及对俄罗斯社会发展持“第三条道路”的政党和组织；俄罗斯右翼政党包括以盖达尔、丘拜斯为首的俄罗斯“激进自由派”，以亚夫林斯基为首的“亚博卢”联盟等主张走西方式的自由主义道路，以及

持极端民族主义立场的极右翼政党等。上述内容参见李兴耕等编《前车之鉴——俄罗斯关于苏联剧变问题的各种观点综述》，人民出版社，2003，第194页。

[9] 张树华、罗文东、辛向阳：《俄罗斯科学院资深院士谈对苏联“改革”及赫鲁晓夫等人的政治评价》，《红旗文稿》2010年第16期。

[10] 李慎明主编，吴恩远、王立强副主编《历史的风——中国学者对苏联解体和对苏联历史的评价》，人民出版社，2007，第89页。

[11] 〔美〕小杰克·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下），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第766～775页。

[12] 〔英〕雷切尔·沃克：《震撼世界的六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怎样葬送了苏联》，张金鉴译，改革出版社，1999，第236页。

[13] 参见陆南泉、姜长斌主编《苏联剧变深层次原因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第377～384、298～299页。类似观点还可见于周尚文、叶书宗、王斯德《苏联兴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第927～944页。在后一部著作中，学者们把主要原因归结为苏联在历史上所积淀的各种阻碍因素，主要也是体制性的客观原因，如经济体制僵化、缺乏民主、未能很好地解决民族问题、忽视了执政党建设等。

[14] 陈之骅、吴恩远、马龙闪主编《苏联兴亡史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第783～796页。

[15] 〔俄〕谢·卡拉-穆尔扎：《论意识操纵》（上），徐昌瀚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第409页；〔俄〕罗伊·亚历山德洛维奇·麦德维杰夫：《意识形态衰落是苏联解体的最重要的原因》，葛新生译，载于李慎明主编，吴恩远、王立强副主编《历史的风——俄罗斯学者论苏联解体和对苏联历史的评价》，人民出版社，2009，第274～276页。

[16] 吴恩远：《论戈尔巴乔夫的“加速发展战略”》，《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

[17] 陆南泉：《戈尔巴乔夫经济体制改革失败与苏联剧变》，《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8年第1期。

[18] 中央编译局中国现实问题研究中心课题组：《苏共民主化改革失败的教训》，《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年第1期。

[19]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

社，1996，第408～409页。

[20] 〔俄〕罗伊·亚历山德洛维奇·麦德维杰夫：《意识形态衰落是苏联解体的最重要的原因》，葛新生译，载于李慎明主编，吴恩远、王立强副主编《历史的风——俄罗斯学者论苏联解体和对苏联历史的评价》，人民出版社，2009，第276～277页。

[21] 〔俄〕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俄罗斯共产主义的悲剧》，侯艾君等译，新华出版社，2004，第269页。

[22] 高放主编《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新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第71～76页。

[23] 张树华：《苏共失败的政治教训——兼析戈尔巴乔夫民主社会主义的破产》，《政治学研究》2007年第1期。

[24] 中央编译局中国现实问题研究中心课题组：《苏共民主化改革失败的教训》，《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年第1期。

[25]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第411～412页。

[26] 〔俄〕罗伊·亚历山德洛维奇·麦德维杰夫：《意识形态衰落是苏联解体的最重要的原因》，葛新生译，载于李慎明主编，吴恩远、王立强副主编《历史的风——俄罗斯学者论苏联解体和对苏联历史的评价》，人民出版社，2009，第268～270页。

[27] 潘广辉、吴婧：《民族问题与苏联解体——欧、美学界的研究》，《世界民族》2006年第1期。

[28] 〔美〕小杰克·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下），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第769页。

[29] 〔俄〕阿·切尔尼亚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徐葵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第458页。

[30] 〔俄〕弗·涅什科：《苏联的解体》，莫斯科，1996，第14页。

[31] 〔俄〕罗伊·亚历山德洛维奇·麦德维杰夫：《意识形态衰落是苏联解体的最重要的原因》，葛新生译，载于李慎明主编，吴恩远、王立强副主编《历史的风——俄罗斯学者论苏联解体和对苏联历史的评价》，人民出版社，2009，第270～271页。

[32] 高放主编《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新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第80～81、88～89、97页。

[33]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第412～413页。

[34] 〔俄〕罗伊·亚历山德洛维奇·麦德维杰夫：《意识形态衰落是苏联解体的最重要的原因》，葛新生译，载于李慎明主编，吴恩远、王立强副主编《历史的风——俄罗斯学者论苏联解体和对苏联历史的评价》，人民出版社，2009，第277～280页。

[35] 〔美〕小杰克·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下），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第772～773页。

[36] 陆南泉、姜长斌：《苏联剧变深层次原因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第240页。

[37] 郭春生：《论戈尔巴乔夫的双重角色及其改革的失败》，《科学社会主义》2010年第1期。

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误与苏联解体

左凤荣[1]

一 经济改革政策选择错误，徒费时光

苏联的体制是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由斯大林建立起来的，其基本特征是苏共统领一切，一切都按有关部门制订的计划运行。这一体制不断发生危机，也曾有过几次改革，但这一体制并未发生实质性的变化。正如俄罗斯学者日夫科夫所说："在斯大林逝世之后，苏联的社会和政治制度并没有摆脱通过各种暴力和镇压的方式对社会主义进行的最严重的歪曲。在这方面最粗暴的表现就是以武力镇压新切尔卡斯克公民的不满行动和对其参加者采取镇压措施，违反国际人权法规利用精神病院镇压持不同政见者，压制言论自由和发表意见的自由，直至强行剥夺国人的公民权。"[2] 到戈尔巴乔夫上台之时，苏联已是一个危机四伏的国家，改革成了苏联上下的共识。

戈尔巴乔夫上任伊始，便提出要改革，其新方针被定名为"加速战略"，重心是加速发展机器制造业，做法是增加投资和加强纪律，与安德罗波夫时期进行的改革和调整并无实质性的区别。这表明，戈尔巴乔夫仍然相信苏联的体制是最先进的，改革只是让这一体制的优越性充分发挥出来。

戈尔巴乔夫仍然坚持计划经济，反对市场和私有制。苏联长期只发展公有制，企业和集体农庄都是执行计划的工具，个人和企业都没有自主性、积极性，更谈不上创造性。苏联长期把重心放在发展军事工业和重工业上，民用经济发展严重不足，造成居民的日用消费品供应不足，勃列日涅夫时期依靠出卖石油、天然气等原料生存。戈尔巴乔夫提出的改革并不是要解决这些问题，其"加速战略"并未突破苏联传统的经济发展战略，仍打算在维护原来体制的情况下实现经济的加速发展。在1985年4月23日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戈尔巴乔夫在谈到"加速战略"时说："如果我们把全部工作的中心放在经济的集约化和

加速科学技术进步上，改革管理和计划，改革机构和投资政策，普遍加强组织性和纪律性，从根本上改善工作作风，那么加速增长，而且是实质性地增长的任务是完全可以实现的。”[3] 戈尔巴乔夫认为：“首先调动人的积极因素，使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极其认真地、高效地工作，那么我们就可以取得比较好的成效。”[4] 他认为：“决定国民经济发展主要方向的，不是市场，也不是自发力量，而首先应当是计划。同时，应当对计划工作采取新的态度，积极采用经济杠杆，为发挥劳动集体的主动性提供广阔天地。”[5] 在戈尔巴乔夫看来，只要把计划定得科学一些，调动起人们的热情，苏联的经济状况就会好转。苏共二十七大制订的1986～1990年第十二个五年计划与以往的计划相似，目标仍是宏伟的，仍需大量投资和热情才能完成计划，计划的核心仍是重工业，特别是机器制造业。

重工业和军事工业早已成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吸血鬼，继续加速机器制造业只会加重经济的畸形状态。苏联迫切需要调整产业结构，加大对居民消费品工业的投资力度，改变对民用工业的歧视状态，戈尔巴乔夫却没有这样做。为了加速机器制造业，苏联在石油收入减少、农业歉收的情况下，反而不断增加机器设备进口，削减消费品进口。1986年10月27日雷日科夫在政治局会议上说，肉、奶制品等的进口额减少了30%～40%[6]。“1987年，苏联全部进口货中41%为机械设备，消费制成品仅占13%，比起1970年的18%明显下降了。”[7] 从1988年起苏联经济预算赤字增大，日用消费品短缺的问题更加突出。“加速”战略的受阻和失败，使本来已经“停滞”的经济雪上加霜。

戈尔巴乔夫同样迷信通过行政手段解决问题，从1985年5月开始，在全国动员起一切力量开展反酗酒斗争。这一斗争由利加乔夫和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索洛缅采夫直接领导，这两个人都以厌恶酗酒而闻名，他们热情很高，把反酗酒斗争推向了极端。他们不仅禁止伏特加酒，甚至还关闭了啤酒馆，销售酒类的商店急剧减少，取消了玻璃酒具的生产，街道上甚至出现了反酗酒纠察队，以恐怖手段吓唬来做客的人。“反酗酒斗争进行得特别有成效，含酒精饮料的产量在1985～1986年减少了差不多1/2。”[8] 从良好愿望出发，不顾客观实际的反酗酒斗争带来巨大的财政损失，禁止生产和出售酒类产品，使

苏联因此失去了重要财源，根据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的估计："据1985年的计划（自然它是在禁酒决议作出之前通过的），预计酒类销售每年可取得600亿卢布的利润。决议通过以后，历年实际利润分别是：1986年为380亿卢布，1987年为350亿卢布，1988年由于停止了禁酒运动，也才有400多亿卢布。国民经济3年至少损失670亿卢布，而精神上的损失则是无法估量的。"[9] 这一运动还破坏了酒业和葡萄种植业，如黑海之滨有90年历史的马桑德拉葡萄酒厂，其生产的葡萄酒闻名苏联内外。1988年7月，记者来到这家工厂了解到的情况是："这次酗酒运动使我们厂的产量由过去年产1700万升减少到年产620万升，为此已忍痛毁掉了工厂附属的25万公顷葡萄园。目前工厂仍面临进一步减产的问题。为把酿酒用的葡萄改为食用葡萄，需要更换品种，进行嫁接，而生产葡萄汁又需要更换工艺，改变生产结构，这就要投入大笔资金，而且还不是短期内就能见效的。生产规模的不断缩小，给工厂的经济和工人的生活都造成很大困难。"[10] 同时，酗酒现象并没有减少，在工作场所发生的酗酒现象大大增加了。"酗酒现象从1986年的11.7万起，增加到1987年的25万起。"[11] 人们有需求，国家不生产，自然鼓励了私人酿酒业的发展，持续3年的反酿酒斗争，导致私酿酒成风，造成白糖供应紧张，酒精中毒事件时有发生。到1988年中期以后，这项工作不了了之了。

有害无益的"加速战略"和反酗酒斗争，使苏联损失了宝贵的两年时间，1987年苏联才真正开始走上改革之路，这一年苏共中央先后召开了一月全会、六月全会和纪念十月革命七十周年大会，对苏联过去的历史进行批判性总结，提出了对苏联的政治经济体制进行根本性改革的问题。1987年6月25～26日苏共中央召开全会的核心是经济体制改革。阿甘别吉扬、阿巴尔金、西塔良、彼特拉科夫、波波夫等经济学家与政府成员一起制定了经济改革构想。其总思路是：扩大企业自主权，加强对劳动的刺激，提高利润的作用。原则与思路与1965年柯西金的改革基本相同：提高国营企业的经营自主权，主要体现在对利润的支配上。对于通货膨胀、外汇储备下降、经济结构调整等问题，并没有切实的措施，对于不合理的价格也没有触及。在厂长选举中，能说会道的人当上了厂长，为了获得工人的支持，"获得自主权的企

业迅速提高了职工的工资，1988年工资增长8%，1989年增长达13%……厂长选举制对劳动纪律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削弱了中央机关运用行政手段调控经济的能力。在既缺乏市场定价机制，又没有硬性财政限制的情况下，这一做法引发了尖锐问题”[12]。虽然1988年年中通过了允许开办私人企业的法令，但在观念上，戈尔巴乔夫仍然排斥财产私有，1988年11月戈尔巴乔夫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批评爱沙尼亚同志说：“私有制，很清楚，这是人剥削人的基础，而我们的革命完全是为了消灭剥削，把它们完全转交给人民所有。试图恢复私有制意味着后退，这是极其错误的决定。”[13]在中国改革已经取得很大进展，个体、私人企业有了很大发展，已经确立私有制是公有制重要补充的条件下，戈尔巴乔夫仍然相信只有公有制才是社会主义的。

直到1990年，在政治斗争白热化，反对派开始夺权，经济发生严重危机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才不得不考虑向市场经济过渡，这年的3月6日通过了《苏联所有制法》，承认了各种所有制形式平等。1990年7月27日，以叶利钦和西拉耶夫为一方，以戈尔巴乔夫和雷日科夫为另一方，签署了合作协议，共同拟订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计划。但最终却形成了两个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计划：雷日科夫-阿巴尔金政府的计划和沙塔林-亚夫林斯基纲领起草委员会的“500天纲领”。因为双方都不妥协，戈尔巴乔夫进行了调和，10月中旬，戈尔巴乔夫向总统委员会和联邦委员会递交了《稳定国民经济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基本方针的统一方案》。叶利钦等人从中看到的是对“500天纲领”的否定，是戈尔巴乔夫拒绝与俄罗斯领导人一道向市场经济过渡，俄罗斯决定独立行事，实施自己的“500天纲领”。联盟中央和俄罗斯联邦没有达成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共同纲领，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再次走上了对抗，苏联经济只能靠惯性运行。到苏联解体前夕，苏联经济实际上已经崩溃，戈尔巴乔夫落到了四处乞讨的地步，苏联难以为继。

二 政治体制改革过于匆忙，“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行不通

苏联体制的危机实际上是政治、经济、精神的全面危机，根子在于政治上的专制。到1988年时，由于经济状况一天天恶化，根本改革政治体制的问题自然被提了出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是许多苏共高级

领导人的共识。雷日科夫认为：“党的领导核心已经逐渐清醒地认识到：这样下去不行！——这句话后来也成为一句时髦的口号。在进行经济改革的情况下，原先那种畸形的政治体制成了拦路虎，使人生畏，尤其是使我们这些经济学家和实业家生畏。我们很清楚，党的高层领导对经济改革的必要性既没有彻底理解，也没有接受。党（主要指高层领导）一方面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另一方面又不对全国发生的大事负任何责任。合法的权力机构——最高苏维埃以及各级地方苏维埃则徒有虚名，什么事也解决不了。选举制度越来越成为一种摆设。”[14] 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也认为：“社会政治体制显得有点太受条条框框的约束，它的巨大潜力丧失自我发挥、自我调节、自我发展的能力。社会主义，作为本质上最需要发扬民主，同时也需要讲法制的社会，却没有使这两方面和谐地结合和有机地统一起来。”[15] 在1988年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上讨论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时，苏共中央就达成了共识，即改革不是改善现有的体制，而是使这个体制有崭新的结构和成分，赋予它新的内容和活力，也就是进行根本性的变革。在缺乏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匆忙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而这种政治体制改革又不是从机关民主化做起，不是先改革党，而是先从群众民主开始，从而使整个国内局势失控，中央权威受损，地方分离势力发展，加速了苏联解体的进程。

戈尔巴乔夫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恢复苏维埃的职能，恢复列宁时代“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原则，任何一个问题，无论是经济的还是社会的问题，不能越过苏维埃加以解决，党的政策——经济政策、社会政策、民族政策——都应当首先经过人民代表苏维埃这个人民政权机构来执行。“政治改革的实质是明确划分党的机关和苏维埃的职权，把权力从共产党的手中转到苏维埃的手中。”[16] 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根据巴黎公社的经验，提出建立立法和行政合一的体制，条件是苏维埃代表普选产生，随时可以撤换。后来苏联建立了立法行政合一的体制，但离开了普选的原则，现在戈尔巴乔夫要恢复这一原则。大多数代表支持戈尔巴乔夫的主张。

戈尔巴乔夫设计的新权力机构是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由2250名代表组成，其产生方式是：750名代表从地区选区选举，750名代表从

民族地区选举，750名来自全苏的社会团体。也就是说，2/3的代表在居民中通过差额选举产生，1/3的代表由社会组织推荐。苏联最高苏维埃，是苏联国家权力常设的立法、管理和监督机构，由人代会选举产生，成员为544人，由联盟院和民族院组成，各有代表271人，外加最高苏维埃主席和副主席。

1989年3月从上到下进行了新的国家权力机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这次人民代表选举同以往的选举相比有两个根本变化：其一，当选的人民代表将拥有独立的政治权力，其二，摒弃了由上级指定候选人进行等额选举的方法，规定实行不受限制的差额选举。苏联历史上第一次差额竞选人民代表的活动刚刚拉开帷幕，就吸引了社会各阶层人士以前所未有的热情积极参与。一方面，参加竞选的不仅有共产党人，而且有主张激进改革的“民主派”及其他形形色色观点的人士；另一方面，选民拥有在代表不同政治观点的候选人之间进行选择的权利。因而，竞选实际上成为各种经济、政治改革主张的竞争，成为在各种经济、政治改革路线中进行选择。从当时的政治力量看，尽管参与竞选者形形色色，但竞争和选择主要在苏共和“民主派”之间展开。当选者除“在册权贵”外，主要是激进派和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们的竞选口号主要是“建立民主的社会、实现社会公正、有保障、清洁环境”等。在许多情况下，这样的候选人都在选举中战胜了“官方”的竞争者，这反映了政权的严重危机[17]。在俄罗斯联邦有232人参与竞选，结果有78%的高层领导在选举中落选，有47%的中层领导落选；相反，有72%的知识分子却在这场选举中获胜[18]。在俄罗斯的645名代表中，知识分子占28%，党和政府官员占21%，工人占16%，企业管理人员占14%，农民领袖占13%，农民占8%。而在城市地区，知识分子占当选代表的37%[19]。戈尔巴乔夫想通过人民代表的选举使共产党通过选举重新获得人民的认同，希望通过差额竞选吸纳社会上支持“改革”的力量进入政权机关。但选举证明，社会上潜藏着对苏共极大的不满，叶利钦、索布恰克等成了影响巨大的人物，在随后进行的地方苏维埃选举中，他们都当上了苏维埃主席，苏共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实际上失去了控制权。

戈尔巴乔夫把一切权力从党全部转向苏维埃的做法，显然很片

面。现代政治体制的原则是分权与制衡。在现代政治中，立法和行政、司法是各自独立、各有分工的，党集中了一切权力有弊端，苏维埃也不能集中一切权力。此外，最高苏维埃不是直接由民众选举产生的，而是由人民代表选举的，仍是间接产生的，人民并不能直接监督他们，他们也不能直接反映民意。苏联的人代会实际上履行的仍是立法机关的职能。

在政治体制改革中，苏联原来体制中缺少制约和监督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戈尔巴乔夫提出，党要把不属于它的那些权力和职能统统归还给国家政权机关，即实现权力中心从党的机关向苏维埃国家机关的转移。但是，戈尔巴乔夫要“用党的威信来加强作为人民代表机关的苏维埃的作用”，其办法是把同级党委会的第一书记推荐到苏维埃主席的岗位上。戈尔巴乔夫兼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在自己的手上集中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这样做的结果是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戈尔巴乔夫陷于繁杂的议会事务中，把越来越多的精力放在最高苏维埃方面，党的决策体系被架空和削弱。苏维埃取代苏共成了新的立法与行政合一的机构，这与原来的体制并无大的区别。苏维埃成了无所不管的职能部门，内设了五花八门的委员会，极大地制约了行政权力，使许多问题议而不决，难以达成一致。1989年5月25日，第一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正式开幕。会议的主要议题是组建最高苏维埃领导机构，启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但代表大会实际上变成了群众大会，2200多名代表观点各异，他们把代表大会变成表演的舞台，提出了各式各样的观点。事实证明，苏维埃无法承担起领导国家的职责，迫使戈尔巴乔夫在1990年3月转向了总统制。

戈尔巴乔夫的政治体制改革最受欢迎的是给了人们以言论自由。1988年6月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公开性》的决议，提出始终一贯地扩大公开性是反映社会主义制度民主实质的必要条件，也是动员人民，吸引每个人参加到所有社会、国家、集体事业的必要条件，使之成为在全民监督所有社会机关、权力和管理机构活动的基础上反对社会主义蜕变的有效保证。会后成立了由雅科夫列夫任主席的公开性委员会。但是，苏共的公开性没有相应的法律规范，有人在党的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提出应该制定出版法，出版物应该对自己不

负责的言论负责，但直到1990年6月12日《苏联新闻出版法》才出台。在公开性的气氛下，苏共长期掩盖的历史错误被揭露出来，在历史的真相面前，苏共失去了为自己辩护的能力，只能宣布与斯大林体制划清界限，试图通过“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为自己寻找新的合法依据。

戈尔巴乔夫匆忙上马的政治体制改革考虑不周，他本想以此促进经济体制改革，想借助选举机制和舆论的力量克服党内利益集团对改革的抵制，结果却带来了更大的混乱，导致政治过热，政客们忙于向民众许诺和夺权，经济被弃之不顾。戈尔巴乔夫的实践表明，立法与行政合一的体制在现代社会行不通，即使它建立在普选制的基础上，也无济于事。

三 联盟体制改革滞后，促进了地方分离主义的发展

苏联本是联邦制国家，解决民族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是扩大各加盟共和国的权力，但戈尔巴乔夫却盲目相信苏联已经解决了民族问题，直到各地区民族运动发展、分离主义出现时，才被迫把革新联盟提上了日程。1989年5月11日在讨论波罗的海三国问题的政治局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曾提出：“如何实实在在地改造我国的联邦制要思考、再思考。否则真的要全部完蛋。”[20] 在1989年5月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戈尔巴乔夫在报告中提出，要划分联盟、共和国、自治区的权限。苏共中央也终于决定在1989年9月召开专门讨论民族问题的中央全会，反映各地代表不同要求的信件寄到了苏共中央，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要求。这次中央全会通过了《党在目前条件下的民族政策（苏共纲领）》，提出的基本任务是：对苏维埃体制加以改造，用现实的政治和经济内容加以充实；扩大各种不同形式的民族自治的权利和机会；保证每个民族的平等权利；为自由发展民族文化和语言创造条件；加强各种保障，以杜绝根据民族特征限制公民权利[21]。但这个决议并没有真正实施，也未能遏制分离主义。9月23日阿塞拜疆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共和国主权宣言，25日立陶宛宣布1940年并入苏联不合法。

虽然苏共中央九月全会首次提出了制定并签订新联盟条约的问题，但直到1990年苏共中央二月全会后才把这一问题提上日程，戈尔巴乔夫本人则直到1991年春天才积极加入制定新联盟条约的进程中来。在各共和国独立性日益增强的背景下，戈尔巴乔夫只能步步退让，把苏联变成了主权国家联盟、独立国家的联邦，但各共和国还是不接受，最后三个斯拉夫国家一纸协议宣布了苏联的死亡。纳扎尔巴耶夫曾说："戈尔巴乔夫的基本错误在于，他没有倾听加盟共和国要求赋予他们经济独立的呼声。除波罗的海诸国外，大多数加盟共和国，包括哈萨克斯坦在内，并没有追求分离、完全和盲目的独立。我们想到一点——可能会自我掌握本身的命运。戈尔巴乔夫及其同伙应及时向各共和国提供在联盟框架中最大的独立。我相信，国家可以避开以后很多动荡。"[22] 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

四 苏共自身未能更新，被民众抛弃

苏共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政党，而是管理国家的机构。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担负着领导国家的重任，决定国家的内外政策。苏共中央政治局是苏共和整个国家的主要政治机构和中枢神经，国家内外政策的大政方针都是在政治局内决定的。政治局每周四上午开会，决定国家的大政方针和一些急需处理的问题。书记处每周二开会，一般由党的第二把手主持，实际上起着第二部长会议的作用，它还有一项部长会议没有的职能，即撤换和任命干部。在党的各种会议上，讨论的主要问题并不是党自身建设的问题，而是管理国家的问题。苏共需要改变领导国家的方式，从直接发布命令转到把党的方针政策上升到法律，指导人民实现当家作主，使管理者的权力来源于公民而不是上级组织的任命，接受公民的监督与制约。

戈尔巴乔夫应该把政治民主化的重心放在党的民主化上，以党的民主化推动社会的民主化，但作为党的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却不相信党，他认为党内官僚是其改革的阻碍，他要用社会民主推动改革。虽然从1987年苏共中央一月全会起，苏共开始在干部选举、机构设置上进行了一些改革，但党内干部的选举仍然流于形式，党内高层领导思想也不统一，党对具体行政工作的干预并没有减少，雷日科夫、叶利

钦因此与利加乔夫产生了尖锐矛盾，党的工作重心并未转移到争取民众和进行党的建设上。在国内轰轰烈烈进行人民代表选举时，苏共的100名代表是在1989年3月中央全会上等额产生的，并未经过竞选。苏共纠正了历史上的许多错误，本可以甩开包袱轻装前进，但他们并没有注意消除历史的负面影响，树立起苏共的新形象，最后为历史的错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苏共内部也没有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重要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利加乔夫、雷日科夫、叶利钦、雅科夫列夫等在改革问题上分歧很大，就像克雷洛夫预言中的梭鱼、天鹅和大虾拉车一样，苏联在这些目标各异者的领导下，难以走出泥潭。

戈尔巴乔夫也没有对民众极其不满的苏共干部特权进行改革，没有采取措施削减高级领导人，包括他自己不应该享有的特权。1988年以后，小白桦“特供商店”虽然取消了，但它仍变相存在，享受特供者所需的东西被直接送至家中。苏联的高级领导人仍有自己专门的医院、专门的疗养院、漂亮的餐厅和精美的食品，克格勃第九局专门负责这方面的工作。“医疗设施——这是最现代的。所有设备都是从国外进口的最先进的设备。医院的病房像是一个庞大的机构，也同样很豪华气派：有精美的茶具、精制的玻璃器皿、漂亮的地毯，还有枝形吊灯。”“购买‘克里姆林宫贡品’只需花它的一半钱就行了，送到这儿来的都是精选过的商品。全莫斯科享受各种特供商品的人总共有4万。国营百货大楼有一些柜台是专为上流社会服务的。而那些级别稍稍低一点的头头们，则有另外的专门商店为他们服务。一切都取决于官级高低。”[23] 戈尔巴乔夫理所当然地享受这些特权，而且还不满足于这些特权，还在为自己建造新别墅。在政治体制改革和人民直接选举代表的背景下，苏共的特权制引起了民众的强烈反感，民众认为苏共只是为自己利益服务的党，并不能代表大众的利益，不投苏共的票。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开启了苏联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市场化之路，但是，这一切都来得太晚。戈尔巴乔夫意识到了苏联体制存在的问题，但他没有找到苏联体制的替代物，其最初的改革只是在修补旧体制。1990年后在社会激进情绪的推动下，他才开始根本改变原来的体制，但党内的保守势力制约其向前走，社会的激进势力又嫌他走得太慢，

抛弃了他并转而支持叶利钦。戈尔巴乔夫左突右击，艰难前行，1991年的“8·19”事件打断了他的改革进程，意味着戈尔巴乔夫改革彻底失败。在其后的几个月里，戈尔巴乔夫的主要任务是保住联盟，但因得不到叶利钦等共和国领导人的支持而没有成功。苏联的剧变表明，按照少数人的意志，用政权和国家机器的力量去搞的社会主义，根基是不牢靠的，这样的发展模式也没有可持续性，只有真正实现以人为本，得到民众的认可和拥护，社会主义才有生命力。

---

[1] 左凤荣，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2] 〔俄〕亚历山大·日夫科夫：《解冻的赫鲁晓夫》，刘明等译，新华出版社，2006，第345页。

[3] 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0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第500页。

[4] 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0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第500页。

[5] 黄宏、纪玉祥主编《原苏联七年“改革”纪实》，红旗出版社，1992，第7页。

[6] В.Политбюро ЦК КПСС.，По записям Анатолия Черняева，Вадима Медведева，Георгия Шахназарова （1985-1991），2-е изд.，исправ.и доп.М.：Горбачев-Фонд，2008，с.91.

[7] 〔苏〕阿贝尔·阿甘别吉扬：《苏联改革内幕》，常玉田等译，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0，第21页。

[8] СогрииВ.В.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ю（1985-2001：от Горбачёва до Путина）.М.2001，с.19.

[9] 〔俄〕尼·雷日科夫：《大动荡的十年》，王攀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第104页。

[10] 唐修哲、孙润玉：《岁月有痕——从苏联到俄罗斯亲历》，东方出版社，2008，第92页。

[11] 〔澳〕利伊乔·佩特罗夫：《戈尔巴乔夫现象——改革年代：苏联东欧与

中国》，葛志强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第46页。

[12] Гайдар Е.Т.Гибель империи.Уроки для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2-е изд.М.：РОССПЭН，2007，с.276.

[13] ФилипповА.В.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1945-2006 гг.），www.prosv.ru/umk/istoriya/index.htm.

[14]〔俄〕尼古拉·雷日科夫：《背叛的历史——苏联改革秘录》，高洪山、韩生民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第239页。

[15]〔俄〕克留奇科夫：《个人档案（1941～1994）——苏联克格勃主席弗·亚·克留奇科夫狱中自述》，何希泉等译，东方出版社，2000，第736页。

[16] ОрловА.С，Георгиев В.А，ГеоргиеваН.Г，Сивохина Т.А.：*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Учебник*，*2-е изд.*，*М.*：*ТК Велби*，*Изд-во Проспект*，2003，с.453.

[17] Козодой В.И，Становление оппозиционных организаций в Сибири（1989-август 1991г.）//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2008，No.5，с.82.

[18]〔美〕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曹荣湘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第133页。

[19]〔美〕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曹荣湘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第134页。

[20]〔俄〕米·谢·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第121页。

[21]〔俄〕米·谢·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第122～123页。

[22]〔哈〕努·纳扎尔巴耶夫：《时代、命运、个人》，陆兵、王沛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第60页。

[23]〔俄〕鲍里斯·叶利钦：《叶利钦自传》，朱启会等译，东方出版社，1991，第141～142页。

第二篇 苏联70年兴亡历史：成也苏共 败也苏共

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党纲中的苏联东欧剧变

聂运麟 [1]

一 对20世纪社会主义历史成就的总结

当前，苏联剧变这一历史事实，已经成为垄断资本发动的反共反社会主义运动的新的出发点，它们从其自身的阶级利益出发，断言社会主义是从马克思头脑中杜撰出来的，苏联东欧剧变是社会主义历史的终结。对此，资本主义各国共产党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表达了与之根本对立的立场和观点。

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认为，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20世纪社会主义既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作出了艰辛的探索，又对世界文明和人类的进步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 [2] 。第一，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开始了；第二，社会主义根本改善了劳动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状况，将贫穷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世界强国；第三，社会主义促进了科学技术的进步和艺术的繁荣；第四，社会主义实现了国内各民族的一律平等；第五，社会主义国家维护了世界的和平；第六，社会主义促进了妇女解放事业的发展；第七，社会主义推动了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和殖民地附属国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促进了社会进步；第八，社会主义创造了劳动群众代表苏维埃和苏维埃各民族联盟这样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前所未有的国家和社会制度；第九，十月革命在国际关系中开创了国家、民族之间兄弟般平等互助合作的新型关系，并为解决国家和民族之间的矛盾、冲突提供

了新思路。

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认为，20世纪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对世界各国人民是个巨大的鼓舞，它证明建立一个新的社会制度是可能的，证明创建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的无阶级社会是可能的。

二 对苏联剧变的原因的多视角分析

（一）苏东剧变的基础性因素：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的僵化

当前，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大多从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宏观视野上研究问题，认为模式的僵化、体制的弊病等所造成的生产力落后和社会僵滞，是苏联东欧国家剧变的基础性原因。

1.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的严重弊病

葡萄牙共产党认为，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的失败既有恶劣的外部环境这一客观原因，也有在后来的改革中迷失了正确方向这一主观原因，但更为根本的是这些国家建立了一种“背离了共产主义理想”甚至与之相对立的社会主义“模式”这一体制性原因。葡共纲领指出，这种“模式”偏离共产主义理想的基本内容甚至与之对立，具有五大“弊病”：第一，“政权不再是人民的权力，而成为一种过分集中在官僚手中，容易偏离人民群众的参与和意愿，不受监督机制约束的权力”；第二，“不是深化政治民主，而是强调国家的集权”；第三，“不是通过主要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来搞活经济，而是实行一种过分国家化的经济，从而使劳动者的积极性被逐步耗尽，生产力逐步下降”；第四，“不是在党内实行民主机制，深深地扎根于群众并从群众中获得革命的能量，而是在党和国家内都实行以行政指令为基础的官僚集中制，这种集中制由于党政职责不分而更加严重”；第五，“不是实行灵活的有创造性的理论，而是将理论教条化和工具化”[3]。正是这种弊病丛生的体制导致苏东剧变。

2.“政治权力过度集中的社会主义体制”没有能创造出高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力

英共纲领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20多年时间里，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超过了资本主义世界。但此后却增长乏力，“70年代中期后，苏联和东欧开始在生产力的质量和增长率方面落后于资本主义，特别是日本和德国”。这就暴露了苏联社会主义体制的严重弊病。英共纲领强调指出：“‘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官僚主义命令体制证明，它不能利用战后的科学和技术革命使各种社会生产力比资本主义更有效率。”“在同帝国主义的竞争中，未能收获科技革命带来的全部好处，是苏联及其他仿效苏联模式的中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垮台的根本原因。”[4]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纲领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认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严重失误，就是没有创造出高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力。

3.“行政极权的社会主义模式”不能给社会主义注入新的革命发展动力，使整个社会僵化

德国的共产党党纲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在很大程度上都采用了“行政集权的社会主义模式”。“如果说这种社会主义模式起初能够取得巨大经济成就，那么后来它证明自己不能及时领会科技革命的新要求，不能灵活地对此作出反应。结果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劳动生产率和物质生活水平的发展方面越来越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此同时，思想意识形态工作也僵化了。“社会科学失去了其通过有科学根据的预测，为解决正在发展的矛盾和社会主义社会的继续发展确定可靠发展方向的力量。党和国家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能力。”专制措施取代党内民主，党的政治和组织原则越来越不起作用，个人的积极性因国家渗透到所有社会领域而受到阻碍，“党的信誉日渐下降，最后失去统治地位”。

因此，德国的共产党的结论是，在“行政集权社会主义模式”下，“社会主义国家未能成功地建立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新生产力发展模式。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也未能长期和全面地得到贯彻”。“欧洲现实社会主义失败的主要内在原因在于社会状况日益僵化。它不能根

据其自身的基础，即根据已经达到的发展水平经常给社会主义注入新的革命发展动力。”[5]

（二）苏东剧变的关键性因素：执政党的蜕化变质

但是，不少国家的共产党认为，虽然传统社会主义特征的弊病对苏联东欧的剧变起着基础性的作用，然而体制是可以改变的，同样类型的社会主义体制，如中国、越南和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就没有出现悲剧性结局。在这里，关键的或根本性的因素是党的性质和作用。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是苏联共产党在俄罗斯的继承者，它在党纲中指出，尽管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犯有严重错误，但剧变不是不可避免的。造成苏联剧变的主要原因是党的蜕变。俄共党纲写道：“摧毁苏联社会的剧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几十年来执政党的尖锐转变所致。”

俄共认为，使党蜕变的思想上的原因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党纲写道：“从一开始，苏共就存在着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与官僚主义的对立倾向。它们之间的斗争在十月革命后更激烈了。正像弗·伊·列宁所警告的，在执政的共产党内混入了不少假革命者和缺乏思想性与原则性的投机钻营者。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具体代言人以其蒙骗性和长期性在过去和现在都是社会主义的主要危险。他们把国家和国家财产视为可以瓜分的‘战利品’。他们的目的最初被虚假的、托洛茨基式的苏维埃国际主义义务的解释所掩饰。假共产主义者号召年轻的共和国变成输出革命的基地，变成‘世界火焰的热源’。”

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党的领导人对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失去警惕。俄共党纲写道：“许多党的领导人对小资产阶级的影响估计不足、对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垄断、专横跋扈等，把苏共推向‘狂妄自大的党’的境地，上层领导越来越脱离千百万党员群众。”

使党蜕变的组织上的原因是党内部的分裂，由于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苏共内形成了两翼，实质上形成了两种流派，相互之间纷

争不休，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各自奉行的政治路线”。

苏共党的蜕变之所以能够变为现实，是因为党内缺乏正常而有效的监督。俄共党纲写道：“党追求党员的数量，缺乏领导干部有序的轮换与年轻化机制，导致党员不能坚持对党的领导干部实行正常监督的合法权利。不能防止越来越多的投机者钻入党内。党历史上的主要失误与不幸就在于此。”

由于党已经蜕变，所谓的“改革”也必然变质。俄共党纲写道：“社会先进阶层进行的条件早已成熟的改革和使国家进入新境界的夙愿，被腐败无能的国家领导以欺骗的手段用于反人民反国家的目的。口头上假仁假义地宣布各种形式的所有制平等，事实上千方百计地破坏最具生命力的公有制的作用。合作化的实质与形式被歪曲。”从而导致改革变为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剧变。

俄共党纲最后指出了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等人在苏共蜕变和苏联的解体中的历史责任：“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叶利钦和谢瓦尔德纳泽应对背叛党、无视民族利益、毁灭我们的祖国承担个人责任。腐朽透顶的头面人物及其帮凶决定‘把权力交换成财富’。” [6]

澳大利亚共产党与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持有类似的观点。

日本共产党也认为：“苏联及其附属的东欧各国的统治体制于1989～1991年先后崩溃，这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与社会主义道路背道而驰的霸权主义、官僚主义的破产。这些国家革命的出发点是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但是领导集体引导国家走上了错误的道路，其结果走了与社会主义截然不同的压制人性型的社会，最终导致解体。” [7]

（三）苏东剧变的重要因素：帝国主义的干涉和颠覆

美国共产党对不断揭秘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划苏联东欧剧变的材料有透彻的了解。他们认为，苏东剧变是多种综合因素造成的，其中帝国主义的压力对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起了重要作用。美国共产党的

纲领指出，苏东剧变，“这是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军备竞赛的压力，冷战，来自帝国主义的其他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压力在这里起到了主要作用。原因还包括在发展社会主义所有制和适应生产方式的经济组织形式时所犯的错误、管理和政治工作界限不明、政治和意识形态工作薄弱、一些国家背负越来越多的跨国银行和其他资本主义借贷组织的债务”[8]。

德国的共产党也认为：“冷战期间的禁运政策和消耗力量的军备竞赛使外部攻击的战线继续延伸，核威胁使外部攻击得到加强。帝国主义国家千方百计——直到制定反革命战略——破坏社会主义，使社会主义变得不稳定。”[9]

但希腊共产党不主张过分强调苏东剧变的外部因素，认为：“使社会主义国家发生资本主义复辟的行动始于内部，来自上层，而不是帝国主义的强制干涉。”[10]

这里要强调的是，各国共产党都不把自己关于苏联东欧剧变原因的见解看成最后的结论，他们表示要继续深入地对此展开研究。

三 对社会主义的反思

苏联东欧剧变的严酷事实，引发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以及如何推进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等基本问题进行了再思考，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思想和观点。

第一，社会主义是一个长期发展的历史过程。澳大利亚共产党和希腊共产党都明确指出，苏联东欧国家“低估了过渡时期的长期性”。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纲领也明确指出，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所犯的重要错误之一，就是“未能正确理解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

苏联东欧的剧变，使20世纪社会主义者迅速地建成社会主义的幼稚想法被彻底击碎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都在自己的党纲和纲领性文件中重新认识了社会主义的长期性问题。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在党钢中指出：“社会解放和社会主义变革将是一个长期复杂的

进程。历史已经表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变革不可能一蹴而就，即使在取得政权以后也要经历一个长期激烈的阶级斗争时期。”巴西共产党在2009年制定的党纲中得出“社会主义建设要经历一个包括不同步骤和阶段的过渡时期”的结论。

第二，不存在统一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必须依据本国的实际，采取特殊的方式和方法来建设社会主义。苏联曾经宣布自己的革命和建设道路，是各国人民必须遵循的唯一正确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然而，模仿苏联模式的中东欧国家都失败了，连苏联自身也没有逃脱解体的命运。这就使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清楚地认识到，社会主义不仅不能照抄照搬什么统一的模式，而且还必须根据本国的国情建设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因此，巴西共产党的纲领指出，世界上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建设和革命的模式”。“社会主义建设要根据每个国家特殊的历史、经济、社会、文化、种族等具体情况以及全球权力体系中的力量对比情况，采取特殊的具体的方法和方式。”这是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对社会主义的崭新认识，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第三，不存在一条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路径和方法，必须通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十月革命以后，列宁曾经想用战时共产主义的办法，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在经历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失败后，1921年春苏维埃国家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转而实行新经济政策，结果使受到重创的苏维埃国家经济得以恢复和振兴，工农联盟得到巩固。因此列宁非常坚定地指出：“我们不应该指望直接采用共产主义的过渡办法。必须以同农民个人利益结合为基础。”[11]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从苏联东欧剧变的教训、列宁新经济政策的经验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成功中清楚地看到，并没有一条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直接路径和方法，必须通过迂回曲折的道路，即通过市场关系走向社会主义。这是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崭新认识，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与实践具有重大的意义。

第四，建设社会主义必须进行反对两种倾向的斗争，特别是反对“左”的倾向的斗争。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工人党认为，在第二次世

界大战期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出现了两种偏离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趋势：“左”倾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以及右倾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左”倾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过高估计运动的发展水平，急躁冒进，超越实现目标所必需的发展阶段，从而导致冒险主义。20世纪50～60年代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估计，以及60年代苏联宣布正在“建设共产主义”，并将在80年代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等等，就是如此。与此相联系的是，“左”倾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又低估了资本主义运用新科技推动生产的能力及其自我调节的能力，对资本主义即将崩溃的预期作了过高的估计，等等。在这个过程中，资本主义发展中出现的复杂问题被忽视，资本主义危机现象被绝对化了，资本主义制度将瓦解的观点被简单化。

澳大利亚共产党认为：“‘左’倾宗派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都根源于资产阶级思想。这两种倾向导致相关政党的孤立和分裂，并使执政党的政策失败，甚至摧毁了社会主义社会。两者经常出现在一个党或一个人身上，必须反对这两种倾向。”

第五，社会主义是一个不断改革和发展的社会，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中应该警惕两种“危险”。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并不是完全没有进行改革，但他们的所谓“改革”却没有取得成功，而是最后葬送了社会主义，这是因为他们的改革犯有两个根本性的错误。其一，苏联在改革的发展方向上，盲目“照搬西欧的政治经济发展形式”，搞所谓“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革背离了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其二，苏联在改革发展的步骤上，采取激进冒险的步骤和方法，这样，“苏共变革的速度导致它丧失了对于形势的控制，威胁着它在苏联的领导地位，威胁着苏联的完整统一和社会主义的存在”。因此，澳大利亚共产党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应该吸取苏联东欧的历史教训，警惕上述“两大危险”。这就要求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一要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不照抄照搬别国的发展模式，走具有本国特征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二要采取循序渐进的步骤和方法进行改革，要像中国、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那样，对改革采取谨慎的态度，“摸着石头过河”，反对用急躁冒进的步骤和方法来进行改革。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除对社会主义进行了再认识以外，还对苏联东欧剧变的历史教训进行了总结，主要是：必须保持共产党的先锋队地位，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必须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不断改善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必须加强意识形态工作和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不能忽视同帝国主义的阶级斗争，特别是同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进行斗争；必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坚持民主集中制；必须重视社会主义内部的非对抗性矛盾，不断解决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重视社会主义内部的阶层变化，不忘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必须高度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必须加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团结，等等。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资本主义各国共产党在苏联东欧剧变问题的认识上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各党总结了社会主义的历史成就及其对人类社会发展所作出的伟大贡献，分析了苏联东欧国家剧变的原因，在此基础上对社会主义进行了全面的反思，总结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所有这一切对今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

[1] 聂运麟，华中师范大学教授。

[2] 参见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2000年10月修改通过的党纲、俄罗斯联邦共产党2005年10月修改通过的党纲、德国共产党2006年4月通过的党纲，巴西共产党2009年通过的党纲等。有的党还对苏东剧变作出了专门的决议，如澳大利亚社会主义党（1996年在其八大上改名为澳大利亚共产党）在1990年9月28日至10月1日召开特别会议，形成了有关苏东剧变问题的决议；希腊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95年3月通过了有关苏东剧变问题的决议，等等。

[3] 刘宏才主编《当代世界共产党党章党纲选编》，当代世界出版社，2009，第563页。

[4] 刘宏才主编《当代世界共产党党章党纲选编》，当代世界出版社，2009，第692～693页。

[5] 刘宏才主编《当代世界共产党党章党纲选编》，当代世界出版社，2009，第442～443页。

[6] 刘宏才主编《当代世界共产党党章党纲选编》，当代世界出版社，2009，第487～488页。

[7] 刘宏才主编《当代世界共产党党章党纲选编》，当代世界出版社，2009，第120页。

[8] 刘宏才主编《当代世界共产党党章党纲选编》，当代世界出版社，2009，第899～900页。

[9] 刘宏才主编《当代世界共产党党章党纲选编》，当代世界出版社，2009，第443页。

[10] 《欧洲社会主义制度覆灭的原因探析——社会主义的现实意义和必然性》，希腊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95年3月通过。

[11] 《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第190页。

苏共亡党过程中的意识形态教训及时代警示

朱继东 [1]

作为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有着1500万名党员的苏联共产党一夜之间失去统治地位，这一事件给我们的教训是极其沉痛的。在2000年12月法新社评出的20世纪共产主义世界的10大事件和新华社评出的20世纪世界10件大事中，俄国十月革命和苏联解体都名列其中，可见苏共亡党对世界影响之大。2011年是苏共亡党20周年，又恰逢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在这个特殊的时期，深刻反省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尤其是苏共亡党过程中的意识形态教训，深入剖析其带给我们的时代警示，避免重蹈覆辙，对我们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具有重要意义。这是我们必须解答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时代课题，不仅是我们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应该高度重视的，也是所有党员乃至所有关心中国发展前途的人都应该特别重视的。

一 苏共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缺乏甚至没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是最重要的原因

意识形态是一个国家生存发展的灵魂，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旗帜和灵魂，也是无产阶级执政党巩固执政地位的强大思想保证。毛泽东曾经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是要先造成舆论，总是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苏联是一个意识形态化的国家，整个社会也是一个意识形态化的社会。在这个国家和社会，意识形态决定着执政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决定着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发展 [2] 。所以，以列宁、斯大林为代表的历届苏共中央领导人都始终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高度注重理论创新和思想政治工作，把意识形态当做革命的强有力武器，始终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和整个国家、社会的指导地位，并且由党内的第二号人物分管意识形态工作成为一个不成文的规定。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带来的强大思想凝聚力，对于苏联强盛并成为世界社会主义的中心起到了极其重要的

作用。但是，从赫鲁晓夫开始，到勃列日涅夫，尤其是到了戈尔巴乔夫时代，苏共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不仅不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更没有为之献身的精神，甚至背离并最终背叛了马克思主义。他们在顺境时忘乎所以，在逆境中则失望消沉甚至迷失方向，领导干部的信仰迷失成为导致苏共亡党的最重要原因。

美国一直企图改变苏联社会主义的性质，但也承认只要斯大林在世，这种图谋就无法实现。赫鲁晓夫上台执政，被美国视为从意识形态上对其施加影响的好机会，并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尼克松在与赫鲁晓夫接触后，就作出如下判断："他信仰共产主义事业及其胜利的必然性，但他只是逢礼拜天在理论的祭坛上做做礼拜而已。我很难设想他实际上是否读过马克思的三卷《资本论》。在这方面，他与斯大林不同，后者广泛阅读并写下了大量有关共产主义理论的书籍。"正是建立在这种看法的基础上，斯大林逝世后，美国以赫鲁晓夫为重点，进行了一系列对苏联的意识形态演变工作，并取得了极大成功。就是从赫鲁晓夫开始，从全盘否定斯大林、丑化十月革命、丑化社会主义国家到鼓吹美苏合作、大国沙文主义、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再到后来在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上提出"全民党"、"全民国家"等，这一系列做法和宣传鼓动都有意无意中在帮美国人做着同一件工作，就是在从意识形态上瓦解苏共和社会主义制度。

戈尔巴乔夫时期这种现象更为严重。1987年11月，戈尔巴乔夫应美国出版商之约出版了《改革与新思维》一书，阐述了所谓"新的政治思维和对外政策的哲理"。他的"新思维"的核心是："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全人类利益高于阶级利益。""新思维"的基本准则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戈尔巴乔夫还宣称，"新思维"既是针对国际政治问题的，也是针对苏联国内问题的，是为了指导处于社会主义建设急剧转折时期的苏联的改革。1988年，戈尔巴乔夫会见奥地利共产党领导人时又说："新思维不是玩弄新名词，而是理论上和政治上必须遵守的最高原则。"由此我们不难发现，戈尔巴乔夫提出"新思维"，目的就是用它来否定、取代马克思列宁主义，从而成为苏联党和国家内外政策的指导思想。

就这样，“新思维”不仅成了苏共推行改革的指导思想，而且在“新思维”的指引下产生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和纲领。作为《改革与新思维》的重要产物，“多元化”更是直接导致苏联社会传统意识形态走向变异和崩溃。由于戈尔巴乔夫主政后对意识形态领域的调整改革是采取递进的办法——先提出“意见多元化”、“舆论多元化”，最后才提出“意识形态多元化”，麻痹了不少苏联共产党人的思想。直到1990年7月苏共二十八大通过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纲领性声明，公开放弃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根本原则，人们才意识到“新思维”的实质就是要放弃、取代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指导地位。作为苏共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不仅不再信仰共产主义，而且公开背叛马克思主义，成为苏共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掘墓人。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用“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取代苏联原有的制度，实质上就是在苏联进行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建设资本主义制度 [3] 。

此外，不仅苏共最高领导人，而且越来越多的苏共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也丧失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甚至背叛了党。例如，身为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的叶利钦以及苏共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宣传部部长雅科夫列夫等苏共高级领导干部不仅自己对马克思主义没有坚定的信仰，甚至已经成为思想上的反对派和苏共的掘墓人。以叶利钦为例，他在1990年6月12日将《俄罗斯国家主权宣言》提交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大会表决，在走向独立、摧毁苏联的道路上走出了第一步，也是果断的一步，给苏联其他加盟共和国树立了一个极坏的榜样。1990年底以后，叶利钦在否定十月革命、否定苏联制度、否定苏共的同时，毫不掩饰地表达对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的崇拜。以叶利钦为代表的自由派势力，主张苏联应利用大好的历史时机，参照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模式，对旧制度进行根本性的变革。他主张全面学习和照搬以美国为代表的大西洋资本主义文明，移植自由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模式，走一条彻底的西方资本主义化的道路，使俄罗斯尽快融入西方文明世界。1991年夏初，首次访问美国的叶利钦在纽约一所大学的演说中公开宣称：“俄罗斯已经作出了自己最终的选择。俄罗斯不会走社会主义道路、不会走共

产主义道路，它将走美利坚合众国及其他西方文明国家走过的那条文明之路。”苏共错用、重用的一批非马克思主义者和政治上的投机钻营之徒、野心家、阴谋家作为党的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等于自己培养了自己的掘墓人，破坏了苏共的根基。而且这些人的言行不仅影响恶劣，更导致大批党员思想混乱、信仰迷失，对党的前途失去信心甚至背叛党，导致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急剧下降并最终为人民所抛弃。

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李慎明带领的“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研究”课题组经过多年深入调研、分析后认为，苏联解体有着多种原因，但苏共的蜕化变质是根本的原因。几年来，“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研究”课题组经过认真分析、研究探讨，大家逐渐达成共识：苏共垮台、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斯大林模式”，即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而在于从赫鲁晓夫集团到戈尔巴乔夫集团逐渐脱离、背离乃至最终背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的利益[4] 。

苏共的教训警示我们，共产党领导人的信仰和德才对党的建设非常重要。如何保证党的各级领导权掌握在信仰坚定的党员手里，而不是掌握在投机分子和野心家、阴谋家手中，是关系党生死存亡的大事。值得警惕的是，当代中国一些干部、党员不下工夫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马克思主义在一些地方被淡化、边缘化已是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并且，不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没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也没有为之献身的精神等危险现象在少数领导干部身上同样存在，并且其中就有一些高级领导干部，例如陈希同、陈良宇、成克杰、李嘉廷、田凤山、郑筱萸、陈绍基、王华元、黄瑶、许宗衡、胡长清、慕绥新、王怀忠等一批省部级腐败高官就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因此，我们要牢记胡锦涛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强调的：“全体党员、干部都要把学习作为一种精神追求，深入学习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深入学习和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牢固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真正做到学以立德、学以增智、学以创业。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都要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坚定理想信念，

增强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懈奋斗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咬定青山不放松，真正做到坚定不移、矢志不渝。”我们不仅要高度重视党的思想理论工作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时刻注意坚定理想信念，而且要更加主动培养和选拔我们自己事业的代表人物尤其是领袖人物。必须坚持把最高领导权始终掌握在忠诚于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政党、国家和民族的人的手里，并始终高度重视培养年龄结构合理的一批又一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5]。

二 对斯大林等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的攻击、诋毁摧毁了苏联人民的理想信念的基石是另一个重要原因

20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苏联上演了两出历史虚无主义的闹剧，不仅大肆攻击、诋毁斯大林等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而且全盘否定十月革命、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等伟大成就。虽然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所作所为的目的、性质不同，强度、裂度不一样，但都是在动摇甚至摧毁人们的精神支柱和理想信念基石，摧毁苏共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基，也从根本上动摇了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基础。

苏共在自己历史上的虚无主义态度始于苏共二十大即将闭幕时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1956年2月25日，苏共二十大最后一天的凌晨，1340名会议代表被紧急召集到会议大厅，由赫鲁晓夫作了长达4个小时的“秘密报告”。“秘密报告”题目为《关于个人迷信及其后果》，从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斯大林违反法制进行大规模镇压的错误、斯大林在卫国战争中的错误、斯大林在民族问题上的错误、斯大林在处理苏联同南斯拉夫关系方面的错误、斯大林在经济工作中的错误、斯大林违背集体领导原则实行个人专断等七个方面，对斯大林进行了所谓的揭露和批判。虽然赫鲁晓夫突然抛出这个后果和影响都极为重大的“秘密报告”是有针对斯大林时期特别是斯大林后期个人迷信已经成为苏联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重大障碍的现实原因，但这份存在着严重失实的“秘密报告”在评价斯大林时采用了抽象肯定、实际上全盘否定的方法，处处把领袖作用同政党和人民群众的作用对立起来并使用对敌斗争的语言，并且很多地方是在捏造事实攻击、诋毁斯大林，

导致原来人们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被彻底打破，开始对苏共和社会主义产生怀疑，再加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反动宣传的影响，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思潮开始出现。在一些公开场合，斯大林的画像被当众扯下来撕碎；在一些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出现了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活动；在游行活动中，有人喊出了“打倒共产党”、“打倒苏维埃”的口号[6]。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包括西方共产党在内的整个共产主义世界，注定了苏联在冷战中的失败。俄罗斯科学院历史学博士博卡列夫在《苏共二十大与地缘政治》一文中指出，苏联解体的客观基础是苏联人民缺乏团结统一的价值体系，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是团结统一的价值体系被破坏的开端。这个报告损坏了使苏联人民紧密团结的领袖形象[7]。更为严重的是，赫鲁晓夫随后决定莫斯科红场不再悬挂斯大林画像，并要求中国等国家也不要挂斯大林画像，后来又把斯大林的遗体从红场的陵墓中迁出，把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立场向全世界公开。这种“非斯大林化”在意识形态领域制造了混乱，打破了苏联一代青年人的社会主义信仰，动摇了人民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心，破坏了党和群众的关系，开了否定苏联历史的先河。

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则继续延续了赫鲁晓夫的错误，他上台伊始便声明坚持苏共二十大以来的路线不动摇，同时理论界继续出现“非斯大林化”的思潮。虽然勃列日涅夫后来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推翻了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评价，那就是在正式场合从不表示要推翻二十大决议，但在实际上对斯大林犯的错误基本不谈，而强调他的功绩和在苏联历史上的作用。但这种暧昧的态度却进一步加剧了苏联人民群众的信仰危机，使苏联在表面强大的现象背后开始悄然走向崩溃的边缘。

1985年3月11日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后，戈尔巴乔夫更是再度掀起了“重评斯大林”运动。这场运动不仅规模大、范围广，而且涉及文化传统、历史条件、政治制度、经济基础等多方面，从对斯大林个人的否定发展到对整个党的否定，从对斯大林时期的否定发展到对整个70年历史的否定，从对斯大林体制的否定发展到对整个社会主义制度的否定，以“兵营社会主义”、“粗陋社会主义”和“行政官僚的社会主义”来描绘苏联社会，所谓“斯大林主义”、“斯大林体制”被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代名词遭到批判和否定。戈尔巴乔夫更是

把十月革命开创的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说成“极权官僚式的社会主义”，“已经遭到战略性失败”，并认为这种制度延误了国家的“革新”，是苏联遇到的一切困难的根源，应该彻底否定。上行下效，苏联历史学领域否定一切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和“重新评价历史”运动兴起，矛头直指苏共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不仅造成苏共领导地位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合法性危机”，更动摇了人们对共产党、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主义理想的信仰。就这样，从全面否定斯大林到全面否定列宁和苏联历史，再到全面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共产主义目标、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步摧毁了苏共执政的思想基础，最终全面否定了苏共的领导地位。这股历史虚无主义的逆流，在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中起到了其他因素不可替代的催化剂的作用 [8] 。

而历史是无法被真正篡改的，斯大林的功过自有公正评说。亲身经历过斯大林时期的苏联人民，充分肯定了斯大林伟大的历史功勋，但也亲身感受了他在肃反扩大化，以及他在工作作风方面不够民主甚至作风粗暴所犯错误而造成的苦果。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拂去历史的尘土，人们更加感到，斯大林的错误，绝不应当影响他作为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历史地位 [9] 。

中国晚清思想家龚自珍曾说过：“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灭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他深刻地揭示了在否定历史的现象背后人们的真实动机，是一条极其宝贵的经验。值得警惕的是，当前在中国国内，也有一股对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进行恶意攻击、诋毁甚至谩骂以及为汉奸、罪犯翻案的暗流涌动，并且在报刊、网络上不时有这样的文章出现，还有这样的书籍公开出版。这种行为为什么在国内会有市场？是什么势力在背后操纵？如果放任下去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我们应该采取怎样的切实有效措施去应对？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深思。我们要深刻认识到，敌对势力西化、分化中国的重要手法之一，就是丑化、诬蔑毛泽东。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他晚年也确实犯有严重的错误。但是，综观毛泽东一生，他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错。我们的一些民众乃至学者、记者没有搞清楚西方为什么把攻击的矛头对准毛泽东，不加分析地加以附和甚至煽风点火，这是很

无知、很危险的。如果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不清醒，认识不到这是西方摧毁社会主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谋略，而仅仅把毛泽东看成他个人，而没有看成他同我们的党、军队、国家、制度、历史密不可分，那我们就会犯极其严重的大错误，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尤其是有苏共的前车之鉴，我们更应该高度重视。

三“抽象人道主义”、“新自由主义”等西方思潮盛行摧毁了苏联党和人民的思想基础和经济基础

高举“抽象人道主义”的大旗，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一切机会主义者、改良主义者的共同特征，也最具有迷惑性。20世纪50年代，赫鲁晓夫在反对“个人迷信”、“专制独裁”的旗号下打起抽象人道主义的旗帜，提出把“一切为了人，一切为了人的幸福”作为党的纲领性目标，用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及唯心史观取代马克思主义，将其作为党的指导思想，鼓吹“全民国家”、“全民党”。而到了戈尔巴乔夫时代，更是高举“抽象人道主义”、“新自由主义”的大旗，用人道主义的观点作为阐述国际国内问题的准则，以“新自由主义”作为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把“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确定为“理想”和“奋斗目标”，这些西方反共思潮盛行摧毁了苏联党和人民的思想基础和经济基础。

1988年夏，戈尔巴乔夫提出要把苏联社会改建成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此后又不断加以说明和补充，最后成为1990年7月苏共二十八大通过的《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纲领性声明。声明中提出，要“坚决抛弃对不同观点和思想的意识形态限制、教条和不容忍态度”，“抛弃与全民和全人类价值观相抵触的简单化的阶级观点”。由此可见，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改革与新思维”、“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其实是在美化资本主义、丑化社会主义，是要用民主社会主义取代马克思主义，是要把共产党改造成社会民主党，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党从根本上的背叛。正如反共政治家、美国卡特时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指出：“戈尔巴乔夫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架起了一座从社会主义演变为资本主义的桥梁。”[10]

对此，有专家一针见血地指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哲学

基础是抽象人道主义。它宣扬“人是万物的尺度”，把社会主义说成符合抽象的“人性”和“一切人”的利益的“人道的”制度，否认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反对在任何情况下使用任何暴力，这就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从抽象人道主义的观点出发，提出所谓的“多元化”理论，并把它作为重要的思想原则。抽象人道主义认为，人的本性是独立不羁和不受任何社会关系制约的，他们向往绝对的自由和民主，因此作为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应该符合人的这一本性，尊重人的多元的思想，满足人的多元的需要和利益。根据这一观点，“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首先提出实行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反对意识形态的所谓“垄断”，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地位。与此同时，主张实行政治多元化，借口反对一党专政，取消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搞多党制和议会民主制[11]。

正如列宁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12]在苏共中央的最高领导人的示范带头下，苏联官方也大力支持人道主义的研究和传播，再加上西方国家在背后推波助澜，抽象人道主义在苏联迅速蔓延开来。首先是苏联哲学领域的人道化进程大大加快，抽象人道主义的力量迅速发展壮大并成为主流，越来越多的苏联哲学家主动或被动地把人道主义作为自己哲学理论创新的突破口和旗帜，不仅改变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面貌，更为严重的是改变了苏联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由于超阶级的人性论、人道主义价值观在理论和舆论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苏联在政治学、经济学、史学、文学等意识形态领域的巨变也自然难免。例如，苏联经济学界极力否定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庸俗性，贬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地位和作用；苏联历史学界否定一切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和“重新评价历史”运动的矛头直指苏共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造成苏共领导地位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合法性危机”；苏联文学界某些人提出极端民主和绝对自由的口号，散布否定一切的思想，攻击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文艺方针，夺取文学阵地并扭转苏联文学的社会主义方向……就这样，与抽象人道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日益占据统治地位相对应，马克思主义在苏联作为指导思想的地位不断遭到削弱，思想阵地逐步缩小，最终完全

丧失。

不仅思想上迷失，而且戈尔巴乔夫还以“新自由主义”作为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1991年4月，自由派经济学家亚夫林斯基与美国哈佛大学的教授共同制定了苏联经济改革纲领。这个被称为“哈佛计划”的纲领其实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大肆推销的西方所谓“新自由主义”的翻版。其基本思路就是：在西方的援助下，进行激进的经济改革，建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和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但这个充满了新自由主义理论色彩的“哈佛计划”，却受到了戈尔巴乔夫的特别青睐。在此基础上，1991年7月，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私有化法，制定了国有企业分阶段私有化的时间表 [13] 。这样就使苏联的改革按照西方指引的方向，走上了“不归之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走向崩溃，意识形态等政治上层建筑的分崩离析也自然是难免的。

近年来，境外某些媒体和机构借题发挥，打着解放思想、适应经济全球化、学习先进文化等旗号，用“话语平移”的手法把“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论”、“历史终结论”等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引入中国并力图在实践上推广。我们对此要彻底揭穿、坚决反对、严厉抨击、严令禁止，勇于揭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虚假性”、“普世价值”、“彻底私有化”等论调的险恶用心，敢于通过有理、有力、有利的论争，揭穿其企图否定和颠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妄图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险恶用心。

四 放任意识形态多元化导致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等反动思想甚嚣尘上是又一个重要原因

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旗帜和灵魂，也是无产阶级执政党巩固执政地位的强大思想保证。苏联是一个意识形态化的国家，整个社会也是一个意识形态化的社会。在这个国家和社会，意识形态决定着执政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决定着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发展 [14] 。所以，列宁、斯大林等苏共领导人都始终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把意识形态当做革命的强有力武器，高度注重理论创新和思想政治工作，始终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和整个国家、社

会的指导地位。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带来的强大思想凝聚力，对于苏联强盛并成为世界社会主义的中心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随着戈尔巴乔夫提出“意识形态多元化”，导致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等反动思想甚嚣尘上，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指导地位逐渐被放弃、取代。

苏联建立初期，列宁就十分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后来，即使在内外环境十分险恶的情况下，苏共仍一直高扬共产主义的思想旗帜，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意识形态的强大能动作用，基本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确保了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巩固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制度，赢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性胜利。但到了斯大林时期，意识形态逐渐僵化和教条化；而从赫鲁晓夫时期开始，更是逐渐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一元化的指导地位；特别是在戈尔巴乔夫执政之初，由于执政党没有能担负起引导社会意识形态的责任，在没有限度、毫无原则的公开性、民主化的旗号下，各种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势力开始迅速兴起并兴风作浪，很多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否定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和制度的文章公开发表。例如，苏共二十大以后，赫鲁晓夫加大了新闻的改革力度，部分照搬了西方的“新闻自由”的概念，报纸开始逐渐讨论在斯大林时代被严格禁止的话题，一些人以前被压抑的对于西方民主和自由的向往也被释放了出来，并在记者和作家中间形成了一股思潮。他们借批判和揭露斯大林之机，直接或间接地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并且质疑共产党执政的合理性，报纸的党性、政治性等都搞得极其混乱。虽然这种所谓的“新闻改革”很快被叫停，但意识形态多元化的潘多拉魔盒已经打开，其危害已经无法消除。

赫鲁晓夫的错误正赶上美国的强力渗透。1961年上台执政的肯尼迪总统提出了“和平战略”，强调在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的口号下，通过援助、贸易、旅行、科技和文化交流，设法削弱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对俄国的经济和意识形态的依附状态，从出现在铁幕上的任何裂缝中培养自由的种子”，“把共产党世界带进我们寻求的多样化的自由世界中来”。1982年6月，里根总统更是发表演说称：“我现在要叙述的一项长期计划和希望是，自由和民主的前进，将使马克思列宁主义

被弃置在历史的灰烬之中”，并提出美国要“举国一致地致力于援助民主的事业”，从而吹响了向社会主义国家发动“和平政治攻势”的进军号。

从戈尔巴乔夫提出“公开性”的那一刻开始，苏共主管的意识形态的闸门就向反共反苏势力开放了。1986年12月16日，戈尔巴乔夫打电话给被与世隔绝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代表人物萨哈罗夫，邀请他“回来干你的爱国主义工作吧”。1989年6月29日，戈尔巴乔夫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出版被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宣布剥夺其苏联国籍并驱逐出境的另一名“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代表人物索尔仁尼琴的那本以揭露十月革命以来“非人的残暴统治”为主旨的头号禁书《古格拉群岛》。苏联社会的意识形态环境变得更加无序和混乱，放任意识形态多元化导致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动思想甚嚣尘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苏联走向变异和崩溃。美国驻前苏联大使马特洛夫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突然间，人们不再怕直抒胸臆了。”“每个人都可以对共产党的统治进行最毫无保留的抨击。”更值得反思的是，“持不同政见者”的许多思想后来竟成了戈尔巴乔夫改革的主导思想，“持不同政见者”的民主化、公开性、多党制等早年主张都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得到了实现，许多“持不同政见者”竟然成为戈尔巴乔夫时期政坛的风云人物。

苏共二十八大之前的党纲和党章都明确规定，苏共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的党”，在全部活动中“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精神生活中占统治地位”。而苏共二十八大通过的纲领却规定“苏联共产党坚决放弃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垄断主义”。这样一来，就为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渗入打开了缺口。苏联社会的信仰危机这时也达到了高潮[15]。

意识形态多元化的一个严重后果是导致了大量政治派别和政治组织的出现。戈尔巴乔夫主政前期，苏联社会非正式组织比较少，也没有形成完整的政治纲领。但从1987年秋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发表后，非正式组织急剧增加，并且政治化色彩越来越浓厚，有的甚至成为批判社会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先锋，直接向苏共的执

政地位挑战。苏共二十八大前，仅全苏性的非正式政治组织就有16个，每个组织都有政治纲领。其中，有5个组织的目标是推翻苏共，有6个组织的目标是建立西方议会制政体，有2个组织的目标是恢复沙皇君主体制，有1个组织的目标是恢复斯大林体制，有1个组织的目标是建立非意识形态社会，有1个组织主张苏联解体。在这些非正式政治组织的活动中，一个明显的特点是，许多知识分子的政治化和非理性化极大地加剧了社会动荡[16]。

马克思主义在苏联社会意识形态领域里丧失主导地位带来的沉痛教训再次告诫我们：社会的舆论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会去占领；科学的思想在社会生活中失去了统治地位，价值观缺失、社会政治混乱就必然接踵而至。网络时代传播手段日新月异，颠覆了传统意识形态传播规律，打破了传统意识形态传播格局，多元、多样、多变的特征日益明显，意识形态领域的噪音、杂音此起彼伏，要求我们必须把意识形态提高到国家安全的战略地位。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的讲话中指出："经济工作搞不好要出大问题，意识形态工作搞不好也要出大问题，在集中精力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同时，一刻也不能放松意识形态工作。"当代意识形态的冲突有很多制度化，最大的莫过于突出了核心价值观的较量[17]。所以，为了保证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不变质和国家不改变颜色，必须正确处理好文化多样性和指导思想一元化的关系，在多样性文化发展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灵魂来统领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占领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指导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同时，反对把马克思主义非政治化和非意识形态化的倾向，尤其要警惕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篡改和否定，绝不允许意识形态多元化思潮在中国传播。

五 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高级干部"僵化"、"西化"导致了控制权丧失和意识形态混乱乃至反动

苏共不是在战争中被打败从而瓦解的，而是在和平的条件下完成了这一过程的；不是被反革命政治势力直接打倒的，而是由执政党领

导人自己宣布解散的。为什么会这样呢？斯大林有一句名言：“在制定了经过实践检验的正确的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党的干部就成为党的领导和国家领导的决定力量。”事实上，虽然苏共几乎一直由党内的第二号人物分管意识形态工作，但由于主管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干部“僵化”、“西化”，导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死气沉沉或乌烟瘴气，尤其是戈尔巴乔夫时期在苏共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高级干部中出现了盖达尔、雅科夫列夫等思想“西化”分子，雅科夫列夫甚至是一个反共反社会主义分子，使得苏共在意识形态领域解除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封印，释放出了毁灭自身的魔鬼，导致了苏共在意识形态领域控制权丧失和全党、全国人民意识形态的混乱乃至反动。

在斯大林时代，由于当时的复杂环境和特殊原因，主管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干部“僵化”现象比较突出，以思想“僵化”强硬著称的苏联20世纪40年代意识形态领导人日丹诺夫就是一个代表。50年代后期，随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相继去世，苏共中央领导层多数来自经济和组织部门，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有限，理论素养不高。60年代前后，苏共的意识形态组织领导水平下降的情况更加明显。虽然形式上一直保留着党的第二把手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传统，但思想干部经常受到经济工作和干部工作领导人的蔑视。社会思潮中对物质生活享受的追求也排挤了理论的思考和思想的对话。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由于害怕出现赫鲁晓夫所谓“新闻改革”带来的混乱局面，苏共又摒弃了赫鲁晓夫的思想和做法，把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倒退到了30年代的水平，把斯大林模式与社会主义等同起来。勃列日涅夫的思想又决定了主管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干部思想，使得苏联的新闻事业和舆论环境又回复到了斯大林时代的“僵化”状况。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中央宣传部的负责人经常更换，相对频繁地变动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领导人，说明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等苏共领导人极不满意中央宣传部的工作。“僵化”模式导致了意识形态领域空话套话连篇累牍，形式主义愈演愈烈，使得在苏共对意识形态的高度控制和对新闻的严格管制的表面下暗流涌动，埋下祸根。

戈尔巴乔夫的“小校友”、毕业于莫斯科大学经济系并具有博士学位的盖达尔崇尚资本主义制度，早在1986年就和一伙意气相投的经济

学研究人员在列宁格勒郊外组织了一次经济学研讨会，这群完全接受西方政治经济理论的年轻学者形成了一个政治团体——青年改革派。盖达尔被称为“芝加哥小男孩”、“完全美国化了的专家”、“被称为市场改革派核心人物”，他所代表的一批青年学者的理论主张，一是经济市场化，二是政治民主化。他们心目中的市场化就是建立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制度，民主化就是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而美国经济学家研究了这些年轻人的主张后发现，盖达尔们接受的不过是19世纪最简单、最天真的自由主义观点。盖达尔大学毕业后先后负责苏共中央最重要的理论刊物——《共产党员》杂志及苏共主要报纸《真理报》，是苏共意识形态机构中很有影响的人物。中央党刊、党报的高位使盖达尔成为苏共意识形态机构中有影响的人物，但由于他既没有任何生产和行政工作的经验，也没有对苏联经济社会生活的深刻了解，再加上不注重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只是把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上的东西当做法宝，成为被公认的思想“西化”非常严重的人，其影响之恶劣可想而知。

主管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干部“西化”使得坚持真理的人声音较弱而且被孤立起来甚至遭到打击报复，典型的例子就是列宁格勒技术学院女教师尼娜·安德列耶娃在1988年3月13日《苏维埃俄罗斯报》上发表《我不能放弃原则》这封信引发的风波。安德烈耶娃在信中说，当前报刊上轰动一时的文章只能教人迷失方向，是给社会主义的苏联抹黑。这封信引起轩然大波，所谓的“改革派”更将其视为“保守势力和苏共旧势力”的反攻倒算。苏共中央政治局接连两天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目的就是要制止和反击这股所谓“反对改革的势力”。结果戈尔巴乔夫将坚持马列主义原则、原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政治局委员利加乔夫调整为主管农业工作，取而代之的是曾留学美国的雅科夫列夫。在雅科夫列夫直接授意下，《真理报》4月5日发表了反击文章《改革的原则：思维和行动的革命性》，对安德烈耶娃给予全面反击和打压。《真理报》将安德烈耶娃的信称为“反改革分子的宣言”，把安德烈耶娃称为“改革的敌人、斯大林主义分子、保守派、机关官僚、党的权贵代表”。此后，各种攻击、谩骂苏共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文章纷纷出笼，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泛滥，整个苏联历史都被描述得一

团漆黑。由此，已经被撕开裂口的苏共思想和意识形态工作的大堤，急剧滑向崩溃的边缘[18]。

曾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宣传部部长的雅科夫列夫是苏共掌管意识形态工作的关键人物，也是戈尔巴乔夫的“密友”和“军师”，然而他不仅不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反而对资本主义赞不绝口，实际上就是一个隐藏在苏共内部的反共反社会主义分子。可以想象，这样的人掌管苏共意识形态工作，会是一个怎样的混乱局面。雅科夫列夫1967年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美国对外政策理论发展史，其答辩时所表述的许多观点都与官方见解相异。他1969年起担任教授，与此同时还在苏共中央担任过宣传部副部长、宣传部代理部长。据说，当时苏共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人苏斯洛夫对他“既做官又搞研究”极为反感，但却没有认清其本质并将其从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关键领导岗位上清除。在戈尔巴乔夫实行改革的开头几年，雅科夫列夫通过对戈尔巴乔夫施加影响和利用负责领导宣传舆论工作的权力，力图改变苏共性质和毁掉苏联社会制度。尤其是在掌握了苏共意识形态大权后，雅科夫列夫开始四处作报告、发表讲话或撰写文章，鼓吹所谓“民主化”和“公开性”。并且，他还安排所谓的自由派人士出任一些报刊的主编，使这些媒体成为他可以自由使唤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急先锋。在雅科夫列夫的主持下，1986～1988年，苏联一批最有影响的报刊先后被“新人”接管：《消息报》、《星火画报》、《莫斯科新闻》、《共青团真理报》、《论据与事实》周刊、《莫斯科真理报》、《莫斯科共青团员报》、《青春》杂志、《新世界》杂志等。苏共《真理报》、《共产党人》杂志、《经济报》等报刊的编辑部也大幅度调整。其中苏共机关最重要的理论刊物《共产党人》杂志的主编、有深厚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的科索拉波夫被解除职务。此后，这些在全苏很有影响的主流报刊煽风点火、左右舆论，为苏共垮台、苏联解体充当马前卒[19]。

面对敌对势力对马克思主义、共产党肆无忌惮地攻击，苏共一些领导人也曾感到事态严重，要求召开中央会议讨论党和国家的形势，对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思潮予以反击。而雅科夫列夫却说：“值得这样吗……改革正在正常地进行着。这是过渡时期不可避免的困难，不

要这样不安。”由于雅科夫列夫利用负责领导宣传舆论工作的权力力图改变苏共性质和毁掉苏联社会制度，媒体主动或被迫按照其意志去做，攻击马克思主义、共产党成为主要工作。

从1990年冬季起，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雅科夫列夫更是原形毕露，不仅在1991年8月6日宣布退出苏共，而且支持叶利钦，同谢瓦尔德纳泽等人组建“民主改革运动”公开反共。雅科夫列夫后来在其代表作《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中也再次暴露出了其本来面目，他对资本主义赞不绝口、顶礼膜拜。他认为：“资本主义带来了实用主义的伦理。在资本主义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中体现了崇高的理想主义，它依据的是清醒的、脚踏实地的现实考虑。” [20]

当前，我们一些部门和地方在选拔任用干部时，一味强调海外背景、高学历等，使得一些在海外留学时深受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甚至与我们党离心离德的人走上领导岗位，在党员群众中引起争议。苏联解体的悲剧警示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要严把党的干部选拔关，尤其是在任用从海外回来的人员走上党的关键领导岗位时，一定要首先考察其意识形态立场，警惕雅科夫列夫一类的野心家、阴谋家混入我们的队伍，防止其进入我们内部尤其是我们的权力决策部门或职能部门的高层，以深化改革为幌子，塞入他们渐进西化的私货，通过渐进潜行把改革引入他们事先设计好的陷阱中。其中，特别要严防主管意识形态、干部组织等工作的重要岗位失控，避免最终颠覆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应该尽快行动起来，通过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党校等权威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机构，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培养一批具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坚定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立场和过硬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能力的意识形态专业人才，充实到中央和地方宣传主管部门、理论研究机构和主要新闻媒体中去，让他们当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守门员、把关人。

六 媒体纷纷站到了苏共的对立面导致意识形态动荡使人们的思想观念变得日益迷茫和混乱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政治家们十分懂得舆论工具的重要性，

历来十分重视利用大众媒体和人员来往等加强意识形态宣传渗透工作。在苏联演变过程中，西方国家积极扶持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者控制各种新闻媒体，这些本来应该是党的耳目和喉舌的媒体纷纷站到了苏共的对立面，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已经成为苏共的“反对党”，以致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宣传在全社会大肆泛滥，严重动摇了人们对苏共和社会主义的信念，大大加速了苏共亡党进程。

1986年3月，在戈尔巴乔夫掀起的“重评斯大林”运动中，他邀请大众媒体批评苏联党政机关。他对新闻媒体说：“在当今社会发展阶段，我们的报刊可以成为独特的反对派。”在官方鼓励下，一些对“反思历史”特别激进的报刊如《星火画报》和《莫斯科新闻》逐渐暴露其真面目：借否定过去，否定苏共历史，否定社会主义，进而公然打出向资本主义方向“改革”的旗号。一些大型刊物靠揭露历史、曝光“隐蔽”材料、刊登所谓的反思小说等，发行量剧增——《人民友谊》杂志1989年刊登了雷巴科夫丑化斯大林的小说《阿尔巴特大街的儿女们》，这部被称为“文学炸弹”的作品一经刊登，该刊发行量即突破了100万份。《新世界》杂志1989年借刊登索尔仁尼琴反映劳改营和流放地的小说《古拉格群岛》，发行量从42万份猛增至250万份。此后，各种非正式出版物纷纷登台，苏共报刊舆论阵地逐渐被蚕食。1990年上半年，苏联境内各种“非正式”出版物多达上千种[21]。1990年6月12日，戈尔巴乔夫批准《新闻出版法》，宣布“新闻自由”，使苏联新闻体制和性质发生根本性变化。《新闻出版法》规定，舆论从此不受检查，取消新闻审查制度，各种组织和私人均有权办报，并扩大办报人的自主权。这实际上纵容了反对派报纸的大泛滥，不但没有改变新闻界的无序状态，反而使其混乱局面有增无减，以《真理报》为基石的苏联社会主义党报体系受到沉重打击，《莫斯科新闻》、《文学报》及隶属最高苏维埃的《消息报》等许多机关报刊都纷纷抛弃机关报性质宣告“独立”，《消息报》甚至长期批评苏共和苏联政府，支持各地的“民主派”和民族主义者。在这样的背景下，媒体迅速掀起了一股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暴露苏联社会的阴暗面、贬低苏联70年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狂潮。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者控制的新闻媒体在“重评斯大林”运动中更是把挖掘历史、揭露斯大

林时期的阴暗面作为吸引读者的手段。再加上右翼势力乘机推波助澜，掀起了一股步步深入直至全盘否定苏共历史和苏联领导的浪潮，苏共党员的思想被搞乱了，苏联人民的思想被搞乱了：斯大林成了恶魔，列宁成了无赖，整个苏共和苏联的历史除了罪恶还是罪恶，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带来的只是灾难，而资本主义则成了人们心目中自由和富足的理想天堂。人们逐渐失去了对党和国家的信任和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人们的精神支柱轰然坍塌。从1989年1月到1991年1月的短短两年内，就有290多万名苏共党员声明退出党组织，留在党内的党员也大都对党失去了信任。

原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主张不惜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把苏联社会上一切卑鄙的东西“神圣化”，使头脑清醒、忠于社会主义的人变成少数，被置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把他们变成众人耻笑的对象”。因此，西方反共势力一直在想尽办法通过支持苏联反共传媒和自己掌控的传媒，对社会主义展开全面的进攻。为了实施和平演变战略，西方发达国家分别建立其专门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新闻媒体。面对这种宣传攻势，戈尔巴乔夫不仅不积极进行斗争，反而为虎作伥，不仅在1987年1月指示停止干扰BBC对苏广播，不久又相继停止干扰美国之音、自由广播电台等多家西方电台的对苏广播，使苏联民众从此可以随时听到外国电台的声音。这些西方国家的喉舌大肆宣扬西方的生活方式，介绍西方对苏联改革的态度和观点，以西方的立场和视角评论苏联的政治局势。这对当时正处于改革十字路口的苏联人来说，其蛊惑性、煽动性不言自明。这可以在美国国际广播委员会那里得到印证：“苏联停止干扰西方广播，可能比戈尔巴乔夫决定从东欧撤军50万的允诺更重要。对美国来说，它为促进苏联社会的和平演变，提供了难得的机会。”此外，戈尔巴乔夫还决定拨款400万外汇卢布进口20种西方国家报刊，从1989年1月1日起公开发行，进一步助长了西方对苏联的舆论攻势，主动为西方媒体进入苏联打开了大门，对西方意识形态的进攻敞开大门。面对这些以前没见过的西方报刊，人们的意识形态受到极大冲击甚至颠覆。随着进一步放弃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以及大批冤假错案的平反，使苏联意识形态环境更加失序。美国驻苏联大使马特洛夫这时也评价说：“突然间，人们不

再怕直抒胸臆了。”“每个人都可以对共产党的统治进行最毫无保留的抨击。”

不仅报刊成为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阵地，而且电视台也不甘落后。1990年7月15日，戈尔巴乔夫发布关于电视和广播民主化的总统令。反对派极力挤进电视台并且要求直播，以便摆脱控制和剪辑。几位年轻记者在电视一台创办了直播政论性节目“视点”、“第五车轮”，公开抨击和批判苏共。1989年春天，根据修改后的宪法，全苏进行人民代表选举。反对派抓住竞选活动这个机会，通过电视直播，合法地将各种反苏、反共的声音传遍全国。苏共的党代会和后来全程电视直播的人民代表大会也成为反对派的重要舞台。实际上已呈垄断之势的所谓开放传媒和自由竞选运动，进一步加剧了苏共的信任危机，并由此成为政治上和组织上全盘否定苏共的开端[22]。因此，可以说是媒体失控导致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舆论一步步瓦解、摧毁了苏联意识形态大厦的根基，掏空了苏联制度的核心价值体系，加速了苏共亡党的步伐。正如叶利钦所说：“正是新闻传媒发起的揭露苏联历史黑暗面和现存体制缺点的运动，直接动摇了这一帝国的根基。”

对于一个马列主义执政党来说，强有力的思想意识形态工作就是它凝聚党心、凝聚民心、率领自己的党和人民前进的理想、意志和号角、旗帜。当它的号角、旗帜被夺取，当它的理想和意志被摧垮的时候，这个党还能够存在吗？答案显而易见。等到1991年，当主流舆论千百次地重复苏共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是失败的，当各种媒体把党的领袖的形象抹得漆黑一团，当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把这些谎言和谬论误当成真理之后，面对敌对势力宣布解散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危急时刻，还会有谁站出来捍卫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呢？[23]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结局已经作出了最明确的回答。

“常怀忧党之心，恪尽兴党之责！”我国新闻媒体是党和国家的喉舌，这一性质决定我国的新闻队伍在政治素质上应该是高标准、严要求的。但不可否认的是，一些新闻媒体的从业人员甚至负责人不注重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不学、不懂马克思主义，忽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能力建设，没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仰，甚至深受非意识

形态化、意识形态多元化等思潮影响，导致了一些攻击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言论时有出现。更值得警惕的是，不断有人攻击中国的新闻制度，鼓吹媒体民营化、私有化，更有一些西方的基金会、企业也趁机从介入中国媒体市场经营权开始一步步控制媒体的采编权，其用心、目的不言而喻。因此，我们一定要加强新闻从业人员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让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形成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成为其坚定的从业理念，从而把舆论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忠于马克思主义、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人的手里，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善于用政治的头脑、政治的眼光审视和思考复杂的社会现象，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动权、主导权，这是我们社会主义事业能否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

---

[1] 朱继东，新华社新华网编委、终审发稿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博士。

[2] 肖德甫：《世纪悲歌——苏联共产党执政失败的前前后后》，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第167页。

[3] 曹长盛等主编《苏联演变过程中的意识形态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第50页。

[4] 李慎明主编《居安思危——苏共亡党二十年的思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第18页。

[5] 李慎明主编《居安思危——苏共亡党二十年的思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第44页。

[6] 王立新：《苏共兴亡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第156页。

[7] 李慎明主编《世界社会主义跟踪研究报告（2008～200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第379页。

[8] 李慎明主编，吴恩远、王立强副主编《历史的风——中国学者论苏联解体和对苏联历史的评价》，人民出版社，2007，第285页。

[9] 李慎明：《李慎明自选集》，学习出版社，2007，第439页。

[10] 肖德甫：《世纪悲歌——苏联共产党执政失败的前前后后》，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第177页。

[11] 李慎明主编《世界社会主义跟踪研究报告（2008～200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第394页。

[12]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311页。

[13] 吴恩远：《苏联史论》，人民出版社，2007，第311页。

[14] 肖德甫：《世纪悲歌——苏联共产党执政失败的前前后后》，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第167页。

[15] 肖德甫：《世纪悲歌——苏联共产党执政失败的前前后后》，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第172页。

[16] 肖德甫：《世纪悲歌——苏联共产党执政失败的前前后后》，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第173页。

[17] 侯惠勤：《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与当代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第659页。

[18] 李慎明：《李慎明自选集》，学习出版社，2007，第466页。

[19] 李慎明：《李慎明自选集》，学习出版社，2007，第509页。

[20] 〔俄〕亚·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1999，第339页。

[21] 李慎明主编《居安思危——苏共亡党二十年的思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第469页。

[22] 李慎明主编《居安思危——苏共亡党二十年的思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第470～471页。

[23] 李慎明主编《居安思危——苏共亡党二十年的思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第473页。

社会信仰体系崩溃：前苏联制度颠覆的一个重要根源

金民卿[1]

一 信仰是个人前进的旗帜方向和社会发展稳定的维系力量

就个体来说，信仰是关系到生死问题的终极判断。人在生命的取舍面前是最慎重的，生与不生、为什么生、怎么样生，死与不死、为什么选择死、死后怎么样，这些问题是每一个人都越不过的重大问题。当一个人超越了个体存在和现存状态，把自己的生命与某种未来状态、某个群体存在联系起来之时，信仰问题也就出现了。一旦确立某种信仰，个人的生命就获得了信仰上的意义，个体生命就可以同某种群体生命联系在一起获得集体化存在，短暂生命就可以同某种不朽联系在一起，获得永恒化存在。因此，个人的信仰实际上也就成为一个人的精神依托、行动指向和生命归宿。

有了信仰就有了前进的方向，就有了奋斗的动力。信仰的坚定性和一致性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鲜明特点，他们把对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作为人生奋斗的旗帜和方向，在信仰的旗帜下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当年的革命志士，确立了共产主义的信仰，把个人的生命同人民的解放联系起来，把短暂的生存同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联系起来，在艰难困苦面前绝不后退，即便是在敌人的屠刀面前，也无所畏惧，因为他们已经在信仰层面获得了不朽的生命。1920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给罗章龙的信中就明确，一个政党，一个团体，必须要有共同的信仰、共同的主义，要成为主义的结合而不只是个人情感的结合。只有有了共同信仰的主义，大家才能够成为一个团结战斗的团体。主义就像一面旗帜，旗帜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毛泽东在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之后，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奋斗前进的旗帜，在这面旗帜的指导下，他历经坎坷，从不动摇，最终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民族解放，建立了新中国。邓小平在《悼伯承》一文中讲过一段话："和许多忧国忧民之士一样……一旦看准了，选定了，他

就为实现自己的信仰鞠躬尽瘁，万死不辞。从他接受马克思主义、参加中国共产党那一天起，从民主革命时期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从战争年代到和平年代，从指挥作战到治学办校，顺境也好，逆境也好，无论何时何地，客观环境有什么变化，他始终是把自己的一切贡献于、服从于党的需要，把自己融合于党的事业之中，毫无个人荣辱得失的考虑，真正达到了忘我的境界。”[2] 这段话实际上代表了一大批革命志士的共同特性。

个人的信仰有巨大的生命规约力量，而社会的信仰体系则具有巨大的精神维系力量。当一个社会确立了共同的信仰认同，获得了共同的精神维系，这个社会就会在这个信仰的维系下保持稳定和发展，而超出这个信仰的做法则会遭到共同的反对。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最科学最先进的思想体系，以此作为自己的信仰，作为中国人民前进发展的方向引领。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靠着这种信仰，把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紧密团结起来，进行了波澜壮阔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中国人民获得了巨大的精神力量，战胜一切敌人，获得了民族解放和革命胜利；新中国成立以后，在遭遇重大困难的情况下能够众志成城，力克时艰，不断取得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发展的胜利。正如邓小平所说：“如果我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充分信仰，或者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自己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中国革命就搞不成功……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建国以后……我们解决吃饭问题，就业问题，稳定物价和财经统一问题，国民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了大规模经济建设。靠的是什么？靠的是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3]

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无产阶级政党历来高度重视信仰体系建设，用共产主义信念来统一人们的意志，整合社会思想，形成革命斗争和社会发展的合力。马克思恩格斯强调，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具有革命毅力并努力进行宣传工作”[4] ，用先进的理论武装群众，使人们树立共产主义的意识，在世界观和理想信念上发生重大改变，放弃错误信仰，树立科学信仰。列宁强调指出，无产阶级政党要“帮助培养和教

育劳动群众，使他们克服旧制度遗留下来的旧习惯、旧风气，那些在群众中根深蒂固的私有者的习惯和风气”。帮助工农大众追求社会主义的理想，为社会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这应成为“教育工作者和共产党这个斗争的先锋队的基本任务”[5]。斯大林指出，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组织“文化教育”和“文化革命”的目的就是“用社会主义精神改造人”[6]，帮助人们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毛泽东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十分重视通过思想政治工作来帮助人民纠正错误认识，树立科学世界观，确立马克思主义的理想和信仰。他曾经明确指出：“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7]“应该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没有这种宣传和学习，不但不能引导中国革命到将来的社会主义阶段上去，而且也不能指导现时的民主革命达到胜利。”[8]

二 前苏联社会信仰体系崩溃的历史进程及其恶果

苏联后期全盘否定斯大林，消解苏联人的领袖信仰，社会信仰体系被打开一个缺口。苏联社会的信仰体系崩溃是从信仰紊乱开始的，社会信仰体系的紊乱是从否定斯大林开始的，紊乱的第一个豁口是革命领袖信仰被打破。苏联人民对斯大林的信仰是在历史和实践中形成的。20世纪30～50年代，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正是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维护了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国家的强盛发展。尽管斯大林曾犯过一些重大错误，但是同他所取得的成就相比，这些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由此，斯大林几乎成为苏联人民的精神依托和不可替代的信仰对象。虽然这种神化领袖的做法存在着弊端，但是对于社会制度的维护，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产生了强大的精神维系力量，形成了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强大精神合力和实践合力，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195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赫鲁晓夫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反斯大林“秘密报告”，对斯大林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用一些“事先没有进行核实”的材料，把所有责任都推到斯大林一个人身上，给斯大林画了“一幅丑陋的肖像画”[9]，进行恶毒的诋毁诽谤和全盘否定。一

个长期以来被推崇为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斯大林被完全妖魔化为“人间恶魔”，成为“法西斯主义独裁者”的形象。伟大领袖成为恶魔的化身，信仰对象的被极端妖魔化，给人们的心理、思想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信仰坚定性发生了动摇，人们对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始产生怀疑。这种怀疑开始只是一种不确定性，但经过政党宣传机器的不断重复，妖魔化被羽化成为一种“客观实在”，人们对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信仰逐渐消散。随着斯大林的被妖魔化，包括列宁在内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形象，都遭到了严重质疑，对革命领袖的不认同逐渐成为一种社会共识。从社会大众的信仰系统来说，红色革命情结开始切断，革命领袖信仰开始破裂。这样，人们就失去了一个长期以来坚守着的信仰对象，即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由于领袖信仰的打破，整个社会的信仰体系被撕开了一个大大的口子，社会信仰体系的紊乱由此开始。

苏共变质变向，社会大众对苏共的认同日益消失，社会信仰体系又被打开了一个缺口。20世纪60年代以后，苏联共产党本身开始发生一系列内在变化。党的性质越来越从无产阶级政党向社会民主党方向的全民党转变。赫鲁晓夫提出“全民国家”、“全民党”等一系列理论观点，模糊了苏共和苏联应有的阶级和社会属性，与马克思主义立场和基本原理、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和方向背道而驰。赫鲁晓夫上台后，表面上声称要“破除个人崇拜”，而实际上在推行党内独裁，而这种党内独裁不仅不能获得广大民众的认同，连党内的原有支持者也开始反对他。党内生活越来越不正常，演变成为恶性的党内派系斗争，民主集中制原则被严重践踏，赫鲁晓夫的不正常下台就是一个明证。党的领导干部腐败现象越来越严重，在日益脱离群众的同时形成了一个既得利益集团，党与群众之间的对立局面开始形成。于是，人们对这个政党本身越来越感到失望，对共产党的信仰逐渐被打破。由于苏联共产党本身的变质变向，党的政策在党内斗争连续不断和指导思想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日益脱离人民的需要，出现严重失误，由此而导致了苏联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了严重的停滞甚至倒退。人民对苏联社会主义的前景感到迷茫和失望，进而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出现了裂变，制度信仰发生动摇。随着政党信仰被打破和制度信仰的动摇，社会的信仰体系的裂口进一步被打开，其支撑点更加脆弱。

非马克思主义理论逐步占据指导地位，社会信仰体系的紊乱进一步恶化。20世纪60～70年代，苏联共产党一方面仍然声称自己依然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甚至宣称自己进入了“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但另一方面，又把抽象的人道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写进了党的指导思想当中，提出把“一切为了人，一切为了人的幸福”作为党的纲领性目标，用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及唯心史观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声称要把苏联建设成为一个“人人幸福”的人道社会。这样，就在党的指导思想中出现了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以及反马克思主义并存的局面。党的指导思想所出现的这种“主义”的混杂和冲突，不仅导致了党的政策缺乏一致性，党的工作无法正常进行，同时造成思想文化界失去了统一的思想政治标准，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一方面，马克思列宁主义因其科学真理性，仍然得到大多数知识界人士的赞同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声音依然高亢。另一方面，抽象的人道主义、超阶级的人性论思想、民主社会主义、极端自由主义等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严重泛滥，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观点的修正主义甚嚣尘上。抽象人道主义成为哲学主流，人道化成为苏联哲学家们更新哲学理论的一面旗帜；经济学界极力贬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地位和作用；文学界某些人提出极端民主和绝对自由的口号，攻击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文艺方针，扭转苏联文学的社会主义方向。在此情况下，广大人民群众在认知上出现了严重错乱，在行动上无所适从，精神维系的支撑点越来越模糊。理论信仰出现严重紊乱，社会信仰体系日益走向崩溃。

全盘西化的“新思维”，全面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导致了社会信仰体系的全面崩溃。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在理论上就是用资产阶级的普世价值观取代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的指导思想，其核心观点是“承认全人类的价值高了一切”，“全人类利益高于阶级利益”[10]，“新思维”改革的纲领是所谓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企图用这种与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完全背离的“理想”和“奋斗目标”，以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解除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和在社会生活中的指导地位。在所谓的“公开性”中，主张毫无保留、毫无限度的公开性，

放开新闻舆论的控制，为各种反苏反共反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泛滥提供了机会，使人们的思想日益迷茫和混乱，解除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信仰。“新思维”彻底否定十月革命以来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和历史经验，否定了社会主义存在的现实合理性，认为苏联的社会主义已经到了“危机前的状态”，必须对苏联的社会主义进行“从上到下，从经济基础、所有制关系到上层建筑的整个社会”进行“根本改革”，“广泛地、彻底地和果断地行动，不惜采取最大胆的步骤”。戈尔巴乔夫采取这种最大胆的步骤进行制度的彻底变革，他自己就把全面民主化的纲领看做苏联“现有政治制度变革的纲领”[11]，解除了人们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制度信仰。“新思维”改革在经济领域的核心是取消公有制，实行私有化，建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政治领域的核心是民主化，其实质就是在政党制度上实行多党制，在政治体制上实行议会民主、自由选举、三权分立、总统制，在党的组织上实行全民党，这与马克思主义的民主思想相背离，在实践中导致苏联共产党日益社会民主党化并由掌握全国政权的执政党自我降格为议会党，最终丧失政权。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并没有给苏联社会和苏联人民带来福音，相反却带来了国家分裂和制度颠覆，整个国家陷于巨大的社会动荡之中。

缺乏信仰支撑的社会，必然出现动荡乃至颠覆性变革。20世纪80年代后期，已经变质变向的苏联领导人，日益把苏联共产党挤出了领导地位，把马克思主义排斥在国家精神生活的领域之外，把苏联社会推向了社会主义的反面。此时，因为长时期以来社会信仰体系的紊乱和崩溃，人们长时间不能得到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对于苏联共产党已经失去了信心，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前景不抱希望，对苏联领导人完全失去了信任。维系人们关注国家发展和制度延续的政治热情和精神动力已经不复存在，再加上苏联经济社会发展状况长期得不到改善，打破现存社会状况，谋求新的生活状态，渴望新的治理方式，越来越成为社会的普遍心态，精神上的变革欲望和行动上的无政府主义已经形成。由此，人们静静地看着戈尔巴乔夫被逼下台，把苏联发生的社会动荡、国家分裂、制度颠覆等重大事件看做顺理成章的，并没有引起强烈的社会反抗，相反，倒对新的制度和政府表示一定程度的欢迎。

历史变革虽然显得有些沧桑无奈，但是历史就是这样无情，苏共和苏联领导人在逐步打破社会信仰体系的同时，实际上已经在为自己举行着一个并不令人伤悲的葬礼。

三 当代中国必须高度重视信仰体系建设

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我国目前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和综合国力再上新台阶的历史时期已经到来。同时，我国的改革发展也面临一系列新情况、新课题，发展的外部环境也更趋复杂。在此情况下，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尖锐复杂。各种敌对势力对我实施西化、分化的活动愈演愈烈，渗透的手法和策略呈现许多新特点新变化，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舆论时有出现，引导整合多种社会思潮的难度不断加大。进而，社会大众甚至党员干部的信仰也出现了令人担忧的情况。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市场化确定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取向，构建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但是，在市场经济建设的过程中，一些人从西方经济学家那里借用了实用主义伦理学作为理论基础，提出的思路和论断往往忽略人的社会性存在，忽略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个根本目标，把经济社会发展演变成为单纯的经济增长，离开了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而走向片面的发展观。而且，把市场化这个仅仅限于经济领域的取向无限蔓延到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对整个社会生活带来严重的不良后果。社会的物质化，导致了人的精神世界的日益枯竭，信仰失去了存在的空间。物质主义不断膨胀，演变成为一些人信奉的价值观，单纯以物质财富的多少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由此，消费主义、实用主义思想等获得了发酵的土壤，导致了极端个人利己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给整个社会的信仰体系乃至社会稳定带来诸多不稳定因素。

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展开，国外的文化思潮大量涌入中国，在活跃我国文化思想的同时，也给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带来了挑战。特别是，境外敌对势力乘机加大对我国的文化渗透，力图实现其对我西

化、分化的政治图谋。这增强了我国文化安全形势极大的复杂性，给我国的社会信仰体系造成强大冲击。一是以“普世价值”为载体，渗透资产阶级的核心价值观，冲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2005年，流亡美国的胡平就通过《简评中共民主白皮书》，以所谓“普世价值”为武器，攻击否定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2007年秋，借助于某些报刊和网站媒体的推动，“普世价值”论开始在国内扩散、传播。2008年以后，境内外一部分媒体又借题发挥，曲解民族分裂问题、抗震救灾精神、奥运口号等，误导了很多群众、青年学生甚至党员干部，在社会舆论和人们思想中造成了极大的混乱。随着知识界的批判以及国际金融危机对西方体制神话的重创，“普世价值”的鼓噪有所降温，但远没有结束。二是利用政治性非法出版物攻击主流意识形态，诽谤党和国家领导人，冲击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和革命领袖的信仰。例如，《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晚年周恩来》、《新发现的毛泽东》等，旨在颠覆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和国家根本政治制度，切断中国人民的红色情结。这些出版物大多具有攻击诽谤、捏造事实或煽动性敏感内容，容易对具有猎奇心理、缺乏判断力的读者产生思想政治上的误导，而一些媒体对恶意歪曲历史、丑化领袖的言论和人物，不仅不加以禁止，反倒提供传播平台。三是以宗教活动为媒介，把渗透对象向青少年集中，着力影响下一代的信仰。近年来，西方宗教渗透更加直接、广泛并逐步公开化，他们利用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进行“空中传教”，宣扬“美国富强因为是基督教国家”、“基督教超越国家、民族界限”，攻击我国没有宗教自由，鼓动信徒对抗国家政策法令。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境外宗教势力把渗透的对象重点放在青少年身上，在青少年世界观、人生观尚不成熟的阶段，用宗教思想加以诱导和渗透，培养其对教会、宗教的好感，切断他们走向马克思主义的路径。四是利用学术途径渗透西方意识形态话语，向党政机关和学界渗透，企图影响广大青年和党员干部的理想信仰。

在这些内外因素的冲击下，马克思主义信仰受到了很大影响。改革开放之后，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作为一种信仰体系，尽管在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中不断强化，但在社会大众乃至一些党员领导干部当中，其信仰力量、精神维系力量却遭到削弱。

一些领导干部中存在的“两面人”、“瞬间人”的现象，凸显了这些领导干部党性不纯，理想信念缺失，信仰的动摇和空虚。“两面人”干部就是像陈良宇、成克杰之流的高干贪官，他们善于装廉表演，搜出苦心编织的荣誉光环和一大串廉政名言，台上道貌岸然，正襟危坐，一副正人君子模样，台下却贪赃枉法，徇私舞弊，贪财、贪色、贪誉，失去了最基本的信仰和党性，沦丧了最起码的做人品德，成为当前党内的危险性因素。“瞬间人”干部，就是那些目光短浅、急功近利的领导干部，他们总想着在自己的任期内干出些出人头地的事，甚至不惜劳民伤财地大搞所谓的“形象工程”，热衷于“短、平、快”的“政绩工程”，着力于为自己树碑立传，为自己往上爬创造条件，根本不考虑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不考虑党和国家的全局利益，陷入到极端个人主义而放弃了共产党员应有的理想信念。前几年被中纪委查处的原沈阳市市长慕绥新就十分典型。他上任后一年内搞了两个城建项目，沈阳市一下子迈进了全国卫生先进城市的行列，其本人也获得了1998年联合国颁发的“人居奖”。但是这些“政绩工程”却给沈阳人民留下了沉重的包袱。仅二环路和高速公路，沈阳市就要连续在10年中每天付给投资的港商50万～60万元人民币。以几代人的包袱换取一个人的政绩和发达，可见其思想境界低下到什么地步，其共产主义信仰丧失到什么状况。

学术界、教育界一些人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思想混乱，在信仰问题上模糊不清。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存在着阐释不连贯、不明确，甚至有相互矛盾、前后冲突之处，提出所谓的“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学术的马克思主义”、“官方的马克思主义”、“民间的马克思主义”等概念，把马克思主义多元化，而我们的有关部门却并不加以阻止，甚至一些媒体也加以引用。2010年5月，我们在一项关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调研中发现，我国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以来，在不少高等院校遭到冷遇甚至抵制，一些校长和教授不赞成、不使用“马工程”教材，不重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相关课程，有的高校把这些课程安排为考察课，对学生无法形成约束力，反而促使他们对主流意识形态抱有抵触情绪。这种现象极大地削弱了马克思主义作为信仰体系的精神维系力量。

思想文化领域存在着“庸俗宽容”倾向和用人标准上的“中庸化”，助长了错误言论的泛滥，冲淡了共同理想的号召力。一些人误解或故意曲解“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意识形态不争论”的思想，对错误的和反动的思想缺乏明确态度和立场，视而不见、听之任之，作壁上观，而不与之正面交锋。这种漫无原则的“庸俗宽容”，导致了许多正常的政治批评和理论抵制无法展开，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学者的“批判合法性”遭到质疑。一些错误和反动言论者将主管部门的态度视为默许，气焰不降反升，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新实用主义等一些明显具有错误倾向甚至反动倾向的思想盛行无阻，主张这些错误思想的人成为所谓的学术英雄、思想精英、“学术良心”。这就给思想文化领域带来了诸多杂音噪音，使社会信仰体系显得复杂紊乱。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得到推崇就是典型的一例。2004年9月《南方日报》属下的《南方人物周刊》推出了中国最有影响的“公共知识分子”50人名单。这些“公共知识分子”自我标榜“理性”、“超然”、“独立”、“秉持良知”、“兼具专业性、公共性和批判性”素质，但大都是非马克思主义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例如，一位榜上有名的“公共知识分子”就在境外网站上宣称：“在今天的大陆，‘公共知识分子’就是在知识上、政治上对共产党统治满怀否定和愤怒的人，就是对持不同政见者的隐约称呼，是异议人士开始浮出水面的标志。”这些人得到了与他们观点类似的部分媒体和受众的支持和共鸣，并在涉世不深、思想单纯、对中国近现代历史和国情了解不多、缺乏今昔对比经历、是非真伪判断能力较弱、正处于成长“叛逆期”的部分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和群众中有一定市场。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面对中国当前社会信仰体系不容乐观的局面，比较苏联解体和制度巨变的历史，中国人不能不有所深思，有所警醒。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信仰问题已经越来越突出，如果不加以重视，将不仅会对文化意识形态建设产生重大影响，而且会危及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甚至成为引发社会动荡和制度变革的导火索。为此，我们必须加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切实建设好社会信仰体系，以更加有效的方式方法巩固人民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

[1] 金民卿，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2]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188～189页。

[3]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63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第572页。

[5]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303页。

[6] 《斯大林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79，第470页。

[7]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77页。

[8]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706页。

[9]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第152页。

[10] 〔苏〕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第183～184页。

[11] 参见〔苏〕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第20、61、55、48、62等页。

成也苏共 败也苏共

——论苏共民族政策与苏联解体的关系

赵常庆 [1]

迄今人们讲苏联解体，讲体制原因、经济原因的很多，民族原因也会被提到，但往往被置于次要的位置。笔者个人认为，苏联解体应该包括以下两层意思：一是苏共领导的社会主义大国不存在了，苏共也亡党了；二是苏联作为由15个加盟共和国组成的联盟国家不存在了，在原苏联版图上诞生了15个新的国家。从“苏联解体”的字面本身理解，后一个意思似乎更贴切，但目前人们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前者。事实上苏共的分裂不仅表现在中央层面，也表现在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与苏共中央的分道扬镳。苏联国家的分裂是从苏共分裂开始的。苏联成在苏共，败也在苏共。苏共的民族政策则是苏联兴亡的重要原因。

一 苏共是苏联的缔造者

说到苏联解体就不能不提苏联的建立。众所周知，苏联是在1922年12月30日成立的，比十月革命胜利的1917年11月7日要晚5年。不过我们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往往是指十月革命的成功。

然而，十月革命胜利前后的俄国国内形势相当复杂，其中包括民族关系。这是因为沙俄是由多民族组成的国家，而且存在严重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问题。1905年俄国爆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动了俄国各族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而苏共的前身社会民主工党把实现“民族自决权”、“民族区域自治”和“民族平等”等民族解放的内容写进自己的纲领。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统治，各地民族运动进一步高涨，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仍坚持沙俄的民族政策，引起民族地区的不满和反抗。1917年11月7日十月革命胜利，建立了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但该共和国的管辖范围要小于今日的俄罗斯联邦。在沙俄其他

地区，如乌克兰、白俄罗斯、外高加索、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芬兰、波兰等地，由于有的宣布独立，有的处于“红”、“白”政权拉锯状态，这就造成在苏联成立之前，在沙俄版图上，出现了60多个独立民族共和国和民族自治实体，昔日沙俄已经处于支离破碎状态。

当时，刚刚夺取政权的布尔什维克党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十分严峻。国内有各种反动势力的叛乱，国外有英、法、美、日等帝国主义国家的大规模武装进犯，战火燃遍苏俄各地，再加上国内经济十分困难，各地民众缺衣少食、饥寒交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面临生死存亡的巨大考验。从民族角度来看，此时俄国的形势与1990年前后的苏联有些相似，但国内外形势远比1990年时的苏联复杂，起码解体前的苏联国内还未到饥寒交迫的程度，国家也没有遭到外国的武装进攻。

严峻形势在考验布尔什维克党。该党在列宁的领导下沉着应对，由于方针正确、措施得当，几年后过了最危难的时期，红色政权站稳了脚跟，而且破碎的沙俄重新成为统一的苏联。当时俄共（布）最成功的决策之一是通过建立联邦的方式将已经宣布独立的乌克兰、白俄罗斯、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格鲁吉亚等共和国重新与俄罗斯联邦结盟，于1922年12月30日组建了苏联。

苏联之所以能够成立，主要在于以下原因：第一，各新独立国家生存的需要；第二，大体一致的价值取向；第三，统一的俄共（布）的存在和坚强领导。第二点很重要，价值取向不一就很难联合，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由于政权为资产阶级所控制，就没有加入苏联。而第三点更重要。当时各国虽然独立，但党是国家的领导核心，各国党组织归属俄共（布）领导。尽管各国党组织对俄共（布）作出的建立联邦国家的决定存在不同的看法，但必须执行中央的决定。俄共（布）像一条纽带将各新独立国家联系在一起。此时的俄共（布）是充满活力并得到国内各民族工农大众拥护的战斗集体。历史证明，它在苏联成立前后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尽管当时党员人数远不如20世纪80年代苏共人多，但所发挥的作用远大于苏联解体前的苏共。可以说，没有俄共（布）就没有苏联，苏共是苏联的缔造者。

二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对苏共民族政策的巨大考验

苏联成立后苏共成为国家的领导力量。从1922年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苏联经历了民族工作既有成就也有错误的时期。就成就而言，该时期，随着苏联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展，在很多落后的民族地区建立了工业基础，在全国扫除了文盲，民族地区的教科文卫事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培养了大批少数民族干部，还为20多个没有文字的民族创造了文字。不过，也是在这个时期，民族工作也犯了很多严重的错误，如经常被后人提到的有：肃反扩大化使很多少数民族干部含冤而死；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12个少数民族实行强制迁徙，涉及440万人；“一刀切”的农业集体化政策给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带来重大损失；对波罗的海地区实行扩张，由此留下后患，并成为苏联解体的突破口，等等。这个时期民族工作错误虽然不少，但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民族分裂事件。特别是苏共民族工作经受住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考验，在敌人的武装进攻和蛊惑宣传下，苏联并没有解体，而是绝大多数民族同仇敌忾，参加了反法西斯战争，为战争获胜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这个时期民族工作错误虽多，但苏联没有解体，其重要原因在于苏共的领导坚强有力，其政策促进了民族地区的发展，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拥护。

三 苏共错判形势与理论僵化对民族关系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经历了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等人执政时期。该时期，苏联虽然对计划经济体制有所调整，但总体方向没有改变。就民族工作而言，该时期苏共纠正了斯大林时期所犯的一些错误，扩大了加盟共和国的自主权，推行发达和后进的加盟共和国“接近”和“拉平”的政策和民族“融合”政策。苏联利用计划经济的有利条件，从资金、物资、人才和技术等方面扶持民族地区的发展。很多加盟共和国的工业基础大多建于这一时期。科教文卫事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干部基本实现了本地民族化，民族知识分子队伍已经形成，人民生活水平有明显的提高。

赫、勃执政时期民族关系方面已经出现一些问题，主要是加盟共和国和民族地区领导人向联盟中央争权，为谋私利虚报成绩，有时也

出现民族分立的苗头，特别是在波罗的海沿岸三个加盟共和国，但总的来看还没有发展到影响国家统一的地步。正是因为如此，苏联领导人错误地认为，民族问题“已经完全解决，已经彻底和一劳永逸地解决了”[2]。该时期民族关系理论新提法不多，基本停留在对列宁民族理论的解释上，再就是长篇大论地颂扬苏联民族工作的成就，而对民族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往往一带而过，特别是对潜伏的危机缄口不言。联盟中央偶尔作出的一些事关民族工作的决议也是针对加盟共和国或基层的，而对中央的方针政策是否存在问题很少涉及。该时期民族工作方面的最大问题是对社会主义与民族关系的看法有误。长期以来，苏联领导人和理论界对超越本国发展阶段的错误认识影响到对本国民族关系的判断。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想法使苏共领导夸大民族工作成绩，粉饰矛盾，竭力掩盖事实上存在的各种问题。一旦掩盖不住，就以敌我矛盾的方式处理，结果使大量民族问题积累下来，或失去最佳处理时机，或处理失当，这些都形成了积怨。

总的来看，这一时期的苏联民族理论和民族工作就像苏共对国家发展阶段的过高估计一样，停留在理论僵化和对工作成就自我满足的状态，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缺乏足够的认识，对非俄罗斯民族的离心倾向有所发展重视不够。不过，由于这一时期苏联综合国力不断壮大，多数非俄罗斯民族地区经济和文化发展较快，各民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有明显提高，因此联盟国家对各民族人民的凝聚力要大于离心力。特别是因为有统一的苏共的存在及其在苏联政治生活中发挥较大的作用，这一时期的民族矛盾和冲突对苏联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存在还不构成重大威胁。

四 苏共亡党，苏联随之解体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尽管当时苏联民族关系方面积累问题不少，但并没有到一触即发的地步，苏联也未呈现即将解体的先兆。在翌年召开的苏共二十七大上，戈尔巴乔夫受到众星捧月般的欢迎，党政军表面尚能听从他的号令。戈尔巴乔夫在这次党代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和大会通过的《苏共纲领新修订本》中都提到了民族问题，但没有新意，仍认为“过去遗留下来的民族问题已

得到圆满解决”。此时，戈尔巴乔夫认为苏联民族关系是较为“顺遂”的领域。他不会想到，苏联绝大多数人也不曾想到，此后6年多时间苏联就解体了。其实，当时苏联已出现了民族关系紧张的苗头，1986年12月在哈萨克加盟共和国首都阿拉木图市就发生了因调换共和国党的第一书记发生青年学生上街抗议事件，哈萨克族一些高官也参与了。但苏共领导人并没有防微杜渐，在推行所谓改革时，忽视了民族问题与稳定的关系。而这种“忽视”带来的后果直到几年以后民族冲突迭起时，苏共领导人才认识到。戈尔巴乔夫在1990年召开的苏共二十八大上承认：“我们没有及时意识到这个问题（指民族问题）的意义，没有及时看到这其间所包含的危险性。”当严重的民族问题出现时，“我们对发生的一切毫无准备”[3]。曾作为苏共中央第二把手、长期和戈尔巴乔夫共事后被废黜的利加乔夫，1991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演讲时也承认，苏共领导层没有及时看到苏联当时的主要危险是民族分立运动。

的确，从1987年起苏联民族事件接连发生，但真正对苏联生存构成致命威胁的并不是民族冲突事件，而是1988年前后苏共思想和政治路线的改变。其中最突出的有两点：一是政治导向错误。1987年1月戈尔巴乔夫提出“民主化”、“公开性”、“不留历史空白点”和“舆论批评无禁区”等口号。正是利用戈尔巴乔夫提供的机会，波罗的海沿岸三国提出当年它们加入苏联的合法性问题，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提出退出阿塞拜疆加入亚美尼亚的问题，车臣提出退出俄罗斯联邦和苏联谋求独立问题。也正是在这些口号的鼓舞下，苏联出现了形形色色重新解释苏联历史的活动，为其后民族主义泛起创造了条件。二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错误。1988年苏共召开第十九次代表会议。这次会议提出“全面改革政治体制”的任务，改革的主要对象：一是制度，苏联长期执行的、被戈尔巴乔夫定性为“兵营式社会主义”的制度；二是该制度的具体执行者——苏共；三是联盟中央与加盟共和国的关系。正是这三项改革导致苏联出现混乱，苏共中央领导层发生分裂，一些加盟共和国谋求分立，国内局势逐步失控。尤其是1990年苏共中央二月全会和同年召开的苏共二十八大决定修改苏联宪法、取消法定的苏共领导地位、实行多党制。在这之后，苏联国内形势大乱，苏共分裂加

剧，民族分立活动遍及全苏，戈尔巴乔夫地位岌岌可危，苏联面临解体的危险。

在上面已经提到，苏联的建立有特定的历史条件，特别是党的统一犹如一条纽带把各共和国捆绑在一起。这是苏联存在的最重要保证。而戈尔巴乔夫提出的针对苏共的错误改革，对苏联是致命一击。

众所周知，多年来苏共是苏联的领导力量，国家的荣辱成败都与它分不开。然而，戈尔巴乔夫却认为苏共是几十年来为“专横的官僚体制”服务的政党，因此要对苏共进行“彻底的改革”，包括修正苏共的建党原则、活动方式及其在国家中的地位。实践证明，改革苏共的最直接后果是造成党内派别林立、威信急剧下降、退党人数猛增，最后丧失其执政地位。“8·19”事件后，苏共亡党。隶属于苏共的各加盟共和国的共产党面对中央领导的死亡，也被迫或独立，或更名，或解散。还应注意这样一个事实：1991年“8·19”事件5天后苏共解散，4个月后12月25日苏联解体。然而，同年3月在就是否保留苏联的全民公决中，有共产党执政的加盟共和国基本都赞成保留苏联。可见苏共作为维系苏联所起的纽带作用。

苏共的变化对民族关系的致命影响还在于：其一，苏共中央领导的自我否定导致共和国以及基层党组织无法理直气壮地工作，成为反对派攻击的靶子；其二，取消宪法规定的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实行多党制，导致共和国的党组织有的丧失执政党地位，多数为自保求助于民族主义。多党制和议会民主制的实施，一方面为苏共反对派上台提供了机会，另一方面也为共产党内的民族主义滋长创造了条件。

苏共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错误，带来国家和党内工作的混乱，必然也反映在组织方面。苏共在二十七大时表面上还是统一的政党，而共和国分立趋势的出现与发展助长了共和国党组织谋求联邦化的倾向。到苏共二十八大时，苏共已经成为缺乏统一步伐的、令行已经不能禁止的、邦联化的政党。如果说，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作为维系苏联存在纽带的作用已经弱化但尚在，那么，在戈尔巴乔夫执政后这条纽带就开始逐渐松懈直到断裂。

民族分立活动是导致苏联解体的直接原因，而民族分立活动的猖獗并成为现实则与苏共有密切的关系。回顾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初，尽管已经存在不少民族问题，但还不是苏联政治生活中最紧急的问题。然而，正是戈尔巴乔夫错误的思想路线、执政路线和组织路线导致国家陷入危机。苏共的蜕变导致苏联构成体与联盟中央渐行渐远，苏共亡党最终带来苏联解体。

我们在上面已经讲过，苏联成立的三个条件之一是生存的需要。1990年前后的苏联虽然经济存在困难，但还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不足以导致苏联解体。不过，15个加盟共和国已经丧失共同的价值取向，这倒是苏联必散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最为重要的和具有关键作用的是苏共已经不是列宁领导的俄共（布），列宁坚持社会主义，而戈尔巴乔夫则一心想把苏联引向“民主社会主义”，即资本主义。苏联作为世界超级大国瞬间解体并不容易，需要具备一定条件。笔者记得美国著名国际问题专家布热津斯基在一篇题为《苏联民族问题的政治含义》[4] 的文章中这样写道：像苏联这样的大国，仅靠外力是无法使它解体的，分立主义在苏联能够实现，必须是在苏联国内出现危机和国际灾难相结合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布热津斯基所说的国内危机是指：苏联领导瘫痪，社会上层分裂，是非混乱，思想败坏，进退失据，无所适从，此外还包括经济停滞。国际灾难是指国际冲突引起的某种重大崩溃，使整个苏维埃面临挑战，戈尔巴乔夫执政后，国际冲突方面并未发生苏美大战和其他重大国际冲突。国内形势则展现了布热津斯基所描述的情景。这种情景刚好发生在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是他推行的错误路线的产物。

中国有句典故：“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其意思是说，某人或某个组织在涉及一个人的命运或某一重大事件成败中具有重要作用。套用这句典故，在苏联近70年的兴亡过程中，苏共是苏联成立的缔造者，同时也是苏联解体的责任者。成也苏共，败也苏共，这是对苏共与苏联解体关系的写照。苏共执政虎头蛇尾、惨淡收场，其历史教训深刻，发人深省。

---

[1] 赵常庆，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政策研究室编译《苏联民族问题文献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第343页。

[3] 1990年7月3日《真理报》。

[4] 译文载于《民族译丛》1989年第2期。

苏共亡党的深刻教训

——党群关系是执政党建设的根本问题

佟玉华 [1]

时光荏苒，苏联解体已20年。20年来世界发生了很大变化，政治多极化演进加速，经济全球化步伐加快，科学技术突发猛进，国际竞争日趋激烈。这种国际背景使中国“面临的发展机遇前所未有，面对的挑战也前所未有”。面向富有挑战的千变万化的未来，总结苏联解体、苏共亡党的教训，增强忧患意识，对于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期、改革攻坚期、社会发展的高风险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苏共亡党的原因，国内外许多学者已从不同角度作了大量分析研究，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些对于我们透彻地认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从中正确地汲取经验教训都有启发。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笔者认为，苏联共产党的兴衰成败充分证明：什么时候党群关系密切，党的事业就顺利发展；什么时候党群关系受到损害，党的事业就遭受挫折，甚至走向失败。执政共产党必须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始终代表绝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已成为一个不可改变的历史结论。因而，深刻认识党与人民群众的密切关系，认真总结苏共党群关系在实践中的经验教训，对于加强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意义重大。

一 列宁关于党群关系的理论与实践

党群关系问题是党的建设的根本问题，也是关系着党生死存亡的重大政治问题。在列宁的党建学说中，如何正确认识党群关系，如何在实践中密切党群关系，是列宁始终关注的焦点之一。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同劳动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思想，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必要性，二是如何保持和加强这种联系。

1.党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是党不可战胜的力量源泉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历史是由物质生产的主要承担者人民群众创造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是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动力。因而，就群众、阶级和个人的关系而言，无产阶级政党从建立之时起就非常重视群众和阶级的作用，始终反对一切形式的英雄创世说和个人迷信、个人崇拜思想。列宁从俄国革命中出现的民意党人企图靠少数人以行刺的办法推翻沙皇制度，民粹主义者把劳动群众看做“群氓”，企图充当人民的救世主，结果都遭到失败的教训中，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他坚定地认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但先锋队只是整个无产阶级中的一小部分，而无产阶级又是全体居民群众中的一小部分。因而，靠先锋队而没有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不可能取得胜利。列宁明确地指出：“劳动群众拥护我们。我们的力量就在这里。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不可战胜的根源就在这里。”[2]

因而，列宁在20世纪初，在创建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实践中，就把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与党的建设理论相结合，提出并确立了党必须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建党原则。正是依据这一原则，布尔什维克党在斗争中与人民群众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和无私援助下，赢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卫国战争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建立并捍卫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包括东欧和中国在内的其他各国无产阶级政党也都在人民群众之中不断成长、壮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纷纷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历史已雄辩地表明，处于反动势力残酷围剿下的无产阶级政党之所以能最终赢得革命的胜利，取得执政党的地位，关键是与人民群众结成了广泛的联盟，拥有人民群众这一打不破的“铜墙铁壁”。除了人民群众之外，无产阶级政党没有其他的法宝和武器。

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列宁坚决排斥了党内那些以为“只靠共产党员的双手就能建设社会主义”的幼稚想法，并郑重告诫全党：“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不是一个党所能实施的。只有千百万人学会亲自做这件事的时候，他们才能实施社会主义。”[3] 离开了人民群众，政

党就算不了什么。斯大林则形象地把党比作希腊神话中的无敌英雄安泰，把群众比作哺育他的母亲地神盖娅，认为布尔什维克之所以强大，就是因为他们同自己的母亲，即那些生育、抚养和教导他们成人的群众保持联系；相反，只要布尔什维克脱离群众和失去同群众的联系，就会丧失任何力量，而变成空架子。

2.保持党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必须维护好人民群众的利益

革命胜利后如何保持党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列宁认为，执政党必须实现好维护好人民群众的利益。

任何政党都是一定阶级或集团利益的代表，超阶级的政党是不存在的。无产阶级政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以无产阶级为阶级基础的，是无产阶级利益的忠实体现者。由于无产阶级是历史上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是最革命、最有前途的阶级，因而无产阶级所反映的利益是全人类绝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是人民群众的公利。这就决定了同以往一切运动不同，“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4]，也因此决定了无产阶级政党不是为少数人而是为多数人谋利益的政党。对此，无产阶级政党的第一个纲领《共产党宣言》明确指出：“党没有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5]就是说，党的利益、阶级的利益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是根本一致的，除了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外，党自身没有任何特殊的利益。这是党的本质属性所在，也是无产阶级政党区别于资产阶级政党的最显著标志。

党与人民群众在利益上的密切关系，要求执政党必须把为人民谋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作为共产党员言行的最高标准。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这不仅是党的性质的根本要求，也是党能够在政治上代表群众的根本所在。一个政党如果在政治上空喊代表群众，但不切实为群众谋利益，是不可能真正赢得群众的信任的。列宁认为，为人民谋利益，首先必须从根本上正确地反映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即要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他指出：“只有我们正确地表达人民的想法，我们才能管理，

否则共产党就不能率领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就不能率领群众，整个机器就要散架。”[6] 可谓言简意赅。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列宁就指出，现在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从事国家的经济建设，收获更多的粮食，供应更多的煤炭，解决更恰当地利用这些粮食和煤炭的问题，消除饥荒。这里列宁讲得很清楚，从事国家的经济建设，这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所在，消除饥荒则是人民群众的眼前利益所在。无产阶级执政党只有实现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眼前利益的有机结合，才能保持与群众的密切联系。任何只讲群众根本利益，不顾群众眼前利益或只顾群众眼前利益，损害群众根本利益的行为都将使党最终失去群众，失掉民心。

3.发展民主，保持党始终是人民利益的维护者

如何使党能从根本上正确地反映人民的愿望和要求，维护好实现好人民利益，将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眼前利益的有机结合起来？列宁认为，必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党内民主，使执政党的权力始终受到监督和制约；充分发挥每个党员的民主权利，始终保持党自身肌体的健康和活力。

当革命胜利之后，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如何继续保持在战争年代中形成的党与群众的密切关系，是无产阶级政党面临的一个新的重大的课题。实际上，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布尔什维克党内就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倾向，因而，对于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履行党对群众的义务和责任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脱离群众的危险不是减小了，而是增大了。因此，列宁严肃地指出：“对于一个人数不多的共产党来说，对于一个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来领导一个大国在暂时没有得到较先进国家的直接援助的情况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共产党来说，最严重最可怕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7] 对此，列宁指出，必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使执政党的权力始终受到人民的监督和制约，使国家权力始终为人民谋利益，使党和人民群众永远保持密切联系。他于1916年8～10月间写成的《论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一文中提出：“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就不能保持它所取

得的胜利。”[8] 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前一年，他依据历史经验就预见到社会主义必须实现“充分的民主”，否则社会主义就会胜而转败，就会最终覆灭。十月革命一胜利，列宁马上就主持通过了《工人监督条例》和《罢免权法令》，强调实行工人监督权和人民的罢免权，指出只有承认和实行选举人对代表的罢免权，才能被认为是真正民主的和确实代表人民意志的机关，才能“使人民的代表真正服从人民”[9] 。

列宁强调，要积极推进党内民主，始终保持党自身肌体的健康和活力。他指出，党内的一切事务由一律平等的全体党员直接或者通过代表来处理；党的所有负责人员，所有机构都是选举出来的，是必须向党员作工作报告的，是可以撤换的；必须让该组织的全体党员在选举代表的时候，同时就整个组织所关心的争论问题都能人人独立地发展自己的意见。

列宁还提出了许多密切党群关系的具体措施。比如，密切联系群众必须反对官僚主义，改进领导机关的工作作风；必须杜绝任何形式的特权，坚决抵制行贿受贿、请客送礼之风；必须深入到群众之中，关心群众疾苦，倾听群众的呼声。此外，他还创立了接待群众的信访制度，并建议要定期召开群众大会，中央委员和有关负责人员要到会演说，列宁本人也经常前往。据统计，1918年3月至1922年底，列宁在莫斯科一地就演讲250次，并经常亲临基层群众之中，为我们树立了密切联系群众的光辉典范。

二 背离列宁的建党原则是苏共亡党的重要原因

然而，列宁之后的苏共领导者，在长期的和平条件下的社会主义实践中逐渐歪曲和抛弃了列宁的民主思想，逐渐背离了列宁的党必须密切联系群众的建党原则，使本来作为人民利益忠实体现者的苏共严重脱离群众，最后被人民群众所抛弃。

1.在领导干部选拔任用上违背民主原则

战争革命年代，由于沙皇专制，没有民主可利用，不得不实行干

部委任制，战争一经结束，在列宁的领导下，苏联建立了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实行了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和不记名的选举制度，但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民主制度并没有逐步完善、民主实践并没有逐渐深入。列宁逝世以后，尤其是在斯大林之后，党政干部的民主选举、罢免和监督机制遭到削弱，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干部的产生主要是通过自上而下的委任制。

权力的来源方向决定了权力的负责方向。这种干部制度决定了党和国家的干部不是向党和人民负责，而是向上级负责，上下级之间形成了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许多干部对于来自上级的唯意志论的指示往往不加抵制，只知道盲目地执行。有些干部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由于各级官员的升降任免都取决于上级领导人的意见和态度，就必然衍生出一批唯唯诺诺、媚上欺下、拍马吹牛、投机钻营的官场小人。他们关心的主要是如何保住自己的官职，怎样才能得到上级的青睐而升官晋级；对于上级的决议，他们不愿意做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结合本部门、本单位、本地区的具体情况加以创造性的贯彻，而宁愿靠长官意志和强迫命令手段加以贯彻。许多干部因而脱离群众，不关心群众疾苦，容不得来自下面的批评。他们对上级卑躬屈膝，奴态百出，而在人民面前却表现得狂妄自大、反复无常。试想这样的干部群体如何为群众的利益着想？

同时，由于苏共对高级干部长期实行的特殊供给制，以及过于森严的高干保卫制度等物质和精神的特殊待遇，使有权就有特殊利益，权越大特殊利益就越大。因而，在苏共党内形成了“向上爬”的严重的官本位意识，形成了一批高高在上，不问群众疾苦的官员队伍，也必然使苏共严重地脱离人民群众。

2.党内缺乏民主使苏共逐渐失去了生机和活力

党内民主是党保持生机和活力、保持党的性质的制度保证；是巩固党的团结，使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保证。然而，苏共党内民主严重缺乏。

党内民主的重要标志就是全体党员对党的一切重要决策都有民主讨论的权利，有发表意见和见解的权利。在党的纲领和章程的基础上，由于个人了解和掌握的情况不同，认识能力、思维的角度和方法相异，经验和素养也不一样，党内存在不同意见分歧是自然的、正常的。列宁在世时，尽管从整个领导体制来看，权力是比较集中，但是党内有正常的民主生活。比如在党的决议通过以前，党员有讨论和批评的自由。苏共十大作出了禁止派别活动的决定，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一种选择。他只说，允许派别存在“现在”不是时候，同时还决定出版《争论专页》，使党员群众能够参加党的政策的制定。对于违反党的决议的党员，也采取慎重处理的方针。而在斯大林时期和斯大林之后，却把禁止党内派别存在的规定扩大化、固定化了。在斯大林时期，把党内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看成势不两立的对抗性斗争，轻易给不同意见者扣上“派别集团”、“反对派”的帽子，不但组织上开除，而且对其实行逮捕、审判，直至肉体消灭。党内民主遭到粗暴的践踏，党员的民主权利得不到保障。这种情况大大加速了以个人集权为突出特点的高度集权领导体制的形成，并把这种做法扩大到国际上的各共产党之间，对国际社会主义事业产生了极大的危害。这个教训是极为深刻和惨痛的。

由于没有建立起党内正常的民主机制，没有形成在重大问题决策时充分听取和吸纳党内不同意见的制度和环境，而且在党内生活和国家政治生活中没有正确处理和对待党内斗争，致使在经济文化较落后国家历史中积淀的封建主义影响和个人的偏好，对苏联和国际社会主义事业产生了极大的危害。这方面的问题，为在经济文化较落后的国家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实践，为执政党自身建设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借鉴。

3.官僚主义和腐化的盛行使苏共的先锋作用衰退

由于干部选任上的委任制和党内民主严重缺乏，导致苏共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盛行，党内腐化严重，党的干部严重脱离群众，党的先锋作用衰退。

早在列宁时期，就存在国家机构官僚化趋势。1919年，列宁就提出反对官僚主义和防止苏维埃官僚化的任务，尤其在国内战争基本结束、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开始的时候，干部机关已出现官僚主义趋向，因此，列宁把当时的俄国称为“带有官僚主义毛病”的国家，一些国家管理机关成了“官僚主义的庞然大物”，甚至是“最典型的旧式国家机关”。列宁尖锐地指出，官僚主义是“我们内部最可恶的敌人”[10]。他由此提出了改革的主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改革国家机关。列宁在5篇“政治遗嘱”中，有4篇涉及改革国家机关问题。二是增加党中央委员会的人数。三是健全和完善党和国家的检察机构和制度。

斯大林也强调反对官僚主义。1928年，他宣称官僚主义是“阻碍我们前进的最凶恶敌人之一”。“它生活在我们的一切组织里，不论是党组织、青年团组织、工会组织或经济组织。”[11] 只是，他没有找到反对官僚主义的有效方法，而实行的措施是：一是靠组织清洗，二是靠开展自我批评，而不是从体制上去解决问题，因而使官僚主义愈演愈烈。赫鲁晓夫当政时，也进行了一些改革，试图改变这一趋向，但没有成功。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党政机关已完全官僚主义化。

党政机构重叠，人浮于事；会议繁多，议而不决；形式主义严重，文牍主义盛行；办事拖拉，不讲效率；消极怠惰，营私舞弊；高高在上，滥用权力；对群众疾苦漠不关心，对党的政策贯彻不力；压制民主、打击报复……这一切，严重损害了苏共在人民中的形象，削弱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的信念，挫伤人们的积极性，严重影响了党群关系。

与严重的官僚主义相伴随的就是党内腐化程度日益加深。早在20世纪30年代，苏共党内的特权之风就开始兴起，大量的财富分配给官员，官员的职位越高，享受的东西就越丰富。莫斯科的国营百货大楼有一些柜台专门是为高级领导人服务的，除此之外，还有狩猎、别墅、特种医疗保健等种种待遇。不仅如此，他们还利用手中的权力公然收受各种贿赂。随着苏联经济和政治形势的不断恶化，一些权力拥有者变本加厉地捞取个人的私利，发国难财。据统计，苏联剧变后，

社会中2/3的富翁都是原来苏共各级委员会的官员。

无产阶级政党之所以能密切同群众的联系，关键在于党不是象征性地而是真实地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随着苏共党内官僚化和腐化程度的加深，群众已无法感受到这一点。苏联国内的一项民意调查表明，在苏共瓦解前夕，85%以上的人已经不再认为苏共代表的是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认为他们是党的官僚机关干部们的利益代表。可以说，苏共在拥有17万党员时，由于建立起来了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但随着苏共背离了列宁的密切联系群众的建党原则和民主原则，随着苏共党政领导干部群体日益官僚主义化、特权化、腐败化，随着群众各种不满的日渐积累，苏联人民对党的感情由亲到疏，由热到冷，最后到彻底失望，在拥有2000万党员时，却亡党亡国，从十月革命时期人民支持和理解甚至不惜为之献出生命的党变成了遭到人民抛弃的党。

---

[1] 佟玉华，辽宁省委党校教授。

[2]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53页。

[3] 《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第49页。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83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第32页。

[6] 《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109页。

[7]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626页。

[8] 《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90，第168页。

[9] 《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85，第102页。

[10] 《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第14页。

[11] 《斯大林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55，第60页。

从思想政治教育视角解读苏联解体

王秀阁 闫艳 [1]

综观苏联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其在苏联解体上的重大失误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 思想政治教育背离了正确的指导思想，造成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混乱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俄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在此基础上开启了一条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正确道路。斯大林把马克思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制度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的设想，在生产力还非常落后的苏联转变为现实，形成了所谓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尽管由于主观和客观的原因，斯大林时期存在着“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但是此时期苏联的思想政治教育十分注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及时批判各种错误思想和来自西方的反动思潮，坚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因此，虽说斯大林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在指导思想上出现过偏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问题，但属于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犯的错误。

到了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执政期间，他们也表现出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指导地位。例如，赫鲁晓夫时期编写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教科书。勃列日涅夫执政期间，要求全党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并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为指导，编写新的苏共党史，作为全党和全国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中心轴”。他说：“要知道一个党，任何一个党，尤其是我们这个人数以百万计的大党，按照列宁的遗训生活，真诚地力求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应当有一面旗帜。而我们的旗帜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2] 但是，他们虽然口头上重视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指导地位，而在思想本质上却并不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赫鲁晓夫本人“马克思列宁主义修养

太差……善于搞权术，因而他对马克思主义缺少坚定的信仰，在世界观上是个实用主义者”[3]。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些重大问题一知半解，甚至模糊篡改。他全盘否定斯大林，将党的性质改为“全民党”，以抽象的人道主义取代无产阶级专政。勃列日涅夫虽然调整和纠正了赫鲁晓夫时期的一些错误，但他也是“平时不读书、不看报，马列主义修养太差”，基本沿袭了赫鲁晓夫的“全民党”等错误观点[4]。如果说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奉行的是教条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戈尔巴乔夫则完全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戈尔巴乔夫时期对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指导思想进行了改革和突破，然而他的改革和突破不是对此前苏联对马克思主义片面理解的纠正，而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在思想上，他宣扬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教条化”，已经“过时”，将人道主义作为其改革的基本方针——“民主化”、“公开化”、“多元化”——的理论基础；在经济上，他主张和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在政治上，他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主张重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使国际关系人性化、人道主义化”。戈尔巴乔夫认为，马克思主义不能作为苏共唯一的指导思想，他攻击党内规定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是一种“精神垄断”，提出革新党就要允许党员有信仰，有表达意见和行动的自由，允许党内和社会上出现的各种观点、意见和流派的存在[5]。1989年，苏联有关部门颁布命令，取消学校中马列主义这门必修课，将中学的马列主义课程改为《社会与人》。

党的领导核心偏离、抛弃，甚至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直接动摇了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指导地位，其结果是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甚嚣尘上，从而导致社会思想混乱，人们思想迷茫，信仰出现危机，无政府主义、极端自由主义思潮泛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价值观和道德观教育被一步步削弱，思想政治和品德教育的优良传统逐渐丧失。这虽然不是导致苏联解体的最根本的原因，然而它对苏联解体起到的加速作用是不容置疑的。

二 思想政治教育降低了可信度，造成群众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疏远

党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领导核心，党的领导干部大部分承担着思想

政治教育的职责，因此，党自身建设的状况如何，能否始终如一地保持其先进性，直接决定思想政治教育在群众中的声誉及其功效的发挥。列宁时期，非常注重党的自身建设，严格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和党员廉洁奉公，艰苦奋斗，参加劳动，反对官僚主义，反对脱离群众。斯大林执政后期开始搞“一言堂”，长期不开党的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搞个人崇拜，使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受到严重损害，党内也滋生了特殊化倾向。赫鲁晓夫时期，党风进一步败坏，并且逐步形成了一个特权阶层。勃列日涅夫继承赫鲁晓夫的衣钵，这一时期苏共党内贪污贿赂、特权腐败、卖官鬻爵、徇私枉法等不正之风愈演愈烈。1968年，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大学生为例呈送苏共中央的报告中反映了党脱离群众的程度。在大学生看来，党“已不是最光明、最先进的东西的化身”。他们认为：“现阶段的党是升官发财方便的跳板，但绝不是按照思想观点而联合起来的最优秀分子的组织。”“多数人对党委形成一个印象，就是其成员都是一些不学无术、落后于现代需求、不可救药的人……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党委书记在学生的眼中成为愚蠢的化身。”[6] 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党的组织生活涣散，丢掉了批评与自我批评。“许多党员缺乏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迷失了前进方向，相当多的人入党不是为实现党的纲领和目标奋斗，而是为了自己在仕途上、物质上捞取好处。”[7]

由于党的威信丧失殆尽，干群关系恶化，人民群众对党的不满情绪日益严重，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权威性、可信度也不复存在。人民群众把公开供人瞻仰的列宁的朴素居室，与有机会见到的为数不多的党的官员的生活方式相对比，苏共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就化为零了。尤其是当时年轻一代，越来越厌恶思想政治活动，蔑视思想政治理论学习。他们想方设法逃避学校组织的“星期日义务劳动”，对种种政治学习漠不关心，拒绝参加各种节日游行。不少学校为了组织学生参加节日游行，只好规定种种惩罚性条例。例如，敖德萨邮电学院规定：取消不参加游行的大学生的奖学金。其他学校也有类似的规定。于是，大学生们就想出种种恶作剧：拒绝举领导人画像；在游行的路上乱扔画像；还未通过主席台，一半人已离散；喊口号有气无力、稀稀拉拉，等等 [8] 。由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失利，使年轻一代的价值观

严重滑坡、颓废。奥斯特洛夫斯基、马特洛索夫、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等英雄，曾经是年轻一代崇拜的偶像和学习的榜样。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年轻一代崇拜的是美国西部牛仔，或者是从西方电影中看到的那些威武有力、漂亮潇洒，解决疑难问题靠拳头的“英雄”。年轻一代的发型、胡子、裤子和跳游行舞蹈，无不亦步亦趋地模仿西方青年。年轻一代在相互交谈时公开说：“美国人民是聪明的人民，因此他们那里没有共产党。”“他们的失业人员比我们的工程师生活还好。”[9] 年轻一代已不讲理想信念。他们常说：“我不管什么社会主义——只要给我的钱多。”[10]

可以说苏联共产党自身的退化对其思想教育的失效来说是致命的。所以，“实际上还是苏共自己将自己的思想教育工作化为乌有，这不能不说是苏共真正的悲剧”[11] 。

三 思想政治教育丧失了吸引力，造成群众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反叛

首先，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脱离社会现实发展的阶段。根据唯物史观的原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作为社会的上层建筑，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由特定的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所决定，并且要为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服务。长期以来，苏联的执政当局对于国家社会发展阶段的认识超越现实发展阶段，存在主观性、盲目性和片面性。1936年斯大林就指出苏联社会“已经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1961赫鲁晓夫又宣称苏联进入“全面开展共产主义建设的时期”，提出“20年基本建成共产主义”；20世纪80年代初勃列日涅夫又宣布“进入发达社会主义”的阶段。对社会发展阶段定位的不准确，对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正确确立产生了消极的影响。由于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制定是随社会政治经济发展而变化的，对社会发展阶段的认识脱离国情，导致思想政治教育目标脱离实际。例如，在80年代苏联高等教育部门制订的《共产主义教育示范综合计划》中，仍把“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坚强战士”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唯一目标，要求所有学生“在个人的思想意识，精神面貌与行为中确立共产主义道德规范和理想以及积极而且鲜明的立场和态度”等。这种目标缺乏将普遍性和层次性要求相结合，使除了少数先进分子的大多数学生难以企及，造成青少年知行分

离现象严重。

其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方法、途径上存在一些弊病，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影响较为严重。根据1968年克格勃（KGB）向苏共中央提交的报告及所附材料，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这方面的工作已严重地流于形式和简单空洞的说教。例如，对大学生进行苏共党史、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教育时，“死板的研究，教员只要求记住而不是理解，直到增强记忆的法则——怎样记住讲台上讲的俄共（布）历次党代会召开的日期，迫使大学生对社会政治课程就像对待积累事实，对待令人生厌的次要的义务一样……形成社会科学‘不是课程’的观点” [12] 。勃列日涅夫本人每次讲话也都要到列宁著作中引经据典，却毫无吸引力和说服力。另外，苏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大规模地印刷出版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勃列日涅夫等苏共现领导人的著作，对年轻一代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虽然社会上和群众中对此类读物毫无兴趣，但为了表示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视，有关部门仍一路绿灯、不吝钱财、不计成本，大量印刷发行这些著作，造成严重积压，后来不得不将这些出版物当做废纸处理。在此时期，党、国家、各个部门以及大专院校关于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各类决议和文件多如牛毛，可是在实际工作中却没有得到贯彻落实。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方式方法未能因时顺势加以改进和拓新，遇到问题不作具体的分析，而是千篇一律地设法把矛盾堵住，不作深入细致的解释与引导，致使许多问题不仅得不到解决，反而不断恶化甚至蜕变。

再次，思想政治宣传缺乏客观性和真实性。可以说苏联每一届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都极其重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舆论宣传的作用，尤其希望通过舆论来宣传国家的建设成就，以此来增强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和荣誉感。列宁在革命胜利后曾自豪地说：“我们曾经靠宣传工作取得了世界性的成就。” [13] 但是后来在思想政治宣传过程中逐渐出现了与现实生活不相符的现象，如为了美化苏联，一方面采取丑化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另一方面则采取了有失客观、不切实际宣传国家建设成就的做法。这种做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极为有害。如为了激发人们的爱国、爱党情感，以及对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向往，宣传部门将苏联社会描绘得白璧无瑕，大谈特谈国家已经取得的成就，而对存

在的困难和问题则缄默不言。“长期以来，无论是报刊宣传报道，还是口头宣传报道，大多是回避现实社会的重大问题，报喜不报忧，言行不一，理论脱离实际。报告、决议讲得都不错，而实际情况却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14] 正如拉扎尔·沃林所言：“一提到苏联人民群众的生活状况，马上映入眼帘的就是商品短缺、住房紧张、到处排长队等现象。尽管苏联有了导弹、卫星等可以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媲美的高精尖的技术产品，尽管它也取得了总体上的经济增长，但是却没有带来充足的面包、黄油等。”[15] 正因为思想政治宣传严重脱离实际，所以不仅没有起到促进人民群众更加热爱社会主义、更加向往共产主义的作用，反而造成了理想和现实的巨大差距，甚至引起他们的逆反心理。如苏联一位教师所言：“最讨厌听我们的广播，整天说我们怎么样，我们如何，全是瞎吹牛。”“我在讨论中经常给大家介绍我国赶超美国的宏伟计划，说劳动人民的福利不断提高。现在我该说些什么呢？我再也不相信了。”[16] 思想政治教育长期的“假、大、空”，使其彻底失去人心，失去吸引力，以致人们从心理上反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接受资本主义价值观。据一份社会调查显示，1990年苏联已有94%的人主张俄罗斯走西方的道路，其中32%的人主张以美国为榜样，32%的人主张以日本为榜样，还有17%和11%的人认为苏联的榜样应是德国和瑞典[17]。

俄国哲学巨匠赫尔岑曾写下过这样一句话：“充分地理解过去——我们可以弄清楚现状；深刻认识过去的意义——我们可以揭示未来的意义；向后看——就是向前进。”在苏联解体20周年之际，我们分析其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大失误在苏联解体中的作用，就是要以史为鉴，警钟长鸣，更有针对性地加强和改进我国现阶段的思想政治教育，使其更好地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服务。

---

[1] 王秀阁，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闫艳，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2] 《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国内意识形态问题讨论的记录摘抄（1966年11月10日）》，沈志华总主编、叶书宗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1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117页。

[3] 李慎明主编《居安思危：苏共亡党二十年的思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第388页。

[4] 李慎明主编《居安思危：苏共亡党二十年的思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第391页。

[5] 黄苇町：《苏共亡党十年祭》，江西高校出版社，2002，第72页。

[6] 沈志华总主编、叶书宗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1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149、152、146页。

[7] 张全景：《苏共失败、苏联解体的惨痛教训及借鉴意义》，《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年第2期。

[8] 转引自叶书宗《苏共思想教育工作的失策与苏联剧变》，《探索与争鸣》2006年第9期。

[9] 沈志华总主编、叶书宗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1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151页。

[10] 沈志华总主编、叶书宗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1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148页。

[11] 叶书宗：《苏共思想教育工作的失策与苏联剧变》，《探索与争鸣》2006年第9期。

[12] 葛宁：《从勃列日涅夫时期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看苏联解体的原因》，《当代世界》2000年第8期。

[13] 《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6，第143页。

[14] 贾文华：《苏联教育》，河南教育出版社，1989，第187页。

[15] 〔美〕拉扎尔·沃林：《苏联的农业（1953～1964）》，上海市“五·七”干校六连翻译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第1页。

[16]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杨春华、张道庆译，东方出版社，2006，第218页。

[17] 曹长盛等：《苏联演进过程中的意识形态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第495页。

苏联解体20年再看文化因素

——苏联解体20周年反思

董晓阳 [1]

一 文化领域的纰漏启动了思想领域的混乱，文化和思想混乱，改变了人们的思维和观念，使其偏离体制本质要求，是苏联解体原因之一

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苏联的“解冻文学” [2] 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从文学方面改变了文学回避矛盾，不揭示冲突的状况，要求文学体现人性本位，形成了批评主义文学。但更重要的是，“解冻文学”最后发展到过度地揭示苏联的黑暗面，以文学方式对斯大林时期的苏联社会主义抹黑，并全盘否定。在苏联仍处在帝国主义包围和打压的背景下，在右的威胁仍然是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主要威胁的总的国内外局势下，“解冻文学”反映在政治上却是掀起了过度纠偏、过度反“左”的政治思潮，斯大林逝世后，苏联第二次作代会召开，要求彻底纠正“左”，把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评延伸扩大到对整个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苏联党的制度的全面批评。这股新的文学潮流远远超越了文学的范畴，它在唤起人们反思的同时，渗透到了整个社会的思想领域，超越了斯大林问题，涉及整个社会主义制度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国内文学和文化界出现了分裂，传统派和自由派在文化文学领域的斗争白热化，一发不可收拾，导致苏联知识界和思想界的纷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了分裂，事件接二连三。文化是社会和社会思想的载体，也是所在社会体制和制度的载体。应当说，苏联的变化最先始于文化。虽然60年代，苏联领导人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这个问题，但是文学的多样化与思想观念的多样化过程则难以以行政方法控制，人们多样化的思想与划一的体制已经形成隔阂。与苏联开始限制“解冻文学”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到六十年代，西方国家对批判主义作家不只限于称赞和肯定，而且以实际行动支持他们，帮助他们把无法在国内发表的作品偷运出境，这些作品在国外出版后，又通过各种渠道将其运回国内秘密散发” [3] 。

20世纪80年代，戈尔巴乔夫时期的“回归文学”浪潮，与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相呼应，再次为思想混乱推波助澜，直至苏联解体。“回归文学”一般是指其中大部分从来没有发表过的作品，在写成之后只能在地下流传或国外出版，一直未能同苏联的读者见面，还有一小部分过去曾经发表过，后来却因种种原因成为禁书。这些作品艺术手法相差悬殊，包括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多种流派，但在思想性方面却出奇地一致，主要是暴露苏维埃社会的现实阴暗面，批评苏联共产党政策的失误，揭露苏联历史内幕[4]。对“回归文学”艺术性如何评价暂且不谈，戈尔巴乔夫执政后，该类文学挤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成为苏联文坛主流，其所宣扬的苏联制度的黑暗对普通大众和官僚阶层的影响甚深。戈尔巴乔夫改革初始，障碍多多，也有意利用“回归文学”打破传统观念坚冰，推动思想解放，对苏联制度进行反思。值得注意的是，“回归文学”的不少作者本身就是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或被驱逐出境或流亡海外，他们对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是不认同的。著名的“回归文学”作家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自称，他写了30本分析什么是共产主义的书，30本反对共产主义的书。戈尔巴乔夫时期，对于思想界和社会制度变迁而言，这些“回归文学”对普通民众的政治影响大大超过其艺术性。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苏联的解体也使“回归文学”热随之退烧，相应的文人也没有了批评的对象，这些文化现象也逐渐成为历史。

二 政治文化特别是上层政治文化失准，丢失了对社会发展和改革的引导作用

一个国家和政党的政治文化对社会变化的影响非常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由特里·N.克拉克等著的《新政治文化》一书，对政治文化作了以下的描述：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形成的一种政治态度、信仰和情感，是政治关系在人们精神领域内的投射形式。政治文化属于政治社会的精神范畴，它是一个社会关于政治体系和政治问题的态度、信念、情绪和价值的总体倾向。政治文化是政治体系中的软件。犹如计算机运行需要软件、硬件相互兼容一样，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也需要相互匹配。但是，苏联某些时期的政治文化，却与社会政治精神需求不相符，与苏联社会政治体制的发展和变革要求相

悖，与社会现实偏离。苏联政治文化的失准的第一重要案例是赫鲁晓夫借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为名，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割断苏联建立以来形成的苏联政治文化与苏联未来发展的联系，以改革为名，改变苏联共产党的政治生活和运转机制，把统一的共产党分成“工业党”和“农业党”。把反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变成了反对苏联成立以来的社会主义实践 [5] 。政治文化上的失准还体现在对社会发展阶段的判断和评估上。例如，赫鲁晓夫在1959年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一次非常代表大会上宣布苏联已经进入了“全面开展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新时期”。在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党的行动指南性文件——苏共纲领——中又提出在20年内“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目标。特别是把这些与社会真实和体制真实有很大背离的政治文化，在全社会、全党和全民推广贯彻，造成百姓和知识界对社会发展现实的怀疑，也被西方用来攻击苏联。应当说从苏共二十大到苏共二十二大期间，赫鲁晓夫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原有苏联官方和苏联共产党的政治文化。国家和党的运转已经发生重大改变，对这种政治文化的认知以及这种政治文化的传播已经在思想上分裂了苏联社会，分化了苏联共产党，分化了苏联知识分子，苏联制度转型已显端倪。1964年苏联共产党中央全会选举勃列日涅夫为苏共总书记，从组织上遏制了这种变化继续蔓延，在推进变革的同时一方面对赫鲁晓夫时期的理论、方针和政策进行矫正，另一方面对斯大林时期的好传统实行继承性变革。但是勃列日涅夫并没有走出政治文化失准的怪圈，仍然陷入超越社会现实的政治文化当中，对社会发展阶段仍然作出了错误估计。他于1967年提出苏联建成了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概念。之后发达社会主义成为社会各个细胞最积极的词语，成为苏联政治文化的核心。安德罗波夫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虽然提出苏联只是处于建设发达社会主义漫长历史阶段的起点的“起点论”，但影响甚微。苏联高层政治文化与社会现实的背离，对社会思想和社会心理的影响不乏负面因素，起码对社会发展程度的高估，造成了对社会发展的满足和停滞，造成了与西方不讲战略的消耗性对抗，而忽视或不能准确定位对西方软实力和思想政治文化的对抗总体战略。但总体上，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前，苏联政治文化的演变仍然受苏联社会主义传统体制框架制约，在其框架内调整和发挥影响。

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的政治文化发生了质变，导致苏联主导意识形态的丧失和苏共领导地位的丧失，是苏联解体的重要因素。1987年苏联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再次以文化为突破口，启动了对苏联道路和历史重新全面反思的浪潮。戈尔巴乔夫在这次会议上号召："在苏联的历史和文学中都不应有被遗忘的名字和空白点。"[6]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彻底改变了苏联政治文化的风向标，承认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对西方文化和各种思潮敞开大门，各种文化涌入苏联，文化和政治文化的多样性已经不同于赫鲁晓夫时期，意识形态的多元化随之发展起来，并且对苏联共产党主导的意识形态产生严重冲击。随着政治文化的根本改变，"党内有党，党内有派，国中有国"现象出现，形形色色的社会组织、政党如雨后春笋般充斥苏联社会。1988年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戈尔巴乔夫在两位作家尤里·邦达列夫和格·巴克拉诺夫争论[7] 时立场鲜明地支持后者的自由派观点。戈尔巴乔夫在本次代表会议提出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这实质上是政治上的改旗易帜，是苏联共产党由社会主义政党转向社会民主党的政治标志，是传统的苏联社会主义转向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标志，是苏联的政治文化已经发生质变的标志。与这种质变相适应，权力中心向已经派别林立、鱼目混珠、乱象丛生的苏维埃转移，要求根本性变革上层建筑，三权分立、鼓励多党制，与此同时作为苏共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却热衷于实行总统制，要当苏联的首任总统。应当说，戈尔巴乔夫改旗易帜的步伐实际上不仅迅速地将苏联党和苏联国家推向解体的边缘，也是迅速地为其政治生命自掘坟墓。从1990年开始，戈尔巴乔夫不断宣传多党制，不断主张苏共放弃宪法中规定的领导地位，大搞所谓的非意识形态化。实质上，所谓的非意识形态化就是非共化和非社会主义化，就是西方意识形态和文化入主苏联的进程。当年3月，苏联第三次非常代表大会决定删去苏联宪法第六条关于苏联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的表述，并选举戈尔巴乔夫为首任苏联总统。放弃党的领导，放弃主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并没有挽救苏联，并没有将苏联引向富裕，而是以戈尔巴乔夫不久下台，成为短命的苏联总统，以苏共垮台、苏联解体为结局。严格来说，苏共垮台不是因为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宪法中删去苏共领导地位，苏共领导地位是长期带领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赋予

的，是历史赋予的，不是一个条文保障的。实际上戈尔巴乔夫早就改旗易帜，他在回忆录中甚至炫耀自己最大的功劳就是想“消灭了那个早已使我国无法成为富足安康、繁荣昌盛国家的极权主义体制” [8] 。他放弃了党的领导，严重地损害了党的政治肌体，涣散了党的意志，党和国家不仅没有走上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而是党内思想混乱、组织混乱已经达到了病入膏肓之境。戈尔巴乔夫修改宪法只是从法律上宣布既定事实而已。这也是为什么对苏联解体几千万党员不能有效抵制的原因之一。综上所述，政治文化特别是官方的政治文化如何选择，事关党和国家存亡，事关社会发展方向，事关人民福祉，绝不能掉以轻心。执政党立足国情、放眼世情，继承优秀文化遗产，构建开明先进的执政党政治文化是一件统领意识形态、统领社会意识走向、构建人们健康现实的思想和思维方式、保证社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大事。

三 先进民族文化建设走向误区，民族文化意识和民族文化认知脱离社会发展和民族关系实际，民族离心倾向和分离意识凸起，是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

民族文化是民族对自身和周围世界的认知，是利益、思想和世界观的体现，作为意识形态是一定社会政治文化和经济物质文化的民族性。

赫鲁晓夫1959年提出：“共产主义现在已经不是遥远的理想，而是我们最近的明天。” [9] 他于1961年进一步提出了两个与社会和民族关系发展实际不符，不能实事求是地阐述民族文化意识和民族文化认知，对民族文化建设产生深远影响的论断：一是宣布苏联“已经解决了人类世世代代所关心的而在资本主义世界直到今天仍然是尖锐的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即各民族之间相互关系问题”，同时却大肆揭露斯大林时期对某些少数民族的驱逐和镇压，大肆批判斯大林的民族政策和理论，造成苏联民族问题很严重的舆论文化氛围；二是宣布苏联已经“形成了具有共同特征的不同民族人们的新的历史性共同体——苏联人民”。这就是著名的新的历史性共同体理论。它强调苏联200多个民族文化的共同性，要求推进各民族达到完全一致；强调各

民族共和国之间的疆界失去意义；由此苏联派生出来形成了民族文化共同体，对各民族文化特性加以抹杀；形成了民族语言共同体，实际上成了俄语共同体，忽视了其他民族语言的地位；民族世界观共同体，强调各民族形成了共同的世界观；民族文化共同体，强调民族文化的一致性、精神的共同性、文化心理素质的共同性，并认为这会推动“形成共产主义统一的全人类文化” [10] 。

勃列日涅夫虽然对赫鲁晓夫时期的许多错误进行了纠正，但是仍然把“新的人们历史性共同体”纳入其发达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加以修饰继承。1972年，他和苏共中央都认为，已经形成了各民族共同的和一致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和文化生活。苏联民族问题“已经完全解决，已经彻底和一劳永逸地解决了” [11] 。这些理论和关于民族文化建设的判断，忽视了民族问题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忽视了民族差异和文化差异，更没有认识到社会主义也会产生自身的民族问题，掩盖了许多在社会主义阶段由于发展不平衡等因素导致的仍然尖锐的民族矛盾，丧失了解决社会主义阶段日常民族问题的机遇。

戈尔巴乔夫时期在所谓新思维和民主的思潮影响下，民族冲突和骚乱频发，戈尔巴乔夫初期对此是不重视的，后来又在全苏民主浪潮下一味迁就，发展到后来甚至承认波罗的海三国加入苏联不正常。面对各地兴起的民族独立运动，戈尔巴乔夫束手无策，最后走向了从法律上和事实上瓦解苏联的危险境地。1989年戈尔巴乔夫否定了列宁、斯大林经过千辛万苦、复杂斗争用领袖的智慧和魅力形成的建立苏联的苏联联盟条约，愚蠢地提出重新签署新的联盟条约。1990年正式提出缔结新联盟条约的问题，并成立了相关的起草委员会，1991年4月仍然有摩尔达维亚、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波罗的海三国没有参加缔结新条约的有关工作，参加的也提出了不少具有独立意义的要求，实际上形成的草案已经带有浓厚的主权国家邦联的色彩。尽管如此，这个条约还没有签署就发生了“8·19”事件。最可怕的是苏联主体民族俄罗斯族的民族主义大爆发，宣布俄罗斯独立，苏联实际上已经形成解体态势。

最后值得着重指出的是，西方一直对苏联进行文化渗透，并以文

化为载体推广西方的意识形态、民主观、价值观，抢占苏联文化话语权、意识形态掌控权，改变苏联人的观念，这对苏联解体起了主要的外部推动作用。

---

[1] 董晓阳，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所研究员。

[2] “解冻文学”以依·戈·爱伦堡1954年发表的《解冻》一书为标志。参阅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中文版。

[3] 张捷：《20世纪俄罗斯文学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第90页。

[4] 曾繁仁：《20世纪欧美文学热点问题》，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第226页。

[5] 参见李慎明主编《居安思危——苏共亡党二十年的思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6] 李慎明主编《居安思危——苏共亡党二十年的思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第512页。

[7]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第467～468页。

[8]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第2页。

[9]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一次非常代表大会文件》（中文版），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社，1959，第40页。

[10] 赵常庆、陈联壁、刘庚辰、董晓阳：《苏联民族问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第216页。

[11] 赵常庆、陈联壁主编《苏联民族问题文献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第305～343页。

苏联解体起源于抹黑斯大林

冯颜利 龙钰[1]

一 为什么不能全盘否定、抹黑斯大林

为何不能全盘否定、抹黑斯大林？因为，斯大林虽犯过错误，但他把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现实，领导苏联人民将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强大的工业国；他帮助亚非拉国家走上独立道路，壮大了社会主义阵营；他直接领导打败了法西斯，维护了世界和平。所以，他无疑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忠诚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1.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把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现实

斯大林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探索者、实践者，他把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现实，创设了比较完整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他领导苏联人民建立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制度，将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变为现实；根据《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消灭私有制”的共产党总纲领，建立起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实现生产资料公有；依据马克思关于计划经济是首要经济规律的观点，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地发展经济，使“社会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2] 成为现实；根据公有制的本质要求建立起按劳分配制度，并将按劳分配具体化为八级工资制，为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奠定了基础；还建立起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文化制度，等等。斯大林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社会主义的零散论述，转变为具体可行的制度体系，并体现出强大的生机与活力。此后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借鉴甚至照搬这一制度体系。一种制度模式能够得到众多国家效仿，能够得到如此大面积的推广，在人类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尽管在具体的经济、政治、文化制度和运行机制等方面，还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但毋庸置疑，在斯大林领导下确立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坚持了

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反映了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符合社会发展规律。

斯大林不仅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还积极进行理论探索，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光著述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对苏联30多年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战后资本主义的发展进行了理论概括，阐明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规律的客观性，论述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阐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规律的作用，并强调社会主义制度下仍存在商品生产，“不能把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混为一谈”。同时，该书还论述了消灭三大差别，向共产主义过渡，把集体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战争不可避免，现代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等问题。这一著作成为那个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高成就。

2.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展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斯大林一生最重要的活动，就是领导苏联人民沿着十月革命开辟出来的道路，顶住资本主义包围的压力，建设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下，应对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的巨大破坏，把俄国这样一个欧洲的经济弱国，建设成为先进的工业国，建设成可与美国抗衡的世界第二强国。这一时期，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强大的生机与活力，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苏联以不到20年的时间弥补了同西方发达国家长达50～100年的发展差距。俄罗斯教育部审定的教科书《20世纪的祖国史》写道：“30年代末期，苏联工业总产值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位。年均工业增长速度为11%，成为世界上仅有的三四个能制造当时所有工业品的国家。”[3] 联合国《世界银行》在关于世界工业化分析的总报告中也指出：“相当清楚的是，苏联在工业化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根据西方经济学家的计算，苏联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率从1929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即整个斯大林时期——笔者注）为6.7%，1953～1965年为6.1%，1966～1970年为5.3%。”这个报告还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20年间世界其他国家与苏联工业化的发展作了对比，指出，在工业化国家中除了日本和德国，以及所有非市场经济国家，增长速度都没有苏联快，增长持续时间也没有苏联长[4]。在斯大林时期，苏联大规模地开展提高人民

群众文化水平的运动，达到了人人识字的程度，人民的教育和文化水平被提升到世界第一位。斯大林领导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展现出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为人类开辟了通向未来的道路。正如毛泽东所言：“在列宁逝世之后，斯大林同志指导苏联人民，把他和伟大的列宁在十月革命时期共同缔造的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成了光明灿烂的社会主义社会。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这不只是苏联人民的胜利，而且是全世界人民共同的胜利……这个胜利用最现实的生活证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限正确，具体地教育了全世界劳动人民应该如何朝着美好的生活前进。”[5]

3.帮助发展中国家，壮大社会主义阵营

斯大林推动了20世纪长达半个世纪的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帮助一大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走上民族独立的道路，摧毁了统治世界达两三百年之久的西方殖民主义体系。同时，他发挥苏联的经济力量和文化力量，帮助和带动一批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开创了社会主义从一国胜利走向世界的历史时代，从而彻底地改变了20世纪的发展格局和整个世界的面貌。作为中国人，我们也不应当忘记斯大林的帮助。在革命战争年代，斯大林和他领导的苏联对我们就有很多帮助。1926年11月，斯大林专门谈到中国革命，指出武装斗争对中国革命具有重要意义。“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中国革命军队的特殊意义正在这里……由此应得出结论，中国共产党人应当特别注意军队工作。”[6]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正是斯大林帮助了我们，正是苏联在战后国民经济亟须恢复，国内建设急需资金的情况下，帮助我们建立起了国民工业基础。正如毛泽东在《关于悼念斯大林逝世的命令和唁电》中所言：“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斯大林同志三十多年来不断的关怀、指导和支持，是完全分不开的。在中国人民革命胜利后，斯大林同志和在他领导下的伟大的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对中国人民的建设事业，又给予了慷慨无私的援助。斯大林同志对于中国人民这样伟大的深厚的友谊，中国人民永远感念不忘。斯大林同志的不朽光辉，将永远照耀着中国人民前进的道路。”[7]

4.反法西斯，维护世界和平

斯大林领导的苏联为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巨大贡献。尊重历史的人都承认，斯大林领导下的社会主义苏联，是反法西斯战争的中流砥柱。一贯坚决反苏反共的丘吉尔，也不得不承认“敲碎德军骨头的是俄国人”，“与英国和美国的巨大资源相比，尤其是与俄国的巨大努力相比，我们所实施的一切战役规模都是不大的”[8]。罗斯福也认为：“很难抹杀这样明显的事实，就是俄国军队所消灭的敌军士兵和武器的数量，比联合国中其他25个国家所消灭的敌军总数还多。”[9]在这场维护世界和平的战争中，斯大林发挥了重要作用。朱可夫多次强调：“1941年6月22日后，几乎在整个战争期间，斯大林都坚定地管理着国家，领导着武装斗争和国际事务。”“毫无疑问，他是一位当之无愧的最高统帅。”[10]

当然，斯大林也犯过大国主义、主观主义、斗争扩大化等错误。对这些错误，我们既不能视而不见，也不能夸大其词。但我们不能因为这些错误，就否认斯大林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否认他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否认他在社会主义发展和反帝国主义、反法西斯主义中的历史功绩。

二 全盘否定、抹黑斯大林的后果

1.抹黑斯大林就抹黑了社会主义

斯大林把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现实，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第一个伟大探索者。然而，赫鲁晓夫却在苏共二十大已经闭幕，且已对斯大林的错误作出批评的情况下，于1956年2月24日深夜突然召开紧急会议，抛出那份《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他煽动代表们的情绪，批判斯大林个人独裁和专权妄为，把一切脏水都泼到斯大林身上，颠覆斯大林的伟大形象，全盘否定、抹黑斯大林。其实质是打着反对个人崇拜的旗号，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掀起了“非斯大林化”浪潮，动摇了苏联人民尤其是青年人的社会主义信仰，动摇了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心，并引发了国际共产主义运

动的分裂和波兰、匈牙利的严重骚乱。同时，也为西方反共势力污蔑社会主义“极权统治”、“不人道”提供了“材料”，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反共浪潮。

1964年10月，勃列日涅夫上台伊始就宣称将继续走苏共二十大以来的路线。10月17日，《真理报》发表社论说：“苏联人民走向共产主义的道路已由党在第二十次、第二十一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集体制定的总路线和苏共纲领确定了。”“党实行自己的总路线时，无论过去和现在都不调和地一贯反对个人迷信的思想和实践。” [11]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沿袭赫鲁晓夫时代的政治观点，号召重评苏联历史，掀起“批判斯大林主义”的高潮。否定苏联历史和抹黑斯大林迅速成为普遍的社会运动。这一轮全盘否定斯大林的运动，目的就是颠覆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在“非斯大林化”过程中，“斯大林模式”这一概念应运而生。社会主义制度是“斯大林模式”，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也属于“斯大林模式”。他们把斯大林时期和后来苏联的错误完全归结为斯大林建立的体制。这样，就从抹黑斯大林转向全面否定、抹黑社会主义制度。苏共二十八大对“斯大林模式”正式作出否定性评价，指出斯大林从20世纪30年代起建立的政治经济制度，是“专横官僚主义体制”，是“极权官僚模式的社会主义”，是对社会主义思想的扭曲。它导致个人迷信、专制独裁，经济停滞，思想僵化，形成一套阻碍社会发展的机制，使国家陷入危机 [12] 。戈尔巴乔夫公然宣称：“我们的理想是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13] 这就全面否定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完全抹黑了社会主义。

2.抹黑斯大林就抹黑了苏联共产党

苏联共产党曾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它的兴衰被赋予重大的象征意义。1917年，它领导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了无产阶级政权，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1991年，这个有着93年斗争历史、74年执政经历、1500万名党员的大党，在一夜之间亡党亡国，成为国际共运史上的最大悲剧。苏共的

失败不是偶然的，这与全盘否定、抹黑斯大林密切相关。全盘否定、抹黑斯大林，事实上就是否定了斯大林领导苏共的这几十年，就是否定了苏共这几十年的成就和历史。在对斯大林的一片否定声中，苏共的历史成为一段不断犯错误的历史，成为一段不光彩的历史。与这样的历史决裂就成为必然。原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博尔金回忆道："情况越来越糟：党总是在自我批评，说要为自己过去的罪过负责，可是又无力改变现状。这使得人民对它疏远，把它视为万恶之源……他们大声疾呼，既否定过去，也否定现在，可是又拿不出自己的解决方案。形势变得非常紧张。改革把国家带到爆发革命的边缘，只缺一个借口……"[14] 从全盘否定、抹黑斯大林到全面否定苏共历史，这就逐步拆除了苏共执政的基础，导致全面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在苏共提交二十八大的纲领草案中，公然建议取消宪法第六条关于共产党是国家执政党的规定[15]。这不仅是自毁长城，更是自掘坟墓！当然，全盘否定、抹黑斯大林不仅仅是抹黑了苏联共产党，也导致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员的思想混乱，国际退党现象大量出现。

3.抹黑斯大林就抹黑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抹黑斯大林，鼓吹"全民国家"、"全民党"，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和政党理论，削弱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拉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仰危机"序幕。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在公开性和民主化的口号下，掀起了重评斯大林的活动。国家领导人不断指责斯大林，攻击斯大林的文章连篇累牍。"斯大林主义"逐渐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代名词，遭到粗暴的批判。批判"斯大林主义"就要追根溯源，这就一直追到了列宁主义甚至马克思主义。最后得出结论：斯大林主义＝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因而要清算"斯大林主义"就必须批判马克思主义本身，这就导致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否定。苏共"民主纲领派"头目阿法纳西耶夫就曾赤裸裸地宣称："斯大林主义的实质在于列宁主义。""在1918～1919年著作里，列宁多次强调'暴力'、'无情地处决'、'大规模的恐怖'这些字眼……就是这种允许恐怖、允许党的垄断的思想成为最终在斯大林时期形成的

社会结构类型的基础。从这一点意义上说，斯大林与列宁相比实际上没有任何新的发明。现在社会上有一种说法，应当从坏的斯大林转向好的列宁。我感到这个口号是无益的、是前途无望的。我感到最重要的是要揭露斯大林主义所包含的列宁主义实质。”[16] 1990年，《苏维埃文化报》主编阿·安·别利亚耶夫指出：“现在，正是列宁遭到了集中攻击，恰恰在我们的报刊上，而不是在外国的报刊上。某些出版物把他描绘成暴君，据说列宁策动了恐怖行动，也是他建立了集中营。一句话，他不是劳动人民的领袖，而是个鬼蜮……我们在某些杂志上看到了谈十月革命和列宁本人在以后国家遭遇到的灾难中所起的罪恶作用的重头文章。而斯大林仅被认为在恐怖方面继承了列宁的事业。”[17] 这就造成了意识形态的严重混乱，结果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潮成为苏联意识形态的主流。

三 如何评价斯大林

1.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态度

我们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评价斯大林。斯大林等第一代社会主义国家领袖是在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中，由人民群众选择出来的。在一定意义上，他们代表了那一段历史、那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追求。在社会主义建设这一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中，他们有辉煌的历史功绩，也难免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但不论功绩还是失误，都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发生的。我们应把斯大林放到他所处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把斯大林同20世纪上半叶的国际形势和苏联国情联系起来，对他的是非功过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正如毛泽东所言：“必须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全面地、客观地、科学地分析斯大林的功绩和错误；而不应当用历史唯心主义的方法，任意歪曲和篡改历史，主观地、粗暴地全盘否定斯大林。”[18] 毛泽东在修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时特别强调：“我们应当用历史的观点看斯大林，对于他的正确的地方和错误的地方作出全面的和适当的分析，从而吸取有益的教训。不论是他的正确的地方，或者错误的地方，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种现象，带有时代的特点。”[19]

我们要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评价斯大林。对斯大林的是非功过，应全面地、整体地分析，切忌非黑即白地全面肯定或全盘否定。在修改《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时，毛泽东指出："我们在总结斯大林的全部思想和活动的时候，必须同时看到他的正面和反面，他的功绩和错误。"[20] 他对那种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的做法提出了尖锐批评："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国内也有人跟着转。"[21] 评价斯大林，我们还要区分主次，要看主流。要看到斯大林尽管在某些方面犯了错误，但从总体上看他的思想和观点基本上是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也就是说主要方面是正确的。"斯大林的错误同他的成绩比较起来，只居于第二位的地位。"[22] "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23]

评价斯大林的目的，在于总结经验教训，而不是追究个人责任。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来看，任何一种制度都有一个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其间可能存在着挫折、失误甚至暂时的倒退。资本主义制度有300多年历史，经过了种种曲折和失败，仍在不断地自我调整。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制度，其发展历程尚不足百年，并且是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建立的。因此，更需要较长时间的改革和完善，才能充分发挥其优越性。列宁曾把这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比喻为攀登一座人迹罕至的高山。社会主义运动的每一个历史时期都面临着艰巨的任务、严峻的挑战，每前进一步都可能付出沉重的代价。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作为这项伟大事业的第一个探索者，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失误甚至严重错误是难免的。正如毛泽东所说："因为我们走的是前无古人的道路。我历来是'难免论'。斯大林犯错误是题中应有之义。赫鲁晓夫同样也要犯错误。苏联要犯错误，我们也要犯错误。"[24] 但就此而否定探索者的努力和这一制度本身，却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应有的态度。邓小平明确指出："总结历史，不要着眼于个人功过，而是为了开辟未来。过去的成功是我们的财富，过去的错误也是我们的财富。"[25] 不仅如此，他还以身作则，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2."历史的风"正在刮走斯大林坟上的垃圾

近年，俄罗斯各界对斯大林的评价可谓风向大变。2000年5月7日，普京发表总统就职演讲：“我们不能成为那种不明白自己历史的人。我们应当始终记住：是谁建立了俄罗斯，是谁捍卫了俄罗斯的尊严，并使俄罗斯成为一个伟大的、强大的国家。”[26]任何人都明白，这个俄罗斯人民不能忘记的人，就是斯大林。2003年伏尔加格勒州提出恢复原来的名称——“斯大林格勒”。他们的理由是：“斯大林格勒是俄罗斯历史中最光荣的名字。斯大林是强大俄罗斯的象征。重新使用这个名字，有助于使俄罗斯人对国家的未来充满希望。”[27]这一改名要求得到了十几个州政府的签名支持。2003年11月7日，在纪念十月革命86周年的群众集会中，人们喊出了这样的口号：“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是搞垮苏联的历史罪人！”“斯大林是强大的俄罗斯的象征！”[28]2007年俄罗斯教育部修订历史教科书，肯定斯大林是苏联最成功的领导人，成功地治理过“伟大的祖国”。2008年3月5日，俄罗斯民调资料显示，有42%的俄罗斯人认为，国家需要的正是斯大林这样的领袖。有36%的人肯定苏联是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取得卫国战争的胜利。有20%的人认为斯大林是一个睿智的领导人[29]。2009年8月，莫斯科最繁忙的库尔斯卡亚地铁站，恢复了被赫鲁晓夫移除的苏联国歌中歌颂斯大林的话：“斯大林培育我们对人民的忠诚。鼓舞我们去劳动、去立功！”[30]2009年11月7日，莫斯科举行盛大游行，纪念1941年红场阅兵68周年，表达人们反对篡改历史、贬低苏联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的作用的坚定立场。

俄罗斯人重评斯大林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一个可以想见的原因是：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的国际地位急转直下，人民生活水平长期未见改善，人们无限怀念光辉、强大的斯大林时代。是的，历史终究是会准确评价斯大林和苏联历史的。

这一点也在斯大林的预料之中。早在1943年，斯大林就曾说过：“我知道，我死后有人会把一大堆垃圾扔到我的坟上。但是历史的风一定会毫不留情地把那些垃圾刮走！”[31]

---

[1] 冯颜利，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龙钰，西南大学马克

思主义学院博士。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633页。

[3]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动态》2004年第30期。

[4] 参见吴恩远《正确评价苏联模式》，《理论前沿》2007年第19期。

[5]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第104页。

[6] 《斯大林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79，第487页。

[7]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第90页。

[8] 〔英〕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第4卷，伦敦，1951，第613页。

[9] 1955年10月25日《纽约时报》。

[10] 〔俄〕朱可夫：《回忆与思考》第2卷，洪科译，三联书店，1972。

[11] 柯雄编《苏联国内资本主义复辟纪事》，三联书店，1975，第246页。

[12] 黄宏、纪玉祥编著《原苏联七年“改革”纪实》，红旗出版社，1992，第339～340页。

[13] 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编译组编译《苏联问题资料》，东方出版社，1990，第2页。

[14] 〔俄〕博尔金：《震撼世界的十年》，甄西译，昆仑出版社，1998，第121页。

[15] 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编译组编译《苏联问题资料》，东方出版社，1990，第26页。

[16] 《今日苏联东欧》1991年第1期；刘书林：《斯大林评价中具有争议性问题的新分析》，《政治学研究》2006年第4期。

[17] 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编译组编译《苏联问题资料》，东方出版社，1990，第140页。

[18]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人民出版社，1965，第111页。

[19]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第65～66

页。

[20]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第284页。

[21]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第102页。

[2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第284页。

[23]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第102页。

[24] 参见吴冷西《毛泽东和两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当代思潮》1996年第6期。

[25]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272页。

[26] 2000年11月5日《俄罗斯报》。

[27] 参见刘书林《“非斯大林化”与苏联的解体》，《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年第5期。

[28]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动态》专题报告之二，2004年6月30日。

[29] 《民调显示斯大林个人崇拜重回俄罗斯》，俄新网，2008年3月5日。

[30] 《斯大林“重回”莫斯科地铁》，2009年9月7日《参考消息》。

[31] 参见张捷《“历史的风”刮走斯大林坟上的垃圾》，《真理的追求》1999年第11期；刘书林：《斯大林评价中具有争议性问题的新分析》，《政治学研究》2006年第4期。

苏共变质与苏联解体

张全省 [1]

一 苏联解体及其原因分析

作为执政党的苏联共产党由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变了党的性质和奋斗目标，放弃了党的领导地位。党开始从国家的决策中心向议会党过渡。由于实行意识形态多元化的方针，马克思列宁主义失去了指导思想的地位，社会主义理想实际上遭到否定，各民族失去了联合的思想基础和共同的奋斗目标，从而使苏联这个国家迷失了未来的方向，失去了主心骨，最终走向解体。

1.苏共由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变成了背离了马列主义，失去正确理论指导、思想老朽、理论混乱的政党

列宁创立的布尔什维克党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又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已有论断，而是根据变化了的情况发展马克思主义，开创了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列宁主义。列宁去世后，苏共逐渐使原本生动活泼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变成僵化的理论教条。苏共党纲和党章虽然规定苏共的全部活动都要“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但实际上却陷入了教条主义不能自拔，在制定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上，不是根据国内外发展实际和国内生产力水平，而是把马列著作中的某些概念作为衡量社会发展阶段的标准，因而往往过高估计苏联社会的发展阶段，过急地提出向共产主义过渡。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赫鲁晓夫就宣布苏联将用20年“基本上建成共产主义社会”；勃列日涅夫掌权后提出苏联已进入发达社会主义阶段；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在总结历史教训时，不认为苏共的失误是教条主义结果，相反是马克思主义过时了，开始把民主社会主义奉为灵丹妙药。1990年7月苏共二十八大通过党章取消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规定。这标志着苏共已完全背离了自己的党纲，蜕变为机会主义政党。执政党的思想理论僵化老朽及后来的混乱，使其迷失了方

向，不能为国家未来发展指明奋斗目标。

2.苏共由一个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政党变成了缺乏先进性的全民党

列宁创立了布尔什维克党，把它作为阶级的先进觉悟阶层和阶级的先锋队，领导十月革命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打败了德国法西斯，取得了卫国战争胜利。但是随着革命胜利和发展，党的先进性逐渐丧失，许多党员领导干部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淡漠，迷失了前进方向。勃列日涅夫曾对他弟弟说过："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的空话。"[2] 党的最高领导人都这样说，如何能让普通百姓相信共产主义？同时苏共党的领导干部搞特殊、搞腐败日益严重。许多高级干部的实际收入同一般劳动者相比是50：1，甚至达到100：1。苏联有一整套内部的特供商店、餐厅、医院、别墅等特殊享受制度和设施，专供党政高级干部享受。特权变成了各级干部追求的目的，成为钱权交易、满足私欲的工具。据估计，在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以各种形式享受特权的人数不低于1000万。人民对贪污腐化日益严重不满，对苏共的离心力和冷淡情绪与日俱增，进而发展到怀疑马克思主义和对党不信任。再就是党的建设没有搞好，基层组织缺乏凝聚力和战斗力，不能发挥先进作用。在党的阶级性质上，一方面说苏共"捍卫工人阶级的利益"，另一方面又讲苏共是"按自愿原则联合苏联公民"的"政治组织"；在发展党员中注重数量，却没有努力把工人阶级中的优秀分子培养成理想信念坚定、敢于和善于斗争的"阶级斗士"，而是只要求他们服从上级的领导意志，成为机械地贯彻上级意图的工具，上层出了问题，党员不知所从。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又出台了不允许在企业、农村、学校等基层单位建立党组织的法律，结果造成党的基层组织萎缩，党失去了在群众中开展活动的基础，无法领导团结人民。在党的地位上，不再讲苏共是"政治体制的核心"和"社会的领导力量"，宣布苏共同其他政党、社会团体将是平等竞争的合作伙伴关系；在党的组织原则上，一方面还讲民主集中制是党的组织原则，另一方面又允许少数人利用党的舆论工具"捍卫"自己的不同观点，允许党员"按纲领进行联合"。这种所谓"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混乱了党内思想，严重削弱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

力，造成各级组织松散，政治局势逐渐失控。所以人们说，苏共拥有20万党员时夺取了政权，拥有200万党员时打败了希特勒，而到拥有近2000万党员时却失去了政权，关键是党的建设没有搞好。

3.苏共由一个重视改善民生的政党变成了重政治、轻经济，没有让人民得到经济发展实惠，失去人民信任的政党

十月革命胜利后，面对整个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的严重困难，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审时度势，果断实施以征收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为主要内容的新经济政策，大大减轻了农民负担，促进了生产力发展，受到广大人民特别是农民的欢迎，使1921年的危机迅速得到克服。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联共产党未能适应世界潮流变化，实施的国民经济发展战略仍然以重军工业为主，赫鲁晓夫虽然对僵化的经济与政治体制及时改革，但仍沿袭了一条粗放经营型的经济发展战略，使得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逐步处于下降趋势。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的国民经济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未能改变这种局面，且一年不如一年。1987年苏联国民生产总值相当于美国的38%，食品消费品短缺达到空前程度。1989年“消费品篮子”里1200多种商品中有1050种短缺，221种食品中有188种实行票证供应；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人民实际生活水平下降，1991年大约有1/3到1/2的居民生活处于贫困状态[3]。苏共过分突出重军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的片面经济路线和方针，背离了社会主义根本任务和目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吸引力在人民群众心目中越来越下降。人民群众失去了对苏共领导经济能力的信任，不满情绪与日俱增，最后导致苏联的解体。

4.苏共由一个坚持民主集中制、富有生机活力的政党变成一个实行党内个人专断、死气沉沉的政党

无产阶级政党取得政权后，要及时建立健全民主与法制，这是执政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执政党要把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变成国家意志，成为全社会共同遵循的行为规范，从法律上保障全社会实现公平和公正，才能从制度上保证人民群众当家作主，保持党执政地位

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列宁在苏联成立之初，就致力于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首先明确把民主集中制作为党和国家的根本组织原则。他强调民主集中制的重点是党内民主建设，认为党内民主的实行领域主要在讨论、批评、决策方面，党内集中制则贯彻在党的行动统一方面。两者有机结合构成党内民主集中制。在实践中，列宁坚持集体领导，从不利用自己的威望、地位和权力来突出自己和搞个人专断。他经常这样说："不召开政治局会议，我不能作出任何答复。"然而，列宁逝世后，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屡遭破坏，党内民主建设出现不正常情况。在党内，为了显示团结统一，不允许存在任何不同意见，只准相信领袖和上级，党员和下级组织往往成了唯唯诺诺的仆从。从20世纪30年代起到斯大林逝世，20多年内仅召开党的代表大会3次，党的代表会议2次，党的中央全会也很少开，其中8个年头未召开过一次党的中央全会。赫鲁晓夫上台后更是不讲民主、更专制，连党代表大会报告都不经过政治局讨论，苏共二十二大开幕词、报告、修改党章报告和闭幕词都由他一个人写作。党的领导人大权独揽，政治局多数人没有发言权和参与决策的权力，由于党的上层脱离普通党员和群众，没有掌握群众情绪，使得基层组织大多盲目服从上级组织的决策和决议。党内长期缺乏民主，造成党员不把捍卫党看做自己的事情，因此"8·19"事件发生后，在党面临严重危机情况下，居然没有几个党员站出来维护党。当戈尔巴乔夫宣布解散共产党、叶利钦宣布共产党非法时，没有一个党员和党组织站出来进行抗争。苏共民主集中制坚持得不好，党内生活不正常，是导致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

5.苏共由一个具有权力制衡系统的政党变成了一个失去有效监督制约，党内产生特权阶层和严重腐败的政党

为发扬党内民主，预防权力走向腐败和专横，列宁进行了积极探索，1918年苏俄成立了国家监察部，1920年改为工农检察院。俄共（布）九大后成立了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1923年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工农检察院合并，以加强对执政党的检查和监督。列宁积极探索党内权力制约机制，倡议并建立了与中央委员会权力平行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有权参加中央全会甚至政治局会议，不顾情面地

向总书记及其他中央委员提出质问，审查各种文件”。这为监督和严厉查处那些滥用职权、以权谋私的党员干部，确保在新经济政策下，党和国家的性质不发生变化，防止“人民公仆”蜕变腐败起到了重要的制度保障作用。然而自1926年11月起，却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兼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人员开始互通，导致监察委员会权力开始削弱。1934年苏共十七大通过的《组织问题》决议，把中央监察委员会改为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并“委派一名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为党监察委员会的领导者”。大会通过的党章把监察委员会的职权规定为：监督党的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执行，审理违反党纪的人，审理违反党的道德的人。这使被监督者变成了监督者的领导，监督者只能在被监督者领导下工作，没有相应的权力，其监督功能也就完全丧失。由于党内监督制约机制缺失，不可避免地形成特权阶层，而党一旦成为特权利益代表，必然失去执政基础。苏联剧变前夕，民意调查显示，只有7%～8%的人认为苏共代表人民，却有70%～80%的人认为它只代表它自己。如果说人民群众曾用自己的乳汁哺育了党，用自己的生命保护了党，那是因为党是为着人民利益不惜牺牲一切、英勇不屈的党。在苏联卫国战争中，荣膺“苏联英雄”称号的74%是共产党员，11%是共青团员，有300万名共产党员牺牲在战场[4]。正是由于苏共曾是这样的党，才获得了人民拥戴，才能取得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但是随着和平的到来，权力腐败恶疾愈演愈烈。人民群众怎么可能熟视无睹，一如既往地真心拥戴共产党？因此，当戈尔巴乔夫宣布苏共解散时，人民群众一个个表情冷淡，无动于衷。这让人们再次想起经常说的一句话：缺乏监督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腐败必然亡党亡国。

二 苏联解体带来的严重后果

1.苏联解体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了空前的重大挫折，带来极为恶劣的影响

苏联的解体使东欧社会主义迅速演变，社会主义阵营迅速瓦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空前低潮，许多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支持者感到失去了偶像，失去了精神支柱，对继续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感到迷茫。

苏联的解体，让西方反共势力幸灾乐祸，他们认为这意味着共产主义的终结、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终结、马克思主义的终结，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失败。但是，历史并没有完全如西方反共人士所想的那样。恰恰相反，社会主义运动在经历了这一段挫折之后逐渐走出困境，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重压和裂隙中依然顽强前进，国际社会主义力量从挫折中吸取了教训，正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

2.苏联解体使整个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存在了40多年的两极格局最终结束，形成以美国为首的一超多强的世界格局。美国企图独霸世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势力借机向原苏联和东欧地区介入，对继续坚持社会主义的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施加压力。但两极格局终结后，华约组织解散，两大军事集团对抗局面结束，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也有利于第三世界国家振兴民族经济。由于世界形势总趋势走向缓和，美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转向对话和缓和，这使得维护世界和平的可能性增长。世界政治格局多极化，经济全球一体化趋势也在迅速增强，世界经济越来越成为一个整体。

3.苏联解体促使中国共产党反省思考自身建设和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

苏联解体后20年来，中国共产党吸取经验教训，既总结了执政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经验，也吸取了世界上其他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与时俱进，切实加强党的思想组织政治作风建设，在改革与开放中形成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理论路线纲领和基本政策。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明确提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为中国规划了未来的宏伟蓝图。所以，苏联的解体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本身的失败，而是一种特殊的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

---

[1] 张全省，宝鸡文理学院哲学系教授。

[2] 转引自李瑞琴《党风廉政建设存在的严重问题与苏东共产党的垮台》，《上海党史与党建》2008年第6期。

[3] 于滨：《借鉴国外政党执政经验教训加强党的建设》，《延边党校学报》2007年第4期。

[4] http：//www.xj71.com/？action-viewnews-itemid-21029.

苏共利益观的蜕变及其严重后果

罗建林 [1]

一 共产党利益观的科学含义

任何政党都有自己的利益。政党是近现代社会中代表一定阶级、阶层或社会集团的利益并为其利益而斗争的政治组织。政党的根本属性是阶级性。而阶级本身就是一个经济范畴，一个利益范畴。正如列宁所说："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 [2] 可见，政党的存在不仅表现在不同政党在社会经济关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而且表现在它们所处的地位与其利益密切相关，简言之，政党就是利益的代表、利益的化身。同时，党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的组织实体，它本身的运行、发展也需要有一定的物资来维护和保证，所以，作为一个政党，它不仅代表一定集团的利益，而且自身还必须消耗一定的利益。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曾经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 [3] 他还形象地说："'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 [4] 这种直白而坦率的利益观告诉我们，革命导师从来没有否认无产阶级政党有自身利益。

共产党的利益就是人民的利益。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详细阐述了共产党的阶级性和先进性。他们指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代表着无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但共产党不是一般的无产阶级政治组织，而是无产阶级的先进政党，是无产阶级"最先进的和最坚决的部分"。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在论述共产党的利益观时就指出："共产党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在无产者不同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这就告诉我们，在阶级尚未被彻底

消灭之前，共产党只能是无产阶级利益的代表，共产党除了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也不能有自身特殊的利益。

共产党的最终利益是人类共同的利益。无产阶级政党的纲领，是组织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的劳动人民进行阶级斗争，建立无产阶级的统治，经过社会主义而达到共产主义的最终目的。实现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最终目标。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包括：彻底消灭私有制和阶级、阶级差别；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社会成员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具有高度的精神文明，人们能获得全面发展；随着阶级和阶级差别的消灭，一切重大社会差别消失，政党和国家都会消亡。由此可见，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历史上最进步、最合理、最美好的社会。共产党把实现这样的社会制度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不仅代表了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最高利益，而且表明了共产党人所从事的事业，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壮丽的事业，所有共产党人都应该为实现党的最终目标而努力奋斗。

二 苏共利益观的蜕变

苏共利益观的蜕变过程，实质上源于苏共党内自身特殊利益集团对个人利益的贪婪追逐。美国作家大卫·科兹和弗雷德·威尔在《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中就认为，这种蜕变是“一次来自上层的革命，旧统治集团中的主体部分自行背叛了以往对自己借以统治的体制的忠贞，掉头而去”，即“在很大程度上是苏联既得利益集团的‘自我政变’”。

这种蜕变发轫于斯大林时期。列宁时期，由于苏共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追求，苏共广大党员不仅在艰苦的战争岁月中始终身先士卒、浴血奋战，而且在刚刚开始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十分不齿那种攫取特权、谋取私利的行径。然而，随着列宁的早逝，斯大林上台后，开始建立起一种盲目服从上级的官僚体制，并赋予各级官员种种特权，于是当年列宁设立的那种为了保障为人民日夜操劳的同志们能吃饭肚子的“疗养食堂”慢慢扩展为形形色色的特供商店，甚至于在庞

大的干部队伍中逐渐孕育出一个“官僚特权的阶层”。为此，1935年20世纪文学大师、法国左翼作家罗曼·罗兰在他的《莫斯科日记》中就写道：“身为国家与民族卫士的伟大共产党人队伍与其领导者们，正在不顾一切地把自己变成一种特殊的阶级。”“而人民则不得不依然为弄到一块面包与一股空气（住房）而处于艰难斗争的状况之中。”[5]

这种蜕变形成于勃列日涅夫时期。勃列日涅夫制定了一系列强化特权的条例和规定，将官僚特权系统化、合法化。特别是在其执政后期，一方面由于体制的僵化和干部队伍的稳定，特别是事实上的终身制的确立；另一方面由于党内外民主和群众监督机制的破坏和削弱以及腐朽思想对干部的侵蚀，苏共“特权阶层”得以形成。据俄国学者估计，当时这个阶层有50万～70万人，加上他们的家属，共有300万人之多，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5%[6]。苏共领导拥有包括宅第权、特供权、特教权、特继权、特卫权、特支权等名目繁多的特权。

这种蜕变恶化于戈尔巴乔夫时期。戈尔巴乔夫执政时，苏共特殊利益集团羽翼已经丰满，他们已将大量国家财富占为己有。此时，他们急切希望共产党的垮台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剧变，以便通过国家制度的公开变更，在新制度下从法律上承认他们攫取的财富合法化，并能名正言顺地将这些财富传给子孙。而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推行的所谓“改革”，恰恰迎合了特权阶层的这种需要，并成为把苏共特殊利益集团推向新生资产阶级的催化剂。终于，在苏共及国家利益处于生死存亡的那场政治剧变中，特殊利益集团迅速撕下了原来的假面具，公开推动放弃社会主义，走上全盘私有化的资本主义道路。苏共曾经代表无产阶级劳苦大众的利益观终于彻底终结。

三 苏共利益观蜕变的危害

苏共利益观的蜕变直接导致党内腐败蔓延。苏共从为无产阶级劳苦大众的利益而奋斗的利益观向追求自身特权利益的蜕变，其必然结果就是党内出现日益严重的腐败现象。特别在20世纪70年代前后，腐败事实上已迅速向党的肌体的深层次侵蚀。主要表现在：经济领域的特权制度化、贪图享受的相互攀比，以及公然侵占人民利益；思想上

僵化、保守主义盛行和不思进取；干部任用上任人唯亲、裙带关系等不正之风盛行，以及党和国家高级干部职务实际上的终身制；党风的日益庸俗和衰败，等等。苏共利益观的蜕变使苏共特权利益阶层成为引领苏联整个社会走向腐败的急先锋，这对苏共的影响实质上是毁灭性的。

苏共利益观的蜕变直接引发人民的信仰危机。苏共日益严重的特权现象和不断恶化的腐败行径让人们深恶痛绝，人们不但对苏共当前是否代表人民的利益提出了质疑，而且对苏共今后还能否代表人民的利益提出了质疑。实际上，人们已经不再相信苏共曾经倡导的那种让人民欣然向往的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不仅如此，苏共自身许多干部和党员也丧失了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他们中有相当多的人入党不再是为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事业奋斗，而是为了自己在仕途上的发展和捞取个人好处。据勃列日涅夫的侄女柳芭在1990年移居美国后写的回忆录说，勃列日涅夫自己也“不再相信社会主义的胜利、马列主义的原则或者共产主义的前途”。他甚至对弟弟说：“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的空话。”[7] 以至于1993年重建俄共时，加入俄共的原苏共党员还不到10%。在圣彼得堡市，原有苏共党员50多万人，而1993年加入俄共的只有2.1万人。该市加里宁区原有苏共党员2万多人，1993年加入俄共的只有85人[8]。这说明原苏共党员中，有相当一部分并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与此同时，俄罗斯人民再也不太相信和支持共产党，比如，在2007年的杜马选举中，俄共所获席位只有57个，得票率仅为11.6%[9]。

苏共利益观的蜕变直接割裂了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随着苏共特权阶层及其利益的不断扩张，苏共腐化变质的特权阶层的野心与私利也就不断被诱发并膨胀，这不仅导致人民群众对苏共的日益不满、失望、冷漠甚至抗议，即使在苏共内部，因各职别间巨大的利益差别，不断地撕裂着党的内部团结，从而导致党的上层不断脱离普通党员和群众，最终失去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所以，当戈尔巴乔夫宣布解散共产党、叶利钦宣布共产党非法时，不仅没有一个党员和党组织站出来进行抗争，而且被它代表的人民群众也隔岸观火，幸灾乐祸，甚至直接加入掘墓人的行列。

当然，苏共利益观蜕变的最终结局是其自身的垮台和国家的解体。这一历史悲剧的深刻启示在于，作为共产党人特别是共产党的各级领导，必须牢记共产党应该始终树立正确的利益观，即“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做成的”，除了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始终不变的价值观。

---

[1] 罗建林，武警上海政治学院教授。

[2]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10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第82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6，第103页。

[5] 〔法〕罗曼·罗兰：《莫斯科日记》，夏伯铭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第117～119页。

[6] 陆南泉：《苏联特权阶层的奢华触目惊心》，《同舟共进》2010年第2期。

[7] http：//www.reviewing.cn/gongyun/2009/0301/article_796.html.

[8] 张全景：《对苏联亡党亡国的几点思考》，《学习与研究》2008年第3期。

[9] http：//kprf.ru/personal/deputies/.

教训与启示：苏联共产党丧失政权的思考

种明富 [1]

一 苏联共产党丧失政权的教训

1.没有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苏联共产党曾取得过令世界震惊、苏联人民自豪的光辉业绩。它用了不长的时间就建成了强大的社会主义物质基础，大大缩小了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差距。然而，苏联共产党在时代已经发生变化的条件下，仍然固守原有体制的弊端，对世界新科技革命无动于衷；它拒绝对外开放，拉大了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最终使得生产效率低下，经济发展速度不断下滑，压抑了劳动者的积极性，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阻碍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

（1）实行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由于否定和限制商品生产，苏联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这种指令性计划经济表现为计划本身的过度集中性、无所不包的全面性、内容上的片面性，以及行使过程中的强制性。中央计划囊括了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在国有企业之间不存在实质性的商品交换关系，国家根据社会需求确定指令性生产指标进行社会资源配置。这种过分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管理体制，不可能及时了解市场上千变万化的需求，势必严重制约生产力的发展。

（2）离开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推行简单化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从1926年起，苏联政府通过法令和行政手段排挤私营企业，私营工商业者作为“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受到打击和取缔。在农业方面，急于消灭富农阶级和富农经济，用行政手段实现农业集体化。1936年以后，苏联完全排斥了私有制和个体经济的存在，既急于消灭私有制经济，又急于实现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这就离开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与要求，片面追求生产关系的“纯正”，束缚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

也影响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优越性的发挥。

（3）拒绝对外开放，在经济建设中闭关自守。斯大林认为，中国和欧洲各人民民主国家脱离了资本主义体系，和苏联一起形成了统一的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而与资本主义阵营相对立。两个对立阵营的存在所造成的经济结果，就是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瓦解了，因而就有了两个平行的、互相对立的世界市场。在斯大林这种错误理论指导下，苏联割断了与西方国家的经济联系，凡是资本主义组建的国际经济组织一律不参加。这种封闭的经济体系和运行机制，阻塞了从西方引进资金和技术的渠道，割断了与世界的联系，极大地妨碍了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甚至人为地拉大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的经济差距，对苏联的各方面建设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也为苏联解体埋下了重大隐患。

（4）错失科技革命带来的机遇。苏联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科学技术取得了十分出色的成就，但由于思想僵化，闭关自守，夜郎自大，忽视西方的新科技革命及其成果对生产力的巨大推动作用，一味强调军事工业，致使科学技术长期不能为民用工业服务，产业结构得不到合理调整，科学技术得不到产业化，形成不了强大的生产力，其最终结果只能是在以科技和经济为主的综合国力竞争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

2.没有引领当时代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

在意识形态领域，苏联共产党未能坚持既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潮，同时又繁荣社会主义科学文化的方针，而是搞阶级斗争扩大化，严重损害了知识分子的感情，使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充斥于各种报刊和书籍。这样，当“公开性”、“民主化”的闸门一打开，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封建主义思潮大肆泛滥，搞乱了人民群众的思想，削弱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也为戈尔巴乔夫“新思维”、“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纲领的推行打下了基础，从而最终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1）封建主义遗毒的影响。苏联共产党思想文化上受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表现为宣扬领袖的个人崇拜，把领袖捧为一贯正确、洞察一切的先知。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特别是斯大林个人主观的原因，苏联逐步建立了凌驾于党中央和政治局权力之上的总书记个人专断制，大搞“一言堂”，把正常的思想认识上的分歧等同于阶级斗争，无限上纲，残酷斗争，给党、国家和人民造成了难以挽回的重大损失，破坏了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败坏了社会主义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

（2）思想上僵化保守，教条主义盛行，缺乏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态度。苏联共产党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当初的一切设想当做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条，甚至把斯大林本人总结社会主义实践经验而提出的一些理论观点当做教条。苏共长期以来不能把马列主义与本国实际相结合，使马列主义活的生命力凝固、僵化，降低了其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削弱了马列主义的战斗力。

（3）在文化上，实行过度集中的管理体制。与过度集权的经济、政治体制相一致，实行文化专制主义，各种文化单位均由国家统一包办，甚至学校教科书的编写大纲也由党中央领导人拟订。对科学和艺术粗暴干预，阻碍了科学和艺术的进步，限制了科学上不同观点和学派、艺术上不同形式和风格的发展，挫伤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3.日渐背离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苏共在很长时期里代表了苏联人民的意愿和利益，获得了人民的高度信赖。然而，随着高度集中、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制度的确立，苏联共产党没有把马列主义与本国实际相结合，逐渐脱离了人民，出现了以权力为基础的阶级分化，官僚主义屡禁不止，贪污腐化现象日益严重。

（1）苏联共产党内部日益形成了一个既得利益的特权阶层。从20世纪30年代起，苏共干部特权增多了，领导干部实行高薪制并享有名目繁多的补助，享受兼薪及其他种种特权，他们通过权力获取了高

出一般社会成员许多的财富。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实行自由的市场经济，赋予各种经济成分、各种经营方式以合法性。然而，苏联并没有为此制定相应的法律规范市场和人们的行为。于是，原先大权在握的官员迅速把权力变为资本，大搞权力寻租，不少人一夜暴富。因此，苏联解体是苏共丧失先进性从而丧失合法性的结果。

（2）贪污腐败现象严重。在苏联共产党内部，贪污受贿、裙带关系、结党营私、损公肥私等腐败现象日益严重。乌兹别克、哈萨克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的女婿、内政部长丘尔巴诺夫等人的贪污受贿案曾披露报端，广为人知。以标榜“民主”自居的戈尔巴乔夫也不例外。在苏联解体期间，学者就“苏共代表谁”搞过社会调查，结果显示，认为苏共代表全体劳动人民的只占7%，认为苏共代表工人的占4%，认为苏共代表全体党员的也只占11%，而认为苏共代表党的官僚、代表干部、代表机关工作人员的占78%。这样一个失去民心、脱离群众的党，必然要被老百姓所抛弃。“8·19”事件以后，克里姆林宫的红旗，就是在多数民众以及广大党员毫无反应的宁静中降了下来。

二 苏联共产党丧失政权的启示

1.执政党必须始终注重从思想、组织和作风上加强自身建设

总结苏联解体的经验教训，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要继续把党的思想建设放在首要地位，坚持从思想上建党，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特别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党的思想基础和行动指南。一个党如果没有先进的理论作为指导，就不可能有正确的行动；一个党如果没有思想上的一致，就不可能有全党的团结和统一。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实施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旺发达。要选拔和培养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造就一支能适应跨世纪发展要求的年轻干部队伍，逐步形成完善干部选拔、培养、管理的制度，切实加强对选拔任用领导干部的监督制度，坚决防止和纠正用人上的不正之风等。要继续坚持改革开放道路，依靠更深层次的改革开放来整治党风。

2.执政党必须始终具备与时俱进的创新品质

执政的共产党，只有自觉顺应历史潮流，不断地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提出适合形势任务的正确纲领，才有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即邓小平理论。正是有了这一理论，才使中国共产党继续保持了先进性，始终站在时代的最前列。正是从党的建设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形势任务的历史性变化出发，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成为新世纪推动我们党走向新阶段的伟大纲领，标志着我们党继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之后，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又一重大贡献。

3.执政党必须不断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改革发展战略

执政党要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最根本的就是要顺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只有不断地满足和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才能促进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不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来改变自己的方针政策，同样有落后于生产力发展，最后失去政权的危险。江泽民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都需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适时地通过改革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这样才能使社会主义制度充满生机和活力。全党同志必须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改革和发展的基本观点和自觉性。

4.执政党必须大力推进科技进步和创新以解放生产力

1988年，邓小平第一次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江泽民在2001年“七一”讲话中深刻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且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这就为新世纪我们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指明了方向。当前，我们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在世界政治走向多极化、经济日趋全球化的条件下，我们要实现跨世纪发展的战略目标，必须加紧推进科技进步和创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提供强大的科技支持。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追赶世界科技的先进

潮流，加快我国经济和科技事业的发展，努力缩小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力争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

5.执政党必须具备宽广的世界视野，立足中国，放眼世界

苏联在20世纪下半叶与资本主义的较量中渐渐败下阵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苏联领导人对所处时代特征、世界形势缺乏正确的分析和科学的判断。世界眼光重要，正确的世界眼光更重要。这应当是从苏联社会主义失败的教训中得出的一个重要启示。随着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推进，各国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人们之间的交往越来越频繁，世界越来越成为大的“地球村落”，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指望自己游离于世界之外而不被淘汰。这种状况，对我们党全面、准确地认识和把握时代的新特征，始终站在时代前列，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我们必须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置于更加广阔的时代背景和世界形势中去观察、认识、思考，去创新，去推进发展。我们必须抛弃狭隘和封闭的意识，具有世界的眼光和开放的思维，具有博大胸怀和海纳百川的包容精神，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使我们党永远保持先进性，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参考文献

湘妮：《从苏共指导思想的几个问题看苏联演变的教训》，《政党与当代世界》1992年第2期。

刘克明：《苏联剧变的历史教训》，《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4年第1期。

刘添才：《苏联解体的原因及教训》，《今日前苏联东欧》1992年第6期。

王丹：《民族自我意识与苏联解体问题》，《世界历史》2000年第4期。

桂立：《苏联的争霸扩张政策与国家解体关系析》，《宁夏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

江流等：《苏联演变的历史思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里忠：《苏共垮台原因浅析》，《政党与当代世界》1992年第12期。

张建华：《论苏联联邦制变形的历史原因》，《东欧中亚研究》1999年第4期。

王丽萍：《苏联解体的国有结构特征分析》，《东欧中亚研究》1999年第3期。

黄立茀：《苏共政治控制衰变探析》，《东欧中亚研究》2000年第2期。

安维复：《科技革命与苏联兴亡》，《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0年第1期。

高放：《苏联、东欧剧变的根本原因何在？》，《国际共运史研究》1992年第3期。

孙午生：《从联邦制国家形式析苏联解体原因》，《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8年第1期。

王悦南：《试论意识形态在苏联解体中的作用》，《俄罗斯研究》1997年第5期。

马岩：《意识形态与苏联解体》，《马克思主义研究》1997年第3期。

---

[1] 种明富，南京政治学院博士。

希腊共产党关于苏东剧变原因的思考

王喜满 [1]

一 内部因素是苏东剧变的根本原因

希共认为，对于反革命之为何能够在苏东得逞，要优先考虑内部因素，因为“反革命颠覆行动不是来自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而是始于内部，来自上层，是通过失去革命性的执政党的政策实现的” [2] ，具体表现在经济、政党政治、意识形态、阶级、科技、对外政策等各个方面。

（1）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缺点、错误并最终走入歧途，关键的问题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被忽略了。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忽视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经济、产业结构严重失调，工农业发展不平衡现象突出。这些矛盾不仅没有得到苏东国家党的领导人的重视，反而采取了激化这些矛盾的措施，如私有化、集权化等。因此，这些矛盾逐渐演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对抗性矛盾，表现为激烈的社会对抗和冲突。

（2）社会主义经济机制的僵化、所有制和分配制度等社会主义因素的弱化对苏东剧变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希共指出，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运行机制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主要是中央计划僵硬，中央集权化严重，商品流通和市场供应方面存在严重不足，而且“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也被破坏。其结果就是社会利益、集体利益被严重损害和社会主义和谐局面的破裂。

（3）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的内在优势未能发挥出来，特别是作为政治体制核心的执政的共产党又逐渐丧失其先锋领导作用是苏东剧变的重要政治因素。希共指出，苏东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潜在优势是人们的自觉参与、社会对政府和管理机构的监督，以及“党—苏维埃—人民”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而所有这些政治优势均未能发

挥出来。突出表现为党和国家机关脱离现实和人民群众，不关心人民的需求和情绪，致使人民群众建设社会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弱化，人民对党组织和党干部的监督也日渐弱化；民主集中制遭到践踏，地方苏维埃、劳动人民和工人组织的地位和作用得不到保障，人们对党和国家机关的监督实际上只剩下了形式；干部的提拔也不是通过民主方法实现的，而是在一种非组织的和充满功利的气氛中进行的。之所以出现上面这许多问题，其责任主要在于共产党自身的角色和行为蜕化变质。这些国家的共产党认为自己的先锋队角色是注定的和不可否认的，这就培养了骄矜和自满情绪，逐渐失去了同人民的联系，致使党越来越松散，党的原则、党的运行机制和干部提拔政策失去活力，最后逐渐丧失其先锋领导作用。这些现象不仅与社会主义本质不相容，而且导致共产党逐渐丧失了它在人民心中的威望，失去了人民的支持。

（4）政治工作和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的弱化和出现偏差是苏东剧变的重要因素。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旨在培养社会主义觉悟和确保社会主义建设所需新型人才的多方面教育活动被削弱，同时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被低估了，这就使得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在社会上渗透和发展起来，而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进行斗争的工作却被忽略了；二是关于社会主义及其建设的问题被简单化，而关于资本主义危机的理论又被绝对化了。例如，苏联提出的发达社会主义理论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理论就低估了过渡时期的复杂性和长期性。类似脱离实际的理论还有“全民国家”、“全民党”和“全民民主”的理论。与高估社会主义无可争议的胜利相对的是将资本主义危机现象绝对化，这就表现为低估了资本主义运用新科技推动生产发展的能力，低估了战后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能力，致使在两种制度斗争的关键时刻，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这些错误理论和乌托邦幻想不得不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压力下屈服了。

（5）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忽视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问题。在社会主义基础已经奠定时，工人阶级和农民、知识分子等其他社会阶层的角色差别减少了，但还没有根除（城乡矛盾、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矛盾还存在）。之所以还存在这些差别是因为社会主义社会是

一个过渡时期，社会的完全平等尚不能实现。有阶级差别存在，就存在着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所有制形式、民族特点、历史传统、地方特点和旧社会残余以及剥削阶级的复辟企图等，都是社会主义社会还将长期存在阶级斗争的原因。阶级斗争的强度、形式和持续时间的长短取决于社会主义关系建立的速度，国际阶级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民族特点，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传统，党和人民关系的好坏，工人阶级与其联盟者的团结等。希共认为，正是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忽视，从而为社会矛盾的激化提供了条件，这些矛盾在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情况下就演变成为一场革命与反革命的较量。

（6）科技革命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片面应用是不可忽视的原因。希共指出，科技革命成果在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各个领域的全面应用被耽搁了。虽然党代表大会反复强调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和科技成果推广使用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但是，实际情况是，科技革命的发展和科技成果的运用是很不平衡的：科学技术在军工领域、航空航天领域，在一些重工业部门和大规模工程中应用得多，而在消费品和服务行业则使用得极少。这就直接抑制了社会生产力的持续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

（7）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战略和策略上出现了重大失误。帝国主义发动的两种制度的对抗不只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斗争，而是一种企图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实际活动。但是，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在战略目标和具体策略的制定上，却忽视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性本质，片面执行“和平共处”的对外路线，实行阶级调和、意识形态调和的政策。苏东各国共产党为进行反帝斗争和争取国际和平，在战略上寻求同社会建立联盟和采取联合行动，但是未能根据形势的变化，正确把握社会党及其民主社会主义理论的变化，也忽视了社会党支持资本主义制度和反社会主义的一面。所有这些都助长了帝国主义颠覆社会主义的活动。

（8）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被严重削弱。共产国际的解散是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重大打击，由于意识形

态的分歧，新的类似共产国际的组织没有能够建立起来。有关各国共产党之间意识形态分歧的讨论，或者是采取了公开论战的形式，或者是流于形式上的观点交流，最后造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从而影响到国际阶级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和反帝斗争行动的统一，对整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更是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正是在上述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反革命的“改革和新思维”政策才能打着“民主化”、“公开性”和“透明度”的旗号，颠倒是非，丑化社会主义，否定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及历史贡献，抹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功绩，肆无忌惮地实行复辟资本主义的政策。

二 反革命的“改革和新思维”政策是苏东剧变的最直接原因

希共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发生资本主义复辟的行动始于内部，来自上层。因此，苏共采取反革命的“改革”政策是苏东剧变的最直接原因。

希共认为，虽然“改革”政策最初是以“社会主义更新和调整”的口号出现的，但是它实质上采取的是反革命措施，其目的是在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层次上，推翻社会主义社会的关键领域和基础部门，废除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取消社会主义计划，拆除生产、流通和消费品与服务的分配制度，实现向私有制的转型。同时在社会主义劳动分工的框架下，通过选择废除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和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兄弟般的平等关系的措施向外输出反革命。

在外交领域，苏共提出了“新思维”的外交理念。这一理念是建立在反科学的错误立场上的。这种立场假借列宁的和平共处思想，将国际关系去意识形态化、去政治化、非阶级化，实际上否认了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和性质，执行了一条阶级安抚、意识形态安慰的政策，最终让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政策得逞。

希共认为，反革命“改革和新思维”政策之所以没有遭到人民的反抗，是因为以下三个前提条件同时发生作用：①“改革”是由党和政府机关推动的，依靠的是它们的权威和人们对它们的信任；②“改革”的

政策使用了人民所熟悉的口号，如“更加社会主义—更加民主”；③当时现实存在的很多问题被利用了，而且最为重要的是所有人的共同信念是需要在社会主义的框架内作出某些改变和改革，以弥补在基本经济领域和社会基本生活中出现的扭曲和延误现象。

正是在上述前提条件的综合作用下，“改革”政策能够打着“民主”、“公开性”和“透明度”的口号，颠倒是非黑白，大肆篡改和否定苏联人民的伟大历史、社会主义的贡献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肆无忌惮地实行恢复资本主义的政策。

因此，希共认为，如果我们看到苏共的威信和它的政策所施加的影响的话，在其他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党和国家领导层发生了类似的情况就不足为怪了。也就是说，苏联采取的反革命的“改革”政策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具有示范和催化效果。东欧发生资本主义复辟就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了。

三 外部因素对苏东剧变产生了重要的和意义深远的影响

希共认为，苏东剧变的外部原因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及其共产党采取的热战、冷战和和平演变等不同的战略和策略，社会民主主义的负面影响和作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消极影响。这些因素造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危机，加速了苏东剧变的进程，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起到决定性作用。

（1）希共认为，帝国主义针对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变化形势所作出的战略性的和策略性的政策调整是导致苏东剧变的主要外在因素。希共总结指出帝国主义的反社会主义报复政策经历了武装干涉—冷战—搭桥政策、反缓和策略—催化“改革”策略这样一个灵活多变的调整过程。

最早从十月革命胜利起，帝国主义就将推翻新的苏维埃政权作为它的战略任务。为将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中，帝国主义纠集了十几个国家的军事力量对年轻的苏维埃政府进行武装干涉，同时对布尔什

维克党实施各种阴谋、破坏和暗杀等颠覆行动，并煽动国内资产阶级和反动势力武装反抗新的苏维埃政府。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帝国主义更是采取绥靖纳粹德国，将战争矛头引向苏联的策略，以期望苏联被战争和灾难击溃。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及其威胁对苏维埃政府的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它迫使苏维埃政府为了应战和迅速提高实力在社会主义建立的初级阶段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之后的新经济政策也没有得到贯彻，在帝国主义的强大压力下，苏联采取了“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还击”的政策以及“农业经济全面合作化”和迅速高度集体化的政策，这一时期出现的问题和失误为工人阶级和它的联盟之间的摩擦和矛盾埋下了隐患。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帝国主义为防止社会主义扩散，转而采取了冷战政策和宣扬“共产主义威胁”、“共产主义骚乱”的手段和政策。企图通过对苏东社会主义的封锁、包围、孤立和中伤诽谤遏制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希共指出，帝国主义的冷战政策对社会主义建设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进一步“加剧了社会主义内部的问题和矛盾，致使社会主义建设作出的决定更加艰难” [3] 。

希共指出，当帝国主义冷战政策在20世纪70年代停滞不前时，它们就开始寻求新的方式暗中破坏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帝国主义对苏东社会主义国家一方面继续采取“搭桥”政策和所谓的“两种制度共处”（convergence）的策略，如1975年赫尔辛基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就是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妥协的结果；另一方面帝国主义作出“反缓和”的政策调整，其手段和工具可以列出一系列的破坏清单，如新一轮的陆海空军备竞赛，以“人权”为旗帜的多形式“挑衅”，利用意识形态武器展开积极的颠覆活动，公开给予各种反社会主义反共产主义团体和组织以经济、政治和道德支持，鼓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从苏联压迫下独立”的理论和“东欧的进步要依靠扩大同西方的关系和缓和同西方对抗”来实现的腔调，等等。希共认为，帝国主义在这一时期的灵活策略不仅迷惑了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和共产党员，最严重的后果就是培养起对帝国主义本质的幻想，低估了资本主义的调整能力，而且离间了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力量的关系，使得帝国主义针对社会主义的战略和策略没有

得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联合抵制，这为苏东剧变埋下了伏笔。

当苏东出现“改革”和“新思维”的浪潮时，帝国主义改变了它对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反缓和”策略，通过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催化作用，促使“改革”向着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方向发展。希共指出，为达到这个目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推出了旨在打击社会主义政权，扩大社会主义国家关系裂痕的“经济援助和改革”项目；政治上支持“改革”对社会主义制度作出的调整；意识形态方面加强干预能力，否定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和贡献，培育人民的冷漠和疏远感，在所谓的“对话”和“谈判”中，使社会主义制度变质变色。

希共由此强调指出，帝国主义作为一个外在因素对苏东剧变产生了重要作用。帝国主义的作用不仅是苏东剧变原因中“量”的因素，更有“质”影响。因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要正确评估战后资本主义的调整能力，而不能低估它。

（2）希共认为，社会民主主义要为苏东剧变承担责任。战后，社会民主主义都站在了反社会主义和反共产主义的“人权”运动的帝国主义势力一方。西欧社会民主党遵从了美国的压力，迫使共产党从战后政府中退出，这对整个欧洲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恶劣的影响。除了支持资本主义制度之外，社会民主主义还被证明是破坏工运团结和工人力量发展壮大的主要因素，如勃兰特领导的联邦德国社民党就在所谓的新东方政策中起到了积极作用，其目标明确，就是要合并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鼓励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反社会主义活动。另外，希共还指出，要判断社会民主党的性质，我们可以从社会民主党上台执政的政策、它们为支持资本主义制度和度过其危机的管理方面所提供服务等方面来判断。事实证明，在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的关键时刻，某些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其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因此希共认为，当前我们需要一个强大的充满自信的反社会民主主义理论的思想武装阵线。

（3）希共认为，无论直接地还是间接地，机会主义都为削弱共产党开辟了道路，机会主义也是帝国主义破坏和削弱社会主义的思想

基础。比如，当右派机会主义以所谓“欧洲共产主义”的标签出现在西欧共产主义运动中时，困难就变得越来越多。欧洲共产主义公开站在社会民主主义一边，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希共由此强调指出，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中的机会主义和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中的机会主义的相互作用问题要作更深层的历史调查。在苏东剧变过程中，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通过日益渗透到整个共产党的内部，诱使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一些领导人自觉地采取了恢复资本主义的政策。因此，希共强调，苏东剧变这一事实表明了整个工人运动历史上已经被证明了的事情：“随着机会主义的发展，尤其是在阶级斗争日益尖锐的情况下，它就会与反革命力量融合在一起，就会日益成熟为一种反革命力量。” [4]

---

[1] 王喜满，辽宁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

[2] “Thoughts about the Factors that Determined the Reversal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in Europe”，http：//inter.kke.gr，March 1995，也可参见王喜满《希腊共产党的社会主义观》，《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

[3] 王喜满：《希腊共产党关于十月革命的评价》，《国外理论动态》2008年第5期。

[4] “Thoughts about the Factors that Determined the Reversal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in Europe”，http：//inter.kke.gr，March 1995.

思想路线错误是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根源

王音 房广顺[1]

一 苏共政治立场的错位导致偏离马克思主义

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时代特点和俄国实际相结合创立的列宁主义，是列宁为苏共和苏联留下的一笔最为宝贵的财富。在列宁主义指导下，布尔什维克党和人民群众坚定不移地沿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路前进，取得了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并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然而，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苏联开始蔓延，一些苏联领导人不是站在科学社会主义的立场上，而是站在民主社会主义的立场上看待苏联的历史和现实问题，逐渐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用民主社会主义的观点思考苏联国内和对外事务的始作俑者是赫鲁晓夫。1956年苏共二十大和后来的二十二大提出了以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以及全民党、全民国家为主要内容的路线和纲领。按照苏共二十大的解释，“和平共处”是指列宁关于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不可避免的观点“在那个时期是正确的”，而在社会主义阵营已经具备了防止侵略的物质基础的当时已经过时，“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在当时的形势下，“只有两条路：要么和平共处，要么发动历史上最具毁灭性的战争。第三条路是不存在的”。“和平竞赛”是指：“向资本主义国家领导人建议：‘让我们用实践来证明哪一种制度更好吧，让我们进行不打仗的竞赛吧……我们建议的是未提及所有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而进行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是指十月革命的方式在当时是唯一的出路，而国际形势发生“根本性变化”后已经不具有普遍性，“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将越来越多样化”。在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完全可以通过“取得议会中稳定的多数，并且将议会从资产阶级民主的工具转变成真正代表人民意志的工具”，不需要武装起义就可以夺取政权，和平过渡是“实现社会根本改造的条件”。“两全”即“全民党”和“全民国家”。也就是说，苏联已经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变成“全民国家”，苏共已由工人阶级的政党变

成“全民党”。尽管苏共二十大对克服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后果，推动苏共和苏联社会的改革进程具有历史性作用，但是，“三和两全”[2] 的思想体系和立场观点与民主社会主义是一脉相承的，否定了科学社会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地位及其职能的基本原理，接受了民主社会主义的改良主义思想。由此导致干部群众误以为苏联社会已经不再存在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不再存在阶级斗争，因而失去了对资本主义复辟的警惕性，埋下了苏共最终亡党、苏联最终解体的祸根。

戈尔巴乔夫是受民主社会主义影响成长起来的一代。他1961年步入苏联政坛，当选苏共二十二大代表。这次会议是继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之后的又一次批判高潮，大会决定将斯大林的遗体迁出列宁墓。苏共二十二大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再度泛滥对戈尔巴乔夫思想成熟以及他后来的思想转变，具有不可割裂的联系。在戈尔巴乔夫走上政治前台、掌控苏联命运的时候，最终转向了民主社会主义的立场。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第二年就正式提出了“民主化”、“公开性”和“舆论多元化”的口号，并以此作为其打开改革阻碍机制的突破口。戈尔巴乔夫公开宣称，苏共和苏联得以立党立国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列宁主义，只不过是各种社会思潮之一。1990年1月，戈尔巴乔夫在立陶宛发表讲话宣称，实行多党制并不是悲剧，不应当像魔鬼怕烧香那样害怕多党制。同年7月，苏共二十八大通过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纲领。至此，多党制和议会制以及意识形态多元化已正式成为苏共的指导思想。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3] 而错误的理论必然导致错误的行动和错误的运动。苏共取得的所有成就归根到底是正确理论指导的结果，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恶果归根结底则是理论错误的结果。一个政党的政治立场、基本理论只有转化为党的行动纲领和各项具体工作方针才具有实际意义。苏共最终的垮台，根源就在于苏共领导人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模糊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界限，放弃了工人阶级政党的先进性。因此可以说，苏共亡党、苏联解体中失败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自赫鲁晓夫开始逐渐脱离、背离乃至戈尔巴乔夫最终背叛马克思主义的唯西方国

家马首是瞻的另一种教条主义；失败的不是社会主义或“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而是自赫鲁晓夫开始逐渐脱离、背离乃至戈尔巴乔夫最终背叛社会主义的另一种资本主义或者社会民主主义；失败的不是真正和原来意义上的工人阶级先锋队——苏联共产党，而是自赫鲁晓夫开始逐渐脱离、背离乃至戈尔巴乔夫最终背叛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并从本质上已经蜕化变质的政党。正如江泽民指出：“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最深刻的教训是：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放弃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结果使得已经相当严重的经济、政治、社会、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最终酿成了制度剧变、国家解体的历史悲剧。”[4]

二 苏共思想方法错位导致社会矛盾愈演愈烈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主要的就是辩证法，即最完备最深刻最无片面性的关于发展的学说”[5]，“不懂得辩证法就经过相对主义而陷入了唯心主义”[6]。但是，列宁逝世后，苏共党内形而上学的现象开始抬头并发展到相当严重的地步。不讲辩证法而搞形而上学的始作俑者是斯大林，他在一些问题上犯了“非此即彼”的错误。毛泽东曾指出：“斯大林为什么犯错误呢？就是在一部分问题上他的主观跟客观不相符合。”[7]“基洛夫事件”是斯大林形而上学思维的体现。1937年基洛夫被刺，斯大林借此感到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因此大规模肃反，大大降低了苏联共产党的公信度。再比如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等问题的论述中，没有深刻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复杂性，产生了不好的影响。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秉承了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并以这种思维对待斯大林的错误。1956年苏共二十大期间，赫鲁晓夫《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不是全面地科学地评价斯大林这样一个具有重要国际影响的历史人物，而是抓住一点，不及其余，把斯大林描绘成一个罪人。这种态度和做法给苏联乃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极大的思想混乱。戈尔巴乔夫则以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全部否定了十月革命以来苏共和苏联的历史。在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分析上，戈尔巴乔夫也表现出突出的形而上学风格。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一改以往国内形势大

好的宣传口径，把困难看成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的问题，其结果导致否定历史、否定社会主义。对于国际形势则作出相反的判断，打破以往苏联强调“大家庭”内部的团结一致、强调与西方国家不可调和的敌对的对立这种宣传口径，转而强调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相互不同的利益存在、强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不可分割的共同利益，以所谓“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代替社会主义和苏联人民的根本利益，从而导致思想混乱，莫衷一是，整个社会陷入深刻的矛盾之中。

由于上述原因导致苏联社会矛盾和混乱主要表现在，一是全盘否定斯大林使得苏联社会发展和人们的信仰陷入茫然，民主和自由的矛盾上升。斯大林逝世后，苏联人民期待苏共领导国家治愈历史上留下的创伤，但这一希望历经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代几次落空。正如苏联学者费·布尔拉茨基所言，赫鲁晓夫“谴责了斯大林，但是没有触及专横的政权机构；他批驳个人迷信，但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生育它的体制。至于抱怨斯大林的个人品质和残暴性格，那是小孩子的政治思考水平” [8] 。经过反复的失望之后，苏联人民对苏共的信心渐渐开始动摇。在国际交流日益密切的情况下，人们自然会将本国的情况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较而发现自己的差距。而苏共的教条主义的宣传却无法解答人们心目中的疑问和现实生活提出的种种问题。因此，加深了人们对苏共和社会主义的信任和信仰危机，一些人变得消极悲观、玩世不恭，一些人甚至变成体制内或体制外的反对派，总之比较茫然。二是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的观点升级了民族矛盾，也在国际关系中陷入被动。苏联是个多民族国家，苏共的民族政策所造成的民族利益的冲突、民族矛盾的发展与民族意识的上升，尤其是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发展，使苏联联邦制在改革中面临严峻的挑战，一些加盟共和国要求独立就成为苏联解体的开端。而苏联长期以来同美国的军备竞赛使自己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在艰难的国内改革的同时不得不花大量精力去处理和应付各种国际问题。而正是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的观点使戈尔巴乔夫接受了西方国家的经济援助，同时也把苏联的政治体制拱手相让。

其实，任何一个国家和政党的理论和实践都具有继承性，既不能故步自封、毫无进取，也不能否定一切、另起炉灶。苏共在思想路线

上全盘否定历史，丢掉了自己最为宝贵的传统和经验，放弃了最为重要的原则和立场，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对此，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就深刻剖析了苏共的问题。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对苏联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做法进行过精辟的分析。他指出，苏联“有多少资本呢？无非是一个列宁，一个斯大林。你把斯大林丢了，把列宁丢得差不多了，列宁的脚没有了，或者还有一个头，或者两只手砍掉了一只”[9]。如果说赫鲁晓夫丢掉了斯大林，部分丢掉了列宁，戈尔巴乔夫则完全丢掉了斯大林，完全丢掉了列宁，苏共和苏联的过去成为黑暗的历史，苏共和苏联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毁掉了苏共，瓦解了苏联，这是一个需要切实记取的沉痛教训。

三 苏共发展战略错位导致社会发展逐步停滞甚至倒退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的首要任务是“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10]。列宁认为：“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它的最主要最根本的需要就是增加产品数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11]社会主义的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也是共产党人的根本目标。苏联建国以来经济整体实力显著增强，1913年工业总产值只相当于美国的6.9%，而到1985年已相当于美国的80%[12]。但是，苏联长期以来从与帝国主义竞争的需要出发，并没有很好地把工作重点放到经济建设上。从斯大林时期开始，为了实现工业化，采取了挤农业保工业、挤生活保生产的办法，虽然工业化进程很快，现代化水平很高，但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程度并不明显。最严重的是搞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农民被挖得很苦，农业生产水平很低，1953年苏联的农业生产水平还没有达到1913年的水平。这种优先发展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的不合理的国民经济结构没能及时调整，农业、轻工业严重落后，第三产业基本没有发展。20世纪60～80年代，苏联同美国搞军备竞赛，争夺霸权，美苏两国每年的军费要花3000亿美元左右，苏联经济被拖垮了。80年代中期，苏联经济尽管困难重重，但仍能保持4%～5%的增长速度。而真正出现经济状况恶化，生产、金融、财政、市场供应危机交织，并由此引发政治动乱，使苏联经济滑向全面危机，还是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改革路线导致的。1990年出现了战后以来第一次经济

负增长，内外债陡然增加，内债为5500亿卢布，几乎相当于全年的国民收入；外债为700亿美元。消费品严重匮乏，市场供应全面短缺。据统计，在1200种基本消费品中，95%以上的商品供应经常短缺，211种食品中有188种不能自由买卖 [13] 。

纵观苏联经济发展的起落，必须承认其在发展战略的选择上有成功之处，即在建国初期集中全国的力量迅速崛起，综合经济实力居于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超级大国。这一点连西方学者都不得不研究和借鉴。然而，初期高速发展的背后也隐藏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积累起来就成为了无法跨越的陷阱。一是苏联长期以来实行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却以私有制为基础，彻底瓦解了社会主义；二是苏联没能正确处理社会积累与消费的关系、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等，难以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使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丧失了信心；三是苏联没能跟上世界新科技革命的浪潮，忽视了科技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综合国力和科技竞争力受到极大影响，加之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带来的沉重负担，苏联经济形势每况愈下，人民生活水平明显下降。长期这样搞的结果不仅使经济搞不上去，更失掉了民心，苏共威信下降，社会主义也失去了吸引力，继而引发了政治危机、民族危机和信仰危机等。

四 苏共改革时机错位导致驶离社会主义轨道

恩格斯指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 [14] 列宁进一步提出了"共产主义等于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 [15] 的著名论断，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们对社会主义及其改革的正确认识。斯大林认为苏联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完全适应，不需要改革。从20世纪50年代赫鲁晓夫改革开始，苏联就力图突破斯大林模式，但理论上和实践上只是修修补补，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半途而废，丧失了改革的大好时机。勃列日涅夫求稳怕变，实际上没有搞改革。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提出了完善社会主义的主张，他从经济体制改革入手，改革步子逐渐加大。其实，戈尔巴乔夫经济体制改革没

有什么新思路。1985年起戈尔巴乔夫提出“加速发展战略”，这个战略也是在旧的计划经济体制框架内的发展战略，要加快发展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关键是体制上的问题没有解决，只是强调发挥商品市场货币的作用就遇到了阻力，改革举步维艰，逐渐陷入困境。这时，戈尔巴乔夫认为问题出在政治体制和干部体制上，于是1987年1月，在经济体制改革搞得一塌糊涂的时候，他启动了政治体制改革。但其改革重点不是进一步发扬党内民主，发展苏维埃民主，而是提出更新社会主义的口号，建立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实则引进了西方的议会制。至此，刚刚起步的经济体制改革丧失了最佳的改革时机。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要根本改变当时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领域推行“新思维”和所谓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搞“民主化”、“公开性”和“不留历史空白点”，揭露社会黑暗面，严重破坏了党的形象和社会主义的形象，偏离了社会主义的轨道。1988年以后，戈尔巴乔夫在西方国家的压力下，效仿西方政体，实行总统制，把权力中心从党的政治局转移到最高苏维埃特别是总统委员会。改革彻底驶离了社会主义的轨道，从完善社会主义转变为“根本改造整个社会主义大厦” [16] 。1990年二月全会提出修改苏联宪法第六条，正式实行多党制，随后共产党全面解散，使苏联各民族失去了联合的政治基础和统一的领导力量。全会还探讨了取消民主集中制的问题，戈尔巴乔夫虽然没有明确表态，但他发言的倾向性很明显：“党的革新需要进行深刻的、全面的民主化，重新认识民主集中制原则，并将重点放在民主化和党员群众的权利上面。” [17]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从经济体制改革入手是对的，但其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的时机明显有些急躁。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固然与政治体制相关，然而政治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选择非常重要，政治体制改革的时机选择更为关键。戈尔巴乔夫的政治体制改革时机超前，目标模式的选择改向，这就必然导致一系列的偏离。一是改革指导思想的偏离，以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代替了马克思主义；二是政体的偏离，以议会制代替了联邦制；三是政党制度的偏离，以多党制代替了一党制。这就不可避免地致使苏联社会政局混乱、政治危机加深，最终引起政治、经济、民族三个危机并发症，导致党、国家和社会制度

三个灭亡。在这一点上，戈尔巴乔夫摒弃了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历史性成就这一改革的基础，错误地选择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时机及改革的目标和方向。他不懂得改革过程中必须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还根本否定了苏联共产党在改革中的领导核心地位。戈尔巴乔夫的错误归根到底是苏共长期以来的教条主义、集权政治埋下的祸根，以致后人难以有效地进行根本改革。社会主义的改革是必要的、合乎规律的，性质是对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要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不能把改革变成“改制”、“改向”，改革不离开社会主义的轨道，社会主义就不会垮台。

---

[1] 王音，辽宁大学副教授；房广顺，辽宁大学教授。

[2] 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第461～467页。

[3]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311页。

[4] 《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第230页。

[5] 《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88，第42页。

[6] 《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88，第374～375页。

[7]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90页。

[8] 转引自宫达非主编《苏联剧变新探》，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第32页。

[9] 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第61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93页。

[11]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623页。

[12] 李慎明主编，吴恩远、王立强副主编《历史的风——中国学者论苏联解体和对苏联历史的评价》，人民出版社，2007，第104页。

[13] 李慎明主编，吴恩远、王立强副主编《历史的风——中国学者论苏联解体和对苏联历史的评价》，人民出版社，2007，第105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88页。

[15] 《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6，第223页。

[16] 李慎明主编《居安思危——苏共亡党二十年的思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第105页。

[17] 李慎明主编《居安思危——苏共亡党二十年的思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第107页。

苏共党内特权阶层的腐败和蜕变是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

王建均 [1]

一 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内因是苏共党内的特权阶层的腐败和蜕变

苏共建党93年，执政74年，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赢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取得过经济建设、科技发展和文化进步等辉煌成就，但是在没有硝烟的和平发展时期土崩瓦解，关键在于苏共党内的特权阶层。这个特权阶层“是10万人左右的占据着党政机关重要领导岗位的‘精英集团’” [2] ，它形成于勃列日涅夫时期，在戈尔巴乔夫时期达到极致 [3] ，其难以遏制的腐败和最终的蜕化变质，葬送了苏共，肢解了苏联。

1.苏共特权阶层腐败盛行，背离党的性质和宗旨，丧失党的执政基础

苏共特权阶层垄断着国家的一切执政资源，包括政治经济资源、舆论宣传工具；掌握着党政军以及企业和社会团体等干部的任命权。他们不但拥有宅第权、特供权、特教权、特继权、特卫权、特支权等众多特权 [4] ，而且还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贪污腐败。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贪污腐败大案时有发生。例如在乌兹别克共和国的贪污大案，“从共和国的党中央书记、部长会议主席、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内务部长及3名副部长，到基层党的一些书记、政府官员、企业领导人等都参与了此案，贪污的总金额竟达20多亿卢布”。1980年的“黑鱼子酱走私案”，还有震惊全国的“驸马案” [5] 。到了戈尔巴乔夫时代，这个特权阶层，趁着戈尔巴乔夫的所谓改革，大肆侵吞国有资产，化公为私，据为己有。尤其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这个阶层的私有财产急剧膨胀。为了使自己拥有的财产合法化，他们实际上成了公有制的最有力的摧毁者和私有化的最实际的推动者。

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政党，苏共没有自身的利益，追求的应当是无

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利益。正因为如此，苏联人民曾经全身心地信任和支持苏共。但是，随着苏共内部特权阶层的形成，其特权特别是腐败，完全背离了党的性质和宗旨，严重败坏了苏共的声誉，消解了人民群众对苏共的信任和支持，并从根本上动摇了苏共执政的合法性。1990年6月，在一次“苏共究竟代表谁的利益”民意调查中，认为苏共代表工人的占4%，认为苏共代表全体人民的占7%，认为苏共代表党员的也只占11%，认为苏共代表官僚、干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高达85%。这说明，苏共此时已完全丧失了其执政必需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这就不难理解，苏联共产党在拥有20万多名党员的时候，领导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专制统治；在拥有35万多名党员的时候，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并执掌了全国政权；在拥有554万多名党员的时候，领导人民打败了不可一世的德国法西斯，为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立下了不朽功勋。而在拥有近2000万名党员的时候，苏共却丧失了执政地位，亡党亡国。

2.苏共特权阶层蜕化变质，自我政变使改革变成改向，成为苏共和苏联的掘墓人

在戈尔巴乔夫时期，特权阶层完全丧失信仰，变本加厉地攫取财富，为了使自己拥有的财产合法化，开始了自上而下的自我政变，否定苏共和社会主义，推动社会主义的改革变为资本主义的改向，特权阶层完全蜕化变质，转向官僚资产阶级，成为苏共和苏联的掘墓人。正如美国马萨诸塞州大学安姆赫斯特分校经济学教授大卫·科兹所分析的：“70年代苏共领导集团还是由理想主义的革命者组成的，到80年代就完全不同了，占据苏联党政机关要职的‘精英’们开始放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代之以典型的物质主义、实用主义。尽管这些‘精英’们还在不断重复官方的论点，但相信者是极少数。他们开始考虑实行什么改革方案对自己最有利。许多人认为民主社会主义会减少自身的权力，改革前的社会主义虽然赋予他们某些特权，但又限制了他们把权力传给子女和聚敛更多的财富。显然，实行资本主义最符合‘精英集团’的利益，这样，他们不仅是生产资料的管理者，而且可以成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既可以实现个人财富更快地增长，又能合法地让子女

继承权力和财富。”[6] 因此，苏联解体、苏共的垮台，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苏联特权阶层的“自我政变”，是为了使他们长期以来通过非法手段占有的社会财富和各种权益合法化，是他们主动选择的结果。1991年6月，美国一个社会问题调查机构在莫斯科作了一次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调查，调查对象是掌握着高层权力的党政要员，目的是判断他们的思想观点。结果是：大约9.6%的人具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他们明确支持改革前的社会主义模式；12.3%的人具有民主社会主义观点，拥护改革，并希望社会主义国家实现民主化；76.7%的人认为应当实行资本主义。苏联剧变后的进程也确实表明了这一点。苏联时期的那些特权阶层在苏联解体以后摇身一变，变成了新体制下的新官僚或者富翁，其中在最高领导层的为75%，政党首领为57.2%，议会领导为60.2%，在政府部门的为74.3%，地方领导为82.3%，商界精英为61%[7] 。

苏共首脑戈尔巴乔夫，是20世纪50～60年代形成的特权统治阶层的政治代表[8] 。在特权阶层蜕化变质、推动改革转向改向的过程中，戈尔巴乔夫以改革“新思维”与“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推行了一条错误的“改革”路线和方针，同特权阶层一道一步一步地埋葬了苏共和苏联：1990年1月，一批苏共党员建立“民主纲领派”。2月，修改宪法、取消苏共法定领导地位。3月，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作出决议，取消宪法中苏共领导地位的规定，在苏联实行多党制和总统制。由此共产党的地位不保，也开始动摇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8·19”事件后，俄联邦更下令禁止俄共活动；戈尔巴乔宣布苏共中央“自行解散”；随后，11个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签署议定书，创建独联体，宣布苏联解体。至此，苏共亡党、苏联解体。

二 苏共党内的特权阶层及其腐败和蜕变是高度集权体制的产物

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是党内特权阶层的腐败和蜕变，而苏共党内之所以产生一个特权阶层，并因其腐败和蜕变成为苏共和苏联的掘墓人，究其原因，在于苏共的高度集权体制。体制更具有根本性。正如邓小平指出：“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

要。”“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9] 当然，这里要强调的是，尽管体制更具根本性，但是这种高度集权的体制不是不能通过社会主义的改革加以完善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谁来改革，改革的目的和原则是什么，防止改革变成改向，就成为关键性的问题。而要防止改革变为改向，从体制上深入分析苏共的特权阶层及其腐败和蜕变，是必须和必然的。

马克思主义政党是民主的党，保证党的民主性关键在于民主制度建设，这是防止党内特权产生及其腐败和蜕变的根本保障。马克思、恩格斯于1847年参与创建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时，即明确提出建党的民主制原则和民主制度。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指导制定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中规定：各级委员会由选举产生，并可随时撤换；盟员个人必须服从同盟的决议；代表大会是全盟的最高权力机关；中央委员会是全盟的执行机关，要向代表大会报告工作等。这就明确了党的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党的立法机关，中央委员会是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党的权力中心在党代表大会，不在中央委员会。后来，在第一国际的临时章程里，马克思制定了一系列民主制度，如民主选举制度、民主表决制度、定期报告制度和代表大会年会制度等。当欧洲各国政党建立起来之后，恩格斯在总结帮助各国建党的经验时，着重阐明了发扬党内民主、健全党内生活的重要意义。他指出，在始终不渝地遵守共同原则的前提下，“在党内绝对自由地交换意见是必要的”。“应当坚持每年召开一次党代表大会。”“让党员哪怕一年有一次发表自己意见的机会，一般说来也是重要的。”[10]

列宁在建党过程中坚持马克思经典作家的民主原则，进一步提出了“民主集中制”的概念。他强调，党内的一切事务由一律平等的全体党员直接或者通过代表来处理。1906年4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根据列宁的提议，第一次把民主集中制原则载入党的章程，规定党的一切组织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在列宁时期，建立和完善了一系列民主制度：党的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实行年会制；中央委员会是党的代表大会的常设机构，政治局只是党

中央常设机构之一；设立中央监察委员会，专门监督中央委员会；国、党、政、军最高职务分别由四个人担任，等等。尽管由于新生无产阶级政权面临残酷的国内外斗争环境，但上述制度还是有效地保障了新生政权的巩固和发展。

列宁逝世之后，由于激烈的权力斗争和当时苏联所处的国际环境，苏联的政治体制没有像列宁所叮嘱的那样向民主化方向转变，而是建立健全了一套高度集中的体制，党政军权力集中于斯大林一个人。其特征是个人集权、个人崇拜盛行、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干部任命制、片面强调铁的纪律和党的统一，党的监察委员会从属制（监督党中央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变为归属中央领导的用以监督下级是否执行中央决定的机构，使得监督成为纸上谈兵，徒有其表，甚至成为清除异己和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等，严重破坏了党的民主制度。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终身制已在事实上确立，党内外民主和群众监督机制遭到严重破坏和削弱。结果导致党内特权形成及其腐败和蜕变，为苏共亡党、苏联亡国埋下隐患。客观地说，斯大林之后，苏联各届领导人都不同程度地对这种政治体制模式作了一些变革和调整，剔除了其中极端的成分。但因为没有触动根本体制，戈尔巴乔夫上台时的苏联政治体制，与20世纪30年代形成的体制模式大体还是一脉相承，它们之间没有根本的差别和界限。

总之，高度集权的体制，由于权力高度集中，缺少有效监督机制，成为特权阶层产生的体制基础。而这个特权阶层的腐败和蜕变，使得苏共的改革变为改向，直接导致苏共亡党、苏联解体。

三 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启示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我们必须牢记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教训，在深化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既要坚持党的领导，又要不断改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才能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第一，科学执政是关键。从根本上说，坚持科学执政就是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认识方法，结合当代中国的实际，不断探索和

努力遵循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使党的执政理念和执政行为建立在更加自觉地遵循和运用客观规律的基础之上。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科学和多门当代新兴科学，不断提高科学水平，增长科学知识，具有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科学态度、科学精神，能够按照客观规律和实际情况来进行科学决策，科学用人，建立各种科学制度。绝不能不作调查研究，或者只凭个人局部经验，感情用事，主观武断，违背事理与实际，滥用权力。同时，按照科学执政的要求，我们还要大胆地借鉴和吸收人类社会一切优秀的政治文明建设的成果，特别是要大胆借鉴和积极吸收资本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优秀成果，如不具有制度性质的权力制衡机制、权力监督机制、舆论监督机制等。不断开阔眼界，丰富思想，提高认识水平，加强决策的民主化、制度化和科学化，注重决策过程和程序的合法性，通过决策的制度化保障决策的科学性，努力使我们的执政方式和执政行为更加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和要求。

第二，民主执政是基础。从根本上说，民主执政就是要始终坚持和践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人为本，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倾听人民呼声，关心人民疾苦，诚心接受人民监督，决策和用人都要按照人民意愿，由人民做主，而不能为民做主。先要做到权为民所授，进而要求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牢记和遵循巴黎公社工人执政开创的最基本的原则：政府委员由公民民主竞选产生，并且随时可以罢免；其工资待遇不得超过熟练工人水平，不得享有特权。如此才能防止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保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当前应当加快党内民主建设。党内民主要从制度上入手，一是要改革和完善党员代表大会制度和党的常委制。党员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构，党的常委会是党的常设机构和党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常设机构，负责党的日常事务。作为党的最高权力机构的党的代表大会，应当一年举行一次，及时就党的重大事务和方针政策进行党内民主讨论和决策。在党代表大会上，代表可以就中央委员会工作和中央领导人提出批评、质询和问责；对党的理论、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展开争论，等等。党的常务委员会应体现党的集体和民主决策原则。总之，在试点经验的基础

上尽快实现党代表大会年会制和常任制。二是加强和落实党员民主权利，真正体现党员的主人翁地位。三是改革和完善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党内民主选举制。党代表和各级党委领导干部都要采用自下提名、差额选举和随时罢免制度。四是实行党政分开，解决以党代政问题。依法规范党和政府、立法和司法的关系，使其依法独立运作。党主要通过优秀的党员竞争到其中发挥党的领导作用，实现党的执政。五是中央领导人的任期制。任期应当制度化，如总书记的任期不得超过两届，满70岁的领导干部退职等。

第三，法治是保障。从本质上说，依法执政就是要按照依法治国的理念规范党的执政行为，进而通过党的依法执政的实践，推动和促进整个国家、社会法制建设的进程。一是要确立和坚持依法治国的理念，这是依法执政的前提。在执政行为和过程中，要确立宪法和法律至高无上的地位与权威，强调任何组织和个人，包括执政党和党的领导人，都不能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要坚持依法办事，强调宪法和法律应该成为执政党执政的主要依据，党自身活动及其对国家的领导、对社会实施的控制，都必须建立在遵守和遵循宪法和法律的基础上。二是要通过领导立法、带头守法、保证执法等基本途径，实践依法治国的理念，推动依法执政的实施，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在这一进程中，最根本的就是要把党的活动包括党的自身活动及其对国家的领导方式和行为纳入法制的轨道，使之逐步实现制度化、规范化和法制化，这是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建设的现实需求，也是我们党提高自身执政能力和水平、努力实践科学发展观的需要。

---

[1] 王建均，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教授。

[2] 〔美〕大卫·科茨：《一位美国学者对苏联解体的分析》，《真理的追求》2000年第7期。

[3] 奚广庆：《也谈苏联解体的一个原因——兼评美国学者科兹的几个论点》，《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1年第4期。

[4] 季正矩：《腐败与苏共垮台》，《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0年第4期。

[5] 赵明义：《社会主义的命运》，人民出版社，1997，第120页。

[6] 〔美〕大卫·科兹：《苏联解体的原因》，《当代思潮》2000年第5期。

[7] 张树华：《过渡时期的俄罗斯社会》，新华出版社，2001，第88页。

[8] 奚广庆：《也谈苏联解体的一个原因——兼评美国学者科兹的几个论点》，《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1年第4期。

[9]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333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474页。

第三篇 西方大国的和平演变战略与苏联解体

从美国战胜苏联的“其他方式”看外因对苏联解体的影响

马维先 [1]

一 消灭苏联是美国的既定方针

无论美国领导人公开的讲话还是秘密指示都表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整个冷战时期，消灭苏联是美国的既定方针。美国制订了消灭或颠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计划，并确定了执行这一计划的方式。

其一是以和平演变方式搞垮苏联。它集中体现在1945年初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杜勒斯在一次秘密会议上发表的讲话：“战争将结束，不管怎么说，一切都会得到解决，一切都会安排好。而我们将把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所有的黄金，全部物质援助或资金用于对人们的愚弄和哄骗。人们的头脑和意识是可以改变的。在播种了混乱的地方，我们可以悄悄地用杜撰的价值观将那里人们的价值观取而代之，并迫使他们相信杜撰的价值观。怎么做？我们可以在俄罗斯寻找与我们观点一致的人，寻找可以帮助我们的人和盟友。一步一步地，这个地球上最难驯服的人民死亡的规模巨大的悲剧，它的自我意识的彻底和不可逆转的衰败，将会发生……所以，我们将一代接一代地动摇他们……我们将从儿童、少年着手，将永远把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瓦解他们，促使他们蜕化，让他们精神上堕落。我们要把他们变成我们的利益代理人，变成自由世界的世界主义者。这就是我们要做的。” [2]

其二是利用垄断核武器的绝对优势，对苏联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美国第一份关于核战争方案的文件是在1945年末编制的。当年12月14日，美国军事计划联合委员会颁布了432D号指令，提出了对

苏联20个大型工业—行政中心城市设施核打击的任务。1948年中，美国参谋长委员会制订了代号为“御者”（“Charioteer”）的与苏联进行核战争的计划。根据这一计划，在战争开始后的前30天，拟向70个苏联城市投掷133颗原子弹。但专家们认为，这还不足以保证战争的彻底胜利，因而决定进一步发展核力量。之后，美国将军们曾使用不同的计划名称，三次修改和完善核战构想，但其目的始终如一：消灭潜在的主要对手苏联。

但20世纪50年代之后，美国更多地强调和平演变战略。1961年肯尼迪在就职演说中明确表示：“我们不可能通过一般的战争战胜苏联。苏联是不可逾越的堡垒。我们只能用其他方式战胜苏联：意识形态的、心理的、通过宣传，通过经济。”[3]

里根执政时期，1981年春至1986年，实施了一项对社会、政府和国会严格保密，只有4个美国决策人物（总统里根，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凯西，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里查德·艾伦，国防部部长卡斯珀·温伯格）知道的推翻苏联国家制度的计划。其间，哈佛大学历史学家理查德·派普斯为里根起草了有关苏联的“NSDD-75”计划[4]。根据该计划，美国“目前的首要目标已经不是与苏联共处，而是改变苏联制度”[5]。

二 美国战胜苏联采取的“其他方式”

为采取“其他方式”而不是“一般的战争”战胜苏联，“改变苏联制度”，美国和西方国家的主要做法可以概括为以下几方面。

1.通过军备竞赛、军事威胁及其他方式，包括操纵石油价格，搞垮苏联经济

西方搞垮苏联经济的明确目标，从西方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中已得到完全证实。众所周知，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计划经济的弊病已经比较明显，在戈尔巴乔夫执政后，勃列日涅夫统治的18年，被称为“停滞时期”。但即使是“停滞时期”，苏联经济的发展速度仍无法使西方高枕无忧。英国前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承认：“由于实行计划经济和有

特色的精神和物质鼓励的结合，苏联达到了很高的经济指标。苏联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百分比，超过我们这些国家一倍还多。如果考虑其丰富的自然资源，那么，在合理管理经济的条件下，苏联完全有能力将我们挤出世界市场。因此，我们一直在采取行动，削弱苏联的经济，在苏联内部制造困难。主要手段是搞军备竞赛。我们知道，苏联政府坚持苏联应与它的对手北约保持军备均等的思想。军备竞赛使苏联用于这方面的资金约占预算的15%，与此同时，我们（西方国家）约占5%。毫无疑问，这对苏联经济产生了负面影响。苏联不得不减少生活日用品生产领域的投资。我们希望这能引发苏联民众的不满情绪。我们的手法之一是'泄露'有关军备数量的情报，而所'泄露'的数量，大大高于实际数量，以便让苏联在这一经济无利可图的领域注入更多的资金。”[6] 在勃列日涅夫去世当日，根据美国领导人的“NSDD-66”指示，对苏联开始进行经济大战。里根的苏联经济问题助理亨利·罗音（Генри Роуэн）提出，美国“应保持军备的高水平，让莫斯科追赶我们”。“应停止供应苏联维持生存的物资。这样，可以在10年内看到苏联制度是怎样瓦解的。”为断绝苏联外汇来源，美国说服沙特阿拉伯不遵守石油输出国组织限产的规定。1985年，上述努力产生了决定性的成果：沙特阿拉伯出口的石油突破了规定的限额，世界石油价格下降了50%[7]，这使主要依靠能源出口赚取外汇的苏联损失惨重。

2.进行意识形态和心理战，影响苏联社会和精英层

早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等西方国家已经开始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动信息和心理战。“美国之音”和“自由欧洲”电台从欧洲领土对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日夜进行广播，广播对这些国家的社会和精英层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从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和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可见一斑。苏联精英、摧毁苏联的主要人物之一的叶利钦曾承认，他主要听“自由欧洲”电台[8]。

戈尔巴乔夫执政后，开始了他自己都没有搞清的所谓“改革”和“公开性”。这一时期，美国通过各种手段搞垮苏联经济的目标已初见成效。而经济形势的恶化和居民生活水平的下降，加剧了社会的动荡。

美国利用千载难逢的机会，直接在苏联境内发动和领导了意识形态和心理战，包括：

——组织一些人在广场和公园聚众挑起关于苏维埃制度和国家如何可怕的辩论（苏联解体后，没有人再挑起这样的辩论）；——举行全国范围的群众游行，其基本目标是摧毁苏联社会的意识形态基础；

——通过各种可能的方式，影响苏联的大众传媒，苏联媒体充斥着各种否定苏联的负面信息：苏联什么都坏，西方什么都好；

——美国和西方国家利用目标确定的资金及财政资金，不仅在苏联境内发动各种群众政治运动和抗议活动，还设法将这些运动和活动纳入所需要的轨道。

3.在苏联权力高层寻找和培养贯彻执行西方战略意图“利益代理人”

在情报机构术语中，“利益代理人”是指一个国家的公民，利用他在国家、政党、议会、大众传媒以及科学、艺术和文化领域所掌握的职权，为另一个国家的利益工作。研究“利益代理人”的俄罗斯专家总结了为美国利益工作的利益代理人的一系列特点：

第一，能够影响社会意识、整个社会或政府和地区的某些集团。

第二，他们会加入一定的组织。利益代理人从来都是复杂的“政治”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而该机器是根据中央情报局20世纪60～70年代制订的计划操纵的。

第三，客观上有助于达到“主人”（即中央情报局）提出的目标。在某个阶段，这些目标甚至与苏联的利益一致，而实际上，它们只是达到“主人”目标道路上的过渡性目标。

第四，必须进行培训，培训以集体或单独的方式进行。培训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从普通的讲座到在毫无拘束情况下的秘密座谈。这方面有特别的规定。

第五，利益代理人是“摇羽毛扇”式的人物。代理人层次越高，隐藏得就越深。他们搞地下政治，是“灰衣主教”。他们不进行决策，而是提交和提议“主人”需要的和对（苏联）国家有害的这样或那样的决策。

第六，忠于某些“全人类的价值观”和世界文明成就，而其实质，轻则是缺乏俄罗斯民族意识，重则是仇俄和对俄罗斯历史价值观敌视[9]。

据俄罗斯民族主义者、政论家和社会活动家O.A.普拉托诺夫《俄罗斯荆棘之冠：共济会历史（1731～1995）》一书所披露的事实，美国通过克瑞伯协会和类似机构，对几百名俄罗斯精英进行了利益代理人培训，他们成为毁灭苏联和未来叶利钦政权的骨干。戈尔巴乔夫从苏联克格勃提供的情报中准确地知道，存在着一些特别的培训利益代理人的机构，也知道这些机构培养的“毕业生”名单，但戈尔巴乔夫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制止叛变者的活动[10]。尽管如此，很多为西方和美国利益活动的利益代理人不断被曝光。常被点名道姓的高层领导人有，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任外长的谢瓦尔德纳泽，主管意识形态和宣传的雅科夫列夫，瓦季姆·安德烈耶维奇·梅德韦杰夫，内务部领导人巴卡京，以及克格勃将军O.Д.卡卢金等。有的人则为了迎合西方的需要，干脆公开进行活动。比如，在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克格勃将军O.Д.卡卢金加入“民主派”行列，发表了大量曝光克格勃活动和为苏联社会制度抹黑的讲话。

现已公开的大量材料表明，美国和西方国家领导人还不遗余力地做了后来的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工作。在这方面首推英国前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她是西方国务活动家中第一个发现戈尔巴乔夫是一个“可以打交道的人”。自第一次会见（1984年，当时戈尔巴乔夫是苏共党内的第二把手）开始，撒切尔便着手做戈尔巴乔夫的“工作”，为此几乎动员了整个英国情报机构以及英国情报机构招募的苏联克格勃特工戈尔季耶夫斯基。她从戈尔巴乔夫身上看到了其他人没有发现的东西：关注个人的声望，迷恋抽象的“全人类价值观”，自信，难以遏止的孤芳自赏嗜好，易受阿谀奉承的影响[11]。撒切尔作为聪明的政

治家，对戈尔巴乔夫的这些弱点，当然要加以利用。据报道，撒切尔在与戈尔巴乔夫会谈时，可以平心静气地解决所有她想解决的问题。而戈尔巴乔夫则总是败在撒切尔手中[12]。

如果说撒切尔是发现戈尔巴乔夫“可以打交道”的第一人，那么最早注意戈尔巴乔夫的是美国人。根据《谁任命了戈尔巴乔夫》一书的作者奥斯特罗夫斯基提供的材料和提出的分析意见[13]，至少在1968年，M.C.戈尔巴乔夫的姓名已出现在中央情报局卡片资料中，当时他任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党委第二书记；资料卡片开始输入其党务活动、公开讲话和“个人和社会生活”资料的时间，也不会晚于这一时间。该书还根据当事人的回忆录，公开了时任美国副总统布什在1984年与日内瓦会议苏联代表，裁军大使B.Л.伊兹拉埃良秘密会谈的详情。当时，苏共党的高层围绕K.У.契尔年科接班人的斗争十分激烈，而在结果并不明朗的情况下，布什却斩钉截铁地对苏联官员宣称：“你们下一个领袖将是戈尔巴乔夫。”为对苏联最高领导层的变动施加影响，或在角逐总书记的苏共高层激烈斗争中助戈尔巴乔夫一臂之力，布什先是通过其代表，然后他又亲自出面，提出与戈尔巴乔夫举行秘密会见的要求，其条件必须是：与戈尔巴乔夫的非正式的接触，要对苏联所有国家领导人保密，包括国家首脑契尔年科。与此同时，美国人还通过当年4月访问苏联的芬兰总统毛诺·科伊维斯托表达了与戈尔巴乔夫个人建立非正式联系的愿望。根据前美国驻苏联大使马特洛克的回忆录，戈尔巴乔夫没有拒绝美国的建议，即他表示愿意与美国领导人举行秘密谈判。

著名苏联持不同政见者A.季诺维也夫在侨居国外时（1979年）曾就“苏联体制的什么地方最容易被攻破”问题对他的听众发表了一针见血的观点：“那些被认为是固若金汤的地方，即苏联共产党机关，它的中央委员会，它的政治局，最后是它的总书记。”“只要把自己的人安排在这一位置（总书记）”，“只需几个月他就可以搞垮党的机关……然后，整个政权和管理体系开始出现解体连锁反应”，“其结果”是“整个社会的解体”[14]。

无论玛格丽特·撒切尔不惜动用英国整个情报机构对戈尔巴乔夫进

行细致入微的“工作”，还是布什死乞白赖地要求与戈尔巴乔夫建立秘密联系，目的只有一个：“把自己的人”安排在总书记的位置。纵观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的所作所为，特别是在所谓改革中苏共所遭受的灭顶之灾和对外政策方面一系列匪夷所思的让步和投降，可以得出结论，西方的努力没有付之东流。

三 美国对冷战投资数额巨大，但“成本”接近收回

为了在冷战中“不用一般的战争”而“用其他方式”战胜苏联，美国投入了巨额资金。苏联解体后，关于美国为击败苏联的“投资”数额，已有一些具体的数字公之于世。美国前国务卿詹姆斯·贝克1992年曾谈道：“为取得对苏联冷战的胜利，美国在近40年中花费了若干万亿美元。”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的数字比较具体：为搞垮苏联，美国耗费的资金为13万亿美元。戈尔巴乔夫时期美国搞垮苏联的耗费也有具体的数据：1985～1992年，西方，主要是美国为“苏联民主化进程”提供资金900亿美元。资金是通过下述中介机构提供的：俄罗斯改革公众委员会，美国“国家对民主化捐赠”协会（National Endowmentv for Democracy，1983年美国国会组建的机构，其任务是“对东欧国家和苏联所有为自由和自治而斗争的人给予帮助”），克瑞伯协会等。1990年国会的基金组织主动资助苏联最高苏维埃地区间议员团[15]。

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对上述巨额支出所产生的“效益”相当满意。1995年10月24日，他在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次秘密会议上就苏联解体问题发表了下述意见：“最近10年对苏联及其盟友的政策完全证明了我们所执行的除掉世界最大的国家之一以及最强的军事集团方针的正确性。利用苏联外交的失误，戈尔巴乔夫及其亲信超强的自信，包括利用那些公开持亲美立场的人，我们得到了杜鲁门总统拟通过原子弹对付苏联所得到的东西。当然，两者有很大的区别：我们得到的是原料附庸，而不是原子弹炸毁的国□家——□这样的国家是很难重建的。是的，我们为此花费了成千上万亿美元，但这些资金成本已接近收回，即如俄罗斯人常讲的，实现了‘自负盈□亏’……□在苏联的所谓改革年代，我们的许多军人和商人不相信即将打响的战役的成

功。过虑了。在动摇了苏联的意识形态基础后，我们得以用不流血的方式让美国的主要对手国家从争夺世界统治权的战争中退出。”[16] 克林顿感到骄傲和自豪：“打响的战役”取得了成功；“得到了杜鲁门总统拟通过原子弹对付苏联所得到的东西”。但为了公正起见，在美国人为自己方针的“正确性”高唱赞歌之时，我们想指出，苏联解体的主要推动力量是内因，是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腐败的特权阶层，是他们主动放弃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社会主义的旗帜，摧毁了苏联赖以生存的基础。因此，俄罗斯很多研究人员，不赞成将毁灭苏联的“功劳”和“贡献”完全记在西方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账上。他们认为，苏联解体的原因很深，需要从内部危机中，从经济问题中，从相当一大部分高层党和国家机关腐化中去寻找[17]。

---

[1] 马维先，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

[2] А.Доронин，Агенты влияния，http：//www.sec4all.net/agent-vlian.html.

[3] Темная сторона Америки，http：//www.usinfo.ru/sssrindex.htm.

[4] NSDD-National Security Decision Directive.

[5] Г.Павловский，Как они уничтожали СССР，Война и мир Выпуск：No.11 [ST2（35[BH6），ноябрь-декабрь 2005г.

[6] С.Миронин，Как ученые помогли разрущить СССР，http：//toyota-club.net/files/07-01-10_lib_pol.uchen.htm.

[7] Г.Павловский，Как они уничтожали СССР，Война и мир Выпуск：No.11[ST2（35[BH6），ноябрь-декабрь 2005г.

[8] Тёмная сторона Америки，http：//www.usinfo.ru/sssrindex.htm.

[9] СОВЕТСКАЯ РОССИЯ，21.11.1992.

[10] О.А.Платонов，Терновый венец России.История масонства 1731-1995 годы，Москва，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Родник”，1995 год，глава 24.

[11] Р.Красников，Мифы о разведке и контрразведке，http：//

www.nasledie.ru/oboz/N06_00/06_21.htm.

[12] Секреты из первых рук，http：//www.specnaz.ru/article/？791.

[13] А.Островский，Кто поставил Горбачева у власти？http：//digestweb.ru/24673-kto-postavil-gorbacheva-u-vlasti.html.

[14] А.Островский，Кто поставил Горбачева у власти？http：//digestweb.ru/24673-kto-postavil-gorbacheva-u-vlasti.html.

[15] Тёмная сторона Америки，http：//www.usinfo.ru/sssrindex.htm.

[16] А.Казинцев，Три дня в августе，Наш современник，№.8，2001.

[17] Р.Красников，Мифы о разведке и контрразведке，http：//www.nasledie.ru/oboz/N06_00/06_21.htm.

苏联解体进程中意识形态的作用及其教训

曹长盛 [1]

苏联意识形态领域多元化是怎样导致苏联解体的呢？

先看哲学领域。20世纪50年代中期，苏联出现了哲学人道化的倾向。这种倾向主要是在赫鲁晓夫提出的抽象人道主义的政治纲领（从“全民党”、“全民国家”到“一切为了人，一切为了人的幸福”等）的鼓舞下出现的。它的出现同时又适应了为纲领进一步提供理论依据的需要，因此发展甚为迅速。到80年代所谓“改革”时期，抽象人道主义逐渐成为得到官方支持的哲学主流。当时，苏联哲学界无论是在研究人本身时，还是在考察社会历史进程和当代全球问题（诸如生态平衡问题、资源利用问题、核武器威胁问题）时，都从抽象人道主义出发。这种思潮还通过文学、艺术、科技、管理、生活方式等渠道，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推动着苏联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演变。戈尔巴乔夫接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就以抽象的人道主义作为他推行“全面改革”的思想理论基础。他在198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七大上，用抽象人道主义的观点作为阐述国际国内问题的准则。在1987年11月发表了由他署名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明确地把“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全人类利益高于阶级利益”作为“新思维”的核心。在1988年6月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正式举起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旗帜，具体地论述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特征。1990年7月苏共二十八大在他主持下制定通过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纲领声明和新党章，把“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确定为“理想”和“奋斗目标”。这样，使得“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既是苏联改革的行动纲领，又是苏共行为的准则，成为党和国家完整系统的思想政治路线。结果，导致了改变党的性质和指导思想，动摇和取消党的领导地位，并使党产生混乱和分裂；改变了党在国家政权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为政治反对派势力的得势及夺取政权创造了条件；加重了国家的经济困难和社会矛盾，党和政府威信下降，失

去了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因此，很快地使得全国政治、经济、民族、社会各方面的危机加深，最后导致苏共先被取缔后解散，联盟政府被先夺权后取消，最终苏联解体。苏联解体宣告了以抽象人道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彻底破产，也表明了抽象的人道主义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唯心史观。

经济学领域的变化，也是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的。当时，苏联的社会经济建设中出现了生产下降、供应紧张、工农业发展严重失衡的问题，经济管理体制的弊端日益暴露，经济学界对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为主要内容的所谓“斯大林模式”展开了争论，争论中逐渐地接受了被西方国家宣扬为“规范的经济理论”的新自由主义观点。到80年代，苏联的许多经济学家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他们以“反思”为名，混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公有制与私有制的界限，鼓吹从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向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市场经济转变。他们“论证”了实行私有制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强调私有化可以克服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异化和劳动的异化，实现人的个性解放；私有化可以实现社会公正；私有化可以实现社会稳定。他们认为，经济状况不佳的根本原因是国有制的垄断性。因此，刻不容缓的任务是通过财产非国有化，取消垄断，全面改革所有制关系，实现所有制私有化。这些舆论，造成了思想混乱，动摇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

在上述舆论的影响下，戈尔巴乔夫等苏共领导完全接受了新自由主义并以新自由主义为指针，推行“经济改革”。1990年7月，苏共二十八大确定将“向市场经济过渡”作为经济改革的方针和目标。会后，先后制定了向以私有化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过渡的方案和计划（由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崇拜者和鼓吹者、经济学家沙塔林组织制订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具体计划，即所谓“沙塔林方案”，又称“500天纲领”，以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亚夫林斯基同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阿里森一起起草的“哈佛计划”）。1991年7月1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关于非国有化和私有化的法律。显然，苏联的经济改革已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而是在新自由主义指引下使几代人为之奋斗了70多年的社会主义事业付诸东流。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直接地在经济领域促进了苏联

的解体。

政治学领域，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日益滋长。在50年代中期掀起的“非斯大林化”过程中，民主社会主义的“纯粹民主论”、“民主与专政对立论”等纷纷登场，借以全盘否定斯大林、恶毒地谩骂诬蔑斯大林。到80年代中期以后，戈尔巴乔夫公然用民主社会主义作为改革的指导思想，按照民主社会主义的主张进行改革。1988年6月，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把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作为苏联改革的目标，实现了“改旗易帜”的方向性的转轨。当时美国驻苏大使马特洛克看到这次会议的文件时兴奋不已，说“新内容比比皆是”。“有些‘议题’似乎是从美国宪法中翻译过来的。除了‘社会主义’这个词之外，文件与《共产党宣言》，甚至与《资本论》几乎没有一点联系。”“从某种程度而言，‘议题’所谈论的更接近于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2] 后来，戈尔巴乔夫自己也承认：“当时我的理想是走社会民主主义国家的道路。”[3] 众所周知，社会民主党执政的国家在经济上实行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在政治上实行三权分立的议会民主制，只是在社会政策上较多地顾及民众利益，总体上仍是资本主义国家。

由于民主社会主义的变种“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推行，苏共的指导思想和政治路线的改变，使党在思想上、组织上一片混乱；多党制的推行，使得政治反对派势力迅速扩大，逐渐与中央分庭抗争；经济改革无任何成效，国家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下降；社会矛盾加深和民族冲突不断，民族分裂主义情绪上涨，直至苏联解体。这是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苏联泛滥和实践的必然结果。

史学领域，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不断地得到扩大。这股思潮发端于“非斯大林化”过程中，史学界有人以所谓“重新评价历史”为名，把抽象的人道主义思想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历史观作为依据和出发点，肆意歪曲和否定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历史。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所谓“公开性”、“恢复历史真相”、“填补历史空白点”等口号的鼓动下，史学界掀起了强劲的历史虚无主义浪潮，不仅进一步全盘否定斯大林，而且进一步否定列宁和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否定国

内战争、新经济政策、工业化建设、农业集体化运动、30年代的肃反、卫国战争等，几乎把苏联的整个历史全部抹黑。正如一些正直的苏联史学家们指出："恢复历史真相"成了"随心所欲地演示苏联七十年的背面。彻底地、一年一年地加以毁坏，到处只挑选黑暗的、阴森森的、悲惨的东西，到处只看到停滞、暴力、劳改营"。"这是多么努力地在填补历史的'空白点'，以致都没有觉察到，如何在一个美妙的瞬间，不仅历史没有了'空白点'，连历史本身也不存在了。"[4] 这并非偶然，它是由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领导人自上而下发动的一场否定苏共和苏联的历史运动而掀起的。其目的是为他们推行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改革"路线制造舆论，为"根本改造整个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5] 找到根据。由于否定了苏联共产党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产生、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合理性和必要性，造成了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合法性危机"，也就为苏联解体做好了舆论准备。

文学领域，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政治路线和文艺政策逐步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社会主义文学的主体地位不断遭到削弱，自由主义批判主义倾向迅速滋长，出现了所谓的"解冻文学"、"劳改营文学"现象。到80年代，在"民主化"、"公开性"口号的鼓励下，文学领域出现了一股新的自由主义批判主义浪潮。首先出现了"政论文热"，许多作家，尤其是自由派作家，纷纷发表政论文，相当多的文章歪曲和篡改历史，暴露现实生活的阴暗面，恶毒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接着，各个时期受过批判、遭到禁止和流传到国外的作品重新集中地发表出来，形成了一股声势浩大的"回归文学潮"。与此同时，新创作了一批暴露性作品，丑化革命领袖，否定苏联在革命和建设中取得的成就，甚至诋毁伟大的卫国战争。这三个方面的作品汇成的新批判浪潮几乎淹没了整个文学界，他们的各种奇谈怪论，捏造的各种谎言，精心炮制的半真半假的东西，通过各种文学报刊，通过像广播电视这样覆盖面极广的传播媒介，对要求了解历史真相和现实中存在的真正问题、希望进行真正的改革的广大群众实施所谓信息的狂轰滥炸，对群众的意识起了很大的毒害作用，搞乱了人们的思想，把人们引入了歧途。情况表明，文学领域自由主义批判主义浪潮在制造反共反社会主义舆论、推动苏联解体方面起了打头阵的作用。

上述意识形态多元化表现，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而且是同西方的意识形态渗透密不可分的。西方的意识形态渗透促进了苏联意识形态多元化的形成，共同地在苏联解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由此，为我们提供了十分深刻的教训和启示。

一是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决定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有巨大的反作用。任何一个国家的统治阶级，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都要竭力维护和发展其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的思想体系。社会主义国家为了自身的巩固和发展，必须建立和发展以马克思主义为旗帜和灵魂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苏联解体的教训表明，思想、路线正确与否，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正确的思想和路线可以兴国，错误的思想和路线可以亡国。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必须有力地抵制各种错误思想的影响。意识形态领域从来不会有空白，正确的、积极的、健康的思想不去占领，反动的、消极的、腐朽的东西就会乘虚而入，就会动摇甚至取消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二是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意识形态领域的矛盾和斗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上有多少种所有制、有多少个阶级、有多少个不同利益阶层，就有多少种反映这些所有制和阶级、阶层利益的意识形态。所以，在意识形态领域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占主导地位的同时，各种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同时存在。在社会主义国家以马克思主义为灵魂和旗帜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其他非马克思主义、非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也会存在。敌对势力对社会主义意识的渗透也是难以避免的。因此，在意识形态领域不可避免地存在矛盾和斗争。

苏联解体的教训表明，在意识形态领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矛盾和

斗争的情况下，必须清醒认识，正确对待，积极主动地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妥善处理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一元指导，又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对多样化的社会思潮要冷静观察、辩证分析。要正确区分学术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和政治问题。对学术理论问题，要坚持民主讨论，平等交流；对思想认识问题，要坚持摆事实、讲道理、正面教育，做到以理服人；对政治原则问题，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绝不能掉以轻心、听之任之，对敌对势力的意识形态渗透，要保持高度警惕，加强防范，坚决斗争。这样，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才能在实践中巩固和发展起来。

三是必须掌握好各种舆论工具，充分发挥舆论工具正确的导向作用。任何一个政党、任何一个阶级，都要营造舆论、占领意识形态阵地。要制造舆论，就必须要有工具，没有工具，舆论就无从制造起来。所以，都要努力掌握书报杂志、广播电视和互联网等大众传媒工具及其管理机构，以便营造自己所需要的舆论。

苏联解体的教训表明，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把各种舆论工具牢牢地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使它们永远保持社会主义方向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充分利用各种大众传媒工具营造正确的舆论导向，促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巩固、发展，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舆论支持。

四是必须对西方的意识形态渗透保持高度的警惕并采取有效的对策。长时期内，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与苏联实行军备竞赛、争夺世界霸权和实行经济技术封锁等的同时，还通过全方位、多角度地对苏联进行政治的和思想文化的渗透，竭力拉拢、培植、支持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有计划、有预谋地实行和平演变的战略。苏联解体是和平演变战略得逞的体现。

苏联解体的教训表明，必须高度警惕西方国家意识形态渗透的图谋，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经济与文化交流扩大，西方的意识形态渗透将会进一步加强，形式将更为多样、方法将更为巧

妙，变得更加无孔不入。面对这种情况，必须时刻牢记两种制度的差异和西方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及“西化”、“分化”的图谋，及时揭露和打击西方敌对势力公开的和隐蔽的各种思想渗透活动。与此同时，必须加强对各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教育，帮助他们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树立社会主义理想和坚定社会主义信念，提高抵制外来不良影响的能力和自觉性。要以强有力的思想意识形态工作凝聚党心、民心、军心，朝着既定的理想、目标阔步前进。

苏联解体的教训，不仅可以给中国人民以深刻的启示，而且俄罗斯人民也将会从中得出自己的结论。正如邓小平同志在1990年深情地指出：“在俄罗斯那里有十月革命的光荣传统，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影响，人们还会在演变中比较、反思、鉴别，会得到正确的结论。” [6]

---

[1] 曹长盛，北京大学教授。

[2] 〔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第138页。

[3] 2000年8月19日《苏维埃俄罗斯报》。

[4] 〔俄〕博尔久科夫、〔俄〕科兹洛夫：《史学与时期》，莫斯科，1992，第3～4页。

[5] 〔苏〕戈尔巴乔夫：《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苏〕1989年11月26日《真理报》。

[6] 转引自黄华《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第371页。

“文化冷战”和苏联解体

于沛 [1]

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战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新中心；与此同时，尽管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受到严重的破坏，但通过实施第四个五年计划（1946～1950年）后，很快发展成为世界强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和战后，东欧和亚洲一些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形成，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和美国的“盟友关系”结束。

美国在战后的战略目标，是谋求“主宰世界”、“领导世界”，建立体现出美国根本利益的新的世界秩序。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中，苏联与美国、英国缔结成反法西斯联盟时，西方大国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仇视，也丝毫没有改变。他们依然认为：“纳粹制度具备同共产主义一样的最坏特征。” [2] 战后，苏美及其以苏美为首的东西方两大阵营，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以及文化等领域，出现了全面的对峙和对抗，但又避免在战后不久又直接交战，因为真枪实弹的“热战”不但难以击溃社会主义国家，而且西方国家对战争的代价自己也难以承受，于是便开始了所谓的“冷战”。这正如艾森豪威尔所言：“冷战的目的不是占领他国领土或以武力征服他国。我们的目标更为微妙，更为广泛，更为彻底。我们是试图以和平的手段使全世界都相信真理……为普及这个真理，我们将要使用的方法通常称为‘心理战’……所谓的‘心理战’就是争取人的思想，争取人的意志的一场斗争。” [3]

1946年3月5日，丘吉尔在美国总统杜鲁门的陪同下，在美国密苏里州富尔顿的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题为《和平砥柱》的讲话，即揭开冷战序幕的“铁幕演说”。丘吉尔从“全面遏制苏联”的战略理论出发，污蔑社会主义国家是所谓“铁幕后的国家”，“共产党第五纵队已经

建立……到处构成对基督教文明的日益严重的挑衅和危险”，公开反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在美国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咨文，扬言“美国必须支持那些自由国家人民抵抗武装的少数人或外来的奴役阴谋”，这是美国的“伟大责任”。杜鲁门认为这是“美国对共产主义暴君扩张浪潮的回答”。1947年4月，美国记者斯沃普首先使用了冷战这个术语，同年，美国著名专栏作家李普曼撰写了一系列有关冷战的文章，此后，“冷战”一词迅速流传，为人们广泛采用。

在冷战中，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战略，是西方垄断资产阶级“遏制共产主义”的重要手段，是一种“超越遏制战略”，“和平演变”，是通过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学术、教育和宗教等渠道，与社会主义国家的接触，在体现西方价值观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理论的蛊惑下，在价值观、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等方面，向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渗透和侵蚀，影响和改造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特别是第二代、第三代青年人；通过经济的私有化、政治和思想文化观念的西方化，颠覆社会主义国家，使这些国家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而这种资本主义，并非与西方大国平起平坐，只能是原始的、买办式的资本主义，广大劳动者不仅要受本国资产阶级新贵的奴役，而且要受外国资本的剥削。

1953年1月15日，杜勒斯在国会提出用“和平演变”的方式，实行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解放政策”，至今没有放弃。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苏联东欧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西方垄断资产阶级认为，对苏联东欧实行的和平演变政策，已经发生了作用，已经到了制定一项新政策的时候了，目标要更大胆，使苏联、东欧“同过去决定性地决裂”，“深入持久地进行政治、经济变革”。1990年3月27日，布什向美国会提出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提出：“创造条件使苏联加入和欢迎苏联加入一个和平、自由和繁荣的国际社会……以促进苏联各种思想和民主价值观念的自由交流”，同时使所有东欧国家成为“自由国家的世界联邦的一部分” [4] 。布什特别强调，进行这一努力的主要工具是“美国之音”电台、自由广播电台和自由欧洲广播电台。“它们的影响是无法估价的”。“美国之音”对苏联广播，每周在

500小时以上，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为了“抵制共产主义的影响”，发动了长达近半个世纪之久的冷战，其中也包括“文化冷战”（cultural cold war）。美国中央情报局1947年成立之初，即开始为进行这场特殊的战争组织队伍。美国间谍情报机构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一直以可观的财力支持着西方高层文化领域，名义上是维护言论自由。“如果我们把冷战界定为思想战，那么这场战争就具有一个庞大的文化武器库，所藏的武器是刊物、图书、会议、研讨会、美术展览、音乐会、授奖等等。”[5] 事实表明，这些武器的功能，归根结底是为了削弱民族国家的主权，在全球的范围内推行美国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不断增强美国意识形态的力量。

1949年5月，“自由欧洲委员会”成立，表面上，它由“非官方的美国公民组成”，而实际上却同中央情报局有十分密切的联系。中央情报局的一些官员，被安插到该委员会的重要岗位上。该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利用逃亡的东欧人多种多样的专长来开展各种项目，以此积极地与苏联的统治地位作斗争”。为了取得与苏联斗争的胜利，“自由欧洲委员会”强调不仅要利用强有力的物质力量，更要依靠思想上的力量，积极投入形形色色的文化冷战中去。1950年，“自由欧洲电台”在柏林设立，很快又建立了29个广播站，用16种语言进行广播，披着“文化”的外衣，进行反苏反共宣传。自由欧洲委员会还成立了“自由十字军”，作为它的募集资金的机构。这个机构同中央情报局的关系就更为密切，大量的募款由它自由支配。

美国一向重视在发展中国家的文化输出活动。肯尼迪把美国的外交政策形容为“一手抓箭，一手抓橄榄枝”。“和平队”以文化“使者”的形象活跃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与美国强权外交形成鲜明对比，但在服务于美国全球冷战战略上，并无本质上的区别，和平队始终是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视为美国“软实力”的一种象征。

为了对抗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美国政府在冷

战高潮中，即在1950～1967年曾投入巨资，在西欧执行了一次秘密的文化宣传计划。“好的宣传就是要做到不像宣传”，“文化自由代表大会”（Congress Cultural Freedom）从这一基本认识出发，在中央情报局特工迈克尔·乔斯尔森（Michael Josselson）的主持下执行。这个计划的主要任务，就是让欧洲，主要是西欧的知识分子不再热衷于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转而从思想上接受美国的观点。鼎盛时期，“文化自由代表大会”曾经在35个欧洲国家设立办事处，出版各类刊物20余种，拥有自己的可提供新闻纪录片和故事片的服务公司。属于该机构的雇员有数十人，他们经常举办各种艺术展览，召开多种内容的国际会议，或为音乐家、画家颁奖，等等，通过频繁的接触和联系施加影响和进行渗透，加强美国对西欧的吸引力，服务于美国的外交战略。当然，这一切都是在极端秘密的状态下进行的，是一场“无声的战争”、“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文化自由代表大会”存在的17年，得到中央情报局数千万美元的支持。它所做的一切，是当时中央情报局直接领导下的秘密文化战——文化冷战——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秘密文化战”的实质是政治战，就是要在文化渗透等方面主动采取攻势，对付社会主义国家，而且要始终将这种攻势保持下去。“文化自由代表大会”成为文化冷战中有“强大杀伤力”的重型武器。在它的控制下，《评论》（*Commentary*）、《新领袖》（*New Leader*）、《党派评论》（*Partisan Review*）等刊物，大肆鼓吹“用民主的制度摧毁极权专制制度”，成为反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载体。

美国进行文化冷战时，美国中央情报局介入其中，被越来越多的事实所证实。1966年，《纽约时报》曾连续发表文章，揭露美国文化界的一些名人如何利用自己在文化界的声誉，为中央情报局服务。他们按照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所规定的内容和要求活动。这种努力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心理战”。这里“心理战”的定义是这样的：“一个国家有计划地利用宣传或‘非战’的活动来沟通思想、交流情况，以求影响外国群体的观点、感情和行为，其目的是有助于国家达到其既定目标’，均可称为心理战。”进一步又为“最有效的宣传”下了这样一个定义：“宣传对象按照你所指定的方向走，而他却以为这个方向是

他自己选定的。”[6] 在文化冷战中，美国为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不择手段，但又具有很大的欺骗性或迷惑性。当你身陷其中时，明明是仰承鼻息，亦步亦趋被人牵着走，却又丝毫没有察觉，反而认定这是自己选择的路，心甘情愿地从思想上缴械，自觉地成了失去自我的西方的俘虏。

三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美国成立了一些以苏联和东欧国家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所，一些大学也陆续开设有关苏联和东欧历史与现实的课程，包括华沙条约组织的研究等。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一门新的学科——苏联学。“苏联学”丝毫不掩饰它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和强烈的反苏反共政治倾向。1945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在国际关系委员会发表的讲演中说：“人的脑子，人的意识，是会变的。只要把脑子弄乱，我们就能不知不觉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并迫使他们相信一种经过偷换的价值观念……我们要把布尔什维主义的根挖出来，把精神道德的基础庸俗化并加以清除。我们将以这种方法一代接一代地动摇和破坏列宁主义的狂热。我们要从青少年抓起，要把主要的赌注压在青年身上，要让他们变质、发霉、腐烂。我们要把他们变成无耻之徒、庸人和世界主义者，我们一定要做到。”[7] “苏联学”的主要任务和研究内容，和艾伦·杜勒斯所阐述的美国的对外战略完全一致，在学术研究的外衣下，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西化”、“分化”实行和平演变政策时，具有特殊的作用。它不仅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的斗争中，在苏美对抗中及时、系统地提供理论支持，而且配合美国情报部门的工作，进行超出学术研究范畴的反苏活动。无论是基础理论研究，还是对策性、前瞻性研究，都表现出这些特点。

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出于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敌视，将通过和平演变颠覆社会主义国家作为既定战略。他们强调，西方对社会主义国家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转变。就苏联而言，美国在各方面的努力，就是要使克里姆林宫上的红旗降落。1981年5月18日，里根在圣母玛利亚大学演讲时说，共产主义是“人

类历史上反自然的一章，而且它的最后几页直到今天还继续书写着。这种制度不可能永远存在，他将走到自己的尽头。未来的几年将是我们国家复兴的几年，也是自由事业和文明传播的几年。西方不是遏制共产主义，西方要战胜共产主义。我们不想对此进行批判来给自己找麻烦，我们正在把人类历史上可悲而又可怕的一章删掉，这一章现在已经写到了结尾”[8]。1985年戈尔巴乔夫发动改革，要建设“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1987年开始推行民主化、公开性和对外政策的新思维，要世界各国人民“摆脱意识形态的狭隘偏见”，提出“新思维的核心是承认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更确切地说，是承认人类的生存高于一切”[9]。随着戈尔巴乔夫向右转，在苏联明显地出现了倒向资本主义的变化。美国及时调整对苏和平演变策略，从遏制、“以压促变”，转变为“以接触促变化”，通过“广泛的接触”，加速将苏联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结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历史性的对抗”。

戈尔巴乔夫被西方认为是一个“可以与之打交道的人”。他用社会民主主义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放弃了在意识形态领域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使资产阶级思想任意泛滥。曾目睹苏联解体历史过程的美国驻苏大使马特洛克认为，在20世纪80年代末，戈尔巴乔夫“已经一步一步抽去了影响苏联历史70年的‘社会主义’的真正含义。到1991年中，他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隐藏的资本主义者”，“抛弃了马列主义最后的精髓”[10]。在戈尔巴乔夫那里，已经一点点社会主义的影子也找不到了。戈尔巴乔夫还提出“不让历史留空白点”，从揭露社会主义的“黑暗面”入手推动改革，不遗余力地丑化苏联各族人民的革命历史、丑化列宁和斯大林的历史，导致了人们思想的严重混乱。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俄罗斯国家杜马议员久加诺夫说，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掌权期间，利用媒体传播西方民主价值观，破坏了人民对爱国主义和祖国历史的感情，由此产生的后果，比法西斯主义还严重[11]。1996年，美国出版了《胜利：美国政府对前苏联的秘密战略》，作者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前雇员彼得·施瓦茨。作者披露了美国政府用和平手段，以瓦解苏联为目的的秘密战略的一些内幕。“秘密战略”的核心内容是“攻心为上”，通过“软战争”，使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各级政府官员，以及高级知识分子和广大民众，对社会主义制

度，对苏联的前途失去信心，动摇他们的信仰，直至让他们完全丧失信仰。1991年12月25日，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解体，苏联共产党同时失去执政地位，这使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遭到严重挫折。

毛泽东曾指出，帝国主义企图消灭社会主义有两手：战争方法为第一手，“和平旗子，文化往来，人员往来，准备用腐蚀、演变方法消灭社会主义，这是第二手”[12]。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过程，和今天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大国对我国继续实行的“西化”、“分化”政策这一事实警示我们：我们必须警钟长鸣，保持高度的警觉。

---

[1] 于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2] 〔苏〕特鲁哈诺夫斯基：《丘吉尔的一生》，张德广译，北京出版社，1982，第333页。

[3] 〔英〕弗朗西斯·斯托纳·桑德斯：《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曹大鹏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第165页。

[4] 辛灿：《西方政界要人谈和平演变（修订本）》，新华出版社，1989，第123、124页。

[5] 〔英〕弗朗西斯·斯托纳·桑德斯：《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曹大鹏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第2页。

[6]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指令，1950年7月10日，*Final Report of the Select Committee to Study Government Operations with Respect to Intelligence Activities*，Washington：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6；转引自弗朗西斯·斯托纳·桑德斯《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曹大鹏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第5页。

[7] 〔俄〕尼·伊·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徐昌翰等译，新华出版社，2008，第2～3页。

[8] 〔俄〕罗伊·麦德维杰夫：《苏联的最后一年（增订再版）》，王晓玉、姚强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第155页。

[9] 〔苏〕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第180、184页。

[10] 〔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第655页。

[11] 参见李兴耕等编《前车之鉴：俄罗斯关于苏联剧变问题的各种观点综述》，人民出版社，2003，第128～129页。

[1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第599页。

苏共亡党的教训：要深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

梅荣政 [1]

苏共亡党20年了，这个大悲剧留给我们的教训是极为深刻的。苏共亡党、苏联演变的原因是什么？不同立场的人们有不同的看法。但在一切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们中间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那就是：苏共亡党、苏联演变的原因不是单一的。但是决定性的原因，是从赫鲁晓夫开始，苏共领导集团丢掉列宁、斯大林两把刀子，日益加深地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接受民主社会主义，改变苏共的性质，最终在国内外、党内外反共主义打压下失去执政地位，亡党亡国。斯大林逝世以后，苏共领导集团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表现，就是他们抛弃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在解除自己精神武装的同时，把主动权拱手送给了反共势力，导致了最后灭亡的结局。

这一点，资产阶级政治家看得明白。在苏联演变过程中，美国最后一任驻苏大使马特洛克曾说，阶级斗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心概念”，“如果苏联领导人真的愿意抛弃阶级斗争观念，那么他们是否继续称他们的指导思想为‘马克思主义’也就无关紧要了，这已是一个在别样的社会里实行的别样的‘马克思主义’。这个别样的社会则是我们大家都能认可的社会”。后来的事情正如这个美国外交官所预见的样，苏联领导人抛弃阶级斗争观念的结果，苏联演变成了西方都能认可的“别样的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演变成了连美国都可以容忍的“别样的马克思主义”，即民主社会主义。

说到这里，首先受到质疑的问题就是苏联社会中是否存在阶级斗争。关于这个问题，俄罗斯的克洛茨沃格研究员的回答比较具体。克洛茨沃格说，社会主义苏联演变成今天的俄罗斯，经历了几个阶段：从意识形态领域开始，然后进入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

第一阶段，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开始在报刊上攻击社会主义，说社

会主义这也不好，那也不好。他们到过西方国家，说西方国家什么都好。这些高级知识分子不是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哲学家或社会学家，而是作家、艺术家、新闻记者。报纸、杂志的编辑很乐意发表这些人的文章，而不愿意发表批评这些观点的文章。这样，他们就在意识形态方面打开了突破口。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意识形态方面的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对社会主义、对人民是有罪责的。

第二阶段，另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出来表演了。他们是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等。他们发表各种言论。这些言论可以粗略地归结为两点：一是经济市场化，二是政治民主化。他们心目中的市场化，就是要建立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制度，即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他们心中的民主化，就是要建立西方国家的所谓民主制度，即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但是，当时他们谁也不亮这个底牌。直到今天他们才说，他们当时提出的市场化和民主化，就是要全面实现资本主义化。

第三阶段，轮到政治家登台表演了。这些政治家差不多都是共产党的高级官员，他们用共产党和政府的权力，推行一系列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这些改革措施内容会有很多，也可以粗略地归结为两点：一是私有化基础上的市场化，二是政治制度民主化。改革的结果是：在经济上，摧毁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推行了私有制，造成了两极分化，培育和扶植了一个新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摧毁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推翻了苏维埃政权，推翻了共产党，建立起了一个代表新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的，同人民的利益和要求相对立的政权。

克洛茨沃格说，从苏联到今天的俄罗斯的演变历史，我们自己很难写了，希望中国学者和各国进步学者研究这段历史，找出社会主义改革怎么会导致全面资本主义化的正确答案，使我们的沉痛历史教训成为世界进步力量的有益的历史教科书。他衷心地希望中国的改革，真正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并取得成功[2]。

克洛茨沃格研究员的介绍，清楚地说明：①苏联社会中，从经济领域到政治领域，再到思想文化领域，的确有一股反社会主义势力。

②这股反社会主义势力的矛头和目标很集中，直指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要推翻苏维埃政权，推翻共产党，建立资产阶级政权，全面实现资本主义化。③这股反社会主义势力存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更存在共产党和政府的机构中，它们利用手中掌握的各种权力，进行全面的反社会主义的活动。④这股反社会主义势力的手里举着“改革”的旗帜，借口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推行一系列私有化和西方政治民主化的措施，一步一步实现自己的目的。在克洛茨沃格研究员的这段介绍中，只说到一批攻击社会主义的高级知识分子，到过西方国家，说西方国家什么都好，还没有说到西方国家是如何对苏联进行渗透，千方百计地颠覆它的。事实上，从十月革命以来，西方国家就一直不遗余力地对社会主义国家发动各种攻势，其中很重要的就是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就与西方国家长期进行的意识形态渗透有密切关系。在这种意识形态渗透的过程中，西方反共势力一直把注意力集中在苏联的高级知识分子和党政领导人员身上。这方面的大量材料表明，西方国家的收买起了很大的作用。

这些事实表明，苏联社会存在阶级斗争是一个客观事实，不是人们随意捏造的。同时也回答了人们的一个疑问：为什么面对严重阶级斗争的事实，苏共领导集团要抛弃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摒弃无产阶级专政呢？原因就在于苏共中央的领导权落到了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这一伙人手里。这一伙人在苏联国内私人利益集团的腐蚀下，已经被西方反共势力所收买。据苏联最后一位元帅、国防部部长（1987～1991年）德米特里·季莫费耶维奇·亚佐夫的披露，雅科夫列夫和卡鲁京是在美国学习时被招募的。“他们是第五纵队的思想家。当在克格勃内部对雅科夫列夫进行调查时……戈尔巴乔夫是这样说的：‘不许动雅科夫列夫！’为什么？因为戈尔巴乔夫本人当时也已经被‘做过工作了’。我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讲，其与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进行的那次著名的单独会晤具有决定性意义。伦敦会晤后，他就去找时任我国驻加拿大大使的雅科夫列夫。该行程后，戈尔巴乔夫随即发生了巨大变化。”可见，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这一伙人被收买后，已经成了国内私人利益集团和西方反共势力的代理人。这时他们

事实上不是放弃阶级斗争，而是支持反社会主义势力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力量作斗争，采用各种手段削弱、压制、瓦解、镇压马克思主义力量，而广大的苏联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在较长时期受不到良好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不了解事情真相。正如德米特里·季莫费耶维奇·亚佐夫所说："我们既对戈尔巴乔夫看走了眼，也对雅科夫列夫看走了眼。"

苏共亡党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邓小平同志早就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是一个客观存在，不应该缩小，也不应该夸大。实践证明，无论缩小或者夸大，两者都要犯严重的错误。至于整个社会主义社会历史时期是否始终存在某种阶级斗争，这里包括许多理论上和实践上复杂和困难的问题，不是只靠引证前人的书本所能够解决的，大家可以继续研究。"他还强调："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马克思说过，阶级斗争学说不是他的发明，真正的发明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历史经验证明，刚刚掌握政权的新兴阶级，一般来说，总是弱于敌对阶级的力量，因此要用专政的手段来巩固政权。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他去世之前还讲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他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四个坚持集中表现在党的领导……没有人民民主专政，党的领导怎么实现啊？四个坚持是'成套设备'。"这些话十分深刻，值得我们认真思考。江泽民同志也指出过，西方敌对势力加紧以各种手段和方式对我国施行"西化"、"分化"的政治战略，企图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他们的这种政治图谋是绝不会改变的。这些年来，他们不断利用所谓人权、民主、自由、民族、宗教问题和达赖、台湾问题等向我们发难。他们还与流亡在外的所谓"民运分子"和我国境内的敌对分子相勾结，企图联手行动。我们与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在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上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复杂的。这是阶级斗争在我国一定范围内仍然并将长期存在的主要表现。

面对这种现实，我们应不应该重视阶级斗争的研究，应不应该坚

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分析的观点与方法呢？江泽民同志的答复是肯定的。他指出："我们纠正过去一度发生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但这不等于阶级斗争已不存在了，只要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我们就不能丢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分析的观点与方法。这种观点与方法始终是我们观察社会主义与各种敌对势力斗争的复杂政治现象的一把钥匙。"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有关这方面的论述、论断也很多。这些论述、论断对我们结合实际，消化苏共亡党的教训有重要指导意义。在纪念苏共亡党20年之际，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按照邓小平的遗言，花力气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之所以要花力气去研究，是因为"社会主义社会目前和今后的阶级斗争，显然不同于过去历史上阶级社会的阶级斗争"（邓小平），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究竟有哪些特点、哪些表现、哪些根源、哪些规律，只有紧密结合现实，花大力气去研究才可以作出科学的结论。现在，好在有了苏共灭亡这个教训，给我们提供了现实的材料。我们国内各种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党和政府机构中的腐败分子、民族分裂分子、严重破坏分子、严重犯罪分子和犯罪集团的言行也有大量的现实材料可供研究。我们党、我们的干部很早就学会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这门科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通过我们的努力，定会把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这门科学推向前进，更好地指导我们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事业。同时"找出社会主义改革怎么会导致全面资本主义化的正确答案"，使之成为"世界进步力量的有益的历史教科书"。

---

[1] 梅荣政，武汉大学教授。

[2] 参见吴易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第591～592页。

苏联解体的历史启示

薛新国 [1]

一 从意识形态角度看苏联解体的原因

戈尔巴乔夫用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取代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苏联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苏联解体的直接原因。

1985年，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联共产党开始改革。1985年3月至1988年6月，戈尔巴乔夫提出加速发展战略和推进经济体制改革。1986年2月苏共二十七大强调加速发展应在以科技进步为核心的全面集约化的基础上进行。这一阶段将"完善社会主义"作为改革的中心任务，仍属于社会主义改革的范畴。1988年6月，苏共召开第十九次代表会议，戈尔巴乔夫在会上提出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纲领性口号，以"民主化、公开性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多元化"作为苏联改革的轮子，提出"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全人类坐在一条船上"，"历史不留空白点"，"要摧毁苏联历史的整个大厦"。这些改革对于1991年苏联解体具有致命的作用。1990年3月召开的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设立苏联总统职位和苏联宪法修改补充法》，从宪法中删去了共产党的领导作用的条文。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联总统。1990年7月2～13日，苏共二十八大通过了题为《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文件，宣布苏联实行议会制、总统制和多党制，声称苏共以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为自己的目标，"起着议会党的作用"；放弃党在政治领域的"垄断地位"，主张政治多元化；放弃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主张意识形态的多元化。1991年7月1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非国有化和私有化法。1991年"8·19"事件后，局势失控，出现了全面的政治经济危机和社会动乱。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宣布共产党为非法。可见，民主化和公开性，不能超过必要的限度，必须和一个国家的经济基础、公民的文化素质、历史文化传统、政治社会的成熟性相适应，否则，会给国家和社会带来灾难

性后果。

戈尔巴乔夫“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具有深刻的历史渊源。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教训是深刻的。他提出“全民党”、“全民国家”论；提出“一切为了人，一切为了人的幸福”的口号；在外交政策上，提出“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和平共处”的“三和”外交总路线。赫鲁晓夫的做法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关于评价斯大林的争论，中国共产党认为，斯大林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斯大林主义包括许多内容，其实践表现为斯大林模式。斯大林模式的主要特征为经济上高度集中，政治上高度集权，思想文化上高度划一。对斯大林模式的评价，应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所谓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就是要把斯大林模式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来评析，不能离开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来加以评论。所谓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就是既要看到斯大林模式的功绩，又要看到它的弊端。

二 从意识形态角度看苏联解体的教训

1.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反对意识形态的多元化

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曾指出：“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 [2] 民主社会主义是西方发达国家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工党共同信奉的思想体系。民主社会主义在西方政治思想文化中占支配地位。社会民主党强调，应从价值、手段，而不应从目的、理想的层面，认识和理解社会主义。经济上，主张私有制，反对公有制；政治上，主张三权分立和多党制，主张西方式民主，拒绝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共产党一党执政。社会党突出强调民主在社会主义价值维度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民主只有通过社会主义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只有通过民主才能完成，民主主要包括经济民主、政治民主、社会民主和国际民主。意识形态领域，主张指导思想多元化，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社会党认为欧洲古典哲学、启蒙运动原则，基督教、人道主义、国际工人运动的经验构成民

主社会主义的主要思想来源。改良主义、多元主义和伦理主义为民主社会主义的主要身份特征。而自由、公正、互助为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民主社会主义在西方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一定的社会群众基础，符合西方发达国家的实际。民主社会主义起源于1848年欧洲革命时期。如果从社会民主党人所追求的基本价值看，民主社会主义可追溯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期。“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是民主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表现形式。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国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应借鉴西欧社会民主党在治国理政方面的经验教训，但是应结合中国实际加以消化、吸收，防止脱离中国国情照抄照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有机结合，反对私有化；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反对照搬西方的三权分立和多党制；坚持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指导地位，反对指导思想多元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结合中国实际有所创新，是扎根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借鉴了戈尔巴乔夫用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取代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教训。

2.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十月革命的胜利，标志着社会主义由理论变为实践。然而，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毕竟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生产力不发达、经济基础薄弱成为当时俄国面临的首要问题。可见，对落后国家来说，大力发展生产力，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这个任务尤为重要和艰难。所以，在列宁看来，“开始社会主义革命是容易的”，“而要把革命继续下去，把革命进行到底，却要比欧洲各国困难”[3]。由此出发，他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着重批判了不顾“落后”国情，离开生产力发展水平而空谈社会主义，并急于“过渡”的“左”倾错误思想，提出“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它的最主要最根本的需要就是增加产品数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没有这

个条件，“社会主义就不可能获得胜利”[4]。为此，他提出并实行过一些卓越的思想和政策。

社会主义在实践中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也有曲折。斯大林继承了列宁未完成的社会主义事业。苏联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所谓斯大林模式，在巩固苏联、打败法西斯、支援世界革命等方面，确实起过巨大的作用。这是任何尊重历史的人都无法否定的。但是应该承认，苏联在工业化过程中也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片面发展重工业和不重视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重工业的片面发展严重抑制了轻工业和农业的正常发展，大量资金和人才集中于重工业（尤其是国防工业），致使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比例严重失调，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日用消费品和食品长期匮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提高缓慢。在工业化过程中，苏联采取粮食和农产品义务交售制等措施，使广大农民承担过重的“贡税”义务，极大地损害了农民的积极性，使粮食和农产品产量长期在低水平徘徊，反过来影响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可以说，苏联经济没有搞好，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是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正如邓小平指出：“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5]“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6]邓小平同志这些精辟论断是对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具有普遍意义。

3.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但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改革是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革命导师早有论述。恩格斯指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7]1921年列宁在纪念十月革命四周年时指出，在改进和完善苏维埃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各种形式方面，“我们还有很多很多事情没有完成”。“今后在发展生产力和文化方面，我们每前进一步和每提高一步都必定要同时改善和改造我们的苏维埃制度。”[8]

改革不是要改变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制度，更不是否认社会主义制度的生命力和优越性，而是从根本上破除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僵化的经济政治体制，逐步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体制，进而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所谓体制就是具体制度。社会主义制度有根本制度，也有具体体制。以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政党体制，以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思想文化制度，这些都是好的，必须坚持。但是具体制度中确有不适合或不健全的，必须通过改革进行调整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和其他社会制度一样，也有一个从不成熟、不完善，到比较成熟、比较完善的渐进发展过程，调整和改革具体体制正是为了维护、巩固和完善根本制度。因此，社会主义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目的是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绝不是借口改革，改掉社会主义。苏联解体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改革没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是导致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邓小平指出：“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9]

4.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正确认识和对待资本主义创造的文明成果，反对照抄照搬西方的价值观念和发展模式

首先，应当看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具有相互借鉴、交流与合作的一面。资本主义发展300多年，它在经济、政治、文化、技术上的成就，都是人类的共同财富，应继承利用其积极有用的东西，为社会主义服务。列宁指出：“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10] 他提出了“乐于吸取外国的好东西：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11] 的著名公式。这里，列宁创造性地提出了要利用资本主义社会有用的东西来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两种制度竞争并存的历史与现实表明，资本主义还有很强的适应性和生命力。

其次，要认识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存在分歧、矛盾和斗争。资本主义的本质是私有制与剥削。而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两者具有不同质的规定性。可见，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在两者的关系上，应坚持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坚持两点论，反对一点论。在强调“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同时，不能忽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者的关系。有些抽象的理论观点会被实际生活所否定。

5.社会主义时期，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政权掌握在哪一部分人手里，这一点决定一切。国家既具有权威和强制职能，又具有发展经济和管理社会的职能。

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专政是区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恩格斯指出，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也绝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12] 这段话十分清楚地表达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历史作用和意义的诠释。列宁指出：“谁读了马克思的著作而不懂得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在每一个紧急关头，在每一次严重的阶级冲突发生时，都只能或者是资产阶级专政或者是无产阶级专政，谁就是对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和政治学说都一窍不通。”[13] 毛泽东把人民民主专政形象地比喻为“护身的法宝”。邓小平指出：“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14] “坚持社会主义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叫人民民主专政。在四个坚持中，坚持人民民主专政这一条不低于其他三条。”[15] 邓小平坚定地重申：“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

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16]“事实上，没有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就不可能保卫从而也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17] 这是由阶级力量的对比、社会主义建设任务的艰巨性和国际形势的复杂性决定的。民主社会主义主张超阶级的国家观，其实质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无产阶级专政是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巩固和发展的根本保证。一个国家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的前提条件是经济基础。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是建成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首要的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只有如此，社会主义才具有吸引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不在于暴力，而在于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济建设必须在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中进行，否则，发展经济就会变成一句空话。但是稳定和谐的社会政治环境还必须有无产阶级专政作后盾。可见，无产阶级专政是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经济建设的保证。

---

[1] 薛新国，天津师范大学教授。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1页。

[3]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173页。

[4]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623页。

[5]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第354页。

[6]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第116页。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第443页。

[8]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613页。

[9]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138页。

[10]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492页。

[11] 《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第520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170页。

[13]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796页。

[14]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379页。

[15]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365页。

[16]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379页。

[17]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第169页。

研究苏联演变问题的一份宝贵材料

——读《撒切尔夫人谈苏联解体》有感

周新城

最近，有一个访问俄罗斯的代表团带回来一份材料《撒切尔夫人谈苏联解体》，很值得一读。全文不长，抄录如下。

1991年11月，一批苏联炼油和石化专家出访美国休斯敦，参加美国石油学会的会议。会议邀请的演讲嘉宾是一年前才卸任的英国原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会上撒切尔发表了约45分钟的演讲[1]。其中心内容可以称为“我们是怎样瓦解苏联的”。会议组织者可能没有事先提醒她，在场的还有苏联人。所以撒切尔的演讲可谓开诚布公、毫不掩饰。从中可以看出，她在苏联瓦解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她自己对此并不隐瞒，且乐于公之于众。她说：

苏联是一个对西方世界构成严重威胁的国家。我讲的不是军事威胁。从本质上讲，军事上的威胁并不存在。我们这些国家装备精良，包括核武器。

我指的是经济上的威胁。借助计划政策，加上独特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刺激手段相结合，苏联的经济发展指标很高。其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过去比我们高出一倍。如果再考虑到苏联丰厚的自然资源，如果加以合理地运营，那么苏联完全有可能将我们挤出世界市场。

因此，我们一直采取行动，旨在削弱苏联经济，制造其内部问题。

主要的手段是将其拖进军备竞赛。我们知道，苏联政府遵守苏联和其北约对手军备均等的原则。结果，苏联装备花费占去了预算的15%，而我们这些国家是5%左右。这自然就造成了苏联要紧缩在生

产居民大众消费品上的投入。我们希望借此引发苏联居民大规模的不满。我们使用的方法之一就是“泄露”我们拥有武器的数量，有意夸大，以诱使苏联加大军备投入。

我们的政策的另一重要方面是利用苏联宪法上的漏洞。苏联宪法在形式上允许任何一个加盟共和国（只需凭着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的简单多数）只要有意即可迅速脱离苏联。当然，由于共产党和强力部门的凝聚作用，长时间里这一权利实际上很难实现。但这一宪法漏洞还是给实施我们的政策留下了未来的可能。

遗憾的是，无论我们如何努力，苏联的政治形势长期保持十分稳定。后来我们（主要是美国）出台的一项重要政策就是建立反导弹防御体系。应当承认，当时大多数的专家反对建设反导弹防御体系。理由是其投入巨大，且不太可靠。而苏联可以以更少（1/5～1/10）的投入即可以“矛”刺穿反导弹之“盾”。但不管怎样，我们提出发展反导弹防御体系，目的是希望苏联同样建造类似高造价的系统。令我们十分惋惜的是，苏联政府没有采取行动，只是限于发表政治抗议。

我们由此陷入了困境。不过，很快便得到情报，说苏联领袖逝世后，经我们帮助的人可能继任，借助他我们能够实现我们的想法。这是我的专家智囊的评估意见（我周围始终有一支很专业的苏联问题智囊队伍，我也根据需要促进和吸引苏联境内对我们有用的人才出国移民）。

这个人就是米·戈尔巴乔夫。我的智囊们对此人的评价是：不够谨慎，容易被诱导，极其爱好虚荣。他与苏联政界大多数精英关系良好，因此，通过我们的帮助，他能够掌握大权。

“人民阵线”[2] 的活动不需要太大的花费：主要是一些复印印刷设备的开支和对骨干的资金支持。而支持苏联矿工长时间罢工的花费要多得多。

专家智囊中间围绕以下一个问题争论激烈、分歧很大：是否推举叶利钦作为“人民阵线”的领袖，进而推选其进入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

埃，接下来成为俄罗斯领导人（以和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对抗）。智囊团多数人的意见是反对叶利钦的提名，考虑到他的过去经历和个性特点。

不过，后来经过多次接触和约定，还是决定“推出”叶利钦。叶利钦费了很大的力气，勉强当选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随即便通过了俄罗斯主权独立宣言。有人发问，俄罗斯独立于谁？整个苏联当时不都是围绕俄罗斯为中心构成的吗？苏联的解体真正开始了。

在1991年“8·19”事件期间，我们也给予了叶利钦以极大的支持。当时苏联上层少数人隔离了戈尔巴乔夫，企图恢复维系苏联统一的制度。叶利钦的支持者坚持住了，并且掌握了控制强力部门的绝大部分（虽然不是全部）实权。

其余所有的苏联加盟共和国，借机宣布自己的主权（当然，多数共和国在形式上并未排除联盟地位）。

这样一来，事实上现在苏联已经解体了，不过在法律上苏联还存在。我负责任地告诉诸位，不出一个月的时间你们就会听到法律上苏联解体的消息。

大约两周后，1991年12月8日由斯·舒什克维奇、鲍·叶利钦、列·克拉夫丘克代表白俄罗斯、俄罗斯和乌克兰签署了宣布苏联停止存在和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协定，即大家熟知的《别洛韦日协议》，苏联解体了。撒切尔夫人预计到的，并努力为之奋斗的事情很快就实现了。

这真是一份令人触目惊心的材料，它披露了西方国家是怎样处心积虑地搞垮苏联，他们的真实顾虑是什么，而苏联又是怎样在西方导演下解体的。我们可以从中得到许多启发。下面，笔者谈三点看法。

一 必须高度警惕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

西方国家对苏联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从撒切尔夫人的讲演中我们可以看到，和平演变的关键是在苏联选择并支持

适合西方需要的人，由他们来贯彻西方国家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意图，因为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他们从两个方面着手，双管齐下。一是在执政的共产党内部（即在体制内）物色人选。经过多方面考察，他们选中了戈尔巴乔夫，对他下了很大的赌注。这是主要的方面。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演变过程中能够起那么大的作用，是与帝国主义的支持分不开的。正如季诺维也夫指出的："没有西方的支持，戈尔巴乔夫分子和激进分子恐怕连一个月也坚持不了。他们之所以能维持下去，只是因为他们按照西方的意志行事。"戈尔巴乔夫实质上已经成为西方国家利益在苏联的代理人。二是帝国主义通过资金资助、舆论支持以及其他手段，培植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外的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即所谓的"民主派"（如"人民阵线"等组织），使他们的影响和力量壮大起来，以便伺机夺取政权。在这方面，西方选中了已经退出共产党的叶利钦。苏联的演变正是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党内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改革派"与党外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民主派"相互勾结（当然两者也有矛盾，也有斗争，但总的目标是一致的），沆瀣一气，葬送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全面恢复了资本主义制度。这是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的胜利。

到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眼看就要解体，资产阶级梦寐以求的事情终于实现了，撒切尔夫人得意的心情溢于言表。读了这份材料，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到，苏联解体的过程都是按照西方安排好了的"剧本"发展的。我们不能不佩服他们的精心策划。正如中央情报局一位雇员所说："谈论前苏联崩溃而不知道美国秘密战略的作用，就像调查一件神秘突然死亡案子而不考虑谋杀。"总结这一历史教训，必须警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推行的"和平演变"战略。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第一个提出要警惕和平演变的是毛泽东。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就主张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战略。他在1953年朝鲜战争败局已定的情况下，要求对美国的国际战略作重大调整，明确提出，战胜崛起的社会主义国家和阵营"可以用战争以外的方法达到"，"要摧垮社会主义对自由世界的威胁，必须是而且可能是和平的方法"。他告诫说："不相信精神的压力、宣传的压力能产生效果的人，就是太无知了。"毛泽东敏锐地觉

察到，随着帝国主义战略的调整，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着和平演变的危险。他把杜勒斯三次讲话的材料加上自己的批注发给中央领导同志，指出杜勒斯说的和平转变，就是要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美国企图利用更富有欺骗性的策略来推行它的侵略和扩张的野心。就是说它那个秩序要维持，不要动，要动我们，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1964年以后，毛泽东把防止和平演变问题正式提上日程，并采取了一系列实际步骤。他说，帝国主义说，对于我们的第一代、第二代没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么样，有希望。帝国主义的话讲得灵不灵？我不希望它灵，但也可能灵。

毛泽东防止和平演变的思想，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里，并没有引起重视，甚至遭到嘲笑。然而过了不到30年，苏联东欧国家发生了政局剧变、制度演变的悲剧，毛泽东的预言不幸而言中了。

苏东剧变以后，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垄断资产阶级把和平演变的矛头主要指向中国。邓小平看到了这种形势，他指出："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3] 美国不喜欢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千方百计要把它搞掉。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就职宣誓时再次强调他反对共产主义的决心。他们是绝不会放弃消灭社会主义制度这项战略任务的，只要有机会就会把这一决心付诸实施。这类事例比比皆是。

二 必须正确评价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

从撒切尔夫人的讲演中，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国家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实际上是相当害怕的。她提出，苏联对西方的威胁，不是在军事上，而是在经济上。她认为，对苏联的经济实力不能低估，对计划经济的优越性也不能否定。她承认，计划经济，加上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刺激手段相结合，苏联经济发展很快，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比西方高出一倍，西方国家可能竞争不过苏联。她对此怀有恐惧心理，认为苏联完全有可能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挤出世界市场。因此，

想通过故意泄露机密的办法，夸大西方军事实力，引诱苏联加入军备竞赛，来破坏苏联的经济。

我们并不否认苏联经济工作中存在许多失误，应该总结其教训，作为我们的借鉴。但是，从整体上评价苏联70年社会主义建设时，不能不承认，苏联的经济成绩是第一位的，问题是第二位的。如果经济搞得一团糟，苏联就不可能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国家就没有凝聚力，那么面对希特勒法西斯挟大半个欧洲的经济军事实力发动的进攻，苏联怎么能够打赢这场卫国战争呢？这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因此，不能抓住存在的问题就得出苏联经济没有搞好这种结论。如果客观地全面地分析，“三七开”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毫无疑问，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引起了人民群众的不满，成为敌对势力利用矛盾、制造动乱的一个缘由。但是，要把这一点说成苏联演变和解体的根本原因，说它必然导致苏联垮台，这是没有道理的。既然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是第一位的，缺点是第二位的（这些缺点通过改革是可以解决的），怎么社会主义制度就非垮台不可呢？这在逻辑上就说不通。

有人是从否定计划经济出发，得出苏联社会主义必然发生剧变的结论的。他们历数计划经济的种种弊端，认为计划经济是“万恶之源”，苏联的垮台就是计划经济造成的。撒切尔夫人的想法与这些人相反，她认为计划经济是苏联经济获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应该怎样认识这个问题呢？

不能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抽象地议论计划经济好与坏。按照邓小平的说法，计划经济、市场经济都是发展生产的方法、调节经济的手段，应该根据发展生产的需要进行选择。无论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方法，都有其优点，也有其不足之处。我们的态度应该是，在一定的具体条件下，哪种方法能够发展生产力，就采用哪种方法。所以我们对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需要进行历史的分析，即把它放到当时的国际国内的政治经济环境中进行评价，切忌从现在的、已经变化了的条件出发来评价历史上的事情。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

初，苏联的经济技术十分落后，而当时国际上帝国主义发动侵苏战争的阴影日益迫近，国内又面临着为社会主义社会奠定物质技术基础的艰巨任务，苏联不得不开足马力，加快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步伐。适应这一战略的需要，苏联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把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集中起来，建设规模宏大的重工业企业，尤其是国防工业企业。苏联仅仅用12年时间就完成了资本主义国家花了50～100年时间才完成的工业化任务，为赢得卫国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这证明了当时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有其历史的由来，并起过历史的积极作用，不容否定。战后，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经济联系的复杂化，尤其是随着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发展转向集约发展，计划经济体制逐渐不适应甚至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了，改革提上了日程。然而这不能成为否定历史上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必要性及其积极作用的理由。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这是马克思主义分析问题的基本要求。我们不能脱离具体历史条件抽象地对历史上的事物说三道四。对待苏联的计划经济更应该采取这种态度。

那种否定计划经济，进而认为搞计划经济导致苏联垮台的观点，是毫无根据的。从撒切尔夫人的讲演内容来看，她从实际情况出发，也是反对这种看法的。

三 苏联演变和解体的决定性因素

撒切尔夫人的讲演表明，在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前，苏联的政治形势长期保持十分稳定，西方感到很难实现和平演变的战略目的，陷入了困境。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领导人更迭，事情峰回路转，苏联本身出现了新的动向，使得西方感到鼓舞。用撒切尔夫人的话来说，“经我们帮助的人”可能担任苏共最高领导职务，“借助他我们能够实现我们的想法”。“这个人就是米·戈尔巴乔夫。”事实正是如此。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推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短短6年时间，在改革的旗号下，就把苏联共产党从一个共产主义式的无产阶级政党改造成为社会民主主义式的资产阶级政党，把苏联社会制度由社会主义改造成为资本主义，并与党外敌对势力一起颠覆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政权，最终造成了亡

党亡国的悲剧。发展之快、进展之顺利，出乎人们意料，甚至超出了西方垄断资产阶级的想象，难怪撒切尔夫人等人要喜形于色，额手称庆了。

苏联向资本主义演变，问题就出在领导集团尤其是第一把手戈尔巴乔夫身上。正如我们党中央领导同志指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戈尔巴乔夫手里搞垮了。苏联的基础设施、工业基础都比较雄厚，资源丰富，人民的文化素质也是高的，但眼看着解体了，搞成今天这个样子，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戈尔巴乔夫背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包括取消党的领导、抛弃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教训深刻得很啊！”

应该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出现像戈尔巴乔夫这样的以消灭共产主义为终身目的的叛徒并不是偶然的，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很难免的。这是因为，在当前国际国内的环境下，存在着产生反共反社会主义思潮的土壤和条件，而戈尔巴乔夫正是这种思潮的代表人物。毛泽东同志曾经深刻地指出社会主义国家里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他说，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是修正主义产生的外部条件，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是修正主义产生的内部条件。这一分析完全适用于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反共思潮。我们不应该把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及其带来的后果仅仅看做他一个人的作用，而应该把它放到国际国内两个阶级、两种社会制度激烈斗争的背景下加以观察，应该看到，他的背后是一个势力强大的阶级——处心积虑要推翻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国际国内的资产阶级。这样才能触及事情的本质，才能真正从“戈尔巴乔夫现象”中吸取教训。

苏联演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为惨重的教训，它用血淋淋的事实证明了毛泽东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思想的正确性。有人指出，苏联是一面镜子，如果说在20世纪50年代初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面正面的镜子的话，那么，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的演变，则是一面反面的镜子。殷鉴不远，我们必须认真总结苏联演变的教训，清醒地认识到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斗争远未结束，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远没有过去。

在这个问题上，《撒切尔夫人谈苏联解体》是一份很好的教材，它从西方垄断资产阶级的角度提醒我们，应该怎样总结和吸取苏联演变和解体的教训。这是这份材料的意义所在。

---

[1] http：//www.itnsource.com/shotlist/ITN/1991/11/22/T22119113.

[2] “人民阵线”指的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也就是戈尔巴乔夫执政的苏联后期，在波罗的海等加盟共和国境内兴起的、以“求主权、谋独立”为旗号的民族政治势力组织。

[3]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344页。

意识形态的变化与苏联剧变

汪亭友 [1]

一

全面否定历史是意识形态变化的先导。戈尔巴乔夫推行改革后不久，苏联境内就逐渐掀起一股全面否定历史的浪潮。这股浪潮的兴起，始于揭露苏联历史上的阴暗面。而斯大林时期的问题自然就成为一个中心议题 [2] 。起初是一些描写斯大林时期问题的文艺作品 [3] ，后来蔓延至史学界、理论界和舆论界。到1987年初，苏联境内就出现了重新评价历史的运动，并在全国范围内逐渐形成一股思潮：否定历史的思潮，接过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批判斯大林“罪行”的论调，从否定斯大林与斯大林主义入手，进而引申出去，攻击和诽谤列宁，再进而否定马克思主义和整个苏联共产党。在这方面，戈尔巴乔夫可谓一马当先。他先是不断数落斯大林扶植的“扭曲的社会主义”的弊病和罪恶，认为“几十年来强加给党和社会的模式已遭到战略性的失败”，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官僚专制的”、“极权的社会主义”，“斯大林所创立的社会结构的模式崩溃了”，“这一结论具有原则意义” [4] 。接着，他改变了对马克思、列宁的最初看法。在改革之初，他声言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提出要“向列宁求教”，并认为这是改革的思想源泉。但不久，他就开始批评马克思没有预见到资本主义的活力，列宁没有完整的社会主义建设纲领，直至宣布马克思、列宁创造的社会理论已经过时。因此，他认为，“要校正一个多世纪以来被共产党人视为准则的我们实际行动的主航道”，对70年来苏联走过的道路“作出客观的和恰当的评价”，对许多问题要进行“彻底的研究” [5] 。

在戈尔巴乔夫的怂恿与带领下，党内民主派与社会上各种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激进分子更是不甘落后。他们在猛烈抨击斯大林主义的同时，也开始攻击列宁与十月革命。时任苏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亚·尼·雅科夫列夫甚至认为，十月革命是少数暴徒发动的政变，是“俄罗斯

一千年历史上最悲惨的事件”，是“魔鬼之歌的序曲”，从此社会主义的大船就“在血和泪的海上航行”[6]。“十月革命是一场超恐怖的革命。”[7]相反，“二月革命是一个极其伟大的事件”。“二月革命很快就被十月政变所取代，是十月政变推翻了二月革命，是布尔什维主义专制践踏了通向民主的运动。”[8]“他们以恐怖的手段取缔了不同政见，残酷无情地砍光了旧制度的载体——地主、商人、资本家、神职人员、军官和一切可疑分子。”[9]“民主联盟”的主要成员尤里·阿法纳西耶夫则公然宣称：“我们的整个历史是靠使用武力和暴力写成的，如果我们的领袖和缔造者（列宁）为某种东西打下基础的话，那就是国家暴力和恐怖政策的原则。”[10]他还认为：“列宁关于社会主义的异说及其具体事件是可疑的。需要的不是修理，而是重新打基础。应当抛弃所有革命主义的理论。我们所走过的道路是一条死胡同。”[11]要建立一个“人道主义的新党”，就必须抛弃列宁的教条。在“非列宁化”思潮的蛊惑下，右翼反共分子在公开场合焚烧“专制国家象征”的列宁像，要求将列宁的遗体从墓中迁出，理由是可以在苏联人的意识中“彻底清除个人崇拜的传统”。

否定历史的手法更是多种多样。为达到目的，他们一方面抓住实际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加以渲染和夸大，甚至捏造事实，混淆视听。当时，揪斯大林“辫子”最多的地方，当属20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这是否定“历史热”中的重中之重。苏联国内包括西方世界在这个问题上极尽夸大造谣之能事。1988年，俄哲学副博士阿·恰利科娃认为，1937～1950年在苏联集中营死亡的人数有1200万，加上被枪毙的富农，因集体化被镇压、被饿死的人数总共达2000万。这在当时还是较保守的观点。有人甚至认为，仅在30年代因镇压而死亡的人数就达到1600万～2000万[12]。至于这些人为什么要歪曲历史，毫无根据地把数字扩大，当时的苏联学者达尼洛夫曾说过这么一段话。他说，这些作者尽可能把数字拔高，根本不顾是否可靠和合不合乎逻辑，是因为“他们希望用1300万或1500万的死亡人数来给读者以震惊。因为在他们看来，如果人数‘只有’400万或500万，那对我们彻底谴责斯大林对农民的迫害是不够的”[13]。这或许道出了个中的缘由。本来对于“大肃反”这样的历史问题，需要客观公正地予以评价。

在斯大林时期，在镇压了一些必须镇压的反革命分子的同时，也确实冤枉、错杀了一些好人，甚至是党内很好的同志。重新审视这个历史问题以及其他有争议的历史问题，目的是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以吸取教训，更好地发展社会主义事业。但是，如果违背历史事实，夸大其词，甚至无中生有、故意歪曲捏造，不但无助于历史教训的总结，反而会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从而败坏党的形象，对社会主义事业有百害而无一利。

另一方面，他们还把苏联历史上具体体制上的弊病，以及具体的政策措施上的失误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混为一谈。不仅“肃反”扩大化的后果被再次扩大化，苏联历史上的其他问题也被扩大化，而且还与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直接联系在一起。他们把政治生活中出现的民主发扬不够的现象，说成共产党的领导地位造成“政治垄断”的结果，因而要求取消共产党领导，实行多党制；把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并已纠正了的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归因于无产阶级专政本身，因而要求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实行“全民民主”；把公有制企业经营管理机制上的不合理，出现诸如企业缺乏活力、职工缺乏劳动积极性等问题，说成公有制必然带来的，因而要求把公有财产分散归个人所有，实行私有化；他们利用意识形态工作中学术自由讨论气氛不够等缺点，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是“精神垄断”，因而要求实行意识形态多元化，如此等等。这种做法不仅带有理论色彩，一般群众很难辨别是非，而且很容易从逻辑上得出结论，既然社会主义有如此多的弊端，那就必须否定马克思主义，抛弃社会主义。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戈尔巴乔夫等人的眼里，所谓的民主化与公开性，也只是允许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舆论公开鸣放，而不允许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的人针锋相对地进行批判。比较典型的表现就是安德烈耶娃事件。安德烈耶娃是列宁格勒工艺学院的一位女教师。她出于对反动舆论甚嚣尘上的现状的不满，出于一名普通共产党员的良知，给《苏维埃俄罗斯报》写了一封题为《我不能放弃原则》的长篇来信。1988年3月13日，该报以整版篇幅刊载了来信。信中批评了当时改革的许多做法和错误思潮，如批评那些否定斯大林的文章“使人迷失方向”，是“西方职业反共分子”、“被十月革命推翻的各阶级的后代”对社

会主义发动的进攻；批评“左倾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思潮，说它只提历史的“错误和罪行”，崇尚现代资本主义民主，“利用公开性散布非社会主义的多元论”，等等。此信一经发表，在国内外引起广泛重视，引发了对改革与历史等重大问题的争论。然而，面对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文章铺天盖地而来却熟视无睹的苏共中央政治局，此时在亚·尼·雅科夫列夫等人的一手操纵下一反常态，立即作出反应，又是开会讨论要求人人表态，又是组织写批评文章进行反击，又是查背景力图揪出后台等。戈尔巴乔夫回国后也不失时机地认为，有人怀疑民主和公开性会破坏社会主义[14]，出现了所谓的“社会主义哭灵人”。4月5日，《真理报》以编辑部的名义用整版篇幅，发表了题为《改革的原则：思维和行动的革命性》的长文，严厉批判安德烈耶娃的长信，认为该信的观点背离了苏共二十七大的方针、路线，是“反对改革势力的思想纲领和宣言”。随后，各种报刊纷纷表态，支持《真理报》的文章。《苏维埃俄罗斯报》后来被迫公开承认错误。这个事件暴露了所谓的“民主化”与“公开性”不像戈尔巴乔夫等人说的那样：各种观点、思想、舆论都可以公开争鸣，民主讨论，而是推行如利加乔夫所说的“双重标准”，即符合他们目的与需要的就可以民主，可以公开，反之，就被视作妖魔鬼怪，予以围剿。安德烈耶娃事件可以说是对戈尔巴乔夫所谓的“民主化”与“公开性”政策的绝妙注解与讽刺。

在各种反共反社会主义分子的丑化下，整个社会主义实践被说得一无是处，苏共也被妖魔化。在他们看来，苏共不只是犯了错误，而且是犯罪的组织，甚至“同法西斯组织一样”，卫国战争的胜利不过是“大法西斯打败了小法西斯”；现实社会主义制度非但毫无成就可言，而且给人们带来的“只是灾难”；70年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迷误”，离开了“人类文明的正道”。总之，社会主义是一部“不光彩的历史”，必须与之“一刀两断”、“彻底决裂”，必须“告别过去”、“炸毁过去的一切”。利加乔夫曾对这股否定苏共和苏联历史的逆流作过如下描绘：“颠覆文章犹如狂涛恶浪，席卷了舆论工具。极右报刊所描绘的不是多维的历史，不是成就与错误相互矛盾地交织在一起的历史，而只是阴暗的污点……这种不公正的、恶意中伤的不真实的歪曲报道惊扰和刺激了社会气氛。于是矛头开始对准了共产党员、苏共，对准

了党的历史。”“最终指向人民，指向人民对历史的怀念。”[15] 这段论述客观地反映了当时的情况，令人深思。

全盘否定苏共与苏联历史的后果是严重的。这不仅混淆了是非，掩盖了事实真相，严重损害了党的卓越领导人（特别是斯大林、列宁）的形象，而且极大地动摇了不明真相的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党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急剧下降。一些民意调查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这点。1988年4月，对11所高校的1200名大学生的调查表明，有69%的被调查者赞成报刊上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批评；只有18%的人认为，这样的出版物会动摇年轻人对社会主义社会理想的信仰[16]。1988年6月对莫斯科人的一次调查表明，有55%的被调查者认为斯大林在国家生活中起了负面作用；有31%的人认为斯大林的活动中既有正确的一面，也有错误的一面；只有不到1%的人高度评价斯大林在国家历史上的作用[17]。在这种政治氛围下，广大党员与干部在群众面前抬不起头来，自己觉得好像是犯错误组织甚至犯罪组织的一员，低人一等。不仅如此，在反共宣传的影响下，一些不明真相、意志薄弱的苏共党员开始退党。从1990年初到1991年上半年，苏共1900万名党员中有400万人因“对共产主义理想失望和不信任作为政治力量的苏共”而退党[18]。这就能够理解这样一个现象：当戈尔巴乔夫之流公然宣布解散共产党、解散苏联时，在苏联境内几乎没有出现任何有组织的抗议，更不用说有力的反抗了。因为，既然苏共是这样的一个邪恶组织，既然社会主义是这样的一种邪恶的社会制度，任何一个思维健全的人，不用说在关键时刻，哪怕在平时，也不会挺身而出，来捍卫党、捍卫社会主义的了。俄罗斯著名批评家邦达连科就沉痛地说：“为什么在1991年8月没有一个共产党员站出来保卫自己的市委和区委？因为他们所有的人摇摆不定，感到失望，不再相信，都过着双重生活。”[19] 这足见敌对势力的反动宣传在苏联演变过程中的极端重要性。

全面否定历史的思潮的发生，根源于戈尔巴乔夫提出的“民主化”与“公开性”。为了促进民主化，戈尔巴乔夫提出了“公开性”问题。他认为，公开性原则是社会主义民主不可分离的一个方面，“也是整个社会生活的准则”。没有公开性就没有民主，也就不可能有现代社

会主义。“我们需要公开性就像需要空气一样。” [20] 扩大公开性不仅仅是个原则性的问题，而且也是个政治问题。为了实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根本改造，“我们需要公开性”。改革要把公开性提到“生活的首位”，要让公开性“大放光明”。“民主化和公开性不仅仅是改革的手段，这也是实现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实质。”“我们主张毫无保留、毫无限制的公开性” [21] ，要取消“毫无根据的限制和禁令” [22] ，要让人民“知道一切” [23] 。舆论工具“是公开性的最有代表性的和群众性的论坛” [24] ，要“使公民的呼声能从这个讲坛没有任何‘阻碍’地发出” [25] 。“任何事件，不论是今天的痛处或是过去历史上的悲惨事件，都可以成为报纸分析的对象。” [26] “让那些主张党、国家和经济及社会团体的活动要具有公开性质的人放手去干。” [27] 概括起来，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主张主要集中于两点：一是认为“公开性”不仅是改革的手段，而且它与民主化一道是改革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不仅是整个社会生活的原则，而且还是政治生活的原则。二是主张毫无限制的公开性，即所谓的“历史无禁区、公开无限制”。

苏联过去在公开性方面做得不够，存在一些弊病，提出扩大公开性的任务是必要的，也是必需的。但问题在于，公开性、民主化从来都是服从于、服务于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根本利益的，世界上从古至今没有哪一个阶级、哪一个政党、哪一个国家搞过“毫无保留、毫无限制的公开性”。因为公开性总得有个限度，不能搞没有限度的公开性。而且，从事实看，戈尔巴乔夫也从来没有推行过毫无保留、毫无限制的公开性与民主化。他的公开性、民主化从来都是“单行道”，只准反共反社会主义，不准捍卫党和社会主义。戈尔巴乔夫等人的目的，是要利用公开性来反共反社会主义，是要在全面否定苏共和苏联历史的基础上，宣传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为推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开辟道路。既然过去的社会主义已经失败了，那么就要选择一条“新路”，即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之路。这是戈尔巴乔夫之流鼓吹民主化、公开性、人道主义以及多元化的真实意图。

二

在全面否定过去的同时，戈尔巴乔夫开始提出了人道的民主的社

会主义。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从提出到成为改革的指导思想，经历了一个过程。1985年至1987年底，可以说是思想酝酿、理论逐渐成熟的阶段。其间以《改革与新思维》一书的发表为标志。该书的发表为改革转向奠定了理论基础。1988年上半年，是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成为改革的指导思想大造舆论的阶段。1987年底，《改革与新思维》一书发表后，民主化、公开性与人道主义就成为改革的热门话题。在“改革与新思维”的旗号下，改革的目标被逐渐明确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1985年3月11日，即在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初，他就把民主化作为国内政治生活中的一项根本任务。他说：“党把进一步完善和发扬民主以及人民的社会主义自治体系看做国内政治中的一项根本任务。”[28] 此后，他不断强调民主在苏联政治改革中的作用。1986年2月25日，他在苏共二十七大政治报告中指出，民主是“新鲜的清洁空气”。“社会主义社会的肌体只有在这种空气中才能朝气蓬勃地生活。”[29] 1987年1月28日，他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闭幕词中说：“我们需要民主就像需要空气一样。”[30] 2月21日，在爱沙尼亚共和国的讲话中，他认为：“苏联社会民主化的任务是我们社会最紧迫的、最急切的需求。”[31] 在这年11月出版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戈尔巴乔夫进一步提出：“在原则上把我们的苏联社会民主化的纲领看做现有政治制度变革的纲领。”[32] 他认为，民主是“改革的实质”，是“改革的灵魂”，是改革的“主要手段”。他说：“民主不单纯是个口号，而是改革的实质。”[33] “只有通过民主和借助民主，改革本身才有可能实现。”“各个领域的民主化乃是整个改革事业的主要手段和保障。”[34] “社会民主化是改革的灵魂。”“民主化的程度如何将决定改革的成败，也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将决定整个社会主义的未来。”[35] 民主化是“达到改革的目的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手段”[36] ；虽然民主化可能被坏人利用，但问题只能用“对话”、用“政治方法”解决，不需要“专政”[37]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戈尔巴乔夫已经把民主化上升为改革的纲领。

在推行“民主化”、“公开性”的过程中，戈尔巴乔夫开始大肆宣扬人道主义。1985年3月11日，即在他上任之初，他指出，党制定的社

会政策的纲领性原则是“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幸福”，而且“应当以越来越深刻而具体的内容加以充实”[38]。以后他逐渐地提出了人道主义的问题。他不仅把人道主义看成处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道德准则，还把人道主义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他认为，列宁的社会主义概念公认的优先方面“是在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及文化方面的人道主义价值”[39]，“多一些社会主义”就是意味着“在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和个人关系中多一些文明和人道主义”[40]。改革的最终目的是揭示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性质”，这是改革的决定性方面[41]。在这里，戈尔巴乔夫已经把人道主义看成改革的目标与任务。

到1988年初，戈尔巴乔夫进一步突出强调民主化、公开性与人道主义。1月8日，他在会见舆论工具、意识形态机关和创作协会的领导人的长篇讲话中说，改革目前常常受到来自右的和来自“左”的两方面的批评，前者指责改革破坏了社会主义的基础，后者攻击改革已经停止。党对这两种思想持坚决斗争的立场，特别是对后者的打击不能被理解为对改革的打击。他还认为，民主化和公开性不仅仅是改革的手段，这也是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实质。他还说，当时正在准备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而苏联社会民主化问题，将是这次会议的“主要的中心的问题”[42]。在1988年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上，戈尔巴乔夫指出：“主要的事情是民主化，这是达到改革的目的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手段。”他认为，政治体制改革应“根本提高苏维埃作为我国社会政治体制核心、体现一国政治制度的核心的作用”。“必须恢复列宁所理解的那种苏维埃政权”，使各级苏维埃成为国家的“全权中心”。要建立“社会团体的发达体制”，成立“一系列社会团体”，使它们代表“不同的社会利益、职业利益和其他利益”。在这次会议上，他还特别强调人道主义。他说：“人活着不单是为了面包。”“人活着更多的是为了真理和良心、公正和自由，道德和人道主义”，而“布尔什维主义就吸取了俄罗斯伟大文化的先进的人道主义传统”[43]。5月7日，他在同舆论界领导人会晤时说：“我们应该真正挖掘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潜力，这就是改革的任务。”[44]

戈尔巴乔夫在把民主化、公开性与人道主义等问题与改革的目标

与任务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同时，还认为改革的阻力主要在于在思维方法与意识形态领域，没有把民主化、公开性与人道主义作为实质性的问题提到改革的议程上来。因此，要着重解决这个问题。1988年6月苏共中央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不仅确立民主化、公开性与人道主义为改革的主要内容与方向，而且还把“多元化”引入政治体制改革。早在1987年，戈尔巴乔夫就提出“利益多元论”。他在当时召开的苏共中央一月全会和六月全会上曾强调，社会主义社会的各个阶级、阶层、社会集团和职业类别存在“不同的利益”，它们之间存在“利益矛盾”。其后，他又提倡“意见多元论”。1987年7月，他在会见报刊、文艺界负责人时说：“让我们的言论多样化一些吧！让全社会都参加，让社会主义的多元论充满每一种刊物。”在这次会议上，他反复强调“多元化”，并把“多元论”和“民主化”、“公开性”并列为苏共提出的三大“革命性倡议”。他认为“根本改革政治体制”的基本任务之一，是调整好“自由形成和表达各阶级和社会集团的利益和意志”的机制，“他们商定和实现苏维埃国家的对内对外政策” [45] 。也就是说，在政治体制中要形成“多元化”的机制。

“民主化”、“公开性”、“人道主义”以及“多元化”，是戈尔巴乔夫改革“新思维”的几面旗帜。如同公开性问题一样，如果说苏联过去在“民主化”、“公开性”、“人道主义”等方面重视不够，存在一些不够民主、不够公开、不太注重人道的问题的话，如果说苏联过去过于强调一元化领导，没有注意并尊重各个阶级、阶层、社会集团和职业类别存在的“不同的利益”，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同意见与主张的话，那么，为了更好地发展社会主义，着手解决这些问题，这是无可厚非的。但从他的真实意图看，在这些主张的背后，不是为了在苏联真正实现社会主义的民主与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而是为了从根本上否定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行别样的社会主义。关于这一点，他说得很明确：“我们要创造的是这样一个崭新的社会，它将既不是资本主义的复本，也不是原来的那种东西的翻版——哪怕是得到改善的翻版。” [46] 具体地说，就是建立一个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一个自由和公正的社会。这是戈尔巴乔夫鼓吹“民主化”、“多元化”以及人道主义化的实质，是要为在苏联不折不扣地推行民主社会主义进行思想理

论与舆论准备。应该说，这一准备经过3年多时间的筹划与行动，在1988年上半年已经成熟。1988年6月，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革思想的确立。此后，戈尔巴乔夫按照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与价值理念，逐步把苏共由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改造成为社会民主党，把苏联的社会制度由社会主义全面引向资本主义。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成为苏联演变的桥梁与纽带，成为演变苏联的强大的思想武器。

---

[1] 汪亭友，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2] 有人从苏联32种报纸和97种杂志上搜集了721篇与斯大林有关的作品，其中有4幅画（都是发表于1988年）。如果除去这4幅画，那么文字作品共有717篇，其中有64篇为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发表的年代如下：1986年共发表1篇，系文学作品；1987年共发表56篇，其中有5篇文学作品；1988年共发表660篇，其中有58篇文学作品。从上述数字不难看出，“历史热”的高潮是在1988年。从内容上看，这717篇作品可分列如下：同斯大林本人生平有关的共发表106篇；同斯大林子女有关的共发表11篇；同斯大林周围的亲信有关的共发表21篇；同国家经济有关的共发表25篇；同人口问题有关的共发表7篇；同“大清洗”有关的共发表407篇（其中与“大清洗”直接有关的289篇，旁及科技、文艺界“清洗”的有114篇）。参见E.A.马雷舍娃编《斯大林个人迷信时期苏联社会的历史（1986～1988年作品索引）》，基洛夫市，1998。转引自陈启能《苏联解体前的“历史热”》，《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4期。

[3] 开始是过去被禁的涉及苏联历史的文学作品的解禁出版，接着新创作的有关文艺作品就大批涌现。1986年底，亚历山大·别克被禁的描写斯大林时期高级工业管理人员官运的小说《新任命》出版。紧接着在1987年初，莫扎耶夫、雷巴科夫、杜金采夫、格拉宁等人过去被禁的描写斯大林时期的小说相继出版。影响更大的是亚历山大·特瓦尔托夫斯基的长诗《回忆的权利》。这首诗是写诗人的父亲特里丰在1931年被作为富农遭到流放的遭遇。诗原写于1969年，在当时未能发表。这次在两大主要文学刊物《新世界》和《旗帜》上发表，引起轰动。两大刊物载有这首诗的那期印数达到68万份。女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纪念她的于1937年被捕的儿子的诗《安魂曲》也被解禁。当时反响最大的作品是被允许向广大民众放映的格鲁吉亚的影片《忏悔》。这部影片以寓言方式影射斯大林的专制主义。1987年还出版了雷巴科夫的被禁小说《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这些作品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促使人们包括年轻人去关注苏联过去的历史。在1987年，《文学报》（一周一期）的印数达到310万份。据说，人们从早晨6时起就排着长队去

购买这些出版物，然后一个一个地传着阅读。转引自陈启能《苏联解体前的“历史热”》，《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4期。

[4] 参见戈尔巴乔夫在1991年7月26日苏共中央全会上的讲话。

[5] 参见戈尔巴乔夫在1988年2月17～18日苏共中央全会上的讲话《使革命性的改革具有革新的意识形态》。

[6] 转引自〔俄〕1994年1月19日《文化报》。

[7] 〔俄〕亚·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1999，第48页。

[8] 〔俄〕亚·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1999，第94页。

[9] 〔俄〕亚·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1999，第48页。

[10] 转引自马岩《意识形态与苏联解体》，《马克思主义研究》1997年第3期，第7页。

[11] 参见〔苏〕《文学的俄罗斯》1990年第16期。

[12] 虽然对斯大林“肃反”运动中的迫害人数与死亡人数这个问题一直有争议，但我国国内的学者根据苏联解体前后公布的数据考证，在20世纪30～50年代因政治犯罪被判刑的人总共380万左右，其中在1937～1938年“大清洗”中被判刑的为130万～150万人。1934年1月1日至1947年12月31日，死于集中营的犯人总共为96.21万人。20世纪30～50年代，即几乎整个斯大林时代，苏联国内被处决的政治犯约78万人，其中1937～1938年被处决的人数约68万。参见吴恩远《廓清一个历史真相——斯大林时代被镇压人数考》，《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动态》2002年第25期。

[13] 参见〔苏〕1988年9月16日《真理报》。

[14] 参见戈尔巴乔夫《1988年3月29日会见意共总书记纳塔时的讲话》。

[15] 转引自马岩《意识形态与苏联解体》，《马克思主义研究》1997年第3期，第7页。

[16] 参见〔苏〕1988年7月22日《共青团真理报》。

[17] 参见〔苏〕1988年8月17日《莫斯科晚报》。

[18] 转引自马岩《意识形态与苏联解体》，《马克思主义研究》1997年第3期，第5页。

[19] 转引自张捷《雅科夫列夫其人和他对苏联解体所起的作用》，《当代思潮》1996年第5期，第55页。

[20] 〔苏〕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第92页。

[21] 参见戈尔巴乔夫《1988年1月8日在会见舆论工具、意识形态机关和创作协会的领导人的讲话》。

[22] 〔苏〕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第91页。

[23] 〔苏〕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第78页。

[24] 〔苏〕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第12页。

[25] 〔苏〕戈尔巴乔夫1987年5月18日答意大利共产党《团结报》编辑部问。

[26] 〔苏〕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第94页。

[27] 〔苏〕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第91页。

[28] 中国人民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戈尔巴乔夫言论选录（政治部分）》（内部资料），1990，第54页。

[29]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87，第73页。

[30] 中国人民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戈尔巴乔夫言论选录（政治部分）》（内部资料），第59页。

[31] 中国人民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戈尔巴乔夫言论选录（政治部分）》

（内部资料），第54页。

[32]〔苏〕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第62页。

[33] 参见戈尔巴乔夫在1987年1月27日苏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

[34] 参见戈尔巴乔夫1987年5月18日答意大利共产党《团结报》编辑部问。

[35] 参见戈尔巴乔夫1987年11月在庆祝十月革命70周年大会上的报告《十月革命与改革：革命在继续》（内部资料）。

[36] 参见戈尔巴乔夫1987年2月18日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讲话。

[37] 参见中国人民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戈尔巴乔夫言论选录（政治部分）》（内部资料），第66页。

[38] 中国人民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戈尔巴乔夫言论选录（政治部分）》（内部资料），第39页。

[39]〔苏〕戈尔巴乔夫：《十月革命与改革：革命在继续》（内部资料）。

[40]〔苏〕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第37页。

[41] 参见〔苏〕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第35页。

[42] 参见王正泉、姚谓玉等编《苏联演变纪事（1985.3～1991.1）》（内部资料），第53页。

[43] 参见王正泉、姚谓玉等编《苏联演变纪事（1985.3～1991.1）》（内部资料），第55～56页。

[44] 参见王正泉、姚谓玉等编《苏联演变纪事（1985.3～1991.1）》（内部资料），第62～63页。

[45] 中国人民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戈尔巴乔夫言论选录（政治部分）》（内部资料），第90页。

[46]〔俄〕戈尔巴乔夫：《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局国际发展与合作研究所编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第16页。

第四篇 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及美国对中亚战略新变化

苏联解体20年：影响远未结束

于洪君 [1]

一 苏联解体造成的伤痛和阴影仍然在俄罗斯和独联体大地挥之不去，折磨着这些地区的国家和人民

谈到苏联解体的后果，2005年时任俄罗斯总统普京说过一句被经常引证的话，即苏联解体是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悲剧。实际上，苏联解体的影响远不限于此。

从共产主义运动发展轨迹看，苏联共产党这个党龄达90多年、执政74年、鼎盛时期党员人数曾达1920万的大党，到苏联解体前夕只剩1200余万党员。苏联解体后，经过20年风雨涤荡，其继承者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党员人数持续萎缩，已经从重新登记时的50多万人下滑到目前的17万人左右，在国家杜马中的议席从首届杜马中位居第一的120多个缩减到目前的57个，政治影响力不断减弱。在可预见的将来，俄共基本上不具备重新上台执政的机会和前景。而在其他独联体国家，摩尔多瓦共产党曾执政8年，但目前不得不为重新上台执政而苦斗。乌克兰共产党在议会尚有一定数量的席位，但地位和影响远不及20世纪90年代。除此之外，其他国家由于种种原因，共产党的力量日益微弱，有些国家根本不存在共产党人合法活动的政治气候。总体上看，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左翼运动在独联体地区陷入低潮早已是不争的事实。

从经济和社会上看，苏联曾是与美国并驾齐驱的超级大国，1976

年苏联的钢、石油、化肥、水泥、棉织品的产量及各种货物运输量等，均超过美国。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综合国力和经济地位一落千丈。普京1999年底就任俄总统前夕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文中坦承：“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几乎下降50%，仅相当于美国的1/10。”尽管近10年来俄罗斯实现了强劲复苏，经济实力逐渐恢复到苏联时期的水平，但受2008年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影响，近两年来俄经济再次严重下滑。目前俄罗斯的GDP依然仅为美国的1/10，社会和国内安全问题依然比较突出，两次车臣战争后，俄国内不断发生恐怖袭击事件，北高加索地区依然是俄罗斯流血的伤口。其他独联体国家也与俄罗斯类似，面临的经济和社会政治问题同样复杂严峻。

从地缘政治上看，苏联解体给独联体国家内部和彼此间关系留下了许多问题。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归属权问题上的争端依然无解，摩尔多瓦与德涅斯特左岸地区围绕统一与分离的斗争仍在继续，中亚国家之间因领土、水资源而导致的潜在冲突随时可能爆发。尤其是2008年俄罗斯与格鲁吉亚因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归属问题发生战争，继而承认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独立”后，独联体国家间的关系更加微妙。有俄罗斯学者认为，苏联解体的进程远未结束，今后还要持续多年，领土纠纷和边界变更还可能引发战争或局部冲突。鉴于独联体作为前苏联国家“文明离婚”的“善后机构”在协调彼此冲突方面作用有限，各成员国之间存在盘根错节的利益矛盾和尖锐复杂的领土、资源纷争，苏联解体进程远未结束的观点在一定意义上说有其合理成分。

从安全环境上看，苏联解体之初，俄罗斯独立兴国曾对西方寄予厚望，但其放弃社会主义制度，全面实行西化改革的举动不仅没有得到善意回应，美国和西方国家反而利用俄国力衰弱之机，积极推动北约东扩和欧盟东扩两大进程，不断蚕食俄罗斯的势力范围，全力压制和削弱俄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美还利用反恐之机，打进俄拥有“特殊利益”的中亚和外高加索，千方百计扩大美国和北约在俄战略后院的军事存在，不遗余力地诱拉和撺掇部分独联体国家加入北约。近年来，随着双方关系的“重启”，俄美争端有所缓解，关系有所改善，围绕着美在东欧部署反导系统的争执暂时平息，两国还在安全

领域进行了一系列合作，但俄罗斯与美西方关系的警报并未彻底解除，其安全环境好转与否的主动权如同苏联解体之初，依然掌握在西方手中。

二 两极格局瓦解，美国的霸权主义和西方国家的强权政治大行其道，国际安全体系依然严重失衡

1991年苏联解体，这个横贯欧亚大陆的超级大国作为“国际政治主体和地缘政治的现实”寿终正寝，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东西方冷战状态和世界两极格局最终结束。但是，东西方冷战结束和两极格局瓦解并未给世界带来普遍安全与和平。美国和西方势力凭借其经济、科技、军事实力和外交优势，继续奉行冷战思维，把军事干预和战争作为实现其价值观和利益的重要手段。如果说冷战时期，美苏主要通过“代理人”进行战争，彼此直面有投鼠忌器之虑的话，苏联解体则使美国和西方失去了牵制和掣肘。他们公然破坏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肆无忌惮地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一而再再而三地对外用兵，直至赤裸裸地进行侵略战争。在这些战争行动中，1991年海湾战争以“匡复正义、解放科威特、惩罚侵略”为名，多少还有一点“合法性”。其他几场战争，大都是为美国和西方的一己私利，因而备受质疑。

在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中，美国利用南斯拉夫境内的民族问题，推出“人权高于主权”理论，擎起“人道主义干预”大旗，并以该地区出现“种族清洗”为借口，依靠北约打了一场体现美国价值观、实现美国战略利益的高科技战争，一举除掉了桀骜不驯的米洛舍维奇政权。正是通过这场战争，美国一石二鸟，同时借机打掉了欧盟试图用欧元与美元对垒的勃勃雄心，强化了美国在欧洲和全世界推行单边主义、构建一超霸权世界秩序的地位和野心。

2001年开始的阿富汗十年战争，则是美国借“9·11”事件后世界各国对美国世贸中心大楼被炸的同情和对国际恐怖主义的憎恨，以“反恐自卫”为名进行的一场战争。这场战争虽然推翻了庇护国际恐怖主义势力的塔利班政权，美国出兵阿富汗所要抓捕的恐怖主义大亨拉登虽然于2011年5月被奥巴马总统宣布击毙，但美却借反恐之名在中亚

实现驻军并开始推行图谋深远的大中亚计划，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2003年4月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它一开始以“替天行道”为名，以伊拉克境内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借口，随后转向推翻萨达姆政权。这是美国不经联合国授权发动的赤裸裸的单边主义战争。这场战争违背了《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尊重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原则，开创了无视联合国权威的恶劣先例。

2011年3月，法、英、美战机空袭非洲国家利比亚，依然采用西方惯有的逻辑，即假借联合国授权，以“保护”平民免遭当局涂炭为借口。所谓的联军，主要是北约部队，一方面对卡扎菲政权的军队大打出手，另一方面对利比亚反对派给予各种形式的支持和援助，甚至公开讨论出动地面部队介入利比亚内部冲突的利弊得失！这种假借联合国授权介入别国内战，在政治、军事和外交等多个层面明显偏袒反对派的行为，再次暴露了西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双重标准和强权政治本性。

美国在对利比亚的空袭行动中没有冲在前面，而是有限参与，显得“犹抱琵琶半遮面”。但毫无疑问，美国是这次对利比亚军事行动的重要推手。冷战后美国之所以在世界上到处用兵，最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与之抗衡的另一超级大国苏联已不复存在，美国因而有恃无恐。它处理国际事务、应对地区战乱与国别冲突的根本原则，绝不是出于人道主义考虑。此次参与对利比亚的军事打击，也绝不是基于那里的“人道灾难”，而是旨在维护其“世界领导地位”，维护西方国家在利比亚和西亚北非地区的霸权主义利益。

苏联解体后，西方国家接连不断地发动战争遭到国际社会的质疑。近年来，随着一系列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呼声日益增强，反对强权政治和战争威胁、维护和平与稳定的力量有所增长，这对美国和西方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形成重大牵制。但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经济、科技、军事、文化和政治渗透力等方面依然具有很强的实力，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像当年的苏联那样率领东欧国家与西方集体对抗。因此，美国一超独

霸地位暂时还不会动摇，强权政治也不会在短期内消失，弱小国家遭受战争威胁和霸权凌辱的可能性也就难以排除。

三 西方试图以其价值观和经济模式一统天下，发展道路和模式较量更趋激烈

苏联解体使人类的社会主义发展进程在世界范围内陷入低潮。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只剩下中国、越南、老挝、朝鲜和古巴。在原苏联境内和东欧中南欧地区，美国和西方社会的所有政治元素——多党制议会民主、意识形态多样化等，成为俄罗斯乃至所有转型国家政治生态的标准符号。在拉丁美洲和非洲，许多原来以社会主义为取向的国家改变了政体，纷纷转行多党制、三权分立，政治多元化与经济私有化并行发展。一时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额手称庆。继美国前总统尼克松20世纪80年代即宣布西方“不战而胜”之后，美国国际问题专家福山在苏联解体后进而断言，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而自由民主制度则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在经济领域，西方大力推广所谓“华盛顿共识”，妄图以西方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一统天下。

然而，西方的政治家和政论家高兴得太早了，也高兴得过头了。在美国霸权主义和整个西方的强权政治大行其道的同时，另一个崭新的进程即世界多极化进程也在潜滋暗长。早在20世纪70年代，欧盟即已加快经济一体化、共同安全和防务建设，力求成为国际经济、政治中与美国旗鼓相当的一极。中国联合第三世界共同反霸，推动建立公正合理持久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以美苏两霸相互抗衡为基础的世界两极格局发生动摇，世界已逐步走向多极化。苏联解体使两极格局彻底终结，世界多极化进程在美国一超独存独霸的复杂形势中艰难推进。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作为迅速崛起的大国，与世界上各主要国家建立了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这种伙伴关系以不结盟、不针对第三国、平等互利为基础，带动国际关系形成一股新的潮流。与此同时，各种各样的区域性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这对美国维持其霸权、对西方推行强权政治也形成了一定的牵制。当前，美国在许多国

际组织中依然起主导作用，在国际规则制定方面依然拥有最大的话语权，依然试图凭借“超强”实力维持其“领导”的单极世界，而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等新兴大国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都主张构建一个多种力量并存、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多极格局，就连欧盟也不甘听任美国的“领导”和“指挥”。国际舞台上由此形成了“单极”与“多极”的矛盾和斗争。自然，由于实力对比和其他因素的制约，无论新兴大国还是各种形式的国家联盟或区域集团，目前还难以与美国全面抗衡，还难以有效牵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世界多极化注定还是一个充满曲折与反复的过程和趋势。

苏联解体后世界上的另一个重要趋向，就是经济全球化与政治多极化几乎齐头并进，世界各国各地区的经济联系更趋紧密。伴随着新科技革命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早在20世纪80～90年代，一批新兴市场国家即已开始经济“起飞”。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美国高盛投资公司研究人员所说的“金砖国家”，即中国、巴西、印度和俄罗斯。2009年6月，“金砖四国”首脑在俄罗斯会晤，首次就当今世界面临的一些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和看法，“金砖国家”机制得以形成。随着2011年4月南非总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三亚峰会，“金砖国家”机制进一步巩固和壮大。截至2010年，“金砖五国”人口规模、经济总量和贸易总量分别占全球的40%、16%和15%。与此同时，一大批中型国家也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佼佼者，如被国际研究和投资机构命名为“新钻11国”的韩国、墨西哥、越南、伊朗等，包括越南、印尼、南非在内的“展望五国”，包括哥伦比亚、埃及、土耳其和南非在内的“灵猫六国”等。这些大大小小的新兴经济体实力不断增强，对以美国和西方强权政治影响下形成的世界经济秩序构成了强烈冲击。人们越来越普遍地认为，尽管世界经济正在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各国间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但发展的现代化绝不等于西方化，在经济模式、政治体制、文化生活、对外政策取向等方面，不应一切以西方为楷模，各国应根据本国的情况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与道路间的竞争更加长期性、复杂化。

2008年底发端于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陷入发展的“冬天”。这场危机不仅使20年前全面转行西方发展模式的独联体和

东欧转型国家雪上加霜，就连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同样也陷入经济、社会、政治矛盾积重难返的窘境。这场危机实际上是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危机，预示着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可能破产。所以，连“历史终结论”鼓吹者福山最近也不得不哀叹：“这场全球金融危机让一些发展模式受到审判的话，那就是自由市场或新自由主义模式。危机凸显了资本主义制度——甚至像美国那样先进的制度——内在的不稳定性。”他还不得不承认，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即使没有完全丧失信誉，最起码已不占主导地位。很显然，苏联发展模式完全失败后，美国和西方极力推崇的新自由主义发展道路也难以成为可以随意效仿的唯一模式。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勇对挑战、顺势而为、坚持不懈地走自己的路，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共同构建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和睦与共荣的共治机制，将成为世界各国尤其是新兴大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最优先的选择。

四 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诱发“三股势力”，致使国际恐怖主义成为世界公害，国际社会共同反恐任重而道远

苏联解体后，尽管传统安全问题依然是世界各国关注的重心，但原先两极对立格局掩盖下的民族矛盾、领土纠纷、宗教冲突、资源之争普遍激化，非传统安全问题，如国际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毒品走私、经济危机、资源短缺、非法移民、环境恶化等问题日益突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正是两极格局瓦解导致了美国的单边主义升级和霸权主义膨胀，导致了西方国家的强权政治愈演愈烈。它们不仅以种种借口和手段干涉他国内政，在人权、主权、独立、领土完整等问题上推行双重标准，而且经常以武力方式打击弱小国家，以战争手段破坏别国的统一，瓦解一些主权独立国家的合法政权，在包括原苏联、东欧在内的许多地方扶植民族分裂势力。此举一方面引起国际社会对西方国家外交政策的反对和愤慨，另一方面在伊斯兰国家中催生出广泛的反美反西方情绪。有些极端势力和恐怖组织就是这样应运而生并寻机滋事的。它们在“反对西方强权，反对外来势力”的口号下四处出击，导致重大恐怖袭击案件频发，大量无辜平民死于非命，整个人类社会深受其害。2001年美国发生“9·11”事件后，国际恐怖主义的“潘多拉盒子”大口敞开，以“基地”为代表的头号

恐怖组织与世界上其他形形色色的恐怖组织彼此呼应，制造了一系列震惊世界的事件。从西亚北非到中亚、南亚、东南亚，从俄罗斯腹地到西欧、南欧直至美国，世界各地无处不笼罩着恐怖主义袭击的阴影，任何国家都无法摆脱恐怖主义袭击的威胁。如今的阿富汗、伊拉克已成为全球恐怖主义袭击的演习场，就连白俄罗斯最近也遭受了恐怖袭击的血腥之灾。国际社会普遍意识到，在诸多非传统安全威胁问题中，最值得关注的威胁来源于国际恐怖主义，国际联合反恐问题由此提上各国政府的日程。然而，美国借反恐之机谋一己之利，在全球范围内投棋布子，调整战略布局，谋求强化军事优势，“防止潜在对手为赶超美国而扩充军备”。这就为国际联合反恐增添了复杂因素，同时也成为近年来国际反恐斗争越反越“恐”，恐怖主义势力越来越多、越来越猖獗的主要原因之一。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所在地区，特别是中亚地区，是“三股势力”（即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的主要聚集区和活动区。以分裂我国新疆、破坏我国西部地区安宁与稳定为目的的“东突”恐怖势力，与国际恐怖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不仅接受国际恐怖组织的训练、武装和资助，不时在我国境内开展各种形式的恐怖行动，竟然还得到了美国和西方某些势力的姑息和支持。中国人民深受包括“东突”在内的“三股势力”的骚扰之痛，对美国和西方某些势力在反恐问题上推行双重标准深恶痛绝。所以，中国努力参与国际反恐合作，加入了绝大多数国际反恐公约，并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缔结了《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积极参与并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反恐机构开展相关活动。但是，应该看到，当前的恐怖主义与分裂主义、极端主义相互交织、同生共长，它们不仅植根于某些国家特定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土壤，而且还受到美国霸权主义和西方强权政治的刺激，得到西方双重反恐标准的庇护和怂恿。可见，反恐既需要国际社会的相互联手与通力合作，更需要摒弃冷战思维下形成的双重标准和利己主义目标。换言之，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不彻底废止，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滋生的条件就难以消除。国际反恐斗争的双重标准和一己私利不最终打破，国际社会就永无宁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反思20年前苏联解体这

一重大历史事件，人类社会获得的最深刻的启示是，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大国的衰亡，不仅导致世界社会主义退入低谷，而且使世界格局演进和力量对比关系变得扑朔迷离。但是，时代在发展，人类要进步，在新旧世纪过渡的历史新时期，任何国际格局的构建都必须符合国际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利益诉求，任何大国都不可能持久包办代替别国的选择，更不能用武力把自己的意志和价值观强加于别国。同时，各国的事情一定要由各国人民自己做主，各国的发展道路一定要由各国人民自己选择，国际上的事情应由各国以平等协商的方式加以解决。只有这样，国际社会才能最终克服苏联解体留下的伤痛，才能全面消除两极格局瓦解造成的种种后遗症，才能消除因一超独霸、单边主义和强权政治而导致的种种矛盾冲突，才能使各国真正实现和平、安定和发展，使国际关系和国际格局变得和谐、合理和稳定。

---

[1] 于洪君，中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

20年来美国中亚战略的基本路径

杨鸿玺 [1]

一 密切政治关系，引导中亚国家民主政治改革进程

苏联解体后，大部分中亚国家没有像美国所期望的那样全盘西化，“民主”成果不如东欧国家显著，个别国家重新出现集权特征。美国不希望也不愿意看到中亚卷入“伊斯兰风暴区”，更不甘心中亚重新沦为俄罗斯的势力范围。在美国看来，只有普遍建立“民主制度”才能切实保障中亚国家的独立地位。美国试图促使中亚国家实行“利伯维尔场经济”，按照西方模式实行经济改革 [2] 。通过中亚国家逐步真正地与西方融合，美国可以帮助它们解决面临的问题，为其政治改革创造条件、制定合理有益的经济政策 [3] 。“中亚—高加索与丝绸之路”研究项目主任弗里德里希·斯塔尔曾为欧亚问题专家理查德·维茨（Richard Weitz）的文章《欧亚国际政治中的哈萨克斯坦》撰写序言，指出了2008年值得关注哈萨克斯坦的进步与当前三个领域的现状：社会演变、政治改革和国际安全。斯塔尔认为，过去5年哈取得了苏联解体以来其他独联体国家无法取得的巨大成功。哈发展初期，只有极少数政治权力精英和最广袤农村地区，而今一个成长中的巨大中产阶层正在浮现，并正谋求在国家事务中发挥影响。石油成为促成这一变化的引擎，哈正在努力推进资源财富多元化。但不论如何，如果哈不进行谨慎改革和立法革新，即便是这一刚刚出现的好苗头也无法取得成功，就像哈不维持外交平衡就无法取得国家基本安全一样 [4] 。

在发展政治关系方面，中亚各国独立之初，美国与中亚领导人积极接触，派出大批高级官员访问中亚，同时邀请中亚各国领导人频频访美，逐步渗透、伺机促进中亚国家的政治和经济改革，拉拢并极力扶植亲美势力 [5] 。美国积极向中亚各国灌输美国式民主和价值观念，以期把中亚各国纳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体系，使中亚成为美国进

驻欧亚大陆的桥头堡 [6] 。20世纪90年代，美国与中亚国家高层交往不断，如美国副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部长、中央情报局局长等接连访问中亚国家。苏联解体不到半年，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贝克就在中亚展开穿梭外交，详细考察各国情况；随后，前国务卿基辛格、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主任布热津斯基、国务院开发署中亚地区署干事长巴克、美国国际开发署副主任达伊恩等政治和思想要人先后到访 [7] 。2000年4月，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访问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强调美国与中亚国家有“共同利益”，双方要加强政治、经济和安全合作 [8] ，并向上述三国分别提供300万美元反恐援助。尽管美国的援助附加政治条件，比如奥尔布赖特提出推进中亚民主进程，让中亚国家的领导人感到一定压力 [9] 。

中亚各国把发展对美关系看做融入国际社会、巩固国家地位、在国际舞台上站稳脚跟的重要支撑因素。美国是冷战后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是中亚各国借以在国际事务中寻求政治平衡、维护地区稳定的重要力量，因此它们基本把发展同美国的关系视为外交优先方面之一 [10] 。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多次访美，哈美先后签订《哈美民主伙伴关系宪章》、《哈美国际和军事交往相互谅解备忘录》等，哈萨克斯坦还成为第一个被美国承认是市场经济的独联体国家。美国与多数中亚国家成立了政府间混合委员会，协调政治、经济和军事关系。1996年6月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访美，双方签署多项经贸合作协议，两国关系迅速升温。1997年7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卡耶夫访美，美国表示要加强同吉尔吉斯斯坦在经贸、外交和安全领域的合作，支持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相比之下，美国更看重哈萨克斯坦的地位和影响，更加重视与其高层发展政治关系。参与“中亚-高加索与丝绸之路”研究项目的学者理查德·维茨对欧亚国际政治中的哈萨克斯坦予以高度评价。他认为哈拥有广阔的领土、比较多的人口和丰富的能源储备，国家在政治和种族方面保持相对稳定，外交技巧也比较娴熟。因此，哈已经成为推动欧亚地区经济与政治一体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领跑者。在纳扎尔巴耶夫领导下，哈官员实行多元化外交，寻求与多个重要域外大国以及跨国组织保持良好关系。而且在地区国家不断设想的欧亚联合发展规划中，哈已经作出具体努力，来推动地区

专门的经济、政治与安全合作[11]。

哈前外长托卡耶夫高度评价哈美关系发展，认为纳扎尔巴耶夫总统1994年2月对美国的正式访问进一步推动了双边关系发展。两国领导人签订了《民主伙伴关系纪要》，这是一个堪称为哈美在所有双边合作领域内奠定基础的纲领性文件。它第一次记录下了有关美国官方态度的语句：哈萨克斯坦的安全、独立、主权、领土完整以及民主发展对美国都具有最高意义。该文件规定了两国相互促进的意向，包括政治、经贸、国防安全、科学、生态、卫生、文化等各个方面。美国承诺，当哈遭受侵略或者面临来自核武器的威胁时，一定立即呼吁联合国安理会采取紧急行动。该文件是哈美在各个领域内相互促进的基础上，继续进行广泛合作的一个纲领性文件。该文件的签署无疑具有历史意义，它确定了哈与美国这个超级大国之间的伙伴关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纳扎尔巴耶夫总统的此次正式访美为哈的国际政治活动树立了一块里程碑[12]。

托卡耶夫认为，1997年11月哈总统正式访美再次推动了哈美关系进一步发展。双方希望扩展哈美合作范围、提高合作质量，重点发掘合作潜力并明确合作新任务。双方将双边关系定位为“战略伙伴”关系，都认为这是进一步加强哈安全、独立、主权、领土完整、民主发展，及该地区总体稳定与经济繁荣的关键所在。访问期间，哈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与美国总统克林顿、副总统戈尔、美国各重要部委领导举行了会晤，并召开了第四届哈美联合委员会年会。其间，双方还举办了题为“贸易投资潜力与哈国地缘政治战略重要性”的研讨大会。哈美签订《关于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议》、《两国海关互助互促协议》等18个双边文件，最值得一提的是《经济伙伴行动计划》，它是1994年达成《民主伙伴关系纪要》的有益补充。双方还签署了关于进一步开发油气资源的协议。托卡耶夫认为，美国公司在上述所有方面的领先地位都是不容争辩的事实，它们拥有一切哈方所必需的工艺、资金、经验及最新的管理方法[13]。

“9·11”事件发生后，美国国防部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国务卿鲍尔威、副国务卿博尔顿、助理国务卿琼斯、美参联会主席迈尔斯及各种

高级代表团纷纷访问中亚。仅向吉尔吉斯斯坦就派了10多个高级代表团。鉴于俄不反对美国在中亚反恐并提供支持，中亚国家领导人与美国高层互动就更为频繁。2002年1月，美国助理国务卿伊丽莎白·琼斯访问了中亚五国，代表美国政府向中亚各国承诺增加财政援助。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在会见琼斯时表示，愿与美国共同致力于建立两国间新型的双边关系。2002年3月，卡里莫夫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布什几次称乌兹别克斯坦是美国新的“战略伙伴”，美国希望与乌兹别克斯坦加强在安全、人权、政治和经济改革等领域的合作。美乌签署《美乌战略伙伴和合作宣言》，向乌兹别克斯坦提供5500万美元贷款 [14] 。美国重申将严重关切任何乌兹别克斯坦安全和领土完整面临的外来威胁。2002年12月，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莫诺夫访美，双方讨论了阿富汗问题以及中亚局势，签署包括军事合作协议在内的一系列重要文件，并在联合声明中确认将“进一步发展长期战略伙伴”关系 [15] 。2002年9月下旬，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卡耶夫访美，布什认为吉尔吉斯斯坦是美国反恐的重要伙伴。美吉发表联合声明强调维护中亚安全与稳定，美国帮助吉尔吉斯斯坦推进民主改革，促进吉尔吉斯斯坦经济发展。在原定向吉尔吉斯斯坦提供5200万美元安全援助基础上，追加4000万美元 [16] 。

美国通过高层访问与中亚各国领导人加深了相互理解，推动了在经贸、外交和安全领域的合作，巩固了美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美国还通过加强双边接触，积极向中亚输出美国的政治制度和民主价值观，并推进中亚国家的经济市场化和自由化。美国利用经济援助手段推行西方民主，平均每年向中亚提供22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和改革起步资金”，利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以提供优惠贷款为诱饵，要求这些国家按美国的意志实行“民主改革”。中亚国家的关键立法及政治制度框架甚至就是在美国专家的直接参与下完成的。在美与哈、乌、吉、塔总统的联合宣言中，美国也不忘强调其美式民主。除了签订促进民主的协议外，美国还说明它们制定和修改包括宪法及选举法在内的各种法律，组织和监督选举，支持独立媒体发展、开展各种教育交流等 [17] 。受美国影响，中亚国家在推进民主政治改革方面取得一定进展，极端反美势力未能撼动世俗政权，

俄也未能重新控制中亚国家[18]。

二 加强军事安全合作，推动地区多极化均衡

美国大力推进与中亚国家的军事安全合作，积极支持中亚国家争取独立自主、脱离俄的种种努力，力图使其加入西方体系。“9·11”事件前，美国通过北约与中亚国家之间的《和平伙伴计划》（1994年签署，塔吉克斯坦2002年2月加入）加强双边军事合作。1995年以来，中亚国家的军官和军队陆续参加在美国举行的《和平伙伴计划》军事演习，1997年美国军队正式参加中亚地区军事演习。人们将此类军事演习看做向伊斯兰极端势力发出信号[19]。“9·11”事件后美国大力加强与中亚国家的安全合作，2002年3月和9月，美乌、美吉分别签署类似的战略伙伴文件，加强反恐合作。

集中进行军事安全援助是美国中亚战略的重要内容和路径。美国对中亚的军事援助是通过美国《对外军事援助计划》（FMF）和《国际军事教育和训练计划》（LMET）实施的，援助范围涵盖中亚五国，援助内容包括购买美国武器、提供培训费用、物质与人道主义援助。美国以提供贷款和价格优惠的方式出口武器装备，通过拨款的方式提供军事教育和训练经费。2002～2004年，美国仅对乌的军事援助就达4.2亿美元[20]。军事援助有两个主要阶段，一是1994～1996年，以“合作减少威胁”着眼于消除哈的核武器威胁。据不完全统计，从20世纪90年代初至“9·11”事件前，美国共向哈、吉、乌军队提供3000多万美元直接军事援助，如加上间接或其他形式的援助，实际数字要大得多。为实现“中亚无核化”目标，1994年、1995年、1996年向哈分别提供0.56亿、0.97亿和0.47亿美元军事援助，哈于1996年彻底完成境内所有进攻性战略武器的销毁计划。二是反恐援助。美国对中亚国家的反恐援助可以追溯到1997年，但大规模反恐援助是在“9·11”事件之后，特别是在2001～2003年间。数额不菲的反恐援助对中亚国家很具吸引力，中亚多国允许美国使用其领空和军事基地[21]。

美国不断与中亚国家进行军事交流。从1996年起，美国先后与

哈、乌、吉等国签署大量军事合作文件。这些文件既有年度合作计划，也有长期合作协议。合作内容从美国为中亚各国培训军官、进行军队改革到提供军事援助、进行防御演习[22]。美国拿出专项资金资助中亚国家军事人员赴美交流或培训，尤其是军事高层往来频繁，国防部部长、参联会主席、美军中央战区司令等高官多次出访中亚，中亚各国防部部长和总参谋长也相继访美。美国还推动中亚国家军队作战和指挥体制转型，靠拢西方国家标准，实施手段是数十次的双边或多边联合军事演习。1999年10月，美国将以前由欧洲战区负责的中亚五国划归专门关注中东的中央战区负责指挥。美国还注重在中亚的情报信息工作，在哈建立了信息系统并为吉开通了3条通往美国及北约总部的卫星保密热线，情报信息交流不断加强。2000年4月初，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访乌期间，双方就加强军事和情报领域合作达成共识，美国同意乌使用其通信和侦察卫星。5月，美国帮助哈建立了情报信息中心，每年约300万美元费用由美国国防部负担[23]。

美国积极推进在中亚谋求军事基地战略。1996年初，美国驻北约代表访问中亚国家时，曾谋求在中亚建立军事基地没有成功，但美国并没有放弃。“9·11”事件使美国进军中亚梦想变成现实。美国以反恐名义进入中亚后，投入大量资金改造各机场设备，定期轮换驻中亚军队。时任美国国防部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认为，这些机场在美国的反恐战争中起到重要作用，并将在执行人道主义和军事使命方面继续发挥作用。2005年，吉政权发生更迭前后，拉姆斯菲尔德两次访吉，推动吉继续允许美国使用玛纳斯基地[24]。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认为，这些基地的作用“与其说是军事上的，不如说是政治上的”[25]。美国谋求驻扎中亚长期化。尽管2005年美国被迫从乌的汗纳巴德空军基地撤离，但继续使用在吉的玛纳斯军事基地[26]，2009年顶住俄的压力，以提高租金等手段继续以“物资转运中心名义”使用玛纳斯基地。

美国注意点面结合，培育个别战略支点国家，尤其重视与哈、乌两个中亚大国的军事安全合作。

美国切入中亚安全态势的重要一步是拉拢乌兹别克斯坦。1996年

塔利班在阿富汗掌权后，美乌安全合作逐步加强。美国从实用主义出发，暂时放弃对乌人权状况不佳的指责，乌总统卡里莫夫略作改革姿态，准备允许“建设性反对派”和独立报刊活动，美国随即表示与其改善关系。1998年2月，美—乌联合委员会成立。2000年2月，美国首次向中亚国家大规模提供军事装备，包括向乌提供16辆军事运输车辆[27]。乌在中亚人口最多，对俄离心倾向相对明显，同时与战乱不已的阿富汗、塔吉克斯坦为邻，深受极端势力侵扰，国内外的伊斯兰极端势力遥相呼应、一度猖獗。乌同美国发展关系有利于减轻这些压力，因此乌积极支持美国反恐[28]，同时希望借助美国的支持和伙伴关系，确立在中亚的地区大国地位并巩固政权统治[29]。1999年2月，乌宣布退出俄主导的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4月，乌兹别克斯坦与乌克兰、格鲁吉亚、阿塞拜疆、摩尔多瓦组建具有反俄倾向的“古阿姆”集团。“9·11”事件发生后，美乌进一步接近，乌密切配合美国的军事进驻和反恐行动。2001年10月，美国国防部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访乌，乌总统卡里莫夫同意向美军开放领空和提供军用机场，提供分别距离首都塔什干430公里、460公里和400公里的汉纳巴德、卡凯德和卡甘3个空军基地。12月，美国国务卿鲍威尔访乌，乌正式同意开放南部通往阿富汗的铁尔梅兹大桥。作为回报，美国则承诺打击在以阿富汗为训练基地的“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并给乌安全保证。乌也直接获得金钱利益，仅2001年度就从美国对外军事援助（FMA）款项中得到2500万美元，从不扩散、反恐等相关项目中得到1800万美元，从“支持自由法案”（FSA）基金中得到4050万美元[30]。2001年10月，卡里莫夫接见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弗兰克斯将军，双方强调在阿富汗反恐问题上进行合作的重要性。2002年2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迈尔斯将军访问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阿富汗，商讨扩大军事技术合作等问题[31]。卡里莫夫2002年10月在杜尚别出席中亚合作组织元首会晤时明确表示，美国在乌驻军的期限取决于中亚的和平与稳定，只要阿富汗局势不是完全正常，美国军队就有理由驻扎下去。2002年美国把给乌的军事援助在2520万美元基础上追加1100万美元[32]。

西方学者理查德·维茨认为，哈萨克斯坦在中亚安全中起到重要作

用。哈努力推动并签署中亚地区无核条约，积极参加俄、美和其他国家政府之间有关防止核原料走私的多边合作，积极参加多边或双边反恐行动，加强国家军事力量，服务于中亚安全与国际维和。哈官员和安全专家积极推动亚洲相互信任与合作会议进程（亚信会议），寻求模仿欧安组织机制来加强亚洲的安全机制 [33] 。阿富汗战争后，美乌军事合作最为密切，美国也一直加紧拉拢哈。2002年2月，美国特种部队士兵来到哈训练哈特种部队并进行情报交流。7～8月，在美军指导下，哈军在阿拉木图市近郊进行为期一个月的特种战术演习。2002年4月，美国国防部部长拉姆斯菲尔德7个月中第四次来访问中亚，美哈草签了紧急情况下使用哈三个机场的备忘录，美国将出资帮助哈实现军队现代化并改善里海岸边的军事基地。2002年8月，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弗兰克斯将军访哈，哈政府承诺将继续为国际反恐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希望2003年增派赴美学习的军人数量，并计划从美国进口先进武器装备，美国则向哈提供800万美用于购买军事技术 [34] ，并提供180万美元资助哈军人到美国学习。2003年，美哈签署《军事合作五年计划》，包括打击国家恐怖主义、发展维和部队、加强哈空军防御能力、在里海哈海域建立军事基础设施、成立军事外语学院、降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威胁、禁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 [35] 。

当然，美国没有忽视中亚周边国家及其他中亚国家。克林顿政府曾向中亚周边国家做了一些工作以间接影响中亚国家，比如加强与土耳其的合作并试图探讨同伊朗改善关系 [36] 。随着阿富汗形势日益严峻，2001年5月，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弗兰克斯将军访塔并接受塔方加入北约“和平伙伴计划”。美国不仅向塔军队提供武器装备，还帮助培训边防军人。2001年11月拉姆斯菲尔德访问中亚，塔允许美军使用塔的杜尚别-苦盏机场、库里亚布机场和库尔干-丘别机场，拉姆斯菲尔德同时表示美军将帮助塔建立边防体系、培训各级军官、更新通信设备并提供专项援助。2002年美向塔提供3980万美元无偿援助和军事装备 [37] 。吉尔吉斯斯坦方面，2002年1月美吉签署□2002～□2010年军事合作计划，吉尔吉斯斯坦收取大量机场劳务费和导航勤务费、补偿费 [38] 。2002年吉美军队在北约“和平伙伴关系”计划框架内举行军事演习，美国后来将给吉的军事援助在200万美元基础上追

加900万美元[39]。2004年，美吉签署《2005～2010年长期军事合作协议》，规定美国帮助吉提高反恐作战能力、训练特种部队和维和力量、发展空中机动力量、改善军事基础设施等[40]。土库曼斯坦奉行中立政策，但明确表示有限度提供领空，这对于美国来说已经足够[41]。

三 稳步推进与中亚国家的经济合作

美国通过提供有附加条件的经济援助与发展指导，通过政府和公司行为推进经济战略。经济援助是美国善加利用的一个法宝，也是美国在加强军事影响的同时付出的必要代价[42]。在美国对中亚整体战略中，经济合作更多的是一种手段和工具，美国希望借此促进中亚国家的经济独立，促使这些国家尽快确立市场经济体制，辅助建立以美国为模式的政治体制和亲美政权。2005年美国在中亚推行“颜色革命”遭遇重挫之后，更加重视通过经济合作重塑在中亚国家中的亲和力，并影响其外交政策[43]。可以说，对美国而言，经济利诱是对中亚国家为数不多的、能够立竿见影的有效外交工具之一；国力衰落的中亚国家也比较愿意接受美国的经济援助。

美国积极推动中亚国家与国际经贸体系接轨。美国认为，中亚国家为谋求长远独立与稳定、发挥潜力，必须与国际社会接轨，进一步增加透明度，尊重人权和民主运动。中亚经济发展潜力包括开发自然资源、推进利伯维尔场经济改革和吸引国外直接投资等方面，这将造福地区人民、促进地区能源多元化、推动地区国家融入世界经济体系[44]。因此，尽管获取能源非常重要，但这不是也不能是美国中亚战略的首要追求，更加自由的市场体系将夯实中亚国家的国内稳定与对外交往基础。美国要促使中亚国家开放市场、推动其给予前往投资的美国能源公司以优惠、推动中亚国家产品出口融入世界市场并以国际市场价格定价。如同美国向进入中亚国家市场一样，美国必须向中亚国家开放市场以配合其出口多元化战略[45]。美国著名欧亚问题专家奥尔科特（Olcott）指出，美国必须帮助中亚五国建立强有力的地区贸易市场，该地区贸易市场将为中亚的大量年轻人口创造就业机会，减少失业也就意味着减弱极端伊斯兰势力的吸引力。现有的跨境运输

壁垒阻碍构建中亚贸易区进程，必须最大限度发挥现有运输系统的功能。虽然中亚国家出于安全原因，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限制跨境流动，但必须鼓励中亚国家协同减少这些限制。

美国许多政策制定者坚持认为，必须加强与中亚国家的联系。美国在中亚的利益与土耳其等盟友并不完全契合，其他盟友只能提供有限援助，而美国作为超级大国有能力影响中亚国家的民主进程、促使其改善人权状况。美国带头向其提供人道主义和经济改革援助，有助于遏制伊斯兰极端主义扩张势头，减轻社会压力，并平衡俄中在中亚地区不断扩大的影响[46]。中亚四国1997年起接受美国的财政年度援助，2002年根据美国第97-19号总统令，塔吉克斯坦加入其中。涉及美国对中亚军事援助的主要项目和机构有：对外军事援助基金（FMF），国际军事教育培训项目（IMET），地区防务与反恐基金项目（CTFP），地区安全研究中心项目（RCSS）等。1999年美国中央司令部（USCENTCOM）接管对中亚的军事活动与援助项目计划（以前属于欧洲司令部）。中央军区司令和美国国防部部长等都曾于“9·11”事件后多次访问中亚[47]。

必须继续向所有中亚国家提供各类项目援助（不要计较有无人权记录）。美国应该坚信推动中亚各国国内社会和经济透明发展的重要性，既然“大棒”已经证明是无效的，那么就集中使用“胡萝卜”。美国绝不支持压制性的制度但必须推动下列设想：经济领域的法律透明，包括财产保护法和外资安全法；法律培训，包括根据西方课程和标准进行教育培训、判决培训和再培训；英语培训和中小学科技培训，特别是针对农村地区；扩大奖学金名额，资助中亚学生在美国完成高等教育；更加关注大学生就业[48]。

美国对中亚的经济援助涉及多个方面。通常而言，人道主义援助、经济社会改革、安全援助及推进民主化等方面所占份额最大，但不同年份援助的重点领域有所变化。人道主义援助是1992～1993年的援助重点，与经济社会改革有关的发展援助转而成为1994～2000年的援助重点。“9·11”事件之后至2003年，援助重点是以反恐为核心的安全援助。2004～2005年，推进民主援助所占份额有所上升[49]

。但2005年“颜色革命”失败后，美国推进“大中亚计划”，推进中亚南亚的经济合作成为援助新重点。奥巴马上台后恰逢美国遭遇金融危机，对中亚的经济援助力度相对削弱。

美国对中亚国家经济援助的管道与方式。早在1994年，克林顿政府就宣布了促进中亚投资和贸易计划，美国在能源、运输、建筑、采矿、无线电通信等领域具有优先投资合作权。1993年2月，根据互换外交照会，《贸易关系协议》正式启动运行。美国负责出资1500万美元用以解决咸海问题，向克孜罗尔德诊断中心提供全套医疗设备，包括制定安装净化装置的饮用供水方案、水资源管理等。为详细研究制订旨在稳定恢复咸海生态环境的拨款计划，1993年6月世界银行代表团向该项目首期拨款2.12亿美元，其中向哈提供5700万美元[50]。1997年以来，美国调整了“重经援、轻合作”的做法，扩大对中亚支柱产业特别是石油和天然气工业的投资力度[51]。美国比较重视拉拢哈、乌等中亚大国。美国与中亚的经济合作主要有三种方式：第一，通过投资、贷款等经济渗透方式，使中亚国家加深对美国的依赖；第二，通过合资、独资方式介入中亚国家经济事务；第三，对里海事务积极介入，在能源争夺中频频得手，对中亚油气产销的影响和控制不断上升[52]。美国运用的经济手段具有诱压结合的特点。“诱”是指利用中亚国家急于实现国家富强的心理，以经济援助、投资和免债为诱饵，使中亚国家在民主化改造方面让步。“压”是指通过停止援助、撤资和讨债以及对其国民经济命脉的控制，压迫中亚国家按照美国的要求进行民主化改造[53]。考虑到中亚国家的腐败现实，美国注意与公司、相关经济机构订立合同，由其履行援助项目或者支持相关国际组织进行多边援助，减少直接与中亚国家政府进行官方合作，且不单纯进行赠款援助。

美国把哈萨克看做与中亚发展经贸关系的重要桥梁，赞赏哈在推进欧亚一体化方面的努力。“中亚-高加索与丝绸之路”研究项目参与者理查德·维茨（Richard Weitz）指出，纳扎尔巴耶夫总统提出要把哈建成跨欧亚大陆的经济桥梁和地区发展发动机，因此积极推进欧亚地区多种层次的商贸密切合作，优先推进地区运输、管道和通信网络建设；减少海关和其他人为商贸壁垒；在加强欧亚地区劳动力流动管理

基础上，鼓励发展旅游和其他非政府交流；鼓励哈对欧亚其他经济体的私人投资，尤其重视通过合资企业的方式进行。哈已经从推进欧亚地区一体化中受益良多[54]。

四 大力推进与中亚国家的能源合作

苏联时期，里海地区的所有石油和天然气管道设计都要连接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阿塞拜疆早期石油生产规模不大，利用驳船和火车通过俄罗斯出口。伴随生产能力提高，两国需要新的运输线路通往世界市场。这些国家开始通过亲西方的外交政策并建设战略石油管线来平衡俄罗斯与中国的地区影响。美国在促进中亚地区合作与能源运输安全方面的作用和影响显著上升[55]。美国通过能源政策支持中亚国家的主权独立，加强其与西方国家的联系，带动美国的私人投资，并通过推动中亚的能源出口多元化强化西方的能源安全。美国还鼓励中亚地区的电力、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到南亚[56]。2007年美国“能源独立与安全法案”呼吁在国务院设置能源外交事务协调员。2008年1月，美国国务院设立欧亚能源外交协调员。2008年3月，美国国务卿赖斯任命负责经济、能源和农业事务的副国务卿鲁宾·杰弗里（Reuben Jeffery）为国家能源事务协调员。2008年4月时任助理国务卿鲍彻表示，中亚对于欧美的能源多元化供应意义重大，美国中亚战略将高度关注能源发展与多元化战略[57]。在美国与中亚国家的能源合作方面，克林顿和小布什政府有所不同，克林顿政府虽然也认识到中亚油气资源的重要性，但更多关注美国企业在中亚油气资源产销中的短期利益，维护美国相关企业的投资利益是其政策重点；而小布什政府中的谋士和重臣则从更长远、更全局的角度来制定对中亚能源战略，将其提到攸关美国能源多元和长期能源安全的角度[58]。克林顿政府多是通过美国企业的商业活动和纯粹经济手段来实现其能源政策，尽管也曾考虑和实施所谓“民主推进”，但力度较小；而小布什政府除运用经济手段外，还通过加强中亚国家的“民主政治”，在中亚保持军事存在，试图全方位保障对中亚能源战略的实施[59]。美国为弱化俄罗斯对中亚能源输出的控制，尽可能鼓励在东南西北建设多条能源出口线路。

一是向西的管道。BTC管道（巴库—第比利斯—杰伊汉管道），又被称为欧亚走廊（The Eurasian Corridor），被美国视为“泛中亚地区”油气输送摆脱俄罗斯控制的关键，将使地区能源产销对俄的依赖降到最小 [60] ，美国是最为积极的支持者，因为该管道主要是向欧洲等美国的盟友供油，并且绕过了博斯普鲁斯海峡，不受俄控制。该管道从阿塞拜疆的巴库经格鲁吉亚的第比利斯到达地中海沿岸土耳其的杰伊汉港口，全长1760公里，设计能力为每天输送石油100万桶。该项目自1997年9月5日提出，2002年9月开始动工，已经于2004年第四季度建成并于2005年输油。UE线路是天然气输送管道，基本上与BTC石油管道平行，在埃尔祖鲁姆（Erzumm）小镇与土耳其基础设施相连接。该管道主要输送产自阿塞拜疆气田的天然气，于2006年开始向土耳其输气 [61] 。哈萨克斯坦同时正在升级它在阿特劳（Atyrau）的港口，2007年8月哈与阿塞拜疆签署谅解备忘录，使用BTC作为额外的运输线 [62] 。

二是向东的管道。中哈石油管道一期工程已经开通并实现小规模输油，中土天然气管道于2009年底开通运行。然而，美国视挤压俄罗斯为中亚战略优先目标，同时对油气资源输入中国未尝没有担忧。2004年9月连接哈萨克斯坦阿塔苏和中国阿拉山口的石油管道开工，俄罗斯《分析论丛》月刊认为，美国越来越担心相当大的一部分里海石油循着“亚洲”线路流往经济实力日益增强的中国和印度 [63] 。

三是向南的管道。最终到达巴基斯坦沿海港口的石油线路估计全长为1040公里左右，输送能力可达每天100万桶石油，可以将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等国家的部分石油输送到亚洲。土库曼斯坦早就提出修建一条穿越阿富汗到达巴基斯坦或者印度的天然气管道。1996年10月，美国“尤诺卡”石油公司与土库曼斯坦政府签署议定书，授权美国公司组织国际财团，修筑土库曼斯坦经阿富汗到巴基斯坦的天然气管道。但该地区安全形势复杂，项目关键支持者之一、亚洲银行要求进一步论证其可行性，油气管道项目迟迟未开工，短期内建成希望不大，美国公司对其也信心不足 [64] 。与此同时，土库曼斯坦积极与伊朗合作建设天然气管道，建成后输气能力达到每年200亿立方米。

四是通往北部或西北部的管道。中亚国家独立后，很快就修建了两条通往西北的新管道，其中一条从阿塞拜疆的巴库延伸到俄罗斯的新罗西斯克港，另外一条是从巴库到格鲁吉亚的苏普拉，这两条管道的输送能力加起来为每天21.5万桶左右[65]。欧盟大力推动修建里海管道以减少对俄罗斯的依赖。2008年11月，欧盟国家提议修建从中亚穿越里海底部输送天然气到欧盟国家的管道，其中包括从土耳其东部至奥地利的纳布科（Nabucco）天然气管道专案。气源主要来自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该项目最终目标是每年向欧盟提供600亿～1200亿立方米天然气，相当于欧洲目前消费量的12%～25%[66]。

美国国会研究局欧亚问题专家吉姆·尼克比较形象地描述了美俄在中亚的能源争夺。他指出，2006年和2009年冬天俄两次切断向乌克兰供应天然气，充分暴露了欧洲的弱点，美国支持欧洲减少对俄的油气依赖，从中亚增加供应量。但俄控制着中亚现有的多数油气输出通道，中亚国家受到俄罗斯的压力，被迫将大量能源输往俄罗斯。普京2007年访问中亚之后企图强化这种控制，俄哈签署协议，哈萨克斯坦将向俄罗斯供应更多石油；普京还与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签署新建通往俄罗斯的天然气管道的协定。前者明显是要与美国推动的BTC管道进行竞争，后者则是与欧美支持的跨里海天然气管道相抗衡。当然，中亚国家也在努力摆脱俄罗斯的影响。2008年3月，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的天然气公司首脑宣布，将于2009年以欧洲天然气价格水平出口天然气，与俄罗斯天然气公司以该价格签署谅解协议[67]。

五 以多重手段推进“颜色革命”

美国综合采用软硬手段，通过明暗管道在中亚发起“颜色革命”，推进美国的民主价值观，推广美国的“软实力”，并一度产生轰动效应。主要步骤包括：利用选举争议作为突破口；利用媒体为“愚民”洗脑；用金钱培植反对派，扶持亲美政权[68]，利用非政府组织和大量资金进行渗透；利用各种机会和手段，培训和发展亲美势力；利用中亚国家民主体制上的缺陷，大造这些国家没有民主的舆论；利用和收买媒体，大肆宣传中亚国家领导人的腐败；如果没有当选，煽动选

民、制造动乱以推翻已选出的政府，重新进行选举[69]。

1.美国对中亚输出民主的主体

冷战后，国家和政府依然是主要的国际关系主体。以美国总统为首的行政机构、国会和联邦法院是民主输出的三大类政府主体，其中总统领导的行政机构占据首要地位，具体部门包括国务院、国防部、国际开发署、司法部、国家民主资助局、美国新闻署等一大批与美国外交有关的机构。总统、国务院等扮演了向中亚输出民主的主要角色，美国国际开发署全球援助的重点地区包括“欧洲和欧亚”，中亚五国包括在内。国会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举行政策听证会、推动立法并进行拨款方面。[70]

非主流国际关系主体，尤其是背景复杂、形形色色的非政府组织异军突起。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非政府组织与经济全球化同步发展，呈现爆炸性增长趋势，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西方的非政府组织独立于政府体系之外，不具有企业的营利性质，被称为继政府和企业之后的“第三部门”。2005年5月，美国总统布什参加国际共和研究所自由奖年度颁奖仪式时说：“为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推进民主、进行政权更迭，美国几乎耗费了3000亿美元；相反在策划上述几个国家‘颜色革命’过程中，美国仅仅花费不足46亿美元，少花钱、多办事，效果事半功倍。”[71]有些非政府组织背景相对模糊，也有学者把在中亚活动的西方非政府组织大致分为三类：有政府背景的、无政府背景的、介于两者之间的。它们可能有基金会、友好协会、文化交流中心、科研机构，也可能改头换面成为跨国公司和咨询公司等。三类非政府组织并行不悖，既各行其是，又互相勾连，从不同领域兴风作浪[72]。

以西方为背景的广大非政府组织成为美国推进民主战略的急先锋，中亚更不例外。在美国向中亚输出民主的过程中，美国政府机构和非政府组织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两者不是单独经营，而是彼此配合。美国政府在主权国家身份的掩护下，迫使中亚国家政府为美国的非政府组织在中亚当地活动打开方便之门，并提供力所能及的相应保

护；而美国的非政府组织可以弥补政府的不足，在政府机构力所不及或行动不便的领域开展活动，成为美国向中亚输出民主的重要补充[73]。两者彼此配合，以雄厚的军力、财力、人力和技术经验为基础，依托其操纵的大众传媒和地区组织分支，利用多种渠道向中亚传播美国的民主价值观、政治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74]。

2.美国对中亚“输出民主”的基本手法

第一，有针对性地通过一系列民主自由法案。1992年以来，美国国会先后通过帮助前苏联各共和国实行“民主过渡”的《支持自由法案》，敦促中亚国家“加速民主进程”的议案，以及针对独联体国家的《民主推进法》。1999年美国又提出“丝绸之路战略”法案，“9·11”事件之后更进一步成立“丝绸之路国会议员小组”，以期利用自己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加大对中亚国家“民主输出”力度，促进中亚美式“民主”的发展。2002年美国通过的《支持阿富汗自由法案》宣称，美国将与国际社会一道，在阿富汗和整个中亚地区根除恐怖主义，建立民主制度和公民社会。2003年5月，美国参议院通过决议案，提出美国总统、国务卿和国防部在同中亚国家领导人会晤中要敦促后者高度尊重人权和民主自由；美国提供的种种援助要同这些国家改善人权与推进民主化进程相联系；保证这些财政援助不被用于破坏人权的安全力量；美国计划对非政府组织和人士给予说明，以促进中亚社会更加开放。2005年10月，美国国务卿赖斯访问中亚五国，在塔吉克斯坦表示美国希望塔政府采取措施保证2006年总统选举公平、自由举行，在社会民主建设方面迈出重要一步[75]。

第二，利用大众传媒，控制舆论工具。一直以来，支持独立媒体和信息自由被置于美国对中亚政策的优先地位。美国十分重视为中亚民主派势力的成长壮大提供有利的舆论环境，其对舆论的操控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操控精英舆论，拉拢政府精英和技术官员，积极向其宣传西方民主制度的优势，说服国家领导人制造开放宽松的社会环境和建立民主制度。二是操纵社会舆论。美国十分重视收买大众媒体，利用其宣传西方民主化思想。美国援助的“国家民主协会”在吉尔吉斯斯坦有20个“公民社会中心”。民众可以聚会和免费阅读美国人主

编的俄语、吉尔吉斯语和乌兹别克语报刊[76]。苏联解体后，美国为填补中亚暂时出现的“意识形态真空”，对中亚加强思想攻势，比如在土耳其设立“独立解放电台”，在“美国之音”中增设对中亚的广播[77]，积极向中亚灌输西方价值观，传播其人权观念和道德标准。2003～2005年，舆论在“颜色革命”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舆论鼓噪促使许多民众走上街头支持反对派夺权。西方媒体利用传媒优势，在第一时间向全世界直播这些场景，协助反对派制造声势。长期受西方资助的当地独立媒体还不失时机爆出当权者的腐败“猛料”[78]。现代信息的流通速度和渗透力使各国当局防不胜防，美国充分利用手机短信、互联网等各种现代技术手段，散播现政权腐败、内讧等虚假信息，使民众丧失对现政府的信任和耐心[79]。

第三，提供大量援助，设立多种项目。从布什担任美国总统至2005年，已经将46亿美元用于推进世界民主改革，很多流向中亚。美国拥有的雄厚资金、先进技术和工艺是它与中亚国家发展双边或多边关系的基础，也能转换为协助在中亚推进民主的优势[80]。据不完全统计，1993～2003年，美国用于帮助中亚国家进行“民主改革”的专项援助就有90亿美元。最初这些“民主改革”方案主要借助各国政府来实施，但当发现各国政府并不能完全按照美国的意愿进行“民主改革”时，美国政府又将专项援助转向了中亚国家中的“年轻一代”[81]。据统计，自吉尔吉斯斯坦独立建国以来，美国向其提供的各种物资和资金援助总计7亿多美元。仅2004年，美国就向吉提供了1200万美元援助，其中为吉反对派提供了500万美元。吉“颜色革命”刚刚开始时，美国国务院新闻中心便发表声明，宣称布什政府将继续支持吉“经济和民主改革”，并将于2005年提供3100万美元援助。除了政府资助外，美国还通过政府资助的“民间机构”向吉反对派提供大量资金[82]。2005年2月吉议会大选的关键时刻，据称美驻吉大使向美政府提交报告，呼吁再拨款2500万美元支持吉反对派。2008年度预算中，美国拟向塔吉克斯坦投入人权援助资金59.1万美元。“自由之屋”向美国政府建议建立乌兹别克斯坦人权基金，并提高人权援助金额，即由2006年的140万美元提高到2008年的250万美元。美国通过国际共和研究所向土库曼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提供“民主化”资助。在

土库曼斯坦的民主化计划包括，在当地政府严格限制非政府组织活动的情况下建立相关机构，向土库曼斯坦的非政府组织和社会团体提供捐款，促进公民社会建设、公民教育和小区发展；保护妇女和少数民族权利；促进人权发展 [83]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设立的一些研究项目，重点针对中亚普遍存在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如较易引起群众不满的失业率、腐败、行政或司法部门专横等。这些研究成果将成为美国用来影响国内外公众，向中亚国家施加政治社会压力的资源 [84] 。

第四，软硬手段交替并用，借助同盟力量。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对中亚民主战略有“硬”有“软”、又“打”又“拉”，要么直接采取措施迫使其走美国设计好的政治民主化道路，要么综合运用其经济、政治和军事影响力，通过内部演变或外部诱引等手段引导其政治民主进程。这种组合策略在美国向中亚提供援助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中亚国家接受美国援助的前提是要满足美国提出的各项政治、社会改革要求以及民主政治标准。比如到2005年初，吉尔吉斯斯坦外债已有19亿美元之多。2005年3月巴黎俱乐部宣布免除吉政府所欠5.5亿美元债务中的1.24亿美元，但前提之一就是要考察吉社会“民主”、“人权”状况 [85] 。美国政府机构或者非政府组织还经常批评中亚民主、人权状况，给中亚国家造成国际或国内压力。美国指责乌兹别克斯坦当局于2005年5月血腥镇压安集延骚乱，要求乌兹别克斯坦接受国际调查。2005年10月，美国国务卿赖斯批评乌兹别克斯坦无视外国提出的人权要求，因此在其中亚之旅中“忽略”了乌兹别克斯坦。美国向中亚输出民主时还能倚重第三方的力量，许多西方国家和国际组织也参与其中，其中既有老盟友欧盟、日本、德国，也有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等“新民主国家”，后者为美国向中亚输出民主提供了新的选择途径 [86] 。美国还利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以提供优惠贷款为诱饵，附加先决条件，要求中亚国家按美国意志实行“改革”，鼓励它们摆脱俄罗斯的影响与控制，走“民主化”、“自由主义经济”、“政治多元化”之路 [87] 。

3.异军突起的非政府组织尤其不可忽视

在美国财力支持下，非政府组织在中亚发展迅速并呈现新特点，其政府色彩越来越浓，越来越积极地参与当地政治，日益扩大影响 [88] 。塔吉克斯坦1991年只有53个非政府组织，而2005年有595个非政府组织，最初其活动范围只限于首都杜尚别及其毗邻地区，很快及于索格达州、哈特隆州、戈尔诺-巴达霍尚州 [89] 。在吉尔吉斯活动的非政府组织有1010个，在吉所有地区活动 [90] 。哈萨克斯坦国内登记了699个组织，在哈所有地区和大城市活动 [91] 。另外，在土库曼斯坦有138个、乌兹别克斯坦有472个。这些组织大多有美国背景且受到美国国际发展局（USAID）等机构资助或直接领导，以参与政治为目的，比较有影响的有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学院、“索罗斯基金会”和“自由之屋”，还包括“国际之声”、“青年人权团”、“和平队”、“丝绸之路基金会”及“中亚网络观选组织”等。它们遍布中亚各个角落 [92] 。2005年，吉政局突变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但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就是大量西方非政府组织的长期渗透和暗中策动 [93] 。吉发生“郁金香革命”之前很久，索罗斯基金会下属的吉“开放社会研究所”就为在该国推行“民主”做了大量工作。另有统计，吉人口只有500万，却存在着5000多个非政府组织，多数并未登记 [94] 。吉较为著名的女权运动论坛就是由美国资助的。美国亚洲协会等机构还对哈总统女儿领衔的欧亚传媒论坛进行资助和推广 [95] 。

非政府组织有自己做工作的优势，它们的声音越来越大，利用民间去说，比如学者去说，艺术家个人去说，用自己的语言说，效果会很不一样 [96] 。这已经成为美国对外推进价值观的重要管道。实际上，民主、自由、平等、人权多是来自西方的意识形态概念，这些权利在美国等西方国家自身也经历了曲折痛苦的争取和演变，并非与生俱来、一蹴而就。美国有些人权理论说到底是没有办法服人的，因为它们原来的发展道路很多时候是建立在掠夺、殖民、侵略上，至少是不平等的贸易关系上 [97] 。但美国注意回避这些幕后事实，在推行西方理念方面非常注意方法和潜移默化。表面上美国媒体自由，但实际上美国媒体对国家利益的认同度和捍卫国家利益的自觉性都非常高，它们对政府的批评一般不会伤及国家的根本利益 [98] 。有专家将在中亚活动、有美国背景的非政府组织分为组织论坛型、网络参与型、情

报搜集型、直接介入型四类 [99] 。而具有上述四种类型特征的是“索罗斯基金会”，该基金会由美国金融大鳄索罗斯创立，目标是在独联体国家推广西方价值观，进行“民主”渗透。其活动包括培训反对派、资助独立媒体、监督司法体系、举办国际研讨会、搜集情报等政治内容，也包括完善医疗体系和教育体系、扶持中小企业等社会、经济内容 [100] 。美国政府机构与非政府组织在中亚活动的领域各有侧重。“颜色革命”后，非政府组织在国际和中亚国内受到许多指责，为避免在中亚国家的活动受到更多限制，它们很多隐去美国的敏感身份或者淡化与美国的联系，有的甚至改头换面，如“索罗斯基金会”改变了过去直接资助一些当地“民主活动”的方式，而是在其他地方注册了很多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屋”也在2005年5月改名为“自由之声”，继续在中亚活动 [101] 。

---

[1] 杨鸿玺，中国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

[2] 耶斯尔：《“9·11”前后美国的中亚政策研究》，新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

[3] Stephen J.Blank，“Energy，Economics and Security in Central Asia：Russia and Its Rivals”，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U.S.Army War College，1995.

[4] Richard Weitz，“Kazakhstan and the New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Eurasia”，*Central Asia-Caucasus Institute & Silk Road Studies Program*，A Joint Transatlantic Research and Policy Center，Johns Hopkins University；Institute for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Policy，Sweden，www.silkroadstudies.org.

[5] 王春永、申华：《美国的新中亚战略及中亚地区战略格局走向分析》，《俄罗斯研究》2001年第1期。

[6] 耶斯尔：《“9·11”前后美国的中亚政策研究》，新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

[7] 王莉：《浅析9·11后中亚形势的变化对中国安全态势的影响》，《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

[8] 赵学功：《当代美国外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第89～90

页。

[9] 常玢：《美国的中亚战略探析》，《兰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

[10] 常玢：《美国的中亚战略探析》，《兰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

[11] Richard Weitz，“Kazakhstan and the New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Eurasia”，*Central Asia-Caucasus Institute & Silk Road Studies Program* ，A Joint Transatlantic Research and Policy Center，Johns Hopkins University；Institute for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Policy，Sweden，www.silkroadstudies.org.

[12] 〔哈〕卡·托卡耶夫：《哈萨克斯坦：从中亚到世界》，〔哈〕赛力克·纳雷索夫译，新华出版社，2001，第210页。

[13] 〔哈〕卡·托卡耶夫：《哈萨克斯坦：从中亚到世界》，〔哈〕赛力克·纳雷索夫译，新华出版社，2001，第212页。

[14] 孙壮志：《中亚安全与阿富汗问题》，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第234页。

[15] 孙壮志：《中亚安全与阿富汗问题》，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第236页。

[16] 孙壮志：《中亚安全与阿富汗问题》，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第235页。

[17] 伏文艳：《论中亚地区民主化进程中的美国因素》，新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18] 成宁：《美国在中亚地区的战略利益及美俄争夺该地区的新态势》，《东欧中亚研究》2002年第3期。

[19] Jim Nichol，“Central Asia’s Security：Issues and Implications for U.S.Interests”，Prepared for Members and Committees of Congress，Februrary 25，2009，http：//www.fas.org/sgp/crs/row/RL30294.pdf.

[20] 李淑云：《地缘政治与中亚五国民族问题》，辽宁人民出版社，2007，第234页。

[21] 郑羽：《中俄美在中亚：合作与竞争（1991～2007）》，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2007，第267页。

[22] 李淑云：《地缘政治与中亚五国民族问题》，辽宁人民出版社，2007，第233页。

[23] 王春永、申华：《美国的新中亚战略及中亚地区战略格局走向分析》，《俄罗斯研究》2001年第1期。

[24] Erica Marat，“Rumsfeld in Kyrgyzstan：Halting America’s，Faltering Position in Central Asia”，*Central Asia-Caucasus Institute Analys*，27 July，2005，http：//www.cacianalyst.org/？q＝node/3241.

[25] 转引自李淑云《地缘政治与中亚五国民族问题》，辽宁人民出版社，2007，第235页。

[26] 李淑云：《地缘政治与中亚五国民族问题》，辽宁人民出版社，2007，第235页。

[27] 郑羽：《中俄美在中亚：合作与竞争（1991～200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第357页。

[28] 孙壮志：《中亚五国对外关系》，当代世界出版社，1999，当代世界出版社，1999，第140页。

[29] 常玢：《美国的中亚战略探析》，《兰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

[30] 郑羽：《中俄美在中亚：合作与竞争（1991～200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第361页。

[31] 孙壮志：《中亚安全与阿富汗问题》，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第236页。

[32] 孙壮志：《中亚安全与阿富汗问题》，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第238页。

[33] Richard Weitz，“Kazakhstan and the New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Eurasia”，*Central Asia-Caucasus Institute & Silk Road Studies Program*，A Joint Transatlantic Research and Policy Center，Johns Hopkins University；Institute for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Policy，Sweden.www.silkroadstudies.org.

[34] 孙壮志：《中亚安全与阿富汗问题》，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第237

页。

[35] 李淑云：《地缘政治与中亚五国民族问题》，辽宁人民出版社，2007，第234页。

[36] 孙壮志：《中亚五国对外关系》，当代世界出版社，1999，第134页。

[37] 郑羽：《中俄美在中亚：合作与竞争（1991～200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第361页。

[38] 王桂芳：《中亚战略格局与中国安全》，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第81页。

[39] 孙壮志：《中亚安全与阿富汗问题》，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第238页。

[40] 李淑云：《地缘政治与中亚五国民族问题》，辽宁人民出版社，2007，第234页。

[41] 王桂芳：《中亚战略格局与中国安全》，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第77页。

[42] 王桂芳：《中亚战略格局与中国安全》，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第81页。

[43] 郑羽：《中俄美在中亚：合作与竞争（1991～200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第281页。

[44] Federal News Service，“Testimony of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Democracy，Human Rights，and Labor Lorne W.Craner，to the U.S.Commission on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June 24，2004.

[45] Stephen J.Blank，“U.S.Interests in Central Asia and Their Challenges”，House 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July 25，2006，http：//www.highbeam.com/doc/1G1-167979786.html.

[46] Jim Nichol，“Central Asia’s Security：Issues and Implications for U.S.Interests”，Prepared for Members and Committees of Congress，Februrary 25，2009，http：//www.fas.org/sgp/crs/row/RL30294.pdf.

[47] Jim Nichol，“Central Asia’s Security：Issues and Implications for U.S.Interests”，Prepared for Members and Committees of Congress，Februrary

25，2009，http：//www.fas.org/sgp/crs/row/RL30294.pdf.

[48] Martha Brill Olcott，“U.S.Policy in Central Asia：Balancing Priorities”（Part II），Testimony prepared for the 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earing on the Middle East and Central Asia，April 26，2006，Prepared by，Senior Associate，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http：//www.internationalrelations.house.gov/archives/109/olc042606.pdf.

[49] 郑羽：《中俄美在中亚：合作与竞争（1991～200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第254页。

[50]〔哈〕卡·托卡耶夫：《哈萨克斯坦：从中亚到世界》，〔哈〕赛力克·纳雷索夫译，新华出版社，2001，第209页。

[51] 王春永、申华：《美国的新中亚战略及中亚地区战略格局走向分析》，《俄罗斯研究》2001年第1期。

[52] 翁明：《美俄对中亚五国的争夺》，2001年4月5日《中国经济时报》。转引自徐亚清《中亚五国转型研究》，民族出版社，2003，第227页。

[53] 郑羽：《中俄美在中亚：合作与竞争（1991～200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第150页。

[54] Richard Weitz，“Kazakhstan and the New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Eurasia”，*Central Asia-Caucasus Institute & Silk Road Studies Program*，A Joint Transatlantic Research and Policy Center，Johns Hopkins University；Institute for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Policy，Sweden，www.silkroadstudies.org.

[55] Pinar Ipek：“Challenges for Democratization in Central Asia：What Can the United States Do？”*Middle East Policy*，March 22，2007，http：//findarticles.com/p/articles/mi_qa5400/is_200704/ai_n21284816/.

[56] Jim Nichol，“Central Asia：Regional Developments and Implications for U.S.Interests”，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CRS）Report for Members and Committees of Congress，form Approved OMB No.0704-0188，April 17，2009，https：//www.policyarchive.org/handle/10207/2845，http：//www.au.af.mil/au/awc/awcgate/crs/ib93108.pdf.

[57] Jim Nichol，“Central Asia：Regional Developments and Implications for U.S.Interests”，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CRS）Report for Members and Committees of Congress，form Approved OMB No.0704-0188，April 17，

2009，https：//www.policyarchive.org/handle/10207/2845，http：//www.au.af.mil/au/awc/awcgate/crs/ib93108.pdf.

[58] 郑羽：《中俄美在中亚：合作与竞争（1991～200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第328页。

[59] 郑羽：《中俄美在中亚：合作与竞争（1991～200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第329页。

[60] 杨光、陈沫：《中东非洲发展报告No.8（2004～2005）：防范石油危机的国际经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第126页。

[61] 杨光、陈沫：《中东非洲发展报告No.8（2004～2005）：防范石油危机的国际经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第126页。

[62] 韩隽：《“安集延事件”后美国中亚政策的调整及影响分析》，《新疆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

[63] 任瑞恩、董晓宾：《美国中亚战略咄咄逼人 中国须重建“丝绸之路”》，2005年3月15日《国际先驱导报》。

[64] 杨光、陈沫：《中东非洲发展报告No.8（2004～2005）：防范石油危机的国际经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第128页。

[65] 杨光、陈沫：《中东非洲发展报告No.8（2004～2005）：防范石油危机的国际经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第128页。

[66] 英国《金融时报》乔舒亚·查芬（Joshua Chaffin）和艾德·克鲁克斯（Ed Crooks）2008年11月17日报道《欧盟拟修建里海天然气管道》，http：//www.oilchina.com/syxw/20081118/news200811180“9·11”0914540.html。

[67] Jim Nichol，“Central Asia：Regional Developments and Implications for U.S.Interests”，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CRS） Report for Members and Committees of Congress，form Approved OMB No.0704-0188，April 17，2009，https：//www.policyarchive.org/handle/10207/2845，http：//www.au.af.mil/au/awc/awcgate/crs/ib93108.pdf.

[68] 龙小农：《“颜色革命”的背后：透视美国的中亚战略》，《环球视野》2005年第4期。

[69] 刘国平：《美国民主制度输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第186页。

[70] 马斌：《冷战后美国向中亚输出民主的过程与效果评估》，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71] 李立凡、刘锦前：《美国中亚战略棋盘上的非政府组织》，《国际问题研究》2005年第6期。

[72] 仲轩：《国际非政府组织与中亚色彩革命》，《新疆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

[73] 马斌：《冷战后美国向中亚输出民主的过程与效果评估》，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74] 马斌：《冷战后美国向中亚输出民主的过程与效果评估》，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75] 伏文艳：《论中亚地区民主化进程中的美国因素》，新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76] 邢广程：《2005年：应对挑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第33页。转引自郑羽《中俄美在中亚：合作与竞争（1991～200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第150页。

[77] 郑羽：《中俄美在中亚：合作与竞争（1991～200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第267页。

[78] 仲轩：《国际非政府组织与中亚色彩革命》，《新疆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

[79] 仲轩：《国际非政府组织与中亚色彩革命》，《新疆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

[80] 马斌：《冷战后美国向中亚输出民主的过程与效果评估》，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81] 奉继华、宋蕾：《浅议美国对中亚国家的民主改造》，《阴山学刊（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

[82] 祝政宏：《试论“9·11”后美国对中亚地区安全作用的多重性》，《新疆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

[83] 文丰：《“大中亚”计划与美国国际非政府组织》，《新疆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

[84] 马斌：《冷战后美国向中亚输出民主的过程与效果评估》，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85] 马斌：《冷战后美国向中亚输出民主的过程与效果评估》，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86] 马斌：《冷战后美国向中亚输出民主的过程与效果评估》，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87] 陈佳：《试析冷战后美国在中亚的“民主化”战略》，《哈尔滨市委党校学报》2008年第5期。

[88] 李立凡、刘锦前：《美国中亚战略棋盘上的非政府组织》，《国际问题研究》2005年第6期。

[89] 王一程、黄平：《中俄政治改革与发展》，新华出版社，2006，第241页。

[90] 王一程、黄平：《中俄政治改革与发展》，新华出版社，2006，第243页。

[91] 王一程、黄平：《中俄政治改革与发展》，新华出版社，2006，第245页。

[92] 李立凡、刘锦前：《美国中亚战略棋盘上的非政府组织》，《国际问题研究》2005年第6期。

[93] 仲轩：《国际非政府组织与中亚色彩革命》，《新疆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

[94] 陈达：《颜色革命：中亚面临的现实抉择》，兰州大学出版社，2007，第119页。

[95] 李立凡、刘锦前：《美国中亚战略棋盘上的非政府组织》，《国际问题研究》2005年第6期。

[96] 黄平：《中国在21世纪上半期的国际环境与战略选择》，《天涯》2008年第7期。

[97] 黄平：《中国在21世纪上半期的国际环境与战略选择》，《天涯》2008年第7期。

[98] 黄平：《中国在21世纪上半期的国际环境与战略选择》，《天涯》2008年第7期。

[99] 李立凡、刘锦前：《美国中亚战略棋盘上的非政府组织》，《国际问题研究》2005年第6期。

[100] 李立凡、刘锦前：《美国中亚战略棋盘上的非政府组织》，《国际问题研究》2005年第6期。

[101] 马斌：《冷战后美国向中亚输出民主的过程与效果评估》，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关于俄罗斯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

李福川 [1]

一 俄罗斯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基本特征

俄罗斯社会市场经济模式有以下三个基本特征。

1.混合所有制结构

与许多转型国家一样，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初以私有化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型，在21世纪初基本结束大规模私有化，并建立起了基本的市场经济基础设施。

与1977年苏联宪法不同，1993年俄罗斯宪法没有设“国家经济制度”章节，但规定了包括混合所有制在内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经济原则。

（1）国家承认和平等保护国家所有制、地方自治体所有制、私有制及其他所有制。国家保障统一经济空间，保障商品、服务和资金自由流动，保障经济活动自由。国家支持竞争（第8条）。

（2）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是人民生活的基础，可以开发并受国家保护。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可以私有、国家所有、地方自治体所有，也可以有其他所有制形式（第9条）。

（3）人人有权自由利用自己的才能和财产，从事法律不禁止的经济活动。禁止垄断性经济活动和恶意竞争（第34条）。

（4）财产私有权受法律保护。人人有权拥有个人财产，可独立也可与他人一起使用和支配这些财产。非法院裁决，任何人的财产不得被剥夺。如因国家需要强制占有私人财产的，必须平等补偿。国家保护财产继承权（第35条）。（5）个人有权拥有私人土地。在不对

自然环境造成损害，不损害其他人权利和合法利益的前提下，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由所有者自由使用和支配。土地的使用条件和制度由专项联邦法律规定（第36条）。

俄罗斯宪法规定的平等保护多种所有制，既是市场经济也是社会市场经济的最重要基础。根据对俄罗斯统计年鉴中的数据进行的测算，2009年公有制占全国固定资产的40%（未计集体所有制，下同）。其中国家所有制的两种形式，即联邦所有制和联邦主体所有制合计占22%，地方自治体所有制占18%。俄罗斯的地方自治体是指除莫斯科市和圣彼得堡市以外的所有城市以及基层地方自治体。所以，这里的俄罗斯公有制接近一些国家的国家所有制。

俄罗斯统计年鉴中的数据还表明，公有制占全国固定资产40%的比例是近20年来俄罗斯在私有化过程中保持的基本底线。目前，国家借助国有企业掌控着约50%的国内生产总值[2]。由于近年建立了大量中小私企，国有企业数量占比降到了8.2%，但在国企就业人数占全部就业人数比例高达31.5%。这样，即便不考虑大量合作制集体企业的因素，也可以认定，俄罗斯已经确立了多种所有制结构，且以公有制为主导。

无论是公有制的固定资产占比，还是国营企业就业人数占比，俄罗斯均高于许多市场经济国家。如果这两个基本指标有助于说明经济的性质，那么对于认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建立起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同样也是重要的。

2.混合调节制度

社会市场经济要求国家调节与市场调节有机结合。国家调节是为了保障市场经济的社会方向，以及保护居民利益免受市场经济自然力量的侵害。在俄罗斯，国家调节的手段不仅有税收调节、预算调节、货币调节、价格调节、计划调节，还有行政调节。俄罗斯联邦经济发展部是专门从事国家计划调节的职能机构，相当于国家计划委员会。俄罗斯联邦经济发展部负责进行国家社会经济发展预测、制定国家社

会经济发展规划、制定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制定和管理社会经济领域的联邦专项纲要和联邦定向投资纲要、实行国家宏观经济调节。了解俄罗斯联邦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预测、规划和纲要，是研究俄罗斯经济的必修课。行政调节是很具有俄罗斯特色的国家经济调节手段。以行政调节抑制通胀为例。2010年7月，为抑制粮食减产引起的相关产品价格上涨，俄罗斯联邦政府通过决议，规定了对居民生活最重要的食品实行最高零售限价的规则和清单[3]。实行商品最高零售限价的规则是，如果在一个或数个地区，30天内一种食品价格上涨幅度达到或超过30%，将由联邦政府在此后的90天内对该种食品实行最高零售限价。这一措施有效防止了不法商人囤积居奇，串通哄抬价格，保护了广大居民的利益。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俄罗斯联邦政府直接管到了居民菜篮子里的马铃薯和胡萝卜，体现了联邦政府行政调节措施的具体性和针对性，表现出保护居民利益和维持社会稳定的原则高于“市场原则”。俄罗斯的做法表明，为了保护居民利益，他们习惯于使用非市场调节手段，不会在乎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的批评和来自境外的议论。俄罗斯实行国家价格调节的还有民用天然气、居民用电、居民用水、供暖、市内交通费、固话费等一系列与民生有关的商品和服务。

3.有利于所有居民的分配制度

俄罗斯宪法规定，联邦政府负责执行联邦预算，保障实行国家统一的文化、科技、教育、医疗、生态和社会保障政策（第114条）。俄罗斯基本继承了社会主义苏联时期的社会保障制度，所有居民可享受免费的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机构对任何人（含外国人）的医疗急救都是免费的。所有居民（含农村居民）可以获得基本养老金。所有儿童和学生可享受11年制义务教育，所有高中毕业生有权经考试竞争后获得免费大学教育。所有居住在苏联时期分配住房的居民可无偿获得房屋所有权，俄称“住宅无偿私有化”。所有年轻家庭都可向政府申请购房补贴或贷款帮助。所有生育二胎及以上的妇女都可获得政府1万美元补助，俄称“母亲资本”。

与许多转型国家一样，俄罗斯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也是私有化的过程。无论政府采取怎样的措施，国有资产流失仍是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几乎所有转型国家的普遍现象。在私有化过程中，与国有资产流失相关的腐败现象形形色色，出现了巨富阶层，广大普通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甚至下降，出现了严重的社会两极分化，这成了转型国家为转型被迫付出的道德代价。所以，在转型的基本任务完成后，且在经济和财政收入增长的条件下，转型国家主动对居民进行普遍补偿是合理和必要的。目前俄罗斯强调优先发展社会领域，坚定地执行有利于所有居民的分配政策，既是对居民的国家补偿，也是在健全社会市场经济和建设社会国家。

多年来，俄罗斯居民实际收入的增长一直超过GDP的增长。如2000～2009年俄罗斯GDP由2000亿美元增加到了约15000亿美元，增长了6.5倍，同期月平均工资由50美元增加到了700美元，增长了13倍[4]。尤其典型的是，在国际经济危机条件下，尽管俄罗斯经济在2009年下降将近9%，但由于实行有利于大多数居民的分配政策，俄罗斯贫困人口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在减少。2010年6月世界银行驻俄机构发表的报告指出，由于俄罗斯政府实行的社会经济政策，贫困人口比例在2007～2009年分别为15.5%、12.6%、12.1%，并预计2010～2011年将下降到10.2%和8.6%[5]。俄罗斯贫困人口是指收入低于最低生活水平线的居民。俄罗斯政府根据生活成本的变化，不断提高最低生活水平线。2011年俄罗斯有劳动能力者的最低生活水平线为月6157卢布（合205美元，约每人每天6.84美元）[6]。

俄罗斯分配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不断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使其与最低生活水平线接近。2011年1月，俄联邦政府向国家杜马提交法律草案，把最低工资由4430卢布提高到5960卢布，约为相应最低生活水平线的96.8%[7]。2012年是总统选举年，最低工资很有可能超过最低生活水平线，这将意味着俄罗斯社会政策和收入分配政策的一项重要成就。

俄罗斯居民在共享经济增长创造的财富。2008年俄罗斯的基尼系数为0.412[8]。尽管这一反映社会分化的指标远算不上最好，但已经

好于往年，也好于其他部分转型国家。事实表明，近10年来，俄罗斯一直在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努力。尽管速度还不能让所有人满意，但他们确实在这样做。

公有制为主体和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上述分析表明，俄罗斯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与这些原则有许多相似之处。

二 俄罗斯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价值基础

宪法是集中体现国家最高价值（высшая ценность）的最高形式。“宪法是政治、法律和意识形态文件。宪法的意识形态特征就在于其体现社会的核心价值。没有意识形态的宪法是不存在的。”[9]

1993年俄罗斯以全民公决形式制定了《俄罗斯联邦宪法》，也称“1993年宪法”，有着最高的权威性和最广泛的代表性。宪法第二条宣示：“人，人的权利和自由是最高价值。承认、尊重、保护人和公民的权利和自由是国家的义务。”[10] 这里的人是指所有俄罗斯人，不分出身、民族、信仰、性别、职业、城乡和地域。

俄罗斯最高价值是人的权利和自由，不再是阶级集团利益和（或）国家利益。与苏联宪法相比，俄罗斯人的权利有所扩大，如有权拥有包括土地在内的私人资产，有权从事法律所不禁止的经济活动等。人在政治和精神上是自由的，在经济上也是自由的。“1993年宪法是俄罗斯最重要的成就之一。”[11] 在俄罗斯近18年的发展过程中，尽管有过各种相互对立的政党和派别，但都尊重1993年宪法。这是俄罗斯多元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难得的现象。如果说在建立新的政治和经济制度过程中，俄罗斯没有发生“颜色革命”是一个重要成就，那么其基础就是1993年宪法。

俄罗斯宪法宣示的国家最高价值是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价值基础。这些最高价值体现在俄罗斯联邦法律、地方法律、总统令、总统国情咨文、政府决议、国家学说、发展构想、联邦预算和联邦各领域发展纲要等方面。

俄罗斯是社会主义苏联的国际法主体继承国。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继承了苏联的《世界人权宣言》、《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欧洲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公约》签署国的义务 [12]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规定，缔约国应在资源许可范围内，尽最大努力逐步全面实现公约规定的本国居民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无论在法律上还是在实践上，俄罗斯与社会主义苏联的继承性主要体现在国家承担广泛的社会保障义务上。

三 俄罗斯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与社会国家

俄罗斯宪法第七条规定：“俄罗斯是社会国家（социальн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并规定社会国家要“创造条件，保障人人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和能够自由发展。社会国家保护人的劳动和健康，制定有保障的最低工资，保障家庭、母亲、父亲、儿童、残疾人和老人获得国家帮助”。宪法确定的国家最高价值决定了俄罗斯国家的性质。

宪法是国家经济制度的法的基础，也是俄罗斯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法律基础。在社会国家里，国家要对人的社会权利提供宪法保障，政府为保障人的社会权利承担宪法义务。社会国家是以社会发展为目标的（以社会为取向的）国家类型。社会国家的经济政策目标是满足社会需要 [13] 。社会国家的社会经济特征是，具有多种经济形式，所有居民享有完善的社会保障，国家坚持社会公正原则 [14] 。社会国家要求政府在能力范围内，向本国居民提供一定水平的生活保障，满足本国居民的物质和文化需要 [15] 。而实现人的权利和自由的程度和范围，取决于社会的物质基础、经济和生产力发展水平，更取决于政府的政策。“宪法宣布俄罗斯是社会国家，也就决定了必须建立社会市场经济。” [16] “社会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以外的另一种选择。” [17]

1993年，俄罗斯劳动和社会关系科学院向制宪会议提出选择社会国家模式的建议。该建议得到赞同并最终写入宪法第七条。时任院长的格里岑科博士认为，选择社会国家模式的原因是：①社会国家模式

在德国等欧洲国家经受了半个世纪的考验，这些国家居民已经拥有较高的物质生活水平。②社会国家模式要求经济改革以社会发展为目的。选择社会国家模式可在俄罗斯改革初期获得广大人民的信任和支持。③社会国家模式在内容和形式上最接近苏联模式，最符合俄罗斯社会传统价值观（менталитет）[18]。社会国家遵循的基本原则是：①人人有经济自由。②劳动者参与管理（也称经济民主）。劳动者有权参与制定和实施涉及劳动、工资和企业发展的决策，这使劳动者主动关心企业发展。③人人对社会负责。全社会关心儿童、老人、残疾人和其他弱势阶层。国家通过法律调节，防止出现社会两极分化，提高居民受社会保护的程度。④相信市场调节。□⑤国□家制定市场规则。国家负责制定社会和经济发展方向，防止市场原则对就业、收入、生活水平、教育、科技、文化、医疗等社会领域造成破坏影响[19]。

在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大规模私有化时期，国家经历了十分严重的经济困难，居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但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的社会领域没有完全市场化，中小学11年义务教育、大学免费教育[20]、全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全民社会养老金制度、对低收入和多子女家庭补贴制度等依然保留。事实证明，在困难的年代，国家在法律和名义上都没有放弃社会国家的社会义务，反而向居民承诺的福利种类比苏联时期还要多[21]。

2005年俄罗斯前总统普京主持制定了国家四项民生工程（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проекты），即教育、住房、医疗和农业工程，俄称为“对人的投资工程”，“创造一切有利于人的发展的条件”，目的是提高人的社会权利保障程度，提高人的素质，发展人的创造潜力。四项民生工程表明，随着国家经济和财政状况好转，俄罗斯开始有计划地全面实际履行社会国家的社会义务，提高对所有俄罗斯人的社会保障程度。当然，宪法规定俄罗斯为社会国家的性质，并不能自动减少社会问题。在居民社会保障的质量方面，俄罗斯与欧洲社会国家仍有明显差距。采取积极的社会和经济政策，促使社会和经济共同发展，这是社会国家的要求，也是俄罗斯政府的主要任务。“社会国家的社会政策是俄罗斯社会稳定的基础。社会政策有助于增强社会对俄罗斯

国家政治制度的信任”，而“国家社会政策的效果取决于经济增长”[22]。社会国家是保障人的社会权利的制度形式，既与国家的价值取向，也与社会生产力、历史文化传统密切关联。

社会国家的经济以社会为目的，社会国家的市场经济具有社会属性，社会市场经济模式是社会国家的必然选择。社会市场经济体现了社会国家的质的规定性，是实现社会国家最高价值的内在要求和必然途径。当代社会国家的重要任务是，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平衡。社会市场经济的目标是通过市场竞争发展经济，同时以国家为主导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实现社会公平。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可以实现社会国家理想与经济自由最好的结合。

---

[1] 李福川，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

[2] Кудрин：доля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в экономике сократится на 10%，http：//www.newsland.ru/news/detail/id/419774/cat/86/.

[3]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15.07.2010 г.，№.530，Об утверждении Правил установления предельно допустимых розничных цен на отдельные виды социально значимых 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енных товаров первой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и，Перечня отдельных видов социально значимых 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енных товаров первой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и，в отношении которых могут устанавливаться предельно допустимые розничные цены，и Перечня отдельных видов социально значимых 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енных товаров，за приобретение определенного количества которых хозяйствующему субъекту，осуществляющему торговую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не допускается выплата вознаграждения.

[4] Бен Арис：Самая справедливая из БРИК（перевод публикации во вкладках Russia Now в The Daily Telegraph The Washington Post），http：//www.rg.ru/2010/10/15/rbth-russia-bric.html.

[5]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ьство Всемирного банка в России：Доклад об экономике в России（номер 22.，июнь 2010 г.），www.worldbank.org.ru.

[6] 2010年俄罗斯人均GDP约1万美元。

[7] МРОТ приблизят к прожиточному минимуму，http：// www.kadis.ru/news/91946.

[8] http：//www.duma.spravedlivo.ru/files/Tablitsy_k_dokladu.doc.

[9] Туманов В.А.，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Конституц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М.：Большая Россий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1997，http：//slovari.yandex.ru/dict/konst.

[10] Человек，его права и свободы являются высшей ценностью.Признание，соблюдение и защита прав и свобод человека и гражданина——обязанность государства.

[11] Лукин.В.，Высшая ценность：к 60-летию Всеобщей декларации прав человека，http：//www.novayagazeta.ru/data/2008/92/11.html.

[12] Постатейный научно-практический комментарий Конституци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http：//www.constitution.garant.ru/ DOC_3866952.htm.

[13] Постатейный научно-практический комментарий Конституци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http：//www.constitution.garant.ru/ DOC_3866952.htm.

[14] Мысливченко А.Г.，Перспективы европейской модели социальн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Вопр，философии，2004，№.6.с.3.

[15] Туманов В.А.，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Конституц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М.：Большая Россий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1997，http：//slovari.yandex.ru/dict/konst.

[16] Федотов И.А.，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права человека и гражданина в социальном государстве：современный опыт России（диссертационная работа 2009），http：//www.rags.ru/files/dissertation/644.doc.

[17] Система рассматривалась как альтернатива капитализму и социализму，ru.wikipedia.org/wiki/Социально-рыночная_экономика.

[18] Гриценко Н.Н.，Социальные модели общества в период перехода к социально-ориентированной рыночной экономике（к вопросу о разработке социальной модели России XXI века），Аналитический

вестник Совета Федерации ФС РФ，№.24 （112），1999，с.38.

[19] Гриценко Н.Н.，Социальные модели общества в период перехода к социально-ориентированной рыночной экономике （к вопросу о разработке социальной модели России XXI века），Аналитический вестник Совета Федерации ФС РФ，№.24 （112），1999，с.38.

[20] 俄罗斯联邦《教育法》（Зокон РФ Об образовании от 10.07.1992 №.3266-1）规定，国家保证俄罗斯公民通过高考竞争，在国立高等院校免费接受高等教育。第40条规定，在校免费大学生总数占全体居民的比例不得低于1.7%，既每万人中不得少于170人。现在实际达到220人。免费生占在校大学生的比例超过50%。1996年俄罗斯联邦《高等和大学后专业教育法》，重申了《教育法》中的这一规定，同时提出，高等院校在完成国家公费生招生计划后，可以招收自费生。

[21] 经济发展水平所限，有相当部分无法真正落实。社会支出义务超过了国家经济能力，这是2005年福利货币化改革的主要原因。

[22] Постатейный научно-практический комментарий Конституци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http：//www.constitution.garant.ru/DOC_3866952.htm.

俄罗斯教育前景堪忧 腐败成为最严重问题

李瑞琴 [1]

2011年是苏联解体20周年，俄罗斯学界广泛开展了关于苏联解体20周年有关问题的讨论。2011年3月12日，俄罗斯功勋中学教师舍列霍夫在《苏维埃俄罗斯报》发表文章指出：“苏联的教育体系曾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全民普及教育深入贯彻于苏维埃期间。20世纪20年代扫除了文盲，30年代开始进行全民初级义务教育，随后连续几年普及了全民7年、9年义务教育、全民中等义务教育。在国际上，不仅是我们的朋友，而且是我们的敌人也不得不承认该教育系统的优势。” [2] 苏联时期曾经享誉世界的教育体制，不仅培养出了许多杰出科学家，而且不存在腐败的土壤。但目前，严重的腐败问题不仅使俄罗斯教育面临着严重困境，而且教育系统的腐败也威胁到了俄罗斯的国家安全 [3] 。

一 教育界已被民众列为俄罗斯第二大腐败行业

早在2007年12月6日，透明国际组织公布的“2007年世界贪污统计表”资料显示，俄罗斯护法部门和教育机构的受贿情况最多。刊登在透明国际组织官方网站的新闻稿指出，俄罗斯公民在同护法部门以及教育和卫生保健等部门打交道时被迫经常行贿。2007年6～9月，在对1573名年龄在15岁以上公民进行调查后，有31%的被调查者表示，护法部门的工作人员经常向他们索取贿赂；有19%的被调查者认为教育工作者索取贿赂排第二位；接着是法院和医疗单位，分别占被调查者的19%和17%。在回答2007年被迫向哪些机构和机关行贿的问题时，分别有27%、15%和7%的被调查者称，曾被迫向权利保卫机关、教育机构和医疗单位行贿 [4] 。

2007年年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公布了一份教育领域腐败状况报告。据各国专家的评估，俄罗斯高校年收受贿赂在5亿美元左右。俄《劳动报》同年6月27日文章报道，俄罗斯专家不排除这个数字过

于保守的可能性，实际上大约有80%的父母都准备为子女顺利升入大学而行贿。要想进入名牌大学，秘密行贿数额在1万～4.5万美元不等[5]。

2008年，俄经济安全部门破获受贿案1300起，其中不少发生在高校。许多高等学府早以索要贿赂高而闻名。俄内务部负责经济安全问题的皮利普丘克坦言："在报考大学时，高校教师有时会主动向学生或家长提出'有偿帮助'。开出的价码因地区和学校的档次不同而各异。比如在欠发达地区，入学和继续'保驾护航'的费用是10万卢布（约合4200美元）。而在经济发达地区，赞助费可能高达2.5万美元。"[6]目前，俄罗斯每年都售出约50万张不同专业的假文凭。在主要城市已经发现持有假文凭的高级官员、警务人员、医生、教师和律师等[7]。在互联网上，每月有1700万人在网上搜索需求，用户需求统计显示，需求最多的是各类学校的毕业证书、驾驶执照和医疗证明，其中出售假文凭获利最高[8]。

二 教师犯罪大幅增加，索贿金额逐年递增

由于教育领域腐败问题愈演愈烈，另一种现象自然相应出现，即教书育人、为人师表的教师，其犯罪案件大幅增加。据《俄罗斯报》2010年3月报道，在俄内务部打击教育腐败专项行动中，有928名教师被捕。在他们的操纵下，成绩被明码标价，分数被"兑换"成现金。被捕的928名教师累计受贿3000余起，涉案金额共计2260万卢布。俄罗斯专家痛心地说，腐败考官允许学生或家长用金钱交换入学通知书，这一现象在俄罗斯大学内越来越严重。还有一些大学教授收受学生贿赂，修改学生考试成绩，让他们"高分"毕业[9]。2010年，阿尔汉格尔斯克地区北方国立医科大学的大学校长受贿54万卢布被逮捕。2010年4月，莫斯科大学一女教师收受申请入学者贿赂3.5万欧元，其父为莫斯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2011年3月该女教师获刑3年，其父被解雇。莫斯科大学校长不无忧虑地指出，莫斯科大学教师、学院领导接受贿赂，此丑闻损害了著名大学的形象和国家的形象[10]。

2010年5月25日，俄罗斯人权保护消费者协会教育服务副主席维

克多·帕宁在记者招待会上说，目前俄罗斯教育部门的腐败规模已达到55亿美元，教育腐败正在大肆发展和普遍化。腐败主要表现为滥用预算资金，滥用职权，收受和索要贿赂，出售伪造的教育证明和其他文件。2009年俄罗斯教育部门平均受贿已超2000万卢布，腐败案件比上年翻了一番。严重性在于，此问题存在着两面性，即人们也愿意为自己的无知合法化花钱[11]。

有专家认为，每年约55亿美元的教育腐败，相当于一个小国的预算。这说明现代俄罗斯教育的腐败程度已近临界点。因为几乎所有层次的教育：从幼儿园到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腐败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变为根深蒂固的形式。腐败对全俄国家统一考试已产生严重影响。许多学校都在事先通知有关内容，教师给学生提供考试答案，填报虚假结果，伪造国家统一考试证明。在莫斯科地铁站，几乎每个站都有出售毕业证书的。根据支付数额，可以为你做任何大学的文凭。

专家认为，教育系统的腐败破坏了社会的道德基础，对未来国家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教育腐败使公民从小就参与其中而迷失方向。例如，一个孩子在家里经常听到，父母讨论为他上幼儿园该送多少钱的礼物。长此以往，这将使俄罗斯所有领域的社会活力不可遏止地退化[12]。

三 学生调查显示，腐败排在了俄罗斯高等教育问题的首位

俄《独立报》2010年11月23日公布了一份对逾千名俄罗斯高校学生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约有40%的大学生曾遇到过教师索贿的情况。这些贿赂往往是为顺利通过考试而支付的。名目繁多的非法勒索金额有时达到巨大数额。著名法学高校“优秀”成绩的平均售价是8万卢布。在俄罗斯，已经很少有人能够缴纳正常收费顺利通过大学补考了。莫斯科的大学比地区的大学腐败程度大约高两倍：因此得出了著名法学院优秀成绩平均售价8万卢布的数据。这些数据是2010年夏天，非政府青年组织“真实的俄罗斯”在18所一流大学（9所国立大学、9所私立大学）的学生中调查而得到的。调查随机在工程、人文、法律和经济学4个专业的逾千名大学生中进行。调查表明，被调

查者认为考试存在着腐败行为的，占各学校调查者的比例为：首都国立高校工程技术专业为41%，私立大学为6%；国立大学人文类专业为36%，私立大学为22%；国立大学法律专业为29%，私立大学为12%；国立大学经济类专业为32%，私立大学为28%。根据此项调查看，严重的腐败已排在了俄罗斯高等教育问题的首位。

此外，国立大学被调查者中约有30%的学生报告说，教师向他们勒索贿赂。而私立学校的学生很少这样说。与此同时，大约有40%的国立大学的被调查学生表示，政府在有效地打击腐败；但约有25%的学生认为，政府不解决这个问题；还有一些学生指出，政府甚至鼓励他们的老师受贿，这样的回答包括17%的国立大学法律系学生。俄罗斯国立高等经济学校微观经济分析系主任马克莱文的报告，在俄罗斯的大学，每年没有计入统计的、为入学而行贿的数额约为4亿美元[13]。

四 国家道德城墙倒塌，高等教育危机是腐败的主要原因

早在2008年，就有专家分析，造成俄罗斯教育腐败的主要原因是，缺乏杜绝受贿的有效措施以及高等教育正在经历危机。莫斯科杜马教育委员会主席布尼莫维奇说："西方国家的学生深知，从大学课堂里获得的知识，对未来的职业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因此腐败之风难以盛行。而许多俄罗斯学生上大学只是为了一纸文凭，某些老师也以为受贿理所应当。苏联时期，教育者根本不可能拿考试成绩做交易。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道德的城墙倒塌了，要重新构筑谈何容易。"尽管政府也在进行专项治理，但"突击检查恐怕不会带来显著效果。打击校园贿赂不是靠一两次行动就能见成效的，必须制定一套综合性计划。高校不应成为向学生勒索钱财的机构"[14]。

人权保护消费者协会教育服务副主席维克多认为，教育腐败的主要危险在于对未成年公民的愚弄。必须改变整个社会的观念。社会正常的生活方式应该是：行贿无利可图，只有依据法律才能获得自身利益[15]。

俄罗斯国立高等经济学校微观经济分析系主任马克莱文说，教师

的不道德行为在高校管理自身。例如，在俄罗斯一些高校，教师受贿与学院领导人分享。还有许多学校，教师和领导“默契合谋”：领导对教师的受贿视而不见，而教师对大学预算的滥用同样视而不见。主要问题是“反腐败斗争在大学里没有认真进行”。

俄《独立报》专家也认为，腐败的邪恶根源不在于教师的工资低，虽然也包括这方面的原因，但在一定程度上，教师缺乏道德原则，大学领导有恃无恐大肆受贿的恶劣影响，对于腐败的蔓延是更重要的原因 [16] 。专家们尖锐地指出：常有人认为，平时的腐败不危险，只是简化了人们的生活。但实际上，生活是具有威胁性的可怕的破坏力量。因贿赂而通过了高校考试的人们，将来可以掌舵，可以站在手术台前，能够建造大桥，管理发电厂等等，就像通常已经没有必要从学校获得道德和伦理价值的宝藏——俄罗斯文学！真是如此吗？[17]

五 教育前景堪忧，有识志士呼吁改革俄罗斯教育法，回归苏联教育目标

2011年3月12日，《苏维埃俄罗斯报》刊登俄罗斯功勋中学教师舍列霍夫的文章《教师——一种替代：俄罗斯教育是否需要改革，需要什么样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众对俄罗斯教育前景的忧虑和期待。

该文章说，苏联时期的教育体制不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而且在空间探索上也证明了其优势和成就。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和加加林进入太空飞行后，美国人感到震惊。他们派往苏联的一个特别委员会准备了一份详细而深刻的报告，其中有一章叫做“伊万知道什么和约翰不知道什么”。委员会以及美国国会由此作出判断，美国在中学和大学教育方面已经输掉了空间竞争。美国国会即以10倍于从前的数额增加教育拨款，同时继续在世界广泛招纳人才。在苏联时期，国家约有上百万名科学家工作；在今天的俄罗斯，只有45万名科学工作者，而且远非所有人都从事科学工作。

自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教育领域经过了几次大冲击，仅从政府对

《教育法》的修改就可以看出其下滑的轨迹：1996年的《教育法》使得多年被遏制住的不良倾向渗透到了教育领域。它允许在沉重的20世纪90年代卖掉了一切，只保存下来了教育体系。2004年通过的法律第122条“关于福利货币化”，在社会保障和国家义务方面删除了许多具体规则。例如，保证教育优先、不允许减少高校预算等条款完全消失，教师包括农民的福利等条款被取消。而统一俄罗斯党通过的“关于自治机关”的法律对教育冲击更大，法律改变了教育机关的地位，使其融入了市场结构，不惜任何代价赚取金钱是其主要目标。

目前正在出台的一个300页的新“教育”法草案，其中仍然存在许多问题。例如，以共产党为首的反对派认为，该法案应该“回答国家和社会教育的基本问题”，应该“没有恶化而是改善了多数参与者的状况”。这两个最基本的问题没有解决。再如，教育不能没有钱。从国际经验看，如果教育投资不足国内生产总值的7%，国家不可能实现现代化。还有，世界范围里教育税都是不支付或少支付，而俄罗斯于2002年决定，教育应与商业公司一视同仁。关于教师的地位，政府的新法律草案没有任何说法。现在俄罗斯教师的工资是全国平均工资的64%。在美国，教师工资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29%。新法规定，政府将在全国强制实施学士制，一年将减少40%的专业科目教育课时；初级职业教育将被淘汰；农村教师待遇没有提及；大学结构将被修改而引进扭曲的美国式制度，大学将大规模重组，有许多将不得不大幅度降低其地位，或寻求能够联合的大学。

该文作者不无忧虑地指出，联合国“关于人类发展潜能的报告”最新数据显示，俄罗斯教育在世界的位置，最近几年为第15位、第26位、第41位、第54位。如果政府通过新教育法草案，俄罗斯将被推入第200位。目前的教育法明显是在提倡精英教育、市场化教育。该文章最后引用了孔子的名言“一年种稻，十年植树，百年育人”，强调，目前在俄罗斯国家杜马中，只有以共产党为首的反对派遵循了“教育以人为本”的真正目标[18]。

---

[1] 李瑞琴，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

[2] Г.Шелехов，Учитель—за альтернативу：Нужна ли российскому образованию очередная реформа А если нужна，то какая，Советская Россия，2011-03-12.

[3] Коррупция в системе образования угрожает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оссии，Великая Эпоха，2010-05-27.

[4] 《调查显示：俄罗斯护法部门和教育机构受贿情况最多》，俄新网，2007年12月7日。

[5] 《俄高校每年大约收受5亿美元的贿赂》，俄新网，2007年6月27日。

[6] 《俄罗斯高校腐败愈演愈烈 学生行贿态度像威胁》，中国网，2008年3月24日。

[7] Берут，дают，покупают，продают，Эксперты обнародовали объем коррупции в сфере образования，http：//www.kasparov.ru/material.php？id＝4BFB95F6CFAF.

[8] Коррупция в системе образования угрожает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оссии，Великая Эпоха，2010-05-27.

[9] 《国外的教育腐败及其治理》，新浪网，2010年3月30日。

[10] Происшествия Дочка бывшего декана факультета госуправления МГУ получила три года условно за взятку，GZT.RU.Новости，2011-03-21.

[11] Берут，дают，покупают，продают，Эксперты обнародовали объем коррупции в сфере образования，http：//www.kasparov.ru/material.php？id＝4BFB95F6CFAF.

[12] Лилия Муравьева，Коррупция в образовании России，как общество легализует собственное незнание，Интернет-журнал для каждого родителя Москвы，http：//deti-moskvy.ru/korrupciya-v-obrazovanii-rossii.

[13] Анастасия Башкатова，Экзамен на взяткоемкость，Независимая，2010-11-24.

[14] 《俄罗斯高校腐败愈演愈烈 学生行贿态度像威胁》，中国网，2008年3月24日。

[15] Берут，дают，покупают，продают，Эксперты обнародовали объем коррупции в сфере образования，http：//www.kasparov.ru/material.php？id＝4BFB95F6CFAF.

[16] Анастасия Башкатова，Экзамен на взяткоемкость，Независимая，2010-11-24.

[17] От редакции，О порче и растленииВремя борьбы с коррупцией，Независимая，2011-03-17.

[18] Г.Шелехов，Учитель—за альтернативу，Нужна ли российскому образованию очередная реформа А если нужна，то какая，Советская Россия，2011-03-12.

国家治理与政治稳定的悖论

——以苏联解体后的吉尔吉斯斯坦转轨为视角

徐海燕 [1]

一 转型近20年：民主化与不稳定

吉尔吉斯斯坦体制变迁最明显地体现在政治领域。20年前，吉尔吉斯斯坦当权者在西方国家“民主治理”的理念下，实行多党政治，搞三权分立、自由选举等，希望通过这样一种制度可以达到现代社会发展的双重目标：“谋求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和政治生活的稳定化” [2] 。然而，近20年的实践表明，虽然从政治体制的建构而言，的确在形式上更为“民主化”，但在维护稳定和社会发展发面却在运行中面临困境。

首先，新的政治模式不能遏制权力高层的腐败问题。独立以来，吉尔吉斯斯坦希望引进西方的政治模式对权力进行相互制约、平衡各方利益，实现对国家的共同管理，只是民众的一个良好的愿望。国家内部官商勾结，裙带关系等腐败现象十分普遍。2004年，在透明国际组织公布的《全球清廉指数榜》的排名中，吉尔吉斯斯坦属于极端腐败的国家 [3] 。虽然20年间，国家因此爆发了两次所谓的“革命”，更迭了两届政权，但吉尔吉斯斯坦的民主建设能否遏制腐败、给民众一个满意的答案依然是一个未知数。

其次，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不仅没能达到权力分工、相互制衡的目的，反而使国家精英陷入了长期的政治博弈。经过20年的发展，国家政治精英在独立之初，那种追求国家独立与民主的政治理念早已丧失，随着时间的推移，脱胎于旧官僚体制下的执政集团内部的派系分歧却逐渐加大，代表不同阶层领域的政治势力之间的激烈斗争加剧了政治领域的动荡。各精英派别之间以政治诚信为口号，围绕着政治权力，不断在“当政者”与“反对派”之间进行着角色转换，将主要注意力

放在了权力和利益争夺上，而疏于国家建设和培育具有自己国家特色的新国家意识形态。

再次，政治体制的运行不能促进国家的族际和谐，更难以平衡和弥合地区利益集团的分歧。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政治对立的双方不仅以当权派和反对派来划界，而且还以不同地区和族群对立为特征[4]。由于经历多次经济和社会危机，这种苏联时期就已存在的部落和部族关系在危机中进一步激化，造成了明显的社会和群族分裂。部族利益，部族内部或者部族之间关系的好坏不仅直接影响着执掌政权是否稳定，部族利益还在民族的构成、干部培养与任命、政策制定与执行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5]。在此情况下，每当政府作出涉及各利益集团的决策时，以部族为特征的集团矛盾就凸显出来，甚至会铤而走险，采取极端手段让政权为自己的利益服务。例如，第一次被“郁金香革命”推翻的总统阿卡耶夫是公认的“北方势力的代表”，第二次被“革命”推翻的总统巴基耶夫因出生于南方，被认为是“南方势力的代表”。

在经济领域，吉尔吉斯斯坦的改革家们信奉“民主体制与市场积极的天然联系”的法则，曾经憧憬在短时间内能够建立既有民主又有市场的发展模式。近20年来，吉尔吉斯斯坦与独联体其他国家一起，都程度不同地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以市场化和私有化为特征的改革使国家经济发生结构性转变。但转型研究的事实表明，尽管民主与市场的相互支持在欧美发达工业文明条件下总体而言得到了证实，但在像吉尔吉斯斯坦这样一个中亚比较落后的山地国家，民主与市场并不一定呈正相关关系。以欧洲重建和发展银行（EBRD）的标准来衡量，它们无一被视为市场经济国家[6]。伴随着激进的经济转轨，国内生产滑坡、投资下降、财政赤字和债务增加成为吉尔吉斯斯坦经济发展的常态。由于持续的经济衰退给吉尔吉斯斯坦造成的社会灾难触目惊心。与官僚腐败相对应，普通民众的贫困化十分普遍，极易发生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引发社会动荡。

二 西方国家治理理论与吉尔吉斯斯坦民主实践的分析

从西方理论层面上讲，20年来，吉尔吉斯斯坦是按照西方理论家所倡导的理想民主政治模式来构建国家的。具有学者风范，发誓要将吉尔吉斯斯坦建为中亚的“民主之岛”的首任总统阿斯卡尔·阿卡耶夫，在刚一上任就遵循西方的民主理论，提出真正的民主“首先应赋予千百万公民民主权利和自由”，看重“一切民主权利和自由的表现，包括言论和出版自由，政党和不受权利意识控制的合法活动”的民主政治 [7] 。然而，遵循西方政治理论指导的国家改革实践，却陷入了治理的怪圈。

1.“最小国家”演变为“威权国家”

对于包括吉尔吉斯斯坦的独联体国家，早在独立之初，西方政治学家就给它们开出了“最小国家”的治理药方。最小国家的“小”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国家实力弱或疆域小的意思，而是指国家职能范围的最低限度。这一理论的支持者，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诺齐克认为，国家的唯一职能就是其政治职能，即保护公民的自然权利不受侵犯。而在除此以外的其他事务上，应尽可能消极，尤其不能倡导为了公共利益或他人利益而损害个人利益 [8] 。在这种制度下，权力分立成了政治的基本内涵，宪政成为以宪法为依据的民主形式，分权制度及宪法审查是基本表现形式，而多党制度是基本的运行机制。

但是，吉尔吉斯斯坦在实践这种“最小国家”理论时，并没有取得相应的成果。在实际运行中，强势的总统由于符合国家民众依赖权威的传统心理却具备现实的合法性基础。国家在转轨进程中出现了新的政权形态——威权主义。威权主义的特征从美国政治学家林茨的经典描述中可以看到：“政治体系的多元政治属于有限的、不负责任的性质；政治体系没有一套精密的意识形态作为其主导，但另有不同性质的心态；政治体系除在某一发展时期之外，并没有广泛而深入的政治动员，以及由领袖一人或者偶然是一小撮统治团体，运用体系的统治权，虽然权力的运用方式欠缺明确的界限，但实际上却是十分可以预测的。” [9] 在这种形态下，所构建的政府本应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和实现者，却没有将社会生活中的社会经济利益和要求进行充分的实现和保证，反而变本加厉地运用特定权力谋求小团体或者私人利益。国

家的权力核心不再是庞大的官僚机器，而是在以总统为代表的当权者内部形成的官僚特权阶层和既得利益集团，他们也可能不是总统的亲属，但其职位有赖于与总统本人和总统帮的个人关系[10]。这些特权阶层控制着国家最敏感和利益最大的部门，把公共资源当做自己的私家物品来使用，榨取大量的用于投资的社会剩余，却不能提供"集体产品"。在吉尔吉斯斯坦，占人口3%～4%的极少数暴富者多为权力要害部门的领导及其亲友，而全国1/3的人口则处于失业状态。在2005年爆发的"郁金香革命"中，阿卡耶夫总统其家族成员被指控有金融和职务犯罪等106项罪名。巴基耶夫则在权力的驱使下，让自己的亲属掌握着国家最有利润的项目，还实际上控制着所有的外国资金[11]。这表明，依据这一理论所建立的"最小国家"不但没有实现对公民利益的保护，反而因国家核心利益集团的腐败贪污，引发了民众普遍的反抗。这样国家显然不能称为民主国家了。因此，亨廷顿认为，这种类似于"一党制、集权体制、个人独裁、军人政权以及类似的政权"的威权主义也是一种不民主的体制[12]。

2."民主斗士"颠覆"民主政府"

打造民主政权，建设民主政治，毋庸置疑是独立后吉尔吉斯斯坦政治转轨的一个努力方向。对于吉尔吉斯斯坦应打造一个什么样的民主体制问题，按照现代西方主流政治学家的观点，即把国家是否能够提供合法的竞争和参与的政治制度作为判定国家政体是否民主的主要标准。"民主方法是为达到政治决定的一种制度上的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竞取人民选票而得到做出决定的权力。"[13]"政治体制是否民主所依据的标准是看其中最有影响的集体决策者是否通过公平、诚实和定期选举产生，在这种选举中候选人可以自由地竞争选票，而且基本上所有的成年人都可以参加选举。"[14]美国学者亨廷顿也认为传统的民主概念内涵太多，容易导致"含混不清的规范并不能产生有用的分析结果"，所以只需从"选举"来界定民主就可以了，因为"公开、自由和公平的选举是民主的实质，而且是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15]。对此，亨廷顿还进一步提出了"民主—不民主"的两分法，把世界上的政体分为"民主"与"不民主"两类。区分它们的标准就

是选举：不民主的国家就是“没有选举上的竞争和普遍的选举投票参与”，而民主国家则相反 [16] 。

借助这些定义，我们较为容易认定吉尔吉斯斯坦政体的民主性质。吉尔吉斯斯坦独立后，政治领域出现了各种政治思潮和群众运动。无论是总统还是议会都已实现了全民公选，并得到宪法的确认。在定期举行的总统和杜马选举中，不同党派、不同团体及不同的候选人基本上可以公开、公平及以和平的方式进行竞争。

但是从“选举”来界定民主，虽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在实际运行中，民主与自由、平等、正义等概念一样，被不同的政党、不同的利益集团、不同的政治精英加以不同的解释，以至于所有不民主的政权都把自己标榜为“民主”的，甚至一些极端的专制也借着“捍卫民主”的口号而推行。

因此，西方理论中把民主简化为“选举”可能会导致概念本意的丧失。

经过20年的发展，实践表明，从西方引进的“民主”显然成了烫手的山芋，它不但没有给国家带来繁荣，政权反而在“民主化”的氛围下屡遭颠覆。

3.政治精英操纵“街头政治”

“精英”一词作为西方传统的社会学和政治学的概念，是指对一个社会的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并“决定国家重大问题的人”所构成的群体 [17] 。早期的民主概念有理性化的成分，即把民主的前景想象为没有精英存在的人民统治。但随着选举权的扩展，成立大型政治社团机构的需要也增加了，这些社团机构由于庞大而不得不推行官僚化管理，而且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是由那些有能力、有愿望的人提供一个相互竞争的职业领域，它仍然是精英竞争的一种职业 [18] 。因此，美国学者约瑟夫·熊彼特认为，民主与其说是人民的统治，不如说是一种政治精英的选择机制 [19] 。按照西方政治学家看来，在民主社会里，不同的利益群体为争夺资源而展开竞争，可以有效地防止权力的集中，

从而形成多元格局。因此，西方理论家高度重视精英的作用，将政治决策看做政府行政部门试图调和竞争的利益群体之需要的结果。在这一理论中，“寡头统治已被打破，已转变为由各权力集团所组成的多元的、分散的和开放的一团星云”[20]。

毋庸置疑，吉尔吉斯斯坦的转轨历程一定程度上也可称为新旧精英的博弈过程。例如，在2005年“郁金香革命”中被推翻的阿卡耶夫总统来自苏联旧有的营垒，在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上代表着过去的传统。而以政权颠覆者巴基耶夫为首的新精英，以“民主”、“反腐败”作为西方所重点扶持的人物，则体现西方民主和市场价值，两者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权力争夺。但是，成功夺取权力的政治精英对旧精英集团的财产清算只是为了实现利益再分配。其管理体制依旧，腐败并未减轻，新的精英集团依然面临着被再次推翻的威胁。

精英博弈与斗争更多地体现在国家确立的多党政治制度中。吉尔吉斯斯坦政治转轨之后确定的多党政治体制为国家打造权力多元格局提供了制度保障。但在吉尔吉斯斯坦，这些在独立之后出现的政党，大多是一夜之间出现的，缺乏社会基础。如果按照政治主张来划分其政治派别，已不能够清晰地明确其立场。因为它们通常在国家的未来规划方面没有很大的区别，它们存在的目的却与政治精英或者部族精英的野心相连，以获取政权的支持[21]。

在政治实践中，政治精英主要依靠“街头政治”在政治生活中的颠覆性效果来实现对权力的更替。从竞争手段上看，“民主”与“反腐”常常成为操纵民众“一呼百应”的口号。精英在组织群众示威游行和以参加集会为重要手段进行的集会和抗议活动时，常常由于竞争行为的失范导致流血冲突不断，使整个国家处于混乱无序之中。正如亨廷顿所言，这种“精英内部的分裂可能中断社会和经济的变革进程”[22]。而按照这一标准建构的民主体制又十分脆弱，不能正常地应对由“合法竞争”导致的政权更迭。精英以民主之名动用暴力，民众则被服务于政治精英的政治私利，被误导和操纵，民众的福祉成为权力争夺的无谓祭品。政治精英的无序行为显然成了吉尔吉斯斯坦社会稳定的一大威胁。

4.“利益集团”掠夺公共资源

关于西方理论所界定的国家与利益集团的关系，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国家是影响利益构成和团体作用的决定性力量，应当寻求在利益团体和国家之间建立制度化的联系通道。”[23] 在西方的政治模式中，获批准的公共团体与国家之间建立了一种制度化的合作关系，国家允许获批准的公共团体进入公共政策的决策过程，两者共同协商出台公共政策，而相应的获批准的团体亦有义务在自己的领域贯彻该项公共政策，故而国家与社会的分野不再明显。因此，有学者将这一模式称为政治与社会并重模式[24]。

吉尔吉斯斯坦是有部族政治特征的传统国家，不仅南部北部地区的民众都在不同程度上涉及部族利益，而且部族内部或者部族之间关系的好坏甚至直接影响着执掌政权和控制物质财富的特权阶层。每个部族政治精英都有一定数量的追随者，地方部族势力甚至获得了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的能力，他们的活动都对国家的稳定和秩序产生重要影响。

然而，国家与利益集团在吉尔吉斯斯坦运行的实际情况是，国家与部族利益集团的合作没能将社会生活中的社会经济利益要求予以充分的实现和保证，由政治的、官僚的和地区部族势力构成了无缝之网，利用所执掌的权力机关和组织动员体系集合地区部族精英和资源，从而形成一个以国家利益名义行事的部族集团，并对国家的政治起着越来越消极的作用。在制度构建中，国家的治理能力十分有限，政治制度、政府、政治精英、政治体系等体系要素在改革中既不能相互调整完善，也无法缓解利益集团形成的改革阻力，从而无法保证经济转型兼顾效率和公正两大终极目标。部族等利益集团染指国家政权成为一场程序合法的公开掠夺，国家和政府则变成了部族牟利的工具，或者说公共性政治权力成为私有化经济权力的俘虏。只有当国家行使更多的社会管理职能而不仅仅是为了经济发展而被少数权贵俘获时，国家才能得到更好的治理。有上述论述可以看出，极力移植西方现代性因素、全盘照搬西方理论模式来治理自己的国家，只能扭曲甚至摧毁既有文明体系的完整性。

三 苏联解体后国家制度转型与稳定关系的启示

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实践表明，发展中国家在选择自己的治理模式时必须处理好几种关系。

首先，政权有效性与合法性之间的关系。国家制度转型是个异常复杂的政治和社会的转型过程，在现实政体中，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的结合方式是多样化的，因而形成多样性的转型模式。而要保持“任何一种特定民主的稳定性，不仅取决于经济发展，而且取决于它的政治系统的有效性和合法性，一个高度有效而不合法的系统不比那些有效性相对较低、合法性很高的政权更不稳定”[25]。苏联解体后，现代化促使吉尔吉斯斯坦民众的政治意识不断觉醒，以世袭权威或以个人魅力为基础的合法性已不再被民众（尤其是青年一代）所认可。人们要求现代合法性应满足两项条件：一是统治须以获得公民的同意为前提，二是统治者必须作出政绩。

但新旧权威的更替容易导致权威弱化，政治权威不断转换还会引发合法性危机。一方面，人们从过去的迷信权威、崇拜权威发展到怀疑权威，加上贪污腐败等不公平现象的大量存在，权威的动员和贯彻能力被极大削弱，造成“权威流失”；另一方面，经历两次政府更迭，旧权威日益丧失其约束力和影响力，而新权威的树立需要一定时间。权威流失使得政治机构软弱无力，社会冲突无法得到有效协调和遏制，社会往往处于极度混乱的状态。政府缺乏权威，徒有虚名，就会导致政局不稳甚至国家四分五裂。亨廷顿在分析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所出现的种种不稳定问题的原因时就曾指出统治程度的差异要比统治形式的差异更有意义[26]。

此外，现代化“摧毁了合法的政治权力而没有（及时）提出同样也合法的替代物，没有人知道政治权力在哪里，谁是合法的继承人，谁是人们意志的体现者，谁是穷人的卫士、正义的源泉”[27]，官方权威出现失落，社会上各式各样的“替代性权威”极易俘获处于迷茫心理的信任。

其次，国家治理模式与实现稳定繁荣目标的关系。苏联在20世纪

末期所谓根本性的改革实质上打碎了自己赖以生存的国家机器。在这之后，独立的吉尔吉斯斯坦对国家政权体系的重建开始朝着西方现代政治学范畴的民主国家大步前进。但政治结构的剧烈变革往往蕴涵着巨大的社会风险，由于在转型过程中缺乏慎重思考，反而照搬西方模式和理论，国家应对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诸多问题时显得软弱乏力。吉尔吉斯斯坦因走向自由主义而无法建立强大的国家政权，国家由此不能成为有权威的、政治上负责任的政治行为主体，盲目尊崇的民主程序与准则在这里显然与国家稳定与繁荣的目标相违背。因此，国家转型要实现稳定和繁荣的目标并不是容易的事，但是只有充分考虑到国家发展的终极目标才有可能进一步变革，否则国家的治理只能走向失败。

再次，主流价值观与价值多元取向的关系。苏联时期，社会主义信念作为国家主流的政治价值观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维护社会稳定和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起着重要的作用。但20年以西方为模式的改革实践，使民众不仅淡化和丧失了原有的政治认同和政治信仰，还产生了一些与主流政治文化完全相左的政治情感、政治理想等政治价值观的多元取向。但是，政治参与并非人民影响政治决定之充足条件，大量参与也非健康之民主政治的必有现象。大量参与有时不但降低了政治之素质，而且是一个政治体内部发生深刻冲突、崩溃的征候 [28] 。

综上所述，在一个国家中，政治稳定为民主政治的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在发展中国家，政治稳定都是检测民主政治发展的尺度或标准。谋求政治稳定是任何国家在治理过程中期望的结果。在民主的政治体制中，稳定当然可以通过自由制度的发展而得到增强甚至激励，但是，表明原因的箭头也可以指向相反的方向。在政治转型中会有引起不稳定的多种因素。而通过对政权有效性与合法性、国家治理模式与实现稳定繁荣的目标、主流价值观与价值多元取向等三对范畴的关系来考察，有利于进一步分析吉尔吉斯斯坦在具体治理困境中的症结，为“维护社会稳定”提供一个理论依据。

---

[1] 徐海燕，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2] 转引自刘军、李林《新权威主义——对改革理论纲领的论争》，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第370页。

[3] Марек Домбровски “Будущие вызовы для стран СНГ”，См.，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я в странах СНГ：достижения и проблемы （Материалы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конфенции），ИЭПП，Москва，2004г.，с.46.

[4] 赵华胜：《原苏联地区“颜色革命”浪潮的成因分析》，《国际观察》2005年第3期。

[5] Алишер Хамидов，Кыргызстан：Организованная оппозиция и гражданские беспорядки？，http：//www.eurasianet.org/russian/departments/rights/articles/eav122002ru.shtml.

[6] Spechler，Martin C，“The Economies of Central Asia：A Survey”，*Comparative Economic Studies*，2008（50）：30.

[7] 〔吉〕阿斯卡尔·阿卡耶夫：《难忘的十年》，武柳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第14~15页。

[8] 〔美〕罗伯特·诺齐克：《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何怀宏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第56页。

[9] June J.Linz，“An Authoritariannism Regime：the Case of Spain ”，in Erik Allard and Yrjo Littunen （eds.），*Cleavages*，*Ideologies and Party Systems*，Helsinki：Westerarck Society，1964.

[10] Peter B.Evans，“Predatory，Developmental，and Other Apparatuses：A Comparative Political Economy Perspective on the Third World States”，*Sociological Forum*，1989（4）.

[11] Оппозиция объявила в розыск брата Бакиева，http：//www.perm.kp.ru/daily/24470.4/629515/.

[12] 〔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第11页。

[13] 〔美〕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吴良健译，商务印书馆，1979，第337页。

[14] ［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第5～6页。

[15] ［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第8页。

[16] ［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第8页。

[17] James Hughes，“Sub-national Elite and Post-Communist Transformation in Russia ”，*Europe-Asia Studies*，Vol.49，No.6，1997，pp.1017-1036.

[18] Max Weber，“The Profession and Vocation of Politics”，in P.Lassman and R.Speirs（eds.），*Weber Political Writings*，Cambridge Press，1994，pp.309-369.

[19] ［美］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张绍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第24页。

[20] ［美］乔·萨托利：《民主新论》，冯克利、阎克文译，东方出版社，1993，第63页。

[21]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артии Кыргызстана，http：//www.kyrgyzstan.russian-club.net/spravka_sets.html.

[22] James Hughes，“Sub-national Elite and Post-Communist Transformation in Russia ”，*Europe-Asia Studies*，Vol.49，No.6，1997，pp.1017-1036.

[23] ［美］安东尼·奥罗姆：《政治社会学》，张华清、孙嘉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第22页。

[24] 刘兆佳：《政治与社会》，商务印书馆，1992，第308页。

[25] ［美］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张绍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第55、59页。

[26] ［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三联书店，1988，第1～2页。

[27] Frank Tannenbaum，*Ten keys to Latin America*，New York：Random

House，1962，p.147.

[28] 参见罗志渊主编《云五社会科学大辞典·政治学》，台北“商务印书馆”，1973，第193页。

从苏联社会剧变看俄罗斯转型

田春生 [1]

一 苏联社会剧变的内部因素

苏联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和经济衰退，被认为是苏联解体和社会剧变的主要原因之一。目前的研究和数据显示，尽管苏联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不断下滑，但是并没有出现经济的崩溃致使苏联社会剧变和解体。

那么，一些解释认为，苏联经济社会剧变前已经出现“经济崩溃”，因而“经济崩溃”是苏联解体的重要经济因素。为了说明苏联的“经济崩溃”与苏联解体之间的关系，需要考证苏联解体前后的经济状况。从目前俄罗斯国家给出的苏联经济统计中可以看出，苏联经济明显下滑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80年代中后期的1986~1990年，苏联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为1.3% [2] ，低于1980~1985年的3.2%，农业产量减少，而工业和其他经济部门并没有出现急剧恶化的现象。按照经济学对于“经济崩溃”的解释，一国“经济崩溃”至少有5个标志：①工农业生产全面下降，整个国民经济出现两位数的负增长；②成千上万家企业大批破产倒闭，千百万职工下岗失业，陷于绝对贫困状态；③恶性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率一般在15%以上；④财政崩溃，财政入不敷出，出现巨额赤字，借新债还老债还不足以弥补，靠增发巨额钞票或废弃旧钞发新钞来渡过难关；对外贸易出现巨额逆差，借外债达到还不起的地步；⑤金融崩溃，银行坏账超过国际警戒线，造成银行支付危机，银行大批破产倒闭、储户叫苦连天。上述五大问题相辅相成，互相推动，生产、销售、分配、消费诸环节一片混乱，各项经济活动陷于瘫痪状态。从世界经济的历史看，这种“经济崩溃” [3] 往往受国家极端政治所影响，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大萧条时期、德意日法西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时期、国民党政权在逃离大陆前的时期及苏东国家演变后一段极其混乱时期。因此，苏联在80年代

末尚存时期，并没有出现“经济崩溃”[4]。

对于苏联经济因素的分析，诸如20世纪80年代经济内在矛盾导致经济崩溃等的说法，现在看来值得商榷。如果说苏联（俄罗斯）经济崩溃，应该认为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初始时期。从数据看，苏联经济从1990年开始出现经济绝对下降，被称为“生产不足的危机”[5]。1989年，苏联的“经济短缺”日益严重，它的发生首先是消费品短缺导致价格上涨。1988～1989年，基本消费品短缺日益严重，苏联公民不得不花很多时间，在无尽的排队中购买食物和其他家庭必需品。正是这样的报道，构成了对苏联体制崩溃的最一般的解释。在一定程度上说，苏联在转型时期出现经济大幅度下滑，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当时苏联政治和社会局势的动荡，苏联解体和俄罗斯经济社会转型，从而使国家机器不能正常运转而出现极端政治情况。

这里必然会涉及苏联经济体制和苏联改革的问题。一般认为，苏联经济体制从有效运转到停滞不前，经济改革没有取得成效的原因很多。其中既有计划经济本身的诸多弊端，也与苏联僵化的政治经济制度、“斯大林模式”的遗产、长期形成的官僚政权体制、集权统治的历史传统和文化思想等的禁锢不无关系。如果从苏联这种体制和制度的弊端来看，苏联之所以能够实现经济长期发展，一个根本的原因可以归结为，在苏联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一体制能够通过国家行政力量的强制手段推动经济实现增长；其后，这种“依靠国家行政力量推动的经济体制”的功能，随着国家统治能力的不断减弱而逐渐丧失殆尽。

苏联经济体制功能的减弱本来可以通过改革进行调整，然而战后苏联国家的经济改革没有解决体制功能弱化的问题。现在看来，苏联并非没有进行改革，至少从经济改革方面，苏联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进行过经济改革的探索，自60年代的“柯西金改革”到80年代中期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改革，都没有取得政府所预期的效果。就经济改革而言，现在看来主要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一是苏联已经定型的基本社会制度、政治和经济体制对于经济改革的制约；二是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改革的终极目标、方式、手段、措施和前景等方

面都不清楚，在理论上对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理论缺乏认知，在实践上又缺乏经济改革的成功国家的样板；三是当时苏联经济尚能维持社会稳定，尽管人们生活并不富足，但满足温饱并没有问题，这使得苏联社会的经济改革的真实动力不足，目标不清；四是来自国际环境对苏联经济影响不是很大，戈尔巴乔夫执政后，他着手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认为苏联经济“不能局限于局部的改进，必须进行根本的改革”[6]；在政治改革领域，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构想和改革“新思维”也没有能够推动苏联社会成功改革，反而导致社会思想的混乱。

苏联剧变的国内因素始终是这个国家社会剧变和解体所难以回避的重要因素。但是，仅仅经济方面的原因，并不能导致苏联解体和社会剧变。

二 苏联社会剧变的外部因素

苏联解体本身还有其更加深刻的外部因素。过去，我国一些学者强调西方势力的作用，从西方和平演变视角解释苏联社会剧变的原因。应该承认，西方社会的外部势力对于苏联社会剧变和解体有着直接和潜在的影响。持“和平演变说”看法的人认为，苏联社会剧变一定程度上是西方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结果。但是全面地看，“和平演变说”在解释苏联社会剧变和解体的外部原因时，这一说法显得简单而容易使人产生意识形态的偏见。应该承认，外部势力对于苏联社会剧变和解体的确有重大影响，这种影响主要来自全球范围国际政治和经济全球化的原因，而不仅仅是西方推行和平演变战略。

20世纪90年代是世界经济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

第一，以经济全球化为特征的国际经济变革，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对于苏联社会剧变和苏联解体产生直接和潜在影响。在全球化经济迅速发展的国际背景下，人们更加清楚地看到，80～90年代突起的诸如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信息化、市场化等现象对民族国家产生的巨大影响，延伸到90年代以来的国际局势和国际经济。这些因素加速了苏联社会剧变和解体。

第二，东欧各国的“回归欧洲”、“加入北约”的情结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在东欧各国除了阿尔巴尼亚之外，都不同程度地进行了一些改革，但是这些国家的政局不稳，特别是反对苏联的民族情绪持续高涨，经济政治危机日益深化。1980年，波兰出现的把改革波兰现行社会制度作为其奋斗目标的“独立自治团结工会”，就是这种危机深化的典型表现。这一切，为东欧最终剧变提供了重要的背景条件。这个时期，在美苏关系出现改善的同时，苏联与东欧的关系也有了实质性变化。苏联宣布不再干涉东欧的事务，并陆续从东欧撤军，鼓励和支持东欧的改革和与西方的对话。随着东欧剧变与两德统一，苏军也基本撤出了东欧。“回归欧洲”和“加入北约”的情绪和倾向，对于前苏东地区的剧变产生着直接的影响，但是在苏联对东欧的统治下，东欧的这种情结被压制。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发生变化后，苏联、东欧的社会剧变和苏联解体也成为全球格局变革的重要标志，是全球格局变化的必然结果。

第三，冷战的终结与苏联东欧阵营的瓦解。在冷战中，苏联和美国的长期制度较量的结果，是苏联的优势逐渐丧失，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苏联在抗衡中渐渐失效。冷战趋于终结，苏联东欧作为一个阵营的向心力就大大削弱。对苏联来说，原来在冷战时期具有战略价值的东欧国家失去了其重要性，而这些国家日益落后的社会主义经济及其对苏联的依赖，逐渐成为苏联沉重的经济包袱。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苏联转变了过去对东欧国家的一贯政策，鼓励东欧国家进行变革，而对东欧各国反对变革、依赖苏联支持保护的保守派则显得冷淡。面对东欧国家始于1989年的变革浪潮，苏联采取了一种不干预的默许态度，于是东欧各国的共产党政权就撑不下去，最后被迫相继下台。作为冷战最重要战场的欧洲，在戈尔巴乔夫的倡议下，1990年召开了欧安会特别首脑会议，签署了《新欧洲巴黎宪章》，宣布“欧洲对抗和分裂的时代已经结束”。1991年，以苏联为首的经互会和华沙条约组织相继解散，标志着冷战在欧洲正式结束。

三 转型后若干现实问题的思考

转型后，前苏东地区的经济得到发展，同时也出现许多新的问

题。

第一，转型国家实现国家经济持续增长，是不是被认定完成了制度“转型”？曾任波兰第一副总理和财政部部长、世界银行高级访问学者泽戈尔兹·W.科勒德克以及曾任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的匈牙利籍著名学者科尔奈等人，在对比了苏东国家与中国、越南的经济发展状况后，一方面肯定中国、越南经济改革所取得的成绩，但同时认为，这些国家的改革只是一种“半自由的经济制度”，没有“全方位地向市场经济转轨”。这些国家可以比其他转轨国家，如俄罗斯等国获得更高的持续增长，但是改革所带来的变化不大，GDP的增长率并不能说明“长期趋势”问题。在这里，作者们隐含的一个观点是，只有像苏联和中东欧那样的转轨国家的市场经济，才是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真正的市场经济应该包括民主改革。21世纪以来，俄罗斯已经实现经济增长并成为“金砖国家”成员。从长远看，中国经济增长的趋势是确定的。中国在经济增长的趋势上与俄罗斯一样，那么中国完成了社会经济的“转型”了吗？第二，转型国家的经济利益与政治权力结合导致和产生的腐败，是不是转型国家特有的现象？俄罗斯转型的经验表明，一些转型国家都产生“政治权力与经济利益”结合而导致的腐败。政治权力一旦与经济利益结合，“政治内部人”首先成为改革的“攫财大亨”，俄罗斯的“攫财大亨”就是这样形成的。也许，这就是转型经济的遗产？因为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政治权力与经济利益不能结合。俄罗斯已经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事实：在俄罗斯，叶利钦以及当时的“青年改革派”为首的一批新贵，把防止俄罗斯回到计划经济时代的政治目的作为首要目标，由于他们所追求的经济利益需要与权力结合，就必须寻找政治利益的替身，或者他们的“代言人”。这使得俄罗斯新兴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与权力被合法地结合在一起，它不仅导致转轨过程中的经济腐败，而且俄罗斯的新贵们实际上就是俄转轨过程中特有的一种“政治内部人”。过去，我们更多地关注“经济内部人”而忽略关于转型中政治“内部人”的权力制约问题。转型国家由于旧体制的遗产，如何解决转型过程中的“权钱结合”，“权贵资本主义”的问题是需要研究的。

第三，转型国家“由国家力量主导的经济”（国家资本主义）以

及“主权财富基金”，是不是转型国家发展的一种演变趋势？近年来，俄罗斯逐渐显现出“国家资本主义”的特征与形态。它的性质和作用取决于国家的性质，被认为是一种典型的“由国家力量主导的资本主义制度”，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由国家政权直接控制某些资本主义企业”的一种资本主义。例如，各种官办的和官商合营的银行、铁路、矿山、邮电及公用事业等。

自普京执政起，俄罗斯通过采取整治叶利钦时期形成的寡头集团、委派政府官员在垄断性企业任职、组建国家控股的大型旗舰企业等方式，实现国家资本向命脉企业的扩张与垄断。普京在2000年的国情咨文中强调俄罗斯国家职能的重要性，其意图是通过政府强权的治理，扭转叶利钦时期政府失控与国家混乱的局面。俄罗斯将以一种国家强权的治理方式，使俄罗斯走出转型衰退的困境，并实现国家的崛起。现在看来，在普京倡导的“俄罗斯思想”中，实际蕴涵着“国家”、“集权”等“国家资本主义”的内容，同时也体现俄罗斯传统的核心价值观念，以“重新国有化”的方式收回在激进改革时期被寡头集团所瓜分的重要国有资产，并设立“主权财富基金”。

主要参考文献

〔俄〕尼·伊·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徐昌翰等译，新华出版社，2008。

〔苏〕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言论选集》，苏群译，人民出版社，1987。

苏联国家统计局：《1989年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苏联国家统计局，1990。

田春生：《俄罗斯转型：从叶利钦到普京的转折》，《读书》2005年第8期。

---

[1] 田春生，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

[2] http：//www.gks.ru/wps/wcm/connect/rosstat/rosstatsite/main/

account/.

[3] http：//wiki.mbalib.com/wiki.

[4] 所谓经济崩溃（Economic Collapse），是指经济完全破坏，发生严重的经济危机，经济陷于一片混乱和瘫痪状态（百科词典）。

[5] B.Popov，“Россия 1990-х：обреченность на падение”，http：//opec.hse.ru/1337181.html.

[6] 参见〔苏〕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言论选集》，苏群译，人民出版社，1987，第312页。

后苏联时代的“有限民主”和俄罗斯左翼的困境

——兼对非中心国家左翼替代道路的透视

陈人江 [1]

一 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资本主义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建立起来的是一个更具原始性、野蛮性和权力高度集中的资本主义政体。到目前为止，它的发展大致可概括为三个阶段：叶利钦执政时期、普京执政时期、梅德韦杰夫和普京联袂执政时期。

在叶利钦时期，国家官僚集团尽管规模庞大，但它在某种程度上是屈从于无序的私人金融寡头集团的。金融寡头集团不仅是叶利钦竞选背后最重要的资金支持者，而且还占据了国家重要领导职位（比如，工业巨头波塔宁和别列佐夫斯基曾分别出任叶利钦政府的副总理和安全委员会副秘书长），国家的大政方针无不受金融寡头的操纵和影响，从中央到地方的国家大大小小各级官员无不与寡头财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腐败的官僚集团和贪婪的资本寡头形成了牢固密切的统一体。

经过8年的叶利钦政权的混乱统治后，普京政权应运而生。普京执政以来，这一政权性质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最根本的变化是国家官僚集团开始把私人寡头集团纳入自己控制的一定范围内，笔者称之为“国家官僚资本主义”，以区别于叶利钦时代私人资本寡头占主导的性质。同样存在某种经济上的共生依存关系——无论是在联邦政府层面还是在地方政府层面，私人寡头都没有被完全摒弃，相反，他们继续控制着大部分的经济领域；国家同时为大资本的扩张提供种种支持；国家财富也主要在官僚集团、寡头财团中分配——但官僚集团的统治已成为占主导的因素。普京政府通过国有和半国有化（包括兼并私人资本）的方式，重新控制了资源和某些生产部门，比如，在军

工、天然气和原油等属于国家战略资源的关键经济部门，都是国家资本占主导[2]。政治上，普京大力改革行政体系，建立了垂直权力体系，加强了以总统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制，并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有政治野心的私人寡头对权力的染指，排除了他们对国家政策的直接影响。与普京同属于强力部门出身的官员占据了重要的领导岗位，形成了克里姆林宫的军特系统治。在其他社会矛盾方面，贫富分化进一步扩大，每一次财富的二次分配，绝大多数都落入官僚系统囊中；对言论控制力度加强，大众传媒重新进行了国家化和统一化；腐败依然猖獗[3]，“每年官僚阶层通过影子经济渠道从资产阶级手中拿走3000亿美元的贿赂”[4]；大量中小资本受到大资本的排挤和压榨，这也造成了与自由资产阶级（他在政治和观念上的代表是右翼自由主义）的尖锐矛盾。这依然是寡头资本主义，一种“没有私人寡头政体”的寡头资本主义。总之，普京所建立的是一个波拿巴式权威主义的混合政体，他通过强化国家机器来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政治上的保守主义与经济上的自由主义由此结合在了一起。

梅德韦杰夫上台后，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多了些温和的自由主义色彩，但官僚集团掌控国家机器和关键经济资源、与私人资本财团媾和的情况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基于普京构建的国家制度框架已基本稳定，以及梅德韦杰夫和普京联袂执政具有普京时代政策的延续性，普京时代这种带有寡头性质的国家官僚资本主义可以看做对当代俄罗斯制度特征最鲜明的概括。本文所探讨的问题主要针对的正是这一社会背景。

二 “有限民主”下的俄罗斯左翼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所建立的一整套现代资本主义政治体制，即多党制、选举制、议会民主制，不仅是当代左翼组织借以产生的土壤，也给予了左翼一个与苏联时代完全不同的斗争环境。左翼政党要获得一定的生存空间，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所面临的最直接问题就是如何首先利用制度游戏规则，展开合法斗争，以获得主流社会中的一个斗争舞台。但20年过去了，俄罗斯左翼政党的生存和发展依然举步维艰，并且陷入越来越边缘化的困境。

应该说，造成俄罗斯左翼困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一个外部因素是，俄罗斯资产阶级的“有限民主”制度使得左翼几乎无法有任何机会和获得任何资源登上主流政治舞台，即便像规模最大的、最有影响力的左翼政党——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有幸挤入了这一舞台，也无法摆脱沦为对决策不起决定性影响的布景和道具的命运。

1.法律对组党和政党参选的严格限制

这是资产阶级清洗和过滤左翼政党的第一道网。叶利钦时期，并没有针对政党的专门法律，而他努力要将以俄共为代表的左翼和以自由民主党为代表的右翼势力排挤出国家杜马大门，建立忠于自己的两党制的尝试也均告失败。普京上台后，同样提出要规范政党的活动，改变俄罗斯政坛多党林立的局面，建立西方的现代政党制，即两党制或三党制、四党制，因而开始了从法律上对政党的整顿。2001年2月，国家杜马通过了普京授意俄中央选举委员会起草的《政党法》草案，7月14日《政党法》正式颁布实施。《政党法》对具备组党资格的政党成员、地区组织、成员人数的最低标准都一一作出了严格的规定，同时还规定联邦登记机关对政党的监督，要求政党的党纲党章必须以参加国家政权机关选举为政治目的，并要预先接受司法部的资格审查。《政党法》不仅加强了国家机器对政党的全面监控，也大大压缩了左翼政党组织活动的空间，加速了小党或社会团体的消亡。《政党法》修改后，除俄共外的所有其他左翼党都失去了注册登记的资格。它们之中的一些党因为没有与大党合并而被迫停止了活动，包括曾经较为活跃且有一定影响力的全俄罗斯未来共产党、劳动俄罗斯共产党人党、俄罗斯共产党—苏共，有些则转入了地下进行非法活动，比如2007年被禁止的俄罗斯共产主义工人党—共产党人革命党。

此外，2005年修改了《国家杜马议员选举法》，将政党进入国家杜马的门槛从获得5%的支持率提高到7%，并且取消了独立参选的选区代表制，规定分选区代表只有通过政党系列才能进入杜马。到目前为止，左翼政党中只有俄共一个党具备资格参与国家杜马选举，其他党的代表要想进入国家杜马，只能以俄共选举团代表名义参选。这样一来，左翼政党获取政治斗争阵地的渠道进一步减少。

2.当局利用各种手段对左翼力量进行镇压

例如，有系统地广泛打击左翼和自由派非主流运动以及人权活动家，通过《反极端主义法》，禁止类似性质的部分社团继续活动，对共产党或左翼青年组织的一批骨干以刑事罪名逮捕关押。在2006年的一次集会上，俄共主席久加诺夫愤怒地指责道：“最近半年里，发生在俄罗斯的对左翼政治人物的袭击，远远超过了外国人被袭击的次数。但是政府对此不闻不问，警方也置若罔闻。仅仅是俄罗斯共产党方面，就有数十起袭击和抢劫共产党员的案件没有侦破。甚至是对共产党人的谋杀案件也没有人重视，而这种谋杀案件已经发生5起了！”[5] 为此，以俄共为首的左翼不得不提出要建立自卫军来自保。

3.资产阶级的“金钱选举”造成了左翼的合法道路两难的尴尬处境

金钱选举的重压，加上左翼组织内部普遍存在的经费不足所造成的生存困难问题，都迫使俄共某种程度上不得不向资本财团靠近，不仅接受一些来自于大商家、石油或工业寡头的赞助和助选，而且还允许私人实业家入党，俄共背后多多少少也出现了大资本的影子[6]，而这一切与俄共自我宣称的社会主义的阶级立场又是相对立的。俄共内部由此产生了重大的思想分歧，许多不满于此的党员和干部出走，也埋下了导致日后一系列分裂的根由。

4.政权对俄罗斯共产党有组织地分化和打压

俄罗斯共产党作为俄罗斯最有影响力的左翼政党和国家杜马中唯一“不妥协的反对派”，一向是当局的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早在叶利钦当政时期，当局就已千方百计地分化和打压俄共，但仍然无法改变俄共国家杜马第一大党的地位。普京在上台之初出于权宜之计，一度对俄共采取怀柔政策。在劝说俄共改名和转变党的性质为社会民主党遭到拒绝后，普京有意识地扶植中间派势力来与俄共抗衡，并联合组织杜马中的中右翼势力，形成议会中多数，同时联合右翼党团通过议会政变的方式使俄共失去对杜马的主导权。这一切迫使俄共重新回到“不妥协的反对派”立场上来，并把工作重心转向议会

外，试图发动全民公决阻止改革方针推行，但杜马抢先通过关于《全民公决法》的修正案，禁止在议会与总统选举前一年里举行全民公决，因此，俄共在议会外反对现政权的活动也受到了限制。此外，普京还推动成立政权党“统一俄罗斯”党，作为压制俄共的亲政府力量，扶植中左政党“公正俄罗斯”党，分流俄共的选票。《政党法》出台后，“统一俄罗斯”党取代俄共，一跃成为国家杜马第一大党。国家杜马基本形成了稳定的格局，四大党团中的其他三个：“统一俄罗斯”党、公正俄罗斯党、自由民主党均为总统和政府不同程度的支持者。作为唯一的反对党，俄共不仅处于势单力薄、孤立无援的境地，而且力量持续下降，先是由第一大党团沦为第二大党，其后又变为微弱的少数派[7]。与此同时，普京政权还有效地削弱了俄共在地方上的力量：在地区立法机构中排挤俄共，确立俄统一党的主导地位；废除地方直选制，行政长官改为由总统提名地区议会选举产生，由此把地方行政纳入了联邦中央的控制范围[8]。选举改革前，属俄共或左翼阵营的地方行政长官在联邦主体中曾占到近1/3，改革后他们要么遭到大批撤换，要么受拉拢，为保住职位而加入“统一俄罗斯”党。在当局、中右翼和右翼势力联合排挤、打压下，再加上自身政策、策略失误，俄共内部和统一战线中的分裂加剧。

5.俄罗斯总统制对议会民主的有力钳制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一直实行的是总统集权制下的多党制，表现为强政府、弱议会。叶利钦掌权时期，中央政府相对缺乏权威，无力控制社会秩序并给予有效的管理，议会也没有成为政党政治活动的中心舞台，各类政党更多地通过街头政治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又加上左翼在国家杜马中占据最大的议席，对政府的极端自由主义改革多少是能起到一点约束作用的（比如俄共曾有效阻止叶利钦的土地私有化政策），因此，左翼的政治活动空间在叶利钦时代尚有一定的自由度。但即便如此，反对党哪怕取得杜马多数票，完全控制了杜马，也依然很难对政权施加强有力的影响，更别说改变政权。普京上台以后，议会民主软弱无力的状况进一步恶化。《政党法》的推行使政党活动开始围绕议会来进行，但也在某种意义上反而导致了议会

对国家的进一步依附，因为普京的政治体制改革一方面极大地增强了中央政府和总统的行政权力，同时也加强了国家机器对政党的规范、监督和约束。另一方面，他成功地打击和削弱了左翼在议会中的力量，通过亲总统的政权党“统一俄罗斯”党在议会中的主导地位，保证了政府对议会的稳固控制，议会实际上基本沦为一个摆设。

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左翼不得不继续进行争取扩大政治自由的斗争，以便首先掌握反抗的一定条件和手段。因而，俄罗斯资本主义制度的特殊形式决定了左翼根据现实条件制定的纲领只能是同时具有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性质的。俄罗斯共产党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它在新世纪制定的党纲中提出，以重建社会主义制度为战略目标，以完成民主革命为最低纲领。关于当前变革的一系列主张，用主席久加诺夫的话来说就是：“是具有人民民主革命性质的，但它同时又构成了社会主义的前阶段。”

三 “有限民主”与非中心国家反抗运动的未来

当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指责俄罗斯的“有限民主”（也即“可控民主”）是一种独裁专制时，他们忘记了一点：所有这些——国家机器对新闻的管制和对选举的限制、行政权力的高度集中、资本寡头对国家权力的操纵，对于西方社会来说并非完全陌生的东西，只不过其表现形式更为精妙和隐蔽。自由民主并不必然遏制寡头专制，政治的民主形式与寡头专制并不必然相互矛盾，相反，两者通常较为容易结合在一起。在现代资产阶级国家中，资本寡头或者直接参与政治过程，成为国家权力自身的一部分（如叶利钦时期的俄罗斯和家族统治的亚非拉国家），或者以代理人的方式通过国家来实行间接统治（如美国）。难道美国强大的公司院外活动集团、财团领袖与国家官员的职位轮换制不也是一种寡头统治吗？而俄罗斯的资本寡头对国家的影响也在逐渐向迂回和不引人注意的方向演变。哪怕在北非那些所谓的“独裁者”国家中，也存在着被看做现代民主国家特征的一切政治形式：多党制、选举制、议会民主制等。只是，当突尼斯的本·阿里执政长达23年时，他被称为“独裁者”，而德国的科尔执政16年，德国依然是“民主国家”……所有“民主”或“不民主”的国家，它们的共同本质都

是国家政治统治与大资本统治的统一体。正如马克思说过的，所谓的现代国家，“不管它们的形式如何纷繁，却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建筑在资本主义多少已经发展了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上。所以，它们具有某些极重要的共同特征” [9] 。它们的共同特征同样也反映在政体上。普京构建的国家官僚资本主义体制是对叶利钦时期混乱失序的局面进行调整的结果，是俄罗斯资本主义正常发展对重建秩序的必然要求。但是俄罗斯国家形式中存在的特点，在美国或西方的国家形式中也能发现，因此俄罗斯的共产党和左翼在这种国家形式下所遇到的问题和所受到的限制，美国或西方的共产党和左翼在美国的国家形式下也能遇到（美国建国200多年来，就连第三个资产阶级政党或独立候选人都没能挤入主流政治生活，更别说共产党或左翼会有选举胜利的可能）。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的民主和政治自由都是有限度的，它们之间的差别仅在于不同限度的民主间的差别。

俄罗斯左翼问题所具有的一般历史意义就在于，它反映了在非中心国家更有局限性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制约下，左翼反抗资本主义、争取社会主义替代道路的特点，以及这一反抗实践的内在难题，并给了我们一些重要的启示。

（1）由于非中心国家的社会矛盾更为集中、尖锐，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在取得胜利并实现资产阶级的政治自由后，一般又分为两种情况：如果社会缺乏有效的力量制衡或中央权威的控制，就容易形成持续的流血冲突、政党更迭、政局动荡局面，左翼政党若抓住社会斗争矛盾转化的有利时机，是存在相对大的上台执政机会的，拉美和摩尔多瓦的左翼或共产党上台的情况已证明了这一点。如果为了平衡各个阶级和集团的利益，形成了相对强大的权威中心，它必定会造就或重新造就官僚寡头集团专政，官僚寡头集团集中调动全部经济和政治资源来对付反抗运动，使原有的政治自由成果被取消或削弱，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政党的夺权无论是采取议会选举道路还是非法的武装斗争，都将变得更为艰难。俄罗斯的资产阶级政治自由是由苏联党内外、体制内外的自由派相互勾结，并通过领导反体制的社会民主运动率先争取到的，但其结果不仅没有实现真正的政治自由，反而造成疯狂的大资产阶级寡头独裁统治。俄罗斯共产党和其

他左翼力量不得不独自来消化历史的这枚苦果，被迫承担起新的民主主义变革的重任。因此，非中心国家推翻官僚寡头专制制度的群众民主运动必须由社会主义革命政党和其他左翼爱国主义力量来领导，并通过社会主义来加以最终保障，从而使民主主义任务在争取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一次实现，否则社会主义政党将不得不再次面临在新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进行更为艰巨的二次革命的任务。

（2）非中心国家的共产党和左翼争取社会主义道路的全部问题关键在于如何处理好合法议会道路和非法斗争的关系。直接形式的武装斗争在尚未解决封建割据和封建压迫问题的国家是有非常大的可能性的，但在更多地消除了封建割据，并已建立资产阶级政治统治一般形式的国家，包括俄罗斯，武装斗争可能性非常小，再加上非中心国家社会矛盾的多重性，这也决定了过渡道路上存在更大的曲折性。然而在一方面议会选举道路获胜希望已十分渺茫，另一方面工作重心转向议会外的群众斗争的情况下，利用尖锐化的社会矛盾的激发，所谓的议会外群众运动实际上也是存在转向暴力的激烈对抗性质的可能的。具有民主主义性质的群众性反抗运动，或许将成为非中心国家反抗实践取得第一步成功的最重要形式。这也是最近中东北非的事件实际上已经反映的重大变化。

---

[1] 陈人江，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2] 到2004年9月止，基本上所有的总统办公厅高官都已出掌国家控股的战略企业，包括石油天然气、军工航空航天、运输通信业、电子传媒业、三大国有银行。

[3] 根据2006年透明国际的调查排行，俄罗斯的腐败指数在159个国家中居第126位。还有人认为，俄罗斯的国家腐败程度远远高于叶利钦时代（转引自陈弘《不确定的俄罗斯力量的回归》，《国外理论动态》2008年第6期）。

[4] 刘淑春主编《当代俄罗斯政党》，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第147页。

[5]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0/200612/13435.html.

[6] 石油巨头尤科斯公司、工业巨子帕塔宁都资助过俄共。俄共国家杜马议员团里也有多位工商界人士。

[7] 2003年国家杜马选举，俄共遭到惨败，占据的议席骤减，票数远远落后于第一大党“统一党”。一年后，俄共在国家杜马中的席位又减少5席，根本无法与议席6倍多于自己的统一党抗衡；2007年第五届国家杜马选举中，俄共席位上升了5席（57席），但相比之下，统一党上升了9席，占据2/3以上多数，并获得杜马主席、第一副主席、6个副主席职位以及26个杜马委员会主席职位，而俄共只拥有一个副主席和两个委员会主席职位。2007年的地方立法机构选举中俄共情况有所好转，但到2008年俄共又遭受了史无前例的惨败，在5个地区立法会议选举中失去了两个地区立法会议议席，并被“公正俄罗斯党”抢去了第二党团的位置，统一党则获得了这5个地区的绝大多数议席。

[8] 俄共在地方上的支持率和影响力一向超过它在中心区莫斯科和彼得堡的支持率和影响力。

[9] 美式或西式民主里同样包含着“可控民主”的因素，如预先在固定的利益集团或党派中分配角色，提高参选条件，将非主流力量排除在选举程序之外，金钱开路，操纵媒体，控制舆论，两党轮替、赢家通吃。

俄罗斯左翼学者：质疑现实，憧憬未来

——写在苏联解体20周年

丁军 杜宝玲 [1]

一 对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质疑

1.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衰退

首先，俄罗斯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与1990年相比，20世纪末的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52%（1941～1945年战争期间仅下降22%）；工业生产减少64.5%；农业生产减少60.4%，消费价格上涨了1.7百万倍。” [2]

其次，“人类发展指数”世界排名持续后退。最新资料显示，2010年俄罗斯人类发展指数世界排名跌至第65位 [3] 。

2.频繁发生社会问题

首先，多数俄罗斯人对社会发展状况不满。1993～2001年间，俄罗斯社会和民族问题独立研究所共7次向俄罗斯居民进行调查（其中1998年4月、8月分别调查两次）。调查结果显示，认为由于这些年“改革”而遭到损失的人，每次分别占被调查者的57.4%、86.1%、64.8%、65.6%、72.4%、63.7%、51.3% [4] 。

其次，失业问题困扰着俄罗斯。据俄新社报道，截至2010年2月10日，俄罗斯登记失业2232026人 [5] 。2011年2月19日，梅德韦杰夫接见议会党团领袖时说：“尽管最近一段时间我们成功地减少了失业总量，就业率已经接近危机前水平，但是，依然存在大量的失业人员。” [6]

再次，武装冲突、恐怖事件频发。

3.沦为世界“外围国家”

首先，难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被排除在世界主线之外。而加入21世纪经济发展最为强劲的亚太地区成为俄罗斯更加现实的选择。但是，俄罗斯同亚太相连的地区经济发展相对缓慢。这一切使俄罗斯加入世界经济体系的前景十分不明朗。

其次，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作为西方发达国家能源资源提供者的作用被加强。例如，1997年，矿物原料和燃料在俄罗斯向非独联体国家的出口中所占比重高达47%，黑色和有色金属占23.4% [7] 。然而，石油、天然气等能源资源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可持续发展空间不足。另外，仅仅依靠能源资源出口获取收入是不可靠的：一方面会受到国际能源价格的影响，另一方面“石油美元”并不一定会真正被用来服务于俄罗斯本国居民。正如斯莫林 [8] 所说：“目前俄罗斯通过销售石油和天然气有美元收入……但是由于美元贬值，这些钱不但没有给人们带来任何好处，反而使国家财政收入蒙受巨大损失。” [9]

4.陷入混乱的思想体系

首先，表现在否定历史上。“曾经是俄罗斯人的骄傲的所有英雄都被妖魔化，包括伟大的卫国战争的英雄，甚至包括彼得一世，叶卡捷琳娜二世等。整个20世纪80年代的俄罗斯历史完全是虚无的历史。” [10]

其次，表现在媒体宣传上。“事实上，媒体所进行的是毁灭国家的工作。有些记者是在不知不觉中做了这些，而有些记者则是为西方金钱服务。通过媒体宣传，使西方化逐步转化为一种理想。俄罗斯和苏联文化被认为是‘不值一提的’、‘落后的’，苏联历史被称为‘极权主义历史’。” [11]

再次，表现在年轻人的行为上。在年轻人中间，从前的自由、善良、平等、真诚、互助的思想被扭曲、嘲笑，代之以色情、暴力、贬低自己和崇拜西方等。那些依然忠诚于道德和诚信，忠诚于社会主义理想的人或者被边缘化，或者被公开嘲笑，被称为“改革的敌人”、“极

权主义残余”等[12]。最可悲的是，青少年中嗜毒风行。据2006年3月2日联合国控制毒品国际委员会（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комитет по контролю за наркотиками при ООН）报告显示，俄罗斯吸毒人数可能达到600万，占居民总数的4%。其中年龄低于24岁的吸毒者达到200万人[13]。

二 对社会主义未来前景的探索

正如C.C.扎拉索夫所言：“假如我们在放弃了社会主义制度后全速前进，达到了从前社会主义条件下不曾有过的科技进步和国家富裕，我们可能还可以说社会主义遭到了彻底的失败。但是，这一切都没有发生，有的，只是与之相反的状况。”“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那些遭受资本主义剥削的人一如既往地需要社会主义。”[14]进而，俄罗斯左翼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未来社会主义进行了阐述。

1.斯莫林：未来的社会主义是民主社会主义

（1）阐明民主社会主义的内涵。斯莫林认为，作为21世纪俄罗斯社会发展前景的民主社会主义在原则上有别于社会民主主义者对民主社会主义所作的理解。大部分社会民主主义者把“民主社会主义”理解为一种努力接近却永远不能实现的社会理想。事实上，“民主社会主义，同时并且首先是一种社会制度模式，有一系列固有的属性：生产建立在不破坏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占优势的混合型经济制度，优先发展教育、科学和文化，合理范围内的社会不平等……”[15]，是完全可以实现的。（2）论证了民主社会主义能够实现的理论依据。

第一，历史上还不曾有哪种新的社会形态在建立之后就一直倒退，然后被原来的社会形态所取代。倒退性的社会运动总是暂时的，并且也只是部分地回到前社会。因此，俄罗斯由社会主义倒退为资本主义也只是暂时性的，认为社会主义不可能实现的观点与以往所有的历史经验不符。

第二，客观的历史分析证明，社会越发展，社会公平程度越高。

换言之，效率越高的社会其公平程度也越高。反之亦然。由此可见，随着社会化程度、生产效率的不断提高，资本主义将走向灭亡。民主社会主义的实现将成为历史的必然。

第三，从国际上看，在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出现的建立在工人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经济结构、相对较高的生活水平、发达的社会保障体系、积极的经济调节以及消除社会不平等，都是社会化的表现。换言之，西方发达国家文明化的发展在许多方面也是这些国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3）剖析了实现民主社会主义需要克服的障碍。

第一，斯莫林认为，为了完成向新社会的转变，至少需要两个条件：向新社会转变的前提条件已经成熟，旧的社会制度已经极不稳定，即必须要有一定的社会政治革命的先决条件。“通过一个简单的统计分析就可以看出，发达国家在头两个1/3的时间里的革命的机会从数量上要比最后一个1/3时间的机会多许多。显然，资本主义最不稳定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但是当前却依旧没有出现新社会形成的先决条件。”[16] 俄罗斯自普京执政以来，尤其在最近几年时间发展较快，社会革命的先决条件变得不明朗，这无疑会增大实现民主社会主义的难度。

第二，如何成功地解决社会革命的民主性和在政治革命进程中产生的政府专制行为之间的矛盾。“通常情况下，如果没有一个强势的政府就不可能实现一种社会制度根本转变为另一种社会制度。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无产阶级专政很容易转变成为官僚专政，官僚专政会导致资本主义的复辟。这在许多国家，包括苏联，已经发生了。理论上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大家都很清楚：劳动人民自治运动的发展。然而借助于这把‘钥匙’的帮助却至今都没有打开通往真正的人道民主社会的大门。”[17]

第三，如何解决更高程度的社会化与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实践证明，当前社会的消费模式已经耗尽了自身，试图将这种模式推广到全人类无异于是让人类社会在能源和生态危机中走向灭亡。“用发展代替增长”的口号预示着要用另一种可调控的更加公平的社会模式来

取代当前的社会模式。但是，这个口号未必会对国家上层社会产生感召力，他们面临着为了共同的生存状态牺牲部分财富的境况。同样，群众也未必能够在“新的社会模式还是灭亡”中作出清醒的选择。不敢断定，人类在面临一时的满足和生命的延续两者的抉择时，是否会根据“只要我们安全，哪怕以后洪水滔天！”的原则而选择一时的满足。

（4）明确了左翼力量面临的任务。

第一，迫切需要进行革命性的变革。因为就社会保障水平而言，俄罗斯不仅远远落后于苏联时期，也被许多欧洲福利国家抛在了后面。包括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在内的各国政府消费预算中用于社会发展规划的份额，世界平均水平为22%，而在俄罗斯最近几年这个份额都没有超过16% [18] 。改革已经势在必行。

第二，必须争取政治权力。因为革命性变革只能在哪怕是相对的政治自由的框架内才有可能发生。由于控制国家的是那些把权力和财产都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寡头机构，如果没有“自下而上”的压力，仅仅按照自身的意愿，他们是绝不愿意有广大居民“分享”其财富的。因此，争取政治权力成为左翼力量面临的一大任务。

第三，必须联合其他政治力量。因为国家政策的制定是既无“鱼”也无“渔”，即既不提供社会保障，也不提供独立谋生的机会，因此必然会引起全社会的普遍反对。斯莫林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共产主义者，为了争取政治权力，要同其他渴望政治自由的政治力量相互配合。“可以不和他们合并，可以不建立政治联盟，但一定要在搁置各自社会经济纲领分歧的条件下同包括文明的自由主义者在内的其他政治力量相互配合。” [19]

2.斯拉温 [20] ：未来社会主义应最大化彰显“自由”这一特征

“社会主义”一词从不同的方面可以作出不同的理解。斯拉温认为：“在各种有关社会主义的‘变体’中把真正社会主义区分出来的最大特征就是自由。” [21]

（1）厘清了“自由”的本质。斯拉温指出，这里的自由不能仅仅理解为只是一种否定，不能仅仅作为“免于……”来理解。极端的自由是摆脱一切物质的东西。显然，在现实世界里是不可能实现的。而马克思主义对自由的理解是从事实出发，是唯物主义的。自由是对阻碍的克服，是在认识自然和社会规律基础上的人控制其周围自然和社会环境的权利。没有权利的自由是空谈。在对自由的这种理解中，人不是消极的管理客体，而是富有创造性的积极的活动主体。（2）阐明了生产资料社会所有是实现劳动人民自由的基础。社会所有或联合所有本身并不是自由，而是自由的必要基础，是通往自由的必经之路。因为只有那些掌握生产资料的人才有真正的自由。如果公共财产不是由整个社会使用，而是由官僚支配的话，通往自由的道路就必然会被扭曲。“这里需要指出，私有制带来的是私人业主的自由，公有制带来的是全社会或劳动人民个体联合和协作的自由。在私有制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对一些人的自由意味着对另外一些人的不自由——对这些人而言，自由那是‘别人’的事儿。”[22]

（3）论述了自由需要通过真正的民主加以保障。

民主有一个模式：“权力属于劳动者并为劳动人民服务。”这种模式符合社会主义的特征。在苏联历史上存在过的“变形”的社会主义国家，劳动人民的权利被篡夺，一个人或少数人以劳动人民的名义开始管理国家，群众的自由逐渐消失，各种各样的社会异化现象不断出现，这都是从自由向奴役倒退的例证，这是对社会主义理想或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直接歪曲。正是这种歪曲成为一些人批评社会主义的口实。“而真正的社会主义和民主是两个不可分割的概念，通过民主保障自由的真正实现。”[23]

（4）提出了工人阶级是实现自由的重要力量。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个人的自由只有在集体中才能表现出来，因为个人按其本性来说就是社会性的人。在真正的社会主义或集体主义条件下，个人的自由也是通过集体得到保障的。无论集体还是国家并不是作为个人的对立面出现，而是个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而工人阶级则是为了自身创造性潜能和生产力的释放而联合起来的人，其最终目的是要把自身和全人类

从各种形式的压迫和奴役中解放出来，将每一个人的劳动都变成创造性的、社会性的劳动。可见，工人阶级作为劳动人民的代表，是实现自由的重要力量。

3.普里加林[24]：未来社会主义应当体现其“过渡”的属性

“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社会主义是一系列积极属性的集合”的观点普遍得到赞同。例如，1990年出版的《大百科词典》关于社会主义的定义中包括13个特征：“人道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居于统治地位，向人民群众开放所有信息来源，建立包含一切世界优秀文明成果的进步的社会主义文化，形成建立在社会公平、团结和集体主义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生活方式，让劳动人民对未来充满信心，并在精神和道德上成为新的社会关系和个人命运的创造者……”[25]

普里加林认为，就这些属性本身而言，每个都很好，并且迟早都会在生活中实现。“但把它们放在一起，就会形成一个僵化的体系。”[26]这种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其本身完全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方面，他们不允许社会主义有任何的不足，哪怕是从资本主义那里遗留下来的；另一方面，过度夸大社会主义的优点，其实质就是将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特征人为地“提前”到社会主义阶段。

社会主义的本质究竟是什么？普里加林认为，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过渡状态。

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必然具有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等属性。“在这方面现实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尽管存在许多的不足之处，但和理论上的社会主义原则是相符的。坚信社会主义的这些根本特性同时就意味着消除了资本主义社会相应的弊端。”[27]同时，应当看到社会主义一些潜在优势只能在进一步的发展中，在即将进入社会发展较高阶段，甚至在进入高级阶段后才可能出现。例如，所有社会成员都能够创造性地劳动，同资本主义相比存在更高的劳动生产率等。

“直到现在，谈的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先进性，这些特征明确了

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方向。多年来，理论家在分析社会主义的过渡性时往往更强调它的一个方面，即‘向共产主义去’，不可否认，这是正确的。但同时却鲜有人考虑到第二个方面：‘由资本主义社会而来’。”[28]“由资本主义社会而来”就意味着资本主义的许多特征必然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作为资本主义“遗留物”并不仅仅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中，而且还存在于社会主义生活里，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和各种关系中。并且这种现象会不断积累并反复出现。例如，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依然是用强制的方式让人们劳动。无论劳动有多光荣，劳动的强制性特征将保留到它成为绝大部分人的生活需要的时候，即直到实现共产主义。又如，社会主义条件下，每个个体、每个独立的单位都对扩大自己在社会财富中所占的份额更感兴趣。具体地说，就是要在按劳分配过程中尽可能高地评价自己的贡献。那么，就必然会出现利益的冲突：中央—地方—企业之间，直到基层集体和个体劳动者之间以及不同地区之间，同一地区的不同的企业之间，同一个集体的不同的车间、生产队和工人之间等。必须认清，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益的冲突并不只是由按劳分配原则实现过程中的错误和不可避免的失误引起的，而是由按劳分配原则本身所引起的，同社会主义正面的特性一样，它也是社会主义不可分离的属性。

---

[1] 丁军，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杜宝玲，沈阳工业大学讲师。

[2] 朱佳木编《当代中国与它的外部世界——第一届当代中国史国际高级论坛论文集》，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第491页。

[3] http：//www.newizv.ru/2010-11-04.

[4] Т.И.Заславская Проблемы в России，Москва，2003，с.114.

[5] http：//www.rian.ru/2010-02-11.

[6] http：//news.mail.ru/2011-02-19.

[7] http：//www.ruseconomy.ru/2002-04-10.

[8] 奥列格·尼古拉耶维奇·斯莫林（Олег Николаевич Смолин，1952~）：

哲学博士，教授，国家杜马教育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全民教育”社会运动主席。

[9] О.Н.Смолин Новейш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в России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социализма 21 века，Социализм 21，Москва，2009，с.710.

[10] И.Н.Панарин О развале СССР，http：//www.rakurs-art.ru/ 2007-04-15.

[11] И.Н.Панарин О развале СССР，http：//www.rakurs-art.ru/ 2007-04-15.

[12]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 и СМИ，http：//www.deodar.ru/2006-08-16.

[13] Проблема наркомании в России，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е данные，http：//www.medsovet.info/2006-05-26.

[14] С.С.Дзарасов Переосмысление социализма 21 века，Социализм 21，Москва，2009，с.451.

[15] О.Н.Смолин Новейш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в России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социализма 21 века，Социализм 21，Москва，2009，с.705.

[16] О.Н.Смолин Новейш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в России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социализма 21 века，Социализм 21，Москва，2009，с.707.

[17] О.Н.Смолин Новейш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в России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социализма 21 века，Социализм 21，Москва，2009，сс.707-708.

[18] О.Н.Смолин Новейш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в России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социализма 21 века，Социализм 21，Москва，2009，с.715.

[19] О.Н.Смолин Новейш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в России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социализма 21 века，Социализм 21，Москва，2009，с.718.

[20] 鲍里斯·费奥多罗维奇·斯拉温（Борис Фёдорович Славин，1941～）：国立莫斯科师范大学教授、哲学博士，科学院政治学成员，“社会—民主联盟”执行委员会委员。

[21] Б.Ф.Славин О социализме，свободе и тоталитаризме，Социализм 21 века，Москва，2009，с.86.

[22] Б.Ф.Славин О социализме，свободе и тоталитаризме，Социализм

21 века，Москва，2009，с.88.

[23] Б.Ф.Славин О социализме，свободе и тоталитаризме，Социализм 21 века，Москва，2009，с.90.

[24] 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普里加林（Алексей Алексеевич Пригарин，1930～）：俄罗斯著名经济学家，“俄罗斯共产党—苏共”第一书记。

[25] А.А.Пригарина Социализм，спор о прошлом и будущем，http：//www.sozialismus.ru/2010-04-01.

[26] А.А.Пригарина Социализм，спор о прошлом и будущем，http：//www.sozialismus.ru/2010-04-01.

[27] А.А.Пригарина Социализм，спор о прошлом и будущем，http：//www.sozialismus.ru/2010-04-01.

[28] А.А.Пригарина Социализм，спор о прошлом и будущем，http：//www.sozialismus.ru/2010-04-01.

第五篇 苏联解体后资本运动的新特点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

关于苏联解体的几点思考

张国祚 [1]

一 苏联解体是好事还是坏事？

“好”和“坏”都是价值判断，价值判断都与判断主体的立场紧密相关，主体的立场又难免跟随其利益变化作调整。因此，不同国家、不同群体、不同时期对某一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也会有所不同。在这个问题上，俄罗斯和独联体其他国家的看法有区别，独联体各国普通百姓和上层官员看法有所不同，知识分子和军人看法也有所不同。即便同一个人，不同时期对同一事件的看法也会有变化。苏联著名作家、持不同政见者马克西莫夫对苏联党和国家有很多批评意见，但是1994年，当他目睹苏联解体给苏联带来的灾难后，他对《真理报》记者说：“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对现在发生的一切感到如此痛心”，就好像“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母亲被强奸一样，再没有比这更难受的了”。显然，马克西莫夫对苏联解体由欢迎转变为伤痛了。因为，有目共睹的事实是：有理想、有信仰、有干劲、热爱祖国、甘于奉献的苏联公民不见了，却能见到一些迷茫、困惑、盲目、低效率、分裂的、缺少安全感的、不知明天将向何处去的俄罗斯民众。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斯大林格勒6大工业区、绵延80公里，仅用3年时间便从废墟中崛起；而苏联解体后，一座横跨伏尔加河的大桥竟然蹉跎了12年岁月也没建成。显然，理想信念的缺失，使一个伟大的民族变得迷茫、消沉了。在苏联生机勃勃、迅速发展的时期，正是马克思主义最受干部群众欢迎的时期，也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成为广大干部群众

理想信念的时期。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名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所反映的故事背景，就是那个火热的年代。其中脍炙人口的名言不仅影响了那个火热年代的苏联人，也影响了新中国成长起来的几代人，乃至我们现在都可以背诵那段名言：“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一个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贡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全人类的解放而斗争。’”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有这样的信念和激情，就没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就必然能取得举世震惊的成就。然而，苏联解体后，由于理想信念的丢失、思想理论的混乱，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10年下降了一半。两极分化、人口锐减、人均寿命降低、酗酒闹事、卖淫嫖娼、无家可归等社会问题成堆。治安混乱、犯罪猖獗、人为灾难时有发生、国家职能弱化、悲观情绪弥漫。一个过去在军事上令美国寝食不安的超级大国，现今在美国面前已经强硬不起来了。这种状况，虽经普京任总统以来强力扭转，初见成效，但今日俄罗斯国际地位依然远不及苏联时期。不管在苏联解体当时俄罗斯人是什么心情，现在回头看，凡是有民族自尊心的俄罗斯人都会惋惜苏联的解体。对美国和北约国家来说，苏联解体，使它们减少了一个强大的对手。对苏联周围的邻国来说，苏联解体，使它们减轻了对一个强大邻居的不安。对中国来说，苏联解体既是坏事，也是好事。之所以是坏事，是因为毕竟这是世界社会主义的重大挫折，而且使另一个超级大国的称霸行为少了一个最强有力的制约；之所以是好事，是因为既为中国消除了一个超级大国陈兵百万于中国边境的威胁，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亡党亡国的深刻教训。

二 苏联解体对中国来说有哪些教训可汲取？

1.必须坚持和发展科学的治党治国理论

科学必须以事实为依据，科学的理论必须符合实际。科学的治党治国理论必须符合党情国情而又能与时俱进。马克思列宁主义原本是符合俄罗斯国情的科学的理论，否则就不能取得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否则英国前首相丘吉尔也

不会高度评价斯大林："他接手的是一个使用木犁的国家，撒手人寰时却是一个拥有原子弹的国家。"但是，社会主义是前所未有的新生事物，需要不断探索和完善；马克思列宁主义也需要不断丰富发展，既不能僵化，也不能随意扭曲。斯大林晚年故步自封、迷信盛行、理论停滞。而赫鲁晓夫上台以后走向另一极端，苏联逐步走向政治自由化、经济私有化、理论非马克思主义化，这个"三化"始于赫鲁晓夫，终于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背叛马克思主义是苏联解体的思想理论根源。

2.必须牢牢把握意识形态主导权和正确的舆论导向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苏联解体虽然结果突然，但它是个慢慢积累演变的过程，从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大反斯大林开始，苏联意识形态领域和舆论导向就开始混乱，人们开始怀疑和否定苏联共产党，怀疑和否定苏联社会主义，怀疑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美国不失时机地在苏联周围建立了60多个电台，用苏联各民族语言全天候对苏广播，歪曲和丑化苏联党和国家的历史，歪曲和丑化社会主义，美化西方"自由、民主、人权"价值观和资本主义制度。1968年，勃列日涅夫曾主持过一次苏共中央意识形态工作会议。他不无担心地说："看一看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人们是在怎样攻击和诽谤我们的党，然而，我们有哪个共产党员勇敢站出来批驳那些错误观点？没有。"不难看出，当时苏联共产党已经比较涣散了，信仰动摇，理想淡漠，原则性失落，战斗性减弱，苏联共产党无产阶级性质逐渐褪色，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社会思潮开始泛滥。到了戈尔巴乔夫鼓吹"新思维"，乃至宣布解除报禁和党禁时，终于导致苏联文化软实力大厦坍塌，苏联解体已经覆水难收了。意识形态防线崩溃和舆论导向失控，是苏联解体的深层原因和直接的导火索。

3.必须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

由于苏联共产党采取单一的统得过死的经济模式，不适应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过度重视军火工业，而忽视民用工业，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得不到满足，而苏共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背叛，

对无产阶级政党宗旨的背离，又使党内的特权阶层逐步形成，腐败现象频频发生，社会收入的两极分化日益明显。那些掌握实权的既得利益者，为了进一步中饱私囊，攫取更大的私利，便迫切需要彻底摆脱原苏联体制的束缚，因而便以“改革”的名义，喊着“自由、民主、人权”的诱人口号，加速推动苏联的解体，摇身一变成了解体后新政的官员。而对经济生活和政治民主不满的广大民众，很容易为这种诱人的口号所鼓动。这是苏联解体的社会经济基础。

三 中国为什么没有重蹈苏联解体的覆辙

苏联解体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谷，西方一些人开始为社会主义全面失败和资本主义全面胜利准备庆功酒了。美国日裔学者福山发表了轰动一时的著作《历史的终结》，美国前国务卿布热津斯基出版了结论性的《大失败——20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也发表了《1998：不战而胜》。一些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组织动摇起来，开始了改旗易帜的步伐。许多关心社会主义命运的中外人士，或明或暗地、不无担忧地提出疑问：中国这面红旗到底还能打多久？20年过去了，尽管中国面临很多问题、困难、风险和挑战，但是，中国这面红旗不仅没倒，而且举得越来越高、越来越稳、越来越好。为什么？因为我们从苏联解体的教训和中国自己的经验教训中悟出并遵循以下道理：其一，马克思主义只有不断结合新的实践而与时俱进，才能永远保持它的科学真理性。其二，社会主义只有同各国实际相结合，才能生根开花结果。其三，必须加快发展生产力，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只有这样才能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护。其四，苏联解体是社会主义的一大挫折，但不是社会主义历史的终结。其五，舆论导向正确，利党利国利民，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误党误国误民，是党和人民之祸；务必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其六，不要苛求历史伟人，不要糟蹋党领导人民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奋斗历史，否则必然自毁长城。其七，民主应当追求，但要符合国情、循序渐进；不要把西方民主当成普世价值，否则必然引起社会动乱甚至是灾难。

---

[1] 张国祚，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

苏联解体后资本运动的新特点与社会主义斗争的新任务

余文烈 [1]

资本运动分析是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的基本方法，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这种分析方法同样是今日研究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未来发展趋势的有力武器。本文试图分析当代资本运动的规律和苏联解体后的新特点，揭示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必然逻辑，并通过解剖不合理的世界货币金融体系所形成的金融霸权对整个世界的超级掠夺，提出世界社会主义斗争的新任务。

一 资本运动、苏联解体与全球金融危机

为了从纷繁复杂的当代资本运动清理出一条简约的基本线索，本文将突出两个特点。第一，对当代资本运动的分析将深入到其具体形式——资本社会化、资本自由化和虚拟资本运动。第二，通过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发生的三个重大事件——资本主义新变化、经济全球化和全球金融危机——的资本运动特征，揭示马克思资本运动理论的当代演绎过程。

根据以上思路，可以把当代资本运动的发展过程按照资本运动的具体形式划分为三个阶段：资本社会化阶段、资本自由化阶段和虚拟资本运动阶段。深入的研究表明，三个阶段的资本运动决定了当代资本主义所发生的三个重大事件的性质，我们曾经在一系列的研究论文 [2] 中表达了如下基本结论：

——资本社会化趋势是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重要内容和内在动力；

——资本自由化扩张是经济全球化的巨大推手和根本实质；

——虚拟资本运动疯狂是全球金融危机的主要根源和必然结果。

这三个基本结论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衰及其资本运动的内涵与实质。如果进一步把这些事件的资本运动方式联结起来，就可以勾勒出当代资本运动的基本画面，并从中看到它们与苏联解体存在着的千丝万缕的关系。

最初，资本运动披上含情脉脉的面纱，首先以资本社会化的趋势展示出来，推动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新变化。此时的资本运动之所以含情脉脉，是因为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冲击以及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诞生的挑战，资本暂时收敛了疯狂的本性。而资本社会化在推动当代资本主义新发展、新变化的过程中，也确实展示其推动社会进步的方面，包括推动生产力（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推动所有制关系的社会化趋势和分配形式上兼顾平等，以及由此推动政治上层建筑的变革。这个阶段从战后开始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大约30年。值得重点关注的是最后10年。在这最后10年间，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中的积极面已经充分展示；而随着英、美新保守主义政治势力的登台和新自由主义占据主导地位，资本垄断加强，金融资本统治加深，国际垄断资本势力强化，资本剥削方式与特点改变，超级大国以资本的国际剥削部分地代替了国内剥削。

资本社会化一方面使巨额资本集中在一起，为资本自由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资本社会化推动了当代资本主义新发展、新变化。这种新变化，在某种程度上是在资本主义危机中从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当中吸取了教训，所进行的变革的结果。这也是当时所流行的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趋同论”现象。资本主义的新发展、新变化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优越性”夸张地展示出来。与此同时，当时的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则疲于应对帝国主义在政治、军事、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挑战而忽略了民生方面的建设，因而在这方面显得相形见绌。由此，如同一些论者所指出的那样，资本社会化所推动的当代资本主义新发展、新变化，成为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因素。应当指出，苏联解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宗教的、意识形态的等等，国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只是经济建设中的一个问题。但人们也无法否定上述论者的结论。

如果说战后前30年资本运动的主角是资本社会化的话，那么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以后的30年，资本运动的主角就是资本自由化了。这30年还可以划分为20世纪最后20年与21世纪前10年两个阶段，因为21世纪以来资本运动已经进入激烈的虚拟资本运动阶段。

20世纪80年代以后，资本社会化已经为资本自由化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随着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展开，资本自由化浪潮以翻江倒海之势，打破国家疆域壁垒，消除管制，在全球范围内争自由、谋利润和求扩张，并为资本社会化开辟了更加广阔的空间。资本主义进入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本剥削出现了新的特点，进入“全球剥削”的阶段，并加剧了世界的两极分化。

值得重点关注的是20世纪的最后10年。因为只是在苏东剧变以后，以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才得以形成汹涌澎湃之势，资本自由化运动也开始肆无忌惮起来。虚拟资本运动开始进入主角，一系列局部金融危机逐渐爆发，苏联解体后刚刚在进行“休克疗法”的俄罗斯也很快被拖进金融危机之中。

新世纪的10年同样值得重点关注，因为这是虚拟经济迅速膨胀和虚拟资本运动疯狂表演的10年。资本运动撕开含情脉脉的面纱，露出狰狞面目，按照马克思当年所立下的经典名言群魔乱舞——“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百分之十的利润，它就保证被到处使用；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资本为了追逐利润，在疯狂的金融衍生品交易中处处设下罪恶的陷阱，在信用评级的过程中丧尽天良。终于，导致了全球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

疯狂资本运动的天然敌人是社会主义运动。在苏东剧变和苏联解体以后，帝国主义霸权没有了争霸的对手和阻力，开始为所欲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经济全球化为幌子，以金融自由化为先锋，向整个世界蔓延。当年的美苏冷战转变为货币战争——不再是“资本主义阵

营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斗争，而是发达资本主义对“依附资本主义”和其他欠发达国家的掠夺战，力量的悬殊可想而知。资本开始疯狂起来，“异化”的资本不仅控制着资本主义，而且冲击了整个世界。而在不合理的全球货币金融体系中形成的华尔街金融霸权，则把（资本主义）世界绑架在疯狂的虚拟资本运动这台战车上。终于，华尔街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却让全世界埋单。

以上就是当代资本运动逻辑演绎的简要过程，其中显示了苏联解体以后资本自由化和虚拟资本运动的新特点。

二 资本绑架世界，社会主义何以争创未来？

现在来进一步讨论为什么说华尔街金融霸权绑架了整个世界，以及在新的国际环境下世界社会主义面临的新挑战和新任务。

1.华尔街金融霸权绑架了整个世界

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但是发生国家主权债务危机的不是美国，而是像希腊和葡萄牙那样的国家，这是为什么？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全世界为它埋单，这是为什么？美国现有50万亿美元资产，但负有73万亿美元的债务，从技术层面说已经破产，然而美国非但没有破产，反而依然颐指气使，这是为什么？……所有问题种种，答案只有一个：根本原因在于现有不合理的世界货币金融体制。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占据霸权地位，在国际经济活动中产生不公平和不平等。“这些现有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问题从根本上导致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引发了国际资本市场的动荡。”[3]

为了深入了解华尔街金融霸权如何绑架与掠夺世界，让我们先看看当代全球货币金融体系的运行机制。

根据金融学界专家学者的研究，可以将当代全球货币金融体系划分为相互区别又紧密联系的五大市场体系或价格体系，它们构成一个相互交错、层次分明的金字塔式的全球价格决定体系[4]。

第一层：货币发行体系、货币市场体系和货币价格体系（主要是全球基础货币发行市场和发行机制、交易量同样巨大的外汇市场，以及汇率制度的安排等）。

第二层：全球信用市场体系（包括交易量异常巨大的国债市场、公司债券市场、地方政府债券市场，以及由此派生的衍生金融工具市场等）和价格体系。

第三层：全球企业股权市场体系（包括公开股票市场、私募基金、风险投资、收购兼并等所构成的庞大的全球资本市场体系）和价格体系。

第四层：全球战略资源市场（包括石油、天然气、铁矿石等大宗商品市场）和其他生产要素市场体系（包括人力资本和科学技术市场）和价格体系。

第五层：全球最终商品和服务市场体系和价格体系。

可以看出，在以上五个层次构成的全球金字塔式市场体系和价格体系中，君临全球货币金融之巅的是美元储备货币体系或美元本位制。

全球货币金融价格体系的传导机制从顶层开始，自上而下。也就是说，由美联储决定美元储备货币的发行量和储备货币的价格，决定了全球信用市场的价格，再决定世界各主要金融中心的基准利率水平，再决定全球企业股权市场的兴旺发达和全球信用资金的流向，再（由货币信用市场和少数几家最具权势的美国金融机构一起）共同决定全球战略资源价格和其他重要生产要素的价格，并最后（由货币信用价格和战略资源价格共同）决定最终商品服务市场的价格（譬如石油价格和铁矿石价格直接决定我国成品油和钢铁价格，成品油价格和钢铁价格直接传导到几乎所有最终商品价格，连最普通的蔬菜、猪肉和鸡蛋也不能例外）。

那么，哪个市场决定储备货币（美元）的价格呢？亦即哪个市场

决定全球长期通货膨胀率和长期利率呢？显然，就是美国国债市场。美国国债市场是“高高在上”凌驾于全球金融市场的魔王。

另一方面，美国信用评级公司的评级模型也是依照美国债市运转机制构建起来的。“如同美国国债市场及其信用级别是全球货币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命门和枢纽一样，每个国家的主权信用级别和债券市场则是该国金融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命门和枢纽。谁能够决定一国主权债券的信用级别和债券市场的价格水平，谁就站到了整个金融市场乃至整个经济体系的权力之巅。”[5] 站在这“权力之巅”的就是华尔街评级机构。

这样，一个高高在上的美国国债市场，一帮掌控了他人“命门”处于“权力之巅”的评级机构，现有不合理的世界货币金融体制形成了华尔街金融霸权，后者牢牢地控制了整个世界的金融系统。

华尔街评级机构手握重权，以审判者自居，可以在全球呼风唤雨。一方面，它维护美国国债市场的最高利益，俨然护法神棍。因此，反过来说美国有意庇护华尔街的所作所为也就不是空穴来风。另一方面，它对其他国家主权债务和公司债券评级具有“生杀予夺”的权力。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过程中下调泰国主权信用评级、韩国的主权信用评级、日本山一证券所发行债券的信用级别，2010年4月欧洲债务危机过程中下调希腊主权债务评级、葡萄牙主权债务级别，等等，表明这些评级机构有引发危机和推波助澜的嫌疑，甚至与华尔街其他“国际投行”共同导演“惊天阴谋”[6]。

那么，华尔街金融霸权如何绑架世界掠夺世界呢？

（1）金融霸权支撑美国庞大开支。由于华尔街的金融霸权地位，无数外国政府、公司和金融机构不得不到华尔街市场融资和投资，为美国国债和其他债务工具埋单（其他债券等级“都不如美国国债”呀），支撑着美国庞大的贸易赤字、国际收支赤字和财政赤字。

（2）金融霸权帮助美国掠夺全球财富。金融霸权帮助美国完成了建立美元大循环的整体战略：开动印钞机发行美元货币→美元流出

换取物质财富→美元回流（卖出国债、股票和各类金融衍生品等）。财富的掠夺以通胀通缩、有毒金融衍生品、信用欺诈等方式完成。

（3）金融霸权使全世界为华尔街金融危机埋单。对自己炮制的金融衍生品处心积虑地提升评级，并把有毒资产推向全世界，众多国家企业投资失误血本无归，甚至英、法、德也无法幸免，昔日的巨富因投资失误走投无路，在全球金融危机中自杀案件频频发生。

2.金融危机、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斗争的新任务

全球金融危机尤其是欧洲债务危机爆发后，西方各国经济急剧衰退，失业率大幅升高，物价上涨，劳动阶层贫困化加重。于是，各种罢工抗议一发不可收拾，工人斗争席卷西欧资本主义世界。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资本主义虽然在危机中受到重创，却远未伤筋动骨。西方国家的罢工潮没有导致革命形势的出现，而仅仅是在资本主义秩序范围内争取捍卫劳动者自身经济利益的一种经济斗争。

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从过去10多年一系列局部金融危机和当前全球金融危机中清醒地看到：不仅劳动与资本斗争双方的力量非常悬殊，而且发展中国家的命运也非常脆弱。之所以出现如此格局，是因为如前所说，国际垄断资本势力掌握了货币与金融战争的“核武器”——一种同样可以置人乃至一个国家于死地的“核武器”。今日反对“异化资本”的斗争绝不能轻视这种“核武器”。美国一位曾在财政部任职的银行家罗杰·奥尔特曼坦言：“如今，我们释放出一种与核武器截然不同但具有差不多威力的力量。这种力量几乎能够在一夜之间推翻政府及其政策。现在还没有适当的体系来控制这种力量。这种力量就是全球金融市场。”《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在其专栏中写下了一段同样入木三分的评论：“我们生活在两个超级大国的世界里，一个是美国，一个是穆迪。美国可以用炸弹摧毁一个国家，穆迪可以用债券降级毁灭一个国家；有时候，两者的力量说不上谁更大。”[7] 这些言论进一步印证了笔者前面提出的观点：一个高高在上的美元和美国国债市场，一个掌控他国金融命脉的评级机构，它们一起形成华尔街金融霸权。金融霸权是当代货币与金融战争中的“核武

器”，而这种新式的“核武器”掌握在当代头号资本主义国家美国手里，或者说掌握在华尔街手里。

正因为美国掌握了这个新式的“核武器”，因此，尽管华尔街的所作所为在今天已被千夫所指，然而，以资产证券化为急先锋的“金融创新”，曾经极大地扩展了美国货币金融市场的全球实力，极大地扩张了美元货币总量和资产总量，极大地加强了美元霸权的地位。

正因为华尔街掌握了这个新式“核武器”，因此，美国本该“破产”却没有破产，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却能够轻而易举地把祸水引向欧洲债务危机，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却让全世界为它埋单。

这种情况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国际垄断资本的势力依然强大，说明劳动对资本斗争的任务极其艰巨，说明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的振兴依然艰难曲折。

因此，我们在坚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光明前景的同时，对当代劳动与资本斗争的道路、斗争的方法方式，乃至在斗争中如何结合长远目标确立当前任务等，都应该有更加深入的思考，并采取更加高明的战略与策略。其中，反对金融霸权、改变目前不合理的世界货币金融体系，应该成为世界社会主义斗争的一项新任务。

---

[1] 余文烈，深圳市委党校教授。

[2] 详细的讨论参见余文烈、吴海山《资本运动、道德风险与金融危机》，《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8期；李慎明主编《美元霸权与经济危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余文烈：《当代资本运动的逻辑演绎》，《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年第1期。

[3] 李若谷：《国际货币体系的重构与国际资本市场发展前景》，《中国货币市场》2009年第1期。

[4] 向松祚：《掌控命门——美国信用评级机构如何影响国际货币金融体系》，2010年5月12日《经济参考报》。

[5] 向松祚：《掌控命门——美国信用评级机构如何影响国际货币金融体

系》，《环球视野》2010年第299期。

[6] 想想高盛10年前对希腊的布局和2010年初对希腊与欧元的金融攻击，人们不能不赞同郎咸平教授有关“阴谋论”的观点。参见郎咸平《希腊危机的惊天阴谋》，2010年6月10日《国际财经时报》。

[7] 江涌：《三大评级机构受到美国政府庇护 掌控中国金融稳定命门》，2010年5月10日《经济参考报》；马也：《新自由主义是国际垄断资本剥削的重要工具》，http：//garderouge.spaces.live.com/blog/cns！81ECBF35C9DE20E4！157.entry。

苏东剧变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探索中前进

姜述贤 [1]

一 建立新型党际关系，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健康发展奠定基础

邓小平等中国党的领导人面临因苏共大国大党沙文主义和中苏论战而导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分裂局面的形势，不仅在国内拨乱反正、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创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而且在总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指出：①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各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根据自己的实际，找出自己的革命道路，决定自己的政策，才能取得成功。②独立自主才真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没有中心、不可能有中心。③国家无论大小、党无论大小，应该一律平等。任何大党或老党都不能以最高发言人自居，对别的党指手画脚肯定要犯错误。“我们一直反对苏共搞老子党和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这一点我们是反对得对了。”“但我们自己也犯了点随便指手画脚的错误。”④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墨守成规的观点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⑤“各个国家应该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实行社会主义的政策。”“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社会主义国家要把生产力搞上去，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不要脱离世界。”“不要搞封闭政策，那样搞不会获得发展。”⑥对曾经有过争论的党主张“过去的一切一风吹，双方统统向前看”，恢复了正常的党际关系。倡导党与党之间要建立新型的关系，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提出了“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党际关系四项原则。按照党际关系这四项原则，突破只同社会主义类型政党交往的传统做法，目前已与世界160个国家近600个各种不同类型的合法政党建立了联系，以开放、开明的形象就彼此关心的和平、发展、进步的问题交换看法，增进人民之间的互相了解和友谊。中国共产党的上述主张和行动，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新形势下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 各具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探索中前进

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经过反思认识到社会主义事业的长期性，不再脱离国情超阶段建设发达社会主义或立即向共产主义过渡，而是独立自主地建设各具特色的社会主义，从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转向探索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中国从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出发，顺应民心和时代潮流，开创了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成功应对国内外众多困难和挑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增了光、添了彩。在当今资本主义占优势的世界，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前进的征途上充满困难和曲折。对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作出新的探索，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都是为科学社会主义宝库作出新贡献。社会主义优越性越充分发挥，对人类进步事业的贡献就会越来越大，相信社会主义的人们就会越来越多，社会主义终将取代资本主义。

三 没有执政的共产党在新的形势下探索各自的革命道路

世界上没有执政的共产党在困难处境下，正根据新形势、新情况探索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资本主义国家和平民主力量的斗争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各国政治和社会的变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有了一些调整和自我改良，经济、科技不断取得发展，社会保障、民主权利逐步扩大，社会阶级阶层出现了新变化。资本主义制度在各国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着强大的控制力和国际联系。在这种变化了的形势下，照搬十月革命模式或中国革命模式就困难重重，这些党正在探索新的途径。在相当长时期内不能以出现多少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政权来评判这些党的成就。社会主义的信念来自对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矛盾的认识和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变革。资本主义制度仍然阻碍人类社会的进步。资本主义制度并没有避免因固有矛盾导致的危机。肇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打破了美国经济可以持续增长的神话。奥巴马政府为摆脱危机，除了内部进行改革外，还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倚仗金融优势，以邻为壑，向外转嫁危机，导致多国金融财政困

难、世界性通货膨胀和失业率增长，引发一些国家社会动荡、政权更迭。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主导经济全球化，生产力的发展没有惠及全体人民，世界上还有数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超额利润流向少数金融寡头的钱袋。资本主义制度矛盾的爆发，有利于这些党增强社会主义的信念和力量的发展。

没有执政的共产党脱离了苏共大党沙文主义的干预，通过总结经验教训，摆脱了照搬经典、照搬模式的束缚，从各国实际情况出发独立自主地进行探索。目前，大多数党制定了分阶段的斗争目标，同尽可能多的力量联合，把反对资本主义制度、改善民生、扩大人民民主权利、维护世界和平，作为现阶段的主要斗争任务。在合法斗争中，不少党巩固了在国家政治中的地位，有的还在某些地区甚至在中央政府通过选举上台执政。尽管受资产阶级宪法限制，在多党议会选举条件下执政地位并不巩固，但这些党对这些国家政局的发展有重要影响，为争取人民的权益和国家之间的和谐相处而斗争，对解决世界人民所关注的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作出了重要贡献。

四 当今时代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两大历史潮流

邓小平指出："中国共产党的目标是争取人类进步。"马克思主义科学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明确宣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要经过长过程的发展。曾经有过一个时期，认为我们处于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把"人类社会进步"简单阐述为在世界范围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以取代资本主义，并主张取得社会主义胜利的国家要输出革命。邓小平在总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历史经验时指出："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我们的用心是好的，想早一点进入共产主义。这往往使我们不能冷静地分析主客观方面的情况，从而违反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

人类社会是在曲折中向前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总是在科学分析人类社会发展变化和社会主义运动实践基础上，适应时代不同阶段的新需要，不断地提出和研究新问题，不断地丰富和发展科学社

会主义。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在肯定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正确性的同时指出："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他还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对包含着一连串互相衔接的阶段的发展过程的阐明。"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长时期过渡的进程中，社会发展有动荡激变的时期，也有相对稳定渐变的时期。时代的不同阶段人类社会进步呈现不同的特点。当今时代人类的社会进步观是什么？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科学分析了当今世界的矛盾和力量对比，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判断。他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中国共产党还作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的科学论断。十月革命和中国等国家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由一国实践发展为多国实践，打破了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反法西斯战争和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铲除了法西斯主义、殖民主义两个毒瘤。1971年10月联合国大会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不仅是中国长期斗争的胜利，也标志着发展中国家和世界和平力量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世界形势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深入发展，世界上形成了多元力量长期并存的格局。苏东剧变后没有出现新的社会主义国家，但人类社会并没有停滞不前。客观事实是，人类社会仍然在不断进步，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并取得成就；世界科技不断创新；各国生产力不断增长；世界各国的人权状况、民主政治和生态环境在不断改善；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在深入发展，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群体崛起，世界格局更加有利于人类社会的进步。对人类社会进步，我们要围绕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来进行分析。当今世界维护持久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有两大历史潮流，一是社会主义，二是和平与发展。这两大历史潮流促进了人类社会不断进步。

五 中国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融入当今时代两大历史潮流，共同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

在当今时代多元力量并存的情况下，世界向何处去，如何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是人们所关心的问题。中国领导人胡锦涛主席提

出“和谐世界”理念并明确宣示：“中国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这是中国政府和人民根据时代发展潮流和自身根本利益作出的战略抉择”，回答了中国和平发展的目标及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世界和怎样建设的问题。对“和谐世界”理念和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实和深远意义需要有一个全面、准确的理解。

第一，要准确把握“和谐世界”理念的内涵，即在当今时代我们要推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世界。“和谐世界”理念更鲜明地表达和丰富了中国对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和世界多极化的主张，也就是未来的新秩序和多极化世界应当是“和谐世界”。在当前世界存在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文明的差异和矛盾，热点问题冲突此起彼伏的条件下，“和谐世界”是不是脱离现实的“乌托邦”？和平发展道路能否走得通？“和谐世界”有可能实现。这可从两个方面分析，一个根据中国领导人对国际形势发展前景作出的科学判断：“世界很大，复杂得很，但一分析，真正支持战争的没有多少，人民是要求和平、反对战争的。”“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方向发展。”两次世界大战对世界人民造成的伤害人们记忆犹新，鉴于全球化各方利益交织、现代战争巨大杀伤力，任何一方都难以承受战争需要付出的代价。美国仍有鼓噪发动大规模战争来维护霸权地位的战争狂人，但在多元力量并存的当今世界，霸权主义受到制约不可能为所欲为。就局部战争而言，无论对小国还是大国都会带来灾难，美国侵犯伊拉克不仅造成伊拉克数十万人死亡、政局动荡不已、经济混乱倒退，布什政府也面临国内外反对而陷入困境，这就是明证。另一个理由是在和谐的环境中致力于发展，顺应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潮流，符合世界绝大多数人民的心愿。“和谐世界”理念的“和谐”是在维护世界持久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基础上的“和谐”，是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国家之间的“和谐”。在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日益深入发展的条件下，国家之间依存度加强，合作互惠才能共同分享发展的机遇，凭借霸权强权，以邻为壑，伤害他国利益，最终也要损害本国人民利益。在当今时代，任何国家都不能脱离世界单独应对发展进程中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和谐世界”需要各国人民携手努力共同推动才能

实现。唯物史观认为，历史的发展是一种合力的结果。“和谐世界”需要当今世界多元力量合力推动，因而“和谐世界”理念提出了“和谐世界”在政治、经济、文化、安全和环保方面处理国际关系应遵循的准则，用以规范各方行动，共同推进建设“和谐世界”的目标。

第二，“和谐世界”不可能一蹴而就，“和谐世界”是同当今世界种种不和谐现象进行长期斗争逐步实现的。“和谐世界”理念的“和谐”的含义是指“和而不同”，也就是承认当前世界存在着矛盾和分歧的“不同”，主张妥善解决以达到“和平”相处，共同安全、共同发展。“和谐世界”不可能一蹴而就，和平发展道路也不可能一帆风顺，需要积极推动。提倡“和谐”是针对当今世界存在着的种种不公平、不平等的不和谐现象，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对抗和战争手段，主张以和平对话的方式处理分歧和争端。“和谐世界”理念主张国家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平等相处。各国内部事务由各国人民自己决定，国际事务由各国平等协商解决，而不能由超级大国或几个强国垄断。任何国家都应顺应和平、发展、合作的潮流，而不能以武力威胁、征服别人，或以强国为名凭借实力特别是军事力量损害别国利益，争抢国际地位，争夺势力范围和战略资源。在存在不和谐因素的当今世界，维护世界持久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力量同破坏和平、阻碍发展的力量经历长期斗争才能逐步推动建设“和谐世界”。

第三，“和谐世界”理念符合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和理想追求。“和谐世界”理念是解决在不同文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共处的相当长时期内，如何处理国际关系的问题。“和谐世界”理念的“和谐”含义是“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大同世界”实现的世界“和谐”是消灭了剥削制度后人与人之间和谐的社会关系。两者含义不同，但也有一致之处。我们坚持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纲领，同时要为最近的目的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及要求进行实实在在的工作。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有利于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的发展，也是世界人民的普遍要求。当今时代推动人类社会前进，就要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和谐世界”理念主张在和平的环境下发展，发展的成果惠及广大民众，这符合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同时有利于增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力

量，为实现人类企盼的“大同世界”创造条件。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产生于资本主义制度，为和平与发展而斗争本身就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冲击，为社会主义准备物质和精神基础。世界和平与发展力量以争取和平与发展为共同目标，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剥削制度的束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从而推动人类社会不断进步。“和谐世界”理念主张尊重文明多样性，倡导不同文明互相包容、互相借鉴，取长补短、兼容并蓄，在求同存异中共同提高，在更高层次上提升各自文明的内涵和素质，共同推动人类社会进步。

第四，中国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把中国的发展同世界的发展密切结合起来。中国作为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坚定力量，是“和谐世界”理念的倡导者，也是积极推动者和实践者。中国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为国家的发展作出的战略部署。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充满希望的。从客观上来说符合时代潮流。国际环境越来越有利于发展中国家振兴，关键在于能否抓住机遇。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由于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利益交融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共同利益变得越来越广，需要携手应对的问题越来越多，互利合作对各国发展越来越不可缺少。和平、发展、合作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世界多极化深入发展，多元力量格局有利于国际关系民主化，新兴经济体群体崛起推动国际秩序变革，这都有利于中国的和平发展。从主观上讲，中国贯彻执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抓住发展机遇，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成功应对国内外诸多挑战，经济快速发展、国力大大增强、民生不断改善，发展模式、发展道路令世人关注。当今世界处于大变革、大调整之中，中国的快速发展，必然对世界格局产生影响，也会对与外国关系带来新的问题，世界希望了解中国向何处发展、怎样发展。当前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攻坚阶段，既处于发展机遇期，又处于矛盾凸显期。同各国的关系既处于深化合作期，又处于摩擦多发期。中国的发展按照科学发展观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首先把国内的事情做好。拥有13.4亿人口的大国，政治稳定、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就是对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贡献。中国宣示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高举和平、发展、合

作旗帜，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以中国的发展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发展，目的是开创一条平等合作、互利共赢、和平发展的全新道路，有别于历史上大国崛起以争霸为目标、因争霸而衰亡的先例。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和谐世界”仍会遇到困难和挑战，但以推动人类社会进步为己任的中国人民，必将充满自信，融入当今时代两大历史潮流，共同合作，勇往直前，奔向奋斗目标。

---

[1] 姜述贤，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前秘书长。

金融危机后社会主义在世界的吸引力剧增

刘志明[1]

一 西方发达国家“社会主义”可信度增强

金融危机后，在作为资本主义发源地的西方发达国家，向往社会主义、相信“社会主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代表着对资本主义的必要而可能的选择”的人越来越多了。例如，在一度长期被视为“社会主义例外”的美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可信度开始明显增强。有两个有力的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第一个事实是，金融危机后的拉斯姆森民意调查显示：“20%的受访者更偏爱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30岁以下的年轻人两种选择各占一半。这也许预示着，那些疯狂的电台主持人的子孙后代也终有一天会迎来真正的社会主义。”[2] 美国进步研究中心的研究员马修·伊格莱西亚斯认为，这一民意调查反映了“一个事实，即在某基本层面上，‘社会主义’是块金字招牌。它的总体理念是我们应当把社会置于资本、金钱之前”[3] 。第二个事实是，包括美国共和党和一些媒体在内的“自由放任经济学”的西方拥趸“用社会主义作为恐吓战术的效果也不复当年了”[4] ，“社会主义”这个词也不再像过去一样令人恐惧了[5] 。自从奥巴马政府进驻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白宫所在地——引者注），“社会主义”这个词事实上已经成为日常话题。根据监督美国媒体组织的统计，仅仅在2009年6月18日的前一周，电视新闻中就提到143次“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等词语——这还不包括“共产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等[6] 。而且，虽然奥巴马因为推出扩大公共投入、国有化、限制高管薪酬等一系列加强政府干预的应对危机的措施而被美国国内越来越多的人描述为“社会主义者”[7] ，虽然共和党和美国国内外都有一些媒体总是利用“社会主义”大肆攻击奥巴马，宣称奥巴马应对危机的各种举措“有可能动摇美国的国体”[8] ，但是许多人并不觉得社会主义有多么坏，正如《华盛顿月刊》记者斯蒂芬·贝内所说：“很多人也许都听到媒体把奥巴马和‘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可是，因为人们喜欢这个总统，他

们会觉得社会主义不会那么坏。”[9]“喜欢这个总统”背后的根本原因应当只有这样一点，就是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前总编辑比尔·埃默特指出的：“无论哪个国家在应对金融危机之时都需要社会主义的应对措施。”[10]无独有偶，美国卡特中心中国项目负责人刘亚伟也认为：“在可能出现又一轮世界经济大萧条的时候，我们可能更多地需要对症下药的社会主义。历史是没有尽头的，社会主义是历史的车轮。”[11]

“社会主义”在美国可信度增强的事实使美国杜克大学教授布鲁斯·詹特森和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史蒂文·韦伯认为，像“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好”这类自20世纪后半叶即已开始统治着世界政治的“理念”现在受到巨大挑战。在他看来，世界政治最重要和最基本的问题都需重新讨论，因为世界已经进入“意识形态新时代”[12]。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WP）人乔尔·戈伊尔（Joel Geier）更是认为，“社会主义”在美国可信度的增强“使我们更有论据来争论资本主义的必然失败以及基于人类需求的制度更替”[13]。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伦敦经济学院教授理查德·塞尼特（Richard Sennett）则根据西方发达国家政府采取银行国有化的一些举措认为，西方正在走向“金融社会主义”。不仅如此，他还主张这种“公有制”需要从金融行业扩大到制造业和服务业，因为在目前私有化的情况下，“欧洲和美国有很多产业和服务性企业不能在全球经济中存活”。他甚至还断言：“在当前形势下，西方经济无法自我维系。就我们所知，私营企业是一台制作粗糙的笨拙机器，如果我们不采取措施，它就会减少机遇，降低员工的生活水平。”[14]

需要指出，西方国家采取“国有化”和各种政府干预的举措归根结底是与西方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紧紧相连的“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举措，这种举措从根本上说是维护西方大资产阶级的利益的，是西方资产阶级“利益私人化、损失社会化、危机全球化”长期战略的“更具欺骗性的”组成部分，它们并非社会主义性质的。但是，从“国家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前阶”、“入口”这一点来说，相较于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这些举措多少又具有一点历史的进步意义。

在美国的近邻加拿大，相信社会主义是世界发展的方向并自称“社会主义者”的人也越来越多了。2009年6月1日，加拿大温尼伯选区新民主党众议员帕特·马丁这样说道：“当我宣布我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时，我猜这没什么惊奇的，因为我们现在都是社会主义者。” [15]

在法国，因为全球经济危机的威胁，右翼政府的强权攻势，以及对改良派社会党的极度不满，法国群众的“左”倾趋势越来越明显，这使一个以法国激进左派政党“革命共产主义同盟”为基础，同时集合了其他激进左翼力量成分的“新反资本主义党”于2009年2月在巴黎市郊应运而生。在短短几个月内，“新反资本主义党”在法国各地就成立了460个地方性委员会，吸引了9000多人参加。该党提出了“要对整个社会进行结构调整”的政治目标，还主张对主要的行业实行国有化，关闭证券交易所和利用本次资本主义危机来建立一种可以捍卫社会革命性变革的力量，以反对私有制，重建“更加民主”的社会主义未来。马来西亚大马社会主义党的朱进佳认为：“这是法国左翼力量在野蛮与革命时代的重新出发，也将有助于欧洲以至世界各地激进左翼的发展。” [16] 金融金融危机后法国人民对“社会主义”与日俱增的倾向甚至使法国前总理德维尔潘也开始表示相信：“法国存在爆发革命的可能。” [17]

在西欧其他国家，随着经济不景气的蔓延，随着反资本主义情绪的“行情”不断看涨，广大共产党人敏锐地感知到“历史的风再次吹向了我们的风帆！”他们因而更加“坚信社会主义是实现真正、彻底的人民独立、保障工人阶级权益、结束资本主义破坏性危机的唯一途径”，更加“坚信另一个没有阶级剥削和压迫的世界是可能的”。他们还纷纷表示：“有决心为建立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社会主义新社会而不懈努力。” [18] 比如，金融危机爆发后，葡萄牙共产党就认为，资本主义不可能进行实质性的改革，不可能变得更人性化。要想真正地解决当前的危机，就必须从根源着手，必须采取革命性的方式，必须实行深刻的社会的、反垄断的经济变革。只有社会主义才是克服资本主义制度危机的唯一出路。葡共还强调，历史确定了社会主义是为了工人和人民的利益而代替资本主义的新的社会制度 [19] 。

金融危机后，“社会主义”在西方发达国家可信度日益增强的事实使德国前总理施密特认为：“我们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21世纪的世界将是多种不同价值观并存的世界。”[20]“德国之声”网站的一篇文章甚至认为，这表明危机导致西方国家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这两种意识形态的“接近”，国家将重返经济领域，而“这个意识形态本来是东方的，中国的，或者说是社会主义的”[21]。前德意志银行高管罗杰·依伦伯格（Roger Ehrenberg）下面的这段话可以说是该文“意识形态接近”观点的最好注脚：“有关资本主义太多你需要一点社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太多你需要一点资本主义这一问题的争论，在我看来只具有象征意义。”[22]

从“社会主义”在西方发达国家广大人民群众中间的可信度正日益增强，从西方发达国家的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正日益增强的事实来看，我们应该可以相信俄共主席根纳季·久加诺夫（Gennady Zyuganov）的这个观点：“金融市场的崩溃给美国和全世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后果。这就是转折点。”[23]这个“转折点”，应当说指的是社会主义运动从苏东剧变后的低潮开始走向复兴的转折点。

二 原苏联东欧国家怀旧风潮盛行

金融危机后，原苏联东欧地区的人们在对层出不穷和不断涌现的街头犯罪、吸毒和种族主义这些“被视为西方弊病”的社会问题深感忧虑，对这场金融危机更加凸显20年来他们各自国家经历的社会变革极度失败的失望情绪与日俱增，同时他们对过去社会主义时期的一切不再“左派”幼稚病般地简单地全盘否定，转而重新肯定社会主义“给人们带来了宁静、稳定、幸福的生活”，并开始回忆起社会主义时期“没有失业、恐怖主义与民族冲突，人们的关系朴实而纯净，有着真挚感情而没有过多贪欲”的种种美好，怀旧风潮因而在原苏东大地上盛行开来。需要指出，虽然怀旧现象在剧变后的原苏联东欧地区一直存在着，但是，使怀旧成为一种风头正劲的风潮，却只是2008年金融危机蔓延全球后的事情。这种怀旧风潮甚至使柏林墙倒塌20周年之际，在原苏联东欧地区，“几乎没有举行任何高调的活动来庆祝旧政权的广

泛崩溃”，因为这些地区的人们发现：“在冷战结束后的20年里，战争爆发，全球不安全，现在又陷入了经济危机，这一切使得1989年以后所宣扬的更广泛的和平、资本主义繁荣和历史的终结看起来十分荒谬。”[24]

俄罗斯首先兴起怀旧风潮，与苏联剧变后俄罗斯过去不时弥漫的怀旧情绪牵动的主要是其工作、生活乃至命运与苏联时代休戚相关的中老年人不同，现在被怀旧情绪牵动的更多的是30岁左右的青年。2007年12月6日到13日，《俄罗斯记者周刊》刊出记者奥莉加·安德列耶娃（Ольга·Андреева）、格里戈里·塔拉谢维奇（Григорий·Тарасевич）、谢尔盖·舍赫托夫（Сергей·Шейхетов）联合撰写的《我想回到苏联》评论性报道文章。该文援用社会学家的研究证明，目前，曾在苏联时期度过儿童时代的青年们中间，正弥漫着一种“我想返回苏联”的情绪。该文指出，留恋苏联时代渐渐成为30岁左右的人中不断扩大的现象。他们在1991年时都是13～15岁，都有收集苏联时期照片的爱好，经常在一起交流少先队员、童年时代的回忆。金融危机袭击下原苏联地区出现的怀旧风潮也引起了西方媒体的注意。美国《纽约时报》网站2008年5月15日的一篇文章就敏锐地注意到，虽然苏联解体了，但“有关苏联的记忆尚未埋葬”。这篇文章还援用了苏联解体前曾在一家牙刷厂上班的吉尔吉斯斯坦妇女托克托坎·季列别尔达耶娃这样的话：“我真怀念苏联。我们那时生活得很好，我有工作，挣工资。”这篇文章指出，虽然苏联已经解体近17年了，但是对于许多曾生活在苏联边缘地带的人来说，这就像是昨天的事情。他们喜欢回想年轻时代，那时工厂开足马力生产[25]。

在前社会主义国家东德地区，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初的一个调查显示，有52%的东德人相信自由市场经济是“不合适的”，有43%的人表示比起资本主义，他们宁愿选择社会主义。也曾像许多东德人一样为柏林墙被推倒而欢呼雀跃的拉尔夫·武尔夫在这一调查中表示，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短短几周的时间内，他就开始意识到自由市场经济到底意味着什么。他这样说道：“人性泯灭，剩下的只有猖獗的物质主义和无休止的榨取。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我们缺乏物质享受，但依然拥有很多东西。”[26]德国《明镜》周刊也发现，金融危机后有57%

的东部人认为民主德国“好的方面要多于坏的方面”[27]。

保加利亚也对过去充满怀念。皮尤研究中心2009年和2010年进行的调查研究表明，只有52%的人赞成变为民主国家，而在共产党被推翻两年后的1991年，持上述观点的人曾达到76%[28]。

金融危机后，在作为欧盟新成员的罗马尼亚，一个叫库尔斯的民意调查机构调查表明，随着在经济上受到重创，贫富差距日益拉大，有27%的人认为，1989年以前生活得更好，比相反意见多出4个百分点；关于“今日罗马尼亚的印象”，66%的人回答“糟糕”[29]。另有民意测验显示，许多罗马尼亚人都深情地回忆起共产党政权提供的稳定生活。CSOP调查小组2010年9月进行的调查显示，约有半数（49%）受访者说，共产党执政时期的生活比现在更好。而罗马尼亚市场调查研究所在2005年该国即将加入欧盟时进行的调查表明，有64%的参与者相信国家正朝着自由市场和民主的正确方向前进[30]。

关于金融危机后原苏联东欧地区的怀旧风潮，有各种各样的评论。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大学社会学和哲学高级研究员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认为，东欧的怀旧风潮无疑表明，东欧人民中的大多数人要求的并不是资本主义，他们希望团结和某种公正，他们渴望能自由地过自己的生活，他们希望从原始的意识形态教条与虚伪中解放出来。实际上，他们渴望某种“有人情味的社会主义”。“也许这种情绪是我们的第二次机会。”[31]德新社则根据“目前东欧有大约7200万人是在共产主义政党的领导下成长起来的”事实认为：“他们对当时的回忆仍影响着欧洲的政治格局。”[32]英国《卫报》专栏作家谢默斯·米尔恩（Seumas Milne）则认为，这使得苏联东欧剧变后西方宣布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大失败的断言显得过于草率。正如他指出的：“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那就是会出现新的运动和模式，来挑战一种受生态和经济危机困扰的全球秩序。正如共产党人在1989年认识到的和资本主义宣扬者现在开始发现的那样，什么都没有定论。”[33]有中国学者深刻指出，这里的怀念，既不是抹去今天人民的作为，也不是寻求简单的复制和再现。过去时代给人民带来利益、促进社会进步的精华，在经历过几番风雨洗劫、烈火锤炼之后，已经作为人类文

明的贡献，深深镂刻在人民的心里和全新的历史创造活动中[34]。怀旧或者说留恋过去，在历史上往往是一种十分强大的推动社会政治发展的运动。我们相信，原苏联东欧地区历史运动中的这种怀旧现象，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今天，是追求进步的人类可以寄予厚望的一个“希望之源”。

三 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社会主义思想重新活跃

首先是社会主义价值观念在拉丁美洲重新占据上风。虽然社会主义思想在拉美地区源远流长、丰富多彩，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兴起”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意识形态的侵蚀下，以及在苏东剧变后社会主义思想在世界尤其西方世界被放肆“妖魔化”的背景下，拉美地区一时间也成了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思想俘虏”，社会主义的思想一时间可以说归于沉寂。但是，随着新自由主义的改革很快在世界尤其在拉美本地普遍且教训深刻的失败，随着拉美人民迅即不得不品尝新自由主义理论及其实践带来的苦果，社会主义思想的价值在拉美地区重又开始获得尊重，主要或者说首先作为反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运动理论表达形式的全球化替代主义就吸收了社会主义的思想内容。在反新自由主义斗争中，一批左翼政治家于20世纪末21世纪初先后上台执政。关于新世纪拉丁美洲政治版图的情况，西班牙《起义报》2009年1月3日的一篇文章这样描述：“委内瑞拉诞生了一位民族主义的军人、玻利维亚的土著总统、巴西的前冶金工人、智利和阿根廷的女人当政、巴拉圭穿着凉鞋就职的前主教、厄瓜多尔的支持凯恩斯学说的经济学家，这些都构成了南美洲一张正在拼凑当中的左派版图。”[35]该文还认为，尽管出现了目前的“全球资本主义”危机，但是拉丁美洲的大批左派政府却为“乐观主义情绪”的产生提供了土壤。“乐观主义情绪”产生的基础是什么呢？答案只能是这些左派政府的领导人倾向社会主义甚至纷纷宣布建设各自定义的“21世纪的社会主义”。国际金融危机后，“21世纪的社会主义”在拉美左派政府领导下的各国都深得人心，尤其得到普通民众的支持和拥护，因为它顺应了拉美广大人民需要“社会主义”的热切愿望。正如拉美著名左翼学者艾伦·伍兹（Alan Woods）所说，人民需要的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我们需要返回“马克思、恩格斯、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社会主义”[36]。

应该指出，在拉美左派政府领导人中，最早提出并最坚决倡导建设“21世纪的社会主义”的是委内瑞拉总统乌戈·拉斐尔·查韦斯·弗里亚斯（Hugo Rafael Chavez Frias）。在2007年1月8日的讲话中，查韦斯说：“社会主义才是拯救我们人民，拯救我们国家的唯一道路”，并宣布自2007年起，委内瑞拉将进入一个建设“21世纪社会主义”的新的历史时期。他还强调要建设委内瑞拉式的社会主义[37]。金融危机爆发后，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则更加认为：“社会主义是拯救世界的唯一途径。”[38]

虽然并不自成系统的“21世纪社会主义”不同于科学社会主义，但它却是拉美历史进程中产生的用“另一个世界”“替代资本主义”尤其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的社会思潮的反映，它反映了查韦斯和拉美一些左派人士以“21世纪社会主义”替代“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的理论主张和政策实践，无疑也反映出“社会主义”对拉美地区那些追求社会进步的人的吸引力和生命力。正是鉴于以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为代表倡导的拉美“21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2008年4月10日，俄共中央主席团通过的《纪念卡尔·马克思诞辰190周年》的决议指出：“今天……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在整整一个大陆的辽阔空间占据了上风，拉丁美洲就是这样的一个大陆。”[39]

其次是社会主义尤其是科学社会主义在第三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越来越成为金融危机后的人们思考世界未来及其变革的一把钥匙。国际金融危机特别凸显的全球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贫困和失业率飙升以及可持续发展问题等使第三世界的广大民众越来越深刻体认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没有社会公正，人民群众也不能奢望有更美好的未来。只有充分“了解了一个不公平的世界的意义”的社会主义的选择才是克服资本主义固有剥削和不平等的平台，只有它才能真正摆脱贫困和失业，根治环境灾害，才能结束以牺牲数百万人的利益为代价而使一小撮百万富翁富起来的战争噩梦和金融动荡。比如，在被西方标榜为所谓“民主典范”的印度，金融危机发生后，印度人开始对资本主义不感兴趣，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个认为资本主义存在致命弱点，需要用一种“新的制度”来代替它[40]。这种“新的制度”，在印度共产党看来，就是“解放全人类，结束人剥削人、一个国家压迫另一个国家的

新制度”。印共还表示相信：“21世纪将会是社会主义的天下。” [41] 尼泊尔共产党（联合马列）也坚持认为，目前的全球经济危机不是任何资本家个人或公司的错误，而是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剥削本性所带来的必然结果。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不能通过改革来改变，它必然要被正义和公平的制度，也就是社会主义制度所代替。只有社会主义才是唯一的选择，也只有社会主义才能通过改进生产、提高生产力以及确立社会经济的正义和公平基础上的新的分配制度来解决这些问题 [42] 。

值得一提的是，国际金融危机后，被认为“体现了社会主义的灵魂”的集中发生在第三世界的反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运动，在深刻反思危机前全球替代运动进展缓慢，以及他们提出的各种替代方案在劳工世界的影响相对有限的原因的同时，开始注重吸收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源泉提供的“整体主义、国际主义，以及强调斗争”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理论养分，以利于更好地探寻最能动员世界亿万人民为自己现实的、长远的利益而奋斗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替代方案和“超越资本主义的最合适的道路” [43] 。

四 结语

金融危机后“社会主义”在世界的吸引力正与日俱增的情形意味着什么呢？答案应该说是不言而喻的。这只能意味着我们即将迎来世界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重新沸腾”的时代。正如美国学者斯蒂芬·塞维罗所说：“共产主义可能是一个很好的观点，而属于它的时代终于来临了。” [44] 俄共中央也表示相信，金融危机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得到第二次生机的时刻到来了” [45] 。

---

[1] 刘志明，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

[2] 〔美〕埃里克·奥尔特曼、丹妮尔·艾沃里：《三思而行：社会主义剧场越发冷清》，“美国进步研究中心”网站，2009年6月18日。

[3] 〔美〕埃里克·奥尔特曼、丹妮尔·艾沃里：《三思而行：社会主义剧场越

发冷清》，“美国进步研究中心”网站，2009年6月18日。

[4]〔美〕埃里克·奥尔特曼、丹妮尔·艾沃里：《三思而行：社会主义剧场越发冷清》，“美国进步研究中心”网站，2009年6月18日。

[5]〔美〕汤姆·劳姆：《共和党人指责奥巴马搞社会主义》，美联社华盛顿2009年6月15日电。

[6]〔美〕埃里克·奥尔特曼、丹妮尔·艾沃里：《三思而行：社会主义剧场越发冷清》，“美国进步研究中心”网站，2009年6月18日。

[7] 美国著名政治评论员劳伦斯·奥唐奈指出，2008年9月，只有6%的人用“社会主义者”这个词来描述奥巴马，但到2009年4月，这一数字已升至20%。

[8] 王启超：《外媒称美国大步迈向美国特色社会主义》，2008年9月23日《环球时报》。

[9]〔美〕埃里克·奥尔特曼、丹妮尔·艾沃里：《三思而行：社会主义剧场越发冷清》，“美国进步研究中心”网站，2009年6月18日。

[10]〔日〕有田哲文：《投入公共资金对美国来说是必需的》，〔日〕2008年10月9日《朝日新闻》。

[11] 刘亚伟：《在历史的尽头，还有“社会主义”》，2008年11月11日《环球时报》。

[12]〔美〕布鲁斯·詹特森、史蒂文·韦伯：《美国的强行推销》，〔美〕《外交政策》2008年11～12月号。

[13]《金融危机：一场全球性的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张寒译，http：//theory.people.com.cn/GB/49154/49155/9389015.html。

[14] 张宸宇：《外媒称西方国家应学习中国式社会主义》，2008年10月17日《环球时报》。

[15]〔加拿大〕伊恩·布劳：《奥巴马的雾月革命》，〔加拿大〕2009年6月13日《环球邮报》。

[16]〔马来西亚〕朱进佳：《法国左翼力量的重新出发》，乌有之乡网站，2009年2月13日。

[17] 参见〔法〕帕斯卡尔·佩里诺《危机：为何2009年不是1929年》，

〔法〕2009年12月2日《费加罗报》。

[18] 李慎明主编《世界在反思：国际金融危机与新自由主义全球观点扫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第67页。

[19] 张文化：《葡萄牙共产党论金融危机和社会主义替代方案》，《上海党史与党建》2010年11月号。

[20] 〔德〕施密特：《主要国家应共同驾驭金融市场》，〔日〕2009年1月7日《读卖新闻》。

[21] 张宸宇：《金融危机迫使西方学习中国式社会主义》，2008年10月7日《环球时报》。

[22] 佚名：《外媒称美国大步迈向美国特色社会主义》，2008年9月24日《环球时报》。

[23] 参见刘淑春《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外共产党的新动态》，《红旗文稿》2010年第4期。

[24] 〔英〕谢默斯·米尔恩：《1989年的真正教训是：什么都没有定论》，〔英〕2009年11月11日《卫报》。

[25] 〔美〕萨布里纳·塔弗尼斯：《在吉尔吉斯斯坦的一处菜园，有关苏联的记忆尚未埋葬》，美国纽约时报网站，2008年5月15日。

[26] 〔英〕埃里克·基施鲍姆：《金融危机过境 东德重新思索共产主义》，路透社柏林2008年10月16日电。

[27] 〔英〕谢默斯·米尔恩：《1989年的真正教训是：什么都没有定论》，〔英〕2009年11月11日《卫报》。

[28] 《经济混乱引发罗马尼亚人对共产主义的怀旧情绪》，美联社布加勒斯特2011年1月19日电。

[29] 胡小兵、刘向、张章等：《撕裂的新东欧》，新华网，2009年11月9日。

[30] 《经济混乱引发罗马尼亚人对共产主义的怀旧情绪》，美联社布加勒斯特2011年1月19日电。

[31] 参见马淑贞《齐泽克论柏林墙的倒塌》，《国外理论动态》2010年第2

期。

[32] 《东欧人怀念过去安定生活》，德新社布拉格2009年3月24日电。

[33] 〔英〕谢默斯·米尔恩：《1989年的真正教训是：什么都没有定论》，〔英〕2009年11月11日《卫报》。

[34] 马也：《纪念和怀念——柏林墙倒塌20周年》，乌有之乡网站，2009年12月11日。

[35] 李慎明主编《世界在反思：国际金融危机与新自由主义全球观点扫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第142页。

[36] 刘擎：《2009：西方知识界回顾》，2010年1月10日《东方早报》。

[37] 徐世澄：《委内瑞拉查韦斯“21世纪社会主义”初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10期。

[38] 路透社北京2009年9月25日电。

[39] 《俄共中央主席团〈纪念卡尔·马克思诞辰190周年〉的决议》，柳达译，《国外理论动态》2008年第7期。

[40] 纪双城、丰帆、焦东健等：《27国民众质疑资本主义——BBC民调显示，51%的人认为资本主义系统需要变革》，2009年11月11日《环球时报》。

[41] 刘卫卫、聂运麟：《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应对当前国际经济危机的理论与策略》，《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42] 刘卫卫、聂运麟：《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应对当前国际经济危机的理论与策略》，《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43] 刘志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兴起、危害与替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视角及其评价》，《高校理论战线》2010年第5期。

[44] 〔美〕斯蒂芬·塞维罗：《共产主义的春天到来了吗？——伦敦大学“论共产主义观念”国际研讨会评述》，《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年第2期。

[45] 《俄共中央主席团〈纪念卡尔·马克思诞辰190周年〉的决议》，柳达译，《国外理论动态》2008年第7期。

苏联解体以来越古老朝社会主义运动现状及路向探析

高宜新 贾瑞娜 [1]

一 苏联解体以来越古老朝 [2] 社会主义运动面临的政治经济形势

一是越古老朝社会主义运动转入在困难中探索前进谋求发展的阶段。苏东剧变虽曾给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带来巨大震荡和消极影响，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没有消亡，也绝不会消亡，近年来已出现了一些积极而重要的变化。当前越古老朝社会主义运动总体态势是：由苏东剧变所引发的“震荡期”已基本结束，社会主义运动进入在困难中探索前进谋求发展的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全面低潮中有局部复兴，大挫折中有小的发展，外延缩小的同时有内涵的深化和质量上的提高。二是经济全球化和以信息技术为先导的新的科技革命，加剧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激化。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苏共垮台，使越古老朝社会主义运动处于空前的低潮。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其在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和军事等多方面的优势，竭力推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极大地拓展资本主义的发展空间。以信息技术为先导、主导的高新科技革命也极大地推动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的迅猛发展。由此可见，经济全球化和高新科技革命，对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而言，无疑都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并在一段时日内，可以使得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基本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随着经济全球化和高新科技革命的进一步深入发展，不但不可能消除，反而会在全球范围内进一步加剧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矛盾。

二 苏联解体以来越古老朝社会主义运动现状

1.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理论方面

越南的社会主义制度施行类似于中国，在宪法、国家元首、立法

机构、行政机构、司法机构、政党制度等方面基上无太大差异。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越南学习中国经验，结合自身情况，积极进行改革，越共召开的十大为越南在总结经验、展望未来方面制定了较为完善的规划；开放市场，学习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国力水平正在逐步提升之中。

古巴号称“最硬的社会主义国家”，它经历的特殊战争与它所修订的宪法——“绝不允许资本主义复辟，古巴永远不会在威胁、压力和胁迫的条件下与其他国家发展政治、经济和外交关系等”，使古巴获得了这个称号。古共在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三不放弃”原则（不放弃革命原则，不放弃人民政权，不放弃为民造福的目标）。其政党执政的清廉与强硬可说得上是古巴社会主义制度在遭遇制裁和封锁等情况下仍能坚持的一个重要力量。

1991年老挝党的五大确定“有原则的全面革新路线”，提出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方向等六项基本原则，对外实行开放政策。1996年老挝党的六大重申继续贯彻执行五大确定的有原则的全面革新路线。2001年老挝党的七大提出了老挝在21世纪前20年的发展目标和具体方针，强调继续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方向不变；将经济建设作为工作重心，将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作为首要任务，加快发展，尽快摆脱不发达状态，制定了2001年分别至2005年、2010年和2020年发展规划，保证了老挝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良性发展。

朝鲜的政治制度制定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出于对国家安全和政治体制稳定的考虑。朝鲜在国内社会政治问题上也提出并实施了“先军政治”的治国理念和稳定方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朝鲜式社会主义”。所谓“先军政治”就是强调军队是领袖的军队，军队必须绝对服从领袖的指挥，要用军队和军事的方法来管理和建设国家。

2.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实践呈现为经济的市场化和所有制结构多元化趋势

1991年越共七大重申沿着社会主义道路把改革推向前进，在中国

共产党十四大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影响下，越共八大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的理论。会议指出，“发展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是向社会主义过渡历史进程中的重要阶段，其目标是，到2020年“把我国建成具有现代物质技术基础，合理的经济结构，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先进的生产关系，高水平的物质精神生活，国防安全稳定，民富国强，社会公平和文明的工业国家”。2006年越共十大强调：“要使经济目标跟社会目标相协调，就要在国家范围内，在各个领域和地方实现社会进步和社会公平，逐步实现每个政策的人性化发展，从而达到权利和义务、贡献和享受的对等与统一，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

1993年9月，古共政治局通过决议，将原有的国营农场或企业转变为具有合作社性质的“合作生产基层组织”，改革农业经营机制，实行国营农场合作化，允许农民承包闲置土地。为活跃城乡经济，改善对城镇居民的服务质量，政府规定，要放宽对个体经营的限制，发挥多种经济成分的作用。针对国企长期亏损的状况，1998年8月，古巴正式开始国有企业管理体制的改革。为适应经济体制改革和实体经济系统运行发生的变化，古巴实施了金融体制改革，建立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相分离的金融体系；加强了金融监管，保障了金融体系安全，提高了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使之基本适应了经济发展的需要。古巴共产党及其领导人积极引导国民生产，恰当学习国外经验，自力更生，近年来GDP出现了两位数的猛增，在四国中是一大特色。

1991年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第一部宪法规定：“国家鼓励各种经济成分在发展生产和经营中互相竞争和合作。各种经济成分在法律面前平等。”2001年老挝人民革命党七大进一步强调，国家要利用广大人民和各经济成分的力量促进实施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变，解放发展生产力。2001～2005年老挝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总方针是：重点发展农业，由自然经济转为商品生产，将发展农业与发展农村紧密结合起来，发展国有制经济、合作制经济和其他经济形式，筹集发展资金，协调生产关系。

朝鲜通过“先军政治”的发展战略实现“强盛大国”目标，势必促使

朝鲜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以彻底挣脱贫穷落后的羁绊。在经济上，放弃了配给制，先后建立了图们江自由贸易区、沿海元山、南浦等加工和贸易保税区、新义州特别行政区，逐渐开始改革。值得人们关注的经济改革，是朝鲜2002年7月1日开始实施的“经济管理改善措施”，又称“7·1措施”。其主要内容，一是改革价格体制，在提高职工工资的基础上调高部分商品价格，取消除粮票之外的所有配给券；二是改革金融体制，废止外汇券，打击外汇黑市交易；三是改革生产管理体制，下放企业自主权，增加就业岗位，减少失业。

3.执政党建设上重视与加强执政能力和作风建设

近年来，越古老朝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员总数比苏东剧变时有了大幅度的增长，由剧变时的450万人增长到约800万人。当前，越南共产党、朝鲜劳动党、老挝人民革命党和古巴共产党分别有党员310万人、400多万人、1418万人和85万人，是国外所有政党中党员总数占所在国家人口比例最大、组织力量最强的政党。在经受住了苏东剧变的巨大冲击后，越古老朝四党深刻汲取教训，重视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注重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坚持党的领导地位和社会主义制度，维持了国内政局和经济社会的稳定。

越南共产党于1991年召开七大，提出要拒绝腐朽思想，加强党的建设，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越共很重视理论联系实际，在全国大力宣传胡志明思想，批判多党制、思想多元化和教条主义，注意研究中国的经验；及时总结先进典型，加强党员对党革新开放事业的认识；注意把政治思想教育和道德品质教育结合起来，防止和平演变和敌对势力的破坏活动。同时提出，要加强党的领导，健全党的组织；加强教育，提高党员素质；惩治腐败，努力改善党群关系；加强青年工作，为青年的健康和迅速成长创造条件。号召全党、全军、全民对西方的“和平演变”战略和颠覆活动保持高度警惕，采取措施，严加防范。

古巴共产党也是非常注重党的地位和作用，从而提出了要加强党的建设，巩固党的领导地位。主要内容包括：第一，加强党的政治思想建设。第二，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既要民主，又要集中。第三，调

整党的指导方针，巩固党的领导地位。第四，加强监督，广泛听取各方面的建议。第五，建设一支具有坚定的革命立场、掌握一定的技能并得到人民群众信赖的队伍，提高党的战斗力。

老挝人民革命党规定，各级党政监察委员会须监察党的各级组织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情况，保证党的各项政策规定的贯彻执行。老挝党规定，党政监察委员会应检查党的原则、纪律、规定的执行情况，如民主集中制的执行情况，确保党的纪律得到执行。老挝的党政监察机构是合一的。遇有重大问题时，则党政制订一套计划，协同办理。同时，老挝人民革命党制定了《反贪污腐败条例》。

朝鲜劳动党明确规定，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基本职能是维护和捍卫劳动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检查党组织和党员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情况。如有违犯者，须查处并追究其责任。为了保证党和国家各项政策、措施的贯彻落实，各国都不同程度地加强了对本党有关重大决策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在朝鲜，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坚持把政策监督放在首要位置，把维护和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作为自己的基本任务。

三 从苏联解体以来越古老朝社会主义运动 看社会主义运动的路向

1.治民主建设是社会主义运动得以前进的动力

越古老朝在治国理念与方略问题上，认识到了“依法治国”的重要性，一些国家开始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由“人治”到“法治”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因此，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制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成为社会主义改革的目标取向。一些国家领导人提出了“以德治国”的新理念，这是对“依法治国”思想的重要补充，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缺一不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在规范社会秩序、促进经济发展、推进民主政治建设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以德治国”思想的提出，标志着社会主义国家治国安邦理论的深化，是对当

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继续深入政治体制改革，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共识。总之，民主政治建设是一项调动人的积极性，形成健康的人际关系，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推动两个文明建设进步的伟大事业。同时，又是一项前无古人，异常艰巨的事业。

2.发展经济是社会主义运动顺利推进的基础，尤其是面对全球金融危机

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有一个基本的标准和评估是用不着反复重申的，即社会主义必须在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两个基本领域，尤其是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方面，超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才能展示社会主义的世界魅力，才算是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指引。要完成对资本主义的历史超越，越南、老挝、古巴、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最重要和紧迫的是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面对金融危机，各社会主义国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来积极应对。越南经济增长对出口和外资依赖较大，越南劳动密集型行业出口开始受到影响，不少商品出口额同比未达到预期增幅。为减少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稳定宏观经济，主动防止经济衰退，保证经济合理稳定增长，越南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在继续控制通胀的基础上，总体上适度放宽货币紧缩政策，以增加流动性，保证生产和出口。二是多管齐下，着力促进出口。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蔓延，古巴也受到严重影响。目前古巴全民免费医疗，免费上大学，人们有住房补贴，食品按照每月配额供应。政府将会削减教育和卫生保健方面的支出，以应对金融危机给国家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老挝政府采取了多项措施。增加粮食产量，确保人民有饭吃，成为金融危机爆发后老挝政府的首要目标。自力更生，厉行节约，减少不必要的商品进口，恢复国家经济，已成为全体老挝人民的行动口号。

3.执政党建设是社会主义运动持久发展的基本保证

列宁指出："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开放，必须有坚强、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作为领导核心。"共产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胜利的根本保证。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一些共产主义政党没有根据形势的变化做好党自身的建设，导致亡党亡国，这不能不说是十月革命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大失误。因此，我们一定要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严酷现实中警醒，从严治党，建立健全一套拒腐防变的制度，加强党内监督和人民群众的监督，密切党群关系，坚决清除党内各种消极腐败现象，始终保持党的先锋队性质。

---

[1] 高宜新，重庆理工大学教授；贾瑞娜，重庆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

[2] 越古老朝，即越南、古巴、老挝、朝鲜。

中东欧左翼学者和共产党对未来社会主义的思考与展望

马细谱 [1]

一 左翼学者对未来社会主义的思考

苏联、东欧发生社会制度剧变后，中东欧国家的左翼政治家和学者著书立说，反思和探讨未来社会主义问题。他们的观点与中东欧国家共产党人的观点不尽相同。他们认为，现实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制度在原苏东地区确实失败了，不复存在。但这仅是作为一种制度的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不存在了，而作为一种思想的社会主义始终是存在的。西方报刊和右派政党大肆咒骂的“共产主义已经死亡”的论调是自欺欺人。“死亡的”不是共产主义，因为共产主义根本就未存在过。“死亡的”也不是社会主义思想，而只是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所谓左派力量在历史上已结束其使命的说法，也是不符合实际的。相反，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和昔日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某些社会政策已深入人心，人们仍然在怀念社会主义。应该说，民主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在中东欧共产党人和左翼学者以及群众中还是有影响的。

为此，他们提出了“当代社会主义”、“新社会主义”、“21世纪社会主义”等概念。在他们看来，未来社会主义的理论不是建立在马克思160多年前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之上。因为马克思建立社会主义理论时，强调的是社会的物质生产，是对19世纪中期社会的认识和理解。今天，人类社会已经完全变化了，应该根据当代社会的实际情况来提出新的理论。21世纪人们追求的新社会主义将符合当代世界新的变化、新的现实，符合人民的利益，符合人类历史发展的潮流。也就是说，“关于社会主义的当代概念，不会也不可能跟我们过去老的观念、论据和信仰有任何共同之处”。这种社会“不会是由某些人事先设计好的思想或模式决定的，而是由资本主义有可能进行改革和能使社会摆脱混乱而决定的” [2] 。

他们认为，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思想，作为一种价值观和一场政治

斗争，是历史的产物。它也像任何一种其他思想一样，有它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所以，他们坚信，整个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不会泯灭。历史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又从科学变成了现实；如今，社会主义由成功走向失败；将来，社会主义会由失败走向胜利。

他们还强调指出，现在没有理由说社会主义已经消亡。90年前，资本主义在俄国被推翻，随后在东欧国家也发生了类似事件，但这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消灭了。同样，经过将近一个世纪后，社会主义在苏联和东欧国家解体了，但这绝不能说社会主义就崩溃了，资本主义就胜利了。科学的认识应该是，社会主义在原苏东国家由于种种原因已经不存在了，但它留下了深深的烙印。社会主义并未消逝。社会主义的思想还活着，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也活着。社会主义在中国、越南、古巴、拉丁美洲和其他国家还存在。争取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斗争从未停息。一种形式的社会主义不存在了，而不是整个社会主义不存在了。

保加利亚亚历山大·利洛夫教授指出，社会主义具有光明的历史前景。它将不是20世纪的社会主义，而是21世纪的社会主义，即具有中国、拉丁美洲、欧洲和其他地区民族和文明特色的社会主义。回顾历史，人们会重新发现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加优越的社会。信息时代的社会主义将保留自己的思想价值和社会价值，它将是吸收全球大革命的成就与能力、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重建起来的社会主义[3]。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最后一届共产党人政府总理汉斯·莫德罗指出：“现实社会主义失败了，但资本主义并没有胜利，而只是保存下来了。”今日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紧张，充满局部战争，残酷剥削，社会不公平，国家之间以核武相威胁和自相残杀。被视为左翼的政治力量“不仅在批判现存的状况，而且还在寻找关于未来的可行方案，社会上和世界上大多数人都在这么做”。“如果人类希望继续存在，就应该战胜现实资本主义。这不是不现实的幻想，而是理智的、可以实现的。”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资本主义都无法解决人类存在的问题”[4]。

波兰学者亚当·沙夫指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的问题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而是马克思主义执行者的错误。”他认为，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垮台就是社会主义的整体垮台，这种论点是错误的。“因为某一部分的失败，绝对不能认为是整体的失败。作为整体的马克思主义无疑是正确的。”这种模式的社会主义遭受挫折就为“建设真正的、更加美好的社会主义扫清了道路” [5] 。

二 共产党人为重建社会主义而奋斗

保加利亚共产党人党在其纲领与章程中强调，今天苏东国家的劳动人民为欧洲社会主义的失败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们被迫为所谓“从极权主义向民主过渡”遭受了难以忍受的苦难。“因此，我们共产党人决心捍卫社会主义光辉的过去，吸取我们前任的成绩和错误……为实现党的社会主义纲领而奋斗。”但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趋势和特点要求我们对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制度有新的认识。当今世界形势表明：“只有建立一个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克服当代资本主义对人类造成的灾难。”当然，这种“新生的”或“复兴的”社会主义“不是机械地重复过去在我国存在过的社会主义，尽管它过去在国家现代化方面起过决定性作用”。复兴的社会主义是富有生命力的社会主义，它应该抛弃过去的不足，发扬其优点，并确保在当今世界条件下得到新的发展。“复兴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全民所有□制……□是进步的社会制度。” [6] 该党还认为，未来的社会主义将会不同于以前的社会主义，原来的社会主义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也存在许多问题，譬如，经济高度集中，国家垄断，由此产生了行政高度集中，进而产生了官僚主义，并最终为资本主义的复辟提供了土壤。他们主张以灵活的策略争取社会主义，建立以国有企业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制度，改革计划经济，吸收市场经济中一些有用的东西。他们认为，在保加利亚重建社会主义任重道远，但他们不放弃努力。目前这些党的主要活动是组织抗议活动，向人民宣传社会主义思想。

保加利亚共产党人称赞毛泽东和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实践相结合，把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看做重建社会主义的样板。保加利亚

共产党人党在其纲领中还写道："不要忘记，社会主义之星并没有在各地泯灭。"在中国、越南、朝鲜和古巴，即便是在欧洲社会主义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它们继续寻找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形式，并且取得了成功。这些国家的复兴政策给了它们社会经济蓬勃发展的新动力。我们清楚地看到了中国是怎样变成一支全球政治和经济力量，在同所有反对帝国主义和爱好和平的力量一起共同反对所谓"新"世界秩序，并开辟了世界社会主义改革的道路。

捷克和摩拉维亚共产党是近20年来第一个对21世纪的社会主义提出具体设想的政党。它在其纲领中指出，党的长期纲领目标是社会主义。它认为，社会主义将是繁荣、社会公正、民主、政治和经济多元化、充分调动所有人的能力并共同参与管理的社会；社会主义立足于尊重和利用同社会多数人利益相协调的市场经济的规律性，利用现代科学、信息、技术和加入欧洲与世界范围内的互利的、民主的融合进程与合作；社会主义保障所有人的良好生活水平和社会安定，致力于个人与全社会的文化发展、满足民族和种族群体的利益需求、与持续稳定发展相一致的美好生活环境、安全与和平以及解决人类的全球问题。该党在其章程中又把它的纲领目标概括为："实现社会主义，即公民享有自由和平等权利的民主社会，政治和经济多元化的社会。"因此，21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公正和战略型企业、矿产和主要的工业部门的国有制。在此基础上可以出现较为公正的资源再分配、体面的社会保障和医疗保健[7]。

斯洛伐克共产党对1989年后斯洛伐克的社会发展形势表示不满。它认为，尽管在斯洛伐克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存在不足，但社会主义制度是社会更公正、更人道和更民主的制度。目前在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制度显示出很大的弊端并且已经过时。近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是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我们见证了道德危机和人类价值危机。如果人们不寻找资本主义制度的替代物，就可能自我毁灭。我们认为，社会主义是21世纪的替代社会制度。至于21世纪的社会主义将会是什么样的，谁也无法确切地回答。全世界的共产主义、工人阶级或马克思主义的左翼政党在寻求不同的社会发展道路[8]。该党还认为，世界上还有其他形式的社会主义，如在中国、古巴和越南的社会

主义。还有其他国家对社会主义有自己的设想，只是每个国家依据自己的文化和历史传统而定。这正是过去的错误所在，那时确信只有一种社会主义模式。苏联领导人没有接受捷克斯洛伐克模式，也没有接受南斯拉夫模式。每个国家始终有民族、文化和历史的特点，因此寻找统一的社会主义模式是乌托邦。

南斯拉夫新共产党在1997年通过的党的章程和纲领中指出，党将用自己的整个政治策略和战略为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而奋斗。在这种社会主义制度下，人和人的权利将得到充分的体现，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将得到保障。南新共强调，真正的共产党人永远同人民在一起。共产党人是世界上一支现实的力量，他们有能力聚集人类最进步的力量去打击帝国主义和在全球化掩护下的新殖民主义的剥削。该党认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在永存不灭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原则基础上正在重建、发展和强大。"南新共指出："目前的反革命只是文明史上暂时的、倒行逆施的可耻阶段。"只要世界上还存在大腹便便的人和饥肠辘辘的人、自由和不公正、穷人和富人，那就存在追求社会正义的斗争。"而没有社会主义也就没有社会正义。"所以，该党在其纲领的第一部分明确规定："我们党的最终目的是在较远的未来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纲领最后深信，社会主义事业必然得到复兴，因为"未来属于社会主义"。"21世纪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胜利的世纪。" [9]

塞尔维亚的共产主义者党在2008年4月19日通过的纲领中坚信，未来属于共产主义。它强调："共产党人走过了历史的道路，永远是先进思想的体现者。我们坚持国际主义，主张全世界的共产党和运动团结起来。历史证明我们的思想是伟大的。塞共的纲领是争取共产主义胜利的革命斗争的宣言书。社会主义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阶段。目前，通往共产主义道路上遇到的停滞危机，只是暂时的，首先是主观原因造成的，而非客观原因。共产主义在我国，在世界必将到来！塞共是我国唯一的有组织的力量，用共产主义思想武装自己，并为共产主义的胜利而奋斗！"

克罗地亚社会主义工人党宣称，党的宗旨是为工人、农民和劳动

者的利益奋斗，基本目标是在克罗地亚建立“21世纪的社会主义”。该党认为，官僚主义的社会主义失败了，但社会主义思想并未失败。一个新型的、建立在自由民主、自由市场、充分的政治自由、尊重人权、公民的相互宽容和现代文明社会的多元化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时代正在到来。

2006年9月16日通过的《匈牙利共产主义工人党党章》指出，匈工人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主义的政党，是在匈牙利同资本主义剥削、同资本主义制度斗争的党。党的目标是社会主义，建立一个没有一切形式剥削的社会制度。

三 左翼学者论未来的社会主义

保加利亚亚历山大·利洛夫教授认为，存在多种形式的社会主义模式，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也存在多条，也积累了不同的历史经验。今天，我们可以概括地讲，存在四种社会主义模式或方向。它们是：①新共产主义模式。②社会民主党模式。③中国模式。④欧洲现代社会主义。当然，不会只有这几种模式，也许还会出现新的模式。哪一种模式最有生命力，这要由实践和时间来验证。由此，利洛夫得出两点结论：第一，世界社会主义处于危机时期，但正在进行重建和现代化。世界已进入后工业信息时代。社会主义的未来直接取决于它向现代社会主义过渡的快慢和成功与否。现代社会主义就是信息时代的社会主义。第二，现代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方案完全适用于信息时代。它与世界向后工业时代过渡的大趋势是同步的。它的诞生正是左翼对世界大趋势作出的选择和回答。现代社会主义已经提上信息时代的议事日程。[10]

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汉斯·莫德罗认为，目前的资本主义危机正处于最深刻的阶段。我们主张多种性质的所有制并存，为中小企业提供发展空间。我们还认为，国家应该关注社会公平、公正问题。我们作为左翼应该为反对资本主义、反对剥削而斗争。我们需要加强国际团结，结成广泛的联盟。尽管今天社会主义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但是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意识正是在斗争中产生的。我们需要走上街头，

需要去赢得这场斗争。今天，拉丁美洲的社会运动已经在欧洲产生了影响。我们应当“以宽容和科学的态度来就未来展开辩论，并找到能替代日益衰落的资本主义的办法”。对我们来说，“唯一不变的选择就叫民主社会主义”[11]。

波兰学者亚·沙夫断言，社会主义会以全新的面貌出现，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将不可避免地为人类重新打开通向社会主义的大门”。沙夫对“新型社会主义”提出了如下的设想：社会主义要“爱人”，人是社会主义的心脏，没有“心脏”，是不能建设社会主义的。没有“人性”的社会主义，都是违背自然本性的，不讲“人性”的社会主义要长期实行下去是不可能的。而且，没有民主，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未来社会主义需要建立新型的左翼政党[12]。

阿尔巴尼亚霍查夫人奈奇米叶·朱莉娅在狱中度过了5年的悲惨岁月后出狱。她于2001年11月毫不隐讳地谈到了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她说：“坚持社会主义必将战胜资本主义的观点，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是资产阶级的掘墓人、列宁关于资本主义是泥塑巨人、毛泽东关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论断始终是正确的。”[13]

不少中东欧左翼人士认为，时代在前进，形势在发展，过去的许多理论问题需要重新思考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具有普遍意义，但并不是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问题都可以从中找到现成的答案。所以，共产党人要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开辟前人未走过的路。

---

[1] 马细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2] Защо рухна реалният социализъм，ИК“Христо Ботев ”，София 2001，с.95.

[3] 参见本书第七篇〔保〕亚历山大·利洛夫《苏联模式社会主义解体的三个教训》。

[4] Ханс Модров，Перестройката Както аз я виждам，

Издателство“Български писател” София，2010，сс.238-239.

[5] 郭增麟：《沙夫对苏东剧变的反思和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的构想（上）》，《国外理论动态》2001年第8期。

[6] 详见《保加利亚共产党人党纲领与章程》（Програма и Устав на ПБК，С офия 2006г.）。

[7] 参见2004年5月15～16日捷摩共第六次党代会修订的《捷克和摩拉维亚共产党章程》和该党的纲领。

[8] 2009年1月11日斯洛伐克共产党在其网站上发表的文章《对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制度和全世界社会主义制度的认识》。

[9] 参见《南斯拉夫新共产党章程和纲领》。

[10] 参见〔保〕亚历山大·利洛夫《文明的对话——世界地缘政治大趋势》，马细谱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第331～332页。

[11] Ханс Модров，Перестройката Както аз я виждам，Издателство“Български писател” София，2010，сс.248.

[12] 郭增麟：《沙夫对苏东剧变的反思和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的构想（下）》，《国外理论动态》2001年第8期。

[13] 转引自王洪起《“山鹰之国”亲历》，新华出版社，2008，第150页。

苏联解体与古巴社会主义的“更新”

徐世澄 [1]

一 苏联解体对古巴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的剧变和苏联的解体是对古巴沉重的打击，使古巴在政治上失去了重要的战略依托，经济上陷入危机。卡斯特罗在谈到苏联解体对古巴的影响时，对法国《外交世界》主编拉蒙内特说：“当那个大国在一天之内崩溃时，我们国家遭受了一次毁灭性的打击。我们陷于孤立，孤立无援。我们的糖失去了所有市场，我们得不到粮食、燃料，乃至缺乏为死者举行宗教葬礼所需的木材。转眼之间，我们没有了燃料，没有原料，没有食品，没有卫生用品，什么也没有。所有人都认为：‘要垮台了。’一些愚蠢的家伙到今天还认为古巴会垮台，认为即使今天不垮台，以后也会垮台。”“美国加强了禁运。出现了‘托里切利法’ [2] 和‘赫尔姆斯-伯顿法’ [3] ，两者都有治外法权的性质。我们的市场和基本供应的来源都突然消失。” [4]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宣布停止对古巴的一切援助，撤走援古技术人员，贸易关系仅限于以国际市场价格用石油交换古巴的糖，而糖和石油的交易额也大幅度下降。俄罗斯向古巴提供的石油从苏联时期1989年的1200万吨降至1992年的600万吨，使古巴能源短缺。古巴的能源主要靠苏联的原油，石油的短缺使发电量显著下降，大批工厂被迫关闭或减产，大批农机闲置，客运货运大幅度减少，居民生活用电经常中断。由于燃料短缺和缺少外汇进口化肥、除虫剂等原因，古巴主要农产品蔗糖产量和收入锐减。由于俄罗斯不再向古巴出口粮食，使古巴政府不得不一再削减居民的凭本计划供应的基本食品定量。据古巴官方估计，苏联的解体使古巴遭受的直接经济损失约为40亿美元。1993年俄罗斯与古巴的贸易额仅为5.39亿美元。东欧的剧变和苏联的解体使古巴经济陷入危机。据统计，1990年，古巴经济下降

3.1%，出现了自1987年以来第一次负增长。1991年下降25%，1992年下降14%，1993年又下降了10%。1990～1993年古巴国内生产总值累计下降34%。

正如1993年7月26日卡斯特罗在攻打蒙卡达兵营40周年纪念会上所说："苏联消失的时刻发生了真正急剧的变化，我们实际上不得不承受双重的封锁。社会主义阵营的垮台使我国在各方面遭受到沉重的打击，我们遭受到政治上的打击，军事上的打击，尤其遭受到经济上的打击。"[5]

二 古巴的对策

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共产党和政府应对苏联解体的主要对策是：政治上，坚持、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坚持一党制，不搞多党制，坚持马列主义，坚持社会主义；经济上，进行逐步的、适度的改革开放；社会方面，坚持全民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和普遍的社会保障制度；外交方面，调整外交政策，积极发展对外关系，推进外交关系多元化，积极改善对华关系。

在苏东发生剧变时，1990年9月，卡斯特罗就宣布古巴进入"和平时期的特殊阶段"（简称特殊阶段）。在特殊阶段里，古巴的基本对策是：坚持计划经济，根据特殊阶段的要求调整经济计划和经济工作的重点。古巴政府采取一系列应急措施，实行生存战略，维持国家经济的运转和居民的基本食品供应，同时，采取一些有长期发展战略意义的措施，加快纳入世界经济体系的进程。为解决食品短缺，古巴制订了食品计划。为解决外汇短缺，古巴改变过去重点发展重工业的经济发展战略，把经济发展的重点放在创汇部门，特别是旅游、医疗器材和生物制品的医药产品的生产和出口。

1991年10月，古巴共产党召开四大。大会提出了"拯救祖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原则和口号，卡斯特罗在开幕式讲话中明确提出了古巴对外开放的政策："我们正在广泛地实行开放，广泛地对外资实行开放。"[6] 四大通过的关于修改党章和党纲的决议指出，古巴革命的最高目标是在古巴建设社会主义，古巴共产党坚持共产主义的理

想，古巴共产党是马列主义政党，是古巴社会的领导力量[7]。古共四大将对外开放作为国策确定下来。四大后，古巴加快了开放的步伐。

1997年10月，古巴共产党召开五大，五大制定的方针的要点是：坚持共产党领导和坚持社会主义；反击美国的经济制裁和政治及意识形态攻势；在不改变社会性质的前提下，继续稳步进行经济变革，并尽可能减少由此带来的社会代价。

古共五大通过的中心文件《团结、民主和捍卫人权的党》明确指出：坚持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一党领导，是维护国家独立、主权以及抵抗美国封锁、获得生存的保障；以马列主义、马蒂思想及菲德尔（卡斯特罗）思想为指导的古共，是国家稳定的捍卫者和中流砥柱，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领导，是古巴的唯一选择。五大通过的《经济决议》指出："古巴的经济政策开始了一个新阶段，它应当包括经济结构方面，如多样化、振兴出口、发展食品基地、提高能源、物资和财政部门的经济效益等……提高效益是古巴经济政策的中心目标。"[8]古共五大后，古巴又继续推出了一些新的变革举措。

自1991年古共四大召开后，古巴所实行的变革开放政策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自1994年起，由于实行改革开放，古巴经济开始连续恢复增长；古巴的经济结构和外贸结构逐步多元化；古巴的所有制和分配方式多样化，合资、外资所有制，个体所有制初具规模；古巴已从巨大的灾难中摆脱出来，它不仅经受住美国封锁和侵略的考验，而且也经受住了苏联解体的严峻考验，古巴的政治社会基本稳定，经济逐步恢复，人民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国际环境不断改善。

苏联解体后，古巴竭力维系同俄罗斯、独联体其他国家的正常关系。与此同时，俄罗斯为了自身的利益，逐渐恢复和发展同古巴的关系。1992年9月16日，古巴同俄罗斯就俄罗斯撤出原驻古巴的苏联军队达成协议。根据协议，原苏联军事教练旅军事人员及其家属已于1993年上半年全部撤出古巴。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古俄关系明显有所恢复。1995年5月，古巴外长在苏联解体后首次访俄。古俄签署

了用100万吨食糖换取300万吨石油的协议。俄罗斯还决定向古巴提供贷款，恢复古巴核电站的建设。同年10月，俄罗斯第一副总理索斯科韦茨出访古巴，两国签署了1996～1998年贸易议定书，规定1996年俄罗斯以450万吨石油换取古巴的150万吨食糖，签署了关于延长俄罗斯向古巴胡拉瓜核电站提供的3000万美元贷款期限的议定书，此外，还签署了关于密切两国企业在旅游、运输和轻工业方面进行合作的议定书。古俄贸易从1993年的5.39亿美元，增加到1996年的8.77亿美元。1996年5月，时任俄罗斯外长的普里马科夫访古，这是苏联解体后俄外长首次出访古巴。普里马科夫访古期间，古俄两国签署了相互关系准则声明和文化、教育和科技合作协定。2000年12月13～17日，时任俄罗斯总统的普京访问古巴。这是苏联解体后，第一位访问古巴的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古期间，古俄两国签署了5项合作协议，两国国防部还签署了一项技术—军事合作计划。古俄两国关系明显升温。然而，2001年10月17日，普京总统单方面宣布俄罗斯将关闭在古巴的洛尔德斯电子监听站，使两国刚升温的关系再次降温。这一监听站由苏联建于1964年并为苏古共同使用，冷战结束后交俄罗斯使用，俄方向古巴每年付2亿美元租金。2002年1月底，监听站正式关闭。7年后的2008年，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访问古巴。2009年，劳尔·卡斯特罗主席访问俄罗斯，这是自苏联解体后，古巴国家元首首次访问俄罗斯。两国关系又有所升温。

概括来说，苏联的解体使古巴受到很大的冲击。一是使古巴经济进入最困难的特殊时期，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二是使一部分党员和群众思想上产生较大的混乱，对古巴过去所走的道路产生了怀疑，进而对古巴的未来失去信心；三是古巴的一些非政府组织和持不同政见者乘机加紧活动，反对现政权；四是美国加大了对古巴的封锁与和平演变的力度，通过各种手段千方百计在古巴社会中制造裂隙。有些预言家们甚至预言，古巴的社会主义政权维持不了多久了，认为古巴的社会主义政权早晚也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跟着东欧国家的前社会主义政权垮台。曾几何时，来自世界各地的数百名记者聚集在哈瓦那等待古巴社会主义政权垮台。流亡在美国的反古分子兴高采烈地叫嚷“要返回哈瓦那过圣诞节”。时任美国总统的老布什在《纽约时

报》上发表文章称，他已经听到古巴政权垮台的声音了。他甚至声称："期待着成为踏上卡斯特罗之后的古巴自由土地的第一位美国总统。"

但事实是，苏东剧变至今已过去近20年，由于古巴拥有以卡斯特罗和劳尔为核心的党和政府坚强的领导，古巴全党和全国人民坚持马列主义、坚持社会主义不动摇，古巴的社会主义政权不仅没有垮台，反而越来越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古巴依旧傲然屹立在西半球的加勒比海岸。

三 古巴社会主义的"更新"

2006年7月31日，古巴党和政府的最高领导人卡斯特罗因肠胃出血，接受手术，决定把古巴最高行政职权暂时移交给劳尔。2008年2月24日，古巴人民政权代表大会举行换届选举，在当天召开的第七届人代会上，劳尔当选并就任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和部长会议主席，正式接替他的哥哥、执政长达49年的卡斯特罗，古巴最高行政权力顺利完成交替。

劳尔执政以来，古巴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新的经济变革措施，主要有：放宽对消费品销售的限制，允许向持有"可兑换比索"（即外汇券）的古巴普通民众销售手机、电脑、DVD机、彩电等商品；允许古巴本国公民入住涉外旅游饭店（但需支付"可兑换比索"）；取消工资最高限额；允许职工和大学生兼职，挣两份或两份以上工资；通过第259号法令和第282号法令，将闲置的土地承包给合作社或个体农民；大力发展市郊农业；削减不必要的公共事业补贴，关闭免费职工食堂；取消凭本低价供应的芸豆、土豆、香烟等商品；将原国有理发店和美容店承包给原职工；将投资建高尔夫球场的外国投资者土地租用期限从50年增加到99年等。

2010年以来，古巴政府又出台一系列"更新"（actualizar）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新举措。同年8月1日，劳尔发表重要讲话，宣布古巴将分阶段逐步减少在国有部门工作的职工，扩大个体劳动者的数量，并称这是"结构和概念的变革"。9月13日，古巴官方宣布，到2010年

3月底，在半年时间内，国有部门（包括各部委及其下属单位和国有企业）将有50万人下岗，其中约25万人将从事个体劳动。为此，政府于9月24日在党报《格拉玛报》上公布了为个体户开放的178项经济活动，放宽了对个体工商户的限制。而其余25万人可组建合作社或选择到有空缺岗位的国有单位（农场、建筑业、警察局）就职。10月初，古巴政府开始启动个体户注册登记这一新的经济改革的重要一步。10月25日，古巴官方公报上正式公布了有关个体户纳税的具体规定。自2011年1月4日起，古巴国有部门正式开始裁员，裁员先从糖业部、农业部、建设部、公共卫生部四个部和旅游业开始，然后将波及其他部门。

古巴大批国有部门人员下岗、放宽个体户从业，是解决剩余劳动力、调整就业结构、降低国家财政支出、增加税收收入的必要措施，是古巴新的经济变革的重头戏，是一剂猛药，其成功与否将对古巴未来的经济改革进程起关键作用。根据新的规定，在178项允许个体户从事的经济活动中，有29项是新开放的，有83项允许雇用劳动力。例如，开个体饭店，过去只能由本人和家庭成员一起开饭店，现在允许雇用少量非家庭成员，过去最多只能允许同时12人用餐，现在允许同时20人用餐；过去只允许在服务性行业从事个体劳动，现在允许私人进行食品加工，酿酒，修理汽车、电器，生产和销售鞋子、手工艺品、家庭日常用品、生日和宗教用品等。

这次古巴新的经济变革措施来势凶猛，牵涉面大，触动了经济结构和观念问题。评论认为，随着个体户的扩大和允许雇工和国家银行准备向私企贷款等措施的实行，私人中小企业和城市合作社将逐步在古巴涌现，这将使古巴所有制的结构发生变化，使古巴经济逐步向市场经济过渡。此外，以往只有在外企工作的古巴人缴纳所得税，而绝大多数古巴职工不用缴纳所得税，而最近公布的有关纳税条例，将从根本上改变古巴民众不纳税的观念。到2011年3月底，古巴已有12.8万户农民承包土地，已有17.1万户新个体户进行了登记注册，加上原有的157370户个体户，现总共有32.8万户个体户。

值得一提的是，古巴领导人一般不提古巴是在进行“改

革”（reforma），一般只提“变化、变革”（西班牙文为cambio，英文为change）。古巴领导人强调目前古巴所做的是在“更新”社会主义。2010年8月初，古巴部长会议副主席马里诺·穆里略在古巴人代会期间说：“古巴不会进行经济改革，而是进行不向市场让步的古巴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更新。”他强调古巴“将保持政府控制90%经济活动的中央计划经济的模式”，“经济模式的某些东西会有所松动，如允许从事个体劳动，但我们不会交出所有权”，“古巴不会用市场经济改革来应对经济问题”[9]。同年10月31日，劳尔在古巴中央工会第86届全国理事会扩大的全会的闭幕式上说：“古巴不抄袭任何其他国家（的模式），在更新古巴经济模式的进程中，绝不会放弃社会主义建设。”他强调古巴的做法是根据本国特点的“土生土长的产物”，“古巴绝不会放弃社会主义建设”[10]。按照古巴政府的安排，在3年内，古巴将有100万名国有部门的人员下岗。古巴政府新的经济改革措施究竟效果如何，尚有待进一步观察。

2010年11月8日，劳尔在纪念古委全面合作协议签订1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向古巴全党、全国人民发出关于筹备召开古共六大的号召。他说，古共政治局决定在2011年4月中旬吉隆滩战役胜利和宣布古巴革命社会主义性质50周年之际召开古共六大。六大将集中解决经济问题，对更新古巴经济模式作出基本决定，并将通过《经济社会政策的纲要（草稿）》（El Proyecto de Lineamientos de la Política Económica y Social，以下简称《纲要》）[11]的重要文件。劳尔强调说：六大只讨论经济问题，不讨论其他问题。劳尔说，在六大召开之后，在2011年内，再召开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conferencia），讨论其他问题。同年11月9日，古巴公布了《纲要》的全文。根据安排，古共先在高级党校举办了两次领导人与专家的研讨会，然后，又在全国各地和各级党组织和群众组织中发动大家对《纲要》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广泛讨论。据报道，约有800万人参加了讨论，提出了数百万条意见和建议。经过汇总和分析，六大筹备小组根据大家的意见和建议，对《纲要》相关条文进行了修改，并将修改稿提交给4月16～19日召开的党的六大讨论和通过。

《纲要》包括前言和12个部分（经济管理模式、宏观经济、对外

经济、投资、科技创新、社会、农工、工业和能源、旅游、运输、建筑住房水力资源、贸易政策）。其要点是：①古巴是继续实施计划经济而不是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主要形式，此外，承认并鼓励合资企业、合作社、土地承包、商店承包、个体劳动者等有益于提高社会劳动效率的其他形式。②将继续保持免费医疗、免费教育等革命的成果，但将减少或取消过度的社会开支。③国家将修改就业结构，减少冗员，扩大非国有部门的工作、扩大个体劳动者的活动范围，并向其提供银行贷款和允许其进入原材料批发市场。④古巴将继续吸引外资、寻找资金来源来遏制生产部门的资金流失。⑤将重新安排其所欠外债的偿还期，严格履行其承诺以改善诚信。⑥将创建一个更加先进的金融制度，控制货币政策，将向个人的消费进行贷款。⑦将继续减少政府的比重和取消补贴，将逐步取消低价供应日用品和食品的购货本。⑧将逐步取消货币双轨制（即政府发的工资是古巴比索，而进口商品的销售价格是以比古巴比索高24倍的可兑换比索计价）。⑨将放松对买卖房子的限制，以解决严重的住房不足的问题。⑩古巴将给农业以更大的自主权以减少对进口的依赖，并增加和巩固商品和劳务的出口。（11）继续积极参与拉美一体化协会、加勒比共同体、加勒比国家联盟、加勒比石油组织等拉美和加勒比一体化进程，重点是参与美洲玻利瓦尔联盟。从《纲要》来看，古巴将坚持社会主义，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将坚持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而不是市场经济；将继续实行全民免费医疗和全面免费教育，将重视发展农业，进一步吸收外资，扩大个体户，削减政府的补贴。

古巴在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的道路方面已取得进展，即踏上了一条在变革开放中坚持、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道路。目前古巴正在“更新”其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古巴正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前进。古巴已逐步走出苏联解体造成的困境，在坚持社会主义的前提下，适应新的世界格局，使本国经济同世界经济接轨。展望未来，古巴的“更新”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进程将是渐进、稳步和谨慎的。古巴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还会出现曲折，但古巴社会主义的前景是令人乐观的。

[1] 徐世澄，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员。

[2] 于1992年获得通过。托里切利法确定两项基本惩罚：①禁止美国公司在第三国的子公司与古巴进行贸易活动；②禁止曾经进入古巴港口的船只以贸易为目的，或离开古巴港口180天内在美国港口靠岸。

[3] 杰西·赫尔姆斯，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参议院外事委员会主席；丹·伯顿，印第安纳州众议员。两人提出了一项法案——1996年3月12日由威廉·克林顿总统签署，内容主要是“关于由于古巴革命而受到利益损害人士的权利”和“对与古巴进行贸易活动者采取的措施”。

[4] Cien horas con Fidel，*Conversaciones con Ignacio Ramonet*，*Segunda edicion revisada y enriquecida con nuevos datos*， Oficina de Publicaciones del Consejo de Estado，La Habana，2006，pp.414-415.

[5] Granma，27 de julio de 1993.

[6] Fidel Castro，Independientes hasta siempre Discursos de inauguracion y en el acto de masas，Santiago de Cuba，IV Congreso del Partido Comunista de Cuba，10 y 14 de octubre de 1991，Editora Politica，Cuba，1991，p.50.

[7] Resolucion sobre el Programa del Partido Comunista de Cuba，Este es el Congreso mas democratico，Editora Politica，Cuba，1991，pp.36-47.

[8] Granma，7 de noviembre de 1997，p.2.

[9] http：//www.diarioinformacion.com/internacional/2010/08/01/cuba-quiere-actualizar-calma-socialismo/.

[10] http：//www.granma.cubaweb.cu/2010/11/01/nacional/artic01.html.

[11] http：//www.granma.cubaweb.cu/.

第六篇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学者对几个争论问题的评析

戈尔巴乔夫全盘否定苏共领袖和苏共历史的背景

吴恩远 李燕 [1]

一 戈尔巴乔夫全盘否定苏共领袖和苏共历史的思想根源

戈尔巴乔夫上台不久，由于匆忙推行“加速发展战略”，经济改革的几项主要措施执行都不是很顺利。但他不是从主观方面寻找原因，反而认为是党内干部的抵制及政治制度存在的问题，因此急于实行政治方面的变革。1986年7月31日戈尔巴乔夫在视察哈巴罗夫斯克时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他说：“目前正进行的改革不仅包括经济方面，也涉及社会生活其他领域：社会关系，政治体制，思想意识形态等。”几个月后他发出了号召：“必须在政治、经济、社会和精神领域中进行根本改革” [2] ，把“政治改革”放在了首位。

在推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纲领中，重评苏联历史占有最大分量。1987年1月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提出在苏联历史中“不应该有被遗忘的人物和空白点”，3月苏联科学院历史学部召开会议落实中央指示，由此揭开大规模重评历史的序幕。

正确总结历史经验，对推动改革、加深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理解无疑是有益的。但戈尔巴乔夫“重评历史”一开始就带有极大片面性，一步步走向了全盘否定苏共领导和苏联社会主义70年历史的道路。

戈尔巴乔夫这样做并不是偶然的，有其思想根源。他十分清楚：

要推行其民主社会主义的纲领，必须和苏联体制决裂。1991年他在追溯自己思想变化的轨迹时说，他“比其他人更明白改革的含义，即必须换掉这个体制。但如果一开始，社会还没有准备好，那就什么也得不到”[3]。戈尔巴乔夫的另一个得力助手谢瓦尔德纳泽也明白无误地表达过对苏联体制的憎恨。1991年他在回答法国电视台记者提问时说道：“我们在一个时期里有过共产主义理想，并为实现这一理想进行过斗争。后来我慢慢地意识到我坚信的东西是不可能实现的，必须改变这一现象。20世纪90年代初的一天，我对戈尔巴乔夫说，我们的制度已腐烂了，必须全部加以摧毁，并自上而下地进行彻底改造。”他们也十分清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最大的捷径是首先妖魔化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代表人物斯大林等苏共领导人。

二 苏共二十大奠定了否定斯大林等苏共领导人的历史渊源

苏共二十大在批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平反部分冤假错案等方面有一定积极意义，“揭了盖子”，但也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2007年版俄罗斯历史教科书认为，这些否定性后果包括：赫鲁晓夫在二十大报告中对苏维埃制度含糊其辞的批判逐渐破坏并摧毁了苏联社会主义；他对马林科夫优先发展轻工业方针的批判，导致苏联长时期国民经济结构失衡；对马林科夫认为苏联只是“建成社会主义基础”的批判，提出“最近超过美国”、“20年内建成共产主义”的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纲领，造成“全社会由于不能实现的声明、没有根据的诺言、蛊惑人心的论断而感到精神疲惫”[4]。该教科书强调，苏共二十大的后果不仅使斯大林等苏共领导人威信扫地，从根本上动摇了包括西方共产党在内的整个共产主义世界，注定了苏联在冷战中的失败，也给今天俄罗斯带来了无法挽救的损失[5]。所以，我党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不止一次正确指出：苏联演变是从赫鲁晓夫开始的，原因在于他“丢掉了斯大林这把刀子”。

戈尔巴乔夫自诩“苏共二十大产儿”，公开赞扬“赫鲁晓夫大无畏的行动”，高度评价苏共二十大“是对极权体制的第一次冲击，是朝社会民主化迈进的第一次尝试”[6]。但认为赫鲁晓夫在对斯大林的揭露方面还有局限性，“不能也不愿揭露他所抨击的现象的深层基础”——戈

尔巴乔夫明确指出这个“深层基础”就是“社会体制”[7]。所以，当他宣称要在全社会推行“公开性、民主化”，要与“极权的官僚体制决裂”时，自然也仿效赫鲁晓夫的做法，首先发起对斯大林等苏共领袖人物的攻击。

三 有意识迎合西方“和平演变”苏联的战略

苏联解体以后，通过对剧变的反思，相当一部分俄罗斯学者已认识到：“苏联解体是西方帝国主义有意识的政策的结果，他们借助在苏联内部被其收买的、贪赃枉法的一帮人直接实现了这个目的。”[8]

曾任戈尔巴乔夫总统助理的阿·切尔尼亚耶夫写道：“戈尔巴乔夫早在来莫斯科任职前，内心深处就做好了摧毁马克思主义正统思想的准备。现在当要寻找改革的意识形态时，他自然会求助于自由的，即外国的思想。”[9]

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初，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和其初步交往后，纷纷发表赞扬的讲话，对戈尔巴乔夫寄予希望。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说，戈尔巴乔夫对各种主张都是豁达的和不抱偏见的；法国总统密特朗说，戈尔巴乔夫说话“直率明确”，他将会“十分大胆地利用世界局势”。美国前总统卡特在访苏后发表谈话，认为：“戈尔巴乔夫也许是世界上最引人注目的、最有吸引力、最有创新精神的领导人。”“全世界都期待着他在苏联进行有益的改革，期待他在苏联和其他国家之间进一步限制军备和核武器方面取得有益的进展。”

而当西方社会舆论通过斯大林一代与后斯大林一代在1988年6月的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上的“决战”前夕的对抗，感受到戈尔巴乔夫的用意。西方一家大报写道：“这一次认真进行的并为苏联居民所真正接受的关于斯大林主义的讨论有可能冲毁大坝。莫斯科一家发行量达百万份的大报称戈尔巴乔夫改革是‘阶级背叛’和‘放弃社会主义’。”[10]

“改革的方针岌岌可危。权力之争正在变成关于独裁者斯大林的历史评价之争。如果斯大林的阴影被驱赶到角落中——戈尔巴乔夫就胜利了。如果早已死去的独裁者从过去的黑暗中重新站起来——对可

能的改革一切希望都将破灭。”[11] 因此西方加大了对戈尔巴乔夫的支持。1990年，在全国一片混乱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却被授予了诺贝尔和平奖。

---

[1] 吴恩远，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李燕，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2] 〔苏〕戈尔巴乔夫：《讲话与文章选集》第4卷，莫斯科，1987，第37、308页。

[3]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

[4] 〔俄〕亚·维·菲利波夫：《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吴恩远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5] 《苏共二十大：在苏联历史命运和苏维埃制度中的作用》，〔俄〕《祖国史》2007年第1期。

[6]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王尊贤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60页。

[7]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王尊贤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56页。

[8] 〔俄〕弗·涅什科：《苏联的解体》，莫斯科，1996，第14页。

[9] 〔俄〕阿·切尔尼亚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徐葵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第209页。

[10] 俄罗斯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编《奔向自由：戈尔巴乔夫改革二十年后的评说》，李京洲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第340页。

[11] 俄罗斯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编《奔向自由：戈尔巴乔夫改革二十年后的评说》，李京洲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第331页。

妖魔化斯大林及苏共领袖人物的过程

吴恩远 李燕

一 以“大清洗”事件为突破口丑化斯大林

把社会主义制度、无产阶级专政说成“惨无人性”的体制，把斯大林说成“独裁者”、“暴君”、“阴谋家”、“杀人犯”等，妖魔化斯大林，是资产阶级对付共产党人的一贯手法。戈尔巴乔夫等人继续抓住这件事情大做文章。戈尔巴乔夫说道：“有人说，斯大林对许多违法事实并不了解。据我们所掌握的材料，并非如此。斯大林及其周围的亲信的大规模镇压和违法现象对党、对人民所犯的过错是巨大的和不可原谅的。”[1] 于是所有的报纸、刊物、电台、电视都为否定斯大林和苏共历史的宣传大开绿灯，全国掀起一股反共的浪潮。发表了一大批集中揭露“大清洗”罪行，专门描写集中营、劳改营的文章、文学作品等。例如，《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日瓦戈医生》、《古拉格群岛》等，在过分渲染的恐怖气氛中把斯大林描写成一个独断专横、阴险毒辣，不惜用一切手段来维持统治的专制暴君；同时竭力歪曲事实真相，夸大被镇压者数据，认为“大清洗”中镇压的人数高达2000万、4000万、5000万……甚至有说达1亿人的骇人听闻的数据[2]。

2008年在俄罗斯权威部门通过下出版的俄罗斯历史教师参考书，对这一事件有了一个比较公正的说法。该参考书承认“大清洗”问题发生的严重性，这个问题充满矛盾，必须辩证地看待。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在加强法制、防止个人独裁方面确实存在需要总结的经验教训。但教科书指出：“重要的是对学生讲明，斯大林是在具体历史形势下采取的行动。他作为这个制度的领导者、保卫者，作为要把国家变为工业国，建立一个自上而下的国家管理体制最坚决的拥护者，作为在即将面临一场大战威胁的国家的领袖，他的行为是完全合理的。”[3] 2006年在“中国俄罗斯友好年”活动中，时任俄罗斯总统普京赠送中国社会科学院2004年最新版的《俄罗斯大百科全

书》中，对于大清洗的具体人数有明确说法：20世纪30～50年代初被判死刑的“政治犯”数字是786098人。其中既有不当杀害的人，也有罪有应得的人。

二 贬低斯大林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

贬低斯大林的另一个重要法宝是：否认斯大林时期社会经济发展取得的成就。戈尔巴乔夫说道：“我们接受的是一份极其沉重的遗产：荒芜破落的农村、农业和加工业，生态状况严重……”[4] 广泛宣扬“加速工业化的选择并不带有必然性和不可避免的性质”，是“斯大林人为加速了工业化”，造成“斯大林时期人民生活处于贫困状态”的后果。或者表面也说一点工业化成就，但认为付出了巨大代价，人民遭受巨大损失。有人写道：“斯大林实行的这一工业‘大跃进’方针……最终使国家和人民浪费人力财力，遭受巨大损失。”[5] 认为在农业集体化中，斯大林是制造1932～1933年和1946～1948年遍及全国饥荒的“主谋”，仅在乌克兰一地就饿死700万、1000万甚至1500万人，是杀人恶魔、刽子手（实际上据俄罗斯学者最新考证：当时确实发生了自然灾害，死亡人数在1932～1933年是100万～200万人，1946～1948年约为200万人）[6] 。

戈尔巴乔夫之流违背历史真实、肆意诬陷斯大林等领导人的做法是经不起历史检验的。联合国《世界银行》在关于世界工业化分析的总报告中指出：“相当清楚的是，苏联在工业化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根据西方经济学家的计算，苏联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率从1929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即整个斯大林时期——笔者注）为6.7%，1953～1965年为6.1%，1966～1970年为5.3%……”这个报告还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20年间世界其他国家与苏联工业化的发展作了对比，指出：在工业化国家中除了日本和德国，以及所有非市场经济国家，增长速度都没有苏联快，增长持续时间也没有苏联长[7] 。2007年，俄罗斯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室主任舒宾教授写道：“俄罗斯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开始于俄罗斯帝国时期，20世纪60年代完成。但其中决定性的阶段是在30年代斯大林执政时期。斯大林体制确实具有严酷性，其严酷的程度甚至比资本原始积累阶段也毫不逊

色。但只有这样才能集中掌握对于建设工业基础必需的资源，并奠定了苏联工业体制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他还说道：“苏联实现现代化那种紧迫的、刻不容缓的特点带来了巨大的牺牲，而这常常被一些人指责为无谓的牺牲。但无可怀疑的是，苏联工业化、现代化的道路也是沿着人类共同的道路走的。当然具有自己的三个特点：俄罗斯民族文化传统，社会主义的纲领，列宁、斯大林所制定的发展方向。”[8]

2007年，由俄罗斯国家教委批准出版的俄罗斯历史教学参考书充分肯定了斯大林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取得的巨大功绩。教材写道：“正是在他领导期间国家实现了经济的工业化和文化革命，这个结果使得不仅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快速提高，而且还建立了世界上最好的教育体制；苏联在科学发展领域进入先进国家行列；实际上消灭了失业现象。”

三 卫国战争

苏联卫国战争取得的伟大胜利曾经使斯大林的威望极度升高。赫鲁晓夫为了否定斯大林，力图贬低斯大林在卫国战争中的作用，甚至不惜捏造“斯大林在卫国战争初期惊慌失措”、“斯大林不在莫斯科”、“仅仅靠地图仪指挥作战”等罪名。赫鲁晓夫时期还主要是指责斯大林对战争初期军事失利的责任，而戈尔巴乔夫则对斯大林在整个战争中的作用进行批判。1993年，一个叫苏沃洛夫的前苏军情报部官员写道：“苏联在并无外来威胁的情况下挑起了军备竞赛，组织军事行动，德国被迫在1941年夏发动对苏联的进攻，是为了破坏苏联进攻德国的计划。”他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竟然提出是“斯大林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9]，更多的人则指责“斯大林与希特勒共同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有人把1942年夏季战役的重大挫折，顿河、顿巴斯、罗斯托夫等地陷落，归咎于斯大林的指挥决策错误；1942年苏军最高统帅部发布的“一步也不准后退”的第227号命令，曾经在抵抗法西斯战争的最激烈的战斗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竟被说成斯大林“把责任归咎于那些常常是无罪的人”[10]；有人贬低卫国战争胜利的意义，认为战争胜利不过是强化了苏联高度集中的行政命令体制，促进了“领袖专断”[11]……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原莫斯科大学历史系主任

库库什金尖锐批判了这些歪曲历史的现象。他说："出现了大批歪曲历史真相，特别是歪曲最高统帅部活动的反科学的所谓学术著作，集中对苏联军事力量的最高统帅斯大林进行残酷无情的攻击，甚至提出战争的胜利并不是遵循斯大林的领导、恰恰是违背他的领导取得的。" [12]

2002年，俄罗斯总统普京说道："正是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才取得了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这一胜利在很大程度上与他的名字相关联。忽视这一现实是愚蠢的。" [13] 历史终于给了斯大林在卫国战争中的作用应有的评价。

四 对斯大林个人品质的丑化

政治家犯错误，人们一般还能理解，但这个人如果是个道德败坏的人，那就声名狼藉了。戈尔巴乔夫等人为了全面丑化斯大林，不惜采取人身攻击的卑劣手法。他亲口说道："斯大林是一个不道德的人。" [14] 斯大林的全部历史以及与他有关的一切，包括他的身世、青少年时代的生活、革命活动、思想政治观点甚至他的家庭生活和亲戚朋友等，全部被翻腾出来。

为了败坏斯大林的名声，一个叛逃到西方的叫奥尔洛夫的人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编造了"斯大林是沙皇暗探局的奸细"的故事。后来西方流传所谓"叶廖明的信"，其中谈到斯大林曾与沙皇警察合作。这封信于80年代也传到苏联国内。苏联学者经过研究认定这封信完全是伪造的。1990年《绝密报》刊登了一个叫马尔蒂诺夫的人向沙皇警察厅长汇报马林诺夫斯基和朱加施维里（斯大林）的活动的信，又一次提出"莫须有"的所谓斯大林是沙皇暗探局奸细的问题。

还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对斯大林的心理和行为动机进行了种种揣测，把他说成一个权力欲强、好妒忌、爱报复的人，甚至称他为偏执狂和迫害狂。原苏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后任叶利钦的顾问的沃尔科戈诺夫在其《胜利与悲剧》一书中，把斯大林说成一个智慧过人又生性凶恶的人，说他崇拜暴力，具有永远无法满足的权力欲 [15] 。为了说明斯大林残暴，有人制造了斯大林杀死了他的妻子和粗暴地对待他的

母亲的谣言。有一个作家甚至攻击斯大林不关心他被俘的儿子雅科夫的命运，是毫无人性。后来陆续发表的斯大林的书信和其他材料，说明斯大林对母亲和妻子有着深厚的感情，而斯大林拒绝法西斯的建议，不同意用俘获的德军元帅保卢斯交换雅科夫，恰恰说明了斯大林大公无私的品德 [16] 。

近年来俄罗斯开始了对斯大林的重新评价。阿尔图宁·尼古拉高度赞扬了斯大林的个人生活作风。他写道：“当斯大林逝世之际，他给俄罗斯留下了什么？俄罗斯当时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强国！而斯大林给个人留下了什么？在其逝世之际，工作人员在他的驻地仅仅找到几双织补过的短袜子，几双鞋跟都已磨破的皮靴，两套军服：一套是他每天都要穿的，另一套是用于节日检阅穿的。” [17]

---

[1] 〔苏〕戈尔巴乔夫：《十月革命与改革：革命在继续》，莫斯科，1987，第21页。

[2] 吴恩远：《从档案材料看苏联30年代大清洗数字的夸大》，《世界历史》2003年第4期。

[3] 《俄罗斯历史（1900～1945）》，俄罗斯教育出版社，2008，第130～132页。

[4]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莫斯科，1990，第4页。

[5] 马龙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苏联模式的全面突破》，中国选举与治理网，2007年5月21日。

[6] 吴恩远：《十月革命和俄国现代化进程》，《历史研究》2007年第5期；李燕：《苏联1932～1933年饥荒问题研究综述》，《西伯利亚研究》2008年第6期。

[7] 世界银行：《1987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第44页。

[8] Александр Шубин，10 мифов советской страны，М.2007，cc.348-349.

[9] 〔俄〕弗·苏沃洛夫：《谁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莫斯科，1993；

《斯大林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俄〕1993年1月16日《消息报》。

[10] 《历史学家正在争论》，莫斯科政治书籍出版社，第326页。

[11] 〔苏〕帕·托曼：《伟大卫国战争：公开和未公开的情况》，〔苏〕《苏共历史问题》1990年第9期。

[12] 吴恩远：《再谈俄罗斯反思苏联历史、重评斯大林思潮》，《世界历史》2006年第2期。

[13] 人民网，2002年1月16日。

[14] 〔俄〕阿·切尔尼亚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徐葵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第243页。

[15] 参见张捷《俄罗斯开始重评斯大林》，载于李慎明主编，吴恩远、王立强副主编《历史的风——中国学者论苏联解体和对苏联历史的评价》，人民出版社，2007，第176页。

[16] 李慎明主编，吴恩远、王立强副主编《历史的风——中国学者论苏联解体和对苏联历史的评价》，人民出版社，2007，第179页。

[17] 〔俄〕阿尔图宁·尼古拉：《斯大林政策分析及其对俄罗斯进一步发展的意义》，莫斯科，2003。

从对斯大林的批判扩大到对共产党领袖人物的批判

吴恩远 李燕

戈尔巴乔夫掀起的对斯大林批判的狂潮，极大地损害了斯大林的声誉。据1988年社会民意调查，对斯大林持肯定评价的只占被调查者的8%，否定的占64%。随着社会批判斯大林的进一步升温，自然提出了对“导致斯大林现象产生的苏共其他领袖人物的批判”，说斯大林之所以“罪恶累累，是因为列宁带了个坏头”。正如美国前副国务卿布热津斯基所说：“力图摒弃斯大林主义而保持列宁主义简直是行不通的。”矛头又指向了列宁。

当时在俄罗斯一直在不断复制和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十月革命并非一次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社会革命，而不过是一个巨大的阴谋，是一次在西欧一小撮阴谋家和冒险家的情报机关帮助下，由“德国奸细”列宁和“英美”特务托洛茨基所密谋组织、挑唆完成的一次“政变”[1]。曾任苏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雅科夫列夫宣称：“从文件中早已得知，这（革命）是德国总参谋部的行动……此外我对列宁通过加涅茨基得到的资金格外感兴趣。帕尔武斯是策划者，这是历史学家和所有人都知道的。列宁在1915年3月得到了200万（约合今天的1000万）以进行破坏活动。这些都是有文件记录的历史事实。”[2] 这件事甚至拍成了电影《谁为列宁付钱？世纪秘密》[3]。“民主联盟”主要成员尤里-阿法纳西耶夫公然宣称：“我们的整个历史是靠使用武力和暴力写成的，如果我们的领袖和缔造者（列宁）为某种东西打下基础的话，那就是国家暴力和恐怖政策的原则。”他宣称：“斯大林主义的实质在于列宁主义。”有位作家公开宣扬“十月革命根本就是不必要的”，明目张胆地攻击列宁“不是一个善良的人”，而是一个“具有革命的残酷性的人”。他说：“斯大林一点也不比他的导师更残酷，列宁就是昨天的斯大林。列宁长期居留在国外，所以不热爱自己的祖国。”[4] 从1989年起，苏联各地连续发生了多起推倒列宁纪念像，或向列宁像涂抹油漆、投掷脏物的事件。

戈尔巴乔夫提出还要追究“斯大林亲信”的责任。他以最严厉的口吻指责说：“斯大林及其周围的亲信……对党和人民犯的错误是巨大的和不可原谅。”在1988年的全国州委书记会议上，戈尔巴乔夫赞扬加里宁市要求改名为“特维尔市”的行动，指责加里宁。他说：“斯大林把加里宁的老婆送进了监狱，称她是‘人民公敌’，而他继续颂扬斯大林，对他卑躬屈膝。道德何在？”他同时批评勃列日涅夫，说：“勃列日涅夫也是一样。他的女婿在全国接受了贿赂约100万。而且全家都受贿赂……我们又怎么能阻止人们更改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城市、地区、工厂的名称呢？”[5] 一时间列宁、斯大林、捷尔任斯基等人的塑像在全国各地被推翻或销毁，以他们命名的地方基本上全部被取消。

---

[1]〔俄〕2007年6月1日《莫斯科新闻》。

[2]〔俄〕《选择》2006年第2期。原文如此，没有注明货币单位。

[3] 吴恩远：《苏联解体研究综述》，《世界历史》2009年第1期。

[4] 曹长盛、张捷、樊建新：《苏联演变进程中的意识形态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第335页。

[5]〔俄〕阿·切尔尼亚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徐葵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第242页。

全盘否定苏共领导人与苏联解体

吴恩远 李燕

否定了苏共领导主要人之后，其逻辑结果必然导致全盘否定苏联历史。1987年7月20日，《消息报》载文谴责苏联过去的中小学历史课程，认为它对许多历史事实绝口不谈，最严重的缺陷是没有对斯大林的道德品质作出评价，要求重新编写历史教科书。1988年6月，苏联教育部作出决定，全国所有学校的苏联历史课本在1989年全部销毁；取消学校的历史考试，直至供学校使用的新的、“更真实的”苏联历史课本编写出来之后才恢复。

由于戈尔巴乔夫等人掌握着舆论工具，他们对苏联体制和苏共领导人的疯狂攻击也一度迷惑了当时民众。据1991年初的民意调查统计，苏联政府的支持率仅有13%，不支持率达73%；而苏共的支持率仅有14%。在这种情况下，苏联解体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当代俄罗斯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俄罗斯科学院历史人口学与历史地理学学术委员会主席、科学院院士尤里·波利亚科夫曾具体描述戈尔巴乔夫通过全盘否定斯大林等苏共领袖、否定苏联历史从而导致苏联解体的过程。他写道：“从1987年起，最初还是小心翼翼的，但在1988年、1989年后，开始了对斯大林暴风骤雨般的批判，报纸和杂志充塞了劳改营之类的文章。最先对斯大林的批判还限于比较谨慎的争论，如什么是斯大林主义，或者说它怎样背离了列宁主义、是对列宁主义的扭曲和变形等。从1989年底到1990年初，反共产主义的、主张复辟的思潮急剧增长，不断扩大了对列宁、列宁主义、十月革命、社会主义选择的批判。在1991年8月事件后，这种批判的趋势成为了社会舆论主流，并且具有官方的性质，对苏联历史的批判达到前所未有的炽热程度，甚至关闭博物馆、改换城市名称、推倒苏联史上著名人物的纪念碑。”尤里·波利亚科夫最后总结了全盘否定苏联历史的进程是“从比较含蓄地对苏维埃制度和社会主义的批判发展成对它

们的完全否定。到1992年，在思想上与苏联历史划清界限的过程基本上完成了”[1]，还可以补充一句话：当此之时，苏联也就解体了。

---

[1] Ю.А.Поляков，Наше непредсказуемое прошлое，М.1995，сс.35-36.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对世界局势的影响

吴恩远

（1）苏联解体之初，当时西方世界一片欢腾，认为是社会主义“历史的终结”，西方文明世界的胜利，剩下的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也将步苏联后尘解体或者崩溃。弗朗西斯·福山在其著名的《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一个人》里写道：“世界的历史将进入一个新时期，那就是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将代替其他制度成为世界的政体主流。西方民主制度将在世界各地取得胜利。”前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也认为：“共产主义的失败可能为全球范围内综合地实现具有约200年前在美国和法国那股巨大吸引力所迸发出来的民主观念铺平道路。”[1]

但20年后，这种观点的不合时宜性暴露无遗。

甚至福山本人都改变了自己的观点。在其最近新著《美国在十字路口》中他承认：如果美国自己都无法解决比如华盛顿地区的贫穷问题，它要到一个文化上完全异己的地方贸然实行民主，解决别人的问题，恐怕成功的可能性很小。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西方发达国家悄悄出现了一波又一波的“马克思热”。1999年底，在新千年即将到来之际，英国广播公司和西方一些大的媒体分别进行了“千年伟人”评选活动，投票结果显示，马克思是千年最伟大的思想家。路透社在报道评选结果时，特别指出《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这两本书产生了巨大、深刻的影响。2007年底爆发的世界金融危机，让马克思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重新风行起来，此前少有人问津的《资本论》骤然热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思潮在拉美等地又悄然复兴。

至于中国的日益崛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世界越来越大的影响，更是全世界公认的事实。那种认为“中国即将崩溃”的观点已经成

了世人耻笑的话柄。

（2）当时认为苏联解体消除了“冷战”因素，世界将变得更加和平。事实是：美国的霸权主义、单边主义更加肆无忌惮；北约的东扩，在东欧、中亚发动的一系列“颜色革命”使该地区出现一波又一波政权更迭，局势混乱；由西方插手甚至直接武装干预的中东北非局势，至今战乱频仍，导致大批国家的无辜平民流离失所，局势失控……

20年的历史雄辩地证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并没有改变马克思主义对人类历史发展方向的预测，需要我们进一步坚定对人类社会主义发展前途的信念。正如邓小平所说：“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这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在当前，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将会对世界社会主义发展作出巨大的贡献并产生深远的影响；苏联解体给世人的一个重要教训在于：防止帝国主义和平演变、反对霸权主义仍是当前世界人民的主要任务。

---

[1]〔美〕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大失控与大混乱》，潘嘉玢、刘瑞祥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第73页。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果的总体评价

吴恩远

苏联解体对从法理上承继了苏联遗产的俄罗斯来说究竟是悲剧还是喜剧，是我们评价本文主题的逻辑起点：它决定后人应当吸取其正面经验还是负面教训。

（1）认为俄罗斯将从剧变中受益，步入西方文明世界的殿堂。

事实恰恰相反。

从经济上看，1989~1999年10年间，俄罗斯工农业产值和整个国民经济下降一半，超过卫国战争时期所遭受的经济损失。当时有人为此辩护，说这只是短期的“阵痛”，是“转轨必然付出的代价”。但直到2007年俄罗斯才勉强恢复到1989年的水平。而在此期间由于世界经济的发展，一进一退更拉大了俄罗斯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至于领土分裂、内战频仍、道德沦丧、恐怖威胁、吏治混乱……带给俄罗斯民众心灵上的创伤至今难以平息。俄罗斯总理普京对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后果有一段十分中肯的评价。他说：“我深信，苏联解体是全民族的巨大悲剧。我认为，前苏联的普通公民和后苏联空间内的公民、独联体各国公民、普通的公民们没有从中赢得任何东西。”据俄罗斯多次民意调查，大多数民众也持此看法。这就有力驳斥了国内外一些人鼓吹“苏联解体是历史的进步”、“历史的必然”的谬论，同时也是对中国人民居安思危、避免苏联解体悲剧的警示。

（2）当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时，没有遇到有组织的反抗，也没有共产党人上街抗议。因此有人以这些国家的人民“平静地接受”了苏东剧变的事实，得出苏东剧变是“历史必然”的结论。

的确，当初大多数苏联人没有认识到苏联解体的悲剧性后果，甚至对解体后国家的前途抱有美好幻想。

但是，观察历史事件的方法论是，离当初发生的事实越远，越能看清事实的真相；要从“动态”的角度，而不能从“静态”的角度观察历史。正如马克思曾经对这种观察事物的方法所精辟论述的原理：“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

20年后，大多数俄罗斯人对此态度发生了转变。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所若干次民意调查表明：70%以上的俄罗斯人认为苏联解体是悲剧。这种情况还发生在乌克兰、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等国家。例如，乌克兰总统顾问、乌克兰科学院院士、国际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巴赫莫夫指出，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对乌克兰是一个悲剧，尽管当初有90%的乌克兰人投票赞成独立。他说：“前不久，在欧洲作了一个关于20个国家幸福指数的问卷调查，提的问题是：‘你认为你最幸福吗？’结果乌克兰的幸福指数在全欧洲排在倒数第一。问卷调查中还有一个问题：‘你希望生活在哪个时期？是现在的乌克兰？还是在欧洲？还是在苏联时期？’希望生活在今日乌克兰的只占6%，希望生活在欧洲的占20%，希望生活在苏联时期的占35%。”[1]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季塔连科院士对当年俄罗斯人“平静接受苏联解体”的事实也作了反思。他说，苏联解体之时“我们的人民犯了错误，没有在国家危急的时候出来捍卫它”。

所以，如果说当初俄罗斯人等的确是“平静接受苏联解体的事实”的话，那么现在他们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确实是“不平静”的。

---

[1] 巴赫莫夫2011年4月21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发表的报告。

今天对于苏联解体这一历史事件的争论焦点

吴恩远

在关于苏联解体原因的争论中，大多数人认为苏联解体是一种合力造成的，既有内部的，也有外部的，既有政治的，也有经济的，既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原因……但对其中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则存在不同观点。争论的现实意义在于：主要原因决定人们应当吸收的主要教训是什么。

一种观点认为：是“苏联模式”，或者如一些人所说的“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体制、社会制度导致了苏联解体。

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认为：“以苏联名义所建立的共产主义集权制度”，政治上是一种“官僚化等级制统治整个社会”的“有罪和残暴”的大规模谋杀制度；经济上“无法提出一种切实可行的社会经济的替代办法来取代自由市场制度”致使“经济不振和最终制度上的运作不灵”；更由于“道德上的肆无忌惮”，“摧毁了人的精神”，扼杀了（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最终敲响了共产主义的历史性丧钟 [1] 。

俄罗斯“右翼力量联盟”认为：“我国在长达四分之三的世纪里进行着前所未有的社会实验，试图实现共产主义的空想，它建立了血腥的集权制度和变态的毫无效率的命令经济，以巨大的代价建立起了核强国。”“由于军国主义和泱泱大国自负心理所导致的严重的失调和过重的负担，由于对劳动和工作经济性的自然刺激受到了严重破坏，更由于大规模民主运动所施加的压力，共产主义制度破产了。” [2]

我国部分学者尽管也承认斯大林模式取得的成绩，但认为苏联解体主要原因是“制度问题”，认为苏联体制弊端主要在于：高度集权、缺乏民主与有效的监督机制、领导干部思想僵化、脱离群众、破坏法制、个人崇拜和特权盛行、形成了“在册权贵”、不断出现政策失误

等。最近出版的一本《苏联真相》明确指出："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是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及体现这一模式的体制问题。"[3] 他们坚决反对把苏联解体归咎于戈尔巴乔夫，认为："如果把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归结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必然会忽视历史上长期积累下来的问题，忽略引起质变的诱因"，所以戈尔巴乔夫的"责任只能是直接意义和浅层次上的，是表面性的，属于导因性质"。

与此相对的一种观点，不否认苏联体制历史上存在的严重弊端，甚至把它视为苏联剧变的深层次因素。但较之历史因素，现实是更为主要的原因，戈尔巴乔夫及其同伙上台后奉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全盘否定苏联社会主义体制和社会主义历史，造成政治、经济、社会和民族关系的混乱，最终导致苏联解体。

这里争论的焦点在于：

第一，一些人一再强调苏联解体是"制度"、"体制"的原因造成的，但却忽略戈尔巴乔夫时期的"制度"、"体制"对苏联解体的作用。其实戈尔巴乔夫和他们一样，也是猛烈地抨击"苏联社会主义体制"和"斯大林模式"的。苏共二十八大决议和纲领性声明中写道："集权的斯大林体制给国家、人民、党、社会主义思想本身造成了巨大损失"，党公开"谴责斯大林主义的罪行和粗暴地践踏人权的现象"[4]。所以戈尔巴乔夫在大会上说道："我们已经抛弃了斯大林集权官僚体制。""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正在被自由的人们的公民社会所取代。"[5] 十分清楚，戈尔巴乔夫时期已经和苏联社会主义体制、斯大林模式彻底决裂，奉行的是另一种制度。

因此，即使"制度论"者的观点能够成立，也不能回答是"哪一个制度"导致了苏联解体，而且也不能解释这个悖论：戈尔巴乔夫不正是按照他们的观点批判和改造"苏联模式"、"斯大林模式"吗？为什么反而导致了国破家亡的后果？

第二，评价"苏联社会主义体制"必须遵循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苏联社会主义体制，其实如同任何社会体制一样，自身都存在"肯定"和"否定"两种因素。苏联当时仍然是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之一，按

照美国、日本、中国学者的统计，20世纪80年代中期其综合国力占据世界前两位，并非一定是“无可救药”。这一点甚至连戈尔巴乔夫本人也是认可的。2006年，在戈尔巴乔夫75岁生日时，有人问他：“如果不搞当初的改革，你现在干什么？”戈尔巴乔夫回答说：“如果我身体还行的话，仍在当苏共中央总书记。因为在我执政的时期，社会体制也还是足够稳固的。”[6] 曾任俄罗斯国家档案馆馆长的鲁·皮霍亚教授也认为不存在苏联解体的必然因素：“80年代笼罩着全国的经济危机是严重的。然而，国家的巨大资源使人们能够指望有效地克服经济困难。可以深信不疑的是，苏联（当时）没有一个多少有组织的和群众性的政治反对派。”[7] 俄罗斯科学院综合社会研究所分别在1999年、2000年、2001年曾作了几次调查，占被调查者66.5%、63.2%、57.6%的俄罗斯人均认为苏联解体是可以防止的，赞同“苏联解体是不可避免的”观点的人仅仅占20.3%、25.4%和30.0%。2005年12月俄罗斯“全俄民意调查中心”对俄罗斯46个州、边疆区和共和国的153个居民点进行了民意调查，有57%的人则认为，苏联解体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就是说多数俄罗斯人并不同意“当时的苏联社会制度必然灭亡”的观点。

几千年世界历史发展中的无数事实证明：任何执政者上台之初都会承继一笔巨大历史遗产，其中既有发展的源泉，也有前进的阻碍，或许一些执政者承继的“负担”多些，而另一些执政者负担少些。从辩证法的角度看，这些都不成为朝某种状态发展的“必然因素”：贫困的国家可以发展壮大，“穷则思变”；而一些看似非常强大的国家也可以霎时间“灰飞烟灭”，“富则骄奢”。断言那些即便是“具有严重弊端”的国家必然灭亡，是“失败国家”，如同把那些貌似强大的国家视作“亘古不变”一样，都是站不住脚的。这里的关键在于：执政者如何“趋利避害”。

第三，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人类今天已经进入法治社会。因此，我们追究任何一个事件的责任，首先必须从法理的角度来探寻，而不是凭主观臆想。

1990年3月，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关于设立苏联总统职位和

苏联宪法（基本法）修改补充法》，对苏联的总统职责作了如下规定：

——对维护苏联公民权利和自由、维护苏联宪法和法律起保障作用；

——采取必要的措施维护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的主权、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实现苏联民族国家制度原则[8]。

苏联宪法对总统维护国家宪法、“主权和领土完整”应当承担的职责规定十分清楚，而戈尔巴乔夫在担任苏联总统一职期间，既没有“保障”苏联宪法不被破坏，苏联公民权利不受侵害（普京曾说：苏联解体使2500万俄罗斯公民一夜之间沦为二等公民），更没有维护国家领土和主权的完整，难道他还能把此责任推给其他人，包括他的前任？

接下来我们分析一下俄罗斯人对苏联解体的观点。当我们在讨论苏联解体的原因时，首先应当听取和尊重俄罗斯人的意见，因为这毕竟是他们的国家，是他们的切身经历和感受。

2001年俄罗斯科学院综合社会研究所就“苏联解体主要原因”进行的民意调查表明：有44%的被调查者认为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应对苏联解体承担主要责任；而认为是“苏联社会经济危机”所致的人只占17.2%，认为是“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危机”所致的人只占11.2%。

俄罗斯“社会舆论基金会”2001年、2004年两次就戈尔巴乔夫评价进行了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赞成“戈尔巴乔夫的执政对人民造成更大的危害”的人分别占56%和51%，认为“他对人民带来更多利益”的人仅仅占14%和11%[9]。如果认为民意调查仅仅是部分群众，那么1996年戈尔巴乔夫竞选俄罗斯总统时，较之他第一次当选总统时高达59.2%的得票率，仅仅获得0.58%的赞成票，这可是全民投票！俄罗斯民众对戈尔巴乔夫的评价有力地驳斥了那种竭力为戈尔巴乔夫对苏联解体责任开脱的观点。

戈尔巴乔夫“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总路线造成了苏联社会的混乱。甚至连美国前国务卿也指出戈尔巴乔夫的错误在于，他给苏联公民政治自由先于向市场过渡的完成。这就需要我们警惕“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戈尔巴乔夫削弱乃至放弃了共产党的领导。他在修改苏联宪法时，“废除了关于作为政体核心的苏共的领导作用的宪法第六条；实行多党制原则”。这不仅意味着削弱了苏共的领导，而且削弱了国家政权。因为“苏共本身也是苏联国家管理机构的基础”。在经济方面，戈尔巴乔夫深受新自由主义影响。正如俄罗斯新版历史教学参考书指出，戈尔巴乔夫没有连续性的、经过深思熟虑的经济政策，不但没有实现社会经济的加速发展，反而导致生产下降、国民生活水平降低以及群众对党的领导人的不满；他全盘否定苏联历史和苏共领导人，导致历史虚无主义泛滥和人民思想的混乱，社会失去了精神的支柱……

当然，强调戈尔巴乔夫等人负有的主要责任，并不意味着可以忽略或者弱化旧苏联计划体制对苏联解体的深层次影响。这也是今天我们需要解放思想，进一步改革旧体制的认识前提。我们强调的是，吸收苏联解体教训最为主要的是：必须处理好“改革、稳定、发展”三者之间的关系，对其中任何一个方面的削弱，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

[1] 〔美〕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大失控与大混乱》，潘嘉玢、刘瑞祥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第45、67、68等页。

[2] 李兴耕等编《前车之鉴：俄罗斯关于苏联剧变问题的各种观点综述》，人民出版社，2003，第162～163页。

[3] 陆南泉等主编《苏联真相》，新华出版社，2010，第14页。

[4]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莫斯科，1990，第83页。

[5]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莫斯科，1990，第2、29页。

[6] 〔俄〕亚·维·菲利波夫：《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莫斯科，2007，第359～360页。

[7]〔俄〕鲁·皮霍亚：《苏联为什么解体：20世纪的俄罗斯》，莫斯科，2002，第121页。

[8]〔俄〕1990年3月16日《消息报》。

[9]〔俄〕亚·维·菲利波夫：《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莫斯科，2007，第364页。

今天俄罗斯人如何看待历史

刘淑春 [1]

自2010年7月19日起，俄罗斯第五电视频道每周一至周五晚9点开播“时代法庭”节目。这是一档模仿法庭辩论的政治谈话类节目。每期节目的首席法官由当红俄罗斯电视节目主持人、记者尼古拉·斯瓦尼泽 [2] 担任，辩护人和公诉人分别由历史学家、作家、电视主持人列昂尼德·姆列钦 [3] 和政治学家谢尔盖·库尔根尼扬 [4] 担任（两者的角色根据辩论主题互换）。一些著名的政治家、学者、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及后代被邀请到现场作为“证人”，如亚·鲁茨科伊、列·克拉夫丘克、斯·舒什科维奇、叶·亚辛、罗·梅德韦杰夫等知名人物都曾到场作证。每次辩论之后，演播厅现场“证人”和观众对辩护人和公诉人的观点投票表决，与此同时，电视机前的场外观众可以通过电话和网络参与投票 [5] 。这档节目开播以来，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今俄罗斯人对待祖国历史尤其是苏联历史的态度，值得关注。

一 节目的背景和意图

第五频道一直秉承自由主义思想，所办的栏目大多关注政治历史。此前，第五频道曾播放由尼古拉·斯瓦尼泽主持的“思想自由”节目，正是这套节目的原班人马设计制作了“时代法庭”节目。制作方开播“时代法庭”节目的意图很清楚，就是要让普通观众接受近20年来俄罗斯史学界关于俄罗斯历史的主流观点。用姆列钦的话说，俄罗斯的“现实史学”对国家历史的认识已达到了一定水平，“但这些新的理论仍很难被接受”。“人们的头脑非常混乱”，因为“在苏联时期他们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世界观体系。世界观体系的消失的确很难。这里的罪过不在人们，因为要理解这一切需要做大量的工作” [6] 。姆列钦这番道白的潜台词被一些网民点破，这就是“对俄罗斯20世纪的历史进行清算”，“对共产主义制度进行审判”。名为“visionarys”的博主在

2010年8月14日的博客中写道："在一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脑海里早就酝酿着对斯大林、共产党人、布尔什维克进行审判了……□对共产主义审判的现实法庭一直没有开庭，于是自由主义的宣传家们纯粹从道德立场评价历史事件的不懈激情便采取了作秀这种形式。"[7] "Совшкола"门户网站分析员撰文指出，显而易见，"时代法庭"是经过策划的，"这将是自由主义对俄国历史进行的一场审判"。该文还认为："正因如此，节目邀请尼古拉·斯瓦尼泽和列昂尼德·姆列钦这样的大腕来进行这次'历史审判'。为了使这个宏大的自由主义行动显得更加重要和体面，俄罗斯著名政治学家谢尔盖·库尔根尼扬被邀请来作为姆列钦（而实际上也是斯瓦尼泽）的对手。可是，自由派的失误就出自于此。"[8]

"时代法庭"节目开播以来引起了评论家和电视观众的不同评价，因此节目本身越来越受到社会关注。不同年龄的人都积极参与投票。总体而言，在节目现场投票时，坚持自由民主主义价值观的姆列钦往往获胜（有评论说，这是因为来到演播厅做节目的大多数人是为赚钱而来，拿了人家的钱，就要看主持人和辩护方的脸色投票），而互联网和电话投票的结果却与之相反，大多数赞成票（72%~97%）投给坚决捍卫亲苏（国家）立场的库尔根尼扬[9]。对此，官方媒体保持沉默，但互联网却对这档节目展开热议，库尔根尼扬及其领导的实验创意中心的网站的点击率猛增。而社会学家则证实："节目过程中的投票结果可以认为是真实可信的量尺。"[10]

二 辩论话题和投票结果

"时代法庭"辩论的话题十分广泛。限于篇幅，这里仅对2010年7月19日开播的第一场辩论稍加详细介绍。这场辩论的主题是："1993年十月事件是俄罗斯民主方案的破产还是走出绝境的出路。"据亲临现场的尤·伊梅利亚诺夫介绍，话题首先从这场冲突的原因谈起。作为辩护人的姆列钦认为，当时的俄联邦最高苏维埃是"不复存在的国家"和"不复存在的政治体制"的残余，它"试图阻碍社会的发展"。而公诉人一方的证人、原最高苏维埃代表奥·鲁缅采夫则认为，叶利钦驱散议会的目的就是取消人民政权原则，取消议会对执行权力、对大资本

活动的监督。关于冲突的矛盾焦点，公诉人强调，炮轰议会体现了当局对宪法的态度，当时对叶利钦及其支持者来说，资产阶级宪法的框架已显狭小，在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时就将之丢弃。不仅如此，民主派实际上担心共产党卷土重来。电视节目过程中播放了1993年10月3日夜女演员利娅·阿希扎科娃的镜头，她向军人呼吁："我的朋友们，清醒吧！可怕的东西威胁着我们，共产党人又要来了！"冲突中流血是否可以避免？对这一问题，原叶利钦总统办公厅主任谢尔盖·菲拉托夫确信："谈判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他谴责最高苏维埃代表不让步。而鲁缅采夫答辩道，那些天他与国家的各主要领导人进行了谈判，包括政府的代表。在与政府第一副主席奥列格·柳博夫谈判时，鲁缅采夫问道："奥列格·伊万诺维奇，能否政治解决？"柳博夫显然知道谈话会被别人听到，因此就在纸条上写道："奥列格，政治解决是不可能的！"从重放的鲁·哈斯布拉托夫的电视讲话可以得知，最高苏维埃领导人所有的谈判尝试都被俄联邦政府抵制或者破坏了，叶利钦刚一下达政府令，就切断了最高苏维埃与政府的联系，致使议会领导人失去通过电话进行谈判的机会。公诉人引证A.科尔扎科夫回忆录中的话说："叶利钦及其周围的人用暴力驱散最高苏维埃的计划早在总统指令下达前，甚至在1993年4月举行全民公决前就作出了。而且为了使议会的行动瘫痪，预先就决定使用麻醉烟幕弹，就像后来在杜布罗夫卡剧院（指莫斯科轴承厂剧院人质事件中——笔者注）使用的那种。"对叶利钦政府镇压最高苏维埃行动的正当性，辩论双方各执己见。菲拉托夫声称，他至今都毫不动摇地认为当时就应该这样做。他对向"白宫"开炮进行辩护，确信："这打的是空炮弹……我再说一遍，这是空炮弹！"而时任内务部第一副部长助理的弗拉基米尔·奥夫钦斯基少将推翻了菲拉托夫的说法。他指出，1993年10月5日内务部新闻司领导人播放了当时拍下的45分钟的录像带，议会大楼内几十间办公室留下弹痕，由此他得出结论：当时射进来的是聚能装药穿甲弹，能把东西和人都烧毁。他还驳斥了官方关于死亡人数的说法，认为尸体不是150具，而是比这多得多，新闻司的人都看到了。奥夫钦斯基肯定地说："无论到法院还是到上帝那里，我都可以去作证。"如何评价这一事件的后果？法官斯瓦尼泽确信，总之法律获胜了。"我们得以进行新的选举并产生了杜马。"姆列钦说，现在"我们生活在叶利钦解

散最高苏维埃后所形成的局势之下……在我看来，任何人实际上都不会对此抱怨”。库尔根尼扬讽刺道：“对姆列钦来说，这种局势是正常的。”他补充道，十月事件中获胜的是这一原则：“谁强大，谁就对。现在人们抱怨袭击行动。现在的袭击行动是政治袭击的一部分。而这种政治袭击的最初冲动就是在当时那些日子里形成的。”“这一骇人听闻的法律虚无主义可以在任何时候重演。”[11]

辩论后演播厅内举行投票。有1/3（33%）的现场观众投票支持叶利钦的辩护人姆列钦，认为叶利钦的行动是“摆脱绝境的出路”，有2/3（67%）的观众支持公诉人库尔根尼扬，认为1993年10月炮轰议会的结果使“俄罗斯的民主方案破产”。而场外电视观众通过电话和网络投票的结果与现场投票的结果反差很大。仅有7%的观众赞成叶利钦政府炮轰议会的行动，而93%的观众实际上认为武力镇压苏维埃加速了对民主制的摧毁。由此，尤·伊梅利亚诺夫认为，17年来“通过学校教科书和大众传媒向人们进行意识灌输的那些评价被俄罗斯绝大多数民众否定了。这一投票结果还可视作对在1993年12月通过的俄联邦枪杀宪法的基础上巩固起来的政治制度的谴责”[12]。

为使读者对“时代法庭”节目辩论的主要话题及其投票结果一目了然，笔者特将网站提供的《“时代法庭”：投票结果（按照题目列表）》翻译如下（见表1）。

表1

单位：%

题　　目	答　　案	电视观众投票结果	互联网投票结果	演播厅投票结果
别洛韦日协议	灾祸	91	89	52
	两害相权取其轻	9	11	48
凯撒大帝的作用	国家的挽救者	88	70	84
	共和国的毁灭者	12	30	16
伊戈尔·盖达尔	破坏者	86	75	61
	建设者	14	25	39
集体化	极其必要	78	71	36
	罪恶的、冒险的	22	29	64
1993年10月事件	俄罗斯民主方案的破产	93	82	67
	走出绝境的出路	7	18	33
尼古拉二世	导致垮台的首脑	78	79	34
	称职的执政者	22	21	66
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并入苏联	赢局	83	89	37
	输局	17	11	63
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	未得逞的波拿巴	75	73	28
	斯大林大恐怖的一个普通牺牲者	25	27	72
布尔什维克	挽救了俄国	72	88	29
	葬送了俄国	28	12	71
苏军出兵阿富汗	地缘政治需要	87	90	35
	党内权势者的冒险行为	13	10	65
紧急状态委员会	避免国家瓦解的尝试	93	89	43
	政变	7	11	57
戈尔巴乔夫的反酗酒运动	政治错误	86	81	63
	对民族健康的关心	14	19	37

续表

题　　目	答　　案	电视观众投票结果	互联网投票结果	演播厅投票结果
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	为苏联提供了必要的喘息时间	91	86	44
	打开通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路	9	14	56
彼得大帝的改革	向未来的突破	80	80	78
	通往绝境之路	20	20	22
冷战	有替代选择的方针	86	73	44
	不可避免	14	27	56
本·拉登	大棋局中的一枚棋子	85	93	43
	头号恐怖主义者	15	7	57
勃列日涅夫时代	错失许多机会的时代	91	92	60
	苏联制度濒死时期	9	8	40
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的对外政策	拯救性的	89	72	86
	致命性的	11	28	14
赫鲁晓夫的策略	延发地雷	89	85	47
	挽救措施	11	15	53
安德罗波夫	两手准备的策略	91	75	44
	拧紧螺丝钉	9	25	56
德国统一	背叛行为	91	81	30
	不可避免	9	19	70
托洛茨基	糟糕的脚本	80	86	31
	错失的机会	20	14	69
伊凡·大帝	杰出的政治活动家	87	79	27
	血腥的暴君	13	21	73
苏芬战争	战略上是必要的	90	85	56
	未得逞的扩张	10	15	44
轰炸南斯拉夫	无理的侵略	97	94	83
	维持和平行动的尝试	3	6	17
1941 年的斯大林体制	撑住了	89	89	54
	垮掉了	11	11	46
(戈尔巴乔夫)改革	一场灾难	93	86	46
	走出绝境的出路	7	14	54
世界金融危机	大灾难的前兆	90	89	37
	系统故障	10	11	63

资料来源：http：//sovschola. ru/content/sud – vremeni – itogi – golosovaniya – po – temam。

三 网民的评价

“时代法庭”节目引起网民的关注和热议。在俄文搜索引

擎“Яндекс”上输入“Суд времени”（时代法庭）关键词后，竟显示2900万条相关信息（2010年12月6日）。大体浏览前几页信息，即可得出这样的印象：大多数网民对这档谈话类节目感兴趣；相当一些网民认为，节目主办方为了提高收视率，把库尔根尼扬请来是一大失误，本来节目的初衷是要对俄国历史尤其是苏联历史进行审判，结果事与愿违，由于库尔根尼扬在现场的出色表现，使电视观众大都站在了捍卫苏联历史的立场一边。例如，名为“visionarys”的博主指出：“其实，姆列钦的任务很简单，只要把这些年众所周知的宣传套话说出来并用事实加以证明就可以了，而且节目的表现形式也对他有利。但姆列钦连这么简单的任务都完成得不好，表现得很不自信。而他的对手库尔根尼扬不仅在各个历史问题上具有鲜明的、互为关联且恰当的立场，而且很会辩论，非常专业。他慷慨陈词，充满激情，而且富有逻辑性，意志坚定，在乖张的姆列钦的衬托下，明显占优势。很难理解节目的制作者怎么会出现这样的失误。在几场节目中，姆列钦邀请一些重量级的历史学家作为专家到场，可是这些历史学家并不只想说姆列钦想听的那些话，他们有自己的观点。他们不是为了造势，不想改变立场，竟然不拘礼节地支持库尔根尼扬的立场，结果把姆列钦置于小丑的位置上。甚至在基本事实陈述方面，库尔根尼扬的立场看上去也是完整的、深思熟虑的，无论从逻辑，还是从道德角度说，他都占上风。姆列钦的立场看上去极不稳定，他不过是在一些陈词滥调和口号上兜圈子。他的立场中看不到逻辑。从主持人斯瓦尼泽的评价和现场投票结果来看，节目的目的并不是给库尔根尼扬提供击溃自由主义神话的平台。但为什么结果却恰恰相反，这只能是个谜。我从电视上看不明白。电视观众的投票清楚地表明，自由主义神话宣传了20年，现在正在土崩瓦解，别说没有得到整个国家的支持，甚至没有得到第五频道观众的赞同。”最后这位博主不无讽刺地写道：“我认为，应该为节目的制作者和尼古拉·卡尔洛维□奇·□斯瓦尼泽本人颁发奖章，奖励他们同自由主义的反俄神话进行忘我的斗争。好样的！”[13]

“Совшкола”门户网站分析员文章指出，尽管“时代法庭”节目始终表现出自由主义的鄙夷、恶意和放肆，斯瓦尼泽、姆列钦也总是试

图打断和妨碍对手陈述观点，但库尔根尼扬还是满有信心地在别人的信息舞台上制胜。他通过这个辩论的讲台，不仅成为一个有力的主攻手并胸有成竹地与两位自由派记者大腕对峙，还做得更多。作为公诉人，他把克拉夫丘克和舒什科维奇这两个证人变成了被告，这两个人高兴地、天真地作了准备，满以为感恩的俄罗斯人会为他们摧毁苏联而喝彩，但他们没想到得到的完全不是自己所期待的。他们感到很不自在。更重要的是，20年后的社会能够看到克拉夫丘克和舒什科维奇是如何撒谎、傲慢和无耻。一位分析家看了节目后说："看到他们我就明白了，1991年苏联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另一些精英，而绝不是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克拉夫丘克和舒什科维奇这帮人。如果那时有另一些精英，苏联的解体、可怕的族际冲突、骇人听闻的反社会改革就能避免。"[14]

在网民看来，库尔根尼扬在电视演播厅的辩论，无异于向"姆列钦、斯瓦尼泽以及他们对待历史的自由民主主义方法"的宣战，而且打了一个漂亮仗。有些网民批评库尔根尼扬的辩论"情绪化"，"Совшкола"门户网站分析员文章指出，库尔根尼扬的立场比姆列钦更深刻，因为他知道整个历史充满存在主义与形象主义的意义，所以他比对手更充满激情，也更接近俄国和俄罗斯历史的价值核心[15]。

四 从投票结果得出的几点结论

从表1中可以看出，在28个电视辩论题目中，绝大多数题目直接涉及苏联历史及苏联解体后的20年新俄罗斯历史中的重大事件和人物。而电视观众的投票结果是否完全代表当今所有俄罗斯人的立场，这也有待俄罗斯的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作科学论证。但不管怎么说，观众的投票结果至少从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今天俄罗斯人对祖国历史尤其是对苏联历史的态度和立场，反映了俄罗斯社会思潮的某些动向，我们似可从中得出一些结论。

首先，自由主义史学观点并没有得到大多数俄罗斯人的认同。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官方学者对苏联历史的评价较之苏联时期出现了

180度的大转弯。近20年来，学界和主流媒体已经形成一套新的定论。但从这次观众投票结果可以看出，官方学者的观点并没有被民众接受。比如，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舆论界把沙皇尼古拉二世列入圣人之列，每年在他及其家人被枪决之日都举行祈祷，电视和报纸对他及家人的赞美之词不绝于耳。但仍有78%以上的电视观众和网民并不认为他是“称职的领导人”。不仅如此，从1991年8月起，“布尔什维克毁了俄国”、“十月革命使俄国偏离了人类文明的主干道”等论断时时冲击着人们的头脑。但至今只有28%的电视观众赞成这一论断，而72%的人否定这一说法，认为“布尔什维克是俄国的挽救者”。这些年来，斯大林时期实行的集体化成了列举斯大林“残忍”的主要罪证，但78%的电视观众认为集体化是“极其必要的”，只有22%的观众认为集体化是“罪恶的、冒险的”。“苏德条约”至今一直是一些反斯大林的俄罗斯人尤其是西方反苏、反共人士把斯大林与希特勒相提并论的证据，但91%的观众认为这一条约“为苏联提供了必要的喘息时间”，而否认它“开启了通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道路”。在俄罗斯官方的宣传中赫鲁晓夫被称为撼动苏联制度的“先行者”，斯瓦尼泽、姆列钦在辩论现场还竭力证明赫鲁晓夫在反斯大林化过程中对动摇苏联人们的历史意识方面所作的贡献，但尽管如此，只有11%的观众认为赫鲁晓夫的政策是“挽救的措施”，而89%的人认为是破坏苏联制度的“延发地雷”。在俄罗斯人的意识中一直被灌输这样的思想，即勃列日涅夫时期是苏联制度腐朽的停滞时期，然而只有9%的电视观众赞成这是“苏联制度濒死时期”的说法，91%的电视观众认为这是“错过许多机会的时期”。也就是说，他们表达了这样一种信念，苏联社会的潜力并未耗尽，遗憾的是，这种潜力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苏联解体给苏联各族人民带来巨大灾难，但今天的自由主义历史学家还试图证明加速苏联解体的“别洛韦日协议”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并请来当年与叶利钦一起签订协议的克拉夫丘克和舒什科维奇为其辩护，但公诉人库尔根尼扬把这场辩论变成了“后苏联的纽伦堡”，把这两位仍在世的历史证人变成了被告。结果，库尔根尼扬的立场得到91%的电视观众的支持，甚至现场观众的多数（52%）都不认为这一协议是“两害相权取其轻”。被称为俄罗斯“休克疗法”改革之父的盖达尔不久前去世，俄罗斯官方人士对他的溢美之词铺天盖地，然而，只有14%的电视观众赞成“盖达

尔是建设者”这一评价，而86%的人毫不怀疑地确信“盖达尔是破坏者”。所有这一切不能不说明，自由主义史学家20年苦心经营的所谓新的史学理论并没有得到大多数俄罗斯人的认同。

其次，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仍不放弃自己的信条。观众对“时代法庭”节目的态度十分鲜明，这就是不接受自由主义的历史价值观。对此，自由派感到十分委屈，抱怨“俄罗斯倔犟地不愿意支持他们”，并认为投票结果被人做了手脚。当《俄罗斯报》记者向姆列钦问道：“您的观点在投票中输掉了，您对此有何感受”时，姆列钦回答说：“我感到痛苦。这是在有意捏造历史的人的帮助下做出来的结果。伪造历史使人残废，不仅使人丧失历史知识，而且剥夺了人们比较和思考事实、批判地分析问题的能力。我感到痛苦的是，这些年为改变局面做得太少了。我一直关注学术上发生的一切，那里近些年发生了重大突破。然而，在科学成果、历史知识与社会舆论、大众观念之间仍存在巨大的鸿沟。不可思议的断裂！”[16] 显然，自由派知识分子并不理解人们为什么不接受他们的观点，仍把他们的失败看成在俄罗斯社会转型期间的失意者的怀旧情绪作祟。例如，《莫斯科共青团员报》记者问道：“尽管您非常能言善辩，可是为什么观众在节目中还总是投票反对您而赞成库尔根尼扬呢？”姆列钦回答道，总的来说，能打进电话并表达自己观点的不是青年人，“而是一些对生活不满，对近些年所发生的一切感觉受到委屈，到那个被神话了的、以为是存在的过去寻找支柱并找到支柱的人”。“许多人不是到未来去寻求支柱，而是到过去寻去支柱，这是令人悲哀的。”当然，姆列钦不得不承认，人们对现实的失望也是一个原因。他谈到一个细节：“在录制关于勃列日涅夫一档节目时，大厅里简直炸开锅了，观众开始喊叫起来，说勃列日涅夫时期这样、那样。我看到，喊叫的是青年人，他们是勃列日涅夫逝世后成长起来的。这与今天人民的极度失望有关系。我甚至不知道这种失望会如此强烈。”紧接着，记者想为姆列钦指点迷津，即今天的人们不想再上当受骗了：“您不觉得，问题不仅仅在于多数人的存款化为灰烬，他们靠私有化券什么也没有得到，买不到更多的东西。而是人们感觉他们被欺骗了，对他们来说，未来没有一线光亮——过去的时光再不好，但没有无耻之徒。”姆列钦坚持

认为，俄罗斯社会仍在原地踏步，他甚至把不投他票的人比作愚钝“僵死”的人，更看不到苏联时期在俄罗斯历史中的地位。他断言：“近百年来，我国在各方面都发生了文明的落后，无论如何也未能挣脱这一落后境地。”自由主义史学家的失望和愤懑溢于言表，但姆列钦并不甘心就此罢休，或许出于对自己信仰的忠诚，决心要“苦苦挣扎”。他说：“宁可成为活生生的、有思想的人中的少数，也不落入由一堆僵尸组成的多数。” [17]

再次，抛弃历史的民族是没有未来的。20年来，自由主义文人在抹黑苏联历史、用自己的观点为俄罗斯人洗脑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观众投票结果显示，这种工作的效用不大，社会的大多数对苏联历史仍持肯定态度，用姆列钦的话说：“本质上说，并没有发生与过去的真正告别。” [18] 可以想象，如果是20世纪90年代初电视上播放“时代法庭”这样的节目，姆列钦的观点或许会获胜，因为当时所有的苏联象征物都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俄罗斯似乎与自己的过去告别了。老百姓曾信以为真，以为苏联的过去都错了，只要抛弃了这一切，俄罗斯从此就能走上文明的坦途。但20年过去了，人民发现丢掉的比得到的要珍贵得多，对历史的虚无只能造成对未来的迷茫。俄罗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布坚科对斯大林的体制曾进行过尖锐的批判，但他对俄罗斯社会上刮起的否定苏联历史的思潮十分忧虑。他曾警告说：“烧掉自己历史的人民是不能成为政治上的人民的，因为他们将失去未来，失去所有方位。” [19] 或许受类似警告的提醒，俄罗斯社会近年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历史，大胆表达自己的观点。人们还记得，2008年，“俄罗斯”电视台曾组织了“历史名人”电视评选节目，4600万人参与了评选。最初的评选结果与主办方意图相反，斯大林、列宁名列前三位。在主办方实施某种技术手段后，在最后投票结果中，斯大林还是以第三位当选（莫斯科大公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和彼得·斯托雷平位列第一和第二）。2009年，俄罗斯社会在探讨如何实现新的现代化的时候，“又出现了苏联的甚至斯大林的文艺复兴”（《莫斯科共青团员报》记者语），人们试图在苏联经验中寻找坐标。在此次“时代法庭”电视辩论中，大多数人站在了代表其心声的库尔根尼扬一边，而抛弃了自由主义的代言人姆列钦。原因何在？笔者认为，库

尔根尼扬下面的话道出了原委："我把苏联遗产看成未来的一个因素。我认为，苏联遗产具有巨大的历史价值。苏联遗产中昭示了某种对人类来说极为重要的东西，直到今天都没有失去现实意义。我们的国家如果不以正确的方式重新对待自己的苏联经验，就将寸步难行，而只能滑向深渊。我始终这样认为，早在改革时期就这么说，那时我还是绝对的少数。但现在我得到大多数的支持，而我的对手却不这样认为。恰恰相反，他们更加歇斯底里地否定一切。" [20]

---

[1] 刘淑春，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2] 尼古拉·斯瓦尼泽，1955年生人，1975～1991年间为苏共党员，毕业于莫斯科国立大学历史系，苏联时期在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工作，从1991年起就职于俄罗斯电视台，2005年起成为俄罗斯联邦社会院成员，2009年成为直属总统的"反篡改历史委员会"的成员。斯瓦尼泽近年制作并主持了一系列历史题材的电视节目和电视片，如"镜子"、"细节"、"对比"、"与尼古拉·斯瓦尼泽一起回顾历史"等。他用后现代的解构主义观点分析苏联历史，为其贴上自由主义者通用的标签，如"罪恶的帝国"、"各族人民的监狱"等，被舆论称为持自由主义立场的电视人。

[3] 列昂尼德·姆列钦，1957年生人，毕业于莫斯科国立大学新闻系国际专业，曾做过《新时代》周刊、《消息报》的记者，后在电视台做主持人，制作和主持多部历史题材电视节目和电视片，如政论节目"特别案宗"（Особая папка），出版过系列名人传记，被舆论称为持自由民主主义观点的历史学家、电视人。

[4] 谢尔盖·库尔根尼扬，1949年生人，毕业于莫斯科地质勘探学院地球物理系，在戏剧学校学过戏剧导演，早在苏联时期就从事剧院体制改革实验，创办过集体体制的剧院，创建了"实验创意中心"，并活跃在政治舞台上，曾作为鲁·哈斯布拉托夫议长的顾问经历了1993年10月的炮轰白宫事件，坚持亲苏的爱国主义立场。

[5] Суд времени，Википедия，http：//ru.wikipedia.org/wiki/.

[6] Back in the USSR？http：//www.mk.rusocial/article/2010/10/14/536800-back-in-the-ussr.html.

[7] Суд времени，http：//visionarys.livejournal.com/25339.html.

[8] Суд времени，Сергей Кургинян наносит удар，http：//sovschola.ru/content/.

[9] Итоги голосований на передаче，Суд времени，http：//ru.wikipedia.org/wiki/.

[10] Суд времени，угодил под суд，http：//ru.wikipedia.org/wiki/.

[11] Юрий Емельянов，Народная трагедия стала игрой телевизионных судей，Правда.1-4 октября 2010 года，№.108（29595）.

[12] Юрий Емельянов，Народная трагедия стала игрой телевизионных судей，Правда.1-4 октября 2010 года，№.108（29595）.

[13] Суд времени，http：//visionarys.livejournal.com/25339.html.

[14] Суд времени，Сергей Кургинян наносит удар，http：//sovschola.ru/content/.

[15] Суд времени，Сергей Кургинян наносит удар，http：//sovschola.ru/content/.

[16] Оксана Нараленкова，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попытка.Может ли ток-шоу на темы прошлого научить понимать сегодняшний день？“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Федеральный выпуск，No.5266 （187） от 23 августа 2010 г.

[17] Back in the USSR？Московский Комсомолец，No.25476 от 15 октября 2010 г.

[18] Back in the USSR？Московский Комсомолец，No.25476 от 15 октября 2010 г.

[19] Бутенко А.П.О скрытых формах изменнения социальной природы власти，-М.，2004，сс.129-130.

[20] Back in the USSR？Московский Комсомолец，No.25476 от 15 октября 2010 г.

革命性的创举还是悲剧性的政变？[1]

——俄罗斯学者关于十月革命的争论

刘淑春

2007年是十月革命90周年。这一20世纪的重大历史事件，自其发生之日起就成了俄罗斯政治家、历史学家关注争论的焦点，对这一事件的褒贬评价也随着社会主义的兴衰而变化。本文通过历史的回顾，显示20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苏联史学界先后对斯大林时期形成的关于十月革命的官方看法发起了两次冲击，后一次冲击又与社会上的反共浪潮相呼应，对苏共的瓦解和苏联的解体起了一定的作用。解体后的俄罗斯，攻击和否定十月革命及其领导人、歪曲和篡改苏联历史的思潮甚嚣尘上，但是90年代通过“民主制”下的生活体验，使俄罗斯学者对十月革命的研究又趋于冷静和客观。近10多年来，尽管主流舆论对十月革命的负面宣传对大众尤其是青年人的意识造成混乱，但学者们通过20世纪国家发展历史进程的多领域研究，向人们昭示社会主义的70年是俄罗斯发展最快的时期。社会舆论调查也显示，当代俄罗斯人对十月革命持肯定态度的远多于持否定态度的。本文还介绍了俄罗斯学者就十月革命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十月革命使俄国误入歧途，还是挽救了俄国；苏联的解体是注定的，还是可以避免的；十月革命是世界历史中的最大悲剧，还是具有深远影响的历史事件等问题的争论情况。2007年11月7日迎来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90周年。尽管那一天作为国家法定假日在今天的俄罗斯已被取消，但十月革命的影响并未在人们的记忆中消失。据悉，在俄罗斯乃至独联体国家，群众性的纪念活动和学者的学术会议仍将举行，不仅如此，在世界范围内还将有更多的人以各种方式纪念十月革命。今天，对于一切坚持社会主义信念、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和政党而言，正如俄共中央近期在其相关的决议中所说：“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90周年是深刻思考所走过的道路的极好机会。”[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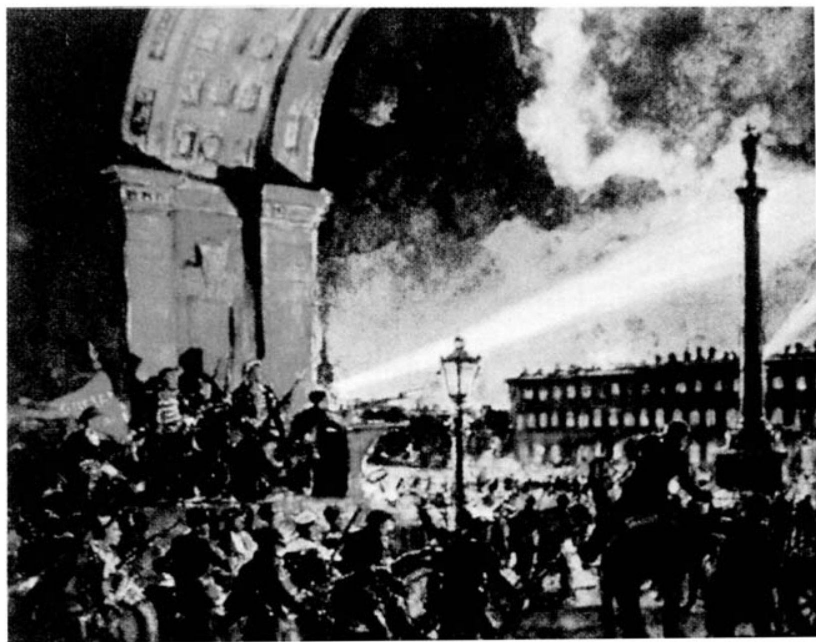


俄罗斯人怀念十月革命的创始人列宁

90年前的11月7日，即俄历10月25日，列宁领导俄国的工人、农民和士兵举行武装起义，推翻了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建立起苏维埃政权，开创了社会主义历史的新纪元。自那时起，世界上无论是赞颂俄国十月革命的人，还是诅咒它的人，都不得不承认它对人类发展史产生的深远影响。它不仅表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上相继出现了一批社会主义国家，而且还表现在当十月革命的故乡苏联已经解体，镰刀斧头红旗已从克里姆林宫上空降落下来之后，仍有人在坚持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仍有人在探讨它的影响和启示。从这个意义上讲，俄国十月革命是不朽的。

然而，众所周知，苏联解体前，在戈尔巴乔夫倡导“新思维”、“公开性”的政治气候下，苏联国内曾围绕“十月革命是20世纪的重大历史事件还是悲剧性的错误”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这场争论与苏联的解体不无关系。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关于十月革命对俄国和世界的历史作用和地位问题的争论至今没有停息。有的人把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归咎于十月革命，攻击它是尔后一切形式社会主义革命的“原罪”，甚至有人断言20世纪的社会主义已经“失败”，共产主义已经“终结”。因

此，今天了解这一争论的焦点和各派观点，对于我们深刻地认识十月革命的意义，客观地评价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正确总结苏东剧变的原因和教训，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攻克冬宫



十月革命的战斗场面

一 关于十月革命争论的背景和经过

十月革命之初，试图复辟沙皇制度、拥护君主立宪制的俄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极力反对十月革命。他们凭着直觉判断，十月革命作为一个新生制度的催生婆，将给人类带来一种不同于以往任何时代的全新的社会制度。因此，对十月革命的爆发，他们先是目瞪口呆，继而又企图将新生政权扼杀在摇篮之中；主张在俄国建立西方民主制度的小资产阶级，也以俄国不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为借口，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横加指责；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在要不要举行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问题上，也存在过争论。起义胜利后，在俄国走什么道路，要不要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上，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之间也产生过尖锐的分歧意见。

斯大林时期，苏联理论界逐渐形成了一套关于十月革命的正统观点。这些观点在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时期受到了第一次冲击，冲击波的总体倾向是肯定十月革命本身，而否定斯大林在其中所起的作

用。1967年十月革命50周年时，苏联史学界出现了研究十月革命的高潮。苏联科学院历史分部成立了由伊·伊·明茨院士领导的专门学术委员会，负责规划和协调十月革命诸多问题的研究。仅这一年，苏联就出版了2000多种关于十月革命的论文集和专著。当时的口号是“回到列宁”，即恢复列宁关于十月革命的评价，抛弃斯大林的解释。

1987年十月革命70周年时，在戈尔巴乔夫推行“新思维”、实行“公开性”的背景下，苏联理论界和史学界再次对十月革命的传统观点进行了重新评价，这可视为第二次冲击。帕·瓦·沃洛布耶夫通信院士（后为院士，于1997年逝世）接替了伊·伊·明茨的职务，主管苏联科学院“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史”（后为俄罗斯科学院“俄国革命史”）学术委员会。他首先主持拟定了新的研究规划，从不同侧面重新评价十月革命，并陆续出版了专题论文集。同时，他再次提出“回到列宁”的口号，呼吁理论界坚持历史主义原则，摒弃把十月革命研究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做法。然而，这次新一轮争论的本身就有着极其深刻的政治背景，理论争论本身其实是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改革的前奏。



苏联人民为纪念十月革命集会游行

在理论界的争论日趋激烈之时，社会上一场以攻击十月革命以及

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为目标的政治斗争也悄然打响。加夫里尔·波波夫开了第一枪。1989年，他在《科学与生活》杂志第7期上以《斯大林所遵循的纲领》为题发表文章，最先对十月革命的历史必然性提出挑战，指出“十月革命不是合乎规律的历史事件，而是布尔什维克冒险主义的结果”。步其后尘，一些政论家、作家、新闻记者、诗人等也纷纷把20世纪20年代西方和流亡国外的沙皇俄国政治家诽谤谩骂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陈词滥调再度祭出，在刊物和报纸上制造舆论，名曰重新评价，实则否定十月革命。苏联当时的《星火》、《莫斯科新闻》、《莫斯科共青团员》、《消息报》、《共青团真理报》等报刊在这场论战中充当了急先锋。而这场论战的总导演、总指挥则是被今天的俄罗斯左翼学者称之为“国家政变和资本主义复辟总思想家”的亚·□尼·□雅科夫列夫。作为当时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总统顾问，他利用大众传媒，发起了“对社会主义的全线进攻”，为1991年的苏共垮台“进行了舆论准备”[3]。一时间，社会舆论对十月革命和列宁的攻击和斥责如排山倒海，盖过了传统的教科书观点，谩骂和人身攻击之声也不绝于耳。面对社会上这种否定十月革命和列宁的思潮，连主张用“客观态度”去评析十月革命的帕·瓦·沃洛布耶夫也不得不大声疾呼：一切有良心有责任感的历史学家都站出来，依据历史事实，“捍卫十月革命”，“捍卫列宁”[4]。于是，一场维护和反对十月革命的激烈论战在苏联展开。这场论战一直持续到1991年底苏联解体而告终。

1991年11月6日，俄罗斯《文学报》以“1917年10月发生了什么？”为题发表访谈录，叶利钦总统的政治顾问、民主制的鼓吹者C.斯坦克维奇把十月革命说成“俄国历史上骤然发生的政变，其结果是把俄国推向苦难的边缘”，声称只是到了“八月事变”后，俄国“才开始走上自然发展的道路”。历史档案学院院长尤·阿法纳西耶夫也说，十月革命“对俄国以至整个世界的运动都产生了极为消极的影响”。同时，诗人B.科斯季科夫、作家B.索洛乌欣、B.瓦西里耶夫、C.扎雷金、B.阿斯塔菲耶夫等纷纷利用《星火》、《消息报》、《祖国》等报刊发表作品，以文学形式对苏联历史进行否定。此外，社会上还出现了一批以攻击十月革命、列宁和社会主义为主题的书籍，如哲学博士M.卡

普斯京的《空想的终结：过去与未来的社会主义》，德·安·沃尔科戈诺夫的关于斯大林、列宁、托洛茨基的“三部曲”，A.拉特舍夫的诗集《秘密公开的列宁》等。

随着苏联的解体，在1992～1995年间，俄罗斯舆论界关于十月革命问题的评价基本上呈一边倒趋势。如果说苏联解体前夕攻击十月革命的浪潮虽来势凶猛，但维护十月革命的呼声也水涨船高的话，那么在苏联解体后的几年里，维护十月革命的呼声则相对微弱了，肯定十月革命的纤纤细语几乎为公开反对十月革命、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高声叫喊所淹没。1994年11月5日，俄罗斯官方组织召开了一次以“1917年的10月和布尔什维克在俄国的实验”为主题的“科学实践会议”。这次会议几乎是一次对十月革命、列宁和苏共进行清算和声讨的大会。会上，帕·瓦·沃洛布耶夫等人要求对十月革命持科学和客观态度的呼声几乎被雅科夫列夫、沃尔科戈诺夫（时任叶利钦的军事顾问）和谢·亚·菲拉托夫（时任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人对十月革命、列宁和苏共的攻击和谩骂声所淹没[5]。



向十月革命致敬

一年之后，雅科夫列夫在11月29日的《俄罗斯消息报》上发表文章，公然要求把布尔什维克送上法庭，其罪名为布尔什维克“是俄国法西斯的变种”，认为他们“在人民面前无法脱逃1917年实行非法暴力政变的责任”，布尔什维克“发动了自相残杀的国内战争”，造成1300万人的损失，因此“应当受到审判” [6] 。

尽管如此，在经历了苏联解体后的生活体验，尝试了资本主义俄国的“民主”和“自由”之后，人们对十月革命的价值又有了新的认识。对比前后两种社会制度的优劣，他们对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功与过、是与非又进行了新一轮的认真思考。从1996年起，重新评价十月革命的专题文章又开始见诸报端。

1997年十月革命80周年到来之际，俄罗斯关于十月革命的讨论再度活跃起来，各种刊物发表了大量纪念性和研究性的文章。人们关于十月革命的研究趋于冷静，较之前几年少了一些感情色彩，当然持不同政治立场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那些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学者在有关杂志上发表经集体讨论的提纲或署名文章，赞扬十月革命是20世纪最伟大的历史事件，对苏联70年社会主义的成就与失误进行了总结，同时对社会上流行的种种攻击十月革命的言论一一予以驳斥 [7] 。一些史学家引证了大量史料，以事实说明十月革命的爆发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布尔什维克赢得政权在当时也是不可避免的。而右翼势力则坚持认为十月革命所带来的是民族灾难，散布“革命已达极限”，如再搞革命，势必会把俄罗斯重新引向国内战争。前一年，俄罗斯政府以国家政治生活非意识形态化和稳定政局为名，把11月7日定为“和睦和解日”，以避免左翼党派作出不利于政府的举动。一年后，俄政府又把这一年定为“和睦和解年”。1997年11月7日，叶利钦发表电视讲话，称当天是“日历中最红的一天，这一天在80年前载入了世界史册”，“革命带来了灾难和不幸”，“燃起了社会内部冲突，使俄罗斯人在国内战争中互相残杀”，使苏联“长期脱离国际社会，成了其他国家和人民害怕的怪物”。叶利钦在这里所说的“最红的一天”，已经不是对革命的赞美，而是对革命的声讨。在他看来，11月7日首先是“历史的教训”。他呼吁俄罗斯人实现“和睦和解”，并宣布他已签署命令，要建立一座国内战争牺牲者纪念碑，既纪念红军，也纪念白军。



俄共主席久加诺夫（右）与民众一起纪念十月革命

新世纪以来，俄罗斯的官方很少直接评价十月革命，但在普京总统的干预下，歪曲和篡改苏联历史的倾向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十月革命领导人列宁的墓地仍保留在莫斯科的红场供人瞻仰，苏联时期的国歌、军旗等仍作为今天俄罗斯的象征物保留下来。各派政治力量开始冷静反思20世纪90年代盲目模仿西方的做法，思考选择适合俄国国情的国家发展道路。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对未来的参照，一些不带政治色彩的关于20世纪国家发展历史的经济学、社会学、统计学等领域的实证性研究成果相继问世，读者从这些著作中自然能得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选择从历史上看是正确的，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起了推动作用。例如，俄罗斯联邦国家统计署统计科学研究所所长B.M.西姆乔尔教授推出的《俄国经济发展百年：历史的数列》[8]一书，虽然没有一句为十月革命进行辩护的话，但读者从书中列举的俄国在20世纪不同年代的经济统计数据可以看出，这一世纪的头两个10年和最后一个10年的发展指标远远逊色于苏联时期的70年。

但必须看到，在今天的俄罗斯，尽管大多数学者主张以严肃的科学态度来研究十月革命及苏联的历史，但近20年来主流舆论对十月革命的负面宣传已经强加给大众意识，这种“洗脑”攻势使很多人尤其是

年轻人对十月革命历史的认识是混乱的。正如俄罗斯著名的历史学家罗伊·麦德维杰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所抱怨的那样：“最近15年在俄罗斯，科学和伪科学之间一直进行着论战，伪学者和各种伪造者占据很大的优势。从1990年开始，国内市场上出版了几百本历史作品，它们或者是建立在伪造的基础上，或者是建立在对历史的歪曲上。没有办法，都被商业化了。”“现在教师无所适从，因为教材众多，而且教材的编写缺乏应有的责任，出版也无人监管。一方面是不受监控了，但另一方面，人只要有了钱，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写书、出书。这种事在美国、德国、英国都不会发生，那里出版这种东西的作者是要以诽谤罪送交法庭的。可我国史学界现在简直是无法无天。”[9] 正是在这种历史被颠倒的情况下，俄罗斯的一些学者不得不对十月革命做一些艰难的正本清源的学术研究工作，以历史事实批驳种种歪曲十月革命的论调。俄罗斯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一些研究员就在做这样的工作，如该所研究员亚历山大·舒宾在其《关于苏维埃国家的10个荒诞说法》[10] 一书中，就以史料反驳所谓“列宁是德国的间谍”、“十月革命是阴谋家的政变”等论调。同时，俄罗斯的左翼政党和学术团体仍坚持每年在十月革命周年纪念期间举行纪念活动和学术会议，并把这些活动与当前的动员群众的工作结合起来，把宣传十月革命的思想和遗产与探索今天的俄罗斯发展道路联系起来。2007年4月，俄共中央主席团专门发表了《关于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90周年的决议》，并对开展一系列纪念活动作了部署[11]。诚然，所有这些工作并非能很快扭转主流社会对十月革命问题上的舆论导向。

尽管如此，从社会的角度说，十月革命并没有被今天的俄罗斯人所忘却。在1990～2006年间，全俄舆论研究中心以“俄罗斯人论十月革命”为题分别进行了3次问卷调查，中心设计的问卷给出了5个选择答案（见表1）。

表1 “俄罗斯人论十月革命”问卷调查

单位：%

答案	1990年	1997年	2002年
十月革命推动了俄国各族人民社会和经济的发展	26	26	33
十月革命开辟了俄国各族人民历史的新纪元	23	23	27
十月革命阻碍了各族人民的发展	18	19	18
十月革命对各族人民是一场灾难	12	15	9
难以回答	23	17	13

资料来源：Россияне об октябрь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http：//wciom. ru/ 05. 11. 2002。

从以上的调查结果来看，十几年来，俄罗斯人对十月革命的看法前后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但持否定看法和难以回答的人的比例呈下降趋势，而持肯定看法的人的比例呈上升趋势。总体而言，持肯定看法的人远远多于持否定看法的人。

二 关于十月革命争论的几个主要问题

1.十月革命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是一场社会革命还是少数人的政变？

对于苏联时期的史学界来说，十月革命是历史的必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对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立论是无可争议的。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末起，苏联的某些政论家、新闻记者开始对十月革命发难，他们重弹西方自由派和俄国某些政治流亡者的老调，从根本上否认十月革命。苏联解体后，以雅科夫列夫、沃尔科戈诺夫、菲拉托夫为代表的少数俄罗斯右翼政治家则更是公开谴责十月革命。他们认为，十月革命是各种偶然事件巧合的结果，是历史上的反常现象，是以贪权的列宁为首的一小撮职业革命家搞的阴谋，是布尔什维克搞的政变。在他们看来，20世纪初俄国的社会矛盾和经济矛盾异常尖锐，但俄罗斯帝国还不是不可救药。布尔什维克利用尖锐的矛盾和复杂的形势实现了“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结果给民族带来了灾难 [12] 。

对上述这种无视历史事实、否认革命社会性的论调，许多俄罗斯历史学家在当时就据理力争。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帕·瓦·沃洛布耶夫和尤·亚·波利亚科夫等人都认为，十月革命是20世纪初俄国客观历史发

展的必然产物，是社会各种矛盾激化的结果。十月革命的爆发是人民群众对和平、土地和面包的渴求在政治上的反映，“全部政权归苏维埃”是人民作出的选择；布尔什维克党顺应历史潮流，不失时机地领导人民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工农政权，这是得到人民的广泛支持的。因此，十月革命是一场必不可免的伟大的人民革命，是反对资产阶级的社会革命，而不是少数职业革命家搞的“阴谋”或“政变” [13] 。

俄罗斯历史学副博士瓦列里·布舒耶夫在《十月》一文中认为，十月革命是20世纪初“俄国革命发展的一个阶段”，绝不像今天的诽谤者所说的那样，是由于“一小撮叛乱分子的阴谋”引起的动荡。如果说这仅是“一小撮布尔什维克阴谋分子”的行为，那他们的活动舞台也只能是彼得格勒。但正因为布尔什维克的纲领口号迎合了千百万群众内心深处的渴望，才使得他们能在极其短暂的时间里将苏维埃政权推广到广袤的国土上 [14] 。布舒耶夫分析了二月革命转向十月革命的复杂因素，并引用1917年俄国一系列事件的参与者——立宪民主党人首领、二月革命后成立的临时政府的外交部长帕·尼·米留科夫——的话，来证明十月革命发生的历史必然性。米留科夫在1927年巴黎出版的《转折中的俄国。俄国革命的布尔什维克时期》一书中说：“‘共产主义’革命不是一场新的、完结的革命，它只是俄国革命长期的和复杂的进程中的一个阶段……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仅是延长了俄国革命的总进程。” [15]

俄罗斯左翼学者B.萨普雷金在俄罗斯《共产党人》杂志2005年第6期上发表题为《伟大的十月革命并非全世界历史和文化中的暂时现象》一文。他在文章中阐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革命的定义，进而从理论上得出结论：“1917年伟大的十月革命作为具体的历史现象，它是在完全确定的政治、社会经济和社会文化的特定条件下诞生的，这是革命历史发展和社会矛盾长期运动的不可避免的、合乎规律的和客观的结果。” [16] 同时，他还用当时的一些历史见证人，如反对革命的C.A.阿斯科尔多夫、C.A.布尔加科夫、C.Л.弗兰克等人的自述来论证自己的观点。这些人在关于俄国革命的文集中写道：“俄国革命，毫无疑问是先前的各种条件酝酿而成的。”“革命——这不仅仅是社会主义的变革，它的意义更加深刻，因为革命是由许多世纪以来人

民与民族文化疏远的进程决定的，这种疏远尤其伴有阶级的敌意。”[17] 萨普雷金还提到，俄国白卫军首领A.И.邓尼金将军在其5卷本的《俄国内乱史札记（1921～1926）》中直接描述了十月革命的必然性及白匪军叛乱失败的必然性：白匪军首领们是一些没有人民支持的领袖，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人民群众的抵抗和协同行动如此有力量，因此，这不是一小撮布尔什维克，而是陛下的臣民拿起了棍棒，开始行使自己的历史权力[18]。由此，萨普雷金认为："这才是最重要的——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的证据，它证明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必然的和最公正的！"[19]

俄共在2007年4月的决议中指出，十月革命是由俄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的进程本身酝酿而成的。20世纪初，帝国主义之间矛盾的尖锐化把俄国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世界革命运动的中心向俄国转移。俄国作为一个中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变成了经济、政治、社会、民族及其他对抗性社会矛盾的聚集地，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这些矛盾激化到极点。俄国陷入民族灾难的境地。摆脱灾难的出路就是实行革命变革。革命变革的必然性既来源于穷途末路的沙皇制度的束手无策，也来源于资产阶级政府没有能力解决迫在眉睫的问题。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使临时政府得以上台执政，但它未能阻止俄国继续参战，没有消除资本对劳动的剥削，没有解决农民问题。这个政府把俄国引上了加速瓦解的道路。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工人、农民、士兵、知识分子、平民跟随布尔什维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因此，伟大的十月革命是自1917年2月开始执政的资产阶级—地主同盟彻底垮台的合乎逻辑的结果[20]。

2.十月革命是使俄国误入歧途，还是挽救了俄国？

否定十月革命的人提出的一个重要理由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已经处于经济发展的上升阶段，如果沿着资本主义的模式发展下去，俄国会跻身于繁荣的资本主义国家之列。而十月革命中断了俄国向工业化民主社会发展的进程，使俄国误入歧途，偏离了人类文明的主干道。

帕·瓦·沃洛布耶夫等学者驳斥了上述观点。他们认为，俄国资本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确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俄国并没有完成工业化这一任务，俄国仍是个落后的农业国，农业尚未进行资本主义的改造，甚至残存着农奴制。战争期间，俄国资本主义承受不了战争的重负，陷入全面的危机，整个国民经济体系土崩瓦解。因此，1917年俄国已经面临全国性灾难，俄国资本主义已是穷途末路。二月革命后，历史曾给俄国资产阶级提供了一次用和平渐进的改良主义的方式加速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对社会进行民主主义改造的机会，但是俄国资产阶级由于自身的软弱而没能抓住这次机会。因此，在国家处于军事、经济和政治崩溃、政权完全丧失统治能力的情况下，十月革命就是保护民族生存的唯一机会。在俄国革命形势已经成熟的情况下，列宁不拘泥于历史发展的一般顺序，提出先用革命的手段推翻不能保证国家进步的资产阶级、建立工农政权，然后在这一政权的基础上发展生产力、向社会主义逐步过渡的构想，并且付诸实施，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这不仅挽救了俄国，而且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为俄国指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欧的通往现代工业文明的道路。

如今仍有人不考虑十月革命是发生在俄国被战争拖到崩溃边缘的1917年，仅仅拿1913年即战争爆发前俄国的经济发展指标来说明俄国继续发展下去的可能性，这显然是不顾历史事实的一相情愿。对此，在改革的最初年代，被推崇为替代马列主义理论的一些反共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却说了一些真话，告诉人们是谁破坏了祖国，是谁创造了新的生活。如H.A.别尔佳耶夫在《俄国共产主义的起源和意义》一书中说："俄罗斯帝国早已开始腐败，在革命之前旧制度就完全烂掉了……共产主义对俄罗斯国家创下了无可争议的功绩。俄国面临全面无政府状态、在无政府状态中崩溃的威胁。但这一崩溃被共产党的专政阻止了，共产党的专政找到了让人民情愿顺从的口号。"[21] 俄国20世纪20年代的路标转换派的一些知识分子也肯定了布尔什维克革命对保全俄罗斯国家的统一所作的贡献。如A.B.博布里谢夫-普希金曾指出："从苏维埃政权保存了俄国那一刻起，它就被证明是合理的，不论个别反对苏维埃的指责多么有力。""如果没有布尔什维克，俄国将被抛向史前阶段，陷入无政府和强盗横行的泥潭。"[22]

诚然，十月革命的意义不仅仅是挽救俄国，更重要的是创造一个新的制度，使俄国在这个新的制度下快速发展。正如俄共决议所指出的那样，十月革命开辟了俄国历史的新时代。国家从血腥的世界杀戮中挣脱出来，“顺便地”解决了早已成熟的民主主义改造的问题，并赋予了俄国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宪法。联合的工人、农民和士兵代表苏维埃的建立，巩固了绝大多数人民手中的政权，一切用来巩固等级制和财产不平等的特权都被废除，企业中确立了工人监督，农民拥有土地的世世代代的梦想也实现了。苏维埃政权取消了任何宗教和民族方面的限制，为苏维埃联邦奠定了基础。俄共决议认为，十月革命在道德和人道主义方面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它打破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主要公设——私有制神圣不可侵犯并永世长存，推翻了以发财致富为目标的任何辩护，并把公正看做社会制度的最重要原则，把人类向前推进到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抽象说教所无法比拟的地步[23]。

生产关系的变革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历史学家B.B.阿列克谢耶夫在其《俄罗斯的革命与现代化：同一抑或对立？》一文中说，苏联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末期（即1937年），工业生产水平超过了1913年的7.2倍。如果说革命前的俄国的工业总产量在世界上占第五位，其在世界工业生产中的比重是2.6%，那么苏联到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末期在工业总产量上已经位居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它在全世界工业中的比重达到了13.7%。1913年工业占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的比重是42.1%，而1937年则提高到77.4%[24]。工业化彻底改变了城乡人口的对比关系，城市人口在总人口的比例从1926年的18%增加到1938年初的30%，即这些年里，城市吸收了国家全部自然增长的人口（2350万人）[25]。

统计学家B.M.西姆乔尔教授在其刚刚问世的《俄国经济发展百年：历史的数列》[26]一书中，根据俄国官方统计数据，对百年经济发展的各项指标进行了比较研究。从他的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实际面积相同的国土上，苏联的人口比俄罗斯帝国最多时的人口增加70%，然而就一些基本经济发展指标来说，苏联时期比帝俄时期却增加了几十倍，甚至上百倍。比如，石油开采量增长了70倍，钢铁产量增长了51.9倍，木材运出量增长了32.2倍，粮食和肉类产量增长了4.2

倍，货物运输量增长了165.5倍，等等。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国民财富的实物总量增长了79倍，相比而言，美国同期的增长不超过16倍。现在有人喜欢说，沙皇俄国时期的经济发展最有活力。事实上，在20世纪第一个10年，国民财富的增长率为11.7%，即年均增长率为1.1%，但苏联时期的第一个和平年代，人民正在医治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造成的创伤，但财富还是增长了63.5%。在40年代，即苏联人民抵抗德国纳粹和战后的恢复时期，国民财富的增长率降到37.2%，但仍比沙皇时代最好的时期高出2倍多。50年代是世界公认的苏联奇迹时期，国民财富增长率达到159.7%。即使在所谓的“停滞”时期，苏联人民仍使国民财富增加了90%。只是90年代后，年均国民财富减少了4.8%，成为20世纪第一个国民财富糟蹋时期，根本无法与苏联时代相比[27]。

2006年11月，B.B.阿列克谢耶夫在中俄思想家论坛上谈到了俄国20世纪百年现代化历程。他在发言中尽管对苏维埃政权进行现代化的方式颇有微词，但他不得不承认，正是苏联时期使俄国走上了现代化之路，而90年代的“改革”却使俄国走上了“去工业化”之路。他指出，直到20世纪初俄国仍是一个农业国，以后俄国经历了3个阶段的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阶段（1905年至1917年9月），社会主义阶段（1917年10月至1990年），自由主义阶段（1991年到现在）。1905年革命未能开启国家通向全面现代化之路，仅局限于政治制度的某种自由化。1917年二月革命推翻了专制制度，但是临时政府在通向新的工业社会的道路上没来得及或没能采取任何实际的步骤。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十月革命，一方面推翻了俄国已经产生的资产阶级关系，进而破坏了现代化过渡的自然发展进程；另一方面消灭了阻碍这一过渡的封建残余。斯大林依靠自身的力量展开了大规模的苏联工业化，开始了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革命性转变，从而使俄国在发展阶段上落后于工业发达国家的局面以革命的方式得到了改变。90年代以来的第三阶段革命具有反社会主义和反现代化的特点。这样，20世纪俄国的历史走了一个圈，实际上发生了第二次社会经济制度的反向变化，取代苏联计划经济的市场经济是向带有反社会主义的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回归。国家步入了去工业化之路，据官方资料显示，俄国丧失

了一半的工业潜力[28]。

3.十月革命的产儿——苏联的解体——是注定的，还是可以避免的？

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之初，有些人便以此断言十月革命搞糟了，把苏联的解体归咎于十月革命，认为苏联的解体是历史注定的、不可避免的，从而断言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是站不住脚的。

应当看到，这种论调实际上是为把俄国从社会主义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的借口，在当时狂热推崇西方模式的背景下，似乎可以蒙蔽一些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通过十几年“民主制”生活的体验，已经有了辨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孰优孰劣的社会经验，因此对苏联解体原因的分析也越来越客观和冷静。于是，那种无视客观现实，主观臆断地把苏联的解体归咎于十月革命的说法越来越没有市场。如今学者们对苏联解体原因的分析普遍集中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时期各种因素所起的作用上。莫斯科大学历史系教授Л.С.列昂诺娃指出，在俄罗斯90年代的史学研究中，大都把苏联的解体与民族问题联系起来，然而通过进一步思索，大家认为民族动因之所以可能在政治领域中被利用，是因为国内还有其他激进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现象与之配合。她认为，这里包括民族因素、社会经济因素、政治因素、缺乏科学依据的民族问题理论、领导人的政治立场和西方的压力等。她强调，苏联解体与苏共在社会政治体制中地位的丧失有关，因为民族问题的增长是与苏共在国家中影响力的削弱同时发生的。苏共本来是苏联政治体制的核心，对整个国家实行横向和纵向的领导，戈尔巴乔夫没有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中建立起一套稳固的、把国家凝聚在一起的体系，就把苏共赶出了政治舞台。党组织的瓦解意味着苏联作为一个国家的解体[29]。

列昂诺娃的这一观点在2005年1～2月间由俄罗斯科学院社会综合研究所进行的题为“俄罗斯人20年后看改革”的社会调查[30]中得到了印证。例如，有近一半（46%）的被调查者认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苏联需要改革，但对改革失败原因的众多选项中，选择“戈尔巴乔夫领导班子的失误”的人最多，占被调查者的44%；在“应如何改

革”的众多选项中，认为改革“不应该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人最多，占被调查者的33%，而赞成改革应“更坚定不移地加速向西方式民主和市场推进”的人仅占12%；同时，完全支持2005年俄罗斯政府社会领域改革的占7%。换句话说，今天相当多的俄罗斯人仍认为，80年代苏联的改革是必要的，但改革不意味着国家瓦解，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领导人对苏联的解体负有主要责任。同时，在今天的俄罗斯，支持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进行改革的人比主张按照资本主义方式改革的人多得多。当然，对苏共当年“能否成为改革的主要力量和先锋队”仍存在争议，认为不能的占57%，认为“苏共可以在思想上和组织上更新并成为改革的先锋队”的占38% [31] 。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戈尔巴乔夫领导的苏共在80年代后期自身的涣散使其丧失了历史机遇，葬送了人民抱以憧憬和希望的改革。

不仅如此，据列昂诺娃介绍，近年来在俄罗斯史学著作中，有关苏联可以保存下来的论题得到了论证。一些学者考察了苏联政治体制的基本标志（官方意识形态、执政的共产党、国家政治体制中的苏维埃、经济变革、多民族联邦制等）在1985～1991年间的演化，认为直到1991年，国家在政治、经济、意识形态领域中发生的深刻变化为在苏联框架内对苏维埃国家进行改革提供了可能，但当时在国内缺乏能够解决这一历史任务的政治力量 [32] 。2006年8月，即在“8·19”事件15周年前夕，俄罗斯舆论基金会进行的民意调查也显示，66%的俄罗斯人对苏联解体感到惋惜，57%的人认为苏联解体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33] 。

长期以来，人们常常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戈尔巴乔夫宣布解散苏共时，广大党员和人民保持了沉默，没有人起来捍卫苏共？这一点也往往成为一些人证明十月革命产生的体制“没有生命力”的重要证据。在萨普雷金看来，每一个了解事件进程的人都知道，党和人民从来也没有对社会主义的命运漠不关心，任何时候也没有反对苏联、反对苏共、反对苏联军队、反对社会主义！尤其是1991年3月17日的全民公决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有76%的苏联人民投票赞成保留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问题在于，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集团是在“多一点民主、多一点公开性、多一点社会主义”的口号下，开始秘

密地、隐蔽地拆卸强国的全部机件：经济和政治体系、军队、国家安全机制、意识形态、道德等。结果在谎言下，社会主义被引进了野蛮的资本主义。萨普雷金指出，克里姆林宫及其周围人的阳奉阴违后来被雅科夫列夫抖搂出来，后者在2000年时说，戈尔巴乔夫“把苏共玩于股掌之中，因为他一直在宣扬要加强党，而实际上是在尽一切努力来破坏党”[34]。其实，在萨普雷金看来，戈尔巴乔夫等人阳奉阴违是为了争取时间，以便在保守派可能举行起义之前，使意识形态和政治变成不可逆转。如果他们一开始就把自己的反革命意图亮出来，社会保护体系势必会自上而下即刻启动，阴谋家会被逮捕，“第五纵队”会被粉碎。但人民被戈尔巴乔夫的夸夸其谈所迷惑，而他却求助于强有力的对手——叶利钦，那里已经为他设下圈套……1993年人民终于从政治麻痹症中清醒过来，10月奋起反抗，但是被反革命分子无情地镇压了。英国外交大臣劳合·乔治曾宣称：“布尔什维主义是不能用武装力量战胜的”，这已被历史所证实，但需要承认的是，布尔什维主义已被“第五纵队”所战胜，被特殊的“特洛伊木马”所战胜。戈尔巴乔夫及其同伙极力摆脱自己的责任，把苏联的解体说成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的罪过。这个谎言被谢瓦尔德纳泽所揭穿。他在2005年8月18日答乌克兰《事实报》记者时指出：“叛乱与解体没有任何关系。还在叛乱之前，鲍里斯·叶利钦、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和斯坦尼斯拉夫·舒什克维奇就不止一次地碰头，讨论成立斯拉夫民族联盟的主张。”3个暗中破坏者把伟大的强国给拆卸了，他们从上到下、全面地拆毁了苏联，乘机掠夺[35]。

4.十月革命是20世纪世界历史中的最大悲剧，还是具有深远影响的重大历史事件？

在十月革命历史意义的评价上，俄罗斯学者有两种截然对立的态度。少数人认为十月革命是20世纪的最大悲剧。例如，菲拉托夫公然提出，十月革命是对俄国社会进行最严重的革命破坏的开始，布尔什维克的实验是人类近代史上持续时间最长、最激烈的极权主义社会实验。布尔什维克在其执政期间非但没能解决俄国社会在20世纪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反而引发了经济、政治、精神及对外政策等危机。因

此，十月革命是20世纪最大的悲剧性错误[36]。

然而，沃洛布耶夫、普列特尼科夫等学者认为，十月革命是20世纪的重大历史事件，它不仅对俄国而且对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他们看来，一方面，十月革命以来布尔什维克解决了全民族的任务，这包括实现国家的工农业现代化、建立先进的科学和现代教育。虽然苏联人民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这一切为伟大的卫国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使苏联在很长时间里成为世界上第二个超级大国；另一方面，十月革命对20世纪整个世界的历史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它促进了亚、非、拉各国解放事业的胜利，加速了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瓦解。苏联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制度，它给国际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树立了榜样，带来了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苏联在短短的几十年间所取得的惊人成就，不仅标志着东方落后国家要赶上西方先进国家的潮流，而且是寻找替代资本主义社会模式的英勇尝试。苏联作为资本主义对抗力量的存在，使资本主义世界受到了威胁，迫使其借鉴社会主义制度的经验进行自身的调整。总之，十月革命改变了世界的格局，推进了历史的进程。尽管20世纪末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了挫折，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已不复存在，但十月革命这一20世纪的重大历史事件将永载史册。

苏东剧变之初，西方预言家宣布了“历史的终结”，实际是断言十月革命的“终结”、社会主义的“终结”，而资本主义将“永世长存”。然而，21世纪以来，“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的呼声响彻全球。这是对“历史的终结”判断的最有力的否定。正如俄共决议所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在苏联领土上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复辟仅表明社会主义的暂时后退。人类的进步是不可阻挡的，反对美国式全球化的运动和‘第三世界’人民的解放斗争正在积聚力量。中国和越南的经济成就引人注目。白俄罗斯得到积极的发展。拉丁美洲社会主义选择力量的声音越来越坚定。21世纪初，社会主义仍然不仅是千百万人的理想，而且也是社会政治生活的现实。”[37]

萨普雷金指出，虽然今天俄国仍有人继续宣扬“十月革命的时代结束了”、“社会主义的一页彻底地翻过去了”、“社会主义的车厢从俄

罗斯文明这辆列车上脱钩了”、“共产主义作为世界文化的背景消失了”等，但是革命没有死亡，她还活在劳动人民的意识中，对社会主义的兴趣仍在增长。2004年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对现今的经济方针不满意的占被调查者的75%。这个数据不是久加诺夫，而是莫斯科市市长卢日科夫引用的。他在其《俄罗斯资本主义发展一百年》一书中承认：“一个幽灵在俄罗斯游荡……□革命形势的幽灵……‘优惠者’的抗议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革命形势的经典的定义令人震惊地吻合：‘上层不能……下层不愿’。”[38] 然而，革命形势，即当“上层不能，下层不愿”时，与其说是主观的，不如说是客观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发展结果。革命形势的深厚基础植根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冲突中，通过社会阶级关系的复杂体系折射出来。即使反革命力量要阻碍社会的进步，但世界文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不可避免的。从整体而言，现代世界最重要的特征是日益加快的资本主义自我否定的进程与全球整个生活的社会化进程。十月革命的伟大且没有过时的意义恰恰在于，正是它奠定了这一进程的实践开端，在全世界范围内开辟了通往这一进程的道路。苏联的失败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历史进程中戏剧性的一幕，而不是伟大的十月革命时代的终结。俄国无产阶级在1917年的10月开始的否定资本世界的革命，无论如何都将继续下去。这不是宿命论，更不是共产主义狂热，而是历史本身的规律使然 [39] 。

---

[1] 原载于《2007国外社会科学前沿》第1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2] 《俄共关于十月革命的评价》，刘达摘译，《国外理论动态》2007年第6期。

[3] П.Голуб，Величайшая из всех революций планеты—наш ответ фальсификаторам октябрь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Диалог，1997，№.10.

[4] 关于帕·瓦·沃洛布耶夫的观点，参见刘淑春等主编《“十月”的选择——90年代国外学者论十月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第1～19页。

[5] 参见刘淑春等主编《“十月”的选择——90年代国外学者论十月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第304～312页。

[6] Россиские вести，11.29.1995.

[7] К 80-летию великого октября—тезисы центрального совета общества “Российские ученые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ориентации”，Диалог，1997，№.9；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уроки Октябрь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Диалог，1996，№.4.

[8] В.М.Симчер，Развитие экономики России за 100 лет.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ряды，М.，2007.

[9] 《罗伊·麦德维杰夫谈苏联历史和当前俄罗斯政局》，《国外理论动态》2006年第9期。

[10] А.Шубин，10 мифов Советской страны，М.，2007.

[11] 《俄共关于十月革命的评价》，柳达摘译，《国外理论动态》2007年第6期。

[12] 参见刘淑春等主编《“十月”的选择——90年代国外学者论十月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第304～309页。

[13] 参见刘淑春等主编《“十月”的选择——90年代国外学者论十月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第1～19、235～248、309～312页。

[14] В.Бушуев，Октябрь，Свободная мысль，1997，№.10.

[15] П.Милюков，Россия в переломе.Большевистский период рус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Т.1.Париж，1927，сс.40-41.

[16] В.Сапрыкин，Великий Октябрь—непреходящее явление во всемирной истории и культуре？，Коммунист，2005，№.6.

[17] Из глубины，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о рус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М.，1990，сс.42，13.

[18] Деникин А.И.，Очерки русской смуты：В5т.Берлин，1924 т.3，с.89.

[19] В.Сапрыкин，Великий Октябрь—непреходящее явление во всемирной истории и культуре？，Коммунист，2005，№.6.

[20] 《俄共关于十月革命的评价》，柳达摘译，《国外理论动态》2007年第

6期。

[21] Бердяев Н.А.Истоки и смысл русского коммунизма，М.，1990，c.109.

[22] Ю.В.克留奇尼科夫、Н.В.乌斯特里亚洛夫、С.С.卢基扬诺夫、А.В.博布里谢夫-普希金、С.С.恰霍金、Ю.Н.波捷欣：《路标转换》，布拉格，1921；引自《文学评论》1991年第7期，第101页。

[23] 《俄共关于十月革命的评价》，柳达摘译，《国外理论动态》2007年第6期。

[24]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рабочего класса.М.，1987.Т.II.сс.426-427.

[25]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рабочего класса，с.196.

[26] В.М.Симчер，Развитие экономики России за 100 лет.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ряды，М.，2007.

[27] В.Трушков，XX век на весах статистики，Правда，15-16.05.2007（№.49），с.2.

[28] 参见刘淑春《十五年后看苏联解体——从俄罗斯学者的反思和民意调查中得出的几点看法》，《高校理论战线》2007年第4期。

[29] 参见刘淑春、尚伟、康晏如《马克思主义：历史与现实——“首届中俄思想家论坛”综述》，《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年第4期。

[30] 该调查报告收载于俄罗斯社会经济与政治研究基金会（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的论文集《奔向自由——20年后看改革》。该论文集的俄文版于2005年11月在莫斯科出版，中文版由中央编译出版社于2007年出版。这里提到的调查报告，可参见中央编译局《国外理论动态》2006年第2期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6年第5～6期。

[31] 引自冯育民编译《俄罗斯人二十年后看改革》，《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6年第5期，第88～89、93页。

[32] 刘淑春：《十五年后看苏联解体——从俄罗斯学者的反思和民意调查中得出的几点看法》，《高校理论战线》2007年第4期。

[33] 张歆：《俄罗斯人怀念苏联共产党》，2006年8月30日《环球时报》。

[34] Аргумены и факты，2000，№.18，с.3.

[35] В.Сапрыкин，Великий Октябрь—непреходящее явление во всемирной истории и культуре？，Коммунист，2005，№.6.

[36] 参见刘淑春等主编《“十月”的选择——90年代国外学者论十月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第304～309页。

[37] 《俄共关于十月革命的评价》，柳达摘译，《国外理论动态》2007年第6期。

[38] Лужков Ю.М.，Развитие капитализма в России，100 лет спустя.М.，2005，сс.7-9.

[39] В.Сапрыкин，Великий Октябрь—непреходящее явление во всемирной истории и культуре，Коммунист，2005，№.6.

15年后看苏联解体

——从俄罗斯学者的反思和民意调查中得出的几点看法 [1]

刘淑春

苏联解体是20世纪世界历史的一个重大事件，15年来俄罗斯人对苏联解体这一事件是否默许了呢？从首届中俄论坛的俄罗斯与会学者们的发言中得不出这样的结论。他们认为，苏联的解体对于人民来说，是一个悲剧性事件，对于国家的发展来说，无疑是一种倒退。俄罗斯科学院院士阿列克谢耶夫分析了20世纪俄国的百年革命直至苏联的解体及其后果。20世纪世界文明进程的特点是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化的工业社会的紧张过渡。20世纪初的俄国仍然是一个农业国。俄国经历了三个阶段的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阶段（1905年至1917年9月），社会主义阶段（1917年10月至1990年），自由主义阶段（1991年到现在）。1905年的革命未能开启国家通向全面现代化之路，仅局限于政治制度的某种自由化。1917年二月革命推翻了专制制度，但临时政府在通向新的工业社会的道路上没来得及或没能采取任何实际的步骤。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十月革命，一方面推翻了在俄国已经产生的资产阶级关系，进而破坏了现代化过渡的自然发展进程；另一方面消灭了阻碍这一过渡的封建残余。斯大林依靠自身的力量展开了大规模的苏联工业化，开始了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革命性转变。俄国在发展阶段上落后于先进的工业发达国家的局面以革命的方式得到了克服。90年代以来的第三阶段革命具有反社会主义和反现代化的特点。这样，20世纪俄国的历史是走了一个圈，实际上发生了第二次社会经济制度的反向变化。取代苏联的计划经济的是带有反社会主义的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市场经济回归。国家步入了“去工业化”之路。据官方资料显示，俄国丧失了一半的工业潜力。因此他认为，这意味着否定现代化，不是向西方繁荣的方向发展，而是向没有后工业化前景的第三世界发展。这种结局对国家来讲可能引起新的震荡或丧失在当代世界上的形象。

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舍甫琴科研究员在论坛上也谈到苏联解体对俄罗斯的现代化的影响问题。他说，很多数据表明，俄国从沙皇时期起就处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外围”，开始参与资本主义的世界分工，为“中心”提供原材料。在18世纪，俄罗斯的生铁产量占欧洲的首位，保障了欧洲90%的市场。然而俄国的资本主义工业萌芽很早就消失了，主要原因是没有内需。这就是处于“外围”的结果。1917年俄国退出了整个资本主义体系，苏联最后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强国。而1991年苏联解体后，西方又强迫俄国回到资本主义体系。结果今天俄罗斯再次沦为为资本主义“中心”提供原料的附庸地位。西方很多学者在鼓吹俄罗斯回到欧洲，这意味着俄罗斯仍将像百年前一样成为欧洲的锅炉房，只不过内部装修更加奢华罢了。

学者们的看法与2005年1～2月间由俄罗斯科学院社会综合研究所搞的题为“俄罗斯人20年后看改革”的社会调查结果不谋而合。调查问卷中涉及对苏联解体态度的问题，而且与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20世纪90年代的调查结果作了比较。例如，对“在苏联有一种大家庭的归属感”的选项，赞同的占被调查者的65%，不赞同的占15%，认为不好回答的占20%（1998年分别是55%、15%、30%），这表明不赞成苏联解体的人占大多数，比7年前增加了10%；赞成的人是少数，7年间没有变；7年前不能作出肯定回答的人中有10%作出了赞成的回答。又比如，对“你愿意过哪一种生活？”的提问，被调查者中有36%回答“愿意过改革前的生活”，27%回答“愿意过现在的生活”，28%回答“哪种生活都不愿意过”，9%说“不好回答”（1992年的相应回答分别是55%、15%、24%、6%）。这表明，在普京执政后俄罗斯经济状况得到好转的情况下，仍有36%的人认为苏联时期的生活好，只有27%的人对现在的生活满意。

俄罗斯学者对苏联解体的原因有不同的解释。列昂诺娃教授提到，在俄罗斯20世纪90年代的史学研究中，大都把苏联的解体与民族问题联系起来。然而，学者们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思索表明，民族动因之所以可能在政治领域中被利用，是因为国内还有其他激进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现象与之配合。她强调，苏联解体很大程度上与苏共在社会政治体制中地位的改变有关，因为民族问题和民族要求的增长是与

苏共在国家中影响力的削弱同时发生的。苏共本来是苏联政治体制的核心。戈尔巴乔夫没有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中建立起一套稳固的、把国家凝聚在一起的体系，却把苏共赶出了政治舞台。党组织的瓦解意味着苏联作为一个国家的解体。列昂诺娃的观点实际上说明戈尔巴乔夫放弃共产党的领导对苏联的解体起了关键作用。

舍甫琴科则从更高的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较量的视角，分析了苏联社会主义失败的原因。他认为，西方是通过让苏联参与资本主义的分工来开始将其拖回到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他指出，大概在20世纪70年代初，出口石油换来的美元和低息贷款大量涌入苏联。当局把贷款首先用于扩大石油和天然气的开采，而不是发展后工业时代的高新技术。尤其是，党和国家的执政集团实际上无视西方后工业社会的到来，而心甘情愿地转换目标，以便成功地阻止政治和社会改革的推行，这些改革对社会来说绝对是必要的，但对执政集团在社会中的垄断地位来说是具有威胁性的。1985年9月，由于美国的竭力操纵，石油价格下跌了3/4。这加剧了苏联经济和政治危机。因此可以说，在这场较量中，苏联领导人未能找到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正确办法。

俄罗斯科学院美国加拿大研究所研究员乌特金在中俄论坛上提到，1988年是苏联解体的关键一年。在这一年，戈尔巴乔夫错误地迈出了5个步骤：第一步，向外借6000亿美元来发展国民经济，引起了长期的通货膨胀，直到现在俄罗斯还在还戈尔巴乔夫时期借的外债；第二步，通过了打击苏联体制的企业法，苏联时期预算完全集中在中央政府，但通过企业法后，预算集中在了10个企业，企业发展遇到问题，引发了加盟共和国的民族情绪；第三步，取消州一级和加盟共和国主管工业部门的党组织；第四步，打击经互会，苏联时期80%的外贸面向经互会成员，戈尔巴乔夫在一天内就提出，与经互会成员的贸易要用硬通货，结果导致经互会消亡；第五步，在爱沙尼亚宣布是一个主权国家时，戈尔巴乔夫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结果7个加盟共和国相继宣布独立，最糟糕的是1990年6月俄罗斯也宣布自己为独立国家，但这个独立是完全违背俄罗斯利益的。乌特金的分析具体说明了戈尔巴乔夫犯了哪些错误而导致了苏联的解体。

列昂诺娃谈到俄罗斯史学界反思的一个新情况。她说："近年来，在俄罗斯史学著作中，有关苏联可以保存下来的论题得到了论证。持这种观点的作者考察了苏联政治体制的基本标志（官方意识形态、执政的共产党、国家政治体制中的苏维埃、经济变革、多民族联邦制等）在1985~1991年间的演化，并得出了合理的结论：直到1991年，国家在政治、经济、意识形态领域中发生的深刻变化、进程为在苏联框架内对苏维埃国家进行改革提供了可能，但当时在国内缺乏能够解决这一历史任务的政治力量。"

列昂诺娃的这一观点在上面提到的2005年的社会调查中也能得到印证。例如，有46%的被调查者认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苏联需要改革（认为不需要的占45%），但对改革失败原因的众多选项中，选择"戈尔巴乔夫领导班子的失误"的人最多，占被调查者的44%；在"应如何改革"的众多选项中，认为改革"不应该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人最多，占被调查者的33%，而赞成改革应"更坚定不移地加速向西方式民主和市场推进"的人仅占12%，同时，完全支持俄罗斯政府推出的改革的占7%。换句话说，今天相当多的俄罗斯人仍然认为，80年代苏联的改革是必要的，但改革不意味着国家瓦解，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领导人对苏联的解体负有主要责任。同时，在今天的俄罗斯，支持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进行改革的人比主张按照资本主义方式改革的人多得多。当然，对苏共当年"能否成为改革的主要力量和先锋队"仍存争议，认为不能的占57%，认为"苏共可以在思想上和组织上更新并成为改革的先锋队"的占38%。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戈尔巴乔夫领导的苏共在80年代后期自身的涣散使其丧失了历史机遇，葬送了人民抱以憧憬和希望的改革。我们常说，历史不承认"如果"，俄罗斯学者关于苏联可以保存的论证来得似乎晚了。

今天，俄罗斯学者对苏联解体问题研究的新特点，是把苏联解体的因果分析与俄罗斯发展道路的选择联系起来，从教训中重新选择振兴国家的道路。通过冷静反思，社会绝大多数人达成共识，认为俄罗斯要走适合自己国情的道路。在"应该从改革的经验和实践中汲取的主要教训"的众多选项中，被调查者选择"俄罗斯应该走自己的路，同时借鉴而不是照搬别国的经验"的人最多，占59%。

学者们认为，当今俄罗斯仍处在抉择之中。舍甫琴科在论坛上指出，近年来，一种本能的、深深植根于俄罗斯人民的历史意识日益明显，要求保存和加强国家的完整性，要求国家政权对未来提出新的战略构想。但在社会意识中形成了几种战略构想的相互对立，主要是三种发展道路的抉择。一是继续沿着边缘化的资本主义走；二是成为在多极化世界中的一个独立强国，以左翼的另一种全球化模式为基础，坚持世界的社会公正原则的思想体系；三是以俄罗斯东正教为思想体系，强调俄罗斯民族的独特性。它们之间的较量远未结束，代表不同的社会阶层和政治力量，结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部因素。其中，激进自由主义的思潮对俄罗斯前途的威胁最大，在全球化条件下，它只能使俄罗斯成为“被边缘化的资本主义，永远是依附性的、落后的、畸形的资本主义”。他认为，俄罗斯只有选择第二条道路，才能在未来成为富有生机的富足国家。

（许建康 摘）

---

[1] 原载于《高教理论战线》2007年第4期。

第七篇 国际理论界对苏东剧变重大历史事件的回顾与展望

关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现状与展望

〔越〕阮孟雄[1]

一 苏联和东欧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瓦解已引起全世界的政治震动，导致世界的社会主义暂时陷入低潮，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陷入危机

从那时到现在已经20年。那么，现在情况如何？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摆脱危机与否？今后何处去？

马克思已强调："对于我们，共产主义不是需要创造出来的一种状态，不是现实需要遵循的一种思想。我们把共产主义称为一种现实运动，他取消现存的状态。这个运动的条件就是现存前提的结果。"那么，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我们要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作为一个现实运动来看待。它包括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和在世界上各个国家活动的共产党、工人党，有着共同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基础，有着共同的政治目标并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胜利而进行行动配合。

二 目前有5个正在直接领导本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国家保卫事业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中国共产党、越南共产党、古巴共产党、朝鲜劳动党和老挝人民革命党

中国、越南、古巴、朝鲜和老挝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和保卫事业就是现实的社会主义，是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共同成果。上述5个党正在人类走向初级阶段为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的新的经济社会形态的斗争中走在前列。

现实社会主义是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巨大鼓舞和依赖。现实社会主义的任何成功或挫折失败、进步或衰退都对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产生深刻的影响和冲击。

东欧国家社会主义的政治剧变和苏联的瓦解对剩下的5个社会主义国家带来了深刻的冲击。但是，虽然要面对国内的困难和挑战，以及帝国主义、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干涉、破坏、捣乱等阴谋和活动，上述5个国家的社会主义不但站得稳，而且取得了世界所认可的新的发展成就。

吸取苏联和东欧国家成功与失败的教训以及本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中国、越南、古巴、朝鲜和老挝的执政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已经并正在积极地进行理论和实践的探索，寻求符合本国国情，民族的、与世界上的变化相适应的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中国20世纪70年代末进行改革开放，越南和老挝80年代中期进行革新事业，古巴和朝鲜也正在改革和革新路上走出第一步。这5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思维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突破性的发展就是为了发展经济社会，为创造社会主义社会物质技术基础而运用市场经济并主动融入国际环境。

克服数不胜数的困难，考验以及敌对势力的破坏，这5个国家已经取得了巨大而具有历史意义的成就。总的来看，虽然还存在许多困难，但社会主义的实力与20世纪90年代苏联瓦解时期完全不同并有着上升的趋势。20多年来，中国一直保持着两位数的世界最快的经济增长速度。越南20年来的年均经济增长速度达到7.5%左右。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0年4月所公布的数据，中国2009年的GDP为49089.8万亿美元，比1991年增长12倍。越南2009年GDP为924.39亿美元，比1991年增长12.1倍。老挝2009年GDP为55.98亿美元，比1991年增长5.2倍。中国、越南、老挝三国占全世界GDP的比重从苏联瓦解的1991年的1.72%增加到2009年的8.64%。这些数字本身已说明目前社会主义的实力的发展趋势。

三 1960年在莫斯科召开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的时候，世界上有87个共产党和工人党

苏联解体后，其中的不少党已终止存在（如苏共、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合会等）或分裂或转化，同时又形成了若干党。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有136个共产党和工人党正在世界上的88个国家活动，包括欧洲34个国家的70个党，亚洲和大洋洲13个国家的14个党，中东非洲15个国家的17个党，美洲26个国家的35个党。这样，除了在中国、越南、古巴、朝鲜和老挝执政的5个共产党外，还有在世界83个国家时时刻刻斗争着的131个共产党和工人党。

总的来看，这些党正在面临着许多困难，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党的实力还薄弱，党建工作碰到许多困难，活动条件差（没有活动经费和工具、难以与现代化传媒接触等）。二是各个党的政治活动环境因许多国家政府的反共政策，各国政府对各个政党，社会组织的控制力加大，来自非共产主义、民族宗教、社会组织、非政府组织力量的竞争加剧等新因素的出现而日益严峻。

然而，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世界上各个共产党和工人党正在呈现着与苏东危机和瓦解时期相比的明显复苏，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各个党基本上越过了组织上的危机阶段，已重整队伍并保持着组织上的稳定。一些党在本国政坛上成为大党之一，在各国议会和地方议会，乃至在欧洲议会、拉丁美洲安德斯地区议会等占有席位。一些党已取得了执政党的地位，如门德瓦共产主义党在2000年、2005年和2009年3次国会大选中取得了胜利，党首被选为总统；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总书记在2008年大选中被选为塞浦路斯共和国的总统。然而，大部分党还处于在野党的地位，占有少数席位，甚至在各国议会中没有席位。

第二，最近许多党已通过了自己的纲领。一个政党能够通过纲领，提出战略路线是标志着已摆脱路线危机的事件。各个党所通过的纲领中有值得注意的几点：①各个党都一致评估苏东社会主义制度瓦解的本质不是社会主义的终结，而只是一个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模式——苏维埃模式——的失败。②各个党都承认有许多建设社会主义的

道路并强调每个党要自己选择符合本国、本民族的环境和具体条件的道路。这是现今发展阶段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它与过去阶段把苏维埃模式和苏联的道路绝对化的做法截然不同。③各个党都认为资本主义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已经并正在为社会主义提供前提。④各个党都认为自己的革命斗争道路要经过许多阶段，其中现今阶段是进行民主或民族民主革命，在选举中取得胜利并上台执政；接下来是利用国家政权来组织劳动人民进行社会变革，改造国家和政治体系，进而建设社会主义。

四 苏东瓦解后，有一段时间世界上共产党和工人党之间的关系被间断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每个党自身的恢复，各个党也积极地恢复和更新相互之间的团结、友谊和合作以及协调的关系。现在世界上共产党和工人党之间的国际关系恢复和发展过程所呈现的趋势是发挥独立自主，互相平等，克服过去所发生的不符合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的诸如大党小党、领导中心、这党干涉那党的内部工作、这党跟那党终止关系、把绝对支持苏联作为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的主要内容等现象。

如今各个党都一致按照独立自主、互不干涉内部工作、互相团结友好的原则来加强关系。最近，包括中国共产党、越南共产党、法国共产党、日本共产党、古巴共产党、希腊共产党等之间已形成理论交流机制，已形成从1990年到现在轮流在拉丁美洲国家举办的由古共、巴西劳动党、墨西哥民主革命党以及乌拉圭广泛阵线每年共同举办的“圣保罗论坛”，从1995年起每年举办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晤”（刚开始由希腊共产党在雅典承办，从2006年开始按照各个党的申办轮流在各个地区举办），从1998年开始由墨西哥劳动党每年举办的“各个政党和一个新的社会”，比利时劳动党每年举办的“共产党国际研讨会”等年度会晤和交流的机制。除了上述年度论坛外，许多党已承办了一些国际会晤，以就国际和地区政治生活中的突出问题进行探讨。

五 纵观上述情况，可以得到关于21世纪头几十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现状和展望的初步评估

（1）总的来看这个运动还没有摆脱危机，但已经越过了苏联解体后最困难的时期，正在恢复并有了新的发展。在现今阶段，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呈现以下值得注意的三个特点。

第一，承认列宁所强调的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的“民族特点”和各国的社会主义模式不相同，而不是像过去那样把苏维埃模式和苏联的道路绝对化。列宁强调：“所有民族必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所有民族不是按照同样的方法走向社会主义，每个民族将把自己的特点融入民主制度的这个或那个形式，融入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融入社会主义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改造的这个幅度或那个幅度。”忠诚于列宁的这个思想，现今世界上大部分共产党和工人党、革命和进步力量都强调，在建设社会主义，实行“民主制度”、“无产阶级专政”和“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改造”的过程中，每个国家、每个民族和首先是共产党和工人党都要从自己国家、自己民族的具体条件出发制定与之相符合的路线、主张、政策、做法和步骤，体现出自己的“民族特征”，不能照搬别人的模式和做法、步骤，没有符合于所有国家和民族的模型。

第二，承认运用市场经济和融入国际来发展经济社会和为社会主义创造物质技术基础是客观要求，取决于现今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是社会主义自我更新和发展的正确方向，而不是像过去那样把市场经济视为资本主义仅有的东西并与社会主义完全不相容。可以说，这是当前许多政党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执政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在社会主义理论上的根本性的新发展。一方面，这个理论的发展与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和其他经济学说相符合之处在于：“商品”、“货币”、“市场”是与人类社会生产力的特定发展时期相联系的历史性范畴；这些范畴当人类社会生产力处于过低的发展水平时（如原始社会时期和奴隶社会初期）并不存在，并当人类社会生产力达到非常高的发展水平时（如马克思、恩格斯所预计的共产主义社会时期）必将消失。另一方面，这一理论的发展已初步通过中国和越南（在某种程度上也包括老挝、古巴、朝鲜）几十年来的实践得到了验证。

第三，在独立自主、互相尊重和各个党之间真正平等的基础上加

强团结合作，分享和借鉴各自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理论和实践的经验，加大处理和解决国际和地区问题中行动协调的力度等，被确定为工人阶级国际主义的头等重要的内容。

（2）各个党的自我更新，加强团结友谊关系并加强各个党之间在国际上的合作与行动协调，是今后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主要走向。各个党都强调现今阶段的迫切要求就是扩大自己在劳动人民、青年和工会组织中的影响；进一步加强团结与合作以及国际上的协调；在社会主义理论发展中更加积极地配合，提高理论工作的效率，共同提出运动的共同观点。

（3）运动今后的走向还要曲折和不平衡，总体上在有新的发展的同时仍有可能出现部分的退步。社会主义国家在面临机遇的同时也要面对挑战。运动的前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现实社会主义的发展，取决于社会主义国家如何体现自己的人道主义和解放的本质，以及利用人类文明成果来为人的自由与平等，为民主、公平和社会进步服务的能力。中国和越南、老挝的改革（革新），以及古巴、朝鲜的发展就是一种巨大的鼓舞，推动着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恢复、摆脱危机并发展前进的过程。

在2011年1月十一大上得到补充和发展的越南共产党政治纲领重申："各国人民为和平、民族独立、民主、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斗争虽然碰到许多困难和挑战，但是必将有新的发展。按照历史进化规律，人类一定走向社会主义。"

---

[1]〔越〕阮孟雄，越南共产党中央对外部副部长、博士。

“改革”：总结和教训

〔俄〕B.И.茹科夫[1]

1991年12月世界获悉：“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从此从世界地图上消失了。

B.B.普京总统称苏联的崩溃是“20世纪的最大灾难”。

诚然，尽管人们对此议题没有进行广泛的讨论，国家领导人作出这样的评价也有其根据的。在笔者看来，普京号召“让我们一起爱护真理、坚持真理”，是给学术界一个信号：让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而不是虚假研究“改革”现象、进程及改革产生的后果。

剖析“改革”的实质，揭示其性质和方向，指出那些狡猾的“改革者”给俄罗斯带来的危险以及俄罗斯要振兴应规避哪些风险，为俄罗斯公民过上舒适的生活创造条件，在国际社会中树立国家形象，获得应有的尊重。

一

关心而不是破坏人的生活和普通老百姓的幸福，是一个高明政府的首要和唯一的任务，这是政治活动公认的规律之一。

苏联共产党的领袖继承了强国的遗产，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向民众许诺在1980年以前建成共产主义。

事实是，不但没有把苏联建成人间天堂，反而让苏联崩溃。

这到底是为什么？

对1991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消失事件，存在多种表述版本：苏联崩溃、苏联解体、苏联消亡、苏联垮台。

每种定义、每种概念都是对强国的悲惨命运的解释。可以将这些概念概括为以下五点：第一种说法最为普遍，苏联消亡是由于苏联在冷战中失败，美国及其盟友获胜造成的。第二种说法，苏联的消亡是由于苏联的精英背叛了自己的人民而造成的。第三种说法，苏联的消亡是苏联搞不过军备竞赛，从而引发经济危机造成的。第四种说法，苏联的消亡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以及在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的破产造成的。第五种说法，苏联的消亡是它打着“假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号，毒害人民，使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自我毁灭，国家停止向科学拨款，破坏了国家中枢的供血而造成的。

上述每一种说法都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抽取任何一种定义来看，任何单个的说法都不足以导致苏联灭亡。然而，假如它们同时发挥作用，是能够达到目的的。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协调所有行动，这基本上体现了1985年以来各种事件发生的必然性。恰恰是这一进程的规律，可以把全球性的矛盾理解为苏联崩溃的外部决定性因素，而苏联崩溃的内部因素可以理解为苏联的自我崩溃，苏联垮台是它们两者相互作用的结果。

苏联崩溃的罪责应由苏联共产党来承担，由1953年以后斯大林的接班人苏共领袖们来承担。苏联成立了30多年，苏联由一个令人失望的国家变成一个深陷政治伪善的深渊。在全球对立中，苏联遭受了极为严重的失败，并且还从政治版图上消失。这一切都是国家执政党的责任，是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和宗教界精英的责任。

为了选择符合苏联人民利益的一种渐进式的社会进步方案，以及确定一种战略，它类似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方针，苏联共产党的确竭尽全力。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尚未进入世界共产主义排头兵行列，但在21世纪初，中国就超过了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成为先进思想和先进技术的缔造者，中国成为文明发展的领军国家。即使发生了全球危机，中国依旧能够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并且中国的商品出口位于世界第一（2011年），国内生产总值位于世界第二。

苏共的政策还产生另一些后果。它摧毁了苏联并使俄罗斯陷入极为危险的境地，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不得不忍受灾难的考验，经历国家屈辱和巨大的破坏，不过是在千年之交的时候才有能力复兴而已。

通过发生的一切进行科学分析，应该把其看做社会进步的源泉之一。

二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即在1985年3月，苏联经济十分强盛，可以保障各种资源，包括人力资源和其他资源，完全可以应对时代的各种挑战。1966～1985年，即在所谓“停滞”的20年内，国民收入增长了3倍，工业生产增长了4倍，固定资产增长了6倍。苏联的工业可以保障并满足苏联居民对各种商品的需求。国家生产照相机、电视机、收音机和计算机、服装食品等。与此同时，苏联生产食品的质量比国外食品和食品加工业产品的质量要好。在商品出口结构中，石油和天然气约占15.6%，机床、汽车和设备等占26%以上[2]。

在Л.И.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苏联军事力量与美国势均力敌，国家在关键的高科技领域占有重要地位（动力工程、造船业、金属加工业、航空航天等）；在“停滞”时期，建造了16亿平方米的住房，即耗资约占1980年整个住房基金的50%。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石油业、有色金属十分发达，化肥产量很高，航天业也得到进一步发展。多亏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取得了这一切，俄罗斯人民今天才可以生活，并希望在世界上获得当之无愧的地位。

与此同时，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也产生了一些其他后果：党的机构蜕化，言行不一，虚情假意，恶意奉承，酗酒和道德败坏。尽管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取得了显著成就，但是却建立起一个坚决否定社会主义的社会，否决共产主义领袖的社会。

劳动标准和消费需求不相符成为“阻碍机制”的核心，破坏了劳动和分配关系，劳动生产率下降和出现大量的社会关系异化现象，例如

社会公正被异化。

那么，结论只有一个：在国家发展的主要成绩和苏联发展的潜力之间形成了一种巨大的矛盾。

三

M.C.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苏共中央这位年轻且精力充沛的总书记原本是有机会全面解决这一矛盾的。

M.C.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3月宣布了自己的政治方针，开始了“改革”。

M.C.戈尔巴乔夫向人民保证，改革“首先是百分百地满足人们对食品的需求，提供丰富的日用消费品和各种高质量的服务，实施住房建设纲要，改善卫生、人民教育和文化”。其中，改革的首要任务是积极保护自然环境，改善国内的生态环境[3]。

M.C.戈尔巴乔夫曾认为，建立一种非社会主义社会是没有发展前景的。他确信：“我们将沿着更好的社会主义方向前进，而不是背离社会主义。我们真诚地这么讲，无论是对国内人民，还是对国外，我们都不会说假话。期望我们开始建立另一种社会，非社会主义的社会，我们转向另一个阵营，这是徒劳无益的和不现实的……”[4]

正如我们所见，在这一表述当中没有社会悲观主义的征兆，甚至没有暗示社会主义会衰败。M.C.戈尔巴乔夫当时提倡搞“改革”，真实反映了苏联社会各阶层的意愿。

于是人们相信了改革。1985年春天，国家进入社会关系现代化的新阶段，其目的是建立政治民主化，经济非垄断化，放开个体经济，产生劳动积极性。但是事与愿违。在M.C.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前（1981～1985年），国民收入年平均年增长速度为3.6%，在1986年为4.1%，1987年只增长了2%。工业产品的生产也出现下滑（1986年为4.9%，1987年为3.8%），农业产品的生产也出现下滑（1986年为5.3%，1987年为0.2%）。

认为在M.C.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前苏联的经济增长速度就是零增长的观点是不符合事实的。零增长是从改革政策结束时开始的。

M.C.戈尔巴乔夫是一个无能的领导，我们可以从表1的各种指标看出这一点。

表1 生产增长速度

单位：%

指标	1986年	1987年
工业产品	4.9	3.8
农业产品	5.3	0.2
国民生产总值	4.1	2.3

表1表明，1987年，“改革”的消极后果已经凸显。

随着粮食和非食品产量的下降，如果再保持高需求，那么短缺势必成为消费市场的主要特征。

商品的严重短缺和有失体面的凭证分配商品制度是消费品市场的一个显著特征。当时几乎在俄罗斯的所有地区都实行票证制度。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改革”的合理性和国家领导人拨乱反正的能力产生了质疑，并在社会舆论中广泛传播。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很少接见本国民众，经常向国外跑。各种奖金、荣誉称号、金质奖章、电视专访像雪片一样纷纷而来，民众对“被文明化”的国家欢呼雀跃，海外侨胞则脸带忧郁，这一切最终使戈尔巴乔夫在政治上更加偏向反苏。

1988年底，大家都很清楚，实际上苏联国内搞的不是改革。苏联的科学技术实力、生产潜力、农工综合体、智力储备领域开始受到毁灭性的摧残。

四

改革的主要结果如何？

在世界地图上，苏联的领土面积达2240.3万平方公里。

到了1991年底，我国的陆地面积由占世界陆地面积的1/6缩减到只有1/8。

俄罗斯的领土面积减少532.76万平方公里，即减少了24%，居民人口缩减到14654.3万。

从经济角度总结“社会主义革新”，“改革”政策实际上阻挠了国民经济以科技进步、创新、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为方针的发展现代化的方案的实施。改革向苏联领导人提出一个新任务：采取何种规模和方式来完成类似于1945～1948年时期的任务？

M.C.戈尔巴乔夫所继承的政治遗产也不尽如人意：国家的“程序民主化”和民主形式凌驾于政治自由和对民众的公民责任之上。“改革”不仅败坏了民主作为执政的一种形式的声誉，而且赋予民主极低的政治红利，几十年之后改革变成一个尖刻批评之词。

虚情假意和耍两面派被看做晋升的手段，导致人民彻底疏远当局。从1985年开始，民主实际上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小。

精神道德领域遭受的破坏更为严重。第一，在这一领域里埋下了敌对情绪、攻击社会、倾向强势观点、无法无天和不受惩罚的祸根；第二，形成了一个稳定的群体，他们具有极端社会政治情绪；第三，社会紧张度不断增长，能够转变成为尖锐的和大规模的冲突；第四，产生民族骚动的策源地，成为爆发民族危机和分裂言论的基地[5]。

这就是“改革”的主要结论和从中应该汲取的教训。

五

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理论与实践反映出一种奇怪的现象：苏联共产党曾经是用最丰富的学说武装起来的党，拥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但是党的领袖对日益积累的矛盾既不研究，也不予以解决。这成为苏联崩溃的一个原因。最本质的和最致命的矛盾有以下几种：

（1）文明发展趋势和所选择应对社会进步需求方式的理论不足之间的矛盾。理论上的无稽之谈遏制了对长远发展纲要的探索，使实践活动走进死胡同。

（2）国家的潜力与政治精英提供的长远发展规划的能力相脱节。改革的领袖经常是废话连篇，既没有知识，也没有特点，不受这个国家的尊重。

苏共总书记对于世界文明发展的基本趋势缺乏起码的认知。

假如不知道航向，那么就不会有顺风，可见，应该离开驾驶台。

如果给国家掌舵，偏离了社会进步的主要矢量，但是不愿意交出方向盘，就应该放弃管理权。

在现实生活中，不论是前一种情况，还是后一种情况，都没有发生。尚未解决的矛盾竟变成苏联的崩溃。

（3）针对这个主要矛盾，应该补充一点，是权力和财产不相适应形成的合力的结果。

苏共任命的官员拥有绝对的权力，使他们可以肆无忌惮地攫取物质财富，尽情享乐，恣意妄为，但是天堂般的生活却以官员丧失官职而终结。在任职期间，实行国家所有制就可以满足他们的所有愿望。精英们十分渴望把他们掌管的一切都变成个人财产，这种追求决定这些官员日后利用政治激情实现政变。

斯大林去世之后，在苏联，符合苏共官员利益的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国家更加富强，另一种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信仰者越来越少。在战后，这种对立现象越来越严重。

（4）毫无疑问，苏联的崩溃是有其内部原因的。但是，全球性矛盾同样愈演愈烈。

（5）苏共和苏联执政时期的需求和社会进步的潜力与个人利益

不相适应，致使苏联遭受厄运。

1991年11月，撒切尔承认，她那些资深专家非常准确地计算出，有一个人可以确保达到目的人，这个人就是M.C.戈尔巴乔夫。撒切尔的专家认为，达到其目的必须具有某些品质：M.C.戈尔巴乔夫是一个行为不谨慎的人（即是一个冒险分子）、接受暗示的人（即不是独立自主的人），他虚荣心极强（即为了自己所喜欢的一切奋不顾身），喜欢各种奖励和称号。

根据撒切尔的启发，以及戈尔巴乔夫周围那些人和他自己的回忆，苏联精英背叛本国民众的利益就成为一种必然。

（6）苏共的官员以代表苏联共产党的利益为名与民众期望对社会公正之间产生的矛盾，是理解苏联悲剧的关键。当时形成这样一种局面，苏维埃党的精英在地方、共和国越来越脱离民众，越来越脱离社会其他阶层。

民众丧失了对苏共领袖、戈尔巴乔夫以及其他领导人的尊敬，民众的悲观情绪、大规模的退党都可以证明这一点。1988年有18000人退回党证，1989年大约有13.7万人，1990年上半年有36.7万人，到1991年8月退党人数超过400万人[6]。

（7）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共产党也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1990年6月12日，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绝大多数共产党员决定报复戈尔巴乔夫，并且赞同国家主权宣言。其中有许多非常精明的人士，他们明白，报复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尽管是庸俗的，但对苏联是致命的打击。该决议通过之后，已经丧失以任何国家法律形式保留苏联的机会。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领袖们结果参与了国家犯罪活动。

苏共二十八大工作的结果使戈尔巴乔夫相信，揭发行径的危险主要来自苏共内部。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担心苏共会变成他下台的工

具。因此，他开始进入筹备阶段：利用苏共以使苏联垮台，然后取缔苏共。这一任务在1991年8月进行预热，于1991年底在别洛韦日完成。

在叶利钦去世后，他提出的戈尔巴乔夫与国家紧急关系委员会的关系的看法浮出水面。2008年4月23日播放萨瓦尼杰（音译）主持的专访叶利钦的节目。在这个节目中，俄罗斯第一总统叶利钦问道：“戈尔巴乔夫知道国家紧急委员会吗？”然后他自己回答说：“他知道，在国家紧急委员会成立之前就知道。他知道所有的事，直到国家紧急委员会期间发生的一切。”听了这些话之后，任何人都不应该对“国家紧急委员会”的行为感到吃惊：他们没有独立性，依旧由戈尔巴乔夫来领导。

一旦蜕化、伪善和腐败成为执政阶层的一个重要特征时，任何一个国家都将消亡。

“改革”年代的现实证明了卡尔·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作的预言：“如果共产党员自己不这么做，任何人和任何时候都无法贬低共产主义思想。”

“改革”的教训之一是，必须重新认识“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

M.C.戈尔巴乔夫实现了俄罗斯所有敌人的梦想。

老布什证实说：“假如戈尔巴乔夫拥有斯大林那样政治意志和他的前辈的果断，苏联现在还会存在。但是这将是一个革新的和强大的苏联。”

1994年，前美国国务卿贝克尔（音译）出访俄罗斯回国之后，他在美国国会讲话中谈道：“近40年内，为了获得冷战的胜利，战胜苏联，我们耗资数万亿美元。结果，伟大的人民和我们一起实现了梦想……最主要的是我们找到了叛徒。”[7]

美国人称戈尔巴乔夫是主要的叛徒。例如，斯考克罗夫特（音译）坚信，以前是美国人准备自己“去寻找解决大悲剧的最佳方式，

但是戈尔巴乔夫无疑是结局的主角”。“他使国家消亡”，也就是使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消亡。按照对东欧国家实施的战略，美国人认为苏联是自己的盟友 [8] 。

中国有位哲人说：“不仅在房顶上种稻米的那个人是傻瓜，帮助他种稻米的人也是傻瓜。”M.C.戈尔巴乔夫的帮手很多：有8.6万个党委书记（从苏共中央到地方）；苏共中央机关（约有2000人）及其最亲的亲信，其中包括A.H.雅科夫列夫、и Э.A.谢瓦尔德纳泽 [9] 。再有，苏联共产党1800万先进分子对自己的组织垮台的命运表现得极为冷淡。

结语

反苏斗争是在苏共的领导下进行的。但是这也与我们40多年和其他年代一直是胜利者有直接的关系。.

毋庸置疑，凡居住在这个国家的民众都应该承担责任，但是不应该忘记，责任的尺度是不同的，因此不能均摊责任。

老子说：“狂风不可能从早一直刮到晚。”狂风耗尽自己所有力量而停止，也许遇到障碍物也会停止。

这种“障碍物”的轮廓在21世纪之初可以清晰地感觉到：那些地缘政治利益相符的国家结成联盟，历史纪念物具有较强影响力；尤其是民族特征和移往俄罗斯的那些民族的精神影响力；关心“共同爱护和坚持真理”；俄罗斯没有忘记她曾是一个世界强国。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 冯育民 译）

---

[1] 〔俄〕B.И.茹科夫，俄罗斯科学院院士。

[2] 参见〔俄〕Г.M.索罗金、〔俄〕Л.M.沃洛达尔斯基、〔俄〕И.A.格拉德霍夫等《五年之路》，莫斯科，经济出版社，1968；参见〔俄〕H.K.巴依巴阔夫《从斯大林到叶利钦》，莫斯科，1998，第15～21页。

[3] 《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速记记录》，莫斯科，政治出版社，

1988，第34页。

[4] 参见〔苏〕M.C.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莫斯科，1988，第33页。

[5] 参见〔俄〕B.谢列布良尼科夫、〔俄〕A.赫洛别耶夫《俄罗斯的社会危险性》，莫斯科，1996，第80页。

[6] 参见〔俄〕*B*.列果斯塔耶夫《毁灭性的代表大会》，〔俄〕《明日报》2000年第29期。

[7] 据戴伯特讲，美国用于苏联解体的资金达3万亿～4万亿美元（“人民之声”，2002年5月10日）。

[8] 参见A.Д舒托夫《磨难史中的俄罗斯》，莫斯科，2008，第82页。

[9] 参见Л.A.奥尼阔夫《剖析苏联共产党瓦解的原因》，莫斯科，1996，第74～76页。

苏联解体与当今国际社会主义运动

〔美〕大卫·科茨[1]

一 引言

1991年的苏联解体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它对世界造成了诸多负面影响。

首先，苏联的解体打破了地缘政治力量的平衡，使美国得以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苏联解体后发动了一系列军事侵略行动，如果苏联仍然存在，那么苏联就能对美国形成掣肘，这些军事行动就不一定会付诸实施。

其次，苏联解体改变了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条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国家为了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竞争，避免工人支持社会主义，限制和修正了资本主义的阴暗面，实施了一系列大幅提高工人权利和福利的改革。在那个时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们开展的争取提高生活水平、获得稳定工作以及国家社会保障的斗争应该说是比较成功的。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苏联逐渐走向衰落，整个世界和苏联领导人都发现苏联存在明显的政治和经济困境。这些困境夹杂着其他因素，导致苏联发生了资本主义性质的剧变。自80年代初启动的新自由主义议程将资本主义倒退回原始的、赤裸裸的剥削阶段。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想方设法收回工人斗争的胜利果实。1991年苏联的解体消除了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威胁，打消了全球资产阶级在这方面的顾虑，资产阶级对工人的反革命进攻全面升级。

再次，苏联解体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尽管苏联并不是一个完美的榜样，但是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仍然把苏联视为其效仿的榜样。这个榜样坍塌后，多数以苏联为导向的共产党发现苏联模式严重地误导了它们，这些共产党随之解散。这一解散风潮席卷全球，西欧、中东和拉美的一些曾经比较强

大的共产党都不复存在。

令人有些意外的是，苏联解体还削弱了那些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持批评态度的社会主义运动力量。许多社会党，尽管不是全部，早就放弃了社会主义目标，而转向修正主义政党。苏联解体后，这些社会党干脆完全放弃了用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的想法。不少修正主义政党甚至连修正主义也抛开了，转而支持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转型[2]。在许多资本主义大国，一些曾经比较强大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政党逐渐边缘化，例如意大利共产党和日本共产党。

苏联解体之前，大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都持社会主义观。即便在美国，尽管社会主义运动从20世纪初开始就显得相对薄弱，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思潮仍然在30年代和60年代对美国的学术界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但是苏联解体以后，许多曾经持社会主义观的学者，包括其中那些批判苏联式社会主义的学者，都迅速地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观点。

本文将着重分析苏联解体的第三个后果——苏联解体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第一，本文回顾了19世纪和20世纪初激发社会主义运动快速发展的思想渊源。第二，本文分析了苏联尝试建立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试验失败的原因。第三，基于前两个部分的论述，本文考察了苏联解体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造成的负面影响，包括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批判苏联模式的分支。第四，本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探讨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前景。笔者认为，由于资本主义近年来在世界范围内对劳工进行残酷的压榨，以及2008年资本主义爆发了结构性危机，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重现复兴的曙光，人们开始寻求替代资本主义的新型社会主义社会。

二 社会主义的愿景

马克思与恩格斯及其追随者们开创了批判资本主义以及建立一种替代性的社会主义体系的洞见，这孕育了一场强烈席卷世界各个角落的社会主义运动。他们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表明，尽管资本主义对于人类生产力的极大发展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但是资本主义建立在资本

家剥削工人的基础上。虽然资本具有不断把科技运用于生产和变革生产过程的动机，但是靠剥削劳工来获取利润以及对利润的无止境追求，意味着资本主义不可避免会带来与巨大财富相伴的贫困、恶劣的工作环境、经济的不稳定、与过度劳累相伴的失业、对自然的破坏以及帝国主义争夺主导权和进行战争的动力。群众运动能在某些时点、一定程度上克制资本主义最恶劣的一面，但是改革不可能最终消除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人类只有用更高形式的人类社会来替代资本主义，才有可能解决上述问题，这种更高的形式就是社会主义[3]。

社会主义的远景是社会主义吸引人民群众的一项核心要素。虽然每个人都能看见资本主义造成了许多社会问题，但是只有当存在一个可以替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愿景，而且这一社会形态是可行的、可以实现的时候，成千上万的人才会将他们的一生投入促成社会转型的运动。在将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方面，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更有效。资本主义在这一转化过程中，导致了环境污染、资源耗尽等诸多负面问题。通过消灭剥削，将生产从为少数富裕的资本所有者追逐利润服务，转变为以满足人类需求为目标，社会主义可以规避上述负面问题。

尽管马克思与恩格斯并未对未来的社会主义提供一种具体的分析，早期的社会主义运动还是对社会主义所含有的一些关键要素有着基本的共识：①生产工具的公有制将代替由少数人拥有它们的私有制；②生产与分配将由根据人们的需求而制订的经济计划来指导，而不再是由对利润的追逐所决定；③作为多数人的工人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不再受资本主义统治阶级控制，而是成为新社会的领导者。社会主义人士相信，社会主义的体系将是一个崭新的社会形态，那里没有悬殊的贫富差距、经济不安全感、失业、加班和环境破坏，没有为了实现帝国主义控制世界和发动战争的动力机制。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合作将代替竞争，对自然的剥夺将转变为可持续的开发。

三 苏联的解体

1917年的俄国革命标志着人类建立新型社会主义体系的第一次尝

试，它引领了中国、越南和古巴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的首次尝试不畏艰难险阻，展示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同时也暴露出一些严重的缺陷。在其超过70年的历史中，苏联尽管有不可否认的缺陷，但仍以其实践证明了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的可能性。然而，在1989～1991年短短几年间，苏联解体了，苏维埃共和国分裂成15个国家，社会主义阵营分崩离析，资本主义残酷的剥削体系大行其道。

苏联的解体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资本主义导向的意识形态宣传机器散布了很多苏联解体原因的传闻，其中最主要的说法就是苏联的解体源于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不可行性或劣势。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事实上，自20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中期，社会主义制度给苏联带来了快速的经济发展。1928～1940年间以及1945～1975年间（除去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的经济增长速度比美国快得多。即便使用西方学者和美国中情局的估计数据，人们仍然能得到上述结论。

虽然苏联经济增长速度从1975年开始放缓，苏联的技术创新速度也有所减缓，但苏联经济一直保持年均1%～2%的增长速度，经济增长直到1990年夏天才停止。1990年夏天，苏共解除了中央计划，苏联政府涣散，苏联自1928年实行中央计划以来，第一次在和平时期出现产出下降的情况。在历经45年经济的高速增长后，苏联经济的表现在之后15年不如领先的资本主义国家，说明苏联经济确实需要重大改革，但这不能抹杀苏联的成就，不能因此表明社会主义的劣势。同时，仅凭苏联经济的表现不尽如人意来解释苏联的解体也站不住脚。资本主义30年代的经济危机远比苏联的经济衰退严重，但这并未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消亡。

笔者认为，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在于苏联式社会主义内部的一种矛盾，即一方面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一种为将利益给予劳动人民而设计的体系，另一方面小部分特权精英却在这一体系中实行政治和经济统治。随着时间的推移，苏联大部分的党与国家的高层官员从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革命家转变为追求政治和物质利益特权的官僚。这一过程发展到一定的时刻，这些党政精英势必会瓦解社会主义，并用资本主义取而代之，因为这样做不仅能够保住他们的特权地位，而且

还能通过将有价值的国家资产占为己有，而不再作为为了人民的利益而管理这些资产的公仆，来巩固其特权地位。由戈尔巴乔夫于1985年发起的改革进程，为苏联政权中以叶利钦为首的倾向于资本主义的力量提供了机会。这些人借机将党政精英中倾向于资本主义的人集结起来，伺机而动，终于在1991年推翻了社会主义，解散了苏维埃共和国。这两个结果都是绝大多数苏联人民不愿意看到的 [4] 。

四 苏联解体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

由于重大的历史事件总能证实某些政治观点，同时证伪与之相左的其他政治观点，所以这些世界往往对政治运动有重大影响。法国大革命表明人民有可能推翻长期统治他们的政权。俄国革命及其后续革命表明社会主义有可能替代资本主义。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表明现代资本主义会出现严重的衰退，导致大量的失业。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经济经验表明大型国家支出计划能够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快速消灭大规模失业。由于上述事件的示范效应，它们都对其后的政治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苏联解体也不例外。无论这一事件的真实原因为何，它必然削弱社会主义而增强资本主义。尽管仔细研究苏联解体的过程后，人们会发现苏联解体并非起源于社会主义的制度劣势，这个事件也不能证明社会主义是不可行的制度。社会主义运动由此丧失了第一个也是历时最长的替代性社会主义制度实例。

苏联解体导致人们广泛接受了这样的观点，即苏联解体表明建立在公有财产和经济计划基础上的制度无法长期有效运作。这也使得社会主义者们不得不放弃替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观念。有学者尝试重新定义社会主义，将社会主义设想成一个基于私有产权和市场机制的没有剥削、高度平等的制度。然而这种制度与资本主义相差无几，因而不能作为人们可以为之奋斗的目标。资本主义世界中继承了社会主义传统的政党，无论在名义上是叫做共产党还是叫做社会主义党，都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那些幸存下来的政党，则放弃了在未来建立替代资本主义的制度的观点，不得不选择声明它们可以比其他党派更有

效地管理资本主义社会。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右倾之风甚嚣尘上，一些当权的政党甚至从改革派的地位转而追逐新自由主义政策。

五 当前社会主义运动的前景

20世纪90年代末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低谷期。资本主义向新自由主义的转型不断深化，看上去势不可挡。新自由主义的卫道士大声疾呼“不存在替代新自由主义式的资本主义的制度”。然而，这个说法本身就表明当代的资本主义存在根本性的弱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家管制资本主义通过强大的工会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提供了较好的福利，工人生活水平提高，公共福利开支增加，贫困人口减少，贫富差距缩小，失业率保持在较低水平。

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盛行以来，资本主义发生了根本的转型。上述所有趋势都逆转了。在许多发达国家，实际工资不断下降，公共开支缩减，贫困人口和贫富差距激增，就业日益无保障。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中资本主义国家强制推行新自由主义，使得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急剧恶化。反复出现的“没有替代制度”的话语反映出两项事实：①除了使工人的生活条件不断恶化外，现在的资本主义无法为工人提供任何好处。②社会主义替代计划从政治议程上消失了。

然而，一个社会制度不可能在越来越剧烈压榨生产阶级的同时无止境地生存下去。资本主义压榨所引发的两个方面的发展，在我看来，有可能扭转社会主义运动的颓势。首先，新自由主义式资本主义对劳动人民压迫的不断加剧最终激起了用新型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的尝试。在新自由主义式资本主义压榨最为严重的地方，例如拉美，此类试验正在进行。先有委内瑞拉人民在饱受新自由主义之苦以后，从2000年开始在查韦斯的领导下试图用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随后，莫拉莱斯领导的社会主义行动党在2006年赢得玻利维亚大选，倡导社会主义的莫拉莱斯当选为总统。在尼泊尔，革命性的共产党已成为当地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

新自由主义式资本主义导致了2008年以来的严重的经济危机。新自由主义式资本主义不仅不断加重对人民的压迫，而且该体系自身日益不稳定。2008年极端的贫富差距、金融部门的失控连同新自由主义式资本主义的其他特征，引发了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危机，危机的严重程度堪比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只不过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来遏制危机的扩散。这场危机使世界各地人们对资本主义的合法性的质疑大大增强。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向银行和大公司伸出援手，通过财政刺激措施挡住了这些机构的自由落体倒塌之势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现在开始推行“财政紧缩”计划。他们的目标是利用这次经济危机彻底消除国家福利制度，后者在过去30年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转型中艰难地存活下来。在美国，“财政紧缩”计划配合对公共部门工会的公开攻击，公共部门工会是过去30年里仅存的未受到新自由主义冲击的劳工组织。

30年以来，劳动人民面临的物质条件不断恶化，危机后失业激增，基本公共服务开支快速削减，与此同时金融家和工业巨头仍在借助广泛宣传持续从纳税人手里攫取财富并攻击工会运动，这很有可能唤醒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意识。对统治精英的愤怒正在增长。即便在社会主义运动长期相对微弱的美国，近期的民意调查显示，超过1/3的人对社会主义持积极观点。危机发生之初，工人还忙于应对，寻觅生存方式。然而，现在工人越来越体会到，资本主义才是造成自身所面对的这些困境的罪魁祸首。工人对统治精英的愤怒正在积蓄。在美国威斯康星州已经爆发了反抗资本攻击劳工权利的大规模游行，抗议右翼政府取消公共部门工会的企图。

现今的条件对于社会主义运动在资本主义世界的重生是十分有利的。但是，一个关键的不利因素是，缺乏一种可行的社会主义替代制度的景象。抗议剥夺工人权利和降低工人居住标准的集体行动往往只能导致一种改良运动，该运动的目标是让资本主义再次人性化，在资本主义框架内部为工人争取更多的权益。如果社会主义运动要再次成为一种挑战资本主义的有力的政治力量，社会主义者就必须产生和推

进一种替代性社会主义体制的景象。即便在社会主义运动长期相对微弱的美国，2009年和2010年举行的民意调查显示，支持资本主义的比例低得出奇，对社会主义持积极观点的比例高得出奇，特别是在年轻人当中 [5] 。

社会主义运动应该摒弃那种倾向于资本主义的观点，即苏联解体本身就证明社会主义行不通。苏联的经验证明，一个基于公有产权和经济计划的体制可以带来高速的经济发展和经济进步，同时保持相对平等的收入分配，防止任何富裕的资本家剥削生产者。苏联解体不是因为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结果而是由于苏联式社会主义的一些严重缺陷。这些缺陷最终导致了苏联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的减缓。

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存在诸多缺陷。经济计划过于集中在中央这一层，几乎所有的主要决策都是莫斯科的中央官员制定的。地方和区域层级几乎没有什么决策权。经济和政治体系过于集中化和层级化，使得权力流向总是自上而下，而普通人民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作用微乎其微。工人只是机械地执行工厂主管发布的指示，消费者无法表达他们的需求，企业作为原材料消费者也无法表达其对上游企业的需求 [6] 。为了使得增长最大化，计划者们没有给计划系统留有多少变动的余地，也即没有预留多余的生产能力和存货，导致计划过程在面对不可预测的发展时显得十分僵硬，生产短缺的现象不可避免，并且一旦一个环节出现短缺后，整个生产体系都会受到影响。

上述苏联式社会主义面临的种种问题威胁苏联式社会主义体制的存续，这些问题都根源于笔者前述的苏联式社会主义内部的根本矛盾，即一方面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一种为将利益给予劳动人民而设计的体系，另一方面小部分特权精英却在这一体系中实行政治和经济统治。苏联体制最为严重的基本缺陷在于劳动人民无法在经济或国家事务中实践主权。一个只有依靠精英的仁善来保障劳动人民利益的社会主义制度不是一种稳定的社会主义形式。可持续的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经济与国家的人民主权之上。经济计划应当是劳动人民的工具，通过这一工具劳动人民决定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及如何分配。国家则应当是劳动人民管理社会所采用的工具。

以上是苏联解体带给我们的最重要的教训。社会主义运动应当从苏联的实践经验和导致苏联解体的矛盾中，吸取正反两个方面的因素，发展出一种21世纪的新型社会主义，以激发社会主义运动新的增长，而不是采纳资本主义原则。我们也应当考虑到交往和信息传播技术的巨大进步，这可能使经济计划更加有效、灵活、更好地回应人民的需求。在西方，有许多探讨社会主义模式的文献。这些文献在发展21世纪新的社会主义形态方面迈出了第一步。

在本文中，笔者说明了当代资本主义以各种方式恶化工人的生活条件。与之相对照，我们在这里字里行间讨论的社会主义体制，将不会变成那种降低工人生活质量、缩减公共服务、使某些劳动人民陷于失业与绝望而同时却使另一些人拼命加班的制度。这样的社会主义体制没有内在的掠夺自然环境的动机，而是与其和谐共处。这样的社会主义体制也不会制造帝国主义与战争，相反，它能够营造一个各民族和平合作的世界。这样的社会主义体制可以建立一种国际经济关系结构，在其中所有人民都能够获益，而不是让各个国家的工人在逐利竞争中相互对立。

如果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能够复兴并再次成为世界的主要力量，它就必须联合有组织的劳动人民为实现美好的生活目标而奋斗，推进一个显著区别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形态的实现——社会主义。这是一项艰难的事业，但是它承载着广大劳动人民的希望，将资本主义制度丢入历史的垃圾堆，同时创建一个新的社会，其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其他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陈硕颖 译）

---

[1] 〔美〕大卫·科茨，马萨诸塞大学安姆斯特分校教授。

[2] 布莱尔领导的英国工党就是一个案例。

[3] 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有丰富的含义。本文中的“社会主义”指替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笔者在此未探讨社会主义社会将经历哪些阶段。

[4] 1990～1991年间展开的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苏联人民更倾向于保留社会主义和苏联的完整，而大多数苏联的高层领导人到1991年春为止都已经变得倾向于资本主义。

[5] 2010年2月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有36%的被调查者对社会主义的印象是正面的。2010年5月皮尤研究中心的民意调查显示，在18～29岁的青年受访者中，有43%的人对社会主义持积极态度，与对资本主义持积极态度的人数比例持平。

[6] 苏联最好的产品是军工产品，而军工产品的消费者——国防部——是苏联最有权力的部门之一。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被系于同一个命运共同体

〔德〕埃贡·克伦茨[1]

我不是以从事研究的历史学者或党派代表的身份，而是以时代见证者的身份来发言的。对我来说，有两个观点非常重要：第一，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以下简称苏联）的解体是一场在全球范围带来严重后果的世界政治的悲剧，这些后果至今还在持续。主要帝国主义国家的力量得到了增强。苏联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伙伴丧失了一个重要的盟友。欧洲，这个在1945～1990年经历了它新近历史中最长一段和平时期的区域，不得不体会到，战争又重现踪迹了，比如对南斯拉夫、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第二，苏联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以下简称民主德国）被维系在一个祸福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民主德国的成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和随之而来的冷战的结果。若非这些因素就不会有德国的分裂，也就不会有民主德国的存在。民主德国也就是苏联的一个孩子。尽管民主德国在时间上要比苏联更早地从这个政治版图上消失。她的终结却与苏联的解体有着因果关系。1981年10月21日，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向埃里希·昂纳克派遣了一名私人特派员。他带来的通知称：苏联正处于像苏维埃俄国1918年签订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Brest-Litowsk）和平条约时的类似局势。这个消息给当时的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层带来了困惑。1918年的情势是关涉苏维埃俄国的存亡的，我们就不明白了，当年的情势和如今的局势该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推断，苏维埃领导层的分析已经得出结论，即苏联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机之中。1982年苏联共产党在总书记安德罗波夫的领导下尝试为拯救社会主义给出原则性结论。但他过早的逝世终结了这一战略。1985年戈尔巴乔夫担任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时，并没有为此做好准备。转型，最初被视为“社会经济的加速”，成为一种历史必然。然而，最晚自1986年开始人们已经意识到，并且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也能逐渐意识到，这位新当选的总书

记乃至整个党派对于转型该如何实施以及导向何方，都没有任何真正内容方面的设想。作家尤里·邦达列夫（Juri Bondarew）对此写道："人们可以拿我们的改革和一架飞机相比，起飞了，却不知道飞行的目的地是否也有着落的地方。"[2] 1987年我从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那里得到一个委派任务，去分析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1月份全体大会。当时我得出了一个错误结论：这种改革新思维源自列宁。但它显现出来的却是：列宁的权威被使用，只是为了假借他的名字来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告别。所宣称的"新思维"对阶级漠不关心，并且没有考虑到，那些和美国结盟的国家根本不愿意以不同于帝国主义权力政治的范畴去思考。在西方主导的是这样一种观点，德国统一社会党从一开始就反对这种改革新思维。但这是不正确的。对于德国统一社会党而言，要想同时做到一方面与苏联保持这样清晰的关系，即民主德国的存在最终有赖于它，一方面又要对戈尔巴乔夫的政策保持批判性距离，是很困难的。然而这种距离并未促使民主德国形成一种可行的方案，以实现连续性与创新之间的平衡。改革新思维的失败诱使我们——民主德国的领导层——对自己国家里的必然变化产生了免疫。戈尔巴乔夫声称，他在1985年已将自由和主权给了各个同盟的社会主义国家。但就民主德国而言我不能为此作证。任何像民主德国这样与苏联通过友谊和援助条约，通过华沙条约以及经济互助委员会结盟的国家，它们的主权在1985年之前和之后都是受限的。在"改革"（Perestroika）和"开放"（Glasnost）这些词语出现之前很久，就已存在与苏联共产党不同的观点，这些观点关涉到世界政治。其中首先是民主德国针对联邦德国的政策。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前任们一样都害怕民主德国在苏联背后打"德国牌"。出于这个原因他长年来一直阻止昂纳克对联邦德国进行国事访问。而当1987年这一访问终于成行时，他宣称德国的问题是开放的。然而就在1989年11月1日他还向我保证，德国的统一没有提上议事日程。同时他的同僚查明了联邦德国已经做好准备将为德国统一付出什么代价。他的同盟伙伴顷刻间已经是联邦德国的总理了。民主德国被放弃了。其次，苏联领导层不满意德国统一社会党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合作所作的努力。1985年8月1日，戈尔巴乔夫在一份私人通知中告知埃里希·昂纳克："北京的立场与民主德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生命攸关的利益相冲突。"[3]

民主德国置之不理继续前行，1986年未征得莫斯科的同意即派遣一个党派和国家的代表团访问了中国。苏维埃领导层的不同政见摇摆于两者之间：一方面是代表大国利益，另一方面是主张国际主义的政治声明。1949年苏维埃政权称民主德国的建立是“欧洲历史的一个转折点”[4]。正如她的建立，民主德国的消失也是欧洲的转折点。民主德国是整体的一部分。毁灭的是一种社会主义模式，这种模式从苏联的远东一直绵延到欧洲的易北河和韦拉河。苏联不是因人民革命而解体，她是从上面被破坏的，由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的不同派系所破坏。帝国主义自1917年以来就想除去苏联：通过战争和秘密警察都失败了，通过“死亡军备”（Totrüsten）却成功了。戈尔巴乔夫事后的供认称，他从政治生涯的一开始就已经决定“去除共产主义”[5]，这我不相信。党派和国家是由于无计划性、无原则性脱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的。正因为如此，一个像叶利钦这样的反共产主义者才会被冲到了浪尖。这是计划好的叛变的结果？我不否认也有这种因素，但原因藏得更深。苏联和她的欧洲盟友们已经丧失了与资本主义进行体制争论的机会。为此不止有一个原因，而是有一堆：主观的、客观的，可避免的、不可避免的，国家的、国际的，历史的、当代史的，经济的、政治的，理论的以及道德伦理的。最后一层是未达到的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这一点对战胜资本主义本是必需的[6]。未能成功做到使劳动大众感觉自己是全民所有企业的所有者。存在一种对党的角色的简单化理解，这导致了一定程度上人民和领导者之间的疏远。这体现于重要的国家事务在其决策之前未能征求市民的意见。马克思主义未能作为自我认识和不断的自我修正的客观器件（objektives Organ）来被运用。现在有很多有关1989~1991年间事件的个别描述。遗憾的是还没有从马克思主义视角来进行的全面分析。这将是此次会议组织者的一大功绩，将不同学科和国家的学者和实践家聚集在一起，进行这种分析。毁灭的是一种特定的社会主义模式，而不是社会主义理念。现在全世界很多人都在关注中国，希望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是成功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 李红霞 译）

[1]〔德〕埃贡·克伦茨，前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2] 参见尼古拉·雷日科夫（Nikolai Ryschkow）《证人》（Der Kronzeuge），莫斯科，2010，第79页。

[3] 戈尔巴乔夫同志给埃里希·昂纳克的私人通知。此文档存于笔者的档案中。

[4] 参见1949年10月7日民主德国建立之时斯大林致民主德国领导者的电报。

[5] 引自1999年有关戈尔巴乔夫在安卡拉的演讲的新闻报道。

[6] 参见《列宁文集》（W.I.Lenin-Werke）第29卷，柏林，1976，第408～417页。

苏联模式社会主义解体的三个教训

〔保〕亚历山大·利洛夫[1]

我想，20世纪有三个重大历史事件决定了当代世界的地缘政治结构。它们是：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1917年）、第二次世界大战（1945年）和伟大的中国革命（1949年）。与此同时，还应该包括最近30年中国的现代化。

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崩溃是具有同样历史意义的事件。这个事件是这些国家人民的悲剧，因为他们从此陷入贫困，他们的国家发展倒退了几十年。而且，这一事件对世界其他各国人民也带来了严重后果，改变了世界范围内各个领域的力量对比与平衡。

今天，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来说，正确认识为何发生了这一切至关重要。我祝贺此次会议的组织者，研讨这个题目具有历史意义。北京为策划和组织这次会议而无比光荣。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回答上面提出的问题。而且，最重要的是通过这种方式可以为未来积累必要的经验。

我认为，考虑到保加利亚的经验教训，苏联模式社会主义解体可以归纳为三个关键性的教训。当然，教训远不止这三个。我只是提出来供大家讨论。

第一个教训：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包括社会主义制度在内，如果没有内部的自我发展，就注定会停滞、僵化、衰退和崩溃。但是，社会主义社会积极的自我发展的首要条件是，在相应的历史时期对正在发生的决定性进程和趋势作出正确的选择。或者说，需要实现现代化。社会主义内部自我发展的机制就叫做现代化。

苏联共产党和东欧执政党未能对20世纪后半期的世界发展作出正确的评价。70年代世界已经进入后工业高技术、计算机和网络新时

代，而苏联和我们东欧国家仍然在走老路。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导致苏联和社会主义大家庭自我孤立，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拉大，最后丧失竞争力，遭遇失败。

我还觉得，我们至今也没有深刻认识到当代世界确实与过去相比发生了质的变化。这种变化的特点是世界在从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过渡。如果一个国家和一种文明不参与到这个进程中来，那就注定会失败。社会主义理论应该深入研究当代社会主义的这个最紧迫的现实问题。社会主义只有适应我们当代全球大革命的形势，它才会有前途，因为全球大革命是科技革命、信息革命、教育革命、生态革命和人口革命的有机统一。毫无疑问，我们应该忠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但是，我们也不应该忘记，我们是生活在21世纪，而不是19世纪。

第二个教训：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它内部自我发展的条件，但这不是一个自发的过程。为了使现代化取得成功，一是需要牢固的、持久的理论和政治战略，二是需要强有力的伟大历史领袖人物来实现这种战略。“改革”既没有前者，也没有后者。

苏联共产党和我们东欧党的一个最大缺陷是国家和政界精英出现了危机，破坏了选择高素质领导干部的机制，导致领导干部严重畸形。我们建立了一种领导岗位终身制的制度，这种实践致使领导精英老年化。于是，在领导层中出现道德上的堕落：自私自利、贪污腐败和脱离人民群众。

历史将对这些人作出判决。但是，我们现在清醒地认识到，如果当初苏联和苏联共产党是别的领袖和领导人执政就好了。那样，苏联就会进行改革，而不是被消亡。如果苏联也像中华人民共和国那样就好了，但苏联和苏联共产党没有邓小平这样的领袖人物。安德罗波夫是一位潜在的优秀领导人，但不幸的是他去世太早；契尔年科随后接任，再后是戈尔巴乔夫。这些人不具备充任世界上第二个超级大国苏联这样国家领导人必备的智力、政治和道德素质。至于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等人更不够条件。

第三个教训：永远不应该忘记苏联和苏联共产党的灭亡不是由于

外部的侵略，而是遭到内部的摧毁。所以，一个极其重要的教训是，社会主义社会及其执政党应该坚持自己的原则、自己的传统和价值，防止其腐化变质。

戈尔巴乔夫及其领导集体的历史责任是没有开始真正的“改革”，而我们的社会主义需要进行激进的改革。历史的戏弄是：社会主义本来应该进行改革，却被“改革”所葬送。这是为什么？

当时的“改革”没有建立在长期的经济和政治战略的基础之上。其目标是逐步解决现存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却引起社会和党内混乱，产生政局动荡，这就为复辟势力的出现开辟了道路。“改革”明显表现出破坏性和不稳定性。“改革”的最大战略错误是引起政局不稳和社会分化。这种情况的出现对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更加无能为力。

这样，人们很快对进行改革失去信心，不再表示支持。党便丧失了自己的威信和执政能力。社会进入内部自我毁灭的阶段。苏联发生的暴动和叶利钦上台标志着“改革”的彻底失败，随着“改革”的终结，苏联和苏联共产党也发生解体。

我深信，伟大的俄罗斯人民将在自己辽阔的土地上站立起来，俄罗斯将重新在当今多元文明世界体系中占据自己应得的位置。没有俄罗斯，没有中国，没有欧洲，就不能建立起稳定的世界体系。

归纳起来，我发言的要点是：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崩溃并不意味社会主义作为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选择的失败和终结，只有当代西方的宣传机器才存在这种幻想。很显然，当代资本主义无法解决今天世界上诸如贫困、生态危机、各个国家和各国人民的发展等一系列最尖锐的问题。人们在寻找新的途径。战胜资本主义的任务并没有从历史的日程中取消。中国进行改革和现代化，在短短的30年里变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再过多少年中国的经济实力将位居世界第一。越南和古巴也在顺利开展改革。

社会主义具有光明的历史前景。它将不是20世纪的社会主义，而是21世纪的社会主义，即具有中国、拉丁美洲、欧洲和其他地区民族

和文明特色的社会主义。回顾历史，人们会重新发现，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加优越的社会。信息时代的社会主义将保留自己的思想价值和社会价值，它将是吸收全球大革命的成就与能力、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重建起来的社会主义。因此，中国现代化的影响已经具有世界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世界上的作用在与日俱增。我们各个政党都是平等的，我们都承担同样的责任，我们都应该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作出贡献。但是，为重振世界和社会主义而斗争，并使社会主义具有吸引力的先锋队就在这里，这就是驰誉世界的“中国奇迹”。

（文中“改革”特指戈尔巴乔夫的改革）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马细谱 译）

---

[1] 〔保〕亚历山大·利洛夫，保加利亚科学院通讯院士、保加利亚社会党战略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哲学博士。

战争与和平：谁将获胜？

〔俄〕弗·伊·多博林科夫[1]

苏联消亡是20世纪地缘政治中的一场浩劫，现在已经过去20年。这个“奥秘”至今依旧令许多人关切和好奇。人们对此的看法和观点迥异。

我们认为，对于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切的问题，也许只有根据现代战争的理论才能搞清楚。由于美国和西方国家联手搞冷战，苏联遭受失败。冷战（1946～1989年）一般被认为是20世纪一场最大的非军事的地缘政治较量，实际上是第三次世界大战，是以对手（以国家为标靶）全面失败为目的的一场信息战、意识形态战。这场第三次世界大战将作为一种无法判断的战争的一个有说服力的实例（有失败，但是好像又没有军事行动）。在这场战争中俄罗斯被打败了。

在冷战中，苏联不是侵略国，它想在国境上阻止这种“战争”，任何时候都不会成功。战争是从国家内部、人民的意识中挑起的。在现代战争中，这种类型的战争（信息战、经济战、意识形态战）的主要之点是进攻性、侵略性。

苏联崩溃之后，美国的国家战略就具有上述侵略性和扩张性，与此同时，还允许非法干涉他国内政。

现在，美国的主要目的不是战胜单个国家或者单个军事政治集团，而是全面统治整个世界，建立一个世界帝国。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美国实际上已经对全人类开始第四次世界大战。

第四次世界大战已经开始并全速进行，现在理解和意识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这场战争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具有全球性，是完全意义上的世界大战，它将逐步蔓延到整个世界，所有民族和国家。

尽管目前这场战争还不具有全球性，但正严格地按计划实施，有时战争仅局限在世界的某一地区，有时战争连续不断。

这场战争沿着三个方向进行（以“冷战”或“热战”形式）。第一，向那些被选择为进攻对象国的居民和政治精英的社会意识进行大量的信息心理宣传。第二，在这些国家建立专门的代理机构，通过“第五纵队”来发挥作用，向这些机构提供一切帮助，主要是针对灌输、渗透和扶持那些在政府的经济、政治部门里的“自己人”，给它们提供资助，利用这些机构影响大众传媒，达到直接在这些国家的内部操纵人们意识的目的，资助那些以阻挠和破坏国家制度，在国内制造动乱和政治不稳定为目的的非政府组织、政治团体和政党。第三，对那些不顺从的国家，强调自己主权和独立发展的国家，搞“颜色革命”，直接投资，公开武装入侵并诉诸武力，用武力推翻这些国家的政府并建立亲美政府的傀儡。

自由主义的现代化是一种不宣而战的战略，它将导致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和东方之间产生整个文明的大对立。如果说在苏联崩溃之前两种社会制度——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对立是世界进程中的基本矛盾的话，那么在苏联解体之后，当今时代的主要矛盾则是东西方之间在文化价值观上的全球冲突，它将决定当代世界的整个政治建构和发展。全球富裕的西方（美国、加拿大、西欧国家、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与全球贫穷的东方（俄罗斯、乌克兰和其他独联体国家、中国、印度、伊斯兰国家、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相对峙。在这种对峙和斗争中，东西方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它们之间的矛盾根本无法解决。西方文化的价值和东方文化的价值互不相容，因此美国期望东方全盘西化完全是幻想。

俄罗斯和中国对外政策中最重要的一项任务是，与其他东方国家一道抵抗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和建立一个国际反自由主义阵线，也只有这样才能遏制美国肆无忌惮地让世界所有国家对其俯首帖耳的企图。

俄罗斯和中国凭借自己博大的精神实力、经济、军事和人力资源潜力完全可以并且应该成为凝聚全世界反西方、反美、反自由主义力

量的中心。

那么，苏联的崩溃对俄罗斯自身又产生了哪些后果呢？

俄罗斯迄今为止无法修复自由化改革的后果，至今依旧处在制度危机、意识形态模糊不清的状态之中。国家从来没有面临像现在这样的问题：怎么办？

在我们看来，要回答这一问题和确定新的发展前景，必须明确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公开承认俄罗斯和西方不是同路人并公开正视自己的敌人；第二，俄罗斯应该坚决地摒弃各种形式的自由主义思想，无论是西方自由主义思想还是俄式自由主义思想，都应该摒弃；第三，俄罗斯只有建立全新的国家意识形态概念及其明确具体的政治行动纲要，才能改变自己的整个政治、社会经济和地缘政治发展的轨迹；第四，俄罗斯需要制定一个新的全球发展战略纲要，这是俄罗斯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它决定着俄罗斯的命□运——生死存亡在此一举。

到了这样一种时刻，俄罗斯要拯救自己就应该毫不犹豫地摆脱西方，走自己的发展道路。一种健康的和理智的孤立政策可以防止俄罗斯变成西方的原料附庸国，可以振兴俄罗斯工业实力和保存俄罗斯民族国家、文化、生活方式及其威望。

应该抛弃这种东西方之间的矛盾可以通过让步和妥协的方式来解决的幻想。这种矛盾根本无法解决，因为东西方是完全不相同的。其根据是它们的地缘政治目标和志向完全是不相容的。现在时机已到，应该公开承认和宣布，美国和西方不是，也不可能成为俄罗斯的战略伙伴。对于俄罗斯来说，美国和西方不仅是地缘政治的竞争者，而且还是对手。现在我们大家应该明白，正如我们与西方几百年的整个历史所证明的那样，西方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会与俄罗斯不和。西方从来不需要一个强大和繁荣的俄罗斯。西方总是害怕俄罗斯强大和繁荣。根据国际关系的现实情况，俄罗斯应该重新架构自己的对外政策，改变方向，由面向西方转为面向东方和南方。

俄罗斯现在应该尽快确定社会改革、重建和发展的全新的意识形态框架。对于俄罗斯来说，唯一正确的选择是选择有利于俄罗斯发展的国家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因为它承载了俄罗斯向实现新的战略发展的全球纲要的历史转变。我们设想，目前只有保守主义的国家思想才能够成为真正给俄罗斯带来期望和未来的思想。

美国、西方和东方国家之间的第四次世界大战已经是事实。它只能以一方的胜利为终结：强者胜。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 冯育民 译）

---

[1] 〔俄〕弗·伊·多博林科夫，莫斯科罗蒙诺索夫国立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哲学博士、教授。

苏联解体20年

——社会主义失败原因反思

〔德〕理查德·克勒尔 [1]

一 苏联——历史上的“破冰者”

在谈到苏联解体的时候，我们首先应该想到的是苏联的重要性。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苏联是一个“破冰者”。十月革命拉开了新时代的序幕。在这样一个时代中，资产阶级代表了革命的变化和进步。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宣告了这个时代的终结和工人阶级、社会主义时代的到来。苏联的存在证明，工人阶级及其同盟不仅能够战胜既有政权，而且能够掌握政权。工人阶级同样可以利用掌握的政权对抗世界反动派的先头□兵——□所谓战无不胜的德国法西斯主义。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苏联千疮百孔，但仍然能够经受住了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孤立苏联的考验。

作为德国人，我们十分感激苏联没有报复我们。苏联当时的原则是：“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希特勒们来了又走了，但是德国人民和德国还要继续生存。” [2] 在苏联的援助下，民主德国才有可能没收和剥夺大资产阶级及大地主的权力。这些力量曾是让希特勒掌权的决定性因素。

在苏联的帮助下，民主德国得以成功建立并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即使在苏联共产党领导层背离社会主义方向时，苏联仍是帝国主义的一个阻碍，苏联能够对抗帝国主义对工人阶级和世界人民的武装侵略。那些批判苏联内部修正主义的政治力量，没有充分考虑到这一点。今天，我们必须对这一点进行自我批评。除此之外，我们不能沉溺于理想主义，而要坚持历史的辩证唯物主义。以下我们对苏联共产党领导层的批判，本意不在于伤害俄国人民，而是对失败原因的

一种必要讨论。这也是所有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者都必须承担的责任。

二 是什么造成了苏联的解体？

我们把对苏联解体原因的讨论的重点放在意识形态和理论问题上。当然，错误的思想本身还不足以引起物质社会条件的直接改变。然而无论如何，社会主义的阶级意识确实具有重要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者通常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推动社会发生剧烈变动的条件。尽管如此，仅仅通过获取政治权力，粉碎旧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以及没收资本家财产，仍然不能保障无产阶级专政。要想实现和发展无产阶级专政，需要工人阶级具备较高的阶级意识，不仅要与社会条件的发展步调一致，而且要走在这种发展的前头以便引领和控制发展的趋势。如果阶级意识的发展受到系统上的阻碍，那么社会主义的建设将会停滞不前；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就会复辟。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存在短缺，正如马克思所描述的，社会主义带有“旧社会的胎记”。这些“胎记”提醒我们，虽然工人阶级已经取代资产阶级掌握了政权，但工人阶级还未超越资产阶级的思想、习惯和传统。这就存在资产阶级再次积蓄力量的危险，至少苏联的解体证明，资产阶级可以重新掌权。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资产阶级有自己强大的朋友：除了帝国主义国家的物质、政治和宣传途径（包括秘密服务、基金、非政府组织等）外，这些资产阶级还有两项优势：其一，资产阶级拥有商品及其相应的私有产权。只要商品和商品生产存在，资产阶级思想的发展就是自发的、不可避免的。当帝国主义国家不断对社会主义实施资产阶级思想渗透时，情况更糟。而且，社会主义国家需要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从事商品生产，直到生产的社会化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使得生产资料占有的社会化既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

一方面，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低估了由商品、商品生产和私人所有制对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威胁；另一方面，苏联高层认为苏联的社会主义是不可逆转的。这两个方面弱化了苏共的警惕性。

三 四项世界基本矛盾及苏联共产党领导层的处理方式

面对德国法西斯的进攻，苏联已经做好了准备。1933年之后，苏联加强了这种预期准备，苏联人民作出巨大牺牲，建设重工业和消灭“第五纵队”，都面临严峻的时间压力。伟大的卫国战争需要所有爱国力量形成一个联盟。苏联在卫国战争中失去了很大一部分斗志昂扬的年轻人和物质基础。战争胜利后，苏联需要召集所有国内力量，改变方向，进行一场“文化革命”。然而，这却受到来自上述经历了艰苦战争和牺牲的阶级的联合抵制。在接下来两方的争斗中，以赫鲁晓夫为首的机会主义集团获胜。

于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尤其是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于1960年通过的《莫斯科宣言》（一个折中方案）释放出一个信号，即苏联共产党领导人以修正主义的态度来解释和处理世界上的决定性矛盾（当然在这里我们可以用一种粗略的、简单的方式来看待它）。1963～1964年，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领导人之间展开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争论（被无数的中国报纸出版转载——如《人民日报》、《红旗》等），其中包括关于那个时期的四项基本矛盾的辩论。

首先，我们将论述这四项矛盾及其在1956年之后的发展，然后我们将介绍两种其他矛盾，它们在那个时期还没有充分发展或还未被提及。

1.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

占主流地位的观点已经不再把帝国主义视为敌人，不再认为应当反对和打倒帝国主义，相反，把帝国主义视为可以“和平共处”、“和平竞争”（苏共二十大）的对手。

修正主义高估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认为帝国主义有利于避免战争。他们认为，与帝国主义国家进行贸易并不必然导致倒退，并不会对社会主义的继续存在造成相当大的威胁，而是一种正常的行为。苏联还毫无保留地允许不断依赖来自美国和加拿大的小麦进口。其结果就是德国的帝国主义势力不仅成功地将社会主义阵营的一个重要部

分（民主德国）分裂出去，而且得以开启一个在世界主要帝国主义国家之间重新洗牌的新阶段。

如果帝国主义不再作为敌人出现，那么社会主义国家就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参照物：建立社会主义是为了反对谁？将民众联合和动员起来又是为了反对谁？结果，帝国主义伺机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意识形态的、政治的、经济的全面渗透。接着，社会主义国家中个人的财富幻景、“西方生活方式”的优越性、商品拜物教为帝国主义“宣传机器”的有效运转创造了前提条件，从而逐渐削弱了社会主义阵营的斗志。

一方面，苏联高估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另一方面，苏联减少和避免对帝国主义的打击，两者在相当大程度上增加了苏联社会主义解体的可能性。

2.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

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引用阶级调和论，确定了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和平过渡”的基调。结果，这些国家革命的活力被轻视，无产阶级变得无力并最终将政权移交给资产阶级，后者甚至都没有料到前者能够如此和平自愿地交出政权，如1973年的智利和1980年的土耳其。帝国主义国家内部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减弱，意味着帝国主义不用再多费心对付内部敌人，可以有更多的精力对付外部的敌人，并且可以毫无顾忌地攻击社会主义阵营。“和平过渡”理论逐渐削弱了无产阶级的国际性，而这却是防止苏联解体的最强大的力量。

“和平过渡”理论是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欧洲修正主义发展的一个最基本构成要素。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西欧最强大的几个共产党公开断绝了同社会主义阵营的联系。修正主义者在政府和工会中与社会民主派达成和解，使得先前的革命政党——法国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和西班牙共产□党——□内部的机会主义大获全胜。人民阵线的传统遭到了背弃，取而代之的是资产阶级的取向和立场。

3.被压迫国家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

当时苏联共产党领导层把各国风起云涌的解放斗争看成对世界和平的干扰和威胁。苏联认为，应该优先考虑同这些国家的政府建立联盟，而不是支持这些国家的人民、革命力量及其政党。修正主义者放弃了新民主主义的观念，即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同所有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并把它作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结果，苏联政府中那些倾向以社会主义阵营为筹码来改善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的人联合起来，他们的观点占了上风。这种思潮强化了这些国家资产阶级的力量。因此，曾是无产阶级后备军的发展中国家群众，再度变成了帝国主义的后备军。这也是导致苏联垮台的重要因素。

4.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及各垄断资本主义集团之间的矛盾

帝国主义被简单地等同于美帝国主义。这一观点忽略了其他帝国主义大国，虽然这些国家在1945年以后日渐依赖美帝国主义，但它们与美帝国主义之间仍然存在着矛盾。苏联的领导人低估了一个重要事实：正是这些矛盾，迫使不同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垄断资本集团就市场、资源、投资领域的分配展开竞争与合作，并会因此增强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攻击性。苏联的外交政策不仅没有利用这些矛盾，反而变成了一种妥协的政策。

从一个德国人的观点来看，1970年的《莫斯科条约》意义重大，苏联在没有和民主德国协商的情况下同联邦德国签订了条约，没有依据国际法正式承认民主德国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因此，苏联接受了德国帝国主义者的政策，这一政策得到公开阐述：通过“恢复友好关系”，更加靠近或“从内部攻破堡垒”来改变。有了上述“缓和”政策作铺垫，苏联在1975年的赫尔辛基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欧安会）上遭到彻底失败。在那次会议上，帝国主义获得了充足的空间对社会主义阵营施加影响。它们巧妙地利用并加深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

结果，东欧国家和苏联之间为反对法西斯主义而形成的联盟瓦解。联盟的瓦解是导致苏联解体的重要因素。

这些就是上面引文中已经提到过的“关于总路线的论战”中的矛盾。现在我们将介绍两个1963年没有讨论过的矛盾。

四 苏联解体是如何发生的？

苏共领导人试图孤立中国和阿尔巴尼亚的革命党，便开始分裂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政党之间的意识形态之争上升为国家之间的冲突，包括军事、政治和经济性质的侵略行为，如撤走经济和军事专家，以及苏联在政治和军事上支持印度对抗中国。

苏联共产党对“南斯拉夫道路”采取调和态度。结果，“民族共产主义”形成了，农民、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等反动力量增强了。同时，苏联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施加支配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压力（例如，1968年占领捷克斯洛伐克）。苏联共产党丧失了革命的立场，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主义力量迅速强大起来，并转而投靠帝国主义，如1956年的匈牙利和波兰，以及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因此，军事干预成为当时苏联避免社会主义阵营分裂的唯一方式。这种方式削弱了社会主义作为人民群众和独立国家追求自由解放的特有组织形式的说服力。社会主义阵营内的离心力增强，这也导致了苏联的崩溃。苏联无力抵制因1975～1982年的国家债务危机带来的日益增长的帝国主义的压力。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波兰成为巴黎俱乐部的一员。1981年，波兰欠帝国主义国家270亿美元的债（其中欠民主德国4.6亿美元），同年，波兰申请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员。随后，波兰对帝国主义的颠覆性活动采取完全放任自由的态度，准备适时与天主教权威及团结工会进行合作。匈牙利于1982年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顺便说一句，南斯拉夫1946年就已成为该组织的成员。

五 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矛盾

苏联的解体迫使我们不得不承认，即便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形式的国家，没收了资产阶级和大地主的资产，实行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也不能彻底消除阶级，解决阶级矛盾。1963年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论战》写道：“社会主义社会将持续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其间阶级和阶级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斗争仍将继

续。仅仅在经济领域开展社会主义革命（生产方式所有制方面）是不够的。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也必须有一场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需要同资本主义展开长期的斗争，才有可能获胜，这个时期不会是几十年，社会主义在任何地方的胜利都需要一个到几个世纪。因此，对于斗争的持续时间，社会主义人士要做好长期准备。对于实现社会主义的困难程度，最好把这项任务看做艰难的。这样的思想和行动方针百利而无害。无论是谁，看不到或不能完全领悟到这一点都将犯大错误。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有必要保持无产阶级专政，并将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如果阻止了资本主义的复辟，就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为共产主义的实现创造条件。”

如果否定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那么无产阶级是唯一革命的阶级的原则就可有可无了，唯一能为建立无阶级的社会提供前提条件的力量——无产阶级——便无能为力了。赫鲁晓夫及其继任者提出修正主义理论，把苏共定义为“全体人民的国家和党”，最终导致苏联解体就证明了这一点。只要阶级差异被掩盖起来，资产阶级复辟力量的增长就不可避免。一旦无产阶级丧失了其历史使命，就会导致党脱离工人阶级，最终引起党的衰落及工人对党的冷漠，促使党内成长起来的反革命分子接管党，如戈尔巴乔夫以及最后的叶利钦。

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趋于分裂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却对马列主义进行了重大的发展，认为不能轻视人民内部的矛盾。社会主义兄弟党完全没有注意到毛泽东1957年著作中对斯大林时期社会主义的分析。当然，如果共产党不区别对待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那么每一个同帝国主义国家有联系的人都会被怀疑，就像1936～1938年苏联的“大清洗”一样。将矛盾轻描淡写，或隐藏和忽视矛盾，社会都会变得麻痹和停滞不前，这并非外因造成的。苏共对人民隐瞒政府的缺点和不足，而不是动员群众来克服这些缺点和不足。结果，民主集中制蜕变为官僚集权制，党成为无能的官僚机器。

“社会主义不可逆转”的神话、“进入共产主义”的幻象和妄自尊大麻痹了革命者，1980年时的赫鲁晓夫就是一个案例。

随着现代修正主义大行其道，人民群众阶级意识的发展遭到了系统的破坏。结果，当政府采取弱化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措施时，几乎没有遇到阻力，包括：

——上层领导越来越脱离人民，人民的权利减少了；

——经济计划被强制推行，不给群众主动性地发挥提供余地；

——取消集体制，支持私人利益（如公有设备的分拆），削弱农业集体所有制；

——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作用领域（农业、对外贸易）无限扩大；

——与此同时，还存在一些“左”倾错误，比如在生产尚未社会化的情况下过早地实行社会主义化。民主德国的一些小型手工作坊还没有达到可以被组织为联合企业的时候，就被社会主义化了。

受篇幅所限，我们在此只是概括了苏共二十大是如何确立了苏联解体的发展方向的。我们不应该忘记，苏共二十大上对矛盾的错误对待渐渐演变成了所谓的反对“个人崇拜”，损害了社会主义运动伟大领袖斯大林的名誉，并因此破坏了社会主义的声誉，尤其是社会主义在年轻人中的声誉。苏共二十大没有系统地总结无产阶级专政第一个10年中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没有进行深刻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及对错误的调查研究，而是采取了对所有叛变者和反革命分子宣告无罪的做法。由此，各级共产主义者都解除了思想武装，戈尔巴乔夫得以为瓦解苏联进行有组织的准备。

六 结语

为了防止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走向失败，我们应该对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及社会主义阵营内的矛盾进行分析。为了联合所有国家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我们也应该认真地分析并坦诚地讨论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帝国主义国家内部无产阶级的利益以及依附于帝国主义的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利益之间的矛盾。

如果我们的联合建立在对上述矛盾的充分理解的基础上，那么，我们就能够战胜帝国主义和金融寡头。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 李静 译）

---

[1] 〔德〕理查德·克勒尔，《共产主义工人报》记者。

[2] 《斯大林全集》第14卷，德语版，1942，第266页。

社会主义消亡：社会主义长存

〔德〕米夏埃尔·布里 [1]

在（苏联的）政治重组改革中，国家社会主义（state socialism）的终结再一次展示了人道主义视角，其开始是以不惜任何代价结束残暴统治的意愿为标志的。正是这种双重目的为国家社会主义的历史画上了一道红线。然而，单纯考察这些动机，与单纯考察那种在1989～1991年之间终结的濒危的社会形式一样，都是不能说明多少问题的。正如黑格尔所强调的那样，单独的动机或结果不能构成历史的真实，只有这两种因素结合在一起才能形成真正的历史。只看意图而忽视了历史进程的客观内容的人，只看衰亡时刻的表面现象的人，都不能理解重大社会现象出现以及持续存在的原因。

20世纪初期，建立基于中央计划经济并被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合法化的共产主义一党专政，似乎是摆脱社会改良主义的妥协倾向和民主社会主义行动乏力的最后办法。整个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手里，整个社会从属于反对外部威胁，内部分工被置于其他替代办法之上，因为这似乎能取得大多数人的信任，同时使自己手中所支配的权力起到极好的作用。然而，不能卓有成效地将共产主义政权的这些形式进行分解，成了苏共社会主义垮台的原因。

怎样文明地利用现代性力量？怎样阻止无政府状态和破坏？怎样确保安全和稳定？以及新社会如何摆脱旧社会的羁绊？党国社会主义（state party socialism）提供了一种解决办法：所有的社会力量严格服从于一个中心。未来社会每个人和所有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将从这里逐步成长起来。因此，显而易见的是，党国社会主义绝不会仅仅因为“偏离”而在社会主义的历史中被抹掉。它当然具有社会主义的一些特征，并且作为一种社会主义实践而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在其中，社会主义远景的一些要素变成了现实。高度的社会公平，以及社会在满足人们工作、对未来的信心、教育或健康等基本需要方面所负有的

责任，都属于这一范围。同时，这种国家社会主义也有自己的未来。

虽然如此，党国社会主义所提供的这种解决现代社会问题的办法，却是一种破坏现代社会最重要基本特征之一的方法，即破坏了持续更新重建其基本要素的能力。对此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关于资本主义的部分曾有过论述。通过权力的绝对集中来处理所有公司和企业的财产，也就是放弃革新重建的机会。仅仅允许一个集中化的政治权威存在，一切岗位都被禁止有闹独立的倾向，就很难有什么现实的适时变革的可能性。

现代社会从来自经济、政治和公众方面的社会力量的自由和自治中获取其更新的潜力。经济、政治和智力主体的自主权以及他们的合作和竞争是创新和提高效率的条件。不同国家和制度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及军事上展开了竞争，只有能够适应这种竞争的国家和制度才能够存续下来。同时，这些条件也可能成为无限制的资本控制、独裁、军国主义和种族主义的诱因，以及极大灾难的导火索。

新社会主义左翼的任务是制定这样的目标和手段，它们优于那些从个人生活角度出发的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以及长期的社会发展。因此，它必须超越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创造自己更高的生产力、自己的社会联盟、具体项目以及持续有效的机构，从而保证促进解放的转型的实现。一种可以击败资本控制的转型政策应当包括以下主要目标。

（1）摆脱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的控制，同时取消发展中国家的公共债务，引入税收以缩减国际金融投机，创建一种新的世界货币管理体系，取消所有形式的关税，逐渐推行最低限度的全球社会及环境标准。

（2）通过需求导向型基础保险、健康、教育及运输等领域内有效的公共产品，超越资本统治的市场，更好地满足公民的基本需求。与自由贸易相比，必须优先规定基本权利和公共生存权。

（3）参与式社会民主的建立，从社区层面开始直到全球层面，

使所有经济活动的框架条件与中下阶层人们的社会利益相一致，并使决策受到其参与的影响。

（4）着眼于维护社会中下层以及后代（社会及生态持续性原则）的利益，通过被雇者以及所有直接利益相关者参与公司基本决策的办法，实现财产的社会责任。

（5）赶走美国军事帝国的力量，将地区组织转变为和平力量，以联合国组织（UNO）为基础，在无条件尊重国际法的前提下开展政治、经济及文化建设，以阻止危机。以法治国家为基础，按照国际刑法及程序的规定，打击恐怖主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 李静 译）

---

[1] 〔德〕米夏埃尔·布里，德国柏林罗莎·卢森堡基金会，社会危机分析研究所教授、博士。

苏联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从斯大林主义向21世纪社会主义转型的失败

〔墨〕海因茨·迪特里奇[1]

列宁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成为苏联与资本主义的分割点。在这一模式下，市场和国家之间的辩证关系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由国家取而代之。当这种体系的作用有所失调时，列宁又采取了新经济政策（1922年）：这是一种市场处于社会主义国家控制下的混合经济制度。但是，我们不知道列宁对一个落后国家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转变的最终经济模式是怎样定义和设计的，因为斯大林很快就结束了新经济政策，转而实行雅各宾式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可悲之处在于，这一政策的演化对共产党和苏联社会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从而导致了苏联的解体。

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打开了潘多拉魔盒，批评斯大林的统治模式，谴责既往体制对人权的侵犯。这是朝着更为“民主”和更具“参与性”的社会主义道路迈进的修正主义阶段的第一步。但是，第二步未能跟上。苏联权力机构的修复和创新能力以及苏联共产党本身在一定程度上都遭到了削弱，导致这一制度处于一个长期的停滞阶段，以至最终毁灭。

1964年，勃列日涅夫在军工联合企业以及党的官僚体制下上台，他的使命是维持现状。在小心翼翼地开放了思想后，勃列日涅夫又开始转向斯大林化，并最终几乎完全转向了新的斯大林主义。勃列日涅夫去世后（1982年），前克格勃首脑安德罗波夫接任，他以个人的能力继续推进新斯大林主义。安德罗波夫本人是这一制度的核心。在1983年6月15日苏共中央全体会议上，他认为过去的体制有民主化的需要，并指出：“对于一系列重大问题，实践科学并未提出与先进的社会主义原则和条件相一致的充足的和必要的解决方法。”

其中，他提到了生产力的效率和质量，以及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理论的价值构成的原则。在公平方面，苏联社会科学不可能提供必要的解决办法，从而实现将20世纪的社会主义升级到21世纪的社会主义超级大国的目标，因为它已经在30年代被斯大林主义破坏了。从那时起，它不过只是一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院哲学。正如革命者米盖伊尔·尤金（Michail Rjutin）在1932年的宣言中写道：“真正的列宁主义现在已经变成违法的。它作为一种被禁止的主义而存在。这勾勒出苏共理论危机的深度。”

安德罗波夫受命解决这一濒危体制的危机，但是，当把为党和社会而提出的相应的民主化建议提交给他时，他却又决定，除非人民的生活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否则只能对这些建议进行讨论。他活着的时候是不能够看到这些条件的实现了。

苏联权力阶层的当权派让勃列日涅夫掌权是为了保障新斯大林体制的现状。尽管知道安德罗波夫是一位真正的改革派，但是他们仍然允许他担任相同的职位（苏共总书记）。如何来解释这一悖论呢？答案就是，安德罗波夫是一个病入膏肓的人，只有一到两年的寿命了。这么短的时间内，任何东西都不可能被民主化。

当权派用同样的方法对待安德罗波夫的继任者康斯坦丁·契尔年科——同样也是一位改革派，也身患重病，他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改变现有体制。结果，由斯大林统治模式创建的苏联政治体制的两个主要因素——党和社会的僵化——得到了延续。这种体制一直延续到苏共在赫尔姆斯决定让另一位继任者——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上台才结束。

从1964年开始，解决新斯大林主义体制严重危机的任务一直推迟了这么多年，现在由戈尔巴乔夫接手去实现一种更高形式的社会主义的转变。尽管戈尔巴乔夫站在了苏联立场的对立面，但是，转变过程中的许多历史证据使我们确信，戈尔巴乔夫是真的想改革这一体制而不是废除它。不管真假，这种观点表明，他不仅在苏联，而且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都得到了坚定的共产主义改革派的相当大的支持。但是

戈尔巴乔夫不是列宁，他不能像列宁那样，在没有任何历史角色模式的情况下，创建一种向不同文明转变所必需的制度。苏联共产党也不像以前那样处于革命时期。因此，历史上的第一次尝试——从一个高度集中的、军事化的、封闭的社会主义国家转变为高级的、进化的第四阶段的、21世纪的社会主义——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合法继承者、科学社会主义以及列宁的苏维埃模式，最终失败了。

戈尔巴乔夫在改革方面没有制定明确的战略规划，也就是说，没有用21世纪社会主义的科学范式（即按照其决定性的机制：社会主义生产的新的、后斯大林主义模式以及参与式民主的新的上层建筑）来指导转型过程。缺少了这样一种范式，就不可能对转型进行系统的规划，并向民众解释。转型过程因此就变成了一场错误的试验过程。旧的制度崩溃，却没有可接受的新制度来代替，以树立民众信心，保证他们的忠诚。也没有能够为转变提供战略指导的独立的大型机构或先锋。尽管如此，却有想结束社会主义的政党精英存在的重要部门。改革的缔造者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就是他们的代表。他在《雪崩》一书中写道：马克思和列宁的社会主义是乌托邦，因为对“自然界不存在的”事物的预测是不科学的，并且在自然界不存在公平。因此，对“建设一种社会主义公平和人类平等的社会”的信念是一种幻想。

对人类社会而言，苏联模式“内爆”向我们提出的问题是：从20世纪的社会主义向21世纪的社会主义转变的中国模式能否成功？苏联模式的失败之处在哪里？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 李静 译）

---

[1]〔墨〕海因茨·迪特里奇，墨西哥城城市自治大学博士、教授。

越南学者对苏联解体和社会主义前途的看法

〔越〕陈原越[1]

一 对苏联解体的看法

伟大的俄国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一个有了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新纪元。俄国在世界上第一个建立起社会主义国家，在完全没有先例的条件下，它只能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本国的实践，自己去找到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的解决办法。尽管这样，俄国之后建立的苏维埃联邦共和国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成就，是所有人甚至包括那些有反共倾向的人都不能否认的。然而，一个20年前至今仍然依然存在的问题是：为何如此强大的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竟那么快就土崩瓦解了？导致这个结局的根本原因是什么？社会主义在整个世界的发展前景，或者至少作为与资本主义的抗衡力量的前景如何？

有很多研究项目专门对苏联现实社会主义的垮台进行了慎重而仔细的分析和研究。尤其是俄罗斯学者，他们从不同的视角来考察这个问题。他们不仅注重分析客观和主观原因，而且还从俄罗斯内部及其外部原因进行了分析。内部原因产生于苏联现实社会主义的出现、形成及其存在的各个发展阶段。即使在社会主义取得全面胜利的阶段，也已经存在最终导致这一现实社会主义模式的危机和解体的一些隐患。此外，就是由于戈尔巴乔夫作为总书记的苏联共产党内部出现了严重错误。在苏联解体后，原党内领导成员对戈氏的政治行为逐个进行了剖析，得出了正确的评价。外部原因是社会主义的敌对势力的破坏。那时，苏联被认为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堡垒。那些在“两个阵营”和“两极”时代提出的口号，体现了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希望通过经济、政治和社会的进步，来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而最后没有成功，甚至还归咎于现实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与它本身的很多缺点。之所以发生这样的情况，是由于当时的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只注重形式，

过于渲染社会主义进步的方面。例如，在所有制方面，只宣传已经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每一个人都能分享国家带来的东西，而经济政策则没作什么调整，使集中、包给的计划体制与时代的发展趋势不能相符。与此同时，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在很多方面不断地进行调整，尤其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者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从而使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得到缓解。另一方面，为了消灭全世界的社会主义，帝国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帝国主义对苏联进行疯狂的反动破坏活动，在不能通过军事行动达到目的的地方，他们通过其他手段，如分离、和平演变等，并最终通过异化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等手段，来达到破坏的目的。

越南学者对导致苏联社会主义垮台的原因的看法，我们暂且归为两个方面，即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内部原因来自三个方面：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此外，也有人认为是由于原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叛变造成的，或者更准确地说，这是戈尔巴乔夫清除苏共、瓦解苏维埃联邦的阴谋和行动的结果。

1.认为是政治原因的观点

可以说，政治方面的原因是最根本的原因。它涉及一系列问题，如苏联共产党的领导路线、已经存在了74年的政治体制的实质以及1985~1991年改组的后果等。在越南俄罗斯合作研究项目“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中，俄罗斯学者舍甫琴科（V.N.Sepchenco）认为：“社会主义苏维埃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的特征就是一党独裁，即：党对建设社会主义的全部过程进行领导，包括经济、文化、体育等各个方面，都被当然地认为是由党来领导。那是一种社会发展总动员模式的特征。”[2] 而我们认为，党的错误并非由于一党独裁的特性，而且，总动员模式在一段时期也曾发挥了作用。例如，党领导了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发展和伟大的苏联人民卫国战争的胜利。然而，自60年代以后，当苏联宣布建成社会主义并开始转向新的时期——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从那时开始，情况就发生了变化，进而导致理论方面的变化。那就是：必须把这种新的过渡阶段理解为一种并非“自上而下”的革命过程，而是要让人们知道：这正是他们自己的事

业，以创造出来自“下面”的集体力量。但这一点没能实现。而且，官僚和个人崇拜变成普遍现象。正如学者吴欢（Ngo Hoan）所言：“苏联共产党成为最高权力机关，党和政权混淆，由此产生包办、代替国家政府机构和群众组织的现象，使得党的机构臃肿，工作效率低下，而不能只集中在自己的工作上。”[3] 这一观点类似于舍甫琴科的看法：“在（党的）很多缺点中，有一点是根本性的，那就是全部国家权力执行机构的老化、党和国家机构的全权包揽、对党进行真正监督的方式的欠缺等，必然将引致新的唯意志的、越来越危险的行为。”[4] 独断和专权必然会导致放松检查和监督，极大地限制了人民的民主权利。长期下去，社会辩论的气氛丧失了，而党的主张，即使是出于官僚机构的、唯意志的观点或者命令，也依然被认为是正确的、英明的。

说到苏联时期缺乏社会辩论，学者陈登俊（Tran Dang Tuan）认为，苏联在社会辩论方面的实践，给了我们两点教训。第一个教训是：尽管有一个庞大而系统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有很多高水平的学者，但对各种路线和政策并未进行真正的社会辩论。而通常是，各种重要文件的起草，都是由某个领导人的某些领域的几个人组成的小组，来指导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下属研究机构来进行。即使在由苏联共产党直接领导的科学院——这个在研究和形成文件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机构——的内部有很多不同意见，也未进行深入的民主讨论。还有一个特点是，把起草文件的任务交给哪个研究机构，很大程度上是看这个机构的领导人是谁。勃列日涅夫总书记主要交给中央委员会的机构，而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则几乎完全不相信这个机构。在戈尔巴乔夫时期，直属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科学院几乎只是一个培训机构。应该说，缺少真正的社会辩论，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已经使得苏联领导集体不能把握社会中潜在的要求和挑战，之后逐渐变成险情，最后导致垮台。第二个教训则更加沉痛，那就是：当面临经济的差距加大、当整个社会认识到社会主义如果创造出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就能站稳和发展（列宁认为这一点是事关生死存亡的原则），因而需要提出一些新的主张和路线的时候，戈尔巴乔夫集团不仅没有放弃老一套（准备政策的过程依然缺乏科学论证），而且还犯了新的错误：

使社会辩论变得不可控制、把各个起草机构的科学和论证工作变成一种无政府状态的俱乐部活动 [5] 。这种无政府状态，有来自改组时期降低了党的领导作用方面的原因。越南政治家（同时也是社会科学家）阮富仲（Nguyen Phu Trong）认为："在实际工作中，他们不关心党组织的巩固，不坚持党组织和组织内生活，忽视国家的领导，通过各个党的组织使得党被瓦解，纪律松散，党的组织不能对党员进行检查和监督，党的基层组织的战斗力过于弱小。" [6] 因此，在党的领导路线中，党包揽国家的责任、各级党委放松对这些机构的领导等，都会导致无组织状态。这不仅使党的战斗力被削弱，更为严重的是，使得党的系统被瓦解。

在党的领导路线中的最为重要的一个错误，是排斥马克思列宁主义。通过改组，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中央委员会逐渐地把那些忠诚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排斥在外。而且他们还认为，这个学说已经过时，甚至是错误的。正如阮富仲所说："他们忽视了阶级斗争，而只强调全社会的共同价值；忽视无产阶级专政，而强调缓和、人权；认为资本主义已经改变了本质；修正了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只强调民族问题；忽视帝国主义，而只强调公开性；忽视党内的集中纪律……导致现实社会主义的垮台，党的思想被瓦解。" [7] 对这一严重后果，阮富仲认为："正是因为错误地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且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做法：包括在落实基本原理方面的错误，以及对唯物辩证法的运用的错误。" [8] 而学者阮志米（Nguyen Chi My）认为："不理解、不清楚科学使命，欠缺有效的纲领，这意味着教条、急躁地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导致马克思列宁主义'脱离实际'。正是这一点，使得苏联共产党背离了社会主义原则。" [9]

政治原因还存在于政治系统中，这是苏联现实社会主义和共产党垮台的深层原因。从这个党主张进行改组开始，这一原因就变成了直接原因。这个原因就是：官僚作风。舍甫琴科认为："党和国家的官僚作风是杀死社会主义的根本罪人……在老百姓正在为政治民主和自由进行斗争的时候，当权的官僚们已经默默地靠手中掌握的权力，非法为自己搜刮财产，使全民所有制中最肥的东西突然变成了无主之产。在通过暴力手段消灭了党和苏维埃政权之后，这种非法得来的财

产就得到了法律的承认。”[10] 我们认为：“正是政治系统中的官僚主义，粗暴地践踏了民主集中制。这一点，即使在政治系统看起来很稳定的时期，也已经很明显地暴露出来了。它被那些极端分子、对社会不满分子所利用，用以丑化党、歪曲党、诬告党，使党的清名和威信受到严重损害。”[11] 以上不法行为，致使党员的道德和生活作风退化。他们只关心地位争夺，贪污、贿赂、滥用职权，导致脱离群众，失去群众对党的信任和拥护。总之，正是共产党人自己毁了自己，而且还为外部原因的产生创造了条件。结果不仅使党本身遭到毁灭，而且使整个国家的体制都毁于一旦。

另一个政治方面的直接导致社会主义垮台的内部原因，就是20世纪80年代苏联的改组。刚开始的时候，革新和改组的主张是必要的，其目的是克服经济长期停滞不前的状况——这也被认为是深远的原因。阮唯贵（Nguyen Duy Quy）教授认为，苏联共产党选择从政治领域开始改组是错误的，因为“这是一个敏感领域，尤其是政治改组以民主、公开和无原则作为钥匙的时候”[12] 。这一错误引出了一系列其他错误，从以克服不足为目的变成深远的原因，党越来越陷入了改组的泥潭。在党的二十八大的时候，人们已经不再提民主集中制，而是一提到民主就联系到政治多元化。起初是一些观点的多元化，之后是政治的多元化，它的必然结果就是多党。关于这个问题，阮富仲指出：“于是顷刻间，几十个反对党，然后是几百个、几千个对立的政治社会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党的内部也出现分化，分成许多对立的帮派。”[13] 我们认为，多党派以及多个政治社会组织的出现，并非没有原因，也不一定是国家的灾难。例如，在中国，并非只有一个党，但依然可以走社会主义道路。问题在于，各个党派之间、政治组织之间的斗争，是否能为国家的发展指出正确的方向？或者仅仅是为了其他目的，甚至是通过外部的破坏势力的怂恿来对国家进行破坏。苏联的改组导致苏联共产党内部为了不同的目的产生矛盾和斗争，这是无比巨大的灾难，它破坏了党的内部团结和统一，削弱了党的领导能力和战斗力，其后果我们都已清楚。

2.认为是经济方面的原因的观点

导致苏联社会主义解体的经济原因来自于内部，其中包括深层的原因。政治经济学学者们对这些原因的分析已经很透彻，我们这里只集中介绍那些对此进行评价的观点，涉及三个方面的基本内容：所有制方面的错误、违反经济运行规律的错误，以及经济管理政策方面的错误等。

可以说，所有制方面的错误源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解和运用。弗伊科甫（M.I.Voeicop）认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明显包含了政治内容。在理论上，可以很简单地归结为：社会主义是一种比资本主义更加公平、文明和民主的社会。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在历史发展上的继续。两者并非并行的一个历史阶段，社会主义是后资本主义。"[14] 另一个学者普莱蒂尼科甫（Iu.K.Pletnicop）也同意这一观点，他在越俄合作研究项目"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中说："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区分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后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形态被马克思确定为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15] 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经常等同于完全的共产主义，在那里，大家对社会公平的理解只有一个，就是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

然而，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列宁曾指出："不仅要推翻剥削、地主和资本家，不仅要取消他们的所有权，还要彻底地消灭全部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权，彻底消灭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这是长期的工作。要想完成这一工作就要在发展生产力方面迈出一大步，必须战胜小生产（通常是消极的、长期而难以克服的）残余的反抗，要战胜这些残余的、旧的习惯的巨大力量。"[16] 可见，列宁关于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观点认为，过渡时期是一个无比困难和复杂的时期，它的具体时间跨度还不能确定。这一点，与此前苏联共产党关于过渡时期的主张完全相反，他们通过制订和落实在一段时间内的五年计划，取得一些还不能说是足够的成就，在20世纪30年代由于生产力发展速度超越了各个资本主义国家，从而就确定苏联是一个有很高的劳动效率的国家，那是急躁思想，对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的实质和长期性，没有进行科学论证。

20世纪20年代，在内战（1918～1920年）结束后，苏维埃俄国面临巨大的政治和经济挑战，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也必须寻找别的替代办法。当时，农民占俄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目的是解决社会主义工业（国有化）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尽管共产党的纲领（1919年）确定，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消灭商品经济、市场和货币，但是“代替商品交换的，按照列宁的观点，是正常的买卖和贸易”[17]。可以说，新经济政策很清楚地反映了列宁关于社会主义的观点的变化。据此，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不是采取仅简单地依靠热情，而是带着由革命产生的热情，通过鼓励个人利益，采取经济核算制度”[18]。俄国作为一个小农国家，未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因而农民问题受到列宁特别的重视。列宁指出，要解决好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之间的关系，目的是把农民吸引到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来。为了做到这一点，关键是把劳动合作社改造成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它的必然结果就是形成原始的社会主义，其所有制只有两种基本形式：国家所有和劳动者集体所有。普莱蒂尼科甫认为：“对于经济计划化的形式、生产者的命运、市场和价值规律等，需要有新的理解。”[19]

关于所有制，阮志米认为：“过于强调所有制的统一性（一元性），几乎只有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导致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变成社会化，到处蔓延，而生产力却很低。”[20]这两种经济形式在很长的时间内对苏联的经济产生了不良影响，无法避免“践踏私人所有并蔑视股份制以及其他各种经济形式……造成非经济垄断情况的增加以及官僚、贪污腐败、浪费现象”。这是由于“众人的爸爸没人哭”的所有制造成的，结果是大家“抢功避罪”，谁都有权发布命令、干涉企业的生产活动，而对企业和国家经济的经营结果，谁都不负直接责任[21]。

总之，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是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存在混合经济的社会特征，或者叫做多种经济成分，与此相关的是各种相应的所有制形式。“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研究项目的作者们认为：“在初期的社会主义，以及之后的完全的社会主义中，依旧保留了前社会主义的经济特征，其中包括商品生产、市

场、价值规律等。然而，这些特征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变成了特别的东西。它们被改造成比资本主义更新的制度，并且其目的是为了社会主义的生产（不是为了利益和超额利润，而是为了满足社会和人的需求）；而且，要使这一目的从属于国民经济的发展计划。确定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体制是正确的。社会主义的市场，是计划的工具，它允许更加准确地计算出社会和个人的需求，同时通过一些国民经济的自我调节对计划进行补充。”[22] 而苏联在过去很长时期，以国家的价格给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提供生产资料和交换商品，来代替有国家管理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然而，由于人的消费需求无论是量还是质，从来就没有一个限度。在老百姓不得不花很多的钱去购买资本主义国家的产品的时候，缺陷就暴露出来了。加上老百姓日常生活必需的各种商品都经常性的缺乏等原因，为那些国家内部的蜕化变质的人创造了机会，使苏联20世纪80年代末期商品严重匮乏。

按理说，按照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的观点，苏联党和国家应该继续发展和完善新经济政策，然而，由于过渡时期的经济政策方向的偏离，形成了“一种并不充分重视商品经济的特点和价值规律的经济体制”[23] 。而且，在经济管理方面，领导的官僚作风、行政命令越来越严重，最后导致了苏联社会主义的垮台。

3.认为是文化—社会方面的原因的观点

这方面有很多的观点，这些观点集中体现在《社会主义的理论与越南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本书中。这本书指出：“苏联违反了公民的自由、民主的权利；执行法律、纪律不严明以及社会公平方面的措施不足……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等，造成思想和社会意识形态教育工作脱离实际，理论与实际脱离；文化、精神生活陷入单调、困难的境地，不能客观地反映出真实的社会生活，而人民和社会对精神和文化生活的需求却不断增加。”[24]

自从苏联进行改组，提倡民主化和公开化，造成人民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失去信心，不受到党的监督的各种大小报纸泛滥成灾，为外国推行西化的反动措施创造了条件。就在党的领导内部，出现一批右倾

机会分子，他们总是为自己争取特权，侵吞国家财产以充实自己的腰包。正是他们的贪污腐败，造成了原本是平等和公平的社会主义的贫富分化。

4.认为是戈尔巴乔夫的叛变造成的观点

我们都知道，自从1985年戈尔巴乔夫担任苏共总书记开始，他的名字就与苏联的改组相联系。舍甫琴科认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戈尔巴乔夫改组的目标，包括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可以说，这种改组带有革命的倾向……刚刚开始改组的方向是正确的，都是为了推进科技进步、为国家提高经济效益，因而得到社会极大的热情支持。然而，之后戈尔巴乔夫又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正如他自己所透露的：那是为了打碎行政命令体制。实际上，他为无罪地侵吞国家财产的行为打开了大门，于是资本化运动开始了。改组从改变监督检查系统开始，发展成为整个社会系统的瓦解；从党和国家的机构，到宝贵的苏维埃体制的瓦解。对制度缺陷的批判，有的是真实的，也有莫须有的，全部变成了对制度的否定。政治改革导致了经济和社会的瓦解，同时也为反社会主义的势力创造了条件。" [25] 这种观点具有概括性。在《戈尔巴乔夫的背叛》这本书中，有5篇涉及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垮台。这些文章都认为，戈尔巴乔夫本人在这些灾难中发挥了主要作用。克格勃少将亚科维勒普（Etduard Iacovlep）的文章，揭露了这位总书记对苏联党和国家进行破坏的各种手段 [26] ，主要包括：政治领域，逐步换掉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苏联共产主义事业建设的人，代之以党内的机会主义分子、贪污分子及他们的同伙，抛弃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等；经济领域：对国家和集体财产进行资本化、股份化，制造出商品缺乏的局面，以达到否定国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等；文化社会领域：放松对媒体的管理，同时允许发行多种报纸，为戈尔巴乔夫及其同僚们的"民主化"和"公开化"进行鼓吹，这些报纸还鼓动分离主义，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内容。

值得注意的是，面对这样一个怀着破坏社会主义阴谋的总书记，苏联共产党的党员却显得无能为力，完全失去了保卫党的战斗力。这

一点有深远的原因：一方面，是对党内个人的崇拜；另一方面，是他们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致使所有的党员都相信改组事业；并且，他们还做好了惩治持不同意见者的准备，不允许社会上出现不同意见。

5.认为是外部敌对势力对苏联党和国家的破坏造成的观点

可以说，苏联一直被当成此前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堡垒，同时也是敌对势力破坏的目标。在长达几十年的冷战时期，苏联的敌对势力利用各种手段，包括利用新闻传媒和和平演变等，来达到破坏多民族统一的目的。虽然敌人很危险，是破坏集团的主要力量，是“披着民族服装的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力量……但他们外表看起来却都很安定，他们高唱各民族友谊的高调，却在里面却煽动着民族仇恨的炉火”[27]。这一力量为那些鼓动对国家进行破坏、污蔑社会主义制度和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间谍活动内外勾结。在改组的时候，美国人利用“民主化”、“公开化”的口号，发展苏联国内外反动势力。外部反动势力疯狂叫嚣：“要在俄罗斯的土地上，清除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统治地位，消灭主要干部和人民对于这一思想的信仰，推动反对这一思想的浪潮，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西方的生活方式传播进苏联，逐步消除并最终使苏联的社会成员全部放弃共产主义信念。”[28] 然而，“各个敌对势力如果没有得到阴谋破坏社会主义的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以及被他选进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包括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盖达尔等人作为后盾，以及当时共产党员缺乏政治意志等原因，那么，这一惨剧就不会发生。外部敌对势力加强破坏活动，很快出台了非常具体的计划。当时，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在最高苏维埃秘密会议上报告了西方瓦解苏联的计划，第一次明确由外国情报机构利用间谍来制造影响。”[29] 戈尔巴乔夫本人“不相信有这样的事情”，而是表现得很生气，并且表示相信西方，希望西方提供援助资金，以克服那些由他自己的破坏目的导致的困难。戈尔巴乔夫要通过展示对西方的“忠诚”，落实“民主化”、“公开化”来取悦西方，等待西方的援助。很多材料都证明，难以想象的是，戈尔巴乔夫这个阴谋家又幼稚到竟然相信以美国为首的敌对势力给他的“一张画饼”。“内鬼”和“外贼”的相互勾结，还通过美国的态度得以证明：美国不仅把戈尔巴乔

夫当上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当成俄国的第二次革命，而且还明确指出：“戈尔巴乔夫已经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30]

二 社会主义的前途

近20年来，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模式的垮台成为许多敌对势力宣传的主题。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的命运已经到头了，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将按照资本主义道路来发展。事实并非这样。在纪念俄国十月革命90周年的典礼上，越南共产党总书记农德孟在《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大思想照亮了越南民族的解放斗争和社会主义道路》的发言中说：“和其他革命一样，社会主义革命并非一帆风顺，而是要经历很多考验。有时要经过历史曲折，有时候暂时落入低潮。但是，人类最终一定将进入社会主义，因为那是历史进化的规律。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体系的垮台，只是现实社会主义的一种模式的垮台，而不是社会主义作为一个在历史进程中比资本主义具有更高的级别的社会制度的垮台。”[31]

说到社会主义的前途，首先需要明确的是，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的垮台并不是必然的，不能给社会主义的将来画上句号。其次，人类遇到的许多当前的和未来的问题，只能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得到彻底解决。这些问题包括生态问题、公平问题、平等问题、人类的民主和文明问题等，这些问题是资本主义及其之前的各种社会制度都解决不了的。再次，苏联和东欧的现实社会主义的垮台，对于确定21世纪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的目标和方法来说，是可贵的教训。在21世纪，人类历史上的伟大事件，是俄国取得了惊天动地的十月革命的成功，之后建立了人民政权，并确立了基本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保证生产中的劳动和产品分配的社会公平。遗憾的是，这种在列宁领导时期发挥了作用的、属于劳动人民的政权和所有制，并未得以继续弘扬，而是遭到歪曲，把国家引向严重的危机，最终使整个政治系统垮台。然而，从当前的原苏联和东欧等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来看，大多数人还是表示惋惜，并对社会主义制度有深厚的感情。一个旁证是，上述很多原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还是选择社会主义政党的人作为元首；而且，中国、越南、朝鲜和古巴以及很多其他按社会主义方向

发展的国家，继续保持了稳定和发展。总结教训并进行一些必要的工作，以使社会主义在21世纪有质的发展，直接关系到那些正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前途。

基于以上精神，越南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我们的党和国家正在建设的社会“是一个民富、国强、社会公平、民主、文明的社会；人民当家作主；有建立在现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的高度发达的经济基础；具有浓厚民族特色的先进文化；人们从被压迫、不公中解放出来，人人都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有全面发展的条件；越南各民族平等、团结、相互帮助、共同进步；有在党的领导下，属于人民、来自人民、为了人民的社会主义法权国家；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32]。然而，为了达到这些目标，首先必须要对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理论有正确的认识。换句话说，需要提出并回答两个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这是很久以前就已经提出的问题，并且在不断补充和完善的过程中，这一理论用来指导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多个国家和全世界建成。对理论的补充和完善，正是基于对社会主义的新认识。首先，要从总体上认识，带有抽象性，并把现实理论化，从实践中提取出来，直到形成越来越具体的、真实的社会主义，尤其是认识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33]。其次，要有对民族独立、自由、幸福等有理论上的认识，把它们看成社会主义的根本价值。在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必须得到尊重，并放在首要位置。

对社会主义的新认识的意义，就是要让理论有足够的力量，发挥超前的作用，引导社会主义走向成功。说到对社会主义的思维革新、认识革新以及越南的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学者阮文六（Nguyen Van Sau）认为：“首先，要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进行根本而系统性的研究，以做到对以下这些问题有一个科学和现代的认识：要明确哪些问题依旧是现实的、正确的、有保证的，这些问题对树立我们的世界观和意识形态是必需的；要对那些经典作家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提出的原本是正确和合理的但由于当前的实践变化变得已经不合理、要求有新的认识和新的发展的观点进行评析；对那些经典作家在提出时

就已经是不正确的、之后有所调整的论点，要进行批判性的研究以弄清事实，必须解放自己的思想以创新和发展，而不是盲从；要以自我批评和自我革新的精神，对那些经典作家提出的，由于人们的认识限制而曾经被错误理解、错误和教条地执行的观点进行研究……这些研究必须是客观的、科学的、最为严肃的，从而为树立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念作出贡献。”[34]

因此，可以说，越南学者确定社会主义和越南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与越南党和人民正在全球化背景下，按照社会主义定向来建设和发展自己的国家的方向是重合的。社会主义的前途，首先要看越南、中国和其他正在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并从本国的特殊情况出发、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国家的前景。21世纪的社会主义的前景是无比光明的，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解决人类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那些矛盾，包括保护生态环境、保证真正的公平、平等、自由和民主等。

苏联具体的社会主义模式的解体，首先是因为官僚性，然后是教条地理解和歪曲了马克思列宁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观。它的解体，不仅对于那些正在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而且对于那些正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都是重要的教训。那就是，必须继续发展和科学创新由马克思主义创立者提出的科学共产主义的基本内容；正确认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内容和特点，明确这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在本质上要更高的社会；要尊重并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按照人文主义的精神，逐步完善属于人民、来自人民和为了人民的社会主义法权国家。

世界社会主义的危机只是暂时的，人类必将走向未来的美好目的地——社会主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潘金娥 译）

---

[1] 〔越〕陈原越，越南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副教授。

[2]

Nguyễn Trọng Chuẩn và Pletnicốp Iu.K. (chủ biên), *Vận mệnh lịch sử của chủ nghĩa xã hội.*, Nxb Khoa học xã hội, 2009, tr. 79.

[3]

Ngô Hoan, *Nguyên nhân và tác động của sự sụp đổ chủ nghĩa xã hội ở Liên Xô tới tiến trình cách mạng thế giới hiện nay;* Luận án PTS Khoa học Lịch sử, 5.03.05, Học viện Chính trị Quốc gia Hồ Chí Minh, 1995, tr. 30

[4]

Nguyễn Trọng Chuẩn và Pletnicốp Iu.K. (chủ biên), *Vận mệnh lịch sử của chủ nghĩa xã hội.Sđd., tr.82.*

[5]

Trần Đăng Tuấn, *Muốn có cái nhìn tổng quan về phản biện xã hội* ,Tạp chí Cộng sản điện tử, số 114-2006.

[6]

Nguyễn Phú Trọng, *Vì sao Đảng Cộng sản Liên Xô tan rã,* Tạp chí Cộng sản, số 4/1992, tr.19.

[7]

Nguyễn Phú Trọng, *Vì sao Đảng Cộng sản Liên Xô tan rã,* Tạp chí Cộng sản, số 4/1992, tr.20.

[8]

Nguyễn Phú Trọng, *Vì sao Đảng Cộng sản Liên Xô tan rã,* Tạp chí Cộng sản, số 4/1992, tr.22.

[9]

Nguyễn Chí Mỳ, *Tổng quan chủ nghĩa xã hội hiện thực trong thế kỷ XX – những kinh nghiệm lịch sử //* Chương trình khoa học xã hội cấp nhà nước – KX. 08, *Chủ nghĩa xã hội ở Liên Xô và Đông Âu: nguyên nhân sụp đổ và bài học kinh nghiệm,* Phùng Hữu Phú, Nguyễn Ngọc Long, Nguyễn Chí Mỳ chủ biên, Nxb Chính trị Quốc gia, Hà Nội, 2002, tr. 8.

[10]

Nguyễn Trọng Chuẩn và Pletnicốp Iu.K. (chủ biên), *Vận mệnh lịch sử của chủ nghĩa xã hội, sđd., tr.89.*

[11]

Nguyễn Phú Trọng, *Vì sao Đảng Cộng sản Liên Xô tan rã,* tài liệu đã dẫn, tr. 21.

[12]

Nguyễn Duy Quý (chủ biên), *Những vấn đề lý luận của chủ nghĩa xã hội và con đường đi lên chủ nghĩa xã hội ở Việt Nam,* Nxb Chính trị Quốc gia, Hà Nội, 2000, tr.10.

[13]

Nguyễn Phú Trọng, *Vì sao Đảng Cộng sản Liên Xô tan rã,* tài liệu đã dẫn, tr. 20.

[14]

M.I.Voeicop, *Tranh luận về chủ nghĩa xã hội.* Nxb Dân chủ kinh tế, M. 1999, tr. 10, tiếng Nga.

[15]

Nguyễn Trọng Chuẩn và Pletnicốp Iu.K. (chủ biên), *Vận mệnh lịch sử của chủ nghĩa xã hội, Sđd.,* tr.115.

[16]

V.I.Lênin, *Toàn tập*, t. 39, Nxb Tiến bộ, Mátxcơva, 1978, tr. 18.

[17] V.I. Lênin, *Toàn tập, Sđd.*, t.44, tr. 258.

[18] V.I. Lênin, *Toàn tập, Sđd.*, t.45, tr. 356.

[19]

Nguyễn Trọng Chuẩn và Pletnicốp Iu.K. (chủ biên), *Vận mệnh lịch sử của chủ nghĩa xã hội, Sđd.,* tr. 114-115.

[20]

Nguyễn Chí Mỳ, *Chủ nghĩa xã hội ở Đông Âu và Liên xô..., Sđd.,* tr. 3-4.

[21]

Nguyễn Chí Mỳ, *Chủ nghĩa xã hội ở Đông Âu và Liên xô..., Sđd.,* tr. 6.

[22]

Nguyễn Trọng Chuẩn và Pletnicốp Iu.K. (chủ biên): *Vận mệnh lịch sử của chủ nghĩa xã hội, Sđd.,* tr.127. 127.

[23]

Nguyễn Duy Quý (chủ biên), *Những vấn đề lý luận của chủ nghĩa xã hội và con đường đi lên chủ nghĩa xã hội ở Việt Nam,Sđd.,* tr. 99.

[24]

Nguyễn Duy Quý (chủ biên), *Những vấn đề lý luận của chủ nghĩa xã hội và con đường đi lên chủ nghĩa xã hội ở Việt Nam,Sđd.,* tr. 102-103.

[25]

Nguyễn Trọng Chuẩn và Pletnicốp Iu.K. (chủ biên), *Vận mệnh lịch sử của chủ nghĩa xã hội, Sđd.,* tr. 188-189.

[26]

Xin xem, *Sự phản bội của Goócbatrốp* (Lưu hành nội bộ), Nxb Công an nhân dân, Hà Nội, 2000, tr. 7-54.

[27]

V. Paplop, A. Lukianop, V. Criuscop, *Goócbatrốp bạo loạn – Sự kiện tháng Tám nhìn từ bên trong*. Nxb Chính trị Quốc gia, Hà Nội, 1994, tr. 262-263.

[28] Ngô Hoan, *Sđd.*, tr. 67.

[29]

Sự phản bội của Goócbatrốp (Lưu hành nội bộ), Nxb Công an nhân dân, Hà Nội, 2000, tr. 85.

[30] Ngô Hoan, *Sđd.*, tr. 76.

[31] Xin xem，http：//www.mofa.gov.vn/vi/nr040807104143.

[32]

Đảng Cộng sản Việt Nam, *Văn kiện Đại hội đại biểu toàn quốc lần thứ X,* Nxb Chính trị quốc gia, Hà Nội, 2006, tr. 68.

[33]

Nguyễn Văn Sáu, *Nhận thức về chủ nghĩa xã hội và con đường đi lên chủ nghĩa xã hội ở Việt Nam*//T/c Lý luận chính trị, số 5-2006, tr. 22-23.

[34]

Nguyễn Văn Sáu, *Nhận thức về chủ nghĩa xã hội và con đường đi lên chủ nghĩa xã hội ở Việt Nam*//T/c Lý luận chính trị, số 5-2006, tr. 24-25.

苏联社会契约的终结

〔加拿大〕迈克尔·莱博维茨[1]

本文认为，苏联解体的基础原因——苏联经济系统运转失灵——不能简单地由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抽象矛盾来解释。当我们具体地考察苏联经济于20世纪50～80年代期间所出现的经济异常现象时，我们可以发现经济计划制订者与企业管理层之间存在激烈的冲突和斗争。追求收入最大化的管理层是当时苏联生产中很多反常现象的根源。

问题在于，这一状况为何会持续那么长时间？事实上，当时苏联高层官僚在制订经济计划时面临许多限制，其中一项限制就是笔者所称的苏联特有的社会契约。在该社会契约中，中央高层向工人承诺，为他们提供有保障的工作、维持稳定的物价、不断提高工人的生活水平。作为回报，工人同意让渡其在工厂、社区及其他社会组织中的决策权。一方面，该社会契约将工人和各种资源集中于苏联现代生产力的发展，教育和公共医疗水平急速提高。另一方面，该社会契约内含的缺陷造成工人脱离政治生活，苏联经济难以进一步发展。

不过，该社会契约并不是造成20世纪80年代苏联经济短缺问题和经济危机的直接原因。造成苏联经济缺陷的是两种关系——社会契约所表征的高层官僚和工人之间的关系以及高层官僚和企业管理层之间的关系——的相互作用。由于企业管理层追求的是收入最大化的资本主义目标，这两种关系所遵从的逻辑并不一致，所以两者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扭曲现象。

这些矛盾积重难返，苏联高层官僚发现自己越来越难以满足工人的需要。当苏共党内的主导势力更多地趋向于遵从资本主义逻辑时，苏联的社会契约走向了终结。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陈硕颖 译）

[1] 〔加拿大〕迈克尔·莱博维茨，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经济学教授。

苏联垮台的根本原因和经验教训

〔德〕埃克·考普夫[1]

1917年发生在俄国的十月革命、1922年12月列宁领导下苏联共和国的创立及其后的发展都是人类文明史上最重要的事件。正如1517年的德国改革运动、1566年的荷兰革命、1789~1794年的法国革命以及1848~1949年的欧洲革命对资产阶级政权的重要意义一样，十月革命对于无产阶级也具有同等的意义。

事实上，十月革命开启了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世界历史新纪元，开启了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进程。

没有苏联，欧洲和亚洲的反法西斯斗争不可能取得胜利。直到20世纪80年代，苏联对于推进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民族解放运动以及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和平运动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对于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也是功不可没的。在苏联的推动下，不仅一些农业国家或发展中国家，而且一些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如德意志民主共和国（1949年10月7日成立）和捷克斯洛伐克等也纷纷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与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领导下的苏联的合作，使这些国家在教育、文化、公共卫生、社会公平领域以及人民的多方面发展上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1945~1980年间的世界和平也得以保障。

社会主义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的头5年，无论是在经济、军事还是外交上都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为此，美国政府精心炮制了为期20年的全球战略以遏制这些国家的发展。首先是侵入这些国家进行颠覆和破坏；其次是利用这些国家之间以及国家内部不同阶级之间的发展差异进行剥削；再次是发动常规性的局部战争（如越南战争）。1981年美国总统里根以苏联的军事力量作为打击的目标。与此同时，在意识形态领域重点突破，利用一些秘密机构、广播和电台作为渠道

部署反社会主义行动的地点、目标和口号等。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困难和问题也开始凸显。

不幸始于戈尔巴乔夫的领导。戈尔巴乔夫于1985年出任苏联共产党总书记，他提出的对内对外新政策包括加速战略、转轨、公开等都不是建立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基础之上的，而是具有主观随意性。他反对前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昂纳克1986年对中国的访问；反对德（民主德国）中两国和两党关系的正常化；反对昂纳克提出的关于建立中欧无核区的倡议；反对昂纳克1987年秋对联邦德国首都波恩的国事访问。前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在莫斯科会见戈尔巴乔夫后曾这样说道，他从未在克里姆林宫里见过这样一个反对共产主义的共产党的总书记。

戈尔巴乔夫制定的经济政策也十分武断。他中断了自1949年华沙成立经互会以来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互助合作，实行以美元代替卢布为结算方式。民主德国1700万人民曾是社会主义国家中生活水平最高的，1989年底民主德国的人均工业产品占有量位居世界前10名。民主德国也是苏联最强大的对外贸易合作伙伴，有2/3的符合技术标准和规范的进口产品来自苏联。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起苏联就是民主德国的占领力量。民主德国的货币也是不可自由兑换的。截至1989年底，苏联对民主德国的政府间负债超过60亿卢布，可折合为190亿民主德国马克。1989年9～10月间民主德国向联邦德国借款，联邦德国总理科尔便以民主德国必须改变政治体制作为条件。戈尔巴乔夫宣布苏军“中立”，并从联邦德国那里得到了不少好处，最终促成了所谓的两德“统一”。1990年10月，社会主义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变成了资本主义德国的一部分。

这一事件发生之后，鉴于戈尔巴乔夫对东欧政治秩序的“改变”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位于挪威首都奥斯陆的诺贝尔和平奖评审委员会决定将当年的这一奖项授予他。戈尔巴乔夫在记者采访时这样说道：“我人生的主要目标已经实现了，我已经做了我所能做的一切。”

1991年12月12日，莫斯科宣布取消1922年签订的苏联联盟条

约。1993年1月18日德国《镜报》记者采访戈尔巴乔夫时曾发出这样的疑问："你不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了吗？"戈尔巴乔夫答道："如果你知道我的观点，你就会明白我在政治上倾向于社会民主和社会党的国家，如联邦德国。"其后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的美国大学，戈尔巴乔夫又说，他人生的目标就是要战胜共产主义，而他的遗憾就是没有战胜中国的共产主义。

2005年5月，在纪念苏联卫国战争和战胜法西斯德国60周年的庆典上，俄罗斯总统普京当着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老兵的面提出：苏联解体是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而美国理论界则认为苏联解体和经互会的解散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终结，同时也是建立美国全球秩序的第四次世界大战的开端。

那么该怎么办呢？

重温恩格斯在1851年《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一文中所总结的经验教训会很有用。他在文中这样写道：

欧洲大陆上的革命剧的第一幕已经闭幕了……很难想象出还有什么比大陆的革命党派（更确切地说是各革命党派）在全战线各个据点所遭受的失败更为惨重。但这有什么关系呢？为了争取社会的和政治的统治，英国中间阶级不是经过了48年，而法国中间阶级不是经过了40年空前的斗争吗？中间阶级不正是在复辟了的君主制以为自己的地位比什么时候都巩固的时刻才最接近自己的胜利的吗？把革命的发生归咎于少数煽动者的恶意那种迷信的时代，是早已过去了。现在每个人都知道，任何地方发生革命动荡，其背后必然有某种社会要求，而腐朽的制度阻碍这种要求得到满足。这种要求也许还未被人强烈地、普遍地感觉到，因此还不能保证立即获得成功，但是，任何人企图用暴力来压制这种要求，那只能使它越来越强烈，直到它把自己的枷锁打碎。所以，如果我们被打败了，那么我们除了从头开始干之外再无别的办法。值得庆幸的是，在运动的第一幕闭幕之后和第二幕开幕之前，有一次大约很短暂的休息，使我们有时间来做一件很紧要的工作：研究这次革命必然爆发而又必然失败的原因。这些原因不应从一

些领袖的偶然的动机、优点、缺点、错误或变节中寻找，而应该从每个经历了动荡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寻找……但当你问到反革命成功的原因时，你却到处听到一种现成的回答：因为这个先生或那个公民“出卖了”人民。从具体情况看，这种回答也许正确，也许错误，但在任何情况下，它都不能说明任何问题，甚至不能说明“人民”怎么会让别人出卖自己。而且，如果一个政党的全部本钱只是知道某某公民不可靠这一件事，那么它的前途就太可悲了。

此外，研究和揭示革命动荡及其被镇压下去的原因，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具有极重要的意义……任何一个头脑正常的人都永远不会相信，多半都是庸才、既不能为大善也不能作大恶的11个人（即1848年24日成立的法国临时政府的成员）能在3个月之内毁坏一个有3600万人口的民族……问题正在于这3600万在一定程度上还在昏暗中摸索的人怎么突然应当自己决定走什么路，而后来他们又怎么迷了路而让他们从前的领袖暂时回到了领导地位[2]。

这就是我们必须弄明白的。我们必须弄明白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成就和我们的失败。

让我们回到德国农民战争结束时的1525年5月20日。农民军队当时受到了重创。城市平民和贫农领袖托马斯·闵采尔（生于1489年）被捕。在刑台上的时候，他的手指已经被弄断不能再写字了，上绞刑架之前他说出了他的遗言：图林根州缪尔豪森城的革命起义军现在应该结束战斗了，胜利已是不可能；斗争没有取得胜利的原因是起义军变得更为关心他们自身的利益，而不再关注公共利益！

从根本上来讲，发生在1989～1990年间的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内部原因也是如此。

接下来我讲的这些经验教训是我作为一名前民主德国的市民和一名马克思恩格斯理论的研究者所得出来的，也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所证明和揭示了的。

（1）不管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工人阶级政党和工人运动都要

从根本上把握变化了的现实之间的科学联系。

（2）不仅是自然界，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有其客观规律。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通过历史人物具有特定的倾向性的行为所体现。马克思在他的《资本论》第1卷中这样写道：“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 [3] 这些客观规律没有道义、没有利益、没有敌人也没有朋友（如共产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我们只能试图发现这些科学规律，并利用这些规律有意识地进行计划安排。

（3）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体系，包括哲学、经济学、历史政治理论等，首先是为工人阶级和劳动者服务的。只有工人阶级及其政治运动才能普遍适用于这些理论。这也就是说，工人阶级的领导者必须和工人以及和工人的科技文化建立生产性的联系。

（4）1844年10月恩格斯提出这样一个观点，西欧——首先是英、法、德三国——的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要联合起来进行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也指出，工人阶级的斗争如果只就形式来说首先是一国范围内的斗争。这也就是说，如果就内容来讲，工人阶级的斗争必须是超出一国范围的国家间合作的斗争。而必须联合起来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全球化和世界市场的形成。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清楚工人阶级的斗争将在生产、积累、流通和分配等领域越来越国际化的形势下进行。恩格斯在1874年曾这样指出，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必须要在“所有三方面——理论方面、政治方面和实践经济方面（反抗资本家）——互相配合，互相联系” [4] 。这在今天仍然是正确的。

（5）1917年以来的主要斗争就是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斗争、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斗争。但这种说法并不适用于冷战和反恐战争，因为其中涉及的主体及其利益不能简单归结为资产阶级或工人阶级。

（6）1917年以来侵蚀乃至颠覆社会主义政权的最重要的政治力

量在欧洲就是社会党国际。1914年秋，德国议会中的社会民主党代表就为德国政府的战争投了赞成票。1918年11月至1919年春，德国社会民主党是镇压国内社会主义革命和破坏民主共和国的政治力量之一，而德国的革命力量对于俄国革命的支持乃至对于整个世界历史的推进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联邦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勃兰特的领导下，开始实行针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新东方政策”，主要就是“以接近求改变”。西方民主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和福音教会等组织机构在削弱民主德国的社会主义中扮演了主要角色。80年代末，许多东欧的政府官员和共产党干部都在一定程度上认为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已经改变了侵略本性，变得具有和平精神了（1945～1989年欧洲没有发生战争）。因此，建立一个“欧洲众议院”是可能的，人类的共同利益要高于阶级利益；把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和资本主义国家的高工资结合起来也是可能的。而事实上，从1990年10月3日开始，社会主义的民主德国就变成了联邦德国资本主义统治之下的一个类殖民地，95%的资产被联邦德国和其他外国资本所占有。直至今天，前民主德国境内仍然是工业化程度最低和最贫穷的地方，那里的青年人因为没有工作机会和未来没有保障纷纷移居国外。

（7）工人阶级如果不能夺取国家政权，社会主义就不可能真正得以实现。这是1917年以来的最重要的经验教训。十月革命也因此具有国际的、普遍的重要意义。

（8）工人阶级的政权必须要全力加以捍卫，因为世界资产阶级及其帮凶从社会主义国家成立的第一天起就会用各种手段加以破坏。如果社会主义革命不彻底，就会有反革命紧随其后，就像我们在欧洲那些前社会主义国家中所看到的那样。因此，我们要捍卫社会主义政权就只能从加强社会主义入手。这是1917年以来尤其是1989年以来的一个重要教训。

（9）如果社会主义国家的党和政府能和人民建立好的、有益的、民主的关系，这个国家政权的力量就是巨大的。这也包括建立工人阶级和农民等其他劳动阶层之间的好的关系。

（10）1917年以来的一个重要经验是：没有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所有制作为主体，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可能真正建立起来。苏联、民主德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历，也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的经历表明，如果在社会主义社会（不是共产主义社会！）同时存在着社会主义所有制、私有制和混合所有制的情况下，这个经验是十分管用的。1917年以来的经验还有：要认识到经济是基础，而在经济基础中存在着客观规律；不是政治控制和决定着经济，而恰恰相反，经济在较长时期内决定着政治（包括对内的政治能力、外交能力和军事潜力等）。

（11）民主德国的历史验证了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提出的结论的正确性（这一点和苏联的经验正好相反）：如果根据具体的历史条件运用价值规律和分配规律，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就会取得较为成功的发展，即每个人按照自己的能力给予社会，同时按照自己的工作能力也就是劳动量获得分配。

（12）马克思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因，因此现代生产（包括工业、农业、运输和交通领域等）必须是运用科学的、有计划的生产。因此，有计划的生产并不专属于社会主义。市场也不仅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中。市场对于社会主义国家也是有用的，而对于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则是必需的。但我们必须记住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企业和集团在世界市场上要更加有效率。

（13）社会主义经济要求各部门之间均衡有效地发展。只有积累和消耗之间的均衡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在1875年曾这样指出：从社会总产品里面“应当扣除：第一，用来补偿消耗掉的生产资料的部分。第二，用来扩大生产的追加部分。第三，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从‘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中扣除这些部分，在经济上是必要的……”[5] 一定要有经济储备，这样资本主义国家就不能从政治上进行敲诈，就像联邦德国总理科尔在1989年9月底对民主德国所做的那样。

（14）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必须要对货币进行改革，要建

立社会主义国家的财政垄断。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只能流通一种货币。

（15）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必须要对文化进行改革。这里的文化要从最宽泛的意义上来进行理解，包括劳动、教育、艺术等。宗教团体可以像其他社会团体一样存在和发挥作用，但没有社会上和政治上的特权。

（16）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要实行各民族之间的权利平等。

我们一定要记住的是：经济是人类社会其他方面的基础。马克思在1867年发表的《资本论》第1卷中就“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 [6] ：

“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个自然史的过程” [7] ，这就是说，经济发展有其自然本体（包括有目的的人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和以一定形式（如所有制形式）表现出来的社会发展过程；

“但是，一种历史生产形式的矛盾的发展，是这种形式瓦解和新形式形成的唯一道路” [8] ；

“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 [9] ；

“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 [10] ；

“所以，撇开较高尚的动机，现在的统治阶级的切身利益也要求把一切可以由法律控制的、妨害工人阶级发展的障碍除去” [11] ；

“变革过程……达到一定程度后……将采取较残酷的还是较人道的形式，那要看工人阶级自身的发展程度而定” [12] ；

马克思“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13]；

“一个国家应该而且可以向其他国家学习”[14]；

“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15]。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5～1846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费尔巴哈卷中这样论述道：“此外，许许多多人仅仅依靠自己劳动为生——大量的劳力与资本隔绝或甚至连有限地满足自己的需要的可能性都被剥夺——从而由于竞争，他们不再是暂时失去作为有保障的生活来源的工作，他们陷入绝境，这种状况是以世界市场的存在为前提的。因此，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而各个人的世界历史性的存在，也就是与世界历史直接相联系的各个人的存在。”[16]“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17]

马克思在1857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货币章中，这样谈到他未来的研究写作计划：“它是处于交换价值世界之外的那个全体生产之中的现成的剩余产品。因此，即使是在发达的社会中，这些剩余产品依然会作为直接现成的商品世界而出现于社会表层。然而这个商品却通过自身而且又超过自身显示出那些被确定为生产关系的经济关系。所以生产的内部结构构成第二篇。第三篇总结国家。第四篇讲国际关系。以世界市场来结束。在世界市场上，生产本身以及每种生产因素都被肯定为总体；但在世界市场上，一切矛盾同时都转化为过程了。其次，世界市场又同样构成整体的前提及整体的体现者。此外，危机则会促使其采取新的历史形式。”[18]

马克思在1958年10月8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中还这样说道：“资产阶级社会的真实任务是建立世界市场（至少是一个轮廓）和以这种市

场为基础的生产。”[19]

一年以后，马克思在他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了他的最终研究计划：“我考察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顺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在前三项下，我研究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分成的三大阶级的经济生活条件；其他三项的相互联系是一目了然的”[20]。

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资产阶级直至今日也没有实现它建立世界市场和世界性生产的历史任务。

恩格斯在1853年4月12日写给约瑟夫·魏德曼的信中这样说道：“当然，这一切都只是理论；在实践中，我们和往常一样，将不得不限于首先要求措施坚决和毫不容情。麻烦也出在这里。我感到，由于其他政党一筹莫展和萎靡不振，我们的党有一天不得不出来执政，而归根结蒂是去实行那些并不直接符合我们利益，而是符合一般革命的利益、小资产阶级利益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在无产阶级大众的压力下，由于被我们自己所发表的、或多或少地已被曲解的，而且是在党派斗争中多少带着激昂情绪提出来的声明和计划所约束，我们将不得不进行共产主义的实验，并进行跳跃，但这样做还不是时候，这一点我们自己知道得非常清楚。这样做——我们会丢掉脑袋——但愿只在肉体方面——就会出现反动，并且在全世界能够对这种事情做出历史的判断之前，我们不仅会被人视为怪物（这倒无所谓），而且会被人看成笨蛋（那就糟糕多了）。”[21]

事实上，恩格斯的看法很准确。直至今日，只有东欧、亚洲的一些国家和古巴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转型，而这些都是发展中国家。用马克思1875年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的话来讲，就是“集体财富的源泉”还没有“充分涌流”。

马克思在1871年5月巴黎公社失败后撰写的《法兰西内战》一文中指出：“工人阶级并没有期望公社做出奇迹。他们不是要凭一纸人民法令去推行什么现成的乌托邦。他们知道，为了谋求自己的解放，并同时创造出现代社会本身经济因素作用下不可遏制地向其趋归的那

种更高形式，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历史过程。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的新社会因素。”[22]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第26章中这样说道：“一物最终能破坏该物自身的原因这种说法，只有对那些热衷于高利息率的高利贷者来说，才是不合逻辑的说法。罗马人的强大是他们进行征服的原因，但这种征服破坏了他们的强大。财富是奢侈的原因，但奢侈对财富起着破坏的作用。”[23] 1949～1989年，民主德国的工人、农民、手工业者等人民大众在教育、公共医疗、文化等各方面的生活水平都得到了空前的提高，但还是低于资本主义联邦德国的生活水平——就像西方广播和电视每天宣传的那样。这是由于西方长期针对民主德国社会主义的战略性遏制。其次，由于民主德国缺乏集体主义传统，各层领导中的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也越来越甚。

马克思恩格斯在1845～1846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费尔巴哈卷中曾这样写道：“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24] 马克思在1846年12月28日给帕·瓦·安年科夫的信中也写道：“蒲鲁东先生混淆了思想和事物。人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已经获得的东西，然而这并不是说，他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在其中获得一定生产力的那种社会形式。”[25] 半年之后，马克思在他的《哲学的贫困》第二章第一节的第七个说明中又这样论述道：“资产阶级得势之后，也谈不到封建主义的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了。资产阶级把它在封建主义统治下发展起来的生产力掌握起来。一切旧的经济形式、一切与之相适应的市民关系以及作为旧日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政治制度都被粉碎了……由于最重要的是不使文明的果实——已经获得的生产力——被剥夺，所以必须粉碎生产力在其中产生的那些传统形式。从此以后，革命阶级将成为保守阶级。”[26] 这种保守应该是对“好”的保留，继承旧体制中的积极因素和推进新体制的向前发展。从客观上讲，革命力量在参与和接管政权以后就有变成保守阶级的可能性。

恩格斯在1884年8月11日写给保罗·拉法格的信中说道："你把经济学上的'政治的和社会的理想'强加给马克思，马克思是会提出抗议的。你是'科学家'，你就没有理想，你就去研究出科学的结论，如果你又是一个有信念的人，你就为实现这些科学结论而战斗。但是，如果你有理想，你就不会成为科学家，因为你已经有了先入之见。"[27]革命领导务必要及时把握发展变化了的现实，要时刻联系群众、为群众服务。

马克思主义已经被证明是正确的。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被迫中断，这是因为，用列宁的话来讲："身为领导者的革命家缺乏自觉性和首创精神。"领导者在政治经济上的失误以及他们和人民之间民主联系的弱化，是导致1989～1991年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主要原因。

然而最重要的是，如果我们能对变化了的客观条件进行科学研究并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就能向工人阶级证明：一种比资本主义好的社会制度是可能的，而不仅仅是作为一种观念或是希望。

199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提出、2007年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又进一步确认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直至2050年。这很好。社会主义国家中资本主义的转化不是一个短期能完成的工程。中国要为现代化进行积累。在社会的基础领域运用计划和现在对市场的运用，都是好的。中国共产党到2011年7月就已经成立90周年了。我想，如果2050年要胜利完成任务，中国在今后的20年间就一定要发展这样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即发展建立在足够的（要占第一位）社会主义所有制基础上、运用市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社会主义经济。这将会对整个人类社会的进步产生积极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范春燕 译）

---

[1]〔德〕埃克·考普夫，中央编译局德籍专家。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482～484页。——译者注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100页。——译者注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636页。——译者注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302页。——译者注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101页。——译者注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101～102页。——译者注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14页。——译者注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100页。——译者注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101页。——译者注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101页。——译者注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101页。——译者注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101页。——译者注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101页。——译者注

[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100页。——译者注

[1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87页。——译者注

[1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87页。——译者注

[18]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第1分册，人民出版社，1975，第181～182页。——译者注

[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348页。——译者注

[2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31页。——译者注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73，第587～588页。——译者注

[2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60页。——译者注

[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第477页。——译者注

[2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79页。——译者注

[2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532页。——译者注

[2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152页。——译者注

[2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4，第198页。——译者注

附录一 会议综述

苏联解体并未改变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趋势

——“中国社会科学论坛——苏联解体2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栾文莲 曹苏红 谭扬芳 [1]

2011年4月23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世界历史研究所、政治学研究所、文献信息研究中心，以及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当代世界杂志社、红旗文稿杂志社等12家单位承办的“中国社会科学论坛——苏联解体2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来自俄罗斯、越南、日本、澳大利亚、乌克兰、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德国、保加利亚等国的知名学者和来自全国各地50多个科研单位、高等院校的共26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

中国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王伟光出席会议并致辞。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明、中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于洪君、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郑科扬、中共党史研究会副会长陈小津、驻中国社会科学院纪检组长李秋芳、中国社会科学院秘书长黄浩涛、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北京大学原副校长梁柱、中国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张国祚、越南共产党中央对外部副部长阮孟雄、俄罗斯共产党中央书记德·格·诺维科夫、原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埃贡·克伦茨、美国马萨诸塞大学教授大卫·科茨、莫斯科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弗·伊·多博林科夫、俄罗斯国立社会大学校长瓦·伊·茹科夫、墨西哥城市自治大学教授海因茨·迪特里奇、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经济系教授迈克尔·莱博维茨、日本京都大学

经济学教授大西广、罗莎·卢森堡基金会批判性社会分析研究所所长及洪堡大学社会哲学教授米夏埃尔·布里、德国《共产主义工人报》记者理查德·克勒尔、保加利亚社会党战略研究中心主任亚历山大·利洛夫、保裔澳大利亚学者科伊乔·佩德罗夫等出席研讨会。与会者围绕“苏联解体的原因”、“苏联解体的后果”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前景展望”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一 全面总结苏联解体的后果及其影响

王伟光在大会致辞中指出，苏联解体对于苏联及俄罗斯人民是一场巨大悲剧，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一个巨大挫折。苏联解体、苏共亡党是20世纪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使社会主义事业和人类解放事业遭受重大挫折。20年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制造的局部战争连绵不断，贫富鸿沟日益增大，各类危机频繁爆发，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没有解决世界面临的重大问题，科学社会主义仍是解决资本主义现存问题的切实可行方案。

李慎明强调，苏联解体、苏共亡党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巨大逆流、灾难和反动，是人类历史发生的大曲折、大逆转。它给俄罗斯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经济急剧下降，至今其国内生产总值仍没有恢复到1990年的水平，社会领域分化混乱，犯罪活动猖獗，国际地位下降。它给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造成极大的灾难与低潮，原有的15个社会主义国家中的10个国家改变性质或不复存在，共产党员数量锐减。它给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由于苏东原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全面社会福利体系坍塌，美、法、德等西方发达国家不仅所有制、分配制度、政治体制、意识形态右转，就连已建立好的福利体系也在右转。

苏联解体是一场在全球范围内带来严重后果的悲剧，这些后果至今还在持续。埃贡·克伦茨指出，主要帝国主义力量得到了增强，苏联对德国法西斯的胜利被修正；欧盟这个1945～1990年经历了它在新近历史中最长一段和平时期的区域，战争又重现踪迹，如南斯拉夫战争、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苏联和民主德国被维系在一个祸福与

共的命运共同体系中，尽管民主德国在时间上要比苏联更早从政治版图上消失，但民主德国的终结却与苏联解体有着因果关系。

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看，苏联解体、苏共亡党使共产党的力量遭到削弱。于洪君指出，苏联解体、苏共亡党造成的阵痛和阴影仍在俄罗斯和独联体挥之不去，苏共的继承者俄共党员持续萎缩，人数已从1993年的50多万下滑到今天的18万左右，政治影响力不断减弱。在其他独联体国家，共产党的声音日益微弱或者根本听不到。苏联解体给世界带来的影响是两极格局瓦解。美国现在一超独霸，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大行其道，国际安全体系依然严重失衡。冷战结束后的20年里，美国、西方共发动了5次战争：1991年的海湾战争，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以及2011年3月的法、英、美战机空袭利比亚事件。2008年由美国引发的全球金融经济危机，宣告了美国发展模式的失败。就连“历史终结论”的鼓吹者福山也承认“危机凸显了资本主义制度——甚至像美国这样的先进制度——内在的不稳定性”。

张国祚指出，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10年下降了一半。两极分化、人口锐减、人均寿命降低、酗酒闹事、卖淫嫖娼、无家可归等社会问题成堆，治安混乱、犯罪活动猖獗、国家职能弱化、悲观情绪弥漫。一个过去在军事上令美国寝食不安的超级大国，现今在美国面前已经强硬不起来了。

亚历山大·利洛夫指出，苏联解体是苏联人民的悲剧，因为他们从此陷入贫困，他们的国家发展倒退了几十年。而且，这一事件对世界其他各国人民也带来了严重后果，改变了世界范围内各个领域的力量对比与平衡。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李伟研究员认为，苏东剧变与苏共亡党紧密联系，是一场波及广大地区和国家、波及众多人口的一场改变了当代世界格局和面貌的反革命复辟性质的历史运动。戈尔巴乔夫的作用不是他一个人或几个人的所作所为，而是代表了一个阶级在活动，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利

加乔夫在《警示》一书中说：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一伙人搞的改革就是要摧毁社会主义制度，消灭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

二 深入剖析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及其教训

针对苏联解体、苏共亡党的根本原因，与会者阐述了各自的观点。德·格·诺维科夫介绍了俄罗斯国内关于苏联崩溃原因争论的若干结论。一是现在流行的一种观点认为，建立在计划经济和行政命令管理原则基础上的经济模式导致苏联衰败。他们确信苏联经济的衰败缘于与西方的竞争失败，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耗尽其发展潜力。然而，关于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缺少活力的结论没有得到客观数据的证实。1928～1987年，苏联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4倍，即使80年代的年均增长率3%～4%，也相当于发达国家的水平。二是1985～1990年戈尔巴乔夫推行了混乱的经济、政治改革。例如，部委改革撤销了40%的中央直属机构和60万名公务员，打乱了部门间的互动。1987～1988年实施所谓的国有企业法，减少投资，生产和消费品价格不断上涨，居民收入大幅度下降，国家陷入“既没有计划也没有市场的经济”，经济严重下滑，5年内国家财政赤字增长了6倍。冒进主义的改革使国家遭受经济危机。三是苏共的危机是极重要的因素。1990年苏联宪法第六条被取缔，即取消党的领导作用，国家“非党化”，党的所有权力转向政府机关。与此同时，党内意识形态危机不断加剧，1990年苏共二十八大通过的党内可以建立各种政治派别的决议破坏了党的思想统一，党内出现各种团组，使党从一个充满活力的政治机构变为争论不休的俱乐部。戈尔巴乔夫的摇摆不定加速了分裂进程。1990年叶利钦发布命令，禁止苏共的活动。自由派利用公开性、民主化，公开抹黑苏联历史，同时广泛宣扬西方、美国的价值观，迫使更多人怀疑共产主义的价值，使许多苏联人迷失了方向。四是自由派利用民族矛盾破坏苏联的统一，把民主思想与民族主义捆绑在一起，挑动民族冲突。民族主义势力在苏联解体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五是外国情报系统的破坏作用。战后美国和西方挑起反苏的冷战，并在欧洲和苏联的反共产主义力量中找到了自己的盟友。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赵曜认为，苏联解体、苏共亡党的根本原因源

自其内部，路径是通过戈尔巴乔夫的所谓改革走向剧变。事实表明，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着两种不同方向、不同性质、不同结果的改革。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改向、改制，背离了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轨道。它有五个方面的错误导向：一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错误导向。苏联接受新自由主义的“500天纲领”，把国民经济搞乱；接着大搞私有化，摧毁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二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错误导向。1988年苏联轻率地把改革重点从经济体制转向政治体制，全盘照搬西方模式，错误地提出民主化、公开性的口号。这促使两种势力得到发展：反社会主义势力和民族分裂势力。三是意识形态的错误导向，放弃意识形态的领导地位。四是党自身改革的错误导向。戈尔巴乔夫仇视党的领导，歪曲列宁的“一切政权归苏维埃”的思想，把权力从党的手中转到政府。他修改宪法第六条，取消党的领导作用。这一条是根本性原因。五是民族关系的错误导向，苏联对民族分裂势力采取妥协退让的态度。

张全景指出，苏共在组织路线上的错误是苏共亡党、苏联亡国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一，苏共背叛了党的路线。政治路线的错误导致组织路线的错误。赫鲁晓夫全面否定斯大林，提出全民党、全民国家，造成党的政治路线的混乱。戈尔巴乔夫提出公开化，破坏民主集中制，严重背离、最后抛弃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伴随着“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民主集中制变得面目全非，苏联政党制变成了多党制。第二，严重背离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干部路线。苏共垮台同它在干部工作中的一系列错误，主要是干部选拔任用上以任命制（委任制）和变相任命制代替选举制分不开。苏共抛弃了民主集中制，任人唯亲。扭曲的干部路线，使得戈尔巴乔夫这个敌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人被任命到党的最高领导层，这是苏共从内部被攻破，从而最终导致苏共亡党、苏联亡国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三，背弃自己的生命线——群众路线。随着统治地位的巩固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苏共逐渐把一切依靠群众的原则抛到脑后。背离群众路线使党丧失了最后一道防线。

程恩富把苏联剧变和解体的原因概括如下：一是思想原因。赫鲁晓夫过分反对斯大林和西方和平演变战略，引发长期思想混乱；全盘

否定斯大林，实质是开始脱离、背叛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种下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祸根。二是组织原因，提拔重用一大批思想混乱、非马克思主义的干部。三是苏共领导集团主要是戈尔巴乔夫，其次是叶利钦背叛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这是关键致命的原因。俄罗斯、独联体国家的共产党普遍认同“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上层领导背叛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是苏联解体、苏共失去执政地位直接和主要原因”的观点，认为主要是来自上层的背叛。

吴恩远认为，20年后看苏联解体、东欧剧变，需要进行认真梳理，哪些观点经受了历史检验，哪些观点需要重新认识，还有哪些观点至今仍存在分歧。今天，对苏联解体原因的争论的焦点是，有人认为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具有70年历史的“斯大林模式”——是导致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即解体缘于体制问题，否认应当由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承担主要责任。我们认为，评价斯大林模式历史地位的唯一实践标准是，能否领导苏联改变旧俄国尽快实现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能否领导苏联反抗法西斯入侵保卫国家主权这两个生死关。我们应当尊重俄罗斯人的意见。关于怎么看“人民平静地接受”苏联解体的问题，从历史的观点看，现在已经不平静了。2001年，俄罗斯科学院综合社会研究所就“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进行的民意调查表明，有44%的人认为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应对苏联解体承担主要责任；认为是由“苏联社会经济危机”导致苏联解体的人占17.2%；认为是由“共产主义体系的危机”导致苏联解体的人占11.2%。

南京财经大学教授何干强认为，苏联经济学西化即西方资产阶级化，是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500天纲领”是经济学西化结出的毒瘤，是苏联自由化势力与国外敌对势力联手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行动纲领，它的问世加快了解体的进程。经济西化危害性的主要表现是：贯穿始终的“经济的非国有化”、“私有化”的改革方针，混淆经济形态的一般与特殊，用转向市场经济掩盖转向资本主义经济；要求国家扶植企业家，培养资本家阶级；鼓吹抽象的自由人权，否认劳动者权利的根本决定作用；放任外国资本自由进出本国。为什么会西化？是由于苏共高层领导推行普世价值观，经济学界存在背离历史唯物主义的严重倾向，高校淡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科建设，高校教学

西化，以及放任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侵蚀，而对资本主义经济思潮不加分析。

也有学者把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概括为：第一，苏共蜕化变质。长期不重视执政党的建设，蜕化变质主要表现在身居高位、拥有很大权力的各级领导干部身上，这些领导干部形成了特权阶层。第二，领导集团背叛和领袖背叛。苏共政治局人员状况如何关系党和国家的命运，而苏共政治局形成了右翼势力集团。第三，国外敌对势力颠覆。20世纪80年代西方敌对势力利用苏联的改革和困难，加大了和平演变的力度，最后未能阻止苏联剧变和解体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缺乏社会主义法制的保障。

与会者对苏联解体的深刻教训进行了分析。亚历山大·利洛夫在谈到苏联模式社会主义解体的教训时提出其中有三大教训：第一，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包括社会主义制度，如果没有内部的自我发展，就注定会停滞、衰退和崩溃。但社会主义社会积极地自我发展的首要条件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对正在发生的决定性的进程和趋势作出正确的选择。第二，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它内部自我发展的条件，但这不是一个自发的过程。为使现代化取得成功，需要牢固的、持久的理论和政治战略，需要有强有力的伟大领袖人物来实现这种战略。苏联共产党和东欧党的一个最大缺陷是国家和政界精英出现了危机。第三，永远不应该忘记苏联和苏联共产党的灭亡不是由于外部的侵略，而是遭到内部的摧毁。极其重要的是，社会主义社会及其执政党应该坚持自己的原则、传统和价值，防止腐化变质。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中心副主任张树华研究员总结了苏联政治改革与民主化的教训。他认为，苏联解体是苏共后期蜕化变质的结果，戈尔巴乔夫盲目的政治改组和匆忙的民主化是这一过程的加速器和导火索。第一，政治改革而不能改向。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而不是变成“信仰放弃、方向背离、主义抛弃”。第二，要坚持苏共的领导而非放弃。从放弃党的领导的过程来看，先是从内部削弱，在思想上搞乱；然后自动取消，1990年2月苏共全会通过可取消苏共的领导地位的决定；再就是瓦解和分裂；最后是完全抛弃和葬送苏共的领导

地位和作用。第三，宪政应该完善而非拆毁。苏共领导地位、苏维埃社会主义政权、联盟国家是苏联政治制度的三大根基。而自1988年后的两三年间，戈尔巴乔夫激进的政治改组拆毁了苏联国家和宪法的根基，其他的改革也走进死胡同。第四，改革必须坚持正确的方向。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警示后人必须坚持正确的方向，政治改革必须有利于国家稳定和民族团结，必须有利于提升政治民主、稳定和效率，必须在党的坚强领导下进行。

北京大学原副校长梁柱教授结合毛泽东的预见，分析了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他说，对苏联解体同赫鲁晓夫的历史渊源，经过历史的沉淀和反思，证明了当年毛泽东对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及其后的表演所作的评述具有深邃的历史洞察力。该预见是：对社会主义历史的否定，将会导致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被颠覆；当1956年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时候，毛泽东就敏锐地看到了它必然导致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理论的背离；毛泽东十分警惕国家政权由社会公仆向“社会主人”蜕变的危险，把苏联党和国家政权中特权阶层的形成，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蜕化变质的一个重要原因；社会主义国家还有被西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危险。历史是一面镜子。如果说当年毛泽东的科学预见还主要是从警示的角度而言，那么这种具有历史穿透力的预见性今天已被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被解体的历史悲剧所证实，这就更具现实震撼力。

张国祚认为，马克思主义只有不断结合新的实践而与时俱进，才能保持它的科学真理性。社会主义只有同各国实际相结合，才能生根开花结果。苏联解体是社会主义的一大挫折，但不是社会主义历史的终结。任何时候都要把握舆论导向。不苛求历史伟人，不糟蹋自己民族的奋斗历史，否则就会自毁长城。民主应当追求，但要符合国情、循序渐进；不把西方民主当做普世价值，避免引起社会动乱甚至灾难。对此，我们要居安思危。

多博林科夫指出，苏联的崩溃对俄罗斯自身产生的后果是，俄罗斯迄今为止无法修复自由化改革的后果，至今依旧处在制度危机、意识形态模糊不清的状态。他认为，要回答这一问题和确定新的发展前

景必须做到：公开承认俄罗斯和西方不是同路人并公开正视自己的敌人；坚决摒弃各种形式的自由主义思想，无论是西方的还是俄式的；只有建立全新的国家意识形态概念及明确具体的政治行动纲领，才能改变自己的整个的政治、社会经济和地缘政治发展的轨迹；俄罗斯需要一个新的全球发展战略纲要，这是最重要的发展任务之一。俄罗斯要拯救自己就应该毫不犹豫地摆脱西方，走自己的发展道路。

何干强认为，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深刻教训就是，当资产阶级经济学作为苏联改革的理论导向时，就会诋毁社会主义的经济，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导致亡党亡国。因此，不能依靠西方经济学搞改革，不存在脱离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市场经济；不能迷信抽象的公平正义或普世价值观；不能认为高校淡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只是学科内容的一般变更，要警惕苏联高校培养出“500天纲领”的炮制者的教训。

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副会长曹长盛教授指出，苏联解体为我们提供了十分深刻的教训：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意识形态领域的矛盾和斗争；必须掌握好各种舆论工具，充分发挥舆论工具正确的导向作用；必须对西方的意识形态渗透保持高度的警惕并采取有效的对策。

三 殷切展望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前景

苏联的解体并没有终结也没有改变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今天生存的世界仍然是一个由资本扩张主导的，人类利益被迫服从于资本意志的世界，这没有超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视野。当今世界是自从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描述和科学预期的世界。这是王伟光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前景的科学预测。他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根据资本积累的实质推断出的全球化、全球范围的两极分化、金融资本的恶性膨胀等现象必然出现，资本主义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的激化，以及由此引发的制度性危机的爆发越发显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当年对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预测在今天越发显示其科学的预见性。展望未来，要解决由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导致的结构性制度危机，解决人类面临的种种迫在眉睫的生存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包括由生产过剩导致的经济危机，由利益争夺、价值冲突、两极分化导致的局部战争和贫困饥饿，由过度追求物质生活方式导致的环境和能源危机，以及人们对人类生存状况失望而产生的悲观厌世和愤世嫉俗的情绪……要解决所有这些问题，我们迫切需要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智慧。

李慎明指出，相对于苏东剧变后的低潮而言，世界左翼和社会主义思潮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开始有所复兴。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之中。世界已经步入历史发展的快车道。由于新一轮金融危机在未来几年内极有可能存在进一步恶化的趋势，新兴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今后几年内也都有可能面临国际垄断资本新一轮的洗劫。如果世界上其他各主要大国应对正确，美国霸权从此有可能从其顶峰逐步跌落下来，这个衰落过程可能要用几十年时间。假若如此，这也是我们衷心所希望的现有的中国、越南、古巴、朝鲜、老挝5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巍然屹立与世界社会主义思潮的较大复兴。世界格局中期前景的不确定，从一定意义上说，其根本原因是人们对指导当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理论的认识还不成熟和不完善，或是说还仅在寻找或形成之中。坚信世界各国人民将在无比丰富的社会实践和多种多样的经验教训中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在2050年前后，将出现世界社会主义的又一个无比灿烂的艳阳天。

大卫·科茨认为，苏联解体打破了国际政治格局的平衡，世界社会主义力量大为削弱，从而导致新自由主义的泛滥，引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但是，新自由资本主义急剧增长的对劳动人民的压迫最终激起了在新自由资本主义压榨最为严重的地方兴起对替代资本主义的新社会主义制度进行的新尝试，比如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新自由资本主义导致的2008年以来的严重的经济危机，降低了资本主义的合法性。30年以来劳动人民面临的物质生活条件不断恶化，在金融家和工业巨头仍在借助广泛宣传持续从纳税人手里攫取财富并攻击工会运动的同时，伴随着突然出现的大量失业和实质公共服务的急剧削减，很有可能激起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意识的重生。人们对统治精英的愤怒正在增长。即便在社会主义运动长期相对微弱的美国，

近期的民意调查显示，也有超过1/3的人对社会主义持积极观点。现今的国际条件对于社会主义运动在资本主义世界的重生十分有利。

与会者一致认为，如果现行社会主义国家能够吸取苏联解体的教训，并把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为人们提供一种在经济和政治上超越现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可行性方案，相信社会主义定将实现伟大的复兴。

---

[1] 栾文莲，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曹苏红，中国社会科学院办公厅副编审；谭扬芳，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

附录二 发言摘要

深入剖析苏联解体因果教训 准确把握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规律

——“中国社会科学论坛——苏联解体2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发言摘要

一 大会致辞

中国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 王伟光

20年前，苏联解体曾让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学术精英额首称庆。福山自信地宣称，20世纪社会主义制度实践的失败，标志着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最后一种政治形式和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自由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在全世界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这就是历史的终结。20年过去了，我们看到了什么呢？美国爆发的世界金融危机表明，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制度不但没有解决世界面临的所有重大问题，而且带来了更大的一场灾难，使资本主义面临全局性的衰退趋势。短短20年的历史，我们见证了西方国家所制造的局部战争连绵不断、贫富鸿沟日益增大、各类危机频繁爆发等一系列人类社会危机问题。

苏联的解体并没有终结也没有改变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势，我们今天生存的世界仍然是一个由资本扩张主导的、人类利益被迫服从于资本意志的世界，这不仅没有超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视野，而且可以说，当今世界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描述和科学预期的世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根据资本积累的实质推断出的全球化、全球范围的两极分化、金融资本的恶性膨胀等现象必然出现，资本主义不可克服

的内在矛盾的激化，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制度性危机越发显现。

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的制度危机，西方“自由民主”所标榜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等理念、制度无法给予有效解答。要解决这些问题，人类必须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价值观中寻求思路，必须要认识到资本主义、个人主义、物质主义、拜金主义、自由主义这些世界观和价值观体系已经造成了人类灵魂的深刻异化和人类社会的深重灾难。我们急需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智慧。

苏联解体后的历史进程再次向我们证明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过时，科学社会主义仍然是解决资本主义现存问题的切实可行的方案。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人类的未来，而对未来的开拓是建立在对历史正确解读的基础之上的。苏联解体、苏东剧变是社会主义事业和人类解放事业遭遇的重大挫折，而深刻认识苏联解体的原因和它对世界产生的影响，是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前提。

二 苏联解体与世界格局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李慎明

苏联解体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人类历史的大逆转。一是给俄罗斯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卫国战争期间，苏联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22%，而苏联解体后10年间，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52%。二是给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造成了极大的灾难。苏东剧变使原有的15个社会主义国家中的10个国家改变性质或不复存在，经济严重下滑，给古巴、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也都带来经济上的极大困难。三是给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人民造成了巨大灾难。苏东剧变后，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盛行，全球范围内极少数富人愈来愈富，绝大多数穷人（其中包括中等收入阶层）愈来愈穷，几乎所有国家（其中包括发达国家）愈来愈穷。现在，比尔·盖茨、巴菲特、保罗·艾伦三人的总资产比世界上最不发达的43个国家的GDP之和还要多。

近年来，世界左翼和社会主义思潮在全球范围内开始有所复兴。冷战结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强国利用金融霸权，张着大嘴“巧

吃”、“白吃”世界。美国生活必需品的价格长期低廉，所以其所谓的“民主制度”才能够得到民众的认可并得到维系，在国际上才得到追捧。贫富差距的拉大和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化，进一步引发广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民众对资本主义普遍不满，街头抗议增多，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在全球重新得到重视。

展望世界社会主义前景，我们有如下认识：目前世界各主要大国的主权债务都在急遽增加。新兴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今后几年内也都有可能面临国际垄断资本新一轮的洗劫。世界各大战略力量在加强合作，同时也有激烈的竞争和博弈直至较量。必要之时，所谓的“国际社会”可能寻求战争之道去力图摆脱。如果各主要大国应对正确，美国霸权从此有可能逐步跌落。当然也绝不能排除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遇到新的更大的困难。21世纪前二三十年，乃至上半个世纪的世界格局，都可能处于一种激烈动荡甚至跳跃的状态，这是世界各类重大矛盾特别是生产社会化、生产全球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根本矛盾长期累积冲突的必然结果。笔者坚信，在2050年前后，必将出现世界社会主义的又一个艳阳天。

三 组织路线错误是苏共失败的重要原因

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 张全景

1.苏共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改变了党的性质和作用

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下，苏共始终保持了党的阶级性和先进性，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胜了法西斯，取得了辉煌胜利。但是，赫鲁晓夫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定、歪曲苏联历史，否定列宁和斯大林，提出“全民党”、“全民国家”、“三和一少”的错误理论，造成全党全民极大的思想混乱。戈尔巴乔夫又提出“公开性”、“民主化”，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从根本上背叛科学社会主义，背叛人民。在严重错误思想的指导下，改变了苏共的无产阶级性质，丧失了党的阶级性和先进性。

2.苏共严重背离且最后抛弃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民主集中制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组织原则。在斯大林担任苏共总书记初期，民主集中制和党内监督制度还是得到了贯彻。苏共十七大以后，在党的组织生活中，个人集权制逐渐取代了民主集中制。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虽然在形式上对斯大林时期苏共组织路线的错误作了某些“修正”，但在领导体制上，不过是由一个人说了算改成了少数几个人说了算。戈尔巴乔夫时期，则是抛弃民主集中制原则，走向“民主化”的极端。宣布苏共中央自行解散这样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大事，就是戈尔巴乔夫个人作出的决定。

3.苏共严重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干部路线

苏共垮台是同它在干部工作中的一系列错误分不开的。正是在干部问题上抛弃了民主集中制，苏共在列宁时代确立并实行的选用干部的政治标准和德才兼备原则也随之被任人唯亲所取代。赫鲁晓夫把自己的老婆、女儿、女婿都委以重任。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无一不是如此。这是苏共从内部被攻破的一个重要原因。

4.苏共严重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群众路线

组织路线和干部路线的错误，导致苏共背弃了群众路线。随着统治地位的巩固，苏共逐渐把群众路线抛到脑后，人民群众的利益受到极大伤害，对党逐渐冷漠甚至仇视。在捍卫党和社会主义政权的力量与反党反社会主义势力对垒的时候，广大人民甚至共产党员无动于衷，有的还为反动势力推波助澜。所以，我们才目睹了苏联人民为苏共亡党举行了一个过于平静的“葬礼”。从这个方面看，背离群众路线使得苏共丧失了最后一道防线。

四 苏联解体后果再思考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 于洪君

苏联解体造成的阵痛仍然折磨着俄罗斯、独联体国家和人民。

普京认为，苏联解体是“21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悲剧”。实际上，其影响远不限于此。苏共的继承者俄共的党员持续萎缩；在其他独联体国家，除摩尔多瓦共产党、乌克兰共产党在政治舞台上尚有一定的影响外，其他国家共产党的声音日益微弱。俄罗斯独立之初曾对西方合作寄予厚望，但西方利用俄衰弱之机向俄步步紧逼，利用反恐之机，美军进驻中亚和外高加索，撺掇部分独联体国家加入北约。俄罗斯安全环境好转与否的主动权掌握在西方手中。

美国一超独霸的地位有所削弱，但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大行其道，国际安全体系依然严重失衡。冷战和两极格局结束并没有给世界带来普遍安全与和平。冷战结束后，西方共发动了5次战争。如果说，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美国得到联合国授权和世界多数国家支持，因此还有一点“合法性”的话，那么其他4次战争则都是为了美国和西方的一己私利。只要美国捍卫美元地位的意志不动摇，美国再次发动战争的可能性就难以排除。

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成为国际社会必须共同应对的问题。苏联解体之后，传统安全问题依然是各国关注的重心。同时，非传统安全问题如恐怖主义、毒品走私、经济危机、水资源短缺、非法移民、环境恶化等日益突出，尤其是2001年发生在美国的“9·11”恐怖事件，揭开了国际联合反恐的新篇章。解决任何非传统安全问题，都需要国际社会通力合作。

西方的价值观和自由市场模式破产，世界各国的发展道路选择更趋多元。苏联解体曾使西方以为可以一统天下。多党制议会民主、言论自由、信息开放、市场经济等，成为转型国家效仿的对象。然而，发生在东亚和拉美国家的金融和经济危机，使这个模式遭到强烈质疑。2008年美国金融经济危机爆发，宣告了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彻底破产。以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等为代表的非西方价值观的影响上升，西方的价值观和发展模式难以再成为国际社会的偶像，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将成为世界各国的选择。

五 苏联剧变和解体缘于内部因素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赵曜

20世纪有两件震惊世界并改变世界格局的事件：一件是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一件是苏联剧变和解体。前者是喜剧，后者是悲剧。苏联模式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反法西斯战争和战后恢复工作曾起过积极作用。由于模式僵化，70年代后孕育着一场危机，但并没有死亡的迹象。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登上苏共中央总书记的宝座。他改旗易帜，不但没有解决苏联历史遗留的矛盾和问题，反倒出现全面危机，只用了5年多时间，一个和美国平起平坐的超级大国就在地球上消失了。苏联剧变和解体缘于内部因素，“问题出在苏联共产党党内”。戈氏上台以后，看到苏联社会问题成堆，主张对社会各个方面进行改革，这是对的。但是，戈氏改旗易帜，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背离了原来“完善社会主义”的宗旨和轨道，改革变成改向和改制，从而葬送了社会主义事业。

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一是苏共的蜕化变质。各级领导干部脱离群众、养尊处优，关心的只是维护既得利益。到20世纪80年代，占据苏联党政机关要职的“精英”们放弃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代替以典型的物质主义、实用主义。二是领导集团的背叛。戈氏上台后，形成了以戈氏为中心的右翼势力主导的政治局。这些人有的是民主社会主义者，有的是自由主义者。在他们身上，不仅存在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动摇的问题，而且存在背叛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问题。三是国内外敌对势力的颠覆。敌对势力利用苏联的改革和困难，加大了和平演变的力度，对苏联软硬兼施。戈氏的民主化和公开性，把反社会主义力量释放了出来。反对派降生后，又利用民主化和公开性不断壮大自己，夺权欲望急剧膨胀，从而使苏联解体。

苏联在70多年的历程中制定了宪法和法律，但是没有形成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实行的是人治而非法治，最高领导人一句话比任何法律都管用，宪法等于虚设。它是苏联未能阻止解体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一个重大历史教训。

六 经济学“西化”：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

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何干强

“500天纲领”是《向市场过渡：构想与纲领》这部书的浓缩版。这部书由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共同决定组织撰写。所谓“500天纲领”，就要在从1990年10月1日开始的500天之内，通过各种“非常”政策措施，彻底改变苏联国民经济的基础和结构，转向所谓市场经济，实质是转向资本主义经济。

贯穿“500天纲领”始终的两个关键词，就是“经济非国有化”和“私有化”。“500天纲领”渗透着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性质特征，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必然造成严重的危害。主要表现在：把“非国有化”和“私有化”作为改革的首要方针，把构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作为改革的目的；混淆经济形态的一般与特殊，用转向市场经济掩盖转向资本主义经济；借口突出“企业家”的经济地位，实质是要培育资本家阶级，等等。

与此同时，在其他一些层面也存在相应的错误倾向，加速了苏联解体的进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苏共高层领导推行资产阶级虚伪的“普世价值观”。在“普世价值观”指导下，他们起用经济学界的“西化精英”为改革出谋划策；让西化“改革派”进入苏共领导核心，打击、压制马克思主义正义力量。苏共高层对经济学“西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二是经济学界存在背离历史唯物主义的严重倾向。苏联探讨经济改革的学术文献中不乏一些主张公有制经济与商品货币关系相结合的科学观点，但是占主流地位的现象，则是先把社会主义经济与商品货币关系对立起来，后来则转向另一个极端，用市场经济否定公有制经济。

三是高校淡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学和学科建设。这就使经济学“西化”在苏联迅速蔓延，滋生出大量反社会主义的自由化“精英”。

四是放弃对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这造成了经济

学“西化”的社会思想条件。

七 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吴恩远

我们应当从苏联解体事件中吸取什么教训？

有一种观点认为：“斯大林模式”导致了苏联解体。这种观点忽略了经戈尔巴乔夫改造后的“制度”、“体制”对苏联解体的作用。戈尔巴乔夫猛烈地抨击“苏联社会主义体制”和“斯大林模式”。苏共二十八大的决议和纲领性声明中写道：“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已被自由的人们的公民社会所取代”，明确宣布和苏联社会主义体制彻底决裂；同时修改宪法，取消苏共对社会的领导；制定新联盟条约，取消原苏联名称中的“社会主义”几个字……奉行另一种制度。那么，到底“哪一个制度”导致了苏联解体？而且戈尔巴乔夫不正是按照上述观点批判和改造“苏联模式”、“斯大林模式”的吗？为什么反而导致了国破家亡的后果？

人类今天已经进入法制社会。因此我们追究任何一个事件的责任，首先必须从法理的角度来探寻，而不是凭主观臆想。

1990年3月，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关于设立苏联总统职位和苏联宪法（基本法）修改补充法》，对苏联的总统职责作了如下规定：①对维护苏联公民权利和自由、维护苏联宪法和法律起保障作用；②采取必要的措施维护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的主权、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实现苏联民族国家制度原则。宪法对总统在维护国家宪法、“主权和领土完整”方面应当承担的职责规定得十分清楚，而戈尔巴乔夫在担任苏联总统一职期间，既没有“保障”苏联宪法不被破坏、苏联公民权利不受侵害，也没有维护国家领土和主权的完整，难道能辞其咎？

当我们在讨论苏联解体的原因时，首先应当听取和尊重俄罗斯人的意见，因为这毕竟是他们的国家，是他们的切身经历和感受。

2001年，俄罗斯科学院综合社会研究所就“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进行的民意调查表明：有44%的被调查者认为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应对苏联解体承担主要责任；而认为是“苏联社会经济危机”所致的被调查者只占17.2%，认为是“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危机”所致的被调查者只占11.2%。

八 苏联解体进程中意识形态的作用及其教训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副会长 曹长盛

苏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元化指导地位。但从赫鲁晓夫时期开始，苏联削弱并最终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一元化的指导地位。戈尔巴乔夫时期公然主张在意识形态领域搞自由主义的多元化，在国内外敌对势力的相互作用和影响下，各种错误思潮在意识形态领域呈现出来，使得党和国家失去了科学理论的指导和正确的舆论支撑。

20世纪50年代中期，苏联出现了哲学“人道化”的倾向，用抽象人道主义取代马克思主义哲学。80年代，抽象人道主义成为官方支持的哲学主流。这种思潮通过各种渠道，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推动着苏联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变化。戈尔巴乔夫把这种思潮作为制定党和国家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论基础，推出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提出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纲领。结果导致党的指导思想和性质被改变、党的领导地位被动摇和取消，加重了国家的经济困难和社会矛盾，以致全国政治、经济、民族、社会各个方面的危机加深，最终苏共被取缔，苏联解体。

戈尔巴乔夫等人用民主社会主义作为改革的指导思想，倡导实行所谓“民主化”、“公开性”、“多元化”，造成了各种错误思想和反动思潮的泛滥，搞乱了人们的思想；导致苏联革命和建设的成就遭到否定，使人们对社会主义事业失去信心，结果只能是导致社会主义苏联的覆灭。

九 裂变、失败与崩溃——苏联政治改革与民主化的教训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张树华

历史表明，苏联解体是苏共后期蜕化变质的结果。戈尔巴乔夫的盲目的政治改组和匆忙的民主化正是这一过程的加速器和导火索。

1.政治道路：改革而不应改向

1983年，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考察几个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后得出这样的结论：苏东国家共产党人已经失去信仰。这些国家正在崛起的一代领导人，不是思想家而是务实派。戈尔巴乔夫自己承认，他早就不相信科学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因此在上任后便企图用“西欧式的社会民主思想”来改造苏共。

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的手段，改革不能变成“信仰放弃、方向背弃、主义抛弃”，改革不是改向。打着“民主、人道”旗号的民主社会主义政治思潮不仅使得苏联改革误入歧途，而且葬送了74年的苏联社会主义事业，埋葬了国际共运中最具影响力的、有着90年历史的苏联共产党。

2.苏共领导：坚持而不应放弃

苏维埃国家联盟是苏共一手创建的。苏共是苏维埃政权和政治体系的根本和核心，是整个苏联大厦的支柱和栋梁。然而，戈尔巴乔夫视苏共为“绊脚石和阻碍机制”，采取“非党化、去苏共化”的政策。在5年左右的时间里，苏共遭受了被改组→被削弱→被边缘化→被分化→被抛弃的悲惨命运。失去了苏共也就没有了苏联。广大党员对党的前途失去了信心，引发了大批苏共党员退党。大批党员退党或脱党实际上是对戈尔巴乔夫搞垮苏共的不满和抗议。

3.宪政制度：完善而非拆毁

苏共领导地位、苏维埃社会主义政权、联盟国家是苏联政治制度的三大根基。戈尔巴乔夫通过激进的政治改组拆毁了苏联国家和宪法的根基。1990年前后，戈尔巴乔夫积极推动修改苏联宪法，取消了苏

共的领导地位；宣布政治多元化，实行多党制；设立独揽大权的总统职位。戈尔巴乔夫开启的民主化运动落入陷阱，政治改革也随之走向了绝路。

十 苏联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祸福系于一体

前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埃贡·克伦茨

有两个观点非常重要：

第一，苏联解体是一场世界政治悲剧，给全球带来了严重后果。帝国主义的力量得到了增强。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取得的胜利成果被葬送了。北约组织一直东扩到俄国边境。1945～1990年，欧洲度过了现代历史上最长的和平时期。现在，战争的踪迹重新出现，比如南斯拉夫、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

第二，苏联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祸福系于一体。民主德国的终结与苏联的解体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早在20世纪70年代已经出现某些征兆。1981年10月21日，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向埃里希·昂纳克派遣了一名私人特派员。他带来的消息是：苏联再没有能力满足民主德国的原材料需求，尤其是石油。这触动了民主德国的生命线。

1949年，苏维埃政权称民主德国的建立是“欧洲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同样，民主德国的消失也是欧洲历史的转折点。社会主义模式被毁灭了，这种模式从苏联的远东一直延伸到欧洲的易北河和韦拉河。苏联解体不是人民革命的结果。它被国家领导从上面破坏掉，由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的亲西方派系破坏掉。

戈尔巴乔夫在他政治生涯的一开始就说，他已经决定“去除共产主义”。戈尔巴乔夫事后也完全承认是这样，结果更是如此。党和国家脱离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是因为苏共放弃了纲领和原则。

对苏联解体有很多种解释。遗憾的是，目前还很少看到从马克思主义角度进行的全面分析。请不同国家、不同学科的专家和这段历史

的见证人聚集一堂，共同研究苏联解体的原因，是此次会议的一大功绩。1989年、1990年和1991年发生的事件并不是社会主义的毁灭，只是那种在欧洲占统治地位的后来变了味的苏维埃模式的失败。任何真正为社会主义理想而奋斗的人，今天都不会忽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经验。我们寄希望于中国，相信她能走出一条成功的社会主义道路。

十一 关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现状与展望

越南共产党中央对外部副部长 阮孟雄

苏东社会主义制度的瓦解引起全世界的政治震动，导致世界社会主义陷入低潮，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陷入危机。现在情况如何？今后向何处去？为回答上述问题，我们要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作为一个现实运动来看待。它包括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和活动在各国政坛的共产党、工人党，它们有着共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基础，有着共同的政治目标：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胜利而奋斗。

目前有5个社会主义国家。苏东剧变虽然给它们带来了巨大冲击，但它们今天不但站得稳，而且取得了世界公认的新发展，并正在积极进行理论和实践探索，寻求符合本国国情的、民族的、与时代变化相适应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越南、老挝三国占全世界*GDP* 的比重从1991年的1.72%增加到2009年的8.64%。这些数字本身已说明目前社会主义的发展趋势。

1960年召开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时，世界上有87个共产党和工人党。苏联解体后，其中的不少党已不存在，或者分裂转化，同时又形成了若干新党。目前有136个共产党和工人党正在世界83个国家活动。除社会主义国家的5个政党外，其他各党基本上度过了危机阶段并保持着组织的稳定；各党都根据时代和国情变化，调整了党的纲领和政策。

苏东解体后，共产党和工人党之间的关系曾一度中断。从20世纪

90年代中期开始，各党之间积极恢复和更新它们之间的团结与合作。新的关系准则是：发挥独立自主，互相平等，克服以往出现的有悖于工人阶级国际主义的现象。

21世纪头几十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现状和前景如下：其一，运动还没有彻底摆脱危机，但已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正在恢复并有了新的发展。其二，各党在国际上的合作与行动协调是今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主要方向。其三，在向前发展的同时仍有可能出现局部倒退。运动的前途主要取决于现实社会主义的发展，取决于社会主义国家如何体现自己的人道主义和解放的本质，以及利用人类文明成果为群众谋求自由与平等，实现民主、公平和社会进步的能力。

十二 苏联崩溃的原因：俄罗斯国内争论的若干结论

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中央书记

德米特里·格奥尔吉耶维奇·诺维夫

苏联的崩溃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很多人认为，指令性管理下的计划经济模式是导致苏联衰败的原因。然而，这种结论没有得到客观数据的佐证。苏联曾是世界上最稳定的经济体之一。1928～1987年，苏联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4倍。即使在20世纪80年代，年均增长率也达到3%～4%，这种发展速度与发达国家的标准不相上下。关于苏联技术落后的观点也不符合历史事实。80年代，苏联使用的工农业生产技术或工具基本上都是苏联自己研发的，其中符合世界水准的占70%，超过世界水准的占15%。认为军事工业的过度消耗造成苏联经济走向衰败的观点也站不住脚。戈尔巴乔夫多次声明，苏联的国防消耗占整个国民收入的20%～40%。实际上，按照苏联国家统计局的数据，80年代用于军工的支出只占苏联国民经济总产值的10%。显然，这种水平的消耗不可能导致苏联经济走向崩溃。

苏共的危机加速了苏联崩溃。主张“改革”的思想家要求国家“非党化”。删除苏联宪法第六条的做法，粉碎了苏维埃国家管理体制的关键环节。与此同时，苏共党内的意识形态危机不断加剧。苏共领导在

二十八大上表现软弱，大会通过的《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声明和关于在党内可以建立各种党派的决议破坏了党的思想统一，使苏共变成一个争论不休的俱乐部。戈尔巴乔夫的左右摇摆更加速了党的分裂。最终，被剥夺实际职权、混乱的苏共中央无法抵抗分裂趋势，导致国家走向解体。

戈尔巴乔夫的政策使苏联遭受重创。1985～1988年，国家领导层开启了无法掌控的政治改革进程。“公开性”非但没有推动社会民主化，反而被利用变成了部分人操纵社会舆论的机制。自由主义势力组织了强大的攻势，瓦解了苏联社会的思想基础。“民主派”掌握的大众传媒一波接一波地在社会上散布消极信息，歪曲苏联历史，颂扬美国和西方，许多苏联人因而迷失了方向。改革始于“更多的社会主义！”这一口号，却以反社会主义的政变而告终。最后，应该指出西方特工机构的破坏活动和社会主义国家联盟的瓦解也加速了苏联的崩溃。

十三 苏联解体与当今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

美国马萨诸塞大学阿姆斯特分校教授 大卫·科茨

资本主义因剥削劳工而获得利润，资本家对利润的无止境追求，意味着资本主义在创造巨大财富的同时，会不可避免地造成贫困、恶劣的工作环境、经济的不稳定、与过度劳累相随的失业、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以及帝国主义为争夺主导权而进行的战争。克服这些问题，需要用更高级的人类社会形态来替代资本主义，这就是社会主义。通过消灭剥削，将生产的目的从为少数资本所有者创造利润，转变为满足人类需求，社会主义因此可以规避上述所有问题。这个可行、可实现和更优越的替代资本主义的理想，激励了成千上万的人，将一生奉献给了社会主义运动。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并未对社会主义社会提供一种具体的分析，早期的社会主义运动还是对社会主义的一些关键要素形成了基本的共识：①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代替由少数人拥有它们的私有制；②根据人们的需求制订经济计划，并用来指导社会的生产与分配，而不再是由利润来决定；③工人阶级成为新社会的领导者。

在70多年的历史中，苏联社会主义尽管有不可否认的缺陷，但它仍用实践证明了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的可能性。有人认为，苏维埃经济体制缺乏可行性和优越性，所以苏联才会解体。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事实上，自20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中期，苏维埃制度带来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在那之后只是增速有所减缓。1990年夏天，中央计划停止执行后，经济增长也停止了。增长速度减缓不表明社会主义失败了，它说明对社会主义进行改革的必要性。苏联解体不是因为实行了社会主义制度，而是由于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含有严重的缺陷。最为严重的、根本性的缺陷在于，劳动人民无法在经济或国家事务中实现其权利。一个由精英来保障劳动人民利益的社会主义制度，无论如何完善，都不是一种稳定的形式。可持续的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人民对经济事务与国家事务都享有权利的基础之上。

社会主义运动应当从苏联的实践和导致苏联解体的矛盾中，吸取经验和教训，开创出21世纪的新型社会主义，推动社会主义运动不断发展。我们也应当考虑到通信和信息传播技术的巨大进步，这可以使经济计划更加有效和灵活，更好地回应人民的需求。

十四 当前俄罗斯的历史问题

俄罗斯国立社会大学校长、科学院院士

瓦西里·伊万若维奇·茹科夫

正如大家所知，在俄罗斯历史问题上的造假行为已经十分普遍。为了贬低苏联战胜德国法西斯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中的作用，有人出版了不计其数的书籍来贬低莫斯科保卫战、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等的作用，极力宣扬英、美等国在战争中的作用。在有的书籍中，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用两三行就写完了，而对于北非战场却用了很多章节，描写得非常详细。事实上，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比其他战役都要残酷得多，它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

史学家应客观公正地评价历史和历史人物。在讨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是，在这场战争中“人民”取得了胜利。

当然，没有“人民”，胜利是不可想象的，但是人民需要有人来领导。因此，斯大林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作用是不可抹杀的，同样，苏联共产党的作用也是不可抹杀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共有700万名党员，其中300万人战死在前线，后方的党员们不分昼夜地工作来保障前线的需要。所以，历史是人民最主要的财富，而政治领袖则是其中的瑰宝。如果我们贬低前人在历史中的作用，就等于贬低我们自己。

十五 战争与和平：谁将获胜？

国立莫斯科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教授

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多博林科夫

苏联消亡是20世纪地缘政治中的一场浩劫。我们认为，只有根据现代战争的理论才能搞清楚它解体的原因。由于美国和西方国家联手搞冷战，苏联遭受失败。冷战实际上是“第三次世界大战”，是一场以全面战胜对手为目的的信息战、意识形态战。

苏联解体之后，美国的目的是统治整个世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美国已经针对全人类发动了“第四次世界大战”。这场战争沿着三个方向进行：一是向进攻对象国的居民和政治精英进行信息心理宣传。二是在这些国家建立代理机构，通过“第五纵队”里应外合。三是对那些强调主权和自主发展的国家，搞“颜色革命”，建立亲美的政府。自由主义的现代化就是一场不宣而战的大会战。在新自由主义的作用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和东方出现了两大文明之间的对立。富裕的西方与贫穷的东方相对峙。美国期望通过对峙和斗争，全盘西化东方。这完全是一相情愿的梦想。俄罗斯和中国需要与其他东方国家一道建立国际反自由主义阵线，只有这样才能遏制美国称霸全球的野心。

附录三 论文摘编

一 从苏联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教条化看苏联解体

刘华初

苏联解体已经20年了，但是，20世纪人类历史上的这个大事件所产生的影响依然像大地震的余波一样还没有完全消失，它对当前世界的深远影响几乎可以与十月革命相提并论。对苏联解体进行研究的文章、书籍非常多，对苏联解体的原因也涉及各个方面，从政治的、经济的，到国家管理的，还有军事竞赛等各个方面进行的分析，不一而足。本论文试图从苏联是如何解读历史唯物主义这个思想理论方面来探究苏联解体的原因，因为苏联的意识形态色彩非常浓厚，它对政治统治和社会权力结构的影响非常强烈，与其政治制度、社会大众的日常生活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可以说，苏联版的唯物史观是其意识形态中的一根重要支柱，并成为其精神统治的重要力量。

然而，不幸的是，苏联共产党高层对唯物史观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理解，如果说在早期普列汉诺夫、列宁时期还是具有生命力的话，那么在布哈林的理解中就丧失了辩证法而带有僵化趋向，并在斯大林时期变得教条化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偏离了马克思的原意，演变成了一种进行思想统治的僵化的教条。马克思活的思想在政治统治的需要下变成一种死的意识形态工具，权力的鞭子，尤其是斯大林等人用来排斥不同意见者的手段。对于共产党来说，意识形态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但如果用政权来垄断思想的真理性，就只能是封建社会的遗留，它显然已经不符合时代的发展潮流了。因为封闭的社会注定会被开放的、自由而普遍交流的社会所取代。权力有权力的运作形式，但建立在意识形态垄断基础上的统治权力迟早是会崩溃的。原苏

联共产党中央书记，后来担任俄共中央书记的久加诺夫曾说，苏联共产党垮台的真正原因是它的三条垄断制度，即有权力的共产党员以为自己所想所说都是绝对的真理——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制度；有权力的共产党员以为自己的权力是神圣至上的——垄断权力的政治法律制度；有权力的共产党员以为自己拥有不能言表但可以做的特权福祉——垄断利益的封建特权制度。久加诺夫把意识形态的垄断放在首位，这表明了对于苏联共产党来说，意识形态具有极端重要性。苏联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及初期稳固政权都极大地依靠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先进性。但是，在持久的建设年代，这种先进性需要与时俱进，既要实现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重心转移，又要以开放的心态灵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积极地建设和发展理论，创造性地建设精神文明，而不是坚守教条化的思想。

二 民生问题是如何促使苏联解体的？

卢继元 李守超

（一）民生问题摧毁了对社会主义的信仰

1.“两化”的后果严重损害了农民利益

斯大林式工业化道路的结果是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20世纪80年代中期，从社会总产值的结构来看，苏联农轻重三者的比例关系为2：2：6，严重影响了经济的正常发展，制约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影响和动摇了人民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和信仰，从而最终动摇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

农业集体化虽然在短期内为工业化提供了某些条件，但是它造成的负面影响却是长期难以消除的。强制推行集体化运动，带来了消极的后果：不愿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民在绝望中屠宰牲畜、毁坏农具和焚烧谷物，导致了20世纪30年代发生大饥荒，苏联人民为此付出了沉痛的代价。此后，苏联历届政府在农业政策上都出现了严重失误，这是苏联解体的深层次原因之一。这一教训值得我们深思。

2.苏联人民生活水平与发达国家差距的拉大使人民丧失了对社会主义的信仰

进入20世纪70年代，苏联经济增长率呈下降趋势。1971～1975年，国民收入增长率为5.7%；1981～1985年，为3.2%，1990年为下降4%，1991年为下降15%。食品和日用品供应矛盾加剧。据苏联统计，在1200多种基本消费品中，95%以上供应经常短缺。1985年食品短缺总额达175亿卢布，1988年达210亿卢布，1990年达1000亿卢布，能提供的商品总额只及居民货币收入的12.9%。在211种食品中有188种不能自由买卖。通货膨胀愈演愈烈。据苏联计划委员会的数据，消费领域的通货膨胀率，1897年为7.3%，1988年为8.4%，1989

年为10%~11%，1991年已达到145%。80年代，苏联在诸如彩电、音响、录像机、小汽车等现代消费品的生产和消费水平方面，不仅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甚至落后于发展中国家。失业人数激增。到1991年7月1日，苏联居民前往安置局求职的大约有1300万人。人民生活明显受到影响，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了迷惘。同时，西方国家对苏联加紧进行渗透，宣扬西方的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动摇了人民的社会主义信仰。

（二）民生问题动摇了民族团结统一的基石

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出，社会主义时期的民族问题已不再是民族压迫和剥削问题，而是各民族在经济文化上存在的事实上的不平等，是各民族人民在民生上的差距和不平衡。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应帮助落后民族，尽快改善落后民族人民的民生状况，为民族平等团结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然而，苏联长期固守“民族问题就是阶级问题”，陶醉于一劳永逸地解决民族矛盾，不切实际地推行“一体化”、“民族融合”的错误理论和政策，结果在实践中积累了大量民族问题，激化了民族矛盾，留下了隐患，一旦时机成熟，各种隐患便如火山爆发一样而难以收拾。

1.苏联的民生问题使之失去了凝聚各民族的吸引力

与美国相比，苏联在人口、领土、资源、居民的受教育程度等方面占优势，但在与美国的竞赛中，除军事力量外，苏联的经济实力、人民的生活水平不仅始终没有赶上美国，而且差距也没有缩小。到苏联解体时，其GNP占美国的比例与沙俄时期基本相当。苏联人的生活水平与质量不仅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甚至还低于东欧国家和曾经落后的亚洲国家，这使得各民族对“苏联”产生反感乃至敌意，联盟国家失去了凝聚力。

2.少数民族的民生问题为民族分立主义恶性发展提供了土壤

一是因强迫少数民族迁徙带来的少数民族民生问题。对民族纠纷或分离，当局不是实行民族迁移，就是采取武力镇压，直至取消他们

的自治机构，给少数民族带来了痛苦和灾难。二是因经济社会发展失衡带来的少数民族民生问题。由于苏联在政治上实行高度集权的中央统治，经济上实行大一统的计划体制，使得一些加盟共和国形成了单一的生产体制，成了俄罗斯或其他一些先进共和国的生产原料和劳动力的供应地和工业产品的推销地，也使一些加盟共和国的生态环境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民族构成和社会结构发生了特殊变化，使少数民族对民族政策和政权产生不满。三是因拉平经济政策带来的少数民族民生问题。“勃列日涅夫把拉平各共和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作为短期内必须实现的现行政策，特别是在实际工作中忽视各共和国的自身特殊利益，人为地采取‘一平二调’的政策，既助长了一些落后地区的依赖心理，也引起一些发达地区的不满。”发达地区感到拉平经济政策使他们加入苏联吃了亏，而落后地区又因为没有拉平而感到委屈。

（三）民生问题销蚀了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源泉

在苏共党内形成的官僚特权阶层使党群关系畸变，民心流失，这是导致苏共亡党的决定性因素。苏联社会科学院曾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其中认为苏共代表工人的占4%，认为苏共代表全体人民的占7%，认为苏共代表全体党员的占11%，而认为苏共代表党的官僚、干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占85%。据1991年初的民意调查，苏联政府的支持率仅有13%，不支持率达73%。

三 政治资源流失对苏联解体的影响

何妍 石松

苏联解体与政治资源的流失有紧密的关系。苏联政治资源的流失主要表现在政治（国际政治）、经济（世界经济）、安全（国家安全）三个方面。马克思主义认为：“每一个历史时代的经济本质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和精神的历史基础。”[1] 这阐明了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即政治是经济的表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又对经济基础有强烈的反作用。宋新宁认为，在国际政治和经济的相互关系上，首先表现的是国际经济是国际政治的基础。但是，尽管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却不是被动地接受经济的影响和作用，而是能动地反映经济并作用于经济。有时这种反作用甚至具有决定性的意义[2] 。苏联政治资源的流失对其解体的影响也是在这三者之间交错，相互影响、互为关系的。

（一）资源流失造成经济恶化为解体埋下伏笔

由于政治资源不断流失，苏联经济负担加重，经济形势恶化，国家经济濒临破产边缘，这给苏联的解体埋下了伏笔。

由于政治方面政治资源的流失，首先苏联为了控制和稳住东欧，1960～1980年给予了东欧国家总计约为870亿美元的补贴，还承受了华沙条约组织防务费用的80%[3] 。这样做的结果是苏联背上了沉重的军事援助包袱。其次，苏联采取了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的战略，以保障苏联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世界争霸的目标。军备竞赛战略使苏联背上了沉重的经济负担，经济结构也呈畸形发展。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军费开支开始高速增长。1965～1979年军费平均每年递增8%，其中1970～1975年军费增长近1倍，远远超过了同时期苏联国民收入和社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到1979年，军费开支比1965年增长了3倍以上。由于苏联军费支出快速增长，使其军费支出总额很快就超过美国，从1972年开始苏联一跃成为世界上军费开支最大的国家，它在

20世纪70年代的累计军费开支超过美国20%～30%，1979年甚至超过美国50%。同时在进入70年代以后，军费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越来越高。苏联1979年的军费开支已占当年财政支出的30%以上，占国民总收入的20%以上，占社会总产值的12%～13%。军费支出相当于全年社会新创造财富的1/5，几乎等于当年对国民经济投资的总和。军备竞赛在耗费大量财政资金的同时，还耗费大量物资。1980年苏联机器制造和金属加工业将近50%的产品用于军事目的。整个工业投入军工生产的比重达到40%左右。其中仅用于制造武器的金属消耗每年就大约增长8%，每年用于扩军备战的油料消耗相当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苏联4年耗油量的两倍左右[4]。这样的消耗是一个国家经济难以承受的。在工业发展中，苏联重点仍然发展钢铁、机械、金属等传统的重工业部门，民用工业既不受重视，也不发达，一些起码的日常用品都感缺乏。军事工业为重中之重，与军工密切相关的部门发展非常快，如在1971～1980年，机器制造业产值增长了1.7倍，这比工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高1.2倍。而同期的仪表制造业产值剧增了3.3倍，其中电子计算机增长9倍。苏联把85%以上的工业投资用于发展军事工业。从轻、重工业的比例看，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一度拉平甲、乙两类工业的增长速度，但在“九五”与“十五”计划期间，这两类工业增长速度的差距又拉开了，即由1966～1970年间的1.04：1扩大到1971～1980年的1.28：1，这一差距较1951～1960年间的1.2：1和1961～1970年间的1.18：1都大[5]。这一时期片面发展重工业，是以牺牲人民消费品生产为代价的。因为，从当时苏联经济实力和水平看，它做不到军事工业和消费工业同步发展。长期以来，苏联市场供应紧张，苏联的消费市场经济一直处于短缺状态。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六大上也谈到，许多地方“向居民供应食品的困难依然存在”。他说：“许多消费品，特别是纺织品、皮鞋、家具、电视机的生产计划，年复一年地没有完成。在质量、装潢、品种方面没有取得应有的进步。”[6]

由于在国家安全方面政治资源的流失，苏联又加大了在这些地区的军事投资，使得经济上的负担越来越重。为了对抗中国，苏联在中苏边境建立军事基础设施就耗资2000亿卢布（当时1卢布兑换1.6美

元）[7]。同时，加强对蒙古和越南的援助。1945～1980年，苏联给蒙古的经济援助可能超过23亿美元，每年给予价值约为6.75亿美元的经济援助。越南是苏联在东南亚的重要战略据点，苏联为越南提供的经济、军事援助每天为250万～300万美元（全年为9亿～11亿美元），实际上还可能超过这个数字。1955～1980年，苏联给了越南47.2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和东欧国家一起又提供了将近17.6亿美元的援助。苏联集团的援助相当于越南国民收入的25%[8]。为了稳定在非洲的局势，1978年在欧加登战争时，苏联向埃塞俄比亚提供了大约1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以后出现了越陷越深的局面。“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埃塞俄比亚三国每年要消耗苏联30亿美元。”[9]由于古巴在非洲派出了大量兵力作战，这是符合苏联的需要的。为了支持古巴，苏联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向古巴提供的援助每年平均达46亿美元，将近古巴国民生产总值的1/4。苏联还向它提供所需要的全部石油和石油制品，并以相当于国际市场5倍的价格进口古巴的砂糖。1961～1978年，苏联对古巴的经济援助总额相当于130亿美元，其中40%是双边优惠贷款，60%是无偿地用于食糖、石油和镍的贸易补贴[10]。为了稳定在阿富汗的局势，苏军入侵阿富汗动用了10万军队。占领阿富汗后，苏联在这个国家每年的军费开支是50亿卢布，这对停滞不前的苏联经济来说，战争拖得越久，战争开支和对阿富汗傀儡政权的经济、军事援助就越成了沉重的负担。最后，苏联为入侵阿富汗共损失了600亿卢布[11]。

在这些政治资源流失的影响下，苏联经济已经接近崩溃的边缘。1989～1990年，苏联国内债务由4000亿卢布剧增到5000亿卢布。外债由560亿卢布剧增到700亿卢布。财政赤字从1985年的180亿卢布猛增到1989年底的920亿卢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0%）[12]。苏联的财政已经捉襟见肘，危机重重，几近崩溃边缘。苏联经济上的不堪重负，给苏联的解体投下了深深的阴影。

（二）领导人急于改变现状使国家面临解体

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政治资源大量流失，在他去世以后，苏联经过了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的过渡期。苏联在这两位领导人时期并没

能改变政治资源不断流失的态势，到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形势已经变得非常严重了，这使得苏联领导人急于改变现状。戈尔巴乔夫在国内首先提出了经济“加速战略”，进而着手对僵化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以扭转经济恶化、经济方面政治资源流失的局面 [13] 。但是，经济改革并不成功，于是，戈尔巴乔夫就把方向转向了政治等其他方面。他提出“新思维”、“民主化”、“公开性”等思想，在政治方面进行改革，在这种背景下，苏联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国家出现解体危机。

首先，戈尔巴乔夫认为冷战思维是以前领导的错误思想，苏美之间进行冷战严重导致了苏联国际环境恶化，进而让苏联不断走扩军的道路，并陷入世界多个地区的战争。他认为，苏联在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中也要有“新思维”。这种新思维就是“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在这一新思维指导下，苏联进一步采取了与美国的“缓和”政策。对美国的“缓和”政策使得美国加强了对苏联遏制的信心，里根总统宣布“星球大战”计划，在与苏联全球争霸的过程中由防御转向进攻 [14] 。1989年布什总统提出“超越遏制”战略，美国全面公开地插手苏联内部事务。1991年7月底布什访苏时，毫无顾忌地对苏联的内政外交横加指责。美国不仅大力支持苏联境内的分离主义运动，还在外交上孤立苏联，迫使苏联向美国靠拢 [15] 。苏联国家联盟在国际上无能为力，而分离主义势力在外国的支持下不断壮大，使苏联走向了分解的道路。

其次，为了配合“民主化”、“公开性”的思想，戈尔巴乔夫针对各共和国纷纷要求主权的行动一再让步，对各加盟共和国的经济主权给予无限度承认。1988年，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等加盟共和国提出主权问题，中间包括经济主权的要求。1989年和1990年，苏联中央对各共和国的主权问题几次让步。根据最终让步的结果，各共和国在土地和自然资源的归属、各共和国的所有权、各共和国的经营权、联盟企业的归属和联盟预算收入等问题上取得了很大的权力 [16] 。对各加盟共和国的主权给予承认实际上使苏联中央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而各加盟共和国有了实际的主权作为基础后，独立的实力和意愿加强了。

再次，为了适合苏联外交“新思维”的需要，苏联认为东欧地区在

美苏对抗中的地位不再重要了，于是开始减少对东欧的援助，并甩掉东欧这个“包袱”[17]。苏联鼓励东欧国家进行改革，并对东欧国家出现的政治动荡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1989年戈尔巴乔夫在访问芬兰时，特意提到东欧，公开宣称“苏联将不妨碍正在东欧发生的变化”[18]。苏联的这种态度给了东欧的反对派以信心，而对于当权的领导人却只能一路退却。1989～1990年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都发生剧变，社会主义的体制被推翻，各国的共产党失去政权。东欧剧变不仅鼓舞了苏联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的士气，还鼓舞了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分离主义的势力，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独立趋势加强，加速了苏联的瓦解。

最后，为了改变苏联在阿富汗陷入的困境，1985年戈尔巴乔夫开始准备从阿富汗撤军。苏联从阿富汗撤军实际上承认了苏联的失败。苏联的失败使得苏联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破灭，也造成军队士气低落、厌战。这也使苏联的领导人动摇了用武力来压制其他加盟共和国独立的决心[19]，这为后来各加盟共和国敢于脱离中央而独立开了方便之门。

（三）民族分离运动兴起造成苏联解体

苏联民族方面政治资源一再流失，国家的民族凝聚力已经变得十分微弱，戈尔巴乔夫时期分离主义的倾向愈演愈烈，政治资源损失殆尽，国家也最终瓦解。

苏联民族分离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各地方加盟共和国的地方民族主义，它们意图摆脱长期以来俄罗斯的侵略和压榨；另一方面是俄罗斯共和国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它认为其他加盟共和国的发展都是俄罗斯承担的，因此要摆脱它们的束缚。这两种倾向都把矛头指向了苏联中央，因此，在这两种力量的合力下，苏联国家联盟也自然轰然坍塌。

第一，各地方民族主义的分离揭开了苏联解体的序幕。随着政治资源的流失，苏联民族分离趋势越发严重，冲突越来越多。1987年以来，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波罗的海三国独立风潮高涨。1988年，三国为了还原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苏德秘密协定”真相，进行了

抗议活动。1988～1990年，摩尔多瓦各民族在语言问题上发生纷争，进而演变为摩尔多瓦族人和俄罗斯族人的纷争。1990年，在格鲁吉亚发生了奥塞梯人同格鲁吉亚人之间的冲突。除了这些以外，苏联中亚地区的民族和外来的民族也发生了严重冲突[20]。严重的民族冲突使得民族矛盾难以化解。随着各加盟共和国主权实力的增加，苏联中央权力的削弱，各地区的独立运动已经不可阻挡。1990年，立陶宛最高苏维埃宣布共和国独立。接着，爱沙尼亚议会通过向独立过渡的决定，并决定更改国名、国徽。拉脱维亚最高苏维埃也通过《独立宣言》，改国名为拉脱维亚共和国，恢复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21]。波罗的海三国率先宣布独立，是苏联解体的开端。

第二，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分离使苏联完全解体。俄罗斯的独立倾向是和苏联民族问题紧密相连的。苏联在历史上就一直有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的矛盾，但是由于苏联中央集权的统治和领导人的错误认识，苏联一直认为民族问题已经解决。1985年，戈尔巴乔夫还说，并没有“立即意识到”民族关系方面改革的“必要性”[22]。但是，俄罗斯却认为长期以来，其他民族和地方共和国是靠吸吮俄罗斯这头“大奶牛”的乳汁才养肥了自己的[23]。在苏联民族主义风潮在各地兴起、苏联的民族方面的政治资源一再流失的时候，俄罗斯也在民主派叶利钦等人的带领下，加快了独立的步伐。1990年，俄罗斯召开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全会以907票赞成、13票反对、9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俄罗斯联邦国家主权宣言》，宣布俄罗斯是一个主权国家，俄罗斯保留自由退出苏联的权利[24]。由于俄罗斯是苏联各共和国中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经济最发达的加盟共和国，俄罗斯的独立倾向引起了其他各共和国的连锁反应，各共和国纷纷发表独立宣言和主权宣言。1990年，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全部发表了主权宣言。这样就彻底瓦解了苏联作为一个主权行为体存在的可能性。

---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232页。

[2] 宋新宁、陈岳：《国际政治经济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第61～67页。

[3] Paul Pibb.*The Soviet Union*：*The Incomplete Superpower* ，Macmillan Press Ltd，1986，pp.236-237.

[4] 陆南泉：《苏联走近衰亡的勃列日涅夫时期》，《东欧中亚研究》2001年第6期，第71～72页。

[5] 陆南泉：《苏联走近衰亡的勃列日涅夫时期》，《东欧中亚研究》2001年第6期，第71～72页。

[6] 陆南泉：《苏联走近衰亡的勃列日涅夫时期》，《东欧中亚研究》2001年第6期，第72页。

[7] 李兴：《论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外交与苏联的兴亡》，《科学社会主义》1999年第6期，第52页。

[8] 桂立：《苏联的争霸扩张政策与国家解体关系析》，《宁夏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第82页。

[9] 〔美〕安奈利斯·安德森等主编《展望90年代的美国》，贾继锋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第25页。

[10] 〔美〕安奈利斯·安德森等主编《展望90年代的美国》，贾继锋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第25页。

[11] 李兴：《论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外交与苏联的兴亡》，《科学社会主义》1999年第6期，第52页。

[12] 桂立：《苏联的争霸扩张政策与国家解体关系析》，《宁夏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第81页。

[13] 陆南泉等：《苏联兴亡史论》，人民出版社，2002，第694～706页。

[14] 方连庆、刘金质、王炳元：《战后国际关系史（1945～1995）》（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第626～629页。

[15] 亢稚文：《苏联解体与美国的外交政策》，《西伯利亚研究》1997年第4期，第49～50页。

[16] 许新等：《超级大国的崩溃——苏联解体原因探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第317～324页。

[17] 伏广存：《冷战与苏联解体论析》，《东欧中亚研究》1997年第6期，

第9～10页。

[18] 伏广存：《冷战与苏联解体论析》，《东欧中亚研究》1997年第6期，第9～10页。

[19] 张盛发：《苏联解体原因再探》，《俄罗斯研究》2001年第4期，第24～25页。

[20] 齐向等：《苏联解体内幕》，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第396～400页。

[21] 陆南泉等：《苏联兴亡史论》，人民出版社，2002，第812页。

[22] 齐向等：《苏联解体内幕》，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第401页。

[23] 陆南泉等：《苏联兴亡史论》，人民出版社，2002，第812页。

[24] 陆南泉等：《苏联兴亡史论》，人民出版社，2002，第812页。

四 中国军事软实力建设的战略思考

刘再起 张汉宽

泱泱大国，曾几何时，国土被践踏，人民遭涂炭，割地赔银，丧权辱国，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国力不济，军力不支。“落后就要挨打”，这已为古今中外的发展实践无数次地证明。当今世界，中华民族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以综合国力为基础，以军事实力作支撑，没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将无法得到保障。在新的历史时期，国家利益空间有了实质性的拓展，国家安全面临的挑战也日趋多样化、复杂化。在这个特殊的历史阶段，进一步加强国家军事实力建设特别是“军事软实力”建设显得尤为重要。

（一）加强军事软实力建设，是适应国家“和平崛起”发展战略的必然要求

中国是一个儒家思想根深蒂固的国家，始终向往、倡导并致力于促进世界和平。细心者不难发现，近年来，中国领导人出访十分频繁，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交善”——结交朋友，化解矛盾，促进和平稳定。而个别西方国家的领导人也四处巡查，但其目的则是为了“交恶”——“制造敌人”，干涉内政，挑起战争，把世界秩序搞得更加混乱。这表现出两种不同文明、不同思想的截然不同的行为目的和行为方式。基于对当前国际形势“和平与发展”是主流的基本判断，我国更是明确提出了“和平崛起”的国家发展战略。军队是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其建设与发展必须与国家发展战略相适应，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

当前，世界战略格局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各国关系发展以利益为上，传统“非友即敌”的简单判断式已不再成立，攻城略地式的单纯武力征服已退出主导地位，大量消灭敌之有生力量也不再成为主要目标，军事行动则更加注重于心理效果，战略运筹也更加注重慑服和瓦解对手，军事竞争更多地表现为与对手争夺军心民心、争取国际舆

论。所有这一切，都对军队维护国家利益的内容和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如果仅仅注重军队硬实力建设，则无法适应国家和平发展的战略需求，也难以在新的形势下有效地维护国家利益。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和大力加强中国军事软实力建设，这既是新形势的要求，也是历史的责任。

现代战争实践表明，军事软实力既是不战而胜的重要因素，也是我们在追求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时所必须着重考虑、善加运用的因素。软实力加上必要的军事手段，是未来达成战略目标的重要方式，也是当今世界军事领域竞争发展的基本趋势。此外，在中国的和平崛起的过程中，来自外部的“中国威胁论”始终没有停止过，为争取和平的发展环境，就需要大力加强军事软实力建设，树立我军和平之师的良好形象，提升中国和平崛起的形象。

（二）对我国现阶段军事软实力的基本认知

虽然软实力的建设与运用由来已久，但软实力这一个概念的提出却为时不久。因此，正确认识什么是军事软实力，既是认识军事软实力这一新事物的逻辑起点，也是把握其本质属性，探索其发展规律，找准我国军事软实力建设定位、实现科学发展的客观要求。

1.军事软实力的概念

军事软实力，是指一个国家的军队基于本国政治价值观、文化传统、军事思想、组织体制、战斗精神、对外形象等所产生的一种战略能力。军事软实力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包括军事理论、军事谋略、军队组织结构、军营文化、军人价值观等多个方面。中国军事软实力与其他软实力相比，具有明显的政治性、文化性和柔武性等基本特征。其中，政治性是核心，军事从来都是与政治联系在一起的，政治性是软实力的灵魂，中国军事软实力的政治性主要体现在服务国家利益上；文化性是载体，军事软实力深深植根于民族文化的土壤，是民族精神在军事领域中的呈现和升华；柔武性是外在表现，古人云“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就是指导战争应以军事为手段，以政治

为根本，恰到好处地综合运用硬实力与软实力。军事硬实力体现的是直接诉诸武力的能力，军事软实力体现的则是柔性运用军事力量，“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能力。

2.军事软实力的构成

军事软实力，是由多方力量构成的合力。总体来讲，中国军事软实力主要由军事理论软实力、战斗精神软实力、军事谋略软实力、军事文化软实力、军队结构软实力和军事外交软实力六个要素构成。军事理论软实力，是军队能力建设的“牵引力”。一支军队必须紧密跟踪世界军事发展趋势，着眼军队职能任务的拓展，大胆创新军事理论，用先进的军事理论指导军队能力建设，才能完成时代赋予军队的光荣使命。战斗精神软实力，是军队能力的“支撑力”。战斗精神是军队的强大精神支柱，它能够把军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到极致，是战斗力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一支军队既要有勇于“亮剑”的敢打敢拼精神，也要有“不抛弃、不放弃”的坚忍不拔、团结奋进的精神。军事谋略软实力，是军队发展的“设计力”。它体现的是军队建设的总体筹划能力，即军队“谋打赢”的能力。一支军队必须培养一批文化素质高、责任意识强、具有战略眼光和高超的军事艺术、能够把握世界军事发展趋势、科学设计军队建设的指挥军官，才能可靠地维护国家利益。军事文化软实力，是军队能力建设的“保障力”。“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在信息时代，文化对于军队更为重要，没有文化作保障，军队的其他能力建设就难以开展。军事文化软实力既对军队建设方向具有导向功能，也对我军“文明之师”建设和军人文化素质养成具有直接的作用。文化与军队、文化与战斗力的关系越来越紧密，提高官兵的科学文化水平已成为提升军队战斗力的直接因素。军队结构软实力，是军队能力建设的“组合力”，即由军队体制编制所体现出的“组织结构力”。相同的人员与武器装备，组合形式不同，其产生的战斗力也不同。只有科学地进行组合，才能使各种物质要素有机地结合起来，最大限度地生成和发挥军队的战斗力。军事外交软实力，是军队软实力的重要内容。军事外交领域是阐述我军军事理念、展示军队形象、增强国际影响能力的极好平

台，对争取友军、瓦解敌军，进而克敌制胜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3.军事软实力的基本功能

军事软实力通常表现为用非强制手段影响和塑造他方、达到军事战略目标的能力。军事软实力包括政治因素、文化因素、精神因素、机制因素等多种作用因素，其基本功能主要体现在凝聚力（聚合力）、影响力和威慑力（瓦解力）三个方面。

一是对内的凝聚力。对内的凝聚力包括军队内部的凝聚力和对人民群众的凝聚力两个方面。军队内部的凝聚力，即通过理想、信念、军人核心价值观等的培育，把军人个体团结成一个坚强战斗集体的聚合力。在革命战争时期，人民军队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惊天地、泣鬼神、照日月、贯五经的高风亮节和伟大力量，就是这种凝聚力的直接结果。对人民群众的凝聚力，即通过加强以“为人民服务”为集中体现的宗旨和为人民的利益勇于献身的精神为主要内容的软实力建设而生成的赢得人民支持的能力。这种人民群众对军队的支持能力是中国实施人民战争的基础，也是我军在以往的战争中以弱胜强、以劣胜优的根本所在。在信息时代，人民战争与现代高技术相结合，将会使人民军队如虎添翼，无往而不胜。

二是对友的影响力。有人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强大得可以独自决定世界的问题，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弱小得不能尽一份力量。这话不无道理，中国要和平崛起、和平发展，要致力于建立和谐世界，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必须尽可能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就要求中国应在越来越多的国家中，特别是友好国家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使它们与我国持有相同或相近的观点、立场，或者在某些方面给我国以支持。在非战争时期，只要军事软实力建设得好，运用得当，就会形成这种影响能力，就会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是对敌的威慑力。中央军委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明确指出，在强调打赢战争的基础上，更要强调遏制战争的爆发。在和平时期，要从国际关系全局和国家发展大局出发，做好军事斗争的准备，使敌望

而生畏、畏而却步。威慑，在当前世界上已经得到大量的运用，并产生了很好的效果。据统计，1945年以来世界上爆发的220多次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中，军事力量实际投入使用的实战仅占13%左右，绝大部分是通过显示实力，即威慑而制止了战争。这昭示着人类在不断的军事斗争实践中，普遍地开始认识到传统实战战略的有限性，而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多种手段来迫使对方屈服，以实现国家战略目的的威慑战略上升到重要地位。在伊拉克战争中，伊拉克的硬实力并不差，拥有50万精锐之师，但美军发挥军事软实力的优势，通过战略、战役、战术各层次的精神心理攻击，致使伊军高级将领不战而降，共和国卫队也从人间蒸发，军事软实力的威慑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三）中国军事软实力建设的战略定位

加快中国军事软实力建设，充分发挥军事软实力的功能，是军队建设的现实需要。我们必须解放思想、勇于创新，必须对军事软实力建设进行科学定位。

一是战略环境定位。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信息时代，我军建设的目标是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我军的发展现状是要实现机械化和信息化的复合发展。当前，机械化与信息化相互渗透，军事与经济相互融合，国与国之间利益关系在这种相互渗透、相互融合中快速变化调整，军事斗争对象更加不确定，军事力量的运用方式更加多样化。在国家间的竞争上，争夺以经济、科技、能源、信息为突出标志的综合国力优势和军事优势成为当前世界大国博弈的主调。在安全威胁上，国家安全面临的威胁已经远远超出领土、领空的范畴，对武装力量的运用场合、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军队需应对的威胁和挑战因素日趋多元。我们处在一个各种利益关系变化莫测，十分复杂的环境之中。因此，军事软实力建设必须立足所处的战略环境进行谋划和组织实施。

二是战略目标定位。中国致力于建设和谐世界，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实行防御性国防政策，反对霸权和强权政治。反映到军事软实

力建设上，就是要着眼于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建设与我国国际地位和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相适应的军事软实力，提高应对危机、遏制战争、维护和平的能力。

三是战略任务定位。军事软实力建设的战略任务包括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对内主要是从战斗精神、军事谋略、军事文化、军队组织结构等方面进行建设，形成完整的军事软实力体系，确保高质量地遂行多样化任务。对外主要是通过对外宣传和与外国、外军的交流与合作，树立我军文明之师、威武之师的良好形象，增强我军的影响力，消除“中国威胁论”，为促进我军现代化提供道义支持，为实现国家“和平崛起”创造有利环境，为维护世界和平发挥重要作用。

（四）加强中国军事软实力的几点建议

中国军事软实力建设，是我国国防能力建设的重大系统工程，目前还刚刚起步，必须运用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认真进行战略谋划，找准着力点，采取正确的方法途径，实现军事软实力建设的又好又快发展。

1.搞好顶层设计，系统规划军事软实力建设的长远发展

加强军事软实力的建设，首要的是把军事软实力的建设与运用纳入国家战略和军事战略。重视顶层设计和总体筹划，像重视军事硬实力建设一样，重视军事软实力建设，要有一个明确的军事软实力建设发展思路，有效整合各种资源，从政治、经济、外交、文化、军事等多个层面进行建设。在国家安全战略上，把和平运用武力、柔性运用武力，提高到国家基本国防政策的高度，使军队不仅拥有坚不可摧的硬实力，而且拥有一种“有德不可敌”的软实力，在展示国家形象、建设和谐世界中发挥作用。在军事战略指导上，一方面，要有强烈的“亮剑”意识，争分夺秒、扎扎实实地做好军事斗争准备，努力提高打赢能力，随时准备在必要时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维护国家的安全和主权；另一方面，要有强烈的战略机遇期的维护意识，注重有利于我的战略态势的营造，注重危机管理和控制，注重舆论战、心理战、法

律战等软作战手段的运用，力求和平解决问题或者以最少的武力手段解决问题。

2.抓住建设重点，大力培育革命军人的核心价值观

国际上军事软实力的博弈虽然多层次展开，但最深层次的仍然是军人核心价值观的博弈。军人核心价值观是军事软实力的灵魂，用什么样的核心价值观养兵教战，军队就有什么样的形象。

一是要用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军事文化培育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毛泽东军事思想、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和胡锦涛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论述是与时俱进的党的军事指导理论，是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军事文化的基础，要在推进先进军事文化创新发展中，用科学理论培育官兵核心价值观，筑牢我军软实力的根基。二是要用优秀传统武德文化特别是我军革命道德传统文化培育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武德文化源远流长，集中体现为尽忠报国、贵仁尚义、尚武精艺、礼智信勇等价值理想。特别是党领导我军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斗争中，先后创造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精神，培育和形成了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的优良革命传统。要进一步传承发扬这些优良传统，为增强我军软实力强基固本。三是要用我军特色的军营文化培育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不能离开军营的特殊背景和条件。军队是一个担负特殊任务的集体，军营是一个特殊的活动平台，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和和平建设时期，我军形成了内容丰富、独具特色的军营，但在信息时代，军人的知识结构、文化需求和军营环境本身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必须依据变化，针对特点，借鉴外军经验，大力创新军营文化，用先进的军营文化推动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培育向外延扩展和内涵深化。

3.突出中国特色，不断改进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

军队是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脱离政治目标的军事软实力既无意义也不存在，政治性是软实力的灵魂。在我军建设和发展的历程

中，形成了一整套独具特色的政治工作体系，这是实现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巩固和提高战斗力的根本保证，也是我军软实力建设的制度基础。在新世纪新阶段，我军政治工作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这必然给政治工作的开展带来诸多难题，使政治工作亟待加强和改进。要突出我国军事软实力建设的政治特色，充分发挥我军的政治工作优势，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政治工作，使军队政治工作成为军事软实力建设的重点和亮点。

4.着眼于职能使命，全面提升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

军事软实力建设是有效履行我军历史使命的客观要求，军队职能使命的拓展和延伸要求军事能力必须相应提升。履行新世纪新阶段的历史使命，要求我军把应对传统军事安全威胁与应对多样化的非传统安全威胁统一起来，把打赢战争与遏制战争统一起来，把维护国家利益、保卫国家安全和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和谐统一起来，把军事硬摧毁和军事软打击结合起来。近年来，恐怖主义国际化的趋势明显，热点敏感地区的冲突、骚乱等恐怖事件不断发生，地震、冰雪、洪涝等自然灾害频频发生，为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军队必须着眼于新的使命，立足现实，合理构建军事软实力建设内容，全面提升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

5.加强对外宣传，树立中国军队的良好形象

军队的形象是构成军事软实力的要素之一。形象是内在气质的外化，是一支军队性质、宗旨、纪律、战斗力等的外在体现，具有巨大的影响力。良好的形象，历来都是军队赢得人心、凝聚军心，争取友军、瓦解敌军，进而克敌制胜的法宝。在当今这个媒体高度发达、战场趋于透明的时代，军队形象更是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形象，关系到人们对军事行动是否具备正义性、合法性、有理性的判断，对军事任务的完成、政治目标的实现影响甚大。

一个时期以来，中国军队的正确信息在世界上得不到有效的传播，中国军队形象往往被国际社会误读甚至丑化。这与我军对外宣传

欠缺有直接的关系。为维护我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军队的形象，必须构建对外军事宣传体系，搞好对外宣传。一是要统筹军队对外宣传力量。要在总部有关部门的统一领导协调下，对军队内部隶属不同部门的新闻媒体、信息网络等进行合理整合，加大对外舆论传播的力度。二是要建立军地媒体合作机制。要依托我国对外宣传和传播的媒介平台，如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以及各种对外刊物，及时向世界传播我军的声音，塑造我军对外形象。三是要建立平战结合机制。要参照国外做法，制定平时和战时不同的新闻传播政策和管理体系，积极探索建立军地一体、军地联动机制和舆论应急处理机制，理顺政府、军队和社会媒体的关系。平时服务于世界公众对中国国防政策、军队形象和民众国防观念等了解的需求，战时服务于国家政治和军事战略需要，提高国家和军队对战时舆论的控制能力。四是要建立与境外媒体合作机制。充分利用我国军事代表团出访、联合军事演习、驻外机构和访问学者的作用，积极开展对外舆论传播。还可有效利用境外媒体驻我国记者的特殊作用，结合军队的重大活动，在不影响保密的情况下，组织他们到部队参观访问，通过海外媒体进一步展示我军的良好形象。

我国军事软实力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集全国和全军的智慧。我们只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不断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并发扬光大，大力培育当代革命军人的核心价值观，全面提升我军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就一定能够实现军事软实力建设又好又快发展。

五 苏联解体与现代公有产权制度的包容性和发展

肖毅敏

苏联解体的历史意义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作为一个依靠强力聚合起来的多民族国家，当维持统一的力量消失后，由民族独立所推动的国家解体，只是世界历史长河中国家分合的一例普通事件；苏联解体同时又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和建立这个国家的伟大的共产党的消亡，这是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绝无仅有的历史性重大事件，人们不能不重新思考社会主义制度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中的地位、存在方式和发展形式。

苏联解体后，原苏联国家和东欧国家全面启动了私有化进程。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运动在欧洲的终结，而只是表明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管理模式的终结，而这种终结过程在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早已进行。

苏联解体后社会主义运动仍然在俄罗斯等解体后的新生国家以新的形式进行着。这种新形式在政治上表现为共产党作为一大党派参与执政竞选，在经济上表现为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和平共处。以俄罗斯为例，苏联解体后俄罗斯通过大、小私有化，到1996年底基本完成所有制改造，所有制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据俄罗斯国家统计委员会资料，截至1996年底，俄罗斯实现私有化的企业共有12.46万个，占私有化初期国有企业总数的60%；在企业比重上，国有企业和市政企业占企业总数的16.6%，私有企业占69.1%；在资产比重上，国有资产占国民经济资产总量的45%，非国有资产占55%；在产出比重上，国有经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8%，私有经济占28%。因此，私有化后的俄罗斯，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仍占有相当比重，并居于主导地位。

摆脱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的真谛，或者说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

关键，就是放弃经济上的单一体制。原因很简单：垄断会产生停滞和落后、腐败与灭亡。放弃单一体制不是社会主义的终结，而是社会主义的新发展。社会主义走向了相互包容、共同发展之路。

六 关于苏联剧变原因研究中若干问题的思考

王晓敏

“苏联解体”与“苏联剧变”的含义之别，是探讨苏联兴亡不可不察的基本概念问题。

自苏联发生制度变革之后，人们频繁地使用“苏联解体”与“苏联剧变”等说法用以指称这一历史性事件，有时也会将苏联的变革与此前东欧的变局连在一起称为“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总体来看，更多的人习惯于用“苏联解体”这一说法来概括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垮台和国家分裂这一事件。不少人在总结苏联兴亡和苏共亡党的原因及其经验教训时，也喜欢用“苏联解体”这一说法，其实这都是值得检讨的。

笔者以为，这种不分场合和探讨的具体问题的差异而笼统使用“苏联解体”这一说法，有失严谨。从一些人对这一概念的实际使用可以看出，在一定程度上是某种偏好所致。不少俄国人使用“苏联解体”这个说法，多少渗透着失去昔日超级大国地位的大国情结。一些人使用“苏联解体”的说法，或许是与世界格局中力量对比和地缘政治的巨大变化有关。苏东集团作为两极时期的主角之一，对欧亚地缘政治形势有着重大影响，苏联作为大国而解体的重要后果之一就是地缘政治形势的巨大变化，俄前总统普京曾明确表达过这一意思。但不论怎样，应该说，“解体”与“剧变”有着不同的含义和明确的差异。解体是就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性而言，是统一与分裂问题；剧变是言其社会制度变革之剧烈，这个剧烈变化主要是指社会主义制度的终结和共产党执政地位的丧失。国家分裂是社会根本制度变革的结果。两者虽有一定联系，但各自的具体所指还是有所不同，“解体”不足以涵盖国家分裂和社会制度更替等众多内容。更值得注意的是，分裂与社会制度的变更相比而言，其影响力要小得多。因为苏联的宪法和联盟制度的设计本身就隐含了国家分裂的可能性，从法律意义上来讲，分裂不是什么大逆不道的事。作为苏联前身的俄国，在十月革命爆发后一

段时间内，就已经发生了分裂，后来重新统一与革命在全俄的凯歌行进和共产党的作用密不可分。而社会制度的更迭无论从法律上还是政治价值观来讲，都具有颠覆性。可以说，就苏联来讲，国家分裂不必然导致苏共垮台和社会主义制度终结，而苏共垮台和放弃社会主义选择必致联盟瓦解，这是当初成立苏联时的宗旨和联盟制度设计本身就决定了的。联盟是各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联盟，有其特殊的内在矛盾和维持联盟稳定的因素，凝聚各共和国和各民族的是社会主义目标，马克思主义是维系联盟的精神纽带，而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及其能否坚持，则取决于苏联共产党，党是凝聚力的核心所在和联盟能否稳定的最重要因素，一旦失去这个核心，放弃社会主义，联盟的瓦解也就可能发生。当然，在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也不是没有国家分裂的可能，但这种情况下的分裂在法律上是允许的，也不见得其后果就是危害性的。假如当时苏联一分为15个共产党执政的国家而不是苏共垮台灭亡，其对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震动和冲击恐远不及人们近20年来所感受的那样剧烈和深刻。对于作为共产党领导和执政的社会主义的中国来讲，苏联社会制度变化所带来的影响要远大于苏联作为中国邻国解体而产生的影响。这也是近20年来中国人不断研究苏联兴亡和探讨苏共亡党教训的主要原因所在。

因此，笔者认为，从总结苏联兴亡原因和教训这个角度讲，使用“苏联剧变”这个说法可能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也切当一些。

七 苏联环境政策失败的教训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宋萌荣

苏联在其发展过程中，一直受到追求经济高速增长与保护生态环境这一矛盾的困扰，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环境保护总是让位于经济增长。苏联在这方面的教训、启示极为深刻，主要有两点。

首先，摒弃增长第一的发展战略，把保护生态环境上升为国家意志，才能有效解决环境问题。苏联发展模式的特征之一，是重视数量增长，忽视质量改进；重视经济发展，轻视生态环境保护，致使问题逐渐积累。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世界性的环境保护浪潮的兴起，苏联制定了一系列环境保护法规政策措施，力图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保护生态环境。但因其奉行的增长第一发展理念没有改变而收效甚微。苏联要在经济和军事方面追赶已经是高度发达的且怀有敌意的西方，因此在实践中环境指标总是让位于经济高速增长的单一目标：生态环境保护投资往往是根据经济发展需求的“剩余”来安排；“生态鉴定”即环境影响评估常常走过场；对环境违法行为也并不认真查处；各级政府是根据生产计划指标而不是环境指标的完成情况确定企业的报酬和奖金；企业领导乃至地方官员的政绩和前程也是根据经济增长的数字决定的。总而言之，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导致了很多很好的政策停留在口头上而没有真正付诸实施，生态环境破坏依然如故。由此可见，保护生态环境国家意志至关重要，只有国家真正重视生态环境问题，真正当成基本国策，像考核经济指标一样考核环境指标，从发展战略层面解决环境问题，才能避免苏联环境政策失败的结局。

其次，透支资源环境的增长第一发展战略，影响了国家竞争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损害了共产党执政的基础。苏联发展模式表明，在战争与革命的年代，因承受着“落后就要挨打”的巨大压力，追求不顾一切的高速增长自有其道理。但在和平与发展年代，仍追求数量型的、低水平的快速增长，其负面影响就日益显露：既导致了资源

的大量消耗，又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还导致同发达国家发展水平差距拉大，在竞争中越来越处于劣势。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主要工业品，如石油、天然气、铁矿石、钢、水泥等的生产都大大超过美国，但是苏联每生产1卢布的国民收入消耗的电比美国多20%，钢多90%，石油多100%，水泥多80% [1] 。戈尔巴乔夫上任后不得不承认："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资源日益难以开发，而且越来越昂贵。"粗放型发展使经济走进了死胡同。不仅如此，苏联发展模式"为生产而生产"。"生产大量的中间产品，而中间产品基本上又重新用来生产中间产品。这种'自我折腾'不仅破坏了自然资源和使经济发展脱离它的真正发展目标——提高社会福利，而且实际上是人为地制造所有产品的日益短缺。" [2] 当高速增长不再能持续，当短缺成为常态并日益严重，而生态环境也不断恶化，社会不满空前加剧，最终导致苏共失去了执政地位。

我国正处在工业化、现代化加速发展的进程中，汲取苏联发展的教训至关重要，因为我国的资源没有苏联那样丰富，环境承载力没有苏联强，人口数量又远超苏联。我们要为每年新增的1000多万人口提供衣食住行，要使贫困落后地区脱贫，还要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些都要靠发展来解决。而今，资源环境约束已经成为我国发展最突出的问题。我国对进口石油和铁矿石的依赖已经超过了50%，其他矿产资源的供应保障能力也日渐不足，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已经威胁到了国家的生态安全。这就更要求我们必须秉承正确的发展思路，走经济平稳适度发展、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之路。我们党正是汲取了苏联的教训和人类先进的发展理念，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国家"十二五"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中首次提出居民收入增幅要超过GDP的增幅，把人民生活和生活质量置于经济快速增长之上，经济社会发展的取向正从强国富民转变为富民强国。但是，摒弃"增长第一"这一根深蒂固的观念并非易事，而转变增长第一的发展方式也绝非一朝一夕能完成。只有真正记取苏联发展的教训，坚决告别"增长第一"，纠正实践中GDP增长第一的偏向，科学发展、适度发展，才能从源头上减少环境问题产生，进而对历史积欠问题进行治理，避免形成生态危机，造成不可逆转的严重后果。

---

[1] 江流、徐葵等主编《苏联剧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第66页。

[2] 〔苏〕M.列梅舍夫：《经济利益和社会自然资源利用》，赵玉龄译，载于〔苏〕尤里·阿法纳西耶夫编《别无选择——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和未来》，王复士等译，辽宁大学出版社，1989，第345页。

八 文明的融合：21世纪中俄两国关系发展前景展望

李明伟

21世纪中俄两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两国将走上东西方文明融合的发展道路。21世纪俄罗斯的西方因素和东方因素将同时起作用，而中国的传统因素和西方因素也将同时起作用。这决定了两国将在更多的领域展开合作。两国关系将进一步深化和加强。

中俄两国所取得的任何成就都会对对方产生重大的影响，成功经验会逐渐为对方所借鉴和吸收。历史上，在村社制度下，“俄罗斯没有私有财产。这好像使俄罗斯不擅长商业活动”。而古老的中国颇具商业传统和教育传统，这种传统将随着中华文明的复兴而不断发扬。在新的世纪里，中国新的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的成功将对发展中的俄罗斯文明产生重大影响。俄罗斯有可能借鉴中国的文化模式，推动文明的新的发展与进步。

新的世纪到来之际，中国正处于一个日益繁荣的环太平洋经济—科技圈之中。世界新科学技术革命和环太平洋经济—科技圈日益繁荣不仅对中国提出严峻挑战，也为中国的起飞提供了更多的契机。在新世纪里中国的经济的巨大发展和市场经济的成功，也将对俄罗斯产生巨大的吸引力。俄罗斯有可能借鉴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

21世纪俄罗斯将走上既学习西方同时又接近东方的现代化道路。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信息中心主任欧安德教授曾经指出：中国、越南等地都有各自的改革经验，而对于俄罗斯来说，中国的改革经验最宝贵。我们目前最关注的是：中国改革的措施能否运用于俄罗斯。中国改革的关键不在于速度，也不在于私有化的建设，而在于注重生产力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俄罗斯最大的优势是资源优势，中国最紧张的则是资源，最丰富的是人力资源，俄中之间应该加强经济往来，俄罗斯应该通过发展经济，像中国那样，提高高科技的投入，建立自

己的高新技术产业。

在21世纪，中国和俄罗斯都应该更深层次地接纳西方文明的优秀成果，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在同西方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同时，两国要想在未来世界的发展中取得优势，又必须把先进的西方文化同东方文化的根基结合起来，释放出巨大的发展潜力。中俄两国20世纪的历史表明，只有站在具有深厚东方文化根基的土地上接纳西方文明的优秀成果，寻找到两者的契合点，才能展开飞翔的双翼。

21世纪人类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但人类在发展中的高风险性也在进一步加大。西方文明的进步带动了整个世界的进步，同时也把人类带入了危机和迷茫之中。在全球化背景下，全球变暖、能源压力、水资源危机、高新技术给人类带来的危害，民族与宗教矛盾加剧等全球普遍存在的问题出现在人类面前。这一切都为东方文明参与全球发展提供了历史契机。在21世纪，中俄在国际关系领域里的合作还要加强和拓宽，不仅包括处理地区危机，还要包括维护世界和平、防止国际犯罪、环境保护等领域，承担维护世界秩序的主要责任，真正体现世界大国的风范。

世界历史和科学史的经验证明：在新的文化体系内，由于文明融合的优势，科学很容易产生新的突破或突飞猛进的增长。在近代欧洲，俄罗斯在科学领域起步最晚。1724年，彼得大帝建立科学院，1755年莫斯科大学建立，但由于文化的差异，使它获得了空前发展的机遇，但经过两个世纪的发展，俄国依靠自己的文明优势，实现了人类航天的梦想，它在空间领域和核能技术方面走在了人类前列。

21世纪，人类正在进入一个不同文明在和平交往中相互学习、彼此借鉴的时期，人类文明的未来取决于世界各大文明的政治、精神和知识领域的理解与合作。中国和俄罗斯之间彼此携手，共同前进，将是人类文明和平发展、防止世界战争的最重要保证。

九 从“以人为本”的视角初探苏联解体的体制原因

王振国

纵观苏联的发展历程，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在于其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在制度与实践方面背离了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以人为本”——的要求。

“以人为本”是对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结合中国社会发展的新情况，吸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教训，提出了以“以人为本”为本质与核心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强调依靠最广大人民的力量谋发展，通过提高广大劳动者的素质促发展，强调人民群众是发展的根本动力。这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对“靠谁发展”、“为谁发展”的问题作出的科学回答。唯物史观的这一观点决定了共产党人必须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作为自己最根本的价值取向，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从我国发展的现实情况看，坚持以人为本，不仅是化解疏导国内矛盾和问题的法宝，更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从长远看，以人为本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现阶段社会主义社会的具体体现和必然要求。

中国共产党坚持科学发展观，从而确立了以人为本的执政新理念。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是在科学观察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的发展趋势，深刻总结我们党和世界上一些政党执政历史经验，特别是汲取了苏共败亡教训基础上形成的。胡锦涛同志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1] 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的原因是复杂的，教训是深刻的，今天我们从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的新视角，重新审视苏共败亡的原因，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执政的苏共背弃了以人为本的执政理

念，因此在实践上未能保障好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最终脱离了群众，从而丧失了其执政的合法性根基。

---

[1] 《胡锦涛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04年4月5日《人民日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在这里沉思：苏联解体20周年祭/李慎明主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9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 研究系列）

ISBN 978-7-5097-2639-6

I.①历… II.①李… III.①苏联解体-国际学术会议-文集 IV.①D751.2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72136号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研究系列45

历史在这里沉思

——苏联解体20周年祭

主编/李慎明

副主编/王立强 傅军胜 曹苏红

出版人/谢寿光

总编辑/邹东涛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3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100029

责任部门/编译中心（010）59367139 责任编辑/曹义恒

电子信箱/bianyibu@ssap.cn 责任校对/盖立杰 吴旭栋

项目统筹/祝得彬 责任印制/岳阳

总经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010）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

印装/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41.75

版次/2011年9月第1版 字数/738千字

印次/2011年9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097-2639-6

定价/129.00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 · 研究系列

本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联合国内11家相关权威研究单位举办的“中国社会科学论坛——苏联解体2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集，来自10个国家的23位外国学者以及全国各地50多个科研单位、高等院校的共260多位学者与会。

本书从以下主题出发，对苏联解体及其影响展开论述：戈氏“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与苏联解体，苏联70年兴亡历史，西方大国的和平演变战略与苏联解体，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及美国全球战略新变化，苏联解体后资本运动的新特点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对苏联亡党亡国几个有争议问题的评析，国际理论界对苏东剧变重大历史事件的回顾与展望。

本书对我们深入了解苏联解体的原因及后果，准确把握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现状及趋势，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上架建议：国际政治



ISBN 978-7-5097-2639-6
定价：129.00元

www.ssap.com.cn